

目 录

家谱杂谈	3
守望中华礼仪之邦	38
楚汉相争的决战问题	58
漫谈中唐诗坛	76
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	113
汉字书法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136
东北名人书翰一瞥	163
摘藻扬芬连海情	169
日本人的心与佛教	193
大连图书馆藏稿本述略	213
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之满语、满学图书概述与举要.....	228
眉批钞	249

大连图书馆藏国家善本概论	254
浅析近代以前地域带给中日间的文化差异.....	265
中国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	276
毛文龙与“毛家将”述论	303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320
《读书敏求记》版本源流述略	368
东洋文库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料随录.....	389
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往来函件略考	441
门前两株白果树	455
《天风阁词》论稿	458
尺牍书法中所见平阙书仪及艺术范式	470
国贼郑孝胥旅大行事心迹考实	503

家谱杂谈

张树汉 谷庆福

一、家谱是什么

家谱亦称族谱、宗谱、家乘等，是一种明血统、序昭穆，记载一个家族繁衍发展历史的一种著作，也就是说，入谱者必须是同宗共祖。因此，即使是同姓未必就是同宗共祖，当然就不能修入一部家谱之中，就如同是王姓，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分为琅琊王、太原王、晋陵王等许多宗支。因此，民间流传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说法并不确当。而在当时门第制度森严的社会里，则以琅琊王、太原王为高贵，他们总是以自己的郡望来区别其他郡的王姓，以显示自己的高贵。因此在当时，门第的高下，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因此，对于姓谱记录的重视，则被视为当时的大事。这也就使我联想到在上个世纪，在中国发生过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将全体中国人用“红五类”、“黑五类”来区分，自然是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乃至生命。两者虽然不好直接比拟，但它却可帮助我们理解在门阀制度下，不同人群所处的社会地位是不一样的。清朝历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中就曾举例说：南齐“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王俭乃琅琊王氏，而王敬则是晋陵王氏，姓氏虽同，由于郡望不同，门第相去甚远，当然社会地位相差很大，因而王俭愤愤不平，以为这样一来，是在降低自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可见在当时，同一个姓氏，由于郡望之不同，社会地位则全然不同。所以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一书中就指出，当时的

社会：“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人，无寸进之路。”正因如此，所以在当时，这些高门大姓都非常重视家谱的编修，以防备同姓寒门的假冒。

对于家谱、族谱、宗谱这样一种特有的著作形式或文体，当今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比较陌生的，青年人更加如此。这种家谱、族谱，最初都是由谱（表）与牒两部分所组成，发展到后来则又增加了传、图、艺文、家训等内容。而最基本的则是谱与牒两部分。谱者就是指用列表的方法来记载一家一族的世系发展过程。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因为古代以表来表述家史之书均称之为谱，故将用表记述家史之书亦称之为谱。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

“古者纪年别系之书，谓之谱，太史公改而为表。”指的就是司马迁在学周谱的基础上，编修了《史记》中的十表。《史记·太史公自序》曰：“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开头便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谱牒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谱十二诸侯，就是表列十二诸侯，即作《十二诸侯年表》。司马迁多次称谱牒，实际上是指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也许有人会问，家谱这类书籍为什么要用列表的形式？主要是取其能够做到简而明，看起来能够一目了然。关于这点，章学诚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一文中也已指出：“世系设表，惟取其分别支派，使蝉联系属，皎若列眉，但书名讳，占地无多。”当然，单靠列表有些问题还无法得到解决，因此他在叙文中又说：

“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历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莹墓而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盖古法也。”¹又在《家谱杂议》中说：“夫旁行斜上，周谱之法，原取便于

¹《章学诚遗书》卷十三。

稽查，使夫昭穆亲疏，一望可晓耳。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

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家谱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编写的。后来的发展，内容也不断丰富，如家族中主要人物或称谱主，为其作传，有的是做过官，有的是学术上有过贡献，也有的是为社会作过贡献，如此等等，都应当在家谱中为其立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不仅如此，章学诚还提出，家谱中同样应为妇女立传，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就曾这样说：“史传、方志，并有妇女之篇，所以表内行也。……刘向所录，劝戒并存；范史所标，但取高秀。后世乃专划于贞孝节烈，于义虽曰甚正，而途则隘矣。方志宽于史传，家谱自当宽于方志。内行可称，何必尽出一途？凡安常处顺，而不以贞孝节烈当其变者，有如淑媛相夫，贤母训子，哲妇持家，闺秀文墨之才，婢妾一节之善，岂无可录？则规规于节孝斯存，无乃拘乎！”章氏这番言论，明显是针对宋元以来理学思想而言，因为在理学家看来，妇女一生，只要做到贞孝节烈就行了，也只有做到这些，方能立传，因此，当时就流行着“妇女无才便是德”的说法。章学诚则认为妇女在家庭中只要有过作为、有过贡献、很有才华等，诸如相夫有力（即如今日所称之贤内助）、教子有方等都应为之在家谱中立传。因为既然是一个家族的历史，这个家族的承传必然要靠全体家族的成员共同努力，其中当然应当包括这个家族的妇女的贡献。若是能按章氏这个主张编写家谱，那么这个家族的子孙后代，不仅会知道自己的曾祖、高祖、祖父等家族成员在这个家族发展过程中各自所作出的贡献，而且也将可以了解到曾祖母、高祖母等为这个家族所作过的贡献。章氏这一主张乃是前无古人，值得提倡和宏扬。除了传记以外，许多家谱都还绘有各种图。谱主或家族中主要成员

都还绘有画像、祠堂、莹地也都绘有平面图，注明所在位置和朝向。至于家谱中之艺文，则是著录这个家族所有成员的著作。章学诚还提出，除艺文而外，还应当设立“文征”，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叙例》中说：“谱为家史，前人嘉言懿行，诸传既已载之，文则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于首矣，旧谱传状，多删取为新谱列传，取划一于体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录于文征，非第存文，且使新谱诸传，详略互见，亦史家旁证之遗愿也；考订论辨之文，有关先世传闻异同，嫌介疑似，尤为谱牒指南，则次列之；诗赋词章，或有所抒发，或中有感遇，古人所贵赋诗以见志也，则又次列之。”以上三方面内容，应为“文征内篇”，所选皆为本族人所写。而对于亲友应酬投赠，亦应选录编为“文征外篇”，以显示本族“当日交谊”之盛。如此一来，这部家谱之内容自然就非常丰富了。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家谱是一个家族或宗族繁衍、承传、发展的历史。对此，历史学家实际上早已下了结论，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州县清立志科议》中就曾这样说：“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¹他的好友著名历史学家邵晋涵也说：“家之有谱，固与国之有史、州之有志而并重也。”²

二、私家之谱起源于何时

作为一个家族的私家之谱究竟产生于何时？就已知研究谱学的文章来看，显然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提出在两周时期已经产生了。有的则说在氏族社会已经产生了。我可以明确告诉大家，这两种说法是不可信的。现在有的研究者把西周青铜器上所刻的世系表一律称之为私家之谱，这是很难成立的。因

¹ 《文史通义新编新论》外篇四。

² 《南江文钞》卷九《余姚史氏宗谱序》。

为在西周时期，产生后来那种私家之谱的社会条件并不存，而当时能够铸造规模如此宏大的青铜器，显然都是贵族阶层。赵光贤先生在《周化社会辨析》一书中的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问题：“宗法制度是周人在新的封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为他服务的一种上层建筑。它是直接以维持大小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为目的的，间接以巩固封建秩序为目的的，所以说宗法制度是支持封建社会的主要支柱。战国以前，宗法制度本来是贵族阶级所专有，与庶民无关。”在周代社会中，要么就是宗法制度下的大小贵族，要么就是与宗法制度无关的庶民，这种庶民能有能力铸造为自己祖先歌功颂德的青铜器吗？谁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所有青铜器大多出自各类诸侯所制造，他们不仅具备一定的社会地位，而且还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否则能够兴师动众的铸造吗？因此，这种家族与秦汉以后的“私家”自然不能等同，当然将青铜器上的世系表视作我们今天所讲的私家之谱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谱牒学是起源于西周，而私家之谱的产生则是秦汉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我在《试论谱学的起源》¹一文中已经有过论述了。而私家之谱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实际上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当时错综复杂的各种社会因素促使着这种私家之谱的大量发展，第一，门阀制度是使私家之谱发展的基础和政治条件。两汉以来，由于地方豪族地主经济的势力不断发展和膨胀，乃形成了累世显荣的门阀制度，这些世家大族，大都聚族而居，多者数千家，少者千余家，方圆数十里，组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群体。他们凭借着在社会上的特殊地位，只要得到推荐，就很快能够登仕。加之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又是为巩固世家大族利益的用人

¹ 载《历史文献研究》总第19辑。

制度。因为当时的所有政权，都与这些世家大族是休戚相关的。世家大族正是这些政权得以生存的重要支柱，当然每个政权对这些世家大族也就无微不至的关怀。就以东晋政权的建立而言，就是得到北方南下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而得以重建，其中琅琊王氏拥戴之功居多。因此，王导位至宰相，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当时社会上就流传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司马氏所重建的东晋政权是与世家大族共有的天下。根据史料记载，王、谢两家在江浙一带占有了大量的良田。这些世家大族为了巩固其在政治、经济上的地位和特权，维护门第制度，于是又各自标榜自己的郡望，以达到垄断权势的目的。于是便大写家谱、族谱，以显示自己门第的高上，郡望的优越。于是就出现了颖川荀氏、陈氏；平原华氏；山阳郗氏；河东裴氏、卫氏；扶风苏氏；京兆杜氏；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等著名的郡望大姓，对这种现象，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邑里》篇中就曾指出：“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这些世家大族，便纷纷编修族谱、宗谱，以防止寒门同姓的假冒，垄断自己固有的特权。

第二，当时社会上的避讳流行，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必须懂得谱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避讳之风盛行，因此，无论在官场还是社交活动中，都得熟悉谱学，否则不仅要得罪人，而且还会引发是非，乃至招来大祸。就连当时著名学者颜之推亦深感无可奈何：“今人避讳，更急于古，凡名之者，当为孙地。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无僇赖焉。”¹一位学者尚且发出如此感叹，其影响之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北齐高祖高欢，其父名树生，据《北齐书·杜弼传》载：“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云须取

¹ 《颜氏家训·风操篇》。

署，子炎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于前。”杜弼为之辩护几句，高祖又骂杜弼，并“叱令出去”。可见凡是不小心而触犯帝王之避讳，就要遭到如此厄运。因此有些人由于自己的名字触犯了帝王之讳，宁可弃官不干，免得引来大祸。此时不仅帝王的名字需要避讳，就连后妃亦是如此。著名的如郑太妃小名叫阿春，东晋建文帝母亲，晋元帝妃，后追尊为太后。因此春字就得避讳，故当时地名中凡遇春字悉改为阳字，富春改为富阳，宜春该为宜阳，而历史书凡称春秋者，皆改曰阳秋，于是就出现了《晋阳秋》、《汉晋阳秋》等书名。而在日常社交中，凡涉及对方父祖之名时必须回避，否则将会引起对方的痛哭流涕。据《北史·熊安生传》记载，北朝儒生熊安生，会见徐之才、和士开等人，“以徐之才讳‘雄’”，和士开讳‘安’，乃称‘触触生’。”这自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这就说明，由于避讳之风盛行，家谱就显得更为重要，不了解社会上那些重要的谱系，真是寸步难行。据《南史·王曾孺传》记载，谱学家王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传为佳话，也说明作为一名谱学家确实也不太容易。

至于什么叫“避讳”？如今知道的人恐怕不会很多了，看来也不单是年轻人如此。实际上如果能够知道一些“避讳”的常识，对于阅读古代书记还是大有好处的。著名学者陈垣老先生在其所著《史讳举例》的序文中是这样说的：“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二千年。其流弊足以淆乱古文书，然反而利用之，则可以解释古文书之疑滞，辨别古文书之真伪及时代，识者便焉。盖讳字各朝不同，不啻为时代之标志，前乎此或后乎此均不能有是。”他又在《通鉴胡注表微》一书的《避

讳篇》中说：“避讳为民国以前吾国特有之体制，故史书上之记载有待于以避讳解释者甚众，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可见避讳这一不良的风俗，在我国两千年历史发展中，在史书撰写和文献记录中，都曾起过深远的影响。上引两段陈老的论述，既为我们讲述了什么叫避讳及其起源发展情况，又为我们讲清了避讳在古代书籍中特别是史书中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我们今天掌握和利用它的意义何在。正如陈老所言，“不讲避讳学，不足以读中国之史也”。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避讳并不是专指对君主而言，对于“所尊之名”同样是要闭会的，如对于自己的师长和长辈，在旧社会里都是要避讳的，对于他（她）们都是不能直呼其名的。我们上面讲的北朝儒生熊安生去拜会两位朋友时避讳的情况就是明证，这并不是笑话，而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在《周书·熊安生传》是有明确记载的。又如我小时候曾读过私塾，私塾先生就曾这样教我们：“孔子姓孔名丘，字仲尼”。但这个“丘”字就必须读作“某”，而在书写的时候还必须缺一笔“丘”，表示对孔老夫子是不能直呼其名的。为什么当时要这么读这么做并不知道，恐怕私塾先生本人也未必知道，原来这就叫做避讳。而对于当代的帝王自然更是非避讳不可了，否则还将会引来杀身之祸。因此，不仅是人名、地名必须避讳，即使是姓氏、官名也得要改。就以封建时代中央所实行的三省六部而言，唐初的六部是：史部、民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唐高宗即位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遂将民部改为户部。又如对都城的称呼，本称京师，到了西晋，司马师称帝后，避其讳，遂改称京都。总之，古代书籍中，由于避讳而改前人的姓、名、官名、地名、书名、谥号等真是比比皆是，这就给后人阅读和研究这些典籍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就以清代史学评论家章学诚而言，在他的著作中，许多用于避讳懂得字若不加改正，就很难读懂其原意。如他为了避清高宗（乾隆）爱新觉罗弘历的讳，凡是治历明时，他都改作治宪，不知其讳者，自然就读不通了。相反，如果我

们了解并掌握了避讳的常识，则在阅读和研究古书时就可以解决许多疑难问题。事实上从古至今许多学者已经利用避讳识辨了许多疑难历史问题和伪书。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一书中就是用避讳来考辨一些书籍的真伪。清代史家钱大昕也是利用避讳在史事的正误和辨伪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在阅读范曄《后汉书》时，利用避讳知识就发现了后人将注文抄入正文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后汉书》作者范曄，其父名泰（太），因此，范曄在撰写《后汉书》时，尽量避开泰字，于是对于东汉名士郭泰，他在书中则一律称用其字林宗。（非但本传如此，在其他传中凡涉及者亦称郭林宗。）可是在有些《后汉书》的传本中却出现了这样一段话：

初太始至南州，过袁奉高，不宿而去；从叔度，累日不去。或以问太，太曰：奉高之器，譬之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顷之陂，澄之不清，挠之不浊，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太以是名闻天下。

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卷十二，《后汉书》三，《郭太传》条，全文照录这段文字后，发表了如下看法：

予初读此传，至此数行，疑其词句不伦：蔚宗避其父名，篇中前后，皆称“林宗”，即它传亦然。此独书其名，一疑也；且其事已载《黄宪传》，不当重出，二疑也，叔度书字不书名，三疑也；前云“于是名震京师”，此又云“以是名闻天下”，词意重沓，四疑也。后得闽中旧本，乃知此七十四字，本章怀注引谢承书之文，叔度不书姓名者，蒙上“入汝南则交黄叔度”而言也，今本皆僣入正文，惟闽本犹不失其旧。

钱大昕在其议论中，首先一条，也是最关键的一条，指出此段文字非常明显地有违于范曄著书的书法，再加上其它三点理由，从而肯定了这段文字并非

《后汉书》原文，乃是后人抄书时，将其掺入正文之中。可见懂得一些避讳知识还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避讳这一特殊风俗，一直影响着古代史书乃至所有文献的记载。因此，它在辨别古书的真伪和史料的正误上，都起着其它手段所无法替代的作用，我们不可轻视它。

第三、婚姻门当户对以家谱为据。在门第森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必须门当户对方能通婚，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可逾越之鸿沟，如有违者，必将遭到制裁。所以南宋历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氏族略序》中就曾指出：“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要证明确实是门当户对，宗族之谱在此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为所有宗谱、家谱都必须注明郡望，从而也就可以知道门第之高下。许多出身寒门的大官僚，在得到高官以后，总是千方百计想通过联姻手段，高攀衣冠世族，以改变自己社会低下的地位。拥有大权的侯景向梁武帝请婚于王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梁武帝回答说：“王谢高门，可于朱张以下求之。”¹而宠贵一时的赵邕想与范阳卢氏联婚，卢氏不从，逼出人命，“邕坐处死，会赦得免”，还是落得个“除名”的下场。²门阀豪族王源，将女儿下嫁于富阳满氏，氏族出身的历史学家沈约，认为门第不当，专门写了奏疏弹劾王源，并要求把王源“置之明科，黜之流伍”，要把王源从士籍中清除出去³。这些事实都说明，在门第制度下，世族与寒门之间的通婚限制是很严的，而社会上的舆论比法律还要严厉。因为联婚与选官一样，社会都很关注，特别是上层社会，一旦出现“越轨”现象，很快就会有人弹劾，何况一般官吏由于职能关系，必须熟悉各地的谱系关系，当然对于郡望、姓氏和婚姻关

¹ 《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

² 《魏书·赵邕传》。

³ 《文选》卷四十《弹劾王源》。

系也都比较熟悉，似乎这些内容都是他们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所以我们说门当户对的婚姻现象同样是促使家谱、族谱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社会动乱，家族之间为了联系需要编修家谱、族谱。从东汉末年到隋统一的400年间，除西晋短暂的统一外，我国社会长期处于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地主割据政权之间的斗争、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特别是在西晋灭亡后的120多年间，各族统治者先后在北方建立了许多政权，有所谓“五湖十六国”，其实共有七族二十三国。这些割据政权，旋起旋灭，给广大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中原广大人民避乱南迁者十居六七。为了保持家族之间的联系，因而编修家谱、族谱就成为很重要的手段。尤其是那些名门望族，郡望乃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标志，而家谱、族谱则是他们享受特权的重要凭证，离开故土后维护特权的这个凭证自然就显得更为重要。这也都是促使家谱、族谱编修发达的重要因素。而那些世家大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甚至将自己的郡望也带到江南，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侨置州郡。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设置了第一个侨郡——南琅玕（为了和北方原由的琅玕郡区别，故加“南”字）。此后又在京口（今江苏镇江市）界侨置了南徐州和南兖州，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界侨置南青州，在芜湖界内侨置南豫州等州一级的地方机构。而在今天江苏常州一带便设置了南兰陵郡、南兰陵县等十五六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侨置郡县。这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世家大族南迁后所作所为，因为这些郡望多是他们标榜门第高尚的招牌，而家谱、宗谱则又是保护他们高门望族的护身符。所以他们无论迁到何处，这些家谱、族谱不仅都要带走，而且定居后还必须及时续修。他们就是靠这些才能得到当时政权的百般照顾和关怀。可见谱牒对于这些世家大族来说实在太重要

了，为了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当然就要重视家谱，因为只要有了谱牒，就可以“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威”¹。此外，政府为了严格控制户口以保证户役征收，特别是为了控制广大自耕农民逃避徭役，统治者也就把希望寄托在编修家谱、族谱上面，特别是总谱、统谱，如州、郡谱。综上所述，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之谱所以会如此发达，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虽然这些家谱、族谱如今没有一部流传下来，但是从当年许多书籍的注释中的征引，还是留下了许多家谱、族谱的书名，笔者曾作了粗略统计：

见于《世说新语注》者 39 种。

见于《三国志注》者 13 种。

见于《史记注》者 5 种。

见于《汉书注》者 1 种。

见于《文选注》者 3 种。

见于《水经注》者 2 种。

可见当年许多学者在注释史籍或著书立说时，都将其作为重要的史料来征引，因为当时政府对修谱之事非常重视，严防伪造谱籍的事件发生，凡是伪造谱系者均严加惩处。南齐时著名谱学家贾渊，建武初，迁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买袭琅玕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收，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²。这也说明，作为谱学家尚且替人作伪，作伪现象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一旦作伪成功，就可以得到享受世家大族同样的特权和利益。所以梁武帝在未作皇帝之前给南朝齐皇帝上书中就已经指出：“且夫谱牒讹误，诈伪多绪，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胄袭良家，

¹ 《通志·氏族略序》。

² 《南齐书·贾渊传》。

即成冠族，妄修边幅，便为雅士。”¹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谱牒对于世家大族保持门第上特权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出身寒门的人总想利用这一工具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谱牒出现了讹误、诈伪等混乱现象的发生。

至于家谱、族谱编修真正走入平民之家，还是宋以后的事。当然，其趋势自然是从唐朝后期开始，因为六朝以来的世家大族，经过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唐朝统治者这批新贵们的多次压制和打击，已经逐渐衰落凋零。唐朝后期参加过政治革新运动的政治家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视为这种衰落凋零的真实写照。加之唐中叶以后，皇室不再重视谱牒编修，从而谱牒著作出现了混乱不堪的现象。《新唐书·高俭传》云：“风教不薄，谱录都废，公靡常产之拘，士亡旧德之传，言李悉出陇西，言刘悉出彭城，悠悠世祚，讫无考案，冠冕皂隶，混为一区。”这就足以说明，用编修家谱、族谱的手段来维护高门大族特有功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魏晋南北朝至唐，编修家谱主要是在于维护特权，而进入宋代以后，编修家谱、族谱是出于尊祖、敬宗与收族的作用，要使族人知道本族姓氏受封之由来及始迁之祖何时何地迁来，以及自己祖先长期形成的遗德和祖训，特别是本族祖先做过那些善事和好的传统，所谓收族者就是团结族人。例如欧阳修在《欧阳氏谱图序》中就讲了他们祖先长期形成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示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他们的祖先一直就以此精神来教育家族的子弟。在宋代除了欧阳修所修的家谱外，还有苏询所修的苏氏族谱，这两部家谱如今都保存在各自的文集之中。而这两家的修谱理论和方

¹ 《梁书·武帝纪上》。

法一直影响着整个封建社会后期的家谱编修，直至清代。当然，欧、苏两家修谱理论和方法还不尽相同，而共同之处，则是都主张修谱应当“断目可见之世”，对此章学诚曾给予高度评价，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可谓善矣。”¹这个评价自然是相当高的，充分肯定欧、苏二家修谱时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搞牵强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写宗谱时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是“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又在《嘉善茜泾浦氏支谱序》中说：“宋人颇鉴前代之失，欧、苏诸君为谱，皆断自可知之代，扩清前人矫诬牵援之习，可谓善矣”。²这种精神今天修谱者尤其值得提倡！

三、谱学研究和旧家谱保存现状

我可以告诉大家，谱学和方志学一样，都是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个分支，都是随着史学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因此也都必然具备着史学的某种功能、特点和性质。我们上面引了章学诚和邵晋涵等史学家对家谱、族谱所下的定义，而且充分肯定了其作用与价值，认为方志与家谱同样都是重要的地方文献，对于历史研究都具有同样价值。因此历代学者一直都很重视，无论是编修各类史书还是进行学术研究，都常有涉及。而这种谱学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还曾一度居于显学地位，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几乎是家家要讲谱学，人人要懂谱系。否则在社会上就无从交往，地方官若不懂谱系之学，则无

¹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

² 同上。

从履行其任官职责，因此，统治者也高度重视，并设有专门机构管理，还产生了一大批著名谱学家和谱学著作。而所有家谱可信程度也比较高。自宋以后，不仅私家之谱盛行，又产生了年谱等形式的谱牒著作。特别是年谱，学术价值就更加大了。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家传、家记、世传、家史等并不是家谱，因为家谱编修是要有一定格式的，关于这点，章学诚在多篇文章中都早已作过论述。可是今天还是有人眉毛、胡子不分地在乱讲，有人竟将《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叙传》都一律说成是“自叙家谱”。若是这样的话，那自叙家谱和他叙家谱那就实在太多了。众所周知，魏收的《魏书》、沈约的《宋书》也都有自叙传，自然也都成了自叙家谱。按此理论推演下去，那《史记》中的三十世家，除少数外，都可视作家谱。这样一来，以此类推，一部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不就成了千千万万家谱所组成了吗？所以我早就在文章中指出，研究家谱是不是也该有个谱吧！所以章学诚在家谱分类时，只是将家传、家训之类附在家谱之后，而没有直接把它看作家谱，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我们也要告诉大家，谱学不等于家谱学，谱学的全称应为谱牒学，它是研究和阐述人类宗族和家族世系演变相关问题的一门学问，一切著录和记载宗族、家族世系历史的文献典籍，都属于谱学研究的范畴，诸如家谱、宗谱、世谱、世系录、总谱、统谱、官谱、年谱以及史书中的各类世系表等等，如《新唐书·宰相世系表》等。而家谱只是谱学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成员，不能代表整个谱牒学，充其量也只能说是狭义的谱学而已。如《世本》乃是我国谱牒学流传至今

最早的一部谱牒著作，但它并不能称为私家之谱；又如宋代开始产生的年谱，它又是谱牒家族中重要的成员，但它并不是家谱。

我们毋庸讳言，新中国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门学问的研究，几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因为在“左”倾思想影响下，家谱这类著作被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家谱，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因而在土改和“文化大革命”中，就曾遭到两次大规模焚烧，数以千计的家谱、宗谱都焚于两次运动之中，还有谁敢再问津呢？然而，在海外，如美国、日本许多图书馆和汉学家却一直在收藏、整理和研究中国家谱，台湾不少学者也一直在研究，他们还经常举行族谱研讨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有些学者也开始着手研究，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并于1988年在山西五台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谱牒研讨会，会上并成立了“中国谱牒学会”。当时我因患眼疾未能参加，由叶建华同志代表我前去参加，并代表我在会上发了言。原来是准备成立“中国家谱学会”，我认为“家谱学”范围太小，应当称为“谱牒学”，因为“谱牒”是古代记载世系书籍的总称，而这个称呼的来源，盖出自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这样说：“维三代尚矣，年纪不可考，盖取之于谱牒旧闻，本于兹，于是略推，作《三代世表》第一。”又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有“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可见“谱牒”一词，在司马迁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中国家谱综论》一文中却说：“《七略》有《子云家牒》，而谱牒之名亦于此时出现”。¹

¹载《解冻家谱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这样说法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谱牒之名早已出现，况且《子云家牒》，也只是指家谱而已，因而有必要在此附带指出。总之，最早出现的并不是私家之谱，《汉书·艺文志》的“历谱类”就曾著录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两书，可惜到唐初已不见著录。而《隋书·经籍志》的《谱系篇》共收《世本》、《汉氏帝王谱》、《后齐宗谱》、《百家谱》、《益州谱》等41部，其中一族一姓之家谱仅有《谢氏谱》、《杨氏谱》、《苏氏谱》等几种。从所列书名来看就足以说明谱学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家谱。尤其是《世本》一书，是早已为学术界所公认的流传下来最早的一部谱学之书，但它决不是私家之谱。还有后来产生的年谱，也是谱学的重要内容，而家谱仅仅是谱学内容中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而已，因此，我早已在文章中指出，“谱学不等于家谱学”。正因如此，所以在第一次全国谱学研讨会上，接受了我的建议，将“中国家谱学会”定名为“中国谱牒学会”（全名“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学会建立后，还先后出版过几集《谱牒学研究》。到了1996年8月27日—29日海峡两岸学者在古城扬州举行了“海峡两岸谱学研讨会”，对推动谱学研究起了很大作用。笔者向这次研讨会提交了《对谱学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一文¹，文章共讲了《谱学不等于家谱学》、《研究谱学起源与发展应当注意时代

¹此文后发表在《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标题改为《关于谱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后收入自选集《史家·史籍·史学》中（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背景》、《家谱、族谱是否也该有个“谱”》、《家谱记载传说人物为始祖不可信》、《使用家谱资料应当审慎》六个问题。此后，在上海曾两度举行了这一内容的学术研讨会。

至于旧的家谱目前的保存情况如何？据目前所掌握的材料可知，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曾于1984年11月20日专门发文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家谱综合目录》已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全书收录家谱14719种，162个姓，谱籍覆盖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上海市约15000种，其中上海图书馆约有11700种，近10万册，他们并组织人员编写出版了《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北京约8000余种，其中国家图书馆约有3000种；浙江也于年前出版了《浙江家谱总目提要》，全书著录谱籍浙江的家谱12000种，其中约一半收藏在省内，外省及海外收藏亦占一半，其中浙江图书馆藏有1076种。《提要》共收录浙江家谱姓氏299个，291个单姓，8个复姓。又2001年文化部办公厅又发了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并组成编委会。据该《总目》主编介绍，编入存世的中国家谱约4万种，（其中由浙江选送的浙江籍家谱为4743种）而全书收录家谱的姓氏共计608个。上述统计数字，也只能说是大约数而已，因为据我们所知，散在民间未经著录的为数还不少，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山东省，散藏于民间的远比见于著录的为多，这也是无法作出更为准确统计的。台湾收藏家谱情况比较清楚，1974年开始他们曾作过全社会大调查，到1985年，共得各类家谱为10613种，并编成《台湾区族谱目录》。目前国外收

藏中国家谱较多的主要是美国和日本，美国约有 2000 种，日本约有 1700 种。特别要指出的是，美国犹他州家谱图书馆在大量搜集中国家谱，因为原件已经不太容易收集到，他们就搞缩微复制件，已复制了中国家谱 17099 种，而仅有原家谱 300 余种。他们还多次举行中国家谱和地方志研讨会。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尽管我们全国各地还保存了四、五万部家谱，但宋元时期保留至今的除欧阳修和苏洵所作两种外，可以肯定地讲，其他一部都没有，而这两部也是在他们文集中保存下来的。所以能够保存至今，我看至少有这样两个原因，一则是他们编修中实事求是，对自己远祖世系不知道的则宁可空缺而不胡编乱造，断自可知之世。再则便是他们都是文章大家，家谱都附文集而得以流传。正因如此，他们所修之家谱，深得后世历史学家好评，如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在《唐氏家谱序》中，严厉地批评了社会上伪造家谱现象的泛滥，而大大赞扬了欧阳修和苏洵两人在家谱编修中实事求是的做法：“欧阳修文忠曰：‘渤海之后，独见于今，然中间失其世次者再’；苏文公曰：‘自益州长史味道至吾之高祖，其间世次，再不可纪’。夫欧、苏二氏，其源流历然者，尚有不可纪之世次。而伪谱不问其地之南北，不考其年之上下，一概牵合，某世以至某世，绳联珠贯，至使祖孙倒置，蛇首人身，其有名公墨蹟，内府玺书者，尤市儿之狡狴，无识之世宝也。”¹又如著名历史学家钱大昕

¹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序类》。

在《吴兴闵氏家乘序》中说：“自宋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而诈冒讹舛，几于不可究诘。独欧阳、苏氏二家之谱义例谨严，为后世矜式。盖谱以义法重，尤以人重，后世重二家之谱，尤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¹这就非常明确的点出，欧、苏二家之谱法所以会对后世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成为宋、元、明、清修家谱的楷模，不仅是“义例谨严，为后代矜式”，而更重要的，“尤以人重”，“以其道德文章，足为谱增重耳”！看来这一条尤为重要，首先是道德人品，其次又都是文章大家，他们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这是众所周知的。再看史学评论家章学诚的评论，他在《高邮沈氏家谱序》中说：“宋人谱牒，今不堪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首，可谓善矣。”²充分肯定二家修家谱时，都不搞附会，断自可知之代，这在编修家谱中最为重要，所以称赞他们“最得《春秋》谨严之首”。章氏评论向以顶真而著称，而对欧、苏评价竟如此之高，足以说明他们所创立之修谱之法确实比较合理，尤其是欧阳修，修谱理论比苏洵也更为全面。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清朝乾嘉时期的章学诚已经讲了，“宋人谱牒，今不堪传”，由此可知，宋人流传下来的家谱确实并不多见。即使明代所修亦不多见，大多数都是修于晚清和民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又修了一批新的家谱，《浙江家谱总目提要》中就收录新修家谱一1300余种。可见编修家谱一事，

¹ 《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钜野姚氏族谱序》。

² 《文史通义新编新注》外篇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尽管政府并不提倡，但各地的编修却一直在进行着，这种现象应当值得重视而加以引导。

四、家谱的文献价值和局限

家谱属于地方文献，由于其特殊性，因此，它具有许多特有的文献价值，并且在近年来许多学术研究中已经体现出来。如葛剑雄先生的《中国移民史》就曾采用了有些家谱中的资料。因此，家谱对于研究移民史、人口史、宗法制度、社会经济、人物资料、家庭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国历史上曾经产生过多次大的社会动乱，诸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和几次大规模农民大起义。每次动乱中总有大批人口被迫逃亡。最明显的如西晋灭亡后，有六个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出现史称“五胡十六国”局面，因而大批汉人被迫南移，就连王、谢等大族更是举族南迁。今天的江苏南部和浙江境内，许多家族都是那个时代迁过来的。再一次规模大的就是金人南下，宋王朝南逃，实际上又形成一次大的移民，这次波及就更加广了，有的已经南移到江西、福建、广东一带。由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因而原居住在北宋都城汴梁（今开封）的达官贵族家族，便纷纷定居临安。他们带来了东京汴梁的方言，与原临安土著居民的语言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的杭州方言。也有的是局部移民，大多是封建政权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的措施。就以明朝而言，洪武初年，

朱元璋徙江南 14 万户于凤阳¹，其中不少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迁徙天下富户 14300 余户于南京²。又由于张士诚曾定都于平江（今苏州），因而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之后，曾从这里迁了一批富户到苏北，这从许多家谱中都能得到反映。当然，研究这一问题，并非少数家谱所能奏效的，正如葛建雄先生所说：“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³

作为一部完整的家谱，一般都要登陆该家族所有成员的姓名、生卒年月日、婚姻、子女等。当然，宋代欧阳修、苏洵所修之家谱，还是以男子为中心，妇女均未入谱，到了后来，则男女均要入谱，当然不登正式世系，而别编为牒，实即注释之意，我们在上文中所引章学诚《家谱杂议》中就曾讲了，“至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不待旁行斜上而始识者，则谱家往往别编为牒”。根据这些内容，我们就可以研究人口的增长、寿命长短、婚姻状况、性别比例等，从而可以计算出人口学所必须的基本数据。当然，记载内容比较完整的家谱毕竟并不很多，特别是女性人口记载不全，如只记载儿子结婚年龄，而不记载女儿出嫁年龄，这就势必影响统

¹ 《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

² 《明太祖实录》卷二二零。

³ 《家谱：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和局限》，载《历史教学问题》1997 年第 6 期。

计的准确性。同时我们已经讲了，如今传世的家谱大多为晚清和民国时期所修，明代已经很少，所以家谱资料，一般只能用于研究明清以来人口状况，再早可靠性就成问题了。尤其那些记载世系很早很完整的家谱，如从彭祖开始、从大禹开始、从周公开始等等排起，越发不可信。

由于许多大的家族大多有集体的族田，有的称祠田、香火田，义庄田，一般都用来处理全族公有事业，除了祭祀等费用外，有许多还用来办义学，供家族中经济贫困的子弟读书。因为田地多，租给外人或本族人耕种，这就有租佃关系，有的家谱中对这些内容都有记载，诸如田亩数、坐落何处、每亩租额、每年收租数量等，有的除置田产外，还经营店铺和其他商业。这些一般都比较真实，无需造假，对于研究地方经济发展自然很有价值。

众所周知，宗法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三千多年，所以会延续如此之久，这就与家族制度有很大关系。而每一部家谱都要记录着这个家族在族长领导下的家族组织系统、族规、族约、婚丧礼仪制度、管理方法等。族长权力很大，族规管理很严。作为研究宗法制度的影响而言，具体而详细，其他史料是无法比拟的。

宗谱中关于人物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在家谱中除了记载世系外，生卒、仕宦、子嗣、婚嫁等都有记载，那些在家族中有地位、有影响的人，一般

都还有传记。因而有些历史人物由于种种原因，史书失载，往往从家谱中可以得到弥补。如南宋大史学家郑樵的生卒年史书无确切记载，而学界流传的大多有误，笔者于1962年作过考证，刊于同年10月号《历史教学》刊物上。次年报载厦门大学郑樵历史调查组发现了几种郑氏族谱，据族谱所载郑樵生卒之年，正与笔者考证相合。而在这些族谱中，还发现了以前未曾见过的郑樵佚文《荥阳谱序》，这是一篇可与《通志·氏族略》互相发明的重要文章。文章中他阐述了对谱牒撰修的主张，并对谱学的盛衰、图谱私纪之弊端、郑氏族祖之源流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研究郑樵学术思想，特别是谱学思想有很大价值。这样重要的文章，正是依附于族谱而得以保存下来。在浙江省收藏的家谱中，保存于绍兴鲁迅博物馆里的绍兴宝祐桥百岁堂周氏稿本《老八房祭簿》上，有周恩来于1939年亲手用毛笔写的“恩来 字翔宇，五十房樵水公曾孙，云门公长孙，懋臣长子，出继簪臣公为子，生于光绪戊戌年二月十三日卯时。妻邓颖超”等字，现为国家一级文物。又绍兴《越城周氏支谱》乃是周树人（鲁迅）家谱，为清光绪三年（1877）宁寿堂木活字本。还有上虞《罗氏谱》则是著名学者罗振玉的家谱，1924年贻穀堂木活字本。海盐《张氏族谱》是著名出版家张元济的家谱，1934年木刻本。还有一部家谱大家会很感兴趣的，即《定海小沙陈氏宗谱》，是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原名陈平）祖谱，系1937年永春堂木活字本。可见在众多的家谱中，确实有许多是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我只要将这些家谱与那些名人联系起来，大家就很清楚了。当然我们也要告诉大家，内容确有价值的家谱毕竟不是太多，因为许多家谱都是胡编乱造，

乱造世系，伪造始祖，乱造官阶，假托伪造名人作序题跋，有的则是从别人家谱中抄来稍作改变，夸大祖先官爵功绩，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因此对于家谱资料必须持审慎态度。

关于家谱的价值，我还想强调一下，应该重视研究家谱中的家训内容。我们研究发现，家训是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家庭教育形式，它是随着家谱、宗谱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以前一直不加分析地一律视为封建糟粕而弃置勿论。其实只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就不难发现，其中有许多非常宝贵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内容。我们可以这样说，所有家训，总都教育子弟读书上进，勤俭持家，从未见过要子孙去杀人放火、赌博偷盗为生。只要我们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中优秀的精华，对于发展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宏扬优秀的传统道德都具有重要意义。我们上文在讲述欧阳修在《欧氏谱图序》中所列举他们的祖训是“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虽然仅仅只有四句话，但已经非常明白地告诉他们的子孙做人处世的道理。我们觉得，这四句话，只要适当加以改造，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即将“以忠事君”，改为“以忠事国”，其他三句可以一字不改地适用于今天。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家训一直是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而这种家训又分为单独的流传与附在家谱、宗谱之内两种，前者早期以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以儒家教育子弟，影响深远；后者要以清初朱用纯的《治

家格言》最为典型，流传最广，是一篇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家训名篇，几乎成为清代以来直至近代家庭教育的必读内容，人们习惯称之为《朱子家训》，内中许多辞句，对于做人处世，至今仍有其教育意义。诸如“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毋流连”。“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需加温恤”。“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如此等等，若是全社会每个家庭的成员都能按此要求去做，可以想见社会的公德意识必然大大提高，和谐的社会必然很快实现。至于家谱、宗谱中的家训，亦多强调对族人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教育。现以浙江钱氏家谱为例，钱鏐在《武肃王八训》中就教育子孙，要“绍继家风，宣明礼教”，“子孙若不忠、不孝、不仁、不义，须是破家灭门，千叮万嘱，慎勿违训”。后来又作《遗训》十条，指出“唐室之衰微，皆由文官爱钱，武官惜命，论言讨贼，空言复仇，而于国计民生全无实济”。因此他要求子孙，“心存忠孝，受兵惜民”。这就是钱氏家训的基本内容。当然，钱鏐身为帝王，所述既有其针对性，又具有特殊性。再看《临水钱氏宗谱·家训》，其中也教育子孙要遵守国法，按时交纳赋税，“赋税乃朝廷重务，急公亦市民大义”，“此亦草野尽忠之事也”。而在家训中对子孙教育尤为看重，指出“人之贤达，岂尽生而克肖者，多为教诲所成”。这不仅承认人不是生而知之，成功与否取决于后来的教育，而且承认人是有资质高低不同，

应当视其资质之高下而施教，“视其质之聪俊者，授以经史，俾其知圣贤之义理，识屡代之兴亡，效法先哲，惩戒奸邪；幸而荣名立朝，亦可光宗耀祖，大显家声，即不幸穷约终身，亦不失为守道名儒。其于秉资钝鲁者，莫如课之农桑，终岁勤劳，苟获五谷之储，一缗之绩，足以仰视俯育，不致高堂冻餒，妻儿啼饥。所谓勤读可荣事，勤耕可养家”。这种教育思想出自封建帝王的家训中，实在难得，他们既没有灌输龙生龙凤生凤的思想，也没有一味宏扬“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靠勤奋而能做官，靠勤耕而能养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即帝王的后代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官，还得靠自己的努力，有的可以立朝为官，荣宗耀祖，有的只能做一名“守道名儒”，还有的则要用自己的劳动来养家。这一思想在今天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家训没有反映高人一等的教育思想，而是提出了要因材施教的方法来教育资质不同的子孙。这种教育思想对于当前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无疑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因为钱氏各个宗谱家谱中所载之家训，都非常注重教育，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所以在钱氏家族中一个突出特点便是人才辈出，这种现象竟能延续数十代，历千年不衰，直到近现代仍是如此，人才如此密集现象，在众多族姓中都很突出，这一现象是很值得研究的。还在宋代王安石似乎已经察觉，他在《内殿崇班钱君墓碣》中就曾指出：“钱氏之有籍于朝廷者，殆不可胜数，而

以才称于世尝任事者，比比出焉。”¹可见家训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它不仅传播了传统伦理道德中许多有益的思想，如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相互帮助、与人为善等内容，而且在家庭教育的内容、方法与形式，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价值，我们在研究家谱、族谱时，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内容，更不能把它一律斥之为封建糟粕。

综上所述，可见作为地方文献之一的家谱，只要很好研究，就可以发现它确实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但是这并不是说，每部家谱都具有这些价值，同时也要坦诚地告诉大家，有许多家谱甚至是毫无价值，尤其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更是如此。我们也要指出的是，许多研究家谱的论著，普遍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对此葛剑雄先生早已指出，“反映出一些学者对家谱的局限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有的文章还夸大它的作用，近时读了一篇文章，讲家谱提供地名资料则明显存在着夸大其辞，因为文中所列举的绝大多数地名，在历代所编的历史地理著作和地方志中都可找到，即使是很小的地方，在府县志或乡镇志中都有记载。尤其是历史上产生过不同名称的古地名，历史地理著作和当地的地方志都有记载。就如文中所列举的绍兴古分会稽、上阴，常州古称毗陵，镇江古称京口，杭州古名仁和、钱塘，浙江温岭古称太平等等，没有一种是需要家谱来说明的，唐代以来许多历史地理著作和方志都早已有了说明。绍兴在宋代已有《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两种志书流传下来；常州则有咸淳四年刻

¹ 《临川先生文集》卷四十九。

的《重修毗陵志》流传下来；镇江有《嘉定镇江志》；杭州则有《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三种；浙江温岭，亦有明代《嘉靖太平县志》，没有一种是要靠家谱才能解决的。我们上文已经讲了，宋元时期除了欧阳修、苏洵所修两种家谱外，就没有别的家谱流传下来，即使明代后期所修家谱流传下来的为数也并不太多。而元明以来，各地修志已经非常普遍，单是明代所修方志，如今流传下来的尚有 993 种，而地名又是地方志记载的主要内容之一，还在方志发展的初期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对于各地地名的沿革就已经记载了。我们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希望家谱研究者不要夸大家谱的文献价值，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面对家谱。

五、使用家谱资料应当审慎

我们说家谱、族谱在研究我国封建时代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价值往往是其他史料所无可替代的。我们这是从家谱、族谱总体而言，并不是说每一部家谱都必定具有这些价值。这里我想用当代著名学者、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对旧方志的评价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宗给我们传下来八千多部方志，这是我国一个很伟大的、特有的宝库，这中间有大量的可贵的史料。这是肯定的。但是，这决不等于说，旧方志中的资料完全可靠，完全可信。我喜欢说老实话，老实说，我们八千多部地方志并不是每一部都修得好，旧方志十部中难得有一部好的，大多数是不好的，但坏的也保留了那个时期的

资料。对待地方志中每一条史料都要慎重，照搬照抄要上大当。……虽然每一部方志都有保存价值，但地方志中的各个项目，每一条具体记载，我们决不能轻信不疑，不经考核，照抄照搬。”¹家谱、族谱的情况显然与旧方志相类似，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还不如旧方志，当然我们以此来衡量其价值和使用时的要求自然并不过分。这就是说并不是随意拿到一部家谱都必定有重要史料价值，即使有价值的家谱也并非全部内容有价值。因此，对于每一部家谱决不当不经考证核实就作不确当的宣扬，以免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在家谱、族谱中，伪托名贤、假冒郡望比较常见，而为了抬高自身的社会地位，许多内容都会编造。最为明显的就是将传说中的人物或历史上的名人编造为自己的始祖。我们仍以浙江各种钱氏家谱而言，关于始祖的记载，一律按照钱镠所制之《大宗谱》排列为准，都将彭祖视为始祖。众所周知，钱镠一介平民，史书说他是私盐贩子出生，他的父亲还亲口讲：“吾家世田渔为业，未尝有贵达如此。”²既然如此，与彭祖有何关系呢？而在富贵后，竟将少典、彭祖为自己的始祖，其目的不过是在宣扬本族的名望，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已。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家谱中的那个世系排列，完全抄自《史记·楚世家》。而彭祖究竟是何许人也，古代文献虽有记载，也只是三言两语，让人捉摸不定，至今也从未有人讲清楚。钱镠把他编造为钱氏始祖，本来已经离奇，更加奇怪的是，竟还有人热衷于此，大做考证文章，论述彭祖确系钱氏始祖。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

¹ 《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载《中国地方史志通讯》1981年5、6合期。

² 《旧五代史·世袭列传》。

可笑，而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与彭姓争始祖问题了。台湾省台北市彭氏宗亲会不仅已经出了书，宗亲会会长还在电视中接受采访。这么一来，彭祖究竟是彭氏始祖还是钱氏始祖，又该由谁来做判断呢？

又如浙江绍兴大禹陵附近，居住着姒姓家族，自称为禹的后代，并以晚清所修之族谱为凭。大家想想看，清朝晚期所修之家谱，能够记载着自禹以来世系分明的承传，是根据什么材料编写？就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肯定这部家谱绝对不可信。况且根据我的研究，曾姓家族和欧阳氏家族也是夏禹的后代，因此，我们认为大禹乃是华夏氏族共同的祖先。

我们再举 2006 年 2 月 16 日和 18 日《济南时报》先后发表的《浩繁家谱现身济南》和《济南再现“星光家谱”》所介绍的两部家谱之真伪。前者介绍的是《周氏志》（即周氏家谱），后者介绍的是《强氏家谱》。对于这两部家谱，人们无需看家谱内容，只要看了该报介绍就可以肯定都是伪造的家谱。

《周氏志》云“始祖为周公，讳旦，文王第四子，武王同母弟”。而该谱为 1962 年整理，“家谱已延续了 88 代”。研究或学习过历史的人都知道，周公姬姓，并不姓周，周乃朝代名称，正如秦始皇不姓秦，汉武帝不姓汉，唐太宗不姓唐，道理是一样。而 1962 年编的家谱，记载自周公以来 88 代世系，根据的是什么材料？可靠吗？而《强氏家谱》，《济南时报》的通栏标题就是《曾巩凭吊 苏轼作序 崇祯册封 康熙嘉奖》，而报导文章的第二段则是：“孝同

曾闵，学贯朱程，好施乐善，博古通今，子传五桂……南丰曾巩题”，这是号称“唐宋八大家”的曾巩为宋代仁宗庆历年间进士强至所作的悼词。就这短短几句话就足以告诉我们，这部家谱是伪造的，这正是曾巩的“悼词”露出了马脚。众所周知，北宋程颢、程颐与南宋朱熹都提倡性理之学，并形成一个学派，世称“程朱之学”。而作为北宋人曾巩，怎么会知道一百多年后的南宋朱熹会成名呢？即使程颢、程颐，还是晚辈，这里我们不妨将这几个人生卒年代开列如下：

曾巩：1019—1083

程颢：1032—1085

程颐：1033—1107

强至：1022—1076

朱熹：1130—1200

看了这几位的生卒年，这部家谱编造得也实在太离谱了，其他自然也就无需多谈，至于苏轼作序，自然亦是子虚乌有，苏轼文集如今具在，并无为强氏家谱所作之序。这也说明，这部家谱作伪手段实在太不高明，“程朱”竟然会变成“朱程”，这实在是常识问题都不知道。

当然，也有些虚伪的家谱伪造得比较巧妙的，因此许多人不大注意就被蒙骗过去。我在以前文章中曾经讲过的浙江江山县《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就是如此，不仅蒙骗了大学学报主编，而且蒙骗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1986年《南开学报》第6期上发表了《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一文，两位作者就是根据这部家谱的记载，认为发现了一首岳飞在绍兴三年赠祝允哲大制参的《满江红》及祝允哲的和诗（词）”，未经认真考证，即认定对进一步探讨岳飞《满江红》词的真伪“提供了新的重要文献”，《人民日报》海外版于1987年1月20日便全文予以转载，影响之大于此可见。时隔不久，著名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在《学术月刊》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一文，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宋代根本就没有族谱中所讲的“祝臣”、“祝允哲”这两名官员，族谱中讲祝允哲之父祝臣是“北京绍圣年间兵部尚书、太子少保、都督征讨大元帅、上柱国、宣国公”，而祝允哲则是“靖康元年钦宗敕授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朱先生文章指出：“如果宋哲宗绍圣年间真有‘祝臣’其人，他的差遣之一兵部尚书是从二品官，《宋史》便不可能不为立传，此其一，即使《宋史》不为立传，作为这样身负重任的高级官员，‘祝臣’的政治活动必然会在《宋史》、《宋会要》、《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其它数百种宋代史籍、文籍中留下蛛丝马迹，不至于影踪全无。……”文章还从宋代官制的规定，揭露制假者的漏洞，家谱中的有些官制是到明代方才出现的，最后论证了《祝允公和岳元帅述怀》与所谓岳飞

《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两词全是伪作，而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最后再举一个非常离奇的例子，据《台州地区志·志余辑要》记载，台州地区有陈、吴两姓家谱的世系与名字相同的现象，其中肯定是有一姓抄他姓家谱，更为有趣的是，这两家实际上是在争夺被誉为“世界第一部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的作者。而对于这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有介绍，这两部家谱一为《泾岙陈氏宗谱》，一为《天台吴氏宗谱》。对此我以前在文中已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总之，从上面介绍就可以看出，家谱、宗谱是比较复杂的，作伪情况也是五花八门。所以明末清初大学者黄宗羲早就指出：“以余观之，天下之书，最不可信者有二：郡县之志也，氏族之谱也。”¹又在《唐氏家谱序》中说：“今日谱之为弊，不在作谱者之矫诬，而在伪谱之流传，万姓芸芸，莫不家有伪谱。”²而清代学者杭世骏亦深有感触地说：“纵览天下之籍，每以夸诞而不足征者，莫如家谱。”为什么呢，他认为许多家谱之中，“或虚张动伐而考诸信史竟无其名；或杜撰头衔而稽诸职志竟无其官；或攀附文人而质诸文集竟无其序。踵讹袭谬，恬不知怪”。³可见家谱作伪由来已久，实际上唐代学者颜师古早已提出，但后来反而愈演愈烈，看来编修家谱中的胡编乱造，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顽症，很难根除。这一现象，即使在今天新修家谱中亦同样存在。黄宗羲当日就告戒大家，家谱编修中的胡编乱造，其

¹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序类》，《淮安戴氏家谱序》。

² 同上书。

³ 《道古堂集》卷五，《萧山王氏家族谱序》

结果不仅将造成祖孙倒置的情况，而且有的则将他人的祖先变成自己的祖先，这实际是对自己祖先的最大不敬，因而他特别忠告：“是故诬祖之罪，甚于忘祖。”难道能不值得大家重视吗！

守望中华礼仪之邦

彭林

众所周知，礼仪是文明民族的标志，世界上所有的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礼仪。我们中华是千年文明古国，礼仪文明真是粲然大备，“礼仪之邦”这个词正是对她的赞誉。可是近代以来，由于非常复杂的原因，中华民族的礼受到了过度的批判，甚至被全盘否定，说它是“吃人”的，还说孔子提倡礼是为了复辟奴隶制，中国历史被说得漆黑一团，我们的生活中甚至连起码的礼仪规范都没有了。正是这种“文化自戕”，动摇了我们民族自信和文化自尊的根基。如今，由于2008年我们要举办北京奥运，大家这才猛然发现由于礼的缺失所带来的问题。但是，“中华礼仪之邦”的内涵，并非只是指点头哈腰、鞠躬作揖之类的交际礼仪，它的内涵非常之广泛，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它？在当代它还有没有价值？这些问题都需要来作深入的探讨。今天我想结合北京奥运，谈谈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一、怎样认识中华礼仪之邦？

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没有向全世界炫耀希腊的现代化，而是展示了一个原汁原味的古希腊文明，这是他们高明和成功的地方。作为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主题是明确的，就是展现我们中华文明的人文精神。

中国文化不是西方文明的分店，也不是西方文明的复制品，它是世界上为数很少的几个原生文明之一，是东方人智慧的结晶，有着鲜明的文化个性。在我看来，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成功与否的关键，是能不能抓准中华文明的核心，并且把它完美地表现出来。有一位著名导演说：“中华文明博大精深，随

便舀一勺都是精彩的。”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中华文明确实非常浩瀚，精彩之处，在在多有，但它决不是一锅粥，无论怎么舀都一样。这些年各地的文化热非常热闹，茶文化、酒文化、豆腐文化、小枣文化等等，无所不及。再看书摊上，青楼文化、乞丐文化、流氓文化之类的书触目皆是。这些当然都是文化，也应该研究，但是，无庸讳言，它们都不是中华的核心文化。

1.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礼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什么？这在学术界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是礼。这一说法的发明权不是我的，而是属于著名的史学家钱穆先生。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钱先生就先获我心。钱先生在台北的素书楼会见一位美国学者时说：你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只是看到了它的手指和脚趾，“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钱先生非常明确地说道：“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为什么可以用“礼”来统领中国传统文化呢？钱先生强调了以下两个要点：

首先，“在西方语言里没有‘礼’的同义词”，“西语中没有‘礼’这个概念，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的地域多“小国寡民”的特征。而在中国，方言、风俗可以彼此歧异，但是，“无论在哪儿，‘礼’是一样的”。中国各地的风俗、方言的差别之大，甚至不亚于比如法国与德国的差别。而数千年来，中国虽然历经磨难，但始终没有走向分裂，因为彼此在一个更高层次上是认同的，那就是“礼”。

其次，“（礼）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传世文献里可以为钱先生的说法提供佐证的地方可谓比比皆是，比如《左传》中讲到，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是为政者“经国

家、定社稷、立民人”的依据。《左传》和《礼记》里还多次讲到礼是“国之干也”、“人之干也”，“政之舆也”之类的话，礼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个人，都犹如一棵树的躯干，而不是枝杈，没有它就挺立不起来，因为它是中国人立国安身的准则；礼还是推行政令的车舆，没有它，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于四方。“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之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钱先生的见解，高屋建瓴，非常精辟，不如此认识，就不足以把握“中华礼仪之邦”的本质，我本人非常的赞同。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学术界似乎很少有人注意到钱先生的这个谈话，所以我必须在一开头就特别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2. “礼”是什么？

那么，具体来说，礼包括哪些内容呢？限于时间，我不能面面俱到的介绍，只能着重介绍下面几个要点。

首先，礼是以道德为核心的国家典制。任何国家都有典章制度，而在中国古代，十分强调典制的制订，一定要符合礼的原则。为什么呢？因为古人是把礼作为道德和客观规律的代名词的，所以《礼记》说：“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易”是改易、移易的意思。礼体现的是不能改易的道理，具有最大的合理性。

国家典制是行政管理的规范，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至关重要，所以历代政治家和执政者都非常重视，因而有许多的作品。其中最值得向大家介绍的是《周礼》这部书，不知诸位读过没有？清代学者孙诒让称赞它“体大思精”，是黄帝、尧、舜、禹、汤、文王六代治国智慧的集成。《周礼》是一部理想国的蓝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国家所需要的纲领和政策，书中几乎全部涉及到了。例如：中央和地方的格局应该怎样划分？两者的关系怎么协调？如何教育民众？如何考核各级官员？部门之间如何制约？丰歉之年的税率怎么确定？司法

制度如何保证公平合理等等，非常丰富，而贯穿于其中的则是“理”。下面我们举一个例子。

《周礼》里的秋官是主管司法的部门，但这决不是一个滥用刑罚的机构，因为严刑酷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刑是一种在迫于无奈的时候才使用的教育手段，目的是为了最终不用刑。因此，秋官里面有许多合于“理”的规定。例如，在判定罪名时，先要确认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初犯还是屡犯？如果属于初犯，罪行较轻，就不要关进监狱，让他站在一块称为“嘉石”的石头上面，把罪名牌挂在他胸前，让他感到羞耻，决心改过自新。这样虽然没有用刑，但已经达到了教育的目的。再如，为了保证下情上达，民众有冤屈要申诉，有关官员必须受理。如果拒绝受理，申诉者可以站在一块叫做“肺石”的石头上面，这时监察部门的官员就会出来听取申诉，如果情况属实，拒绝受理申诉的官员要受到惩处。

类似的制度，也见于其他礼书。例如，《仪礼》中的《觐礼》记载的是古代诸侯国之间派使者相互聘问的礼节。在主宾见面的时候，使者要致送“国礼”——“圭”，一种非常珍贵的玉器，这是必须要有的外交礼节。但是，在使者要归国的时候，主人要举行一个称为“还玉”的礼节，就是把对方致送的圭郑重其事地奉还给使者。各位可能要说，这不是开玩笑吧？既然接受了，为什么还要退回去？这里面是含有深意的。国家与国家交往，借助于礼物来表达自己一方的敬重，这是在情理之中的。直到今天，我们去见客人都是不好意思空着手。可是，如果彼此交往的注意力集中在礼物的贵重与否上面，那么，这个礼就成了行贿和受贿，味道就完全变了。所以，“还玉”礼节的设计非常重要，是为了不让礼物冲淡礼的真意，表示君子之交淡如水。

《左传》一书以叙述史事为主，中间常常夹杂“君子曰”的评语，评判的标准是“礼也”还是“非礼也”，就看你的言行是否站在“礼”上。比如鲁隐公五年春，鲁隐公忽发奇想，打算到一个非常遥远的、叫做“棠”的地方去看人家捕鱼。臧僖伯劝阻说：根据自古相传的礼制，国君是为民众树立法度的人，应该专心去做国家的大事。执行乱政，那是要亡国的。鲁隐公坚持要去，臧僖伯“称疾不从”。由于隐公的做法“非礼也”，不符合礼，所以史官将它写进了鲁国的史书，以警示后人。所以说古代的礼，包含了一套以道德为核心的制度。类似的例子，《左传》里非常之多，如果大家有兴趣，不妨一读，相信收获一定会很多。

其次，礼是对人性合理的制约。

西方文化是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文化，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理的。中国文化不然，它是以人为中心的，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理。这是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

那么，人怎样管理自己的灵魂呢？时下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做“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感”，情感、情绪能够左右人的行为，对于人类尤其要紧。情感偏颇、情绪失控就会出乱子。我这里有一张《北京晚报》，上面有一篇报道，题目是：《2/3的命案属于激情犯罪》。许多恶性杀人案，常常是由一两句话引发的，轰动一时的“马加爵案”就是如此。除此之外，某些官员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从根本上说，也是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其实，人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感的命题，两千多年以前，我们的先哲早就讨论过了，最集中的表述是在《中庸》里面。

《中庸》开头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全篇的核心之所在。“天命之谓性”，是说人的喜怒哀乐之情，是与生俱来的天性。“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尊重人性，具有普世的意义。“率性之谓道”，

“率”就是沿着，沿着尊重人性的理路来治理老百姓，充分考虑到民众的喜怒哀乐之情，那么，庶几乎就是治国之道了。可是，人性有天然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除非你是圣人。如果过分张扬人性，肆意放纵它，那么人性与兽性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需要通过教育来引导民众，让他们懂得修正自己的情感，这就是“修道之谓教”。朱熹在《四书集注》里说，修道的“教”，就是指礼乐教化。

《中庸》接着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在没有外发的时候，是处于“中”的位置，既不过分，也没有不足的问题。当人在受到外界的影响，情感的外发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往往不是太过，就是不足。要想做到“发而皆中节”，就是恰到好处，就像孔子评价《诗经》的时候所讲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一旦进入“和”的境界，在任何时候都能波澜不惊，从容面对一切，情绪不会大起大落，不会大喜大悲、狂怒暴躁，“举世誉之而不私悦，举世毁之而不加沮”，这是一种很高的修养，需要长期的学习和修为。

《中庸》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民众原本就有中正的本性，这是我们得以治国的最大的“本”。通过礼的方式，把民众引导到“和”的境界，把残留在人性中的动物性转变为理性，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最大的道。《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和”的道理。“礼之用，和为贵”，礼的终极目的，就是造就和谐的人以及和谐的社会。现在西方有人说中国的发展方向不清楚，其实中华民族从古代就是讲“和”的民族，最有资格谈“和谐”。我们今天提出建立“和谐社会”，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绝不是应付海外舆论的权宜、粉饰之词，而是我们千年传统的自然延续。

儒家认为，人修身需要在“质”和“文”两个方面下工夫。“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品德，比如质朴、诚信、正直、敬让，这是做人的底色。“文”，说得简单一点就是一个文明人的典雅的“文采”。孔子的一个学生对此非常不理解，认为“质”就行了，干吗要“文”？孔子说，虎豹与犬羊的重要区别是在于它们的皮毛上面的“文”不一样，如果把他们的皮毛统统剃掉，还能区分虎豹和犬羊呢？“质”是“文”的依据，“文”是“质”的表露，《乐记》里有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叫做“德辉动于内”，“礼发诸外”，所以，中国人的礼，非常强调内在的德性，把它当作学习礼的起点。

第三，礼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体现。

西方人讲平等，我们东方人讲尊卑，乍一听我们太落伍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讲尊卑？其实，西方人讲平等也是宗教文化的体现，因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你爸爸是上帝的儿子，你也是上帝的儿子，没有区别，孩子见了爸爸可以拍肩膀。现在这种平等被很多人追捧。但它就一定好吗？《参考消息》转引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说，由于对一些学生的行为无法容忍，2004年有1/3的美国教师认真考虑过要改行。因为80%的学生张口闭口都说享有自己的权利，如果老师的管教过于严厉，他们的父母就会提起诉讼，所以孩子毫无顾忌，变得很粗野。这种所谓的平等，造成的结果是学生凌驾于老师之上，使得正常的教育很难进行。

中国人讲尊卑，看似不平等，其实不然。尊卑是相对的，父亲与儿子在一起，父尊子卑，因为父亲岁数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对儿子有养育之恩，当然要尊敬。但这种关系不是不变的，儿子会变成父亲，那时也就成了尊者，受到子女的尊敬，公平得很。平辈之间交往的原则，是以对方为尊，实际上是彼此为尊。我敬你一尺，你也会敬我一尺。实际上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所

以，钱穆先生讲，礼是以对方的存在、并且心存敬意作为前提的。礼的原则是与人为善，处处为对方着想，以此求得社会的和谐。

在我们的历史上，最早实行礼治的是文王。《史记》里记载，商朝末年，纣王暴虐无道，天下怨愤。周文王用道德来收揽人心，威信很高，诸侯之间发生争端，都会找文王做裁判。当时虞、芮两国为了中间的一块田地长期纷争，于是去找文王评理。可是走进周的地界，发现“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感到非常惭愧，说“吾所争，周人所耻”，我们所争执不休的私利，正是周人感到可耻的东西，去找文王评理，岂不是自取其辱？于是，他们转身回国，通过互相谦让解决了争端。文王没有出面，就把虞、芮之争解决了，两国的风气也得到了提升，这就是礼乐教化的力量，成为后世追慕的典范。

因此，后世为政者十分重视礼的教化作用，《史记》在介绍制度史的时候，就把《礼书》放在第一篇，并且强调它对于治理社会的基础意义。《旧唐书·礼仪志》说礼是“人伦之绳墨，失之者辱，得之者荣”，“不可须臾离”。历代对于礼制之书的编撰和研究，更是不遗余力。汉代有《曲台集礼》140篇，隋文帝时有《五礼》130篇。唐太宗践阼之初，就命令房玄龄、魏徵等礼官学士修订了《贞观礼》100卷。后来，唐高宗又命令长孙无忌等增益补订，撰成《显庆礼》130卷。再后来，徐坚等奉命修撰《大唐开元礼》150卷。这些礼书使得大唐的典制粲然大备，对社会的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同时，衣冠文物，声教迄于海外，对于新罗、日本等地的文明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礼在当代社会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

有人可能会讲，现在是工业文明，甚至是后工业时代，我们的“礼”，都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到现在太老旧了！应该把它淘汰了！说老实话，把社会的发展分成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是学者为了研究和叙述的方便而做的划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刀断斧劈式的，而是一个有机体。就像一个人，从少年到老年，他体内有一以贯之的东西，不是到了一个阶段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的。比如孝敬、诚实、守信等这些基础性的道德，是可以超越意识形态而存在的，我称之为“人文基因”，它不仅有继承性，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有所遗传。

1. 物质文明的发展需要精神文明的引领。

人类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从来就是伴有精神追求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生存条件非常恶劣，即便如此，他们还会在陶罐上面画画；用海蚌壳、石片做成配饰；他们还会思考地球以外的事物，许多神话就是这一时期的产品；这就是精神追求啊。

社会的发展，要求物质与精神同步，否则就会失衡，畸形发展的社会是要出大问题的。工业文明时代存在的普遍问题，是人们过度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了人的精神需求。人类用智慧创造了工业文明，如果又用它来摧毁自己的精神家园，那将是人类最大的悲剧。由于精神的缺失，许多人发家致富以后，穷奢极欲，挥金如土，豪赌吸毒，无所不为。孔子早就说过“富而教之”的思想，就是用礼去教化他，让他树立健全的人格。富而不教，就是暴发户，就会成为社会的毒瘤。

改革开放之初，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什么难题都不难解决。没想到，制假、贩假之风随之而起，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而且败坏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于是，又有人认为，只要把法制建立起来，一切问题都会化解。可是，知法犯法、有法不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几乎是

无处不在，令人不胜其烦。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文精神的引领，需要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准。在杂乱无序、甚至是无政府的状态下，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不仅很难长久，而且会带来灾难。

2. 礼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一个国家的实力如何，大家往往只注意哪些看得见的硬指标，比如外汇储备、人均GDP、钢铁产量、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等。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理念等，软实力很难量化，但确实是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的。软实力不但可以在凝聚人心、激励士气、提供史鉴、醇化民风、树立民族形象等方面发挥作用，还可以为经济、政治、外交的发展助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邻国似乎比我们觉悟得早一些。

《环球时报》有一篇文章：《日本借软实力提升形象》。日本人意识到，现在仅仅用金钱、军事手段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已经很困难了。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因此应该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用独创的传统的自然协调的人文力量来赢得各国的信赖，他们的做法是，“动漫、游戏、生鱼片，一个都不能少”，希望借此树立自己的文化形象。

请大家看《环球时报》上的另一篇文章：《韩流在中东登陆》。韩国的《大长今》，成功地树立了民族形象，不但风靡亚洲，而且进军中东，强化了文化外交，赚取了大笔外汇。《大长今》里面的礼仪，基本上是唐宋时期从中国传过去的，现在反而成了人家的文化特色了，我们的国民看了还羡慕不已！这种“文化倒灌”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再塑中华民族的形象服务，它的作用千万不能低估。

3. 礼的缺失带来的问题。

过去我们一讲到礼，就讲是封建秩序。于是我们把礼统统打烂了，结果连起码的社会秩序也没有了。不管是骑自行车的，还是开汽车的，都互不相让。将来大家有钱买了飞机，在天上一定也会这么撞来撞去的（笑声）。

美国《新闻周刊》有一篇报道：《在中国开车危险又刺激》，说调查显示，中国车祸的总量占全世界的 20%。中国每辆车发生车祸的比例是美国的 16 倍。在过去 5 年中，中国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是 10 万。中国在交通法虽然规定了礼貌驾驶，但和现实是有差距的。《纽约时报》有一篇题为《可怜的中国空姐》的报道说，从郑州到上海的一架飞机，本来 90 分钟就到了，可是客人带的行李多得摆在厕所前边。于是有人就开始嚷嚷：有的人说饿了，有的人说扰乱了我的商业计划，结果把空姐都弄哭了。空姐说，请系好安全带，结果客人毫不理会。客舱里总是很吵，有的客人还大声唱歌。空姐请他们安静下来，结果客人瞪着眼看着她。还有在北京一个饭店的电梯里有一个告示牌。写的竟然是“请不要在电梯里大小便”。《参考消息》有一篇文章说：“德国人教中国人规矩地如厕”。我们五千年的礼仪之邦，竟然已经沦落到要外国人教我们如厕的地步，真是令人伤感！

礼仪的缺失，不仅使社会风气变差，而且损害了我们的民族形象。《环球时报》有报道说，欧盟对华开放旅游刚刚一个月，如何面对蜂拥而至的中国游客带来的问题：不遵守公共秩序，没有好的卫生习惯等，将是法国社会面对的一个难题。这种形象怎么和人家交往？这损坏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民族的形象！我们要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让全世界的人都尊重中国人，让大家都相信这是一个有 5000 年文化的民族，是一个和谐的民族，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4. 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

管子说“仓廩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发展后，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应该知礼仪、懂荣辱，营造适合于人居的人文环境。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虽然已经进入了小康，而生活方式还停留在改革开放之前，主要的表现是：

不懂得尊重他人，不懂得谦让，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礼是以敬为主，可以说没有敬就没有礼，而敬又是以谦让为基本内涵的。现在是凡事争先恐后，生怕吃亏，在这种心态之下，不愿排队，不肯让座，无论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彼此抢道。北京的马路之宽，海外也不多见，而交通秩序之混乱，同样是海外罕见，其根源是无礼。

没有公德心，自己家里弄得干干净净，门外如何就不管了。许多人把大地当作大痰盂、大垃圾桶，乱吐乱扔，使得大环境脏、乱、差。

不会用敬语。敬语是文雅的交际语言，需要有一定的教养和文化才会使用。如今许多人还停留在文革时期的风气里面，说话以粗俗为美，以带脏字为豪爽。不知有雅言，不会用敬语，见到人不知道怎么表达对他的尊重。

总之，我们经济上去了，可是人文素质上不去，生活质量有待提高。

三、传统礼仪与人文奥运

从1992年起，我国就开始申办北京奥运，当中曲曲折折，用了8年的时间才获得批准，为此耗费了庞大的资源。为了办好北京奥运，我们还要建设许多比赛场馆，今后的投入还会更多。时下有一个时髦的说法，叫“投入产出比”，这是一个商业运作的术语。投资做一个工程或者项目，要做到投资尽可能少、产出尽可能多，反之就会认为是失败了。北京奥运的投入如此的巨大，

我们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呢？这个问题现在必须把它想得很透彻，否则，将来就没有评估这届奥运是否成功的标准。

1. 京奥运，我们究竟要什么？

近年，媒体对北京奥运的讨论非常之多，而兴奋点主要是在奥运金牌和奥运商机这两个问题上。奥运会是竞技运动比赛，就是要拿金牌的，否则就不要参加了。在北京办奥运，我们的运动员尽占主场之利，金牌肯定会多拿。可是，拿金牌又是为了什么？我想是为了振奋民族精神。许多运动员得了金牌，都会情不自禁地把国旗披在身上欢呼，为获奖者颁奖，要升国旗、奏国歌，说明奥运奖牌是与国家的荣誉一体的。我们是发展中的国家，尤其需要振奋民族精神。但是，平心而论，我们的金牌选手都是由国家花费重金培养起来的，而如今农村的许多中小学里，连起码的体育器材和运动场地都没有。尽管我们已经变成了金牌大国，但远远不是体育强国。如果过于看重金牌，就会产生许多副作用。

有人认为，在最近一二十年当中，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了一个产业，它可以为主办国带来巨额的商业利润，这正是许多国家积极申办奥运的重要原因之一。能在北京奥运中赚到钱，当然是好事，何乐而不为？可是，这不是我们申办北京奥运的主要目的。我最近在报纸上看到凤凰卫视主持人闾邱露微的谈话，她曾经在洛桑亲身见证了萨马兰奇宣布由北京主办 2008 年奥运的历史性场面，目睹了大厅内中国代表欢呼的动人情景。她说大家决不是为了钱在欢呼，而是为了国家的地位和尊严在欢呼。我非常赞成她的见解。宣布表决结果的那天，我恰好在台湾，我从电视里看到，天安门广场和世纪坛成了欢乐的海洋，那画面令人终生难忘。我想，谁都应该很清楚，当时大概很少有人是为了钱在欢呼的。

我国政府没有说要把北京奥运办成金牌奥运、利润奥运的口号，而是提出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目标，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我想，实现绿色奥运的目标并不困难，北京市政府不仅早有规划，而且大家都已见到了成效。科技奥运也不是什么难题。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距今已经 40 多年，“神六”也已经成功升天和回收，运动场上那点技术问题是难不倒我们的。难就难在人文奥运。应该说，奥运无论在哪个国家举办，绿色奥运和科技奥运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差别主要是在人文奥运上。奥运是否成功，在相当的程度上，是看主办国是否成功地向世界展示了本国的文化与形象。

以前，日本、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曾经成功地借助奥运会来展示自己的形象。2008 年奥运会也给了我们一个充分展示我们国家尊严的机会。所以，人文奥运要真正做到人文，就要恢复我们传统礼乐文化中优秀的东西，让别人看到我们的精神面貌。如果人文奥运没有给别人留下这些印象，那么我们赚得钱再多、金牌拿得再多，也是得不偿失的，那么奥运会就是失败的。

2. 什么是“人文奥运”？

那么，什么是人文奥运呢？不少人认为，所谓人文奥运，无非就是让老外来看看我们的天坛、故宫、八达岭等古迹。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还常常用到“人文日新”这个词。那些古迹，是凝固了的历史文化，它怎么能“日新”呢？即使它们需要修复，也必须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保持它的原貌，任何翻新都是对文物的破坏。可见，这种理解是站不住脚的。

人文一词，源出于《周易·贲》卦的彖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人文”一词是与“天文”相对的，是上古为政者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农业社会是要靠天吃饭的，只有时刻观察天文、正确把握

气候的变化和节气的转换，才能有好的收成。否则，农业欠收，社会的安定就没有了前提。这种状况，即使是今天的农村，也还是如此。“文革”期间我在江西很多年，当地农民春季插秧，有一句口号，叫做“不插五一禾”！老俵说，两块秧田，一块是五一前插的，另一块是五一后才插的，秋收的时候两块地的产量就会有明显的差异。所以，天文是非常要紧的。

但是，光是注意天文是不够的，一个社会的进步，除了物质的发展还必须要精神的发展。人类社会是思想者的世界，而人的思想又非常复杂，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会出问题，经济的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必须关注人文。这里的“人文”一词的含义，古人有很明确的解释，就是“文德之教”，具体来说，就是用礼乐之道教育民众，不断提升他们的境界，用道德来引领社会的发展。这种教育不是空洞、苍白的说教，而是寓于民众喜闻乐见的礼和乐当中，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之中被道德所“化”。“教化”一词就是这个意思。“人文日新”，是指人在接受教育之后所呈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只要人人被化，那么自然就是天下大化了，所以说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几句话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说得如此的简明透彻，令人叹服。

在《周易》里面，还有一个与“人文”有关系的词，叫做“观光”。我想请问诸位，它是什么意思？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难道我们会连“观光”这个词都不懂？不就是旅游吗？北京不到处都是来游历名山大川、文物古迹的观光客吗？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的解释不对。“观光”这个词，源出于《周易·观》卦里的“观国之光”这句话。所谓“国之光”，说得明快一点，就是人的精神面貌、道德气象，就是国家的人文之光。古代中国是特别重视人文教育的国度，所以每逢外出，总是把参观和学习对方民众的好风气放在主要位

置。古书里常常有“到上国观光”、“到大国观光”之类的话，说的都不是游山玩水。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来谈什么是“人文奥运”了。在我看来，我们的人文奥运，应该是要体现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尤其要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经济取得骄人成就的同时，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如果我们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一个礼仪之邦的形象，一个人文日新的大国风范，世人都相信中国确实是一个和谐的、和平崛起的国家，那么北京奥运就是成功了。今后谁再想靠操纵媒体来贬低中国，欺骗舆论，就很难得逞了。

3. 古代中国是否有体育精神？

此外，我们还要记住我们的体育精神。如果有外国记者采访我们，问中国古代有体育吗？你怎么回答？我看了一本书，讲奥林匹克的，说奥林匹克体育精神只有希腊才能产生。其实，我们古代就有很多体育。在汉唐的时候，每次科举考试完了后都要打马球，观众人山人海像潮水一样，你不能只会死读书。在战国时代，临淄人就已经盛行玩“蹴鞠”了，也就是最早的足球，所以国际足联承认临淄是足球运动的故乡。可是，从时间上来讲，这些体育运动都比古希腊的奥运会晚。古希腊首届奥运会是在公元前776年，相当于我国的春秋时期，当时我国各地盛行一种“乡射礼”，射道的长短、靶子的大小都有严格的规定，也专门有人量，这里面尤其了不起的是有中国体育精神。

西方体育运动强调的是更高、更快、更强，都是体能方面的。中国人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注重内在的道德与外在的技能协调发展。怎么才能射得更直？内质要直，目标始终如一，气要下沉，用力精猛，发而不中，反求诸己，比赛

开始要揖让，不管谁输谁赢，都要行礼。你看东亚的许多体育运动，都保留着这种习惯，这是君子之争，欧洲没有的。

举行乡射礼的时候还要奏乐，演奏的乐曲有《诗经》的《小雅》、《大雅》，只有身心和谐的射手，才能按照音乐的节奏射箭，并且射中箭靶。所以说，中国古代体育精神讲究全面发展。如果我们都能理解我们传统的体育精神，那么人家输了，我们怎么会嘘他呢？更不会像泰森那样去咬对手的耳朵（笑声）。

那么，有人会说：“照你这么讲，金牌就不要了？”请大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奥运金牌当然是要的，而且多多益善。奋勇拼搏，勇夺金牌，本身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而金牌又可以反过来振奋民族精神。但是，我们在争夺金牌的过程中，要显示大国风范。前不久，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节目，说邓亚萍有一次跟一位韩国选手决赛，在最关键的时刻，对方打了一个擦边球，但裁判没看到。邓亚萍立即对裁判说：“这是一个擦边球。”后来教练称赞邓亚萍做得对，体现了一个大国运动员的风范！如果邓亚萍故作不知，那么这块金牌拿了也不光彩，我们的形象也就没有了。我们争奥运金牌，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上。金牌要靠实力去争，而不能靠小聪明、小动作，或者靠观众起哄，那简直就是抢金牌了。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以前有些主办国为了争得好名次，甚至有买通裁判之嫌。有些犯规动作，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裁判偏偏说没有看到；犯规的运动员也装得没事一样，这是非常让世人看不起的，也是有损国家形象的。

4. 北京奥运需要文明礼仪，但文明礼仪不仅仅是为了北京奥运。

当前，举国上下的礼仪热，是由于2008年北京奥运直接引发的。为了办好北京奥运，进行全民的礼仪教育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把北京奥运与礼仪教育挂钩挂得太紧，就会有问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办北京奥

运，那还要不要举行全民的礼仪教育？如果我们过于功利地看待礼仪教育与北京奥运的关系，那么奥运一结束，礼仪的约束就宣告解除，一切恢复到奥运以前的老样子。大家想想几年前的“非典”，那时大家怕被传染，每天洗手，也不随地吐痰。可是一旦“非典”的风险消失了，一切都照旧。为了抗击“非典”，我们民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连随地吐痰的陋习都没有改掉。因此，在我看来，这场礼仪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仅仅是为了北京奥运的体面。北京奥运是凝聚民心的绝佳机会，抓住这个机遇，用传统礼仪来提升大众的道德水准，把一件本来早该做的事做好，这对我们民族的发展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做秀”。

四、振兴中华礼仪之邦的几个建议

1. 礼要成为社会法规

礼是全社会的行为规范，只要全社会都遵守礼了，移风易俗的目标就可以实现。当前，不少国家都有国民礼仪，例如在升国旗、奏国歌的时候，要把右手放在胸前，向国旗行注目礼，并且要跟着唱国歌。这一类规范的有与没有，我想是不一样的。因此，应该建立公务员礼仪、校园礼仪、乃至外交礼仪等等。去年初，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做关于古代礼乐文化的演讲，节目播出后，我收到一位美籍华人的来信，他说重振礼仪之邦，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应该让全国人大立法之后，颁布执行。我非常赞成他的建议。

2. 礼仪教育要进课堂、进主流教材

少年儿童思想单纯，对他们进行礼仪教育，久而久之，就可以收到“习惯成自然，少成若天性”的效果，这样，我们民族的总体素质，就会在不太长的

时间里得到明显的提升。这个问题，古人非常的重视，例如朱熹就曾经反反复复地谈到这一点，他认为对于孩子，做比说更加重要，因为他们还不太懂事，对他们讲大道理是不会有什效果的，要紧的是要教他们学会正确的行为方式，越是具体越好，比方说吃饭的时候，只要没有特殊情况，一定要等父母先举筷子，然后再吃。再比方说，父母有所召唤的时候，不能拉长了声音应答。再比方，吃菜的时候，如果拿起了汤匙，就要放下筷子；反之亦然；不要这两样东西一起上手。如此等等。这些看似简单的行为规范里面，都包含着尊敬父母、文明进餐等等的道理，对于奠定他们做人的基础，至关重要。目前，这方面的教育尚未进入学校的主流课程，只有社会上的一些志愿者在零星地做，属于“体外循环”的性质，效果不理想。

3. 炎黄子孙要行中华礼仪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严重的西化现象，例如传统节日都快要被“洋节”给替代了，节日是民族文化最显著的表征，如果连它都消失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最近，听说有关部门正在起草一个方案，准备把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这四大传统节日全部休假，让老百姓有充足的时间来过自己的节日。这个方案真是高明得很，我希望它早日通过。令人想不通的是，正当我们在抵制“洋节”的时候，“洋礼”却在在大张旗鼓地登场了！西方商务礼仪正在进入各地各类学校的礼仪课堂，被当作中国礼仪在推广，教你怎么涂眼影、怎么打领结、怎么拿刀拿叉等等。这是另一种形式的西化，一旦推行开来，其严重性一点也不亚于全民过“洋节”，因为礼仪文化是我们的核心文化。所以我非常担心，如果北京年奥运举办之日，就是中国礼仪消亡之时，那就是一个悲剧了。也有人说，推广西方礼仪，是为了北京奥运时能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由。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通行的规则：入境随俗，就是说要尊重到访国的习惯。这种尊重是对等的，我们到外国，要尊重外国人

的习惯，他们吃饭用刀叉，我们也不应该特殊。其实，我们到外国去，没有人会给我们准备筷子的。相反，外国人到中国，则要尊重中国的习惯，我们用筷子，他们也应该用筷子，这是对我们文化的尊重。我们应该有文化自尊，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为此，尽快制订和推广富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礼仪，已经是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楚汉相争的决战问题

施丁

各位好！

这里办的学术讲座，效果很好，影响很大。我应邀而来，凑个热闹，谈点己见，算是争鸣，请予指正。我谈的是：关于楚汉相争的决战问题。基本上根据正史《史记》与《汉书》。现在分几个小节来谈：

前言

- （一） 决战开始（固陵之战）
- （二） 决战关键（陈下之战）
- （三） 决战残酷（屠城父）
- （四） 决战告终（垓下之战）
- （五） 楚汉相争尾声（乌江悲剧）

后语

前言

楚汉相争，是秦楚汉之际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但二千多年来，学者们对楚汉决战问题，并不甚了了。这是应当弄清楚的。

秦朝末年，政治腐败，残害人民，引起百姓反抗。陈胜、吴广于秦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揭竿起义，接着项梁、项羽（名籍）、刘邦、彭越、英布等响应。张良、陈平、韩信、范增等各种人物都卷入了洪流。

项梁、项羽在江东是阴谋夺机起事的。当时项羽 24 岁，年轻气盛。起事后，渡江而西，志在复楚，曾立楚怀王孙心为王。项羽勇猛，有破釜沉舟，大

战巨鹿的威名；但也有“屠”、“杀”，坑秦降卒 40 万于新安的劣迹，故民畏而怨之。

刘邦与萧何、曹参等起事于沛县，匿迹活动于芒砀山区。他当时已 48 岁，老练持重，在丰、沛有一定影响，故逐步形成以他为首的丰沛集团，多方联络，善于智取。曾先入关中，约法三章，颇得民心。

义军用两年多时间，摧垮了秦朝统治。项羽掌握 40 万大军，以压倒各方的优势，而主持政局。他构想的政治蓝图是霸主统领诸侯，组建楚王朝。于楚义帝元年（前 206）初，分封诸侯，让反秦有功，特别是跟随他的一些各国的贵族分子及军队首领当王，共分封了 18 个诸侯王。刘邦被封为汉王。按照先前义军所议：“先入关中者王之”。刘邦当为关中王。可是项羽别有用心。他分封秦之三降将，章邯为雍王，长史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领有关中之地。而只给刘邦巴、蜀、汉中之地，排挤他到秦岭以南一隅。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凌驾于诸侯王之上，领九郡，控制江淮地区广阔的辖境。他不都关中，而衣锦还乡（下相人，今江苏宿迁），带着珍宝美人到彭城（今徐州）做王享乐。这实际上是如同西周王朝的西楚王朝。司马迁在《史记》中立《项羽本纪》，予项羽帝王地位，是按史记实的。后人或因其短命王朝，或因历史无知，而不知不言楚王朝，是欠妥的。

刘邦被压被欺，心中恼火。他当时欲攻项羽，其部下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以为众寡不敌，必败无疑，劝刘邦“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使用巴、蜀，还定秦（即关中），天下可图也。”（《资治通鉴》卷第九）刘邦同意，立即去汉中，以萧何为丞相。张良劝刘邦走后烧绝栈道，以防他人来袭，又显示无东向之意。刘邦到了汉中，汉军中一些关东人或闹情绪、或开小

差。而这时有个韩信却亡楚归汉，来投靠刘邦。韩信原是淮阴无业市民，往往衣食无着，曾受辱于胯下，蒙漂母赐点食物。项家军北上渡淮时，他去投从，当上个郎中，其献策不为项羽所用。一气之下来到汉王处，初为连敖（司马），又为治粟都尉，管管车马，办办粮饷，也没受到重用。又要另谋高就，开了小差。萧何另具慧眼，认为不可失去此人，就连夜把他追了回来。向刘邦大力推荐，说是“国士无双”，应予重用。

附：项羽分封十八王国

王国	王者	诸王国境、都城
西楚霸王	项羽	王九郡、都彭城（今徐州）。
1. 汉王	刘邦	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汉中）。
2. 雍王	章邯（秦降将）	王咸阳以西，都废丘（今兴平）。
3. 塞王	司马欣（秦降将）	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今高陵东）。
4. 翟王	董翳（秦降将）	王上郡，都高奴（今延安）。
5. 西魏王	魏王豹	王河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
6. 河南王	（瑕丘）申阳	都雒阳（今洛阳）。
7. 韩王	韩王成	因故都，都阳翟（今河南禹县）。
8. 殷王	（赵将）司马卬	王河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
9. 代王	赵王歇	（代郡代县，今河北蔚县东北）

10. 常山王	张耳	王赵地，都襄国（今河北邢台）。
11. 九江王	黥布	都六（今安徽六安）
12. 衡山王	吴芮（鄱君）	都邾（今湖北黄冈北）
13. 临江王	共敖	都江陵（南郡，今湖北江陵）
14. 辽东王	（燕王）韩广	（秦辽东郡襄平，今辽宁辽阳市）
15. 燕王	臧荼（燕将）	都蓟（秦广阳郡今北京西南）
16. 胶东王	（齐王）田市	（秦胶东郡，今山东即墨）
17. 齐王	（齐将）田都	都临淄（今山东临淄）
18. 济北王	田安（齐王建孙）	都博阳（秦济北郡今泰安东南）

这就是后世广为流传的“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刘邦立即设坛任命韩信为大将，汉军上下皆为之震惊。如今看来，首先是刘邦会抓典型，当时开小差者众多，而韩信亡楚归汉，是有典型意义的；其次就是能纳谏、善用人。

韩信向刘邦献策，他以为项羽乃“匹夫之勇”、“妇人之仁”，其所作所为“实失天下心”，“诸侯不平”，“百姓不亲附”。又以为章邯等三秦王也不得人心，可先取关中。这个献策，可以与后来诸葛亮的《隆中对策》先后媲美。韩信这个计策，张良、萧何也有屡似之见。所谓英雄所见略同耳！

当年八月，汉军出击，打败了雍、塞、翟三王，取得关中，立定脚跟。楚汉相争从此拉开了序幕。然后矛头东指，诸侯军多有前来附从，浩浩荡荡，奔向楚都彭城。这时项羽正在齐地镇压反对者，一时难以脱身。楚汉二年（前205）四月，汉军与诸侯军56万大兵乘虚进入彭城，得意非常，兴高采烈，“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项羽闻讯，马上以数万轻锐前来，攻击忘乎所以的乌合之众，汉军与诸侯军顿时败散。楚军追杀败军，“睢水为之不流”。刘邦的父母妻（吕雉）子成了俘虏。他本人丧魂落魄而逃，几次从战车上推掉坐在身旁的儿女，幸亏夏侯婴才把其儿女捡了回来。

刘邦退到中原，楚军赶来，双方在荥阳、成皋间形成对峙，展开拉锯战。稍后于广武对峙。楚汉此时，大致旗鼓相当。进入相持阶段，约历时两年有余。刘邦于彭城之役败逃至下邑（今江苏碭山）时曾向张良请教，如何才能扭转战局。张良根据当时形势和情况，建议应当做好三个人的工作：争取把九江王英布拉过来，因他与项羽有矛盾；联络与支持彭越，在楚腹心地区开展扰乱与袭击；信用韩信独当一面，去开辟北线战场，打击项羽的友军，夺取北方地区。刘邦完全用意，放手实施。果然得心应手。英布叛楚归汉了，给予优厚生活待遇；使刘贾去支援彭越，开展游击战；韩信为大将，取河北，下齐地，于井陘之役、淮水之役，都取得大胜，斩陈余、杀龙且，威震遐迩。使得项羽南北吃紧，辅佐少力。

韩信是于楚汉四年（前203）初取得齐地的。他自恃武功、占据一方，乃派人向汉王刘邦要求封为齐王。刘邦无奈，乃遣张良为使，持大印前去封韩信，同时抽调骑将灌婴“别将”而南下袭楚。因为已封了韩信，对曾为楚九江王的英布也不得不封，故于七月封英布为淮南王，派他去淮南开展军事活动。那时的诸侯王，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汉王刘邦既让韩信为齐王、英布为淮南

王，那就不是统属关系，而是统战关系，不是嫡系，而只是友军。所以汉方表面上已大优于楚方，实际上优势尚不突出。

楚汉相争了两年多，双方消耗甚大，尤其是楚方不免内外交困。项羽此时想出了一个歪招：他命人在军前架起了大案板，置刘公（刘邦之父）于其上，架锅生起了火，对汉方刘邦叫喊，声称刘邦若不前来投降，乃烹了刘公。刘邦更能应招。他对项羽说：咱俩曾约为兄弟，我父即你父，你烹我父，请分给我一杯羹。项羽反而左右为难。他提出与刘邦决战，说天下纷扰，只因你我两人拼争，现在决个雌雄，免得百姓再遭涂炭。刘邦自知拼不过项羽，不答应决战，反而在阵前诉说项羽十大罪状。项羽恼急，伏弩射击刘邦。刘邦伤胸而扞足，躲入壁内养伤，命令坚守营壁。

同时，刘邦想出了新招，向楚方倡议媾和分界，一再派人去向项羽解说与谈判。这可能是他为了更好地备战，也可能是为了麻痹对方，也有讨回被俘的父母妻子之用意。项羽终于同意媾和。于楚汉四年（前203）九月划定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东南流至开封南，折而南流，至淮阳东南注入颍水）为界，沟以东归楚，沟以西归汉。项羽放还了刘邦的父母妻子。汉军皆呼“万岁”。也许是以为从此休兵不战了。

（一） 决战开始——固陵之战

媾了和，分了界。项羽因后方不安宁，“乃引兵解而东归”。他不是往彭城，而是向东南去陈县。可能这时彭城已沦陷，已回不了老巢。刘邦也想稍事休息。张良、陈平建议立即追击项羽，说：“今释弗击，乃‘养虎自遗患也’。”刘邦采纳，立即出军。

汉军追到阳夏（今河南太康）南，停了下来，派使者与韩信、彭越约，“期会”而击楚军。稍前，到了固陵（今河南太康南，淮阳以北）。项羽回师来击，汉军大败。

刘邦只好坚守固陵。其时约在九、十月间。此役说明，决战开始，楚军尚有相当的实力；汉军也有一定力量，只因没有韩信、彭越相助，就难以对付楚军，以致一时受挫。

（二） 决战关键——陈下之战

固陵失利，刘邦烦恼，对张良说：“诸侯不从约，为之奈何？”张良说：“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今河南淮阳）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以北至谷城（今山东平阳西南），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破也。”刘邦首肯。于是立即发使相告。韩信、彭越乐意，表示“请今进兵”。（《史记·项羽本纪》）他们出动了。

就在这时，汉军有了新生机，奋战于楚腹心地区的灌婴军西来，刘邦由固陵去迎，“会颍乡”。这一会晤非常重要，应大书特书。灌婴原是个布贩子，乃刘邦的老部下，彭城之役后受命组建骑兵部队，在楚汉对峙中，为汉主立了功，后奉刘邦之命随从韩信破赵、收燕、下齐，于韩信称王时被汉抽调别将南下袭楚，取彭城，收项佗，而来密会刘邦。颍乡，在今河南鹿邑县，西距陈（今淮阳）百余里。史书记载：“（灌婴）与汉王会颍乡，以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就是说，颍乡之会以后，便发生了陈下之战。

陈下之战，大约发生于楚汉五年十月间。双方兵力，史无明文记载，估计楚军至少在十万以上，汉军刘邦所部大约与楚军相当或少些，灌婴军乘胜而来，至少也有十万大军，故此时汉军已过于楚军。项羽所部，有灵常军、吕青军、钟离昧军、周将军、利几军等，都聚于陈下。他当时大约想以经济富庶、

交通方便的陈县为据点，进可取中原，退可往江南，从长打算，再图霸业。汉军来到时，刘邦所部嫡系几乎全部来了（只有刘贾奉命去了淮南），灌婴军（骑兵）从东线来，还有靳歙军也来了（参考《靳歙列传》），形成四面夹击楚军之势。还有一支生力军，充实了汉军骑兵部队，即：两个月前（八月），“北貉、燕人来致梟骑助汉。”（《汉书·高帝纪》）北方游牧族有骑射的特长，号称“梟骑”。这时的“梟骑”，当作先锋，以冲击楚军。

两军接战，先是骑兵交锋，汉军旗开得胜；接着是交战于陈下（陈县城郊），楚军不济；再就是楚军败逃、汉军追击。

所谓陈下之战，是一场关键性的大决战。根据众多零星的史料，尤其是《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内容，全面地仔细地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辨析而立论。一方面，看汉军的战功：

丁义，“为郎骑，破钟离昧军固陵，侯。”

靳强，“以中尉破（楚军）钟离昧，功侯。”

盠达，“以都尉破项籍军陈下，功侯。”

薛欧，“以将军击项羽、钟离昧，功侯。”

尹恢，“以右丞相备守淮阳，功比戾次侯。”

灌婴，“以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食邑二千五百户。”

樊哙，“从击项籍下阳夏，虏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陈，大破之。”

靳歙，“还击项籍陈下，破之。”

灵常，“以荆（楚）令尹汉五年初（即十月）从，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几，破之。”

吕青，“以汉五年用左令尹初（即十月）从，功比堂邑侯，千户。”

利几，“项氏之将。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高祖侯之颍川。”

汉方仅因陈下一战，参战立功或由楚归汉反戈一击而封侯者有七人之多，这是楚汉战争史上空前绝后之事，足证其胜利之辉煌。

另一方面，看楚军之惨败：

令尹灵常临战降于汉，反戈击楚，“击钟离昧及陈公利几。”

左令尹吕青临战降于汉，反戈击楚。

大将钟离昧被汉军丁义、靳强等部击溃，本人潜逃。

陈公利几，“项氏败，利几为陈公，不随项羽，亡降高祖。”

项羽自领兵打仗以来，身经 70 余仗，从未有如此将相叛离、损兵折将之惨烈剧痛，足见其失败之惨重，因此只能溃逃。

陈下之战，仅以此而论，岂非一场大战、决战、战局剧变之大决战乎？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大历史家司马迁写《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只提鸿沟分界后的固陵之役、垓下之战，根本没有提到陈下，更不用说有什么陈下决战，何解？班固于《汉书》写《高帝纪》、《项籍传》也如此，又何解？你是怎么知道有陈下大战的？

请大家注意：近世研究楚汉战争者早就感到陈县附近确有大战，然而与上述《史》《汉》篇章内容对不上号，为了圆通，提出了种种说法，如：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云：“垓下（在河南鹿邑县境。一说在安徽灵璧县。按当时军事形势，应以在鹿邑县境为是）决战，项籍败死。”（第二编第 28 页）所言鹿邑县境，（即古苦县）距陈县百余里。

(2)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一文（载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提出，垓下在今河南淮阳县（即古陈县）境之说，亦即谓垓下是在陈下。

(3) 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一文（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学刊》2001年10月），提出史籍上的所谓“垓下”乃“陈下”之讹，亦即谓历史上有陈下之战而无垓下之战。

这三种说法的共同点是，楚汉的大决战应发生于陈下或其附近（即在之陈县或苦县），这是颇有识见的。但经不起具体推敲，于古籍材料难以圆通。

我于20世纪60年代初，学术界大刮假大空之风时，曾闭门熟读《史记》。在《灌婴传》察觉到，灌婴既参加了“陈下”之战，又赶上了“垓下”之战，奉命追击项羽至东城。更重要的是，稍后，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发现有几位将士因参与陈下之战而封了侯，也有人因参加垓下之战（为孔将军、费将军）而封为侯的。故我断定，陈下之战是有的，是场大决战；垓下之战也是有的，只是已成尾声。还要指出，垓下不可能在鹿邑县，也不可能陈县境，更不可能是“陈下”之讹。我遍查《史记》，发现书“陈下”者6处，书“垓下”者13处。《汉书》所记，与此略同。这难道是司马迁、班固随意或出差错？或是“垓”与“陈”字形之讹？从字形来看，“陈”、“垓”两字，无论真、草、隶、篆哪种字体，都不大一样，不可能阴差阳错的。若按《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中的“洨国”本注：“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此中的“垓下”，若是“陈下”之讹，它也仍在沛郡的洨国，而

不可能窜到“淮阳国”中的“陈”去；何况“淮阳国”内毫无“垓下”的踪影。因此，我参与了争鸣，坚持己见。

或许有人问：照你所说，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写历史不是有问题了吗？他写的《项羽本纪》中，对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战等都写得生动如画，为何不见陈下之战一点笔墨呢？我的回答是：司马迁写史，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一定的缺点。在写楚汉决战事件上，确有避重就轻之过。其过失的原因，大约有二：一是他下很大功夫搜集秦汉之际历史的材料，除掌握档案文件、图书资料外，还游历广大的江淮地区与齐鲁等地，调查访问，采访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但我要指出，他并没有到过陈县，未采访到陈下之战的具体材料，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口头传说；二是他对韩信有所偏爱，因为他在淮阳作过认真调查访问，得到很多传奇性材料，他对韩信才能很赞赏，故写井陘之战、淮水之战都有声有色，他似乎也同情此人的悲剧结局，所写《淮阴侯列传》颇有言外之意。但他并不有意涂抹或掩饰历史，仍然忠实地在《史记》另一些篇章中记录了陈下之战的有关材料，透露了这场战争的史迹，可供后人探索与发现。我个人就是从中有所发现而大谈陈下之战的。

所以，我根据《史记》与《汉书》提供的材料，敢于断言：垓下之战前，有次陈下大决战。

（三） 决战残酷——“屠城父”

项羽惨败于陈下，大军溃逃，奔向东南。按常情，楚军可以沿着鸿沟与颍水而南下，再沿淮河往东，直指寿春（今安徽寿县）。寿春是淮南要地。他曾指派大司马周殷镇守。但大司马周殷已经被汉方劝降，寿春已经失陷于汉，在汉军刘贾部队掌握之中。故楚败军不能去寿春，只好向东奔往城父（今安徽亳县南）。项羽以此为据点，即可稍事喘息，还可再作另图。

汉军追击而来。刘贾也从南而来，周殷跟随而来，淮南王英布也来了。大军包围了城父，“屠城父”。屠城者，围歼血洗者也。城父之战，史无具体记述，仅从“屠”字来推敲，当是激烈而残酷的。被围歼的楚军当不是小数。

（四） 决战告终——垓下之战

垓下之战，决战已基本完结。

“屠城父”，项羽没有被屠，可能是他安排部分楚军守城父，以阻汉军，而亲率溃军继续逃跑，大军“壁垓下”。

楚汉五年十二月（大约前 202 年初），韩信军来了，彭越军来了，英布、刘贾、周殷等军来了，汉军大部在刘邦率领下也追击来了。对楚军形成合围之势。

楚军在垓下（聚落）壁守，“卒可十万”，“兵少食尽”。十分窘迫。汉军与友军声势浩大，仅韩信军就有“三十万”。韩信军南下，一直未经战斗，故先到了垓下，处于前锋位置。项羽被逼反抗，犹困兽之斗，突袭韩信军。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韩信“先合不利，却。孔将军、费将军纵，楚兵不利”，韩信“复乘之。”是以楚军“大败”。项羽退入壁内，“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

项羽于当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有的人说，这“四面楚歌”，乃张良设计所为。这是没有史料可证的。项羽“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愴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据《楚汉春秋》虞美人的歌曰：“汉兵已略地，四面楚

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按歌词之意，项羽已无叱咤风云之气，乃失意者儿女之态。如今，京剧《霸王别姬》，琵琶曲《十面埋伏》能尽此意乎？

（五） 决战尾声——乌江悲剧

项羽无奈，只能逃跑。他骑上马，“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天快亮的时候，汉军才发觉，刘邦命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羽南逃了百余里，渡过淮河的时候，能跟得上的骑兵只有百余人了。项羽到了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迷了道，“问一田父，田父给曰‘左’。左，乃陷大泽中。因此汉军“追及之”。有的学者说：“农夫故意指导他走错道路，因而被汉兵追及。这是人民厌弃他的明证。”这倒未必。司马迁用了“给”字。给者、欺也。说田父故意欺骗，也未必。项羽从北面驰来，田父北向，田父说“左”。这“左”，是田父的“左”，还是项羽的“左”？是东还是西？项羽心急火燎，不明究竟，自己逃错了方向，是可能的。

项羽“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羽估计难以逃脱，又不甘失败，对其骑从者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分骑兵为四队，四向冲向前来包围的数重汉骑兵，“大呼，驰下”，杀退了汉骑，“遂斩汉一将”，瞋目而叱杨喜，使杨喜惊退了好几里。汉骑兵又围了过来。项羽驰击，“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而他自己的骑兵只亡两骑。他对骑从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

项羽逃到了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长江西岸）。乌江亭长将船靠岸，对项羽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

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河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他觉得亭长为人“长者”，便把骑了五年而“日行千里”的亲骑赠送给他。项羽命令骑从等“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他“所杀汉军数万人”。“身亦被十余创”。见到汉骑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吕马童不予正视，向王翳指示：“此项王也。”项羽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足万户，吾为若德。”意思是，汉悬赏千金、邑万户，要我的头颅，我现在就把这个好处送给你。项羽说完“自刎而死”王翳果然取其头，众汉骑前来争夺项羽尸体，互相蹂践、相杀“数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一体”。后来刘邦封王翳等五人各为列侯。

项羽死后，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因为起义初期项羽曾被封为鲁公。刘邦“为发哀，泣之而去”。因项伯有恩于他，被封为射阳侯，还有项襄、项佗等也被封为侯，还“赐姓刘”。这些人，一定也是中途倒戈，而有功于汉的。让韩信为楚王，都下邳。立彭越为梁王，都定陶。遵守了诺言。还封一些功臣为侯。

司马迁写项羽垓下被围至乌江自刎，有声有色，情景交融，可谓中国古代悲剧的名篇。古今中外的作家，喜剧写得好的，不多；而写悲剧，往往入木三分，引人深思。但司马迁写悲剧，不是为悲而悲，而是有批判的。他肯定项羽灭秦，号为霸王，“近古以来未尝有也”；指出“（项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虽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史记·项羽本纪》）这里从

缺道义、失人心、不会用人等立论，谓咎由自取。这是大史家的眼光与手笔，非如近世俗学只谈司马迁同情项羽，而不顾其严厉批判。

后语

刘邦灭楚之后，于汉五年正月被推为皇帝，都于洛阳。在洛阳南宫的庆祝会上，要求众臣直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都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不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以为，这说的不全面，还没有抓住重点，说：“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史记·高祖本纪》）这是当事人从用人方面所总结的宝贵经验。凡事在人为，只要战略方针对头，人就是决定性因素。

近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总结刘项胜败的原因，首先以阶级观点分析，认为：“主要由于刘邦的拥护者是广大农民，特别是秦国农民，项籍（字羽）的拥护者只是些野心的领主残余公子。两人所依靠的力量不同，因之后果也不同。”还说：“刘邦有关中作根据地，萧何替他留守，输运兵卒粮饷，战败后常得补充，有时甚至十几岁的幼童、六十岁的老人也被补充上战场，秦民并不怨恨。项籍战败，不敢回彭城（按：彭城已失陷），也不敢回会稽（按：郡治吴县，今苏州），因为他知道没有民心可靠的根据地。“这是颇有见地的。

除此而外，我觉得，刘邦出生农家，长期混迹民间，足智多谋，善于采纳意见，善于笼络团伙，组成一个可以信赖的平民集团。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萧何、曹参是沛县小吏，与刘邦早有密切关系，是芒碭起义时的骨干；樊噲是

屠狗的，灌婴是布贩子，周勃是吹鼓手，夏侯婴是沛县马厩饲养员，卢绾是农家子，与刘邦是小哥们，刘贾是刘姓同族人，都很早随从刘邦，为集团亲密分子；曾为“盗”的彭越，出身布衣的英布，始为布衣的韩信，旧贵族后裔张良，出身农家的陈平，也都疏项而亲刘。有这样的亲密团伙与联络关系，才得以保证败而不散，藕断丝连，胜利有望。

刘邦非常机智，善于纳谏。试举三例：（1）当他反秦西进时，一路招兵纳贤，到了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高阳地方，高阳老儒酈食其想见刘邦，听说他“不好儒”，曾在戴儒冠者的冠中“溲溺”，但仍然前往谒见。刘邦“方倨床使两女子洗足，而见酈生”。酈生则“长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诸侯乎？且欲率诸侯破秦也？”刘邦听了，骂道：“竖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诸侯相率而攻秦，何谓助秦攻诸侯乎？”酈生说：“必聚徒合义兵诛无道秦，不宜倨见长者。”刘邦听了，马上改变态度，“辍洗，起，摄衣，延酈生上坐，谢之。”（《史记·酈生传》）于是两人畅谈，酈生主动去劝说陈留令投降。刘邦不费吹灰之力取得中原要地陈留。而这时项羽正在北线准备硬拼巨鹿之围。

（2）刘邦于彭城之役败退途中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山），“下马踞鞍”，对张良说：我要以关东地区封赏有功者，“谁可与共功者？”张良说：“九江王黥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齐王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刘邦当即决策，派随何为使，把九江王英布拉了过来，使项羽失却一个臂助；使人与彭越联络，并派刘贾去协助之，使项羽腹心不安；使韩信去开辟

北方战场，取得代、赵、燕、齐，使项羽更为势孤。这是楚汉相争初期汉方极为重要的战略方针，没有这个正确方针，楚汉成败未可确知。

(3) 汉四年（前 203）初，韩信平定了齐地，“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围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史记·淮阴侯列传》）张良征了谁去击楚呢？乃骑将灌婴，“使婴别将击楚将公杲于鲁北，破之。转南……遂降彭城，虜柱国项佗……与汉王会颍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灌婴传》）足见善待韩信的重要性。

(4) 楚汉于广武对峙，刘邦与项羽阵前对话，“项羽欲汉王独身挑战”。刘邦不应，而数项羽十罪。“项羽大怒，伏弩射中汉王。汉王伤胸，乃扞足曰：‘虜中吾指！’汉王病创卧，张良强请汉王起行劳军，以安士卒，毋令楚乘胜于汉。”（《史记·高祖本纪》）刘邦伤胸，急中生智而扞足，又带病劳军，对于安定众心，稳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凡重大的军事、政治事件，其成功者，必有坚强的核心集团，必有明智的首领。楚汉相争事件，刘邦与丰沛集团即其明证。

再宏观一点来看，楚汉相争成败的结局，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与影响。首先，自秦皇统一天下，废分封，立郡国，而项羽分封 18 王国，再至汉统一天下，推行郡县与局部分封，以至景武之世“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推广郡县制，弱枝强干。统一走了个之字道路。而刘邦灭楚兴汉，对于统一道路的由曲而直，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汉之统一乃历史大势所趋。

次之，秦及其以前多为旧贵族掌握政权，秦末起义者，平民陈胜称王，数月即亡。旧贵族公子项梁、项羽得势，竟然找个旧贵族后裔楚怀王孙心立为王，还称楚怀王。项羽称霸，分封十八王国，诸王多为六国旧贵族后裔或贵族公子，像农家子刘邦这种人却被排挤。而出身民间的刘邦兴汉，竟然开“布衣将相”之局。如三公九卿：丞相萧何、曹参、陈平、周勃、灌婴等等。太尉（掌兵权），前几任是卢绾、周勃、灌婴等等。御史大夫（副相），前几任是周苛、周昌、赵尧、任敖、曹窋等等；奉常（太常）叔孙通，郎中令王恬启、卫尉郾商、太仆夏侯婴，廷尉义渠，典客薛欧，宗正刘郢客，中尉周昌。几乎是青一色的布衣出身或来自社会下层。这种“汉初布衣将相”局面的出现，不只是政治舞台上简单地跑龙套，而有新血液、新气象的意义。凡社会变化，制度更易，政权替换，没有新人新意识以主持与贯彻，是难以想象的。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我国人民极为重视历史与文化，有着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故对楚汉相争这样的历史大事依然念念不忘，常想从中汲取教益，加强文化素养。我个人学识浅薄，所谈可能多有谬误，敬请诸君批评指正。谢谢！

漫谈中唐诗坛

卞孝萱

我将多年来研究中唐诗坛之成果，向大家汇报，抛砖引玉。

中唐时代之界定

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将唐诗分为“唐初体”、“盛唐体（景云以后，开元、天宝诸公之诗）”、“大历体（大历十才子之诗）”、“元和体（元、白诸公）”、“晚唐体”。同书《诗评》云：“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盛唐人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大历之诗，高者尚未失盛唐，下者渐入晚唐矣。”当时尚无“中唐”之名称。

明人如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正变》云：“唐诗之变渐矣，隋代以还，一变而为初唐，贞观、垂拱之诗是也。再变而为盛唐，开元、天宝之诗是也。三变而为中唐，大历、贞元之诗是也。四变而为晚唐，元和以后之诗是也。”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近体律诗》云：“至唐而有四等，由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为初唐，由开元至代宗大历初为盛唐，由大历至宪宗元和末为中唐，由文宗开成初至五季为晚唐。然盛唐诗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要当论其大概耳。”此时才有“中唐”之名称。但“中唐”指哪几朝？高棅以德宗贞元为下限，徐师曾以宪宗元和末为下限，意见不一致。

清金人瑞批评：初、盛、中、晚“此等名目，其言出入，初无准定”。

（《鱼庭闻贯·答敦厚法师》）。明、清两代对中、晚唐之界限，见解是不一致的，例如多数人以韩愈、柳宗元为“中唐”，而贺裳《载酒园诗话·咏事》云：“昔人称退之‘一间茅屋祭昭王’为晚唐第一。”《师友诗传录》引张萧亭云：“下及元和，虽晚唐之变，犹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以韩愈、柳宗元为晚唐。

今按照比较通行的说法，以代宗大历至穆宗长庆末为“中唐”，涵盖韩（愈）孟（郊）诗派、元（稹）白（居易）诗派以及柳宗元、刘禹锡等重要诗人的主要创作时期。

中唐时代背景

对“中唐”时代进行界定之后，接着谈这个时代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战乱虽平，唐朝国力大为削弱，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穷则变，变则通。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在各个领域中，先后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从而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持了唐朝的统治。

（一）表现在财政经济方面：“安史之乱”以后，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缩小，税源枯竭，而军费的支出大增，入不敷出，财政支绌，加以漕运破坏，导致关中地区粮荒，物资缺乏，物价腾贵。代宗时，刘晏针对当时积弊所在，改进漕运法，改进盐法，行常平法，均取得成功。

“安史之乱”以后，朝廷不能有效地控制户口及田亩籍账，土地兼并更为剧烈，赋税制度陷于混乱。代宗时，已进行过一些试探性的税务改革。德宗采

纳杨炎的建议，于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废除租庸调，改税丁为税产，扩大了征税面，对无地少产的农民有好处。由于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两税法实行中弊病不少，遭到陆贽等人的强烈反对，反对是有理由的，但没有更好的办法代替两税法。

初行两税法时，曾确定朝廷与地方分割赋税的份额，但未能严格执行。宪宗时，将朝廷能控制地区的赋税，划分为三：一部分上交朝廷（上供），一部分供给节度使、观察使府（送使），一部分作本州用度（留州）。宰相裴垍进一步规定，各节度使、观察使应先以治所之州的赋税充用，不足始取其余之州。各州“送使”有剩余，应上交朝廷。

通过上述种种改革，保证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对维持中央集权与讨伐叛镇，起了重大作用。

（二）表现在政治方面：玄宗晚年，宦官逐渐干政。“安史之乱”以后，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代宗始用宦官于内廷“掌枢密”。宪宗设左右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被侵夺。宦官又掌握禁军，德宗设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宦官从此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队。两神策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并称“四贵”。皇帝又派宦官为监军使，监督藩镇。宦官恶势力不可一世，操纵国家大事，甚至废、立、弑君，忠臣志士，谋翦除之。

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掌权，革除弊政，人情大悦，正着手夺取宦官兵权，遭到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以及与之相勾结的韦皋、裴均、严绶等节度使的猛烈反扑，强逼顺宗让位给太子，所谓“永贞内禅”。宪宗即位后，镇压革新派人物：王叔文先贬后赐死，王伾贬死，主要成员八人贬为远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是在顺宗患病、不能临朝的不正常情况下进行的，是翰林学士王叔文与宰相韦执谊联合起来才能进行的。宪宗即位后，引以为鉴诫，将宰相与“内相”的职权划分得更为明确、具体。一方面，规定内廷的翰林学士不参加外廷的决策过程，以制约翰林学士无限扩大权力；另一方面，利用翰林学士起草诏令，对外廷的决策，有权提出不同意见，以削弱宰相的权力。宪宗约束了内外两个机构的职能，加强了皇权。

（三）表现在军事方面：“安史之乱”虽然平定，安史部将的势力并未消灭，藩镇割据的形势由此形成。肃宗、代宗采取姑息政策。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德宗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乱持续了五年之久，唐朝政权才从危险境地中得到缓解。收复长安而心有余悸的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讨伐转变为妥协，以求苟安。

“永贞革新”的施政方针之一是抑制强藩。王叔文集团挫败了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兼领三川的野心。宪宗虽镇压了王叔文集团，却继续了这个集团抑制强藩的方针。他即位后，依靠父、祖积累的军力和财力，执行削藩政策。先后讨平叛变的藩镇刘闢、杨惠琳、李錡。淮西吴元济叛乱，讨伐无功，屯兵四年，朝廷中分主战、主抚两派，宪宗命主战派首领裴度督师。裴度深知宦官监军之弊，奏准罢去宦官监军，加强了统一指挥，终于取得胜利。淮西既平，河北震慑，相继归顺。接着又平定淄青李师道。史称“元和中兴”。由于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原因，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

（四）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安史之乱”以后，朝廷威势下降，具有进步思想的经学家，针对宦官专擅、藩镇跋扈的局面，提倡《春秋》学以尊王室名分。啖助及其弟子赵匡、陆淳（改名质），都借《春秋》抒发自己的政治见

解，他们不顾经学家法和朝廷功令，对《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任意驳诘，更不用说唐朝颁布的《正义》了。陆淳是王叔文集团的理论家，柳宗元、吕温等都师事之。啖、赵、陆开创的舍传求经的学风，又是宋学的先导。韩愈、李翱在这方面也是有贡献的。

施士句著《春秋传》，唐文宗斥为“穿凿之学”，而韩愈《施先生墓铭》云：“古圣人言，其旨密微，笺注纷罗，颠倒是非，闻先生讲论，如客得归”，叹息施士句卒后，“谁嗣为宗？”又，韩愈《寄卢仝》诗云：“《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诗中推崇卢仝“先生事业不可量”。可见，韩愈研究经学，反对拘守章句训诂，赞成舍传求经的学风。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答侯生问〈论语〉书》中说：“愈昔注解其书，而不敢过求其意，取圣人之旨而合之，则足以信后生辈耳。”用他的自白来对照《论语笔解》，其治经方法，正相符合。《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经解类·〈论语笔解〉十卷》记载：“今世所传，如：‘宰予昼寝’，以‘昼’作‘画’。‘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类，虽未必然，而为伊川之学者，皆取之。”《论语笔解》中这种毫无根据的臆说，表现出儒学由旧的汉学系统开始转向新的宋学系统，这是经学史上的重要变化。

统治者精神空虚，人民生活困苦，都需要从宗教里寻找寄托和安慰，统治者提倡佛教。儒生是反对佛老的一个重要力量。韩愈一生从事排斥佛老的活动，他树立儒学大旗，以儒家传统思想（如忠孝）反对佛教的“怪僻”思想（无父无君），同时期内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旗帜鲜明，也没有一人像他那样斗志昂扬，“虽灭死万万无恨”。

韩愈提出“道统”之说，以继孟轲自任。他经常宣传“严夷夏之防”、“觝排异端”。这个反佛武器收到团结儒生、共同作战的效果。宪宗迎佛骨，只有他敢上表谏阻，震动一时。

为了重整伦常，韩愈撰“五原”，弟子李翱作《复性书》，虽然还未能像宋代理学那样成为系统的儒家学说，但已为宋儒开辟理学的初源。韩愈特别提出《礼记·大学篇》，李翱又提出《礼记·中庸篇》。宋人提倡“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韩、李已开其端绪。

文学附于儒学，作者的思想感情才有正统的来源，是非喜怒才合乎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韩愈领导中唐“古文运动”获得空前的成功，主要原因在此。

下面略述中唐古文运动。

尽管唐朝四六文发达，与之相对抗的古文运动，从初唐就开端了。王绩所作《醉乡记》、《负苓者传》，与陶潜相近。马周所作章奏，摹仿贾谊《治安策》。都是唐代散体之滥觞。高祖时，傅弈以比较接近口语的文章反对佛教。太宗时，吕才著书攻击荒诞的阴阳巫术，“才之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夫，切时事，俾易晓也。”¹傅、吕立言，重点在排斥宗教迷信，无意于古文。武后时，陈子昂有意为古文，“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²形式与内容合起来就成为后来古文运动的轨范。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承认傅、吕、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奠基人。

¹ 《新唐书·吕才传》。

² 《新唐书·陈子昂传》。

“安史之乱”以后，古文运动比较成熟，出现了元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梁肃一批作者，显示将有高潮来到。元结从兄元德秀提倡儒家德行。元结继起，有儒家的政治主张和文学主张，旗帜鲜明。萧颖士子萧存，亦以古文名，与韩愈兄韩会为友。韩愈继承家学，幼年即为萧存赏识。韩愈崇儒学，倡道统，反佛老，除弊事，主张是明显的，态度是坚定的，他写的古文，不只是文体的改革，更是政治、学术思想的斗争。他敢为人师，传道授业，有意培养一批后继的卫道战士，造就一支强大的古文队伍。在韩愈友人中，如刘禹锡、柳宗元，虽然哲学思想、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但在古文创作上则志同道合。韩愈弟子李翱晚年回忆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¹从西晋夏侯湛以《昆弟诰》古文反对骈文以来，经过400余年的酝酿，到唐元结等，从支流变为巨流，到韩愈等又从巨流变为长江大河，波澜壮阔。韩文影响深远，自北宋欧阳修至清桐城派，凡为古文者，无不以韩愈为不祧之祖。韩愈不愧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伟大领导人，空前的成功者。

与文体改革相呼应，在诗坛上也掀起一股改革浪潮，出现了变盛唐、求创新的韩孟、元白两大诗派。

中唐诗坛盛况

¹ 《刘禹锡集》卷一九《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

代宗时，有“大历十才子”，“他们做的诗，没有一人能像杜甫反映现实，伸张正义，足见这些人不过是能作诗和普通文士，做诗不能再现时代的特点，只能被看作普通文士做普通诗。”¹

代表中唐诗坛的是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以及两大诗派之外的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各有创造，自成大家”。²韩孟诗派的主要成员是韩愈、孟郊、贾岛、卢仝、李贺等，元白诗派的主要成员是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等。两大诗派各具特色。侈谈两派之优劣是徒劳的，比较两派之异同才是有意义的，举其大者：

（一）两派都受杜甫影响。在中国诗史上，杜甫是人们所公认的“集大成者”。所谓“集大成”包括承前与启后两个意义。启后为后代诗人开辟广阔道路的作用，尤为重要，正如《新唐书·杜甫传赞》所说：“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具体地说，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云：“公之诗支而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贾岛得其奇僻。”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两行秦树直，万点蜀山尖。’则元、白平易之宗。‘两边山木合，终日子规啼。’卢仝、马异之浑成。‘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鸥饥。’孟郊、李贺之瑰僻。‘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岛、可幽微所从出。‘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籍、建浅显所自来。……杜集大成，五言律尤可见者。”赵翼《瓯北诗话》卷三云：“至昌黎时，李、杜已在前，纵极力变化，

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七章第五节。

²同上。

终不能再辟一径。惟少陵奇险处，尚有可推扩，故一眼觑定，欲从此辟山开道，自成一家。此昌黎注意所在也。” 馀不多举。

（二）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扼要地说出了两大诗派之异。就两大诗派成员言之：（1）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卢仝、马异、孟郊、贾岛，并出一时，其诗体酷类。”（2）据白居易《与元九书》，元稹拟选张籍的古乐府、李绅的新歌行以及他与白居易的作品为《元白往还诗集》。

（三）韩愈、孟郊开创“联句”新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联句诗〉》云：“按联句诗起自《柏梁》人各一句，集以成篇。……唯魏《悬瓠方丈竹堂燕饗》则人各二句，稍变前体。……有人各四句者，如《陶靖节集》所载是也。有人各一联者，如杜甫与李之芳及其甥宇文曷所作是也。有先出一句，次者对之，就出一句，前人复对之者，如《韩昌黎集》所载《城南诗》是也。然必其人意气相投，笔力相称，然后能为之，……”方世举《兰丛诗话》云：“韩、孟联句，是六朝以来联句所无者，无篇不奇，无韵不险，无处不扼抑人，无对不抵挡住，真是国手对局。”施补华《岷傭说诗》云：“韩、孟联句，字字生造，为古来所未有。”

元、白开创长篇次韵之体。赵翼《瓯北诗话》卷四云：“必创前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古来但有和诗，无和韵。唐人有和韵，尚无次韵，次韵实自元、白始。依次押韵，前后不差，此古所未有也。而且长篇累幅，多至百韵，少亦数十韵，争能斗巧，层出不穷，此又古所未有也。……以此另成一格，推倒一世，自不能不传。……二人创此体后，次韵者固习以为常，而篇幅之长且多，终莫有及之者，至今犹推独步也。”

(四) 韩愈、白居易、元稹分别开创传奇新体。韩愈撰《石鼎联句诗、序》，创诗、传奇合一之新体。元稹撰《莺莺传》，李绅作《歌》；白居易作《长恨歌》，陈鸿撰《传》，创二人分任诗、传奇之新体。

两大诗派及刘、柳的几个重要问题

(一) 韩愈“以文为诗”之源流

宋人将韩愈诗的特色概括为“以文为诗”，如沈括、王存说：“退之诗，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然终不是诗。”¹黄庭坚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故不工尔。”陈师道说：“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²俱含贬意。此后，人们沿用韩愈“以文为诗”之说，褒贬不一，褒多于贬，其内涵亦有发展。

清沈德潜提出“昌黎之诗，原本汉赋”³。方东树进一步举出具体例证，认为“《南山》盖以《京都赋》体而移之于诗也”。⁴于是有人把韩愈“以文为诗”解释为以赋为诗。

近有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佛经“长行”“偈颂”暗示之说，如陈寅恪《论韩愈》云：“佛经大抵兼备‘长行’，即散文及偈颂，即诗歌两种体

¹ 见魏泰《临汉隐居诗话》、惠洪《冷斋夜话》卷二《馆中夜谈韩退之诗》等

² 《后山诗话》。

³ 《归愚文钞》卷九《与陈耻庵书》。

⁴ 《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

裁。……‘长行’乃以诗为文，而偈颂亦可视为以文为诗也。天竺偈颂音缀之多少，声调之高下，皆有一定规律，唯独不必叶韵。六朝初期四声尚未发明，与罗什共译佛经诸僧徒虽为当时才学绝伦之人，而改竺为华，以文为诗，实未能成功。……退之虽不译经偈，而独运其天才，以文为诗，若持较华译佛偈，则退之之诗词旨声韵无不谐当，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不仅空前，恐亦绝后，决非效颦之辈所能企及者矣。¹饶宗颐《和韩昌黎南山诗·引言》云：“余读北凉县无谿译马鸣菩萨之佛所行赞。其破魔品第十三……凡用‘或’三十二字，始恍然于昌黎乃脱胎于此。昌黎辟佛，于释迦之行迹必所留意，此赞译自北凉，为一五言长篇，昌黎当曾寓目，无意中受其影响，取其法以撰《南山诗》，遂开诗界旷古未有之新面目。以辟佛之人，而取资于佛，亦云异矣！陈寅恪《论韩愈》，曾谓退之以文为诗，颇受释氏‘长行’之改诗为文，与‘偈颂’之以文为诗之暗示，于兹惟未见及。”²

又有“以文为诗”导源于杜甫之说。胡光炜《杜甫〈北征〉小笺》云：“杜甫兹篇，则结合时事，加入议论，撤去旧来藩篱，通诗与散文而一之，波澜壮阔，前所未见，……后来诗人如元和中韩退之，如宋代庆历以来‘宋诗’作者之欧、王诸家以至‘江西诗派’，到近世如所谓‘同光体’，其特征大要皆以散文入诗，其风气几无不导源于杜，亦可云自《北征》一篇开端。”³

以上诸说，可以互补。韩愈用古文之章法、笔法作诗，以议论入诗，例证很多，略举一二如下：（1）《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方东树评：“一篇古文章法。”（2）《山石》方东树评：“只是一篇游记，而叙写简妙，犹是古文手笔。”（3）《谢自然诗》顾嗣立评：“此篇全以议论作诗。”

¹ 《金明馆丛稿初编》。

² 《选堂诗词集·选堂诗存》。

³ 《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

（二）白居易《新乐府》“愿得天子知”

“安史之乱”虽平定，继之而来的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边防空虚，时有外敌入侵。战祸不停，赋役繁重。加上土地兼并激烈，农村两极分化，官僚地主的享乐生活与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这是中唐新乐府运动所以兴起的社会根源。但仅仅是这样的认识，还嫌不够，还不能回答：为什么新乐府运动不迟不早、恰恰兴起于号称“中兴”¹的元和初年呢？

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唐宪宗比他的先帝们有振作朝廷的意愿，多少能够听朝臣们的谏诤，也多少改革一些前朝的恶政，所用宰相也还得人，因此朝廷在政治上呈现唐中期未曾有过的气象，在军事上也就获得未曾有过的胜利。……”我进一步提出，在裴垪领导下，从贞元末至元和初，逐步组成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政治集团。

《旧唐书·裴垪传》中说：“（裴垪）作相之后，恳请旌别淑慝，杜绝蹊径，齐整法度，考课吏理，皆蒙（宪宗）垂意听纳。”封建史书对裴垪相业的评价，或不免有溢美之词，但元和初年唐朝由中衰暂时转向“中兴”，确是与裴垪集团的努力分不开的。

裴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有才能的、力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年轻官员。其中有李绹、崔群、韦贯之、裴度，还有元稹和白居易等。他们的共同点是：敢于批评朝政，主张改革时弊。作为诗人的元、白，还另有特色，就是：他俩

¹ 《旧唐书·宪宗纪下》。

除了与他人一样陈述政见之外，还以文学配合政治，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兴起了新乐府运动。

唐朝的文人，中进士或明经以后，还要经过吏部考试“身、言、书、判”合格，才能进入仕途。元、白都受裴垪赏识，同登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稹曾在悼念裴垪的《感梦》诗中说：“唯我与白生，感遇同所以。官学不同时，生小异乡里。拔我尘土中，使我名字美。美名何足多，深分从此始。”元和元年（806），元、白又同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考试前，他俩同在长安华阳观进行准备，“揣摩当代之事”¹，“指病危言”²就是遵照裴垪对他俩的指示。

此后，元、白一直受到裴垪的提拔。《旧唐书·白居易传》说：“自雋校（指贞元十九年为秘书省校书郎）至结绶畿甸（指元和元年为盩厔县尉），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而往往流闻禁中。”白居易也曾写过一首《梦裴相公》诗，与元稹的《感梦》诗异口同声，感激裴垪对他俩的知遇。这种交谊，仅仅是私人的感恩戴德吗？不，元、白与裴垪，抱有挽救危亡的共同的政理想。

白居易曾高度评价裴垪的功业。元和三年（808）九月，裴垪为宰相，白居易为宪宗所撰的《除裴垪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制》中说：“在太宗时，实有房、杜，赞贞观之业。在玄宗时，则有姚、宋，辅开元之化。”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是唐朝著名的四个宰相。白居易期望裴垪继之而起，“罔俾房、宋专美于前”。他把“中兴”唐朝的希望寄托在裴垪身上。

¹ 白居易《策林序》。

² 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自注。

在裴垪的领导支持下，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对皇帝进行了勇敢的谏诤，向权幸进行了猛烈的战斗。

元和三年，应制举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的对策，忤犯了权幸裴均、李吉甫等，考策官韦贯之等被贬为外官，覆策官裴垪被免内职。白居易上《论制科人状》，力言裴垪、韦贯之等“皆公忠正直”，不当黜责。

四年，宪宗因久旱，欲颁“德音”。李绛、白居易奏请：降系囚，蠲租税，放宫女，绝进奉，禁止掠卖良人等，宪宗采纳两人意见。

白居易曾多次在谏诤中指责皇帝：“陛下明降制旨，又自弃之，何以制驭四方？何以取信天下？”¹“陛下宁忍徇下之情而隳法制？”²。

五年，元稹勇于弹劾，不避权势，遭到打击，自监察御史贬江陵府士曹参军，李绛、崔群均言元稹不当贬，白居易累疏切谏，《论元稹第三状》中大声疾呼：“今中官有罪，未见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

在一次谏诤中，白居易甚至还当众指摘宪宗：“陛下错！”使宪宗不能忍受。

从上面的一系列事实可以看出，元和初年白居易对皇帝的谏诤，对权幸的战斗，是与裴垪集团其他成员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的，元稹也是这样³。裴垪“好直”，一贯奖励官员行直道，他对无所“献纳”的严休复，进行过严肃的批评。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元、白才有可能勇气百倍地对皇帝进行谏

¹ 《论裴均进奉银器状》。

² 《论承璀职名状》。

³ 参阅拙著《元稹年谱》。

诤，对权幸进行战斗。元稹虽因此贬谪，也毫不畏缩，宣称“谏死是男儿”。¹而裴垪死后，元稹就变节了，承认“自从裴公无，吾道甘已矣”。他还叹息：“白生道亦孤，谗谤销骨髓。司马九江城，无人一言理。”（《感梦》）所谓“道”，指直道，即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白居易的表现怎样呢？裴垪死后，白居易写过“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悠悠身与世，从此两相弃”的诗句。诗的题目是《适意二首》，实际上内心是一片苦闷。他与元稹不同的是，他不愿“诡遇”而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裴垪的存亡，影响元、白的政治态度如此深巨，从而反映出元和初年元、白敢于对皇帝谏诤，对权幸战斗，是与裴垪的支持分不开的。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皇帝初即位，宰相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皇帝”指宪宗，“宰相”指裴垪。“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诗，指讽喻诗。因“难于指言”而创作讽喻诗，可见讽喻诗是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白居易依靠谁将讽喻诗“闻于上”呢？当然是这位“正人”宰相了。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裴垪是白居易元和初年大量创作讽喻诗，兴起新乐府运动的政治上的支持者。

将白居易的《新乐府》与他元和初年的“启奏”、《策林》相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精神是相同的，例如：

《新乐府》	“启奏”、《策林》
《上阳白发人》小序：“愍怨旷也。”	《请拣放后宫内人》奏
《两朱阁》小序：“刺佛寺寢多也。”	《策林》六十七《议释教》自注：

¹ 《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并序》。

	“僧尼。”
《盐商妇》小序：“恶幸人也。”	《策林》二十三《议盐法之弊》自注：“论盐商之幸。”
《鹑九剑》小序：“思决壅也。”	《策林》三十七《决壅蔽》
《采诗官》	《策林》六十九《采诗》

白居易《寄唐生》诗中说他作“乐府诗”是：“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既然“启奏”、为制科考试作准备的《策林》、“愿得天子知”的《新乐府》，都是白居易向皇帝陈述政见之作，写作时间又相近，其精神当然是相同的。这是白居易创作《新乐府》的具体情况。

表现在对诗歌的功能的理解上：白居易把讽喻诗当作变相的谏草，另一种形式的“启奏”，所以他明确提出《新乐府》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就是说：以诗歌反映社会现实，以诗歌推动政治改革，不尚文彩。他标举“六义”，继承《诗经》传统，批判“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的唯美主义诗歌，提出“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所以白居易创作的《新乐府》，明白如话，老妪都解。

总之，白居易把讽喻诗当作谏诤的手段之一。离开这个特点去分析白居易《新乐府》和新乐府运动，是隔靴搔痒的。

（三）王建受张籍影响作乐府

王建与张籍，不但诗歌齐名，而且友谊亲密。当我们评价“张王乐府”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也要涉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譬如说，王建是河南颍川人，张

籍原籍吴郡、寓居和州乌江县，他们是怎样认识，以至于成为好友的呢？这与他们的诗歌创作，又有什么联系呢？考如下：

王建虽是颍川人，但从少年时就离开了故乡。他在《送韦处士老舅》诗中说：“自从出关辅，三十年作客。风雨一飘飏，亲情多阻隔。”可以为证。

王建诗中常常提到“漳岸”。张籍的《酬秘书王丞见寄》诗也说：“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他们都念念不忘于漳河，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再看张籍的《逢王建有赠》诗：“年状皆齐初有髭，鹄山漳水每追随。使君座下朝听易，处士庭中夜会诗。新作句成相借问，闲求义尽共寻思。经今三十余年事，却说还同昨日时。”这首诗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如：

(1) 从“年状皆齐”，看出王、张大约同岁。(2) 既称“初有髭”，可能是在 50 岁左右，上推“三十余年”，当于 20 岁左右就相识。(3) 因在一块求学，并有共同的志趣——做诗而相识。(4) 相识于既是“漳水”经流又是“鹄山”所在之地。考《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六《河北道·魏州·魏县》云：“旧漳河在县西北十里。”“新漳河在县西北三十里。”同卷《魏州·朝城县》云：“扁鹊墓在县罗城西北隅。”可见，魏州是王建与张籍最初相识的地方。

关于王、张同在魏州，还可举出其他资料证明。魏州是唐代魏博节度使的驻节之地。兴元元年至贞元十二年，田绪为节度使（张籍诗中所说的“使君”，即田绪）；……元和七年至十五年，田弘正（原名兴）为节度使。王建集中有《田侍中宴席》、《朝天词十首寄上魏博田侍中》、《田侍中归镇八首》等诗；张籍集中也有《田司空入朝》之作；都是写给田弘正的。从王、张与田的交往中，又可以看出他们曾经同在魏州。因为，据《旧唐书·田弘正

传》云：“少习儒书。”当贞元初，王、张在魏州求学时，田弘正也正在读书，所以才有机会相识。

或许有人要问，王、张为什么要到边远的魏州去求学呢？今案：王建“出关辅”后，就住在魏州。其《山中寄及第故人》云：“十年居此溪。”此“溪”就是漳溪。张籍的岳父名叫胡珣，据韩愈《唐故中散大夫少府监胡良公墓神道碑》说，他是贝州宗城县人（贝州是魏博节度使所辖六州之一）。魏州，既是建的第二故乡，也靠近张籍岳父的家乡，他们在这儿求学是一点不奇怪的。

我把王、张这段友谊史介绍给大家，是因为这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王、张诗歌的精华部分是乐府，这些作品写于何时呢？从白居易《读张籍古乐府》诗“张君何为者？业文三十春，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始从青衿岁，迨此白发新，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贱贫”等句看出，张籍在20岁左右，就开始从事于乐府的创作了。

在张籍的影响下，王建也写乐府。他在《送张籍归江东》诗中，说得很清楚：“清泉浣尘缁，灵药释昏狂，君诗发大雅，正气回我肠。……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傍，出处两相因，如彼衣与裳。”读此可见他们在魏州求学时，对于做诗的志同道合，切磋琢磨的情况。

张籍、王建创作乐府诗，在李绅、元、白之前。何世璵《然灯纪闻》说：“元、白、张、王诸作，不袭前人乐府之貌而能得其神者，乃真乐府也。”这是说他们属于一个流派。张戒《岁寒堂诗话》说：“张司业诗，与元、白一律，专以道得人心事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张思深而语精，元体轻而词躁

尔。”刘熙载《艺概》说：“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张、王二人，虽然齐名，也各有特色。王世贞《艺苑卮言》说：“乐府之所贵者，事与情而已。张籍善言情，王建善征事。”前人这些评论，可供我们参考。

总的来说，张、王乐府诗的成就不如元、白。张、王乐府诗，篇幅比元、白要短，描写不如白居易细腻。张、王擅长以简练的语言对社会现象进行概括，往往以一两句话对黑暗现实作出尖锐的讽刺。当时，张、王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名声，都比元、白低，张、王诗歌所起的影响比元、白小，但张、王各以创作支持新乐府运动，增大了运动的声势。

在韩孟诗派、元白诗派之外，柳宗元、刘禹锡也是中唐诗坛的大家。韩愈与柳宗元合称“韩柳”，刘禹锡与白居易合称“刘白”。柳宗元以山水诗最有成就，刘禹锡以《竹枝词》最有影响。下面略为介绍：

（四）柳宗元山水诗与山水记并传

柳宗元的山水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突出地位，柳宗元的山水诗怎样呢？先看前人对柳山水诗的总评，如：汪森《韩柳诗选》云：“柳州于山水文字最有会心。”这是说，柳宗元不仅精心创作山水记，也精心创作山水诗。又云：“柳工于记，而其诗之绝胜者，亦在山水登临之际。”这是说，柳宗元的山水诗是他诗歌创作中之“绝胜者”，与柳宗元的山水记是他文章创作中之“绝胜者”一样。高步瀛《唐宋诗举要》云：“（柳宗元愚溪）诸诗皆神情高远，词旨幽隽，可与永州山水诸记并传。”这是说，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山水记有同样的艺术价值。

再看前人对柳在永州、柳州所作山水诗的具体评论，如：

乔亿《剑溪说诗》：“永、柳山水孤峻，与永嘉、陇蜀各别，故子厚诗文，不必谢之森秀，杜之险壮，但寓目辄书，自然独造。”

方东树《昭昧詹言》：“游山诗，永嘉山水主灵秀，谢康乐称之；蜀中山水主险隘，杜工部称之；永州山水主幽峭，柳仪曹称之。略一转移，失却山水真面。”

杨庶堪《论诗绝句》：“剑割愁肠海上峰，始知愁苦易为工。柳州山水堪供老，万里投荒别泪红。”

以上是说：永、柳二州的山水，与永嘉、陇蜀的山水，状貌不同；柳宗元在永、柳二州所作的山水诗，与谢灵运、杜甫在永嘉、陇蜀所作的山水诗，风格不同。

再举柳宗元在柳州所写的几首诗来谈：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惊风乱飏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吴闿生评：“二句近景。”又“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吴闿生评：“二句远景。”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宋长白《柳亭诗话》评：“闽粤之间，其树榕，有大叶、细叶二种，纷披轮囷，细枝着地，遇水即生，亦异品也。前人取为诗料，始于柳子厚‘榕叶满庭莺乱啼’。”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苏轼《东坡题跋》评：“仆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铓。诵柳子厚诗，知海山多尔耶。”

可见，柳宗元描写柳州近景、远景、榕树、山峰等，皆绝妙。堪称为柳州的山水与柳宗元的“愁肠”之结晶。

柳宗元的山水诗把中国南方的奇山丽水写活了。前人用“如画”来赞美它。如：

何焯《义门读书记》评《法华寺西亭夜饮》“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三、四工在次第如画。”

汪森《韩柳诗选》评《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诗便是逐笔皴染而出。”又评《田家三首》“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画出村落光景。”

陆时雍《唐诗镜》评《与崔策登西山》：“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语堪入画。”又评《田家三首》“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一起四语如绘。”

《唐诗选脉会通》引周敬评《夏昼偶作》：“好一幅山居夏景图。”

黄周星《唐诗快》评《江雪》：“只为此二十字，至今遂图绘不休，将来竟与天地相终始矣。”黄生《唐诗摘钞》云：“此等作真是诗中有画，不必更作寒江独钓图也。”

以上所引前人称赞柳宗元山水诗“次第如画”，“语堪入画”，“诗中有画”，以及被画家“图绘不休”等等，都是说明它的艺术魅力。阐述柳宗元的山水诗，可以丰富中国美学史的内容。

柳宗元的山水诗，不仅形象逼真，而且情景交融，把我国古代山水文学推向高峰。有人认为“如画”还不足以反映柳宗元山水诗、山水记的艺术成就，应该说是胜于画。如陆葢《问花楼诗话》云：“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然亦有画手所不能到者。先广文尝言：……柳子厚《溪居》诗：‘晓耕

翻露草，夜榜响溪石。’《田家》诗：‘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此岂画手所能到耶？”

前人对柳宗元山水诗之“制题”，有很高评价，如曾习经论诗绝句《壬子八九月间所读书题词十五首》，其中《谢康乐集》云：“后人率尔谈康乐，且向前贤学制题。”自注：“康乐诗，……至其制题，正复妙绝今古。……柳州五言，刻意陶、谢，兼学康乐制题，如《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等题，皆极用意。惜此旨自柳州至今，无闻焉尔。”这是说柳宗诗制题，继承谢灵运之妙。陈衍《石遗室诗话》转载曾习经这一段话，可见他赞成曾习经的观点。今案：柳诗题《登蒲州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与谢诗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确实一脉相承。

前人评注柳宗元山水诗，有疏漏之处。如：柳宗元《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江流曲似九回肠”句，古人如孙汝听，近人如高步瀛，皆注：司马迁《与任安书》：“肠一日而九回。”¹ 1993年8月12日，我游柳州市，登上鱼峰山，俯瞰柳州市全景。当我看到柳江宛如一条玉带，环绕柳州市区时，对柳宗元“江流曲似九回肠”的诗句，加深了理解。前人只说这句诗是运用司马迁“肠一日而九回”的典故，未免简单了。这是柳宗元把写景与写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写下的名句。又如柳宗元称柳州为“山城”²，当我看到山峰挺

¹ 见《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唐柳先生文集》卷四十二、《唐宋诗举要》卷五。

²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起，高耸城隅，林密洞深，好像一座“天然大盆景”时，真切感到柳宗元以“山城”喻柳州之确切，前人诗话中未注意及此。

（五）刘禹锡《竹枝词》的贡献及影响

刘禹锡《竹枝词》作于何时？何地？《新唐书·刘禹锡传》、《乐府诗集》卷八十一说在朗州作，黄常明《诗话》说在连州作¹，均误。今案：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引云：“岁正月，余未建平”，应是长庆二年（822）初到夔州时作。

唐代有几位诗人写过《竹枝词》，而以刘禹锡声誉最高，影响最大。人们公认刘禹锡是《竹枝词》之祖，他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文人诗与民歌相结合的新道路。清王士禛《带经堂诗话》卷二十九指出：“《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入，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这是说，《竹枝词》的题材比绝句广阔，特别是泛咏风土这一点，使它获得了浓厚的地方色彩。从艺术技巧看，《竹枝词》不仅大量使用比兴与谐声双关、重叠回环等民歌常用的艺术手法，而且还把民歌特有的那种清新刚健的语言和悠扬宛转的音节吸入诗中，从而使它达到了所谓“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词意高妙”，“奔轶绝尘”²的境界。刘禹锡的《竹枝词》不仅在民间受到欢迎，而且后世文人也十分喜爱。

刘的《竹枝词》在宋代受到苏轼、黄庭坚等的高度评价，黄庭坚还手书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宋至清《竹枝词》的发展、演变。苏轼所作《竹枝

¹ 《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四。

² 《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刘梦得〈竹枝歌〉》。

词》九首，是竹枝词咏史之始。杨万里所作《过白沙竹枝歌》六首、《过显济庙前石矶竹枝词》二首、《峡山寺竹枝词》五首，是竹枝词加题头之始。

元汪士熙作《竹枝词》六首，袁桷、虞集、马祖常、胡奎、许有壬等有和作。元末杨维桢作《西湖竹枝词》九首，“一时和者数百家”。编为《西湖竹枝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竹枝词》创作活动，作者队伍扩大到“妇人女子”。《西湖竹枝集》风行海内，有“徐兴公选本”、“钱牧斋选本”，还有“徐野君续本”¹。

明邝璠著《便民图纂》，书前有“务农之图”15幅，“女红之图”16幅，每幅题《竹枝词》一首，共31首，“用劝于民”，使泛咏风土的竹枝词成为对农民进行耕织技术教育的农桑课本。在竹枝词中别具一格。

清尤侗写《外国竹枝词》100首，是竹枝词咏外国之始。附“土谣”10首，是竹枝词咏少数民族之始。尤侗只据典籍，并未亲历其地，其中不免有失实之处。自他开了风气，其后作者日多，且皆亲见亲闻，在竹枝词中形成一个系列。

明、清两代的竹枝词，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泛咏一州一县的历史、地理、风俗、人物以至方言、俚语，像万花筒。其中规模浩大者，如：清《海陵竹枝词》800首，尚非出于一人之手。秦荣光一人作《上海县竹枝词》706首，经其弟子删存为532首，可谓空前绝后。另一类为专咏一事，像特写镜头。如叶燮《吴江大水竹枝词》4首，专咏康熙九年（1670）吴江大水灾民之苦。高士奇《灯市竹枝词》6首，专咏康熙时京师灯市盛况。孔尚任《清明红

¹ 据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十《元诗·西湖竹枝》。

桥竹枝词》20首，专咏康熙二十七年（1688）扬州红桥修禊风光及民间习俗。康熙三十二年（1693）孔尚任、袁启旭、蒋景祁等在陈子健家集会，各作《燕九竹枝词》10首，专咏正月十九日北京白云观庙会情况。道光时，卢先轺作《红楼梦竹枝词》100首，专评书中人物。王士恒作《河工竹枝词》10首、《河工后竹枝词》10首、《后河工竹枝词》10首、《新春河工竹枝词》9首，反映了清代黄河缺口、官吏腐败、工程敷衍、民伋艰苦的实际情况。罗暉《壬寅夏纪事竹枝词》16首、对鸦片战争时期清廷沿海大吏，一一评论忠奸。清末还出现《新婚竹枝词》24首，细致描绘了结婚礼仪及夫妇情态，李伯元录入《南亭四话》。余不多举。

这里试对刘禹锡倡导《竹枝词》以来1000多年的发展史，作初步的小结。

（1）作者队伍 有男，有女。有著名的诗人，也有普通的文士。竹枝词的魅力，能使皇帝技痒，爱新觉罗·弘历写了《荔枝效竹枝词》三首。

（2）诗歌内容 咏汉族，也咏少数民族。咏国内，也咏国外。有像万花筒（泛咏一州一县），也有像特定镜头（专咏一事）。有欢乐（青年男女的爱情），也有愁苦（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

（3）表现形式 有诗无注释，有诗加注释。从以诗为主逐渐演变为以注为主，注文是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4）艺术水平 有高，有低。艺术水平不高而资料丰富的竹枝词，从民俗学的角度看，还是有价值的。

（5）社会功能 有美，有刺。清嘉庆时得硕亭《京都竹枝词》序云：“竹枝之作，所以纪风土，讽时尚也。”在他之前，虽已有讽刺性的竹枝词，他才明确提出了竹枝词应有讽时尚的作用。清朝统治日益腐败，讽刺性的《竹枝词》也就增多了。

(6) 诗与唱的关系 刘禹锡的《竹枝词》原是为夔州民歌谱写的新词，有音乐伴奏，歌者边唱边舞。宋人所作，也还能唱。黄庭坚《竹枝词二首》跋云：“予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因作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一家皆弟兄。’”任半塘先生在《唐声诗》中对此作了解释：“黄氏所谓‘和’，既用七言四句之后二句，与唐、五代竹枝之和声，仅用二言短语，散系于各句句中或句尾者，显然不同，应是竹枝唱法至宋之变。”后来，《竹枝词》脱离了音乐，不是为《竹枝》谱写歌词，而是用民歌体来写诗了。王夫之《竹枝词十首》序云：“杨廉夫唱竹枝于湖上，和者麇集。以初体求之，非竹枝也。”“初体”指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其实不止杨维桢《西湖竹枝集》如此，已是普遍现象了。

总之，经过 1000 多年的时间考验，证明《竹枝词》是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样式，也是民俗学的一座资料库。它既有欣赏价值，又有认识价值。刘禹锡倡导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其社会效果不是唐代任何一位诗人的作品所能比拟的。

明、清时期的一些诗人还在刘禹锡学习民歌曲调写《竹枝词》的启发下，开始重视学习其他民间歌谣，并把它吸取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如徐渭的《边词廿六首》之三：“墙头赤枣杵儿斑，打枣竿长二十拳。塞北红裙争打枣，江南白苎怯穿莲。”“打枣竿”是明代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曲调。王骥德《曲律》云：“小曲《挂枝儿》即《打枣竿》，是北人长技，南人每不能及。”徐渭是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把流行于北方的民歌《打枣竿》引入诗，说明他“客燕时”注意学习了这种曲调。《边词》中的内容与声情，与《打枣竿》是

相接近的。明、清诗人的这种努力，与刘禹锡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所以，清黄生说刘禹锡《竹枝词》“诚可为后来山歌、挂枝、打枣先鞭”¹。

中唐诗人身世

刘禹锡之氏族

刘禹锡在《子刘子自传》中自称是西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据《汉书·景十三王传》记载，汉景帝于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封刘胜为中山王，子孙嗣封者五世，至怀王薨，因无后，绝四十五年。东汉末年刘备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已没有多少人相信。元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六十《汉纪》时，对此就已指出：“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即对刘备是否中山靖王刘胜之后的问题提出了疑问。

唐代门第观念较重，以士族为荣。刘禹锡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要想抬高自己的门第，最合适的方法是找历史上的一位帝王作始祖，遂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像这样情况，何止刘禹锡一家，是不足为怪的。

况且刘禹锡自己也有说法不一致的地方，自相矛盾，如他在《口兵戒》中说，“它日读远祖中垒校尉书曰：‘口者，兵也。’……繇是知吾祖之言为急”。根据《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的记载：“成帝……以向为中垒校尉。”后世习惯称刘向为“中垒”。唐代独孤及《送李宾客荆南迎亲》诗云：“宗室刘中垒”。²刘禹锡所说的“远祖中垒校尉”应指刘向。他在《蒙恩转仪曹郎，依前充集贤学士，举韩湖州自代，因寄七言》中又说：“通籍由来在石

¹ 《唐诗摘钞》卷四。

² 《毗陵集》卷二。

渠。”“石渠”指刘向讲论《五经》于石渠阁¹，这是用刘向事自比。刘向是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之后，其传即附见于《汉书·楚元王传》。那么，刘禹锡究竟是楚元王刘交之后，还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实际上，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都是靠不住的。考证刘禹锡的氏族问题，还得从他《自传》中所说的“七代祖亮”这条线索入手。

刘禹锡自言之“七代祖亮”，与《周书》卷十七《刘亮传》、《北史》卷六十五《刘亮传》之刘亮不是一人。其理由是：

(1) 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说：“七代祖亮，事北朝为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遇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据《魏书》记载，“迁都洛阳”是北魏高祖孝文帝元宏太和十九年的事。因此，刘禹锡的“七代祖亮”，应是北魏刘亮。

而《周书·刘亮传》说：“魏孝武西迁，以迎驾功，除使持节、右光禄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所谓“魏孝武西迁”，指北魏孝武帝元脩与高欢关系恶化，逃往关中，投奔宇文泰。因此，《周书》、《北史》之刘亮，应是西魏刘亮。

(2) 《子刘子自传》中所说的“七代祖亮”的官职，与《周书·刘亮传》、《北史·刘亮传》中所记载的官职，全不相同。自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以后，“冀州”在东魏境内。曾任“冀州刺史”的刘禹锡的“七代祖亮”，不可能是《周书》、《北史》中的西魏刘亮。

¹ 《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

(3) 《周书·刘亮传》说：大统十年，“出为东雍州刺史。为政清静，百姓安之。在职三岁，卒于州，时年四十。”从西魏大统十二年、年四十逆推，西魏刘亮应生于北魏正始四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是北魏太和十九年的事，即在西魏刘亮出生前十二年。由此可见，《周书》、《北史》之西魏刘亮，与“遇迁都洛阳”的刘禹锡的“七代祖亮”，不是一人。

(4) 北魏刘亮的子孙，居东魏、北齐，当时称“山东”。西魏刘亮的子孙，居北周，当时称“关中”。刘禹锡《谒枉山会禅师》诗中自言“我本山东人”；《苏州上后谢宰相状》中说：“某山东一书生”。可见，刘禹锡应是北魏刘亮的后裔，与西魏刘亮无关系。

综上所述，刘禹锡的七代祖刘亮，史书无传。《周书》和《北史》有刘亮传，但历官、行事等与刘禹锡所说的刘亮明显不合，时间约晚半个世纪。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把刘禹锡看作西魏、北周刘亮之七代孙，是个误解，我重新考证。

匈奴族原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匈奴与中原发生关系，可上溯到公元前三、四世纪。秦始皇统一六国（公元前 221）以后，匈奴与中原的接触较为频繁。西汉初期，匈奴族在冒顿单于（公元前 209 至前 174）的统领下，势力空前强大，给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以很大威胁。汉初，由于国力较弱，难以抵抗匈奴的侵扰，只得采取和亲的政策。据《晋书·刘元海载记》载，“初，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其子孙遂冒姓刘氏。”这是冒顿后裔冒姓刘氏的起因。

汉代内迁的匈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较大变化。除南匈奴外，这时分化出一支名为“屠各”的匈奴部落，十分活跃。公元 4 世纪时，这两部分匈奴人联合行动，在部落酋长刘渊统率之下，以聚居于汾河流域的匈奴人为主，成为一支反晋的主力军。《晋书·刘元海载记》说：“刘元海，新兴匈奴人，冒

顿之后也。名（渊）犯（唐）高祖庙讳，故称其字焉。”当时，匈奴“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晋阳汾涧之滨”。在发动进攻前，元海对部下曰：“今见众十余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氏。……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因此，匈奴族屠各部落头领刘渊以冒顿之后的名义，冒充西汉皇室刘氏的后代，不仅于304年由大单于改称汉王，而且于308年改称皇帝，建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北），国号汉。从此以后，匈奴刘氏冒充西汉皇室刘氏之后的谱系，就一直沿袭下来。

根据刘禹锡所云“七代祖亮”，“遇迁都洛阳”的史实，有以下三条资料值得注意：

（1）《魏书》卷七下《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六月“丙辰，诏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于是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北魏建国于公元386年正月，初称代国，至同年四月始改国号为魏。北魏由鲜卑族拓跋氏建立，拓跋宏迁都洛阳，改姓元。

（2）《周书》卷四《明帝纪》记载，二年三月“庚申，诏曰：‘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这是说，到周明帝宇文毓时，仍下诏书重申当初随魏氏南徙的各族民众皆称河南人民。

（3）《隋书》卷三十三《经籍志二》指出：“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

这三条资料很重要，提供了鉴别北朝胡姓的一个线索，因为无论是北胡匈奴族还是东胡鲜卑族都有一个逐步南徙的问题。刘禹锡的“七代祖亮”，“遇

迁都洛阳，为北部都昌里人”，“坟墓在洛阳北山”，与《魏书·高祖纪下》、《周书·明帝纪》、《隋书·经籍志二》的记载相合，证明他是随拓跋氏南迁的胡姓刘氏之后。当时与刘禹锡“七代祖亮”一同加入洛阳籍的匈奴刘氏，从史书的记载来看，还有一些人。例如：

唐昭宗时的宰相刘崇望的祖先。据《新唐书》卷七十一上《宰相世系表一上·河南刘氏》记载：“河南刘氏，宰相一人”，即刘崇望。“河南刘氏本出匈奴之族。汉高祖以宗女妻冒顿，其俗贵者皆从母姓，因改为刘氏。左贤王去卑裔孙库仁，字没根，后魏南部大人、凌江将军。弟眷，生罗辰，定州刺史、永安敬公。其后又居辽东襄平，徙河南。”查《北史》卷二十《刘库仁传》：“刘库仁字没根，独孤部人，……为南部大人。”“库仁弟眷，……眷第三子罗辰……拜南部大人。”刘罗辰裔孙仁之，《魏书》卷八十一《刘仁之传》曰：“刘仁之，字山静，河南洛阳人。其先代人，徙于洛。”因此，《旧唐书》卷一七九《刘崇望传》指出：“刘崇望字希徒。其先代郡人，随元魏孝文帝徙洛阳，遂为河南人。”可见，刘崇望的祖先本系匈奴族独孤部人，也是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成为河南人的。

刘禹锡的“从叔”刘公济的祖先。《元和姓纂》卷五《十八尤·刘》记载：“河南——代为部落大人。魏有河间公提。生丰……孙感……感生孝则。孝则曾孙公济，工部尚书。”刘禹锡有《许给事见示哭工部刘尚书诗，因命同作》，“刘尚书”就是“代为部落大人”的后裔刘公济。诗开头曰：“汉室贤王后（从叔望在河间），孔门高第人。”但从诗中所描写的“护塞无南牧，驰心拱北辰”来看，也是冒充“汉室”的匈奴族后裔。

考察刘崇望、刘公济的氏族渊源及其与刘禹锡的关系，可作为刘禹锡是匈奴族后裔这一结论之旁证。肯定刘禹锡的祖先是匈奴族，与肯定元稹的祖先是

鲜卑族、白居易的祖先是龟兹族一样，其意义在于说明自晋末以来，北方民族大融合，少数民族不仅接受了汉文化，而且为汉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韩愈之生母

在韩愈的诗文中，没有说过母亲。在李翱所撰《故正义大夫行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礼部尚书韩公行状》以及皇甫湜所撰《韩文公神道碑》、《韩文公墓铭》中，也都没有提到韩愈的母亲。这是罕见的现象。

解答韩母之谜要从韩愈与韩会的血缘关系说起。韩愈自云“吾上有三兄”，长兄韩会。韩愈称韩会为“宗兄”。今案：宗兄有二义：（一）庶子对嫡子年长于己者之称，（二）指族兄、同姓兄。韩会不是韩愈的族兄、同姓兄，只能解释为韩会是年长的嫡子，韩愈是年幼的庶子。从韩会卒年四十二，韩愈时年十三来看，二人年龄相差甚大，非一母所生。一母所生之子，互称为母兄母弟。韩愈未称韩会为母兄，是二人同父异母之证。

韩愈生母，推测如下：

（1）生母改嫁。沈钦韩《韩集补注·祭郑夫人文》注：“按祭文，言父卒而不及其母，盖所出微，终丧已嫁，故鞠于兄会。”可备一说。

（2）生母即乳母。韩愈《乳母墓铭》云：“乳母李，徐州人，号正真，入韩氏，乳其儿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怜不忍弃去，视保益谨，遂老韩氏。”我据此推测，韩愈生母，在韩家地位卑微，韩愈父卒后，她不愿抛弃韩愈改嫁，只有以乳母身份留在韩家，抚养韩愈。所以韩愈对李正真的感

情，不同于一般乳母：“时节庆贺，辄率妇孙，列拜进寿。”韩愈对李正真的礼节，也不同于一般乳母：乳母卒，葬之日，“愈率妇孙视窆封，且刻其语于石纳诸墓为铭”。《五百家注昌黎文集》注曰：“葬乳母，且为之铭，自公始。”既是乳母，必定是嫁过丈夫，生过子女的，但墓铭中避而不谈。乳母对韩愈的爱，超过对自己的丈夫子女，不回家而终老于韩家，也是不合情理的。所以我推测韩愈乳母即其生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韩愈不便明言事实真相，只在《乳母墓铭》的称谓中，略有透露：韩愈不提乳母之名，而说“号”，暗示为子者讳亲之名。文中两次提到“孙”，韩愈将自己的子女，称为乳母之孙，暗示了乳母的身份。

由于韩愈生母身份卑微，自然不会在诗、文中提到她，李翱、皇甫湜等也为之隐讳。这段历史，对韩愈性格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因是庶出，如不求上进，就不能自立，所以韩愈“自知读书为文”（李汉《韩愈文集序》）。因得到兄嫂乳母的怜悯和抚育，才能长大，推己及人，韩愈“内外彘弱悉抚之”（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

其他中唐诗人之身世，不多举。

问：什么是国学？

答：中华为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昌盛，学术辉煌，文献丰富，世所罕见。学术本无国界，为何出现“国学”一词呢？中华学术，自成体系，西洋学术东渐以后，为了有别于西学，中国人对本国的传统学术，采用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名称。简言之，“国学”是中华固有的全部学术的专名和总称。

1906年9月5日《民报》第七号发表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与言爱国者也。”“未

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署名“国学讲习会发起人，”章士钊执笔。）语重心长，表达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的观点。

尊崇国学，绝不意味着自我封闭。有识之士，受西洋学术之滋润与启迪，突破清学藩篱，学术视野更为开阔，治学方法更为先进，融合了东西方优秀文化，与时俱进，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之前驱，在学术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我对国学的几点认识：

（一）不能认为国学中无自然科学。李约瑟撰写了多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证明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国学中既有人文科学，也有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农学、物候学等）。

（二）陆续发现的殷墟甲骨、敦煌文书以及古代竹木简牍、帛书等，俱为中华之瑰宝，国学研究必不可缺之内容。国学中既有传统学科，也有新兴学科（如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

（三）国学博大精深，门类繁多，其中有研究一部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文选学），有研究一类书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方志学），有研究一种文化现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避讳学），有研究一种治学方法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校勘学），有汇集多种研究对象而形成一门学问者（如金石学），有迷信与科学互相夹杂为一门学问者（如风水学），不一一列举。

（四）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文化输出国不可自骄，文化输入国不必自卑，某一国文明为别一国所吸收，这种输入品即为吸收者所拥有。”佛教本由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

泊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传入中国后,逐渐扎下了根,成为中国的宗教;与儒、道鼎立。国学中应有佛学。

问:《陋室铭》是刘禹锡作的吗?

答:1963年我就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作,主要理由如下:

(一)《刘禹锡集》中无《陋室铭》。宋初的《文苑英华》、《唐文粹》等重要选本中也无此文。

(二)《陋室铭》开头四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完全违反常识。道教称神仙居住的地方为洞天、洞府、灵山、仙山。岂有仙居于矮山,龙游于浅水之理?湖北应山有“大唐贞观四年三月勒石”的《观音寺界碑》(《应山县志》卷二十三《文物名胜五·石刻》),开头四句为“盖闻山不在高,有僧则名。寺不在大,有神则灵”,与《陋室铭》相似。从“盖闻”(即听说)可知这样的话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佛教徒可以套用,道教徒也可以套用,不过一称“僧”、一称“仙”罢了。《陋室铭》与《观音寺界碑》都套用庸俗的顺口溜,显然是一般文士所为,怎么可能是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刘禹锡的手笔?人人皆知《观音寺界碑》无文学价值,《陋室铭》何能称之为“千古名文”呢?

(三)《陋室铭》文章不长,矛盾很多。例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是一副瞧不起群众的口吻,与刘禹锡《名子说》“欲尔于人无贤愚,于事无大小,咸推以信,同施以敬,俾物从而众说,其庶几乎”的思想作风不合。又如:“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是一片幽僻荒凉景象,与刘禹锡诗文中所描写的生活环境不合。苔不多,不可能“上阶绿”;草不长,不可能“入帘青”。苔多、草长,可见人迹罕至,又与“谈笑有鸿儒”相矛盾。再如:既云“调素琴”,又云“无丝竹之乱耳”,琴不是丝类乐器吗?明显地抵

悟。既云“有仙则名”，是崇尚道教，又云“阅金经”，是崇尚佛教，而来陋室“谈笑”的是“鸿儒”，不是和尚、道士，反映出《陋室铭》的作伪者缺乏逻辑，拚凑成文，怎么能与刘禹锡的其他作品相提并论，鱼目混珠呢？

（四）《陋室铭》的结语是：“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据《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刘禹锡下笔不苟，怎么会以“九夷”比喻自己的故乡呢？

（五）《陋室铭》与刘禹锡的文格不类。刘禹锡撰铭，或四言，或七言，名式整齐。如，《唐故朝议郎守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司空奚公神道碑》铭共 44 句，《唐故福建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薛公神道碑》铭共 52 句，《许州文宣王新庙碑》铭共 40 句，《唐故朝散大夫检校尚书吏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清河县开国男赠太师崔公神道碑》铭共 78 句，《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铭共 58 句，《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铭共 74 句，《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鉴禅师第二碑》铭共 38 句，《佛衣铭》共 42 句，《袁州萍乡县杨岐山故广禅师碑》铭共 44 句，《唐故监察御史赠尚书右仆射王公神道碑》铭共 48 句，都是四言到底。《陋室铭》只 18 句，计：四言六句、五言五句、三言一句、六言二句、又五言二句、三言一句、四言一句。这样杂乱的句式，与上述整齐的句式，形成尖锐的对比，怎么会出于一人之手呢？

总之，《陋室铭》俗而不雅，不是《阳春》《白雪》，而是《下里》《巴人》。我们不能惑于《陋室铭》的流传而误认它是刘禹锡之作。

以上漫谈中唐诗坛，请大家指教。

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

刘一闻

尊敬的张本义馆长，尊敬的宋民副主席，诸位读者，诸位同行上午好。我很荣幸地受到张本义馆长的邀请，到大连图书馆来做这个学术讲座。我也感到很兴奋，因为今天来参与讲座的同道朋友很多，我们也可以借此机会会有一个交流。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碑帖之学看海派书法”。昨天我在接受大连晚报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到这么个情况，我说，之所以要讨论海派书法有两个动因，首先是因为在 2002 年上海博物馆举办了一个轰动文物界创作界的《晋唐宋元国宝展》，当时我们向故宫博物院和辽宁省博物馆借了展品，再加上上海博物馆，三家的藏品共 72 件，推出了这个起码来说是解放以来最为令人振奋的国宝级书画展览。一时参观的人想象不到的多，全国各地，甚至是海内外的到上海博物馆参观的人非常多。以至最后形成这么一个状况，就是我们书画部跟办公室系统的同事，躲都躲不及，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来找，真可说是盛况空前。不晓得在座是否有到上海看过这么一个令人难忘的、对我们每一个喜好中国书画艺术的人来说确是非常难得的展览。那次我和陈燮君馆长共同有过一个讲座，上半场讲座是陈馆长把我们这个国宝展的大致情况，从宏观上做了一个介绍，下半场由我来讲海派书法。因为海派书法本身发源于上海，晚近书法当然以海派书法做为不可或缺的主题，因此，尽管国宝展上没有海派书画，但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却有一个必然联系。此外，人们对于海派艺术的热情近年来可谓与日俱增。

这便是我来这里作同一个内容讲座的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和宋民副主席谈到 2007 年 1 月 7 日，上海书法家协会要组织海派书法进京展览。从广义上讲，这个上海派的定义，除了当今活跃于书坛的上海书法家外，当然还包括了我们的前辈及其创作。书法作品之外，我们还编印了十大册如吴昌硕、沈尹默、来楚生、弘一法师、白蕉、潘伯鹰等书家的作品集，打算明年初到北京的时候一块拿去。昨天记者问起我，今天到大连来举办这么一个讲座，是否有一点造势的意思。我说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让大家都来了解海派书法。海派书法是传统书法其中的一个类别，是晚近时期的一个重要部分。当时在上海开讲海派书法之后，反映良好，这个讲座成文后曾陆续刊登在几个专业刊物上。

也许从题目上，大家已能了解到，我有这么一个观点，那就是海派书法的形成跟帖学和碑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海派书法的最后形成，是由于帖学的创作风格和碑学的创造风格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海派书法。

对于帖学书法，我想在座的爱好者多少都会有点了解。帖学书法的形成很早。平时我们写字的时候要写帖，这个字帖自然包括了帖学的内容和碑学的内容。帖学是指以“二王”书法体系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这么一个比较秀美，比较典雅，比较婉约的艺术风格。从宋代有拓本开始，一路上沿续发展到现在，所以我们从中国书法史上来评价它，帖学书法应是最重要的、历时最长、范围最大的一项内容。帖学可以分成两层意思，一个意思就是以帖学样式作为书法创作的形态依据，即刚才我说过的以秀美典雅为基本风貌的创作类别。在帖学书法的表现领域，历代都有传承。如宋代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宋四家”，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吴门书派”及以董其昌为首的“云间派”，和清代前期的“翁、刘、梁、王”

等，都是这个领域的典型人物。此外，帖学同时还指它是一门研究和考订法帖渊源、版本优劣和字迹真伪的盛行于清代的一门学问，在此我不作展开。两年以前，上海博物馆曾经办过一个名叫“《淳化阁帖》最善本展览”，这个展览在海内外同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初我们花了 450 万美金，在海外买回了不全本《淳化阁帖》。这部拓本原本应该是十本的，是北宋的拓本，因为历时太长了，所以我们买到的只有四本。所幸的是其中三册跟“二王”书法有关。当时在上海开展览的时候声势很大，我们在举办研讨会的时候，请了海内外很多专家，当中有很多研究帖学的专家，研究拓本的专家。对这部用这么多钱买的《淳化阁帖》，进行研究，进行讨论，进行鉴定，可见帖学研究也是很复杂的一件事，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

所谓碑学，其实也包括两个内容，一个是指碑学书法那种比较雄浑、比较峻健和比较豪放的书写风格，待会儿我会用图片说明。它和帖学一样，也有一个特定内容，就是碑学本身的专项研究。碑学研究最初起于清代中期，与当时兴起的“乾嘉学派”有关。“乾嘉学派”即汉学，是一门以汉儒经学为宗，从校订经书解释经义扩大到考究历史、地理、音律典章、史料整理并涉及文字学的一门专学。当时出土文字较多，好多研究者本身就是书画家，他们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这些文字是以前所没见到的另外一类，这类文字主要是从遗存的碑版和器物当中所发现的隶书和篆书。清代中期以前，虽然也有篆书和隶书流传，但并不广泛，并且也没有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出土增多和“乾嘉学派”推波助澜，考据学日益盛行起来，好多研究专家发现

另一种文字之美，所以慢慢地形成了包括摩崖书和甲骨文在内的完整碑版研究体系。随着借鉴手法的广泛运用，碑学书法应运而生。

刚才我说过，海派书法的出现，是跟帖学书法和碑学书法紧密相关的。帖学书法因为起源早，我今天的图版仅截取清代这个历史时段来作为一个作品介绍。清代前期，帖学书法影响依然是很大的，虽然在清代前期和明代末期，以张瑞图、王铎、黄道周、倪元璐和傅山这五家为代表的奇崛书派，在当时的书界以及整个社会，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帖学书法诞生的时间及形成的过程，和被人们所接受的状况，无论从哪个方面讲，其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的一些书法表现。所以尽管在明代后期和清代早期已经出现了刚才我说的以张瑞图、黄道周和王铎等为代表的以奇崛书风为特点的强劲书法流派，但是到了清代前期，帖学书法仍然以其固有的影响，顽固地占据着当时的书坛。让我们来看看清代前期的帖学书法。对于清代前期的帖学书法我们有一个比较习惯或者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就是前面涉及的以“翁、刘、梁、王”为代表的所谓“帖学四家”，也有另外的说法是“帖学六家”。翁方纲这种字体，大家是比较熟悉的，尤其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书法爱好者，因为这种书写风格，在以前的书写当中，是常常可以看到的典型帖学一体。怎么来解释他呢——用笔很规范，完完全全是从“二王”的书写体系中来，横、竖、点、撇、捺、钩、挑，完全是按照固有的、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的这么一种规范的写法。平时我们学习书法或者研究书法，不外乎就是这三个项。相关书法的三个项，一个是用笔。我们最初学习书法，老师教你的是怎么使用这支毛笔，楷书怎么写，隶书怎么写，行草书怎么写，它有一个用笔的规范。比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以翁方纲为代表的帖学书家，他们的用笔都是从“二王”体系脱胎而来，因为“二王”体系发展到今天，我们见到很多，我们就很熟悉，所以刚才我

说，我们看到这些字，我们觉得眼熟。那么除了用笔以外，第二就是结字。这个结字当然也是从“二王”体系当中来的，它有一个法则，一个结构法则，而且这些被人们所遵循的结构法则也都经历了多少年的实践验证。还有一个就是笔法、结字之外的汇成总体的第三个项——章法。帖学书法因为是建立在这么一个人皆熟知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来看这些帖学书法作品的话，仍旧会感到很亲切。这个翁方纲，是“帖学四家”当中的第一家。

第二家，是刘墉。我们一看到刘墉这个名字觉得好熟啊，好像是哪里看到过。刘墉就是刘罗锅，官当的非常大。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有这么一个特点，如果他有作品传世的话，往往跟他的特殊身份相关。所以刘罗锅的身份很高，当然也很会写字。如果写的很蹩脚，我们今天就不会欣赏他。刘墉很能写字而且也有自己的风格，所以在清代帖学书坛他自然而然成了这四家或者这六家当中的重要一家。我也看到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很注意地看屏幕上刘墉的字，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刘墉的字究竟是怎样的用笔？因为刚才我提到用笔、结体。他是怎么样一种用笔呢，他水平究竟到哪一步呢？会有这样的疑惑。如果我们用书法术语来解释刘墉的用笔的话，那么刘墉的用笔叫做裹锋，裹住的裹，也就是说，刘墉的字往往看不到他的外露的锋芒，他是用一种紧裹的、提按并不分明的用笔方式来形成他自己的一种书写风格。一笔一捺并不很明确，一撇不尖锐，一捺也不锋利，清初书坛当初称他是“浓墨宰相”。刘墉作书，早年学董其昌，中年学苏轼，晚年学钟繇和颜真卿。他写字时候的所谓浓墨，现在看图版是看不清的，有机会希望大家能看看刘墉的原作。上海博物馆有个书法陈列室，每一期都有帖学代表书家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书法馆的展地有限，不可能把每一个时期的所有书家都陈列出来，但是我们会把代表书家及

其作品展示出来，比方说，清代帖学书法，刚才我说四家或者六家，我们起码有两家到三家会陈列出来。上海博物馆书法陈列室的展品大概是8个月换一次，因为平时工作比较繁忙，往往是后滞的情形比较多，最忙的时候会延至10个月，但是到那个时候，如果恰逢节假日，我们便会考虑观众增多，通常会调整在国庆以前，或者是在元旦、春节以前把所有的展品都换新。刚才说了“浓墨宰相”，在他的原作中的确用墨很重，他几乎没有淡墨之作。平时我们接触书法，会了解一些跟书法相关的知识。有时候会用浓墨书写，有时候会用比较淡的墨写，或者用浓淡相间的墨色书写，都是为了试图通过笔墨宣纸交相辉映表现出的一种艺术效果。刘墉决不用淡墨，他完全是重墨，而且很浓。彼时刘墉的身份很高，所以他用的纸张也非常讲究。上海博物馆收藏刘墉的作品，大概将近40件。因为博物馆的藏品很多，我们有“二王”的作品，我们有历代很多重要的原作，宋代很多拓本。所以刘墉作为上海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并不算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些作品的话，它们就显得重要了。十分欢迎诸位如有机会，到上海博物馆来看一下所陈列的书法作品，上海博物馆新馆从1996年向社会开放以来用的都是原作。

借此机会，我索性再介绍一下上海博物馆整个展厅的情况，上博共有十个常设展厅。一楼是雕塑馆、青铜馆。二楼有陶瓷馆，三楼有书法馆，有绘画馆，有印章馆，四楼有玉器馆，钱币馆，还有家具馆，其他还有三个临时展厅，分别在一楼、二楼和四楼。

第三个是梁同书。他的写法虽然也有个人的风格，但是从大体上讲，帖学这几家的风格都比较接近，也就是说在创作上，帖学的发展到那一步，从个人风貌来解析的话，实际上已经没有很多的内容了。如果我们客观地从书法发展史的高度，来观察帖学发展的这个时段的话，其实到了清代的中期，帖学的发展甚至可称奄奄一息，没有更新的面目表现了。所以此前明朝一代大家董其

昌，当时就曾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他在看了文徵明和吴门派书法的诸家作品以后，便发出感慨，大意是帖学书法，虽然我们一向把它作为一个母本，作为一个样本，作为一个老祖宗来看待，但是书法艺术的本身应该是发展的，帖学发展到这一步，像吴门书风那样缺乏生机和陈陈相因，则该是书法一道的悲哀。缺乏个性风貌是创作最忌讳的也是最无奈的现象，艺术发展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出现，董其昌的感叹说明艺术创作之难，当然凡事也不能过于理想化。

第四家是王文治。如果把王文治的书作跟刘墉的书作做比较，我们会看到王文治的作品出锋比较多，一撇一捺淋漓痛快，决不裹锋，用明快的用笔方法来进行创作。当时对王文治也有一个名称，跟刘墉相比较而言，叫“淡墨探花”。博物馆的王文治藏品也不少，无论从用笔还是结体，王氏之作和刘墉相比差异都很大。这自然还包含了王文治作品干净明快的意思，因此说他淡墨探花是针对刘氏的浓重风格而言的。尤其是他的作品跟刘墉作品放一起对比明显，各人有各人的表现手法。

这四家当中，我个人看法是王文治和刘墉的书法最具个人风貌。四家中梁同书的个人风格就不显得强烈。下面还有两家。一家是成亲王，又叫永瑆，是王室的人，他有一个常用图章，叫“王十一子”，是乾隆皇帝的第十一个儿子。成亲王的书法作品以楷书为主，我们看到他的传世作品，几乎都是楷书一式。有的朋友可能已经看出，这个楷书很像哪种书体，如果我们曾有过一番楷书训练的话，就知道这是往日已经熟悉的“欧体”。欧阳询的书体，用笔很到家，一捺必然是那样捺，一撇必然是那样一撇，结构上也非常严谨，偏一点都不允许，欧体就有这样的特点。书法创作的可贵之处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自己再迈一步。如果你一辈子写字，写欧体，写颜体，最终还是欧体、颜体，那么

我可以说你学习书法的方法和目的都有些问题。学某一家，临习某一家只是你学习书法的一个过程，最终形成一家之风才是目的，但是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通常难以做到。

从“入帖”到“出帖”，有很多人往往直到最后也没能出帖，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用这个话题来说明我们所看到的成亲王的这件作品，很坦白地很客观地评价这件作品，只能说他的书写功力很深厚，他的临摹本领很高而已，而从自创的角度来讲，他只完成了一半。

还有一家铁保，是满洲人，也是皇室后代，他当时的官职也很高。从作品的本身来看，似乎也没有很特别的地方，所以书法史上，往往有说四家的，也有说六家的，现在看到的是六家，但是严格从作品表现风格和作品分类来讲，我觉得四家更恰当一些，这是我们举例的清代前期的帖学书法。

下面看看碑学书法。刚才说过，碑学书法之所以诞生和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因为和乾嘉学派有关系。乾嘉书派的兴起，对碑学书法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屏幕上先看到的字是“书”“体”两个字，“书”是篆书，“体”是隶书。当然我们可以这么说，在碑学书法正式出现之前，隶书和篆书在整个书法表现形态中，虽不能说没有，但数量是很少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书法流派还没有诞生，到了清代中期前后，才一点点形成这么两种书法体系。现在看到的是阮元的行书作品，他是当时的大学者。一定会有人在想，你所举例的隶书作品和篆书作品，为什么看的不是隶书或篆书作品？阮元虽然在隶书篆书创作上不突出，他却是一个积极推行碑学书法的倡导者和先行者，有很多理论著作。他主张书法应该有所变化，尽管自己没有做到，但他在倡导碑学书法方面功不可没。还有其他几位前辈人物，意识到中国的书法发展应该有新的面貌，新的表现风格，因而也鼓吹碑学书法。阮元的书法也从帖学中来，只是他的理论思想倾向碑学书法。我们再往下看，这是钱坫的一件篆书作品。上联是“架有一

书”，“架”，把“木”字放到了左上角。中国文字有一个特点，可以挪位置。但不是所有的字都可以挪位置，有的字可以挪，有的字不可以挪，一个是从文字学角度评判，另外也不能排斥约定俗成的一些现象。“架”字，我们平时写楷书，上面一个“加”，下面一个“木”，但是钱坫却把它挪了一个位置。挪位置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字的结构好看。顺便说一句，篆书和隶书本身就有这样的属性，它比楷书、比其他书体更具装饰特点。隶书的横划是蚕头雁尾，篆书结体具有对称特点，这些都是它们的装饰属性。钱坫把“架”字这样写，一定是出于这个字这样摆好看的动机，当然不是乱摆。刚才已经说过，你不能把口和力拆开来，把口放在木字上面，岂能成字？它当然有一定的规律。上联是“架有异书门无俗客”，下联“行为世表文作词宗”。表字三横，他两横，但这毕竟不是楷书，是篆书。钱坫的落款往往是“十兰”，以前古人的字和号都是有关系的。钱十兰在清代中期名气很大，自己也非常的狂妄，这有若干的因素。一个是他比较早地尝试把篆书书法表现出来，要把这16个字写得互为协调统一，并不是所有的字书上都有现成的。当时虽然有字书，如《说文解字》，但是不是所有的字书上都是完整的。不是说从《说文解字》中挑出16个字来，按照顺序把它排列出来，就成为书法，不是这样的概念，这当中必须要做一道功课，就是要协调这些字。如果不协调这些字，那么这些字就各管各，就不是完整的书法作品，所以钱坫之所以自视高明，当然和他的本事有关系。写篆书历史上有一个李斯，李斯是当初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时的宰相，所以后人称李斯所创立的这种书体叫“斯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规范小篆体。历史上有两个李氏，是篆体文字最重要的书家，一个在秦代，一个在唐代。李斯在秦代，李阳冰在唐代。这两个名字都和钱坫下面这段自白有关。钱

坩曾说，写篆书除了李斯和李阳冰之外，恐怕没有人写过我了，所以他有一句话叫做“斯冰之后，直至小生”。意思是李斯和李阳冰之后，本朝就是我了，我的篆书没人能写过，我是天下第一的。可见，这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尽管他有狂妄的理由。当时有个客观事实是，清代中期乾隆前后这段时期的碑学书法主要是隶书一体，篆书相对少些，一直到清代后期，甚至到了民国的时候，甲骨文、篆书和北魏书才开始活跃起来。

邓石如名气非常大，喜好书法的朋友，大概都会知道他的名字。这两件作品，都是上海博物馆的藏品，一件篆书一件隶书。右边是篆书作品“上栋下宇左图右书，夏葛冬裘朝饗夕餐”，邓石如这件作品是他41岁是时的作品，那时还没形成自己的风格，但功力非常好。当时记载邓石如临摹的古代碑帖很多，当中有李斯、李阳冰的篆书，往往一临就是上百遍，这说明邓石如异常用功，并且进步快。左边是他的隶书作品，邓石如了不起，隶书写的好，篆书写的好，他的楷书也写的相当不错，而且还能写草书。彼时对他的评价是“四体书本朝第一”。这个评价可谓至高无上。当然除了书法，在中国篆刻史上，邓石如也是开家立派的大家，是他最先提出“以书入印”的理论主张。在他以前，刻印章都以固定的已成程式的书体入印，汉代刻印章的标准书体叫“缪篆”。到了邓石如，他提出以书入印的新的创作观念，以他所理解的书法，以他所了解的书体，运用到印章创作上，所以这一点，是邓石如对中国印章创作的历史性贡献，是他人无可相提并论的。

包世诚的作品篆书隶书很少，行草书多。客观评价包世诚，就像刚才评价阮元一样，创作上的水平很一般，甚至和同时的人相比，他都显得差一点。但在理论上，他是一个积极推崇碑学书法的人，他的理论影响当时很多人，也有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凭心而论，包世诚写的隶书篆书实在不怎么样，用笔很牵

强，结构也很生疏，但作为一个当时推行碑学书法的领袖人物，他当然要尝试这类创作。包世诚的行书作品很多。

吴熙载，也是清代后期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能书能刻。在中国书法史尤其是篆刻史上是一位有很大功劳的人。吴熙载是包世诚的学生，包世诚是邓石如的学生。吴熙载学篆书直接学邓石如，跳过这个老师，中间也说明一些问题。吴熙载的行书和他的老师倒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在吴熙载的篆刻作品中，他的边款文字跟他的老师如出一辙，一模一样，但他的篆书和隶书及篆刻创作，几乎亦步亦趋于他的太师邓石如。

徐三庚，彼时篆刻名家。从作品看，说明当时大家都从碑学书法当中汲取能量，然后渐渐的形成自己的风貌。图版表现的这些作者，都是当时相对具有自己风貌的作品。

伊秉绶，是需要推荐和说明的一个人，个人风貌非常强烈。看他的作品有的朋友可能会想，右边这副对联，说它像隶书也不像，隶书有它基本的表现方法的，比如隶书的横划是“蚕头燕尾”，但这体作品缺少隶书特征，并且像篆书，不像隶书笔调。右边那幅对联“黛色参天二千尺，名花出地两重天”。从严格的对联对仗的角度来评析，这上联第五个字应该是“三”，从音韵上讲，也应该是“三”，“三”和“两”，“三”是出声，“两”和“二”都是入声，这是一个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二”，很可能是当时作者写错了，这个情形常常是会有有的，不要以为名家古人一点没差错的，笔误完全可能会有。上联“黛色参天二千尺”黛色的“黛”，中间的“黑”是草书的笔法，“天”是楷书的笔法，“参”字有点楷书间有点隶书的笔法，最后的“尺”字又是草书的。下联“名花出地两重天”，“花”和“华”是通假字，“花”字的写法，

用笔是隶书，结构是篆书。这个现象从文学上讲叫“杂糅”。所以中国的文化，有它很有趣的一面。“杂糅”现象是因为你做的不高明，才叫你“杂糅”，反过来，如果你做的高明，那就是风格多样。能够把那些不协调的因素，最后完整地统一在一个表现体上，这当然是作者的本领。不显突兀，不显矛盾，反而觉得很协调，有那么多姿态，有那么多能够让人体悟的项。伊秉绶的确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曾经有个日本朋友喜欢伊秉绶书法，我带他到书法馆看，我反问他，既然你喜欢伊秉绶，那么请你讲讲他究竟好在哪儿？他说伊秉绶的字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真是妙在其中。我的理解，伊秉绶把这么多的书体，这么多的书写形式融合在一个统一体上，他的内涵很丰富，但最终打动人的是他作品中的一种清健蕴藉的气息。伊秉绶的作品，以我的看法，决不仅仅停留在临摹和挪移的本领上，临摹和挪移这种现象在当时很普遍，只是把古器物当中，把古代碑版当中的那些字，挪移过来，放在自己的书法作品中，最后实际上完成一个拼凑的过程。但是伊秉绶不，所以伊秉绶伟大即在于面对固有文字材料或者创作元素，他有效地完成了再度创造，树立起完整的体现伊氏思想魅力的个人风貌，这才是他最伟大的地方。他用自己的理解对现有对象进行再创造是他的最可贵之处，要走到第二步是非常困难的，往往比较多的是局限在前面的阶段，临什么帖，临什么碑再现出来，但这不是表现，表现是书法创作的命脉，而再现毕竟简单。

陈鸿寿即陈曼生，是“西泠八家”当中的一家，既会篆书，也会写隶书，隶书虽说有特点，但有美术化的倾向，过于外在的那种表现架势。去年年底，香港中文大学办了陈鸿寿艺术展，上海博物馆应邀参加这个展览的研讨会。实事求是地说，因为陈鸿寿有他在紫砂壶号称“曼生壶”壶艺上的名声，比他的书法、刻印大很多，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在办展览的时候，面对陈氏书法作品，我就和他们说了一句笑话，说就陈鸿寿这样的水准，你们是否“小题大做”

了？从创作的客观立场出发，陈鸿寿这样的书写水平我的看法是比较普通的。相反他的紫砂壶，因为当时没人做这件事，能把书和画表现在紫砂壶的壶面上，的确是他的创举，另外在篆刻上他是“西泠八家”之一。如果没有这两项作支撑的话，单从书法看，陈鸿寿显然是不够的。

赵之琛，也是清代后期的一个篆刻家，我罗列这些图版的目的是，让大家看看，在当时碑学书法的发展因素和大前提下，各家各派是怎么表现的。

何绍基，值得一说。何绍基在清代晚期是影响非常大的书法家，他的行书当时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也许有人会问，我们看到图版上这两件篆书和隶书作品，似乎并不高明。这里有个背景材料要交代，何绍基原本是不接近碑学创作的，因为他身边有一批碑学创作的朋友，他是无形中受到那些朋友的感染，也来做一些尝试而已，这段史实发生在何绍基的晚年。何绍基完全是用他习惯了的一种行书创作方法来写隶书和篆书，所以隶书也好，篆书也好，除了有一些隶书和篆书在用笔、结体上的特征以外，仔细看还是行书用笔的风韵。从结构上看，肯定也不是赏心悦目的那种。所以我们研究何绍基的篆隶书作品，一定是出现在他晚年70岁之后的作品，一定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果突然间发现有一件他四五十岁写的如此苍茫、如此不衫不履的篆书和隶书作品的话，那一定就有问题。当然也不能绝对排除有时候纪年会搞错。我的工作告诉我，要认识一件作品，一定是以原本作品的创作特性作为依据的，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特性，以此作为根本依据是不会错的。

认识篆书书法，应从最初的“二李”开始，“二李”的篆书当初有个名词，叫“玉箸体”，箸是筷子，玉箸是玉的筷子，筷子的外形很直，又很圆匀，当初形容“二李”的书体，尤其是形容李阳冰的书体十分恰当。我看到有

些书，写李阳冰的篆书称是“玉筋体”，将筋、筋两字混淆了，没有这个体的，筋是箸的异体。我们年轻的时候，老师教我们写字，说写篆书那根直线写得要像日光灯的管子一样，很形象，也许说玉箸我们会不理解，但说线条写的像日光灯的管子一样，很快就理解了。传统的篆书线条原本是这样的要求，但是书法创作贵在形似之后的再创造，每个作者应该要有这样的思维方式，或者说应具有这样的创作意识。

罗振玉，在书法界、学术界的影响非常大，这件作品是用甲骨文书写的。

齐白石的字当时就有很多人批评他，说是没有法度，那么如此只能从两个方面来原谅他了，一个是齐白石的确没有读过很多书，他在文字上没有很严谨的修养，另外他毕竟是一个画家和篆刻家，有他在创作上相对随意的一面。

用了这么长时间，才切入正题。因为我想如果帖学书法和碑学书法不讲透，我们讲海派书法，是有困难的，因为海派书法是从碑学书法和帖学书法延续过来的，是融合之后的一种风格表现。海派书法既有艺术上的特性，又有时间上的特性。晚清学者张鸣珂在《寒松阁谈艺琐录》中说：“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那是指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上海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大批的外国列强进入了上海。因为上海特有的地理环境，和诸多方面的优势，所以上海很快成了一个全世界有名的经济城市。所以张鸣珂说“贸易之盛，无过于上海一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话，下面一句，“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这说明一个什么现象呢？上海经济发达以后，接下去人们开始追求文化精神生活，当然不止是上海，我想其他地方也是。吃的好，穿的好，住的好，已经觉得不满足，于是想看看演出，听听戏，希望有个好的艺术品放在家里，和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和今天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或许能够印证鸦片战争以后不久的一段事实。在11年以前，一次我在青岛文化市场发现4只红木凳子，

不是现在看到的中国式样，显然是带有西洋审美特点的凳子，凳面既不是圆也不是方，是四个角有点圆的那种。四个凳腿离地大概1寸多的位置上都裹着铜皮，四个腿不方不圆，是由一个圆柱体一劈为四，也就是一边对外是圆弧形的，里面是呈90度方角腿的凳子。这四个凳子，我一看就非常喜欢，虽说卖得很贵，我还是要买，因为我喜欢那个式样。买的时候没在意，买回家，洗干净打蜡之后，发现凳子的背面刻了“1844”这几个阿拉伯数字。凳子不是纯粹中国式的，带有西洋味道，我想一定是鸦片战争以后过了4年，外国人在中国安居乐业，想建设自己的安乐生活而购置的家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产物。

“以砚田为生”，就是靠写字画画赖以生计，我们写字画画都需要砚台。“于于而来”，就是不断地来。这情形很像早20年，上海有很多年轻人到日本打工，那里挣钱快，所以一拨接一拨地都到日本去打工。张鸣珂描绘的当时的情形，说明为数不少的外国人，到中国安居乐业以后，他们也想建设自己的皇道乐土，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家里挂一张字画，当时是一桩平常的事。回忆我们小时候，差不多的人家，也不算很富裕的人家，像教师家庭、职员家庭，家里都挂字画，这毕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最后四个字，是“侨居卖画”。这说明上海本地的书画家还是有限的，多数都是外地的书画家进入上海以后，逐步开辟自己的市场。海派书画的先驱人物赵之谦，名气很大，所作隶书篆书，也是从邓石如来的，写的楷书有魏碑体的风貌，是碑学书法发展到同治、道光年间的那个时段，大力推行北魏书体，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赵之谦在我国篆刻史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说到明清篆刻及其流派，就一定要说到赵之谦。我们一点点看下去，会看到海派书法的某些特质。虚谷是个画家，来往于扬州苏州和上海卖画，虚谷的绘画风格和他的僧人身份有关系，但是的确是自成风

貌、别具一格的，熟悉绘画的朋友都会了解到这个情况。他的书法和他的绘画风格很相近，不讲究具体的点划技法，而是追求通篇的气息。虚谷的字非常的少，和其他书法作品摆在一块，是想说明当时画家的字的风格。彼时张鸣珂所谓“砚田者”，当然主要是指画家，书法家其次。当中有个根本原因，即对买画的人来讲，画家的受众面更大。你看看你周围的朋友，除了书道中人外，搬新家，挂画挂字，一定是挂画多，挂字少。因为挂画有色彩性有形象性，有这种相对通俗的成分在里面。在上海卖画卖字，当然也是卖画比较多，直到在国内的情形，也还是卖画比较多，卖字比较少。

任伯年的书法作品也是个特例，是现在能见到他的篆书作品的唯一一件。他的绘画作品是当时海派作家当中，创作最多的一位，因为他的作品形象丰富，色彩鲜美，通俗易懂，所以受众面很宽。任伯年的书法作品却几乎见不到，我们拿出来展览的时候，有人提出疑问，说任伯年不写字，怎么会有这件篆书作品，而且这件篆书写的还相当不错。我们通过多种研究，最后还是把它确定为任伯年的书法作品。对于任伯年这件篆书作品的疑问，我是这样答复的：任伯年当初是个名气非常大的画家，如果简单从作品的价值来看，他画一张画的价值，通常是一张字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对于任伯年这样一个职业画家来说，当然是多画画，多卖钱。这样的话，书法之作必然就少。此外，偶尔戏作馈赠友人的可能性，也未必不存在。虽然我的答复像是简单，但背后却做了很多任伯年的相关研究，才有根据说这样的话的。顺便说说，他用的印章，每个时间段都非常分明，这件作品，是他 39 岁之前的作品，到了 39、40 岁以后，他就不用这样的印章，这是鉴定学上的一种情况。但是每一个书法家、画家一定会有自己的创作特性和创作习惯的。

吴昌硕是一位精于书、画、印的前海派艺坛的领军人物。这一句话包括了更多内容，他的书法，绘画、印章的创作成就都很突出，用现在比较时髦的说

法叫“三绝”。他是1844年出生、1927年去世的，彼时，吴昌硕的创作高峰，正处在清代后期，因而说他是清代最后一个书画篆刻家。我们的书法陈列，我们的绘画陈列，我们的篆刻陈列品，都是以这个时间段作为作者下限的。因为他在海派艺坛的创作举足轻重，所以很多的书法家、画家，甚至篆刻家，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进行创作实践的。可见他对当时创作的影响，他的确是有资格担当这个领军人物的。吴昌硕的书法，有几种表现方式，其中最负盛名的是他的篆书。他自称他的篆书从石鼓文来，然而在他手下，却变成了略带装饰美感的自家风貌，这种艺术样式，正好迎合了当时上海的欣赏者。我现在逐步引出了海派书法的这个特点的。我在开始的时候已说过，描绘海派作品是需用实例来作比较的，海派书法的确是比较秀美，比较典雅，比较婉约，少数有雄强的作品，但从总体表现上还是服从这种典雅的特点。比如说吴昌硕在众多海派作家中是比较雄强的，但是他和真正的北派作家的雄强还是不一样。被吴氏自己口口声声引为自得的篆书创作中，他曾几番点题说学的是石鼓文一体，但是如果我们把吴昌硕的石鼓文创作和周代石鼓文拓本放在一起比较的话，我们发现还是有差异的。当时的石鼓文介于大篆和小篆之间，用笔是小篆的均匀的用笔，结体偏方是大篆体式。而吴氏石鼓文则运用了小篆的结体和大篆的用笔，以致笔道自由，字形狭长，且呈左低右高状。请看对联中有几个左右结构的字的处理，都是左低右高，他的这一结构特点，在原本石鼓文上是没的，这一点便是他的高妙之处。在我刚才说到伊秉绶的时候，就说到过再创造这个词儿，既不是挪移也不是临摹，便把原先刻板的成分一扫而尽，这就是他们的了不起。所以在这点上，尤其是所谓书画家的再创造的本领，的确只是反映在少数的几个人身上。由此，我们可以下这么个结论，真正在艺术上要有创

造性很难，要有建树那就更难。所以当时人们感叹，在中国现代画坛上，几百年才出现一个张大千，这话并不夸张。把话题再引开一点，在创作上能够有深厚的功力已经难得，如果再有创造性，那就更加难得。艺术创作不是一个简单的功力的积累，其中包括的内容很多。再上一个境界，那就是思维在起关键作用。这种有如西方人所说的带有血液规定性的思维状态，或许根本就不符合唯物辩证法，但以我自己的创作体会，和所从事的工作，我的确有这样的想法。

沈曾植，也是清代晚期的一个大书家，他的书法大家看着有点陌生，并且结体和用笔都不通俗。他是从北碑书法当中来的，所以作风相对雄强。这是我们平时所描述的书法表现风格中倾向于生拙书风的作者，如果才开始喜欢上书法，那你一定不看好他。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书家，也是一个卓有建树的书家，同时也是一个以他自己的作品足以影响后人的书法家。用行书的方法写北魏书，这是他的一大创建。当然在他的书法创作当中还有章草的成分。在他的所有的弟子当中，用章草进行创作实践最成功的一个书法家，就是王蘧常先生。陆恢是名重当时的画家，在书学上也受到碑学书法影响并自视对此道多有心得。曾熙是张大千的老师，但是在书法创作上平平常常。李瑞清和曾熙差不多的水平，都是徒有其形，徒有外在形象。外在形状和古人颇接近，但是精神背离很远。张善孖是张大千的哥哥，时而写些甲骨文和大篆的书体，然不显风格。张大千非常个性化，照理说他是向曾熙学习书法的，理当会受到局限。但是他自己的充满个性的作品却和以描摹为能事的老师的书作那么地不同。叶恭超和黄宾虹，也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书法家。如果说黄宾虹的绘画创作有很高的造诣的话，那就和他的书法密切相关。因为中国画的线条，是从中国书法中来的。大家都知道黄宾虹是个大画家，在绘画上成就很高，但是我觉得要客观地评论黄宾虹的书法和绘画，虽说他的这两项创作是旗鼓相当的，但有一点要强调的，这就是他的书法创作是作用于绘画创作的。海派书法发展到民国年

间，作风越来越通俗，当时的王福厂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他写的非常匀称，写的非常漂亮，我想象这样隶书和篆书都写的非常工整，都非常秀美的字，十家人家起码有九家会喜欢，因为它会令人赏心悦目。所以当时上海画坛、上海书坛乃至整个海派艺坛都有这么个特点，那就是以买你的作品的多和少，来衡量你的成功，其实这是个比较简单的衡量方式。于右任名气很大，写草书。于氏如果不去实践所谓“标准草书”，我想他的成就会更大，起码我认为这个“标准草书”似乎并不适合他的个性风格。

昨天我和记者聊的时候说，海派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从清代赵之谦、吴昌硕那辈人开创的历史算起，一直到解放为止，这可作为一个前海派的时间定位。后海派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我是这样来划分的。当然，当今生活在上海的书画家也都应称之为海派的，但这是另一个定义了。既从艺术上讲，前海派有帖学的传承，同时又跟碑学书法连得很近，尤其是从道光同治晚清后期受到北魏书风影响的那些创作，到了民国前后，风格已经相对成熟了。几乎同时，各种书体都有了发展，篆书、隶书、北魏书，包括甲骨书，规格很齐全。刚才我说过，把海派分前后两段，是因为从艺术上讲有不一样的表现。建国以后的海派，主要是延续前海派的做派，但它跟前海派又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不同直接反映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因为解放以前，书画家跟唱戏的一样，生活常常没保障，当然名声大的如四大名旦等地位就高。一般的书法家说不上地位，都是靠自己的作品来换钱，来生活。今天的画卖得多了，生活好一点，画卖得少，生活就差一点，如没人理会你，那就很尴尬了。建国以后，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新中国建立之后，政府把这些书画家组织起来，归于三个去处，一个是文史馆，一个是国画院，

还有一个类似文管会、博物馆这样的单位。这样，政治上显然就和过去不一样，大家都很尊敬书画家，把他们当作艺术家看待。此外重要的一点，是经济生活跟以前大不一样，他们每月有工资。画院的老先生一般分两档。一档是画师，每个月有80元的工资，在20世纪50年代不算低了，那时叫车马费，不叫工资。在画院当干部的，有160元钱，那就相当高了，唐云先生就跟我讲过他有160元工资。画师们不会再像建国前那样紧迫地卖字卖画为了生计，他们有一个单位，有固定的收入，显然这些人的生活有了保障，他们可以从容地创作，但他们必须参加多项政治运动，积极体验生活，遵循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配合形势创作主题作品，书写和宣传革命内容。

再让我们来看看后海派几位主要书家的创作。丰子恺，当过中国画院的院长，20世纪60年代初，以画画为主，字也写得非常有自己的风格，是弘一法师的学生。他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非常可惜。她的女儿丰一吟目前在整理他父亲的史料。丰先生的画很有特点，有点像版画，画幅都不大。丰子恺先生的书法作品，我们馆只有一件，是一个当时上海的统战部部长捐献的。陆小曼当时归属于上海中国画院，说起陆小曼，我们都会想起浪漫诗人徐志摩来，当时这些人的修养，在书法上的修养，在绘画上的修养，甚至在音乐上的修养，在整个美学上的修养，都不低的。周炼霞也是中国画院的一个画师，诗文尤其好，经常和吴湖帆先生等老辈书画家在一块敲诗的，是当时一致公认的长相一流一等的才女，也是中国画院的。邓散木先生我们比较熟悉，是一个在篆刻上很有影响的印家，也很有个性，只是他的晚年创作格调不很高，趋于通俗，略显习气。

沈尹默是后海派书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是典型的帖学作风。20世纪60年代之初，上海成立了“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和“上海中国画院”，一块挂牌在上海汾阳路，后迁至岳阳路。沈尹默先生是首任会长。沈先生学问很好，

我们都知道他当过北大校长，是新诗时期的代表人物，建国以后为中央文史馆馆长。在上海定居之后，主要以书法创作作为他后半生的生活方式，对当时上海的书法研究和创作，影响非常的大。他十分注重传统，他的众多弟子都严格地秉承他的理论思想和创作实践。他最有名的一个学生叫胡问遂，老先生也在早些年去世了。所以上海书坛，老书家的比例可能是全国最高的，其师承特点，在全国也很突出，学生跟老师，老师带学生，完完全全地照着老师的路子，布置功课，一招一式按着老师教授的方法来学习书法，勤学苦练。当然，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学生比较年幼，从练好基本功的愿望出发，这种基础式的学习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如果学生原本天分不高，而老师又坚持固守程式缺乏启发的教学方式，那么在无形之中便会制约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当今外地有些评论家，对上海一域的书法创作有批评便多集中在这个方面，议论上海人的面目单一风格甜美，随老师亦步亦趋，不敢自己迈出步子。但是我想，就像刚才我所描述过的海派书法也有一个自身发展的轮回特征一样，每个书法家他所处的时代不同，他的作品表现自然也就不同，它会受到时代的限制。譬如沈尹默时代，当时的那批书道中人看了沈先生的字之后，他们觉得似乎也没有很特别的地方，但是过了这几十年以后，如果我们回过头再看沈先生的字的话，他的创作和我们当今的创作，却有很大的不同，凡事比较之下，自会显出高低来。当然，在后海派书家中，除了沈先生之外，主要还有白蕉、拱德邻、潘伯鹰、马公愚、王个簃、来楚生、潘学固、谢稚柳以及钱君匋、赵冷月、任政先生等。所以这句话是不错的，艺术创作一定有它的时代特点的。我是这样的观点，在创作上不必刻意，只要你的功力够了，你的审美到

了，你的各方面的积累到了，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个性化的面貌出现，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现象，不是刻意做得来的，我始终持这样一种观点。

问：怎样理解篆刻书法大师方去疾先生晚年向右上方的倚斜之势的印章和书法的创作？

答：方去疾先生是我的老师，我跟随他多年，方先生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创作上甚至在生活上都是一个非常严谨非常有个性的人。方先生刚才提出他晚年创作有偏斜之势的那种书体样式，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每个人对古代作品，或者对自己创作都有固有的看法和思考。我也曾经就此疑惑请教过方先生，我说，先生的印章结体有左低右高的偏斜感觉，而来楚生先生是左高右低的，这是什么原因？方先生答复我两点，他说来先生是左高右低我来个左低右高，我倒想试试看行不行，当然他这是一种探索，因为有这类作品风格的时候，他年纪还不算大，大概和我差不多，60岁不到一些。另外他说，秦代诏版文字也是这样的，看来他还是考究出处的。那么舆论界或者同行对他看法是怎样的呢？大家都觉得偏斜虽然也是种风格，但是这种偏斜的创作如果要走向最后的完美和稳定，恐怕还需要时间。因为书画创作的过程是很长的，不然就不会有孙过庭“通会之际，人书俱老”那句話了。因此，等你在艺术创作上有一个完全的领会，功力已经到家的时候，你的年纪也许就很大了。方先生很可惜，他60岁多一点生病，生胆囊炎、胃出血、颈椎炎等病，一会住院一会开刀，所以他的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好，可以说是长卧病褥直到80岁去世。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如果他身体一路比较健康的话，我想他到晚年也许不会始终是这一种风格的。

问：王献唐先生的《五灯精舍印话》影响深远，我也受益匪浅，近年关于王氏的古文字和印学方面的材料，是否有新的发掘？

答：我先解释一下，《五灯精舍印话》是王献唐论述中国古代印章的一本专著，一般有关印章的专著，往往会偏重于印史方面或者技法方面，但是王献唐的这本专著，是从考古历史学的角度来阐述和观察中国古代印章的，所以很独到很有研究价值。《五灯精舍印话》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王献唐遗书》中的一本。此书现在恐怕已不易买到。王献唐一生著述50余种约2000万言。近些年，王献唐先生的著作正在不断地整理和出版，青岛出版社2004年出了一部《国史金石志稿》七卷本，国家并且还有出版《王献唐全集》的计划。去年开始，青岛大学把王献唐研究作为一项专门学问，列入了大学课程。

汉字书法在日本的流传与发展

刘作胜

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在他的《古代社会》中说：“人类社会从愚昧走向文明最明显的标志是文字的发明与使用。”在远古，作为没有文字的日本来说，汉字的传入使这个岛国走向了全新的发展；也标志着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可分割的深远关系。

书法是表现文字的艺术，在汉字文化不断传入日本的同时，这门艺术在日本也生根开花，发展至今，形成了具有独自特色的日本书法。

在这里我想绕开正史，换一个角度，从我自身了解到的对日中书法史产生影响的人和事做一个介绍，从侧面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日本书法发展形成的机会。

一、汉字的传入

“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之世，贵贱老少，口口相传，前言往行，存而不忘。”¹这是表述汉字传入之前时的日本人的记录方式。我们先来看一下汉字是什么时代传入日本的。汉字何时传入日本的，至今尚未找到准确的答案。但有一点可以证实的是，汉字最早是通过朝鲜半岛而传入日本的。我们常说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航海技术不发达的2000多年以前，要渡过这“衣带”宽的海域的难度不亚于今天驾一叶孤舟横渡太平洋，可谓九死一生。朝鲜半岛南端与日本九州岛比较近，所以当时日中之间的往来都是通过朝鲜半岛来转渡。日本现存最早的汉字实物是公元5世纪后半所制的“东大寺古坟大

¹ 《古语拾遗》。

刀铭”及“稻荷山古坟铁剑铭”。其制造者署名均为朝鲜人的姓名，以上述实物为依据，有很多学者认为汉字是公元5世纪前后才开始传入日本的。的确，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找到早于5世纪之前的在日本所制造的汉字实物，但也不能够完全否定在此之前日本有汉字。在此，我想通过早期中日之间的交流关系来推断汉字传入日本的时间应早于5世纪之前。

1784年日本福冈县志贺岛出土了一方大家所共知的“汉委奴国王金印”，对照《后汉书口东夷传》可知此印为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汉光武帝赐予日本九州岛中的一小国之印绶。我们可以想到光武帝不会轻易地给一个连来意都表达不了的他国使者金印的。而作为要乞望得到汉朝庇护的朝贡之国，在交涉、缔结承属关系时就必须有类似于国书之类的文书呈交，其文字也必为汉字，书体也应为汉代的通用体隶书或为早于隶书的篆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够具有“远交近攻”外交意识的国家，不论其大小，已经具备比较完整的国家体系。文字是国家行政中不可缺少的应用工具。从金印所证实的外交关系上，我们可以这样推断，早在公元1世纪初，日本列岛已经有了汉字并且存在能够熟练使用汉字的人。

二、继承期——写经体及王羲之书法的盛行

到了飞鸟时代（563—710），日本建立了统一国家，随之而来的国家体制、律令、生产技术、宗教各领域亟需发展，新政权也决定绕开以往由朝鲜半岛引入中国文化的渠道，而派遣使者直接去中国学习。从607年始，实施遣唐史制度，与此同时，留学生、留学僧也大量地往来，在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也将当时的隋唐书法引入了日本。隋朝虽然统一了南北朝，但国祚短暂37年

而终，因此习惯上把包括遣隋使在内的这段时间统称为遣唐使时期，而书法方面是伴随着佛教的传来而在日本得以迅速传播。

佛教的传入在日本历史上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初期统一国家建立后，需要一个稳定民心的精神支柱，佛教在抚慰现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的苦难、支撑普通民众精神需求方面提供了比法令实施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因此佛教成为当时日本的国家宗教，在全国各地建寺立像，大力提倡写经运动，写经成为经典传承、表达虔诚求得福佑的一种行为，蔚然成风。另一方面，写经的盛行无形中也成为识写汉字的一种手段。写经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中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支流，但在日本文化中却占有主要的位置，写经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各大寺庙定期实施写经会，在任何一家文具店都售有写经用具，很多人都是通过写经开始步入汉字书法领域的。由于佛教的盛行，出家僧人的增多，日本需要一位戒律高僧来主持佛教正统，这便引来了鉴真东渡之举。

正仓院坐落在奈良东大寺寺区内，具体地说是奈良中期圣武天皇所收藏的先代先皇珍品的收藏库，由于有着与皇室关联的背景，因此正仓院虽处于东大寺内，至今其管理、研究、开放的权利直接隶属于皇室宫内厅。仓内收藏着7—8世纪以中国为主的东亚文化的精粹文物9000余件，是研究七八世纪东亚文化实物极为重要的所在。

正仓院的《献物帐》中有“王右军真迹行书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的记载。据《元亨释卷》记载，此四件为鉴真东渡时携来之物，献给了当时的孝谦天皇。其中的“王右军真迹行书帖”，现考证即为著名的“丧乱帖”。

《献物帐》中另有“拓王羲之书法二十卷”、“大小王真迹书一卷”、“欧阳询真迹屏风”等法书墨迹，为遣唐使、遣唐僧从当时的唐朝带回后献纳的。鉴真作为传法僧人东渡，在携带大量经典之外，并注重携带了在当时唐土亦极

为珍贵的王羲之、王献之法书真迹献给孝谦天皇，由此可见二王书法在日本的珍重性。笔者在调查正仓院藏品中，还发现了一件署名为鉴真的墨迹。我们都知道鉴真在第五次东渡时，在韶州眼病突发，遂至失明。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后，一直是在失明的状态下传法施教直至病终，这件墨迹为鉴真来日本后的第一年、即754年所书，既然鉴真已经失明又怎么会有手书墨迹存在呢？其真实性受到怀疑。迄今为止，中国国内尚未发现鉴真的手迹，因此无法进行比较鉴别，但从此件墨迹的字纸、内容及正仓院藏品的当时记录来看，无法否定是鉴真所书。笔者就此事请教了佛教美术专家菊竹淳一先生，菊竹先生曾在国立奈良博物馆从事佛像研究多年，菊竹先生说据鉴真当年所在的唐招提寺的代代僧人传下的秘话说，鉴真来日本后，的确眼疾很重，但不是完全失明，东大寺一切经论由他逐字校正，也手书了部分墨迹，但现已全部遗失，唯此件得以保留。因为眼疾很重所以平时一直紧闭双目，所以在他圆寂后塑造的木像也是他生前闭目的形象。后人为了歌颂他不畏险阻舍身传法、身残志坚的精神，将鉴真失明的时间移至东渡途中。

鉴真的此件墨迹规格不大，内容也仅为借阅经典的书状，但行笔气势饱满，错落有致，从章法、字形来看受王献之影响很大，文中几个相同的字也注重写法的变化，寥寥数行间可以看出这位高僧书法造诣之深。而这件墨迹不仅是研究鉴真的珍贵资料，也是中日书法关系史中渡日中国人所书的最早的一件墨迹。

鉴真作为佛教戒律大师来日本，在东大寺设立戒坛，为圣武天皇以下授戒。“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并敕授“传灯大法师”位。之后在唐招提寺建立戒律道场，成为整治律仪、传授培养、考核认证僧人的最高行政

机构。而包括写经在内的汉字书法则成为僧人的一个必修课程。正仓院藏品中就有僧人学习王羲之法书所留下的临书作品，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于汉字书法学习的要求。

鉴真东渡约 50 年后，遣唐僧空海来到大唐，成为继鉴真之后又一位传播中国佛教及书法的高僧。空海 804 年入长安求法，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不仅学习佛法，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广泛摄取。据说他受书家韩方明的《授笔要说》中的五种笔法的启发书艺大进，被誉为“五笔和尚”的美称。我们鉴赏一下空海的书法作品，就会感受到既有王羲之的优雅风韵，又有颜真卿的雄浑力度。代表作“风信帖”被称为日本书法史中的第一精品，不仅在日本，甚至在汉字书法的故乡中国，将此作并列于唐代书法的精品之中也毫不逊色。很难看出是出自一位来中国学习仅一年半时间的日本人所能达到的高度。

关于空海书法的研究，国内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是来到中国留学后在长安正式开始学习汉字书法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识。空海 23 岁时在鉴真所主持过的东大寺戒坛受戒，受到过严格的书法训练。在他有关留学记录的文献中唯一提到的老师是不空三藏法师（《西游记》中的唐三藏）的弟子、青龙寺住持惠果。有人说空海曾师承当时的长安书家韩方明，其实是对空海曾研习过韩氏的《授笔要说》之事的一种推断，并无明确的依据。关于这一点，于植元先生的《空海与唐代书法》一文有精辟的研究，希望大家拜读一下。我想在这里再举两个事例来说明一下空海来大唐留学前后的书法水平。公元 804 年 7 月，空海随大使藤原葛麻吕的遣唐使船赴中国，途中遇风浪袭击，船队失散，空海与大使乘坐的船只漂至福州港。因为当时从日本来的遣唐使船都在南明州宁波登陆，不到福州港，所以福州海防将其船只扣留，严格查问入国目的。因语言不通，大使让空海以笔代言写了一封《为大使与福州观察史书》来说明情况。此书文辞华丽，书法精美，使福州地方官为之惊叹，一时传为佳话。最近，小野

胜年氏的《入唐求法行历研究口圆珍篇》中也提到了与空海“福州登陆事件”相关的资料。空海渡唐 50 年后，日本僧人圆珍来到福州开元寺求法，寺主惠灌问圆珍“五笔和尚（空海）尚在否”，圆珍说“已亡化”，惠灌捶胸悲叹道：“其异艺无伦匹者。”这说明了空海在福州的名声盛传之久。再是空海入唐后的第二年（公元 805 年），空海之师惠果亡化，弟子信徒们共推空海为惠果撰写碑文，署款“日本学法弟子比丘空海撰文并书”¹。遗憾的是此碑至今尚未发现，历代的金石录中也未见记载。惠果所创造的真言宗密教在中国后来衰落，所以墓碑湮没的可能性很大。惠果当时传为弟子千人，在书法盛行的长安，推举一位外来僧人为其撰写碑文，可见当时长安僧众对空海书法的推崇。从这两件事中可以看出空海在渡唐之前，对于汉学诗文及书法已经有了很深的造诣。

空海被派遣到大唐的任务是学习佛教，恐怕连空海本人也未能想到，在语言不通的中国，通过书法的交流，找到了一种跨越国界的共鸣与认可。他笔下轻轻地一动，化解了官府怀疑的目光，更有人对于他的去世而为之捶胸悲痛，作为外来弟子能为惠果这样的大师撰写碑文，这一切都缘于一支毛笔和共同使用的汉字。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文字所没有的表现力。大唐整个社会对于书法的感应，对善书者的崇拜让空海吃惊，他认识到了与佛法同样能够感应人心的书法的魅力。这也成为他在学习佛法的同时，更潜心于学习大唐书法的一个推动力。他以“学问僧”的身份转益多师，对唐朝的文学、哲学，及书法理论也兼收并蓄，并注重搜集书法资料。空海归国时带回的典籍有 216 部 461

¹ 此文被收入空海的《性灵集》。

卷，书法资料方面就有“欧阳询真迹一卷”、“李邕真迹屏风一折”、“张萱真迹一卷”、“王羲之诸舍帖一卷”、“兰亭序拓本一卷”等大量代表当时唐代书法的精品。他带回的这些大唐法书精品，经过翻刻拓印广泛传播，为各级民众学习汉字书法提供了丰厚的资料。空海的另一大贡献是将唐代书法理论引入日本，致力于汉字书法内在表现的研究，著述了《敕赐屏风书了表》、《篆隶万象名义》，开创了日本书法理论研究的先河。空海回国后，继承和发扬了惠果的佛法，成为日本真言宗开祖，奠定了真言密教成为日本国家佛教的基础。当时的嵯峨天皇也拜空海为师学习唐代书法，嵯峨天皇对空海的书艺推崇备至，以诗赞誉空海“绝妙艺能不可测，二王歿后此僧生”。被后人誉为日本的“书圣”。

唐代近 300 年的历史中，由于太宗的偏好，书风及书学思想尽笼罩在王羲之所代表的魏晋风格之下。“书不入晋，固非上流；法不宗王，讵称逸品”。这种倾向，也直接影响了日本奈良、平安两代书法的发展。以鉴真、空海等人所带到日本的二王法书为典范，日本也兴起了临习王羲之书法的风潮，甚至将“羲之”二字的发音与临书范本“手师”（てし）作一样的发音。也就是说，在当时“羲之”二字就代表我们所说的字帖，代表着汉字书法。楷书方面，在写经体的基础上，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为代表的“初唐三大家”也逐渐传到日本，但由于“法度”过于严谨，所以在书写时，适当地融入了行书的用笔表现，创造了一种略带动感，较为妍美的楷书风格。

三、转变期——假名书法的产生

到了平安时代中期，日本朝野中一部分人要求停止遣唐使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其理由一是渡唐航海船只遇难太多，人力及财力为之付出的代价太大；二是进入晚唐时代，唐朝国力日渐衰竭，政局纷扰，世变莫测。已经没有值得

学习的地方。公元 894 年停止向唐朝派遣使僧，遣唐使制度亦随之结束。在长达 260 多年间的遣唐学习过程中，唐朝的政治、文化、艺术等各领域的精华都源源不断地传到了日本，奠定了日本国家发展的雄厚基础。从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事物，在长期依靠一方成长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因为外在及内在的变化而产生分离，形成独立成长的局面。其实早在平安前期的弘仁时代（810—824）日本国内已经逐渐产生了“国风文化兴隆”的萌芽，至 907 年唐朝灭亡，更加速了日本寻求独立发展运动的兴起。书法方面，在汉字书法的基础上，产生了假名书法。

“假名”在日语中又称“假字”，顾名思义就是假借汉字。日语有 47 种音节（50 音图中去掉重复音节后），汉字传入日本后，借用汉字来标注日语音节，而且一个音节可用多个汉字来标注。比如说“a”这个音节，可以用与之发音接近的“安、阿、亚”等字来标注，称之为“训假名”。从出土的 7 世纪文物中可以看到当时训假名的使用形式。

1. 完全用训假名

例：法隆寺命过幡中的“者田（はた□幡）”

2. 训假名与表意汉字兼半

例：藤原宫木简中的“佐目（さめ□鮫）十五斤”

3. 训假名与表意汉字混用

¹见《广辞苑》字典。

例：天寿国曼荼罗绣帐铭中的“斯归斯麻阿米久尔意（しきしまあべくにい） 宫治天下天皇名 阿米久尔意斯波留支比里尔波乃弥己等（あめくにおしはるきひろにはのみこと）

如例举所见，在书写与阅读中训假名与表意汉字混用容易引起混乱，而且化费时间，所以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逐渐删繁就简，约定俗成，创造了用来表音的片假名和平假名。

片假名（取汉字楷书体的一部分）

例：阿→ア 伊→イ 宇→ウ 江→エ 於→オ

平假名（取汉字草书体字形）

例：安→あ 波→は 於→お 世→せ 武→む

片假名的出现早于平假名，但由于片假名字形方正，笔画多为直线，不易连绵书写，所以逐渐被书写快捷的平假名所取代，而片假名现在只用于外来语的音译，不作为书法对象，通常所说的假名书法也是指以平假名书法为代表。

最初将假名文字推向艺术表现的是平安中期的贵族女子。日本自古有“男尊女卑”的习俗，女子得不到读书的机会。但是到了平安中期，贵族中却兴起竞相培育子女才能的风气，以求将来被选入皇宫，成为皇亲国戚。其审美的要求是“字为一，琴为二，歌为三”。与汉字相比，假名文字笔画少，字数也仅为47个，所书写的内容也为传统的和歌，清和优雅。可完全用假名表现，也可以适当穿插汉字。歌与字的结合，在贵族女子的手中得到了完美的表现。假名衍生于草书，字体简洁安稳，婉转连绵；书写时行笔以中锋为主，不激不厉，妍美流畅；章法疏朗，余白也饶有趣。

我们欣赏一下假名书法作品，就会发现虽然阅读不了所书写的内容，但完全可以领略到其造形、线条、布白之美。特别是汉字、假名混合使用时，繁琐

与简洁，厚重与轻盈，紧密与疏朗、方与圆都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是因为假名文字其造型结构本身源于汉字，书写技法审美意识又与汉字书法同出一辙。

虽然个性独具，但是带给我们的视觉感受既新颖又亲近。

由汉字转化为假名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最初汉字传入日本到9世纪平假名的出现，大约经过了近400年的时间。有人说假名是空海创造的，也有人说是9世纪日本书家纪贯之所造，这好似说隶书为程邈、行书为刘德升所造一样，都是不符合文字在社会实用中的发展规律的。但是有一点，汉字字形受到了书法艺术的决定性影响，书法艺术和一些书法家在字形演变及定型使用至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因为王羲之等人所创造的草书为汉字书写开创了妍美流畅的表现，才为假名文字诞生提供了造型基础。同时，假名文字的出现，又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表现领域。

书法是依于文字的造型艺术。假名的产生，是依循文字与书法的相互发展规律而产生的。纵观书法史，我们似乎可以做这样的概括：汉字产生后，几经其变，为书法创作提供了丰富的表现形式。书法创作与实用性书写，尽管都是以汉字为母体，但在其发展演变中，是由各自的性质决定而有相异的发展规律。实用性书写，以实用为目的，也受制于使用。其总趋势是由繁至简，这显然是从便于书写阅读出发的。所以，隶书取代篆书，楷书取代隶书，乃至现代的简体字，日本的假名文字，莫不如此。这种演变轨迹，比较明晰，因为追求的目标是单纯的——便于实用、利于交流，其发展呈一元趋势。

由假名书法使我想到了简体字书法问题。我们观察一下中日或中日韩国际书法展中各国所出的作品情况，就会发现除三国共通的汉字作品以外，日方、韩方还积极地将代表本国特色、现实生活中所使用的文字（假名、韩文）的作

品参与进来，而中方作品中却看不到 13 亿人每天使用的简体字所创造的书法作品。

简体字（简化字）使用已经有 40 多年，像我们这一代人，受简体字课本的教育，在简体字的环境中成长，没有感受到任何不便，也没有影响我们去继承传统文化。简体字不被书法家采用的原因不外乎是简化字不传统，破坏了汉字原有的结构、不易表现等几点。谁能说隶书取代篆书就没有破坏汉字原有的结构，有谁能说用唐楷写《诗经》是不继承传统。至于不易表现，是因为大家都没诚心地去研习怎样表现她。

抛开文字学上的论证，就现实而言，无论现行的简体字是自然简化而来得的，还是政治需要人为简化的，简体字的优越性在中国及世界越来越得到认同，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可能性也不存在。那么，作为我们这一代的书法家们是不是就这样视之不理呢，还是发挥艺术创造力来表现她。秦人写篆、汉人写隶、唐人写楷都是书写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通用字体，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书法经典。而我们这个时代呢，有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字，却没有用代表这个时代的文字所创造的书法作品。“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古”。书法家有责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造具有时代性的作品。我们是否可以在各级的书法展中以及国际性书法交流活动中设一个简体字项目，展示一下具有时代性的汉字书法艺术风采呢？

四、以禅为中心的书风变革

假名书法产生后，日本书法出现了以汉字书法为代表的“唐样”、以假名书法为代表的“和样”两大分野。所谓“样”就是指风格。平安后期，真言宗、密教等佛教主流在平安末期开始衰落，只成为旧贵族的精神支柱。而“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思想正符合了新兴的武士阶层们所追求的那种当机

立断、直截了当的新的精神体系。到了镰仓时代（1192—1333）宗教成为政权争夺的一个工具，幕府集团积极树立禅宗来对峙旧贵族所确立的佛教信仰，随着以武士为中心的幕府开始逐渐控制政治舞台，禅宗也继佛教之后在现实生活中迅速兴起。政治、社会的变动促进了文化的变革，贵族文化的世袭学问，唯美主义受到了冲击。书法上，“唐样”、“和样”等多样化展开的同时，受禅宗思想的影响，作品中追求个性表现成为新的风气。

禅宗思维方式求“悟”，主张直觉体验。其思维方式虽难以理喻，但对艺术却大有价值。艺术本身就难以用常理去分析，那超脱自我的浮思，那一朝振奋的“顿悟”，不招而至的灵感，无不是超逸的表现。书法受悟于禅在晚唐时代已经兴起。具体表现在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草书创作中。“有人若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怀素身为僧人，“经禅之暇，颇好笔翰”，这种妙而不知感觉与张旭的“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狂放并无二致，都是追求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

这种超逸的创作思想延续到了北宋时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尚意”书风正是以禅机为基调而兴盛起来。1168年日本禅僧荣西入宋求法，之后，道元、梦窗疏石等人相继渡宋，宋朝临济宗高僧兰溪道隆、一山一宁、无学祖元等禅僧相继渡海传法，以禅宗为渠道将宋代书法带到了日本。

镰仓、室町两时代的书坛以禅僧为中心。禅宗的理论是反对偶像崇拜，不立圣心，否定圣人、权威，呵佛骂祖。在书法表现上虽以怀素，苏轼，黄庭坚，张即之等人的书法为主线，但不循规蹈矩，突出表现在个人意趣境界的创

造方面。由于偏重于意趣境界的追求，对法度方面的讲究也相应地比较轻视，这种风气打破了平安时代的以王羲之书风为代表的唯美意识。

武士阶层崇尚禅宗思想中的空彻，直接，忘我的境界，凭感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表现在作品中追求“一笔入魂”，劲爽豪快的气势，率意为之。这种表现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常说日本部分书法作品中有一股霸气、其实其风格正是武士精神表现的一种继承。

到了江户时代，日本政府以禁止基督教为名实行锁国政策，隔断了外来文化的传入。1654年，临济宗黄檗派高僧隐元隆琦来日，将明代文化传到了日本。可以这样说，隐元是继鉴真之后又一位对中日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宗教界领袖。隐元来日后，得到了江户幕府的支持，在京都赐地建寺，创立了日本黄檗宗大本山寺院。在仅80多年的时间里，宗系寺院增加到1040座，其影响势力遍布全国。隐元本人书法造诣高深，随同他一同来日的弟子木庵、即非、高泉等人也人人善书，仅隐元本人留下的墨迹有3300多件。黄檗宗一系在传播书法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1，“以笔传心”。因语言不通，在与日本弟子，信徒的问答时以笔代言，以简洁的禅语相赠回应。“随手拈来示人，声光落落蓬岛”（隐元语）。

2，对求题字，题画赞者来者不拒。

3，将携来的书画作品散布全国各宗系寺院展示。隐元来日时携带了大量明代书画作品，其中不乏有董其昌、沈周、文征明、祝允明、王宠、吴宽、黄道周、张瑞图等精品。

4，将篆刻艺术传播到日本。黄檗宗僧人独立，心越精于篆刻，并刻版翻印印学书籍，印谱。二人被称为“日本篆刻之祖”。

5, 弘扬禅宗艺术思想。隐元留下了大量的论书画诗, 提倡直观直觉, 纯然自运。强调加强字外修养, 笔意纵横, 参乎造化。其中多为与日本书画家谈艺时所即兴留下的。例举一首《示狩野安信》¹:

墨池浪溅透禅关, 融处全彰心自闲。
浓淡幻成空有色, 清虚泻落瀑无潺。
三千刹海毫端现, 百亿须弥方寸间。
信笔纵横皆妙用, 可曾描着本来颜。

明末书家张瑞图与隐元是同籍, 因手书魏忠贤生祠碑文, 入为逆案, 坐赎徒为民。回乡后潜心于禅, 与隐元交往甚密。张氏因被《明史》列为“阉党”, 其书作亦受贬低而不为人珍重。隐元来日后, 将张瑞图书作献给后水尾天皇, 并极力推举张瑞图书法。张瑞图书法在日本得以大量保留, 以及对江户时代及现代日本书法产生很大影响, 这与隐元的推举是分不开的。

隐元同其弟子木庵、即非三人在日本书法史中被称为“黄檗三笔”。由于受锁国政策的影响, 在近 160 多年间的日中文化交流中断的前提下, 黄檗宗的渡来, 为包括书法在内的江户文化带来了勃勃生机。

五、碑学书法及书学考证的兴起

日本的近代书法史是由 1880 年杨守敬的来日而拉开了帷幕。杨守敬是应清国出使日本大使何如璋之邀来日的。在当时被称为“明治书坛三巨头”的日下部鸣鹤、岩谷一六、松田雪柯前去拜访杨氏, 据后来的《鸣鹤先生丛话》记

¹ 狩野氏为当时皇室画家。

载，三人起初看不起杨氏，不认为他是个如何的大学者。其原因应为语言障碍。但是通过数次的笔谈交流，杨氏的远见卓识让三人叹服并为之倾倒。而更为重要的是杨氏带来的大量的金石拓本让三人眼界大开。“历代碑版，凡一万二三千及各种法帖”。¹

清初书坛是以赵、董为代表的帖学天下。帖学以王羲之为宗，而所呈现的，已非右军真貌；科举以楷法取仕，流弊过多，性灵全无。在这种山重水复景象之中，引来了碑学的兴起。乾隆以后，古代金石碑版、简牍和甲骨文字陆续出土，清人借助金石学和古文字学研究的成果，透过笔墨重行诠释，赋予书法新的内涵。

19世纪末，日本迎来了明治维新的社会变革。当时流行凡事都要“一新”的新思潮。而书法方面，却是呈现向传统回归的局面。由于受江户中、后期黄檗文化的强烈影响，加之儒学的渗透，“诗书画三绝”的文人修养盛行，中国风的“唐样”书法压倒“和样”。新政府的执政官僚、元勋如副岛种臣、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精于汉学，将汉字书法的“唐样”定为公文书体。明治九年，小学校开设习字课程，教科书为《千字文》的楷、行书对照本。

当时书坛执牛耳者的日下部鸣鹤等人时至今日也是被公认的汉学大家。日下等人留下的日记，完全为汉文书写，造诣之深不逊于当时的中国学者，这或许也是当初轻视杨守敬的原因之一。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一定的汉学功底，也无法与杨氏达到更深的交流。杨守敬的书学理论及大量的汉魏六朝及唐代诸碑版资料让日下等人自惭学识短见，诚心投其门下。从笔谈记录中可以看到，杨氏在日的4年间，向日下等人系统地讲述了笔法、诗文，以及篆、隶、楷的学习方法，书家修养，书法评论，碑版考证等诸学，并亲自指导临书方

¹ 《日下部鸣鹤先生小传》。

法，这些笔谈内容被整理成集，成为明治书坛的指导理论。日下、岩谷、松田等人被称为日本碑学始祖。从而，清代碑学书风在日本盛极一时，杨守敬则被尊为“现代日本书法之父”。

在杨守敬来日的30年后的1911年，又有两位硕学东渡而来，这两位就是罗振玉与王国维。

日本现代书法理论家石川九杨氏称日本书法史的形成是“中途上车，中途下车”。所谓“中途上车”，是指对中国书法的正式引入是从唐代开始；“中途下车”是指9世纪的遣唐使制度停止，以及17世纪至19世纪的锁国政策的实施阻断了向中国学习的机会。从具有3000多年的中国书法史来看，日本只是断续地吸取了一部分。那么，唐以前书法史，至为重要的汉字的演变过程、书体的形成的部分就成为空白。这也是到明治时代为止，日本书法史上，几乎没有留下篆隶作品的原因。明治初期杨守敬来日，将唐以前的汉魏六朝的书法传入日本，但严格地说，杨氏所带来的碑版拓片以六朝北碑为主。罗振玉、王国维的渡来，使日本人对汉字书法史的了解从汉魏时代向前至少引伸了1000年。

罗振玉在日本客寓7年，王国维客寓5年（中途回国月余）。在此期间，二人潜心于学术，对殷墟甲骨、古彝器铭、西陲流沙坠简等有关古文字学做了深入的考证研究（研究范围不仅限如此），留下了大量的著述。当时日本汉学界的内藤湖南、狩野君山，书画界的长尾雨山、富冈铁斋、河井荃庐等人敬慕两先生学识，常伴左右，或协助研究，或聆听指导，或问学探讨，耳濡目染，

受益匪浅。罗振玉将大量的家藏文物带到了日本，“图书长物¹百余篋，运之逾月乃竟”。这些文物留在日本，现散落于各大公、私博物馆，美术馆及研究机构，为日本学术界对于包括文字学、书法学在内的汉学文化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之外，由于当时中国国内战乱蜂起，原清宫所藏文物也大量流入日本，其中一部分由罗振玉、内藤湖南、长尾雨山等人鉴定，题跋题笺，印刷出版。罗王二人的考证方式、治学方法对以京都为中心关西学术界影响深远。继内藤等人以后，近现代的日本书学界、文字界的研究一直以关西地区为中心，其中的重镇如外山军治、中田勇次郎、白川静、杉村邦彦等人都是当年关西学派的后继，学问扎实，精于考证，这与罗王两位汉学大师奠定学术功绩是分不开的。

1998年8月9日，第20届书论研究会大会在京都召开，同时举办了“罗振玉及其友交展”，来自国内外的学者发表有关罗振玉研究的论文，观摹罗氏的藏品及作品，并参观了他当年的旧居永慕园（宸翰楼）及寓居等地。而京都的“观堂学会”也在每年5月3日王国维的忌辰举行纪念活动。两位国学大师为中日文化所创立的业绩永远会受到景仰的。

或许有些偶然，甲骨文研究的“四堂”中，竟有三人（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是在日本得以潜心研究甲骨学的。郭沫若在日本避难期间，于192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甲骨文字研究》。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他在日本活动受到限制，所以在当时与日本学术界间的交流几乎没有。但是后来他对罗振玉甲骨文研究的一些非议，的确在日本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本来，日本书法界对于以政治观点来判断艺术的观点是不重视的，像被列为所谓的“阉党”的张瑞图、“贰臣”的王铎，以及后来被批判过的李鸿章、郑孝

¹指甲骨，彝器，古印，拓本等文物。

胥、王震（一亭）等人的书法在日本一直得到珍重。但是学术研究却来不得半点虚伪。郭沫若公开指出《殷墟书契考释》及《前编》是罗振玉篡取王国维的研究成果，进而指责王国维之死是受罗氏之逼而导致。鉴于郭沫若后来在中日文化界的影响力，日本学术界部分人开始怀疑起罗氏的甲骨文研究的真实性。

其实，翻阅一下记录郭氏在日本期间生活活动的相关资料及年谱，¹就会发现，1928年他在东京上野图书馆及东洋文库借阅了罗氏的《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考释》，完全是依靠这两篇著作完成了他的《甲骨文字研究》。郭氏作为甲骨学的大家，对于罗氏甲骨文研究的功绩其实比任何人都了解。受益于斯却非议其人，或许是从某些政治立场出发而迫于无奈吧。中国历史上，有专业画家而无专业的书家，书法是文人学者自身修养的一种表现。这些人进而为政，退而为学，政治上所谓的功与过，直接影响了其作品的高低。这是不公平的评价，政治立场本身注定了是学术研究的天敌。

六、战后多样化的展开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的结果，对于日本的打击不仅是物质上，对于精神上的打击更为深刻。1948年，联合军总部（JHQ）（当时以美军为主的管制日本政府的机构）提出“国语改革方案”，要求日本废除汉字，采用片假名或罗马字。经过日方的多次争取，最终的结果是虽然停止了废除汉字的决定，但是教育汉字，当用汉字数量从以前的3500字左右制限到1850字。传统文化中的茶道、书道等凡是冠有“道”字的，均视为曾为军国主义战争协力过的剑道、柔道一样从学校教育中遭到废除，直至1951年才得以恢复。

¹可参照《郭沫若自述》，团结出版社。

战后西方文化大量涌入，写实主义表现给传统艺术带来了冲击。它导致了日本书法走向了多元化发展格局，又使书法观念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更新。表现上重视视觉形式，以汉字书法为基础，产生了以下几种样式。

汉字：为适应展厅效果，立式大作品增多。帖学系以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傅山、王铎等明清草书大家的风格为主流。碑学则以六朝碑志、汉隶为主，甲骨文、金文占比例很小。

假名：分为古典假名及现代假名。古典假名以平安时代的小字假名为主流，表现样式为手卷、折帖。现代假名重视视觉效果，借鉴明清草书的用笔，多表现在条幅大作上。

近代诗文书：内容上重视字易识，文易懂。汉字、假名混和使用。所以也称作“调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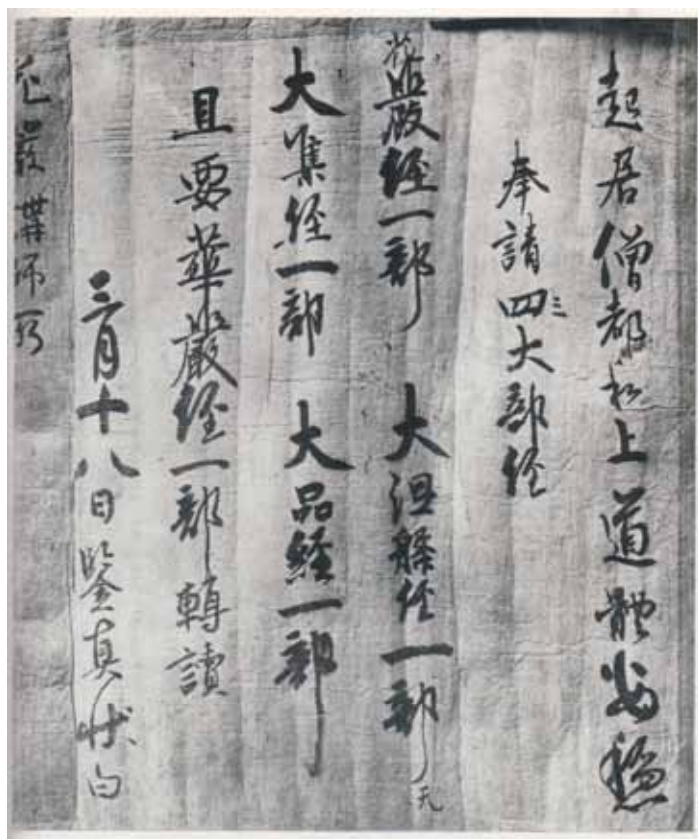
前卫书：不重视文字内容。有时以类似于符号、绘画的形式来表现。抽象性较强。

篆刻：篆刻传入日本较晚。风格上以晚清的赵之谦，徐三庚，以及近代的吴昌硕，现代的邓散木为主流。与中国篆刻相比，刻意造作之处较为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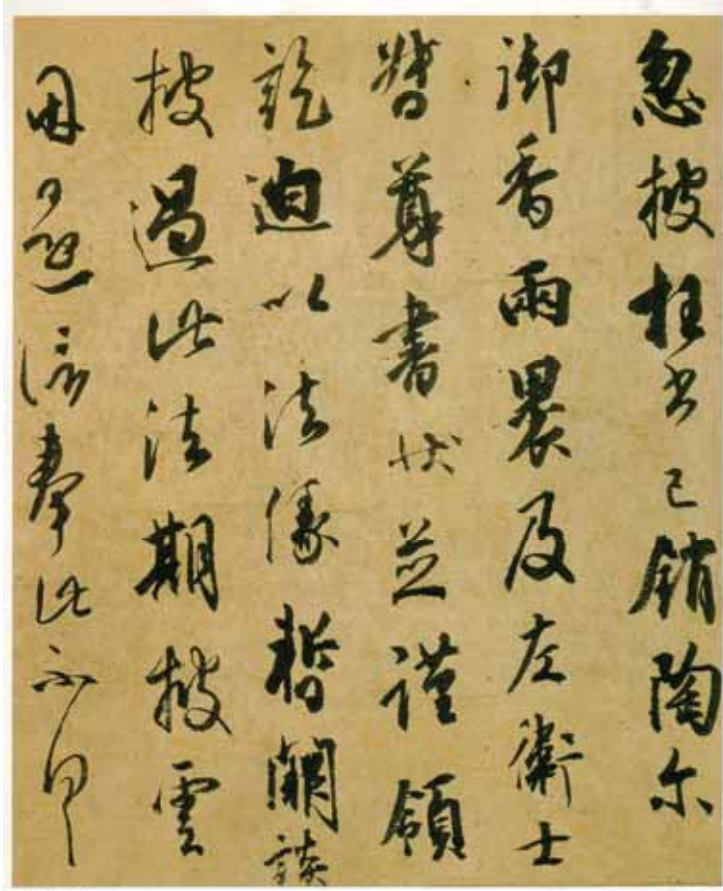
大字书：也称少字数书。以一字或二、三字为书写内容。

尾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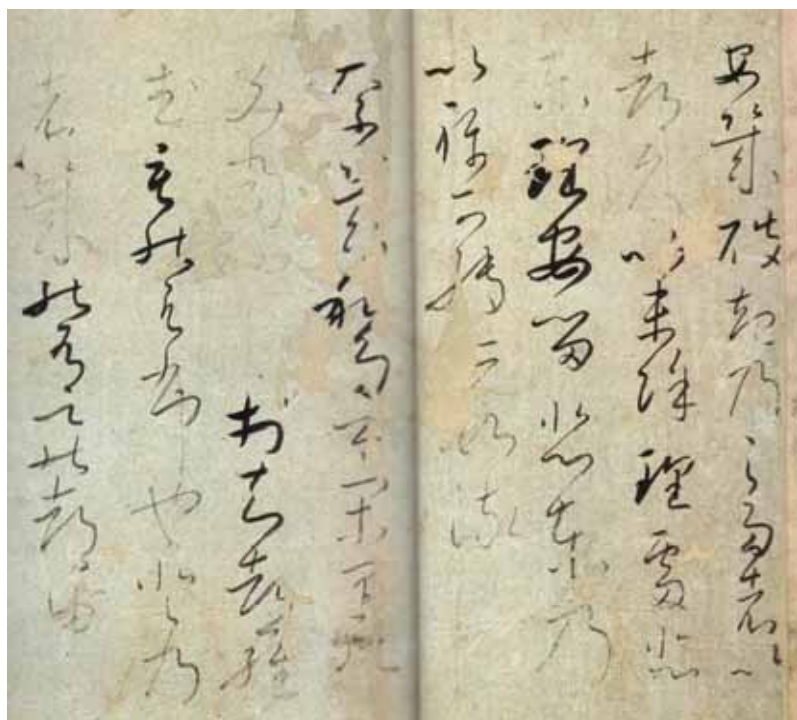
纵观 1500 多年的日本书法史的形成，是依附中国书法而发展来的。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区别于他民族的思想及思维方式，在不断吸收中国书法的同时，受各时代政治、社会、宗教的影响，形成了日本民族独有的书法体系。在汉字文化在国际社会愈来愈产生影响的今天，它对我们研究汉字文化的艺术表现力以及传播力起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鑒真的《書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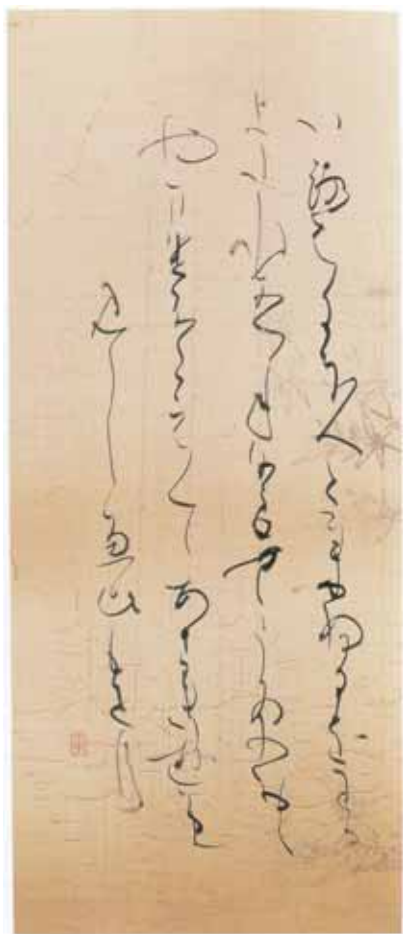
空海的《风信帖》



以汉字来表記日语发音的代表作《秋萩帖》（9世纪，平安中期）

天 てん て	太 たい た	寸 すん す	己 じ ら こ	幾 けい り り	衣 い え え	安 あん あ
止 とど と	知 ち ち	世 せい せ	左 さ さ	久 きう く	於 お お	以 い い
奈 ない な	川 かわ つ	曾 そう そ	之 し し	計 けい け	加 か か	宇 う う

平假名字体形成



古典假名作品



大字书作品（手岛右卿）



前卫书作品（井上有一）

东北名人书翰一瞥

王贵忱

我是东北铁岭人，少时从军，南下到广州，到今天差不多60年了，对家乡的事情非常模糊，也非常敏感。我虽然行伍出身，却喜欢附庸风雅，醉心文化事业，喜好收藏，但这几十年，早期作的是钱币学方面的研究，近来是岭南文化的研究，最近正作《广州大典》的顾问，对东北家乡，虽然也留心收藏东北名人书札墨迹，有许多还非常珍贵罕见，但研究很少，时常觉得惭愧。感谢大连图书馆馆长张本义先生不耻下问，这次让我来为大连的朋友们讲讲东北名人书札，使我有机会为家乡父老作点事情，我很开心。但我年龄大了，加上少年失学，讲不出什么研究成果，只好就我收藏的东西，拉杂谈些，还请各位包涵。

许多人的印象，也包括咱们东北人自己，都认为东北没有人才，尤其是开化晚，文化人才少。但据我自己收藏的东西来看，咱们东北并不是没有人才，尤其是清代中期以来，东北有许多人才，只是作品收集得少，流传得少，宣传得少，外间包括我们东北人自己不知道罢了。我自己收藏最早的是明清易代时期洪承畴和尚可喜父子的手迹，其他基本都是清代的。铁岭人最多的是画家高其佩父子兄弟，包括他父亲高天爵、兄弟高其祚等都有不少，主要是书画，最多的当然是高其佩；其次是大词人纳兰性德，他是开原人。

今天主要就我自己所收集的而言，简单谈几个人。

第一个是郑大鹤，名文焯，号叔问。作品落款，往往写高密，山东高密是郑康成的家乡，攀扯名人是旧日文人通病，其实他是铁岭人，汉军旗人。郑大

鹤是晚清民初相当有影响的文艺家，是大学者、大学问家，又是大书法家。以风雅著称，行书、楷书、篆书都好，词学更是最有名的，是晚清四大家之一。郑大鹤流传下来的真迹很多，我收藏得也不少。这里是他的的一封信，出以行草，笔力雄健，是其精品。原是我的老师、当代文献学大家潘景郑先生所藏，附有潘先生诗跋。

再一个是辽阳杨雪桥杨钟羲，他是满洲人，对清朝历史，对满洲文化的传承，做了大量工作。最著名的著作是《雪桥诗话》四集，《雪桥诗话》现在流传的初印本很少，我有全套的。杨钟羲书法真迹比较少，我有几张，其他人很少见，用他的书法做插图，许多是从我这儿借的。而且他自制笺纸，非常有名。我个人藏有十来种，用文物做图案，黄色、粉红、淡绿。差不多百年以后，流传到现在还有这么多，证明当年制作的数量相当大。林琴南、李拔可等一代名流，当时都用他印的笺纸。所以论清末民初笺纸工艺，东北也占很重要的位置。这第一封信是他写给梁鼎芬的，措词文雅，借以知其写作《雪桥诗话》之勤。第二封写给刘承干，既欲求得其所印新书，更为友人催促应得的工价，为文人物质生活史料。

第三个是吉林成多禄，他是文献学家。也是海城于省吾先生的老师，师徒关系非常好。我也算是于先生的学生，可以算是成先生的再传弟子，但很惭愧，两位先生的学问，我连门也没摸到。成多禄的书法好，又富收藏，最名贵的是米芾的《木兰辞》，民国初年影印过，最近又影印了。他对米芾研究得很到家，还因此探究过岳飞墨迹的真伪。一般人对岳飞最熟悉的就是“怒发冲冠”词和“还我山河”墨迹，其实据成先生研究，那不是岳飞写的字。因为《木兰辞》后面有岳飞的题跋。1957年在杭州，也就是宋时的临安府，发掘出一个碑，是岳飞写的字，和成先生所藏《木兰辞》后的跋是一样的，证明岳飞字学苏东坡和米芾。他的字并不是武人剑拔弩张的，而是很文静很雅，是典型

的文人字。成多禄先生的墨迹也很少。这封信是他写给于先生的，可知当日世续先生也曾称道于先生的古文，于先生古文当日颇负盛名，他自己也很珍视，曾结集为《未兆庐文稿》，今日连知道的人也很少了。

第四位是我们金县人王永江。王永江曾在张作霖手下做过奉天省长。张作霖过去都说他做土匪，依我看，这张作霖可是东北的大人才，和别的土匪不一样。你看，他肯用王永江，还很信任他，很放手，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王永江传统文化功力很深，办事能力也很强，大家公认他是东北办事的人才。我们大连图书馆馆长张本义先生就是研究他的专家，我所知道的王永江的一点情况，主要是借助张馆长的研究成果。我也曾和张馆长交换过意见，我们一致认为，现代东北地方史，王永江是第一流的人物。王永江的墨迹很少，我收藏的和我见过的一共不超过三五件。作为东北人，作为大连人，尤其是作为金州人，应该好好研究王永江，留心搜集他的墨迹和著作。这里的两封信都是写给张作霖的智囊杨宇霆的。这杨宇霆非常自负，自号邻葛，居然以诸葛武侯自诩，其实怂恿张作霖穷兵黩武，自取灭亡，毁坏了王永江呕心沥血得之不易的富强自保局面，所以张学良一继父位，即智斩其首，所谓邻葛，到头来连自己的死期都不能预知，徒贻后人笑柄。其中一封信中提到的岩间顾问，名德也，是张作霖身边的日本特务，为王永江所深信，最后竟死在他手。这两封信，一可见王永江维护国权，一可见其处分事务之不苟，都洵足珍贵。

第五位是大名鼎鼎的张汉卿张学良先生。张学良是海城人，确实是传奇人物。但一般大家似乎更看他是个花花公子，是不抵抗将军，很少有人知道，张学良还应该算是书法家。张学良的墨迹流传非常少，在东北流传的都是20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东西。我就收藏有他的书信，书法非常好，而且笺纸非常讲

究，可知他也很风雅，不是附庸风雅，是真风雅。我们想不到，以张学良这样一个人，竟然这么风雅。这两开信所用笺纸，一张是苹果绿色，一个是粉红色，精美异常。信的上款是子翁，我的朋友认为是 20 世纪初的江湖艺人，在哈尔滨沈阳唱戏的。我个人看法这信是写于 30 年代初。因为 20 年代初，张学良才 20 岁，这封信应该晚一点。另外，张学良对地方文化建设也很重视，沈阳萃升书院是他组织的，他是院长，于省吾先生作学监来负责。于先生曾和我讲，张学良对萃升书院的财政，绝对支持，可以说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还创办东北大学和其他一些地方文化事业。所以张学良先生不仅是军人，不仅在国共合作方面有很大贡献，在东北文化建设上也有很大贡献。

最后一位是罗振玉先生。我这次来，看到张本义、萧文立两位先生主编的《罗雪堂全集》出版了。这部全集，体例严谨，搜罗齐备，印得又非常精美，这不仅是东北文化的大事，也是中国文化的大事。

我是研究历史文献的，历史上的文献学家，我最尊重毛汲古毛子晋，他在传承中国文化当中做了大量工作。他是明朝私家刻书成就最大的，刻了十三经十七史六十名家词等大部头丛书，其他单刻本更多，最重要的如小许本《说文》。毛晋以后，历代传刻图书，相继不绝，但成就最大的，就是罗振玉先生了。罗振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我简单说两句。他是浙江上虞人，寄居在江苏淮安，最后终老在旅大，所以按照过去的算法，他是流寓大连的先贤。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包括搜集抢救甲骨文字、敦煌遗书、内阁大库档案、熹平石经等，编印《流沙坠简》《殷虚书契前后编》等等许多大部头书，许多工作都是在旅顺做的，应该算是我们大连的成绩。罗雪堂不仅刻书是毛晋之后第一人，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贡献也很大，真正是著作等身。但他一生心血，尽瘁于传古，他自己的著作都是家刻本，当时流传得就很少，后来基本上没有人给他重新编印过，所以学者很不容易找得到。现在我们大连能够有

人继承下来，重新整理出版，对我们中国整个文化史的传承，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将来对中国文化史贡献非浅，影响可能是没法估量的。

我和这部《罗雪堂合集》应该说也还有些缘分。一是我跟罗家有点关系，我小时候的老师和罗雪堂认识，后来我认识了他的长孙罗继祖先生。罗继祖先生过去在吉林大学，晚年定居大连，继祖先生是史学家，不同一般，史学造诣很高深，很严谨。二是我收藏雪堂先生很多墨迹，尤其是他的信札，怕是私人收藏最多的几位之一。张本义、萧文立两先生编全集，其中一部分是书信集，我就贡献出我全部的收藏，也算丰富了这部全集。所以这次来，看到全集出版，心里很欣慰。

雪堂先生不仅是了不起的学者，也是同样了不起的书法家。他的信札，一色是小行草书写的，非常有韵味，置于历代流传有序的信札精品中，一点也没有愧色。这除开天分高以外，雪堂先生一生见过的法帖碑拓无计其数，一生临摹古人名作也很多，天资、勤奋和博览，多种条件齐备一身，共同造就出这样一位杰出的书法家。这里所收的是他当年在日本京都时，写给哈同花园《艺术丛刊》主编邹安的信，关系到他传古的事迹。

最后简单讲一下，收藏研究书信有什么意义。我认为，第一，许多书信包含第一手历史资料。尤其是著名人物，包括政治军事家，包括学者，包括实业家，不论正反面人物，他们的书信，一定会和当时具体形势和具体事务有密切关系，可以补充正式史料的不足。第二，书信提供的史料，不仅具体细致，而且是最可信的。因为他是当时的原始纪录。日记也是原始纪录，但日记可以造假，自己写给自己看的吗，当时就可以造假，以后还可以陆续造假。但是书信不一样，因为书信必须寄给收信人，写的当时，写信人不能造假，因为收信人

也知道。后来更无法造假，因为信已经不在他自己手里了。第三，过去许多书信，文辞优美，书法精湛，是文学艺术品，可供后人欣赏。历史上的名帖巨迹好多都是书信，书信是传播书法艺术最重要的载体。第四，中国过去的书信，往往都写在特定的信纸上，也就是所谓笺纸。笺纸名气最大的是晚明的十竹斋，我曾研究过十竹斋，他的特点是套色，现在北京荣宝斋套色基本是继承晚明版画的。我收藏过十竹斋笺纸，分十二部分，有一种是开化纸的，清代芥子园翻刻石竹斋，也是用开化纸；还有薄宣纸的。晚明版画登峰造极，但笺纸最发达的还是在清代民国，各个阶层都用，许多达官贵人和读书人写信，都要用笺纸，许多人自己印笺纸。因此，书信还是工艺品，是研究工艺史美术史的原始资料。

摘藻扬芬连海情

——从诗歌看大连清代文人的爱国情怀

张本义

一、题解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来主讲“市民文化大讲堂”，题目是《摘藻扬芬连海情——从诗歌看清代大连文人的爱国情怀》。摘藻扬芬，用词藻赞扬和传播美好的情感和事物。“摘”，舒展，传布。“藻”，词藻。《文选·班孟坚（固）答宾戏》中有“摘藻如青华”句。“扬”，也是传播和称颂的意思，如“显扬”、“赞扬”都是这个意思。“芬”，花香之气。也借以比喻盛德和美好的情感与事物。南朝文学家鲍照有诗云：“扬芬紫烟上，垂彩绿云中”。后代常以“摘藻扬芬”的句子代表诗歌创作。因为今天讲的内容是有关清代大连文人诗歌，所以我用了“摘藻扬芬”这个词。

二、史概

下面，先将清代大连地区的历史概述一下，以便大家对此有个总的概括了解。

明清争夺辽东的战争，使大连地区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摧残，居民大批逃亡。史载，清初仅不到二万人口。清朝初年，为发展辽东经济，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曾多次下诏移民金、复地区。随着移民的增多，经济方得到了逐步的恢复和发展。但由于人口依然稀少，没能恢复行政建制。当时大连地区以及辽东南部的民事，仍依明初作法统归山东登州府管辖，所谓“金复海

盖，辽阳在外”，讲的就是这时的情况。比如金、复、盖、海州的学子，也必须跨海去山东应对各种考试。

直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才增设金州城守章京（章京：满语音译，清代军职多称章京）。雍正元年（1727年），设立金州巡检司，隶复州通判。雍正十二年（1734），升复州通判为知州，改金州巡检司为宁海县，隶奉天府。

整个清代，辽东实行满汉事务分管制，盛京下设副都统衙门（俗称旗衙门），专管军事和旗人事务，奉天府下设州、县衙署（俗称民衙门），专管钱粮和民人事务。而在金州城和复州城内还设有专管八旗各旗事务的衙门（俗称“旗旗”）。在金州地区，清代分为满洲八旗，汉军三旗和蒙古巴尔虎旗共十二旗，金州城内也都有相应的“旗旗”。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加强金州海防，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将熊岳副都统移驻金州，称金州副都统衙门，分管辽南军事，升宁海县为金州海防厅，设同知（从五品），称“金州海防分府”在金州西街，管理今大连南部的行政。

在此之前因为大连地区人烟少，所以文风微薄，文学方面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少。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年）之后，旅大地区（现在所说的大连这一概念，清代还没有）旅，指旅顺；大，指大连湾，也有称旅大金地区，即现在大连南部地区；金，指金州。也有依据战略地位而将旅大称为金州海口、大连湾海口。自鸦片战争之后，旅大地区战略地位尤为重要，到了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清廷将熊岳复州城移到金州，在金州设立了专管民事的金州厅海防同知，好比现在的副省级，属副府级，从五品。

光绪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甲午战争。日本第二军于10月24日从庄河厅的花园口登陆，进犯旅（顺）大（连湾）。11月6日，日军

攻克金州城，并进行了疯狂的屠戮，11月21日，攻占旅顺口，纵兵屠城四天三夜，被屠杀居民近二万人。

光绪二十一年（1895）清政府被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旅（顺）大（连湾）金（州）地区。后经俄、德、法三国干涉，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但1897年12月，俄国又派军舰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湾。强迫清政府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3月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5月又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强行租借了大连南部地区（划界时，清政府仅存有金州一城）。

沙俄的行径，侵犯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利益。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日本海军舰队偷袭了停泊于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给大连地区的人民群众的生产和财产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给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造成极为严重的破坏。经过将近一年的厮杀，日俄两国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俄国将旅大的租借权转让给了日本，并以长春为界，南满铁路及其权益也转让给日本。同年，清朝政府也被迫承认了该条约的全部内容，从此，旅大地区又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到清朝灭亡的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政府也无权管辖旅大事务，大连地区的人民群众一直处在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并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抗争，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大连地区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所讲的诗歌大致属于这段时期，也有部分是民国时期所作。大连自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到签订《马关条约》后割给日本，一直处于日俄统治之下，直至1911年清朝政府的垮台。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清廷对大连没有实行过有效的统治。历史背景大致如此。

三、诗珍

古人说，“诗言志，歌咏言”。又说“诗者，持也”。就是说，用诗这种形式，表达个人的情感，并以这种形式来教化民众。刚才提到，由于的人烟稀少的原因，大连地区以前留下的诗歌并不多，但到了清代，大连诗歌数以千计。这数以千计的诗歌，反映了这个历史时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文人的精神风貌，是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而爱国诗篇更是这部分精神遗产中的精华所在。

爱国主义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其中的崇祖国，重气节的爱国诗篇，闪烁出与日月同辉的光芒，成为我们民族文化遗产最壮丽的部分之一。

清初，虽然清廷实行了招民垦荒、边民入旗、从关内移民等措施，但大连地区仍然人烟稀少，道光年间，金州仍有“棒打獐狍瓢勺鱼”的传说。文风未蕃，所以诗歌留下来的比较少。现存的有《乾隆四十五年岁次庚子八月复州城工告成恭纪四律》（其一）。作者是当时复州知州陈铨。

诗云：

“ 万年天子万年城，龙虎风云不日成。
五十四层砖似铁，百千万块石为楹。
逶迤远水围东郭，缥缈崇山拱北平。
自是圣朝垂巩固，微臣何幸亦留名！”

讲得是陈铨主持修复州城的事。写了四首律诗，这是其中一首。

复州城在今瓦房店市西南约八十华里，在民国十五年（1926）之前是今瓦房店市的治城。复州城与金州城一样是辽代修建的，距今一千多年。金州城是明洪武次年所建，以砖包砌。复州城是明永乐年间所建，以砖包砌。复州城明代共修了两次，清康熙、雍正年间曾做过修砌，乾隆四十五年（1781年）时任

复州知州的陈铨督工重砌砖城，此时大致是第五次修复。陈铨之后，同治年间至光绪晚期也都做过重修。

中国文人讲“立功、立德、立言”。所谓“立功”就是事功，就如现在所讲的业绩。要为国家、为社稷、为人民做事情。主持修复复州城，是很大的事功，在辽东、在旅大历史上，在陈铨本人更是很重要的事功，所以工程告竣之后，写下了四首诗。

“万年天子万年城”这是一种祝愿。“龙虎风云不日成”写城垣气势，这是易经里的话，“龙从云，虎从风”讲的是气势。“五十四层砖似铁”讲城砖的层数，我没数过，据说是这个数目。“百千万块石为榼”，“石为榼”说的是该城为砖石结构。都是讲复州城气势。“逶迤远水围东郭”，指引来复州河水以护城郭。“缥缈崇山拱北平”，谓护卫京师北京。末联“自是圣朝垂巩固，微臣何幸亦留名”。“垂”，指边陲，本来只想为朝廷巩固边陲，但是我有幸地也留名于世！

这诗就刻在复州衙门的墙壁之上，复州衙门现在仍在，这块碑也在。我前几天还拍了照片。诗中这种自豪的感觉，到今天我们仍然能感觉到。

关于陈铨这个人，我们现在了解的还不多。但是，这件事通过这首诗了解了，文人的报国、爱国的感情也通过这首诗表达了出来。

但世界上没有“万年天子万年城”，诗中所自翊的“万年天子万年城”，一百三十年之后，所谓的“万年天子”大清国天子也垮台了，再后的几十年，“万年城”的复州城也只剩下残垣断壁了。从这点看确实沧桑之感，令人不胜感慨！

常言道，爱国必须爱家乡。清代以来旅大地区出现一大批赞颂桑梓，怀念旧园的诗歌。下面，我举一首乔有年的《旅顺怀古》为例。诗是这样的：

“矗立金山海气横，唐家曾此驻雄兵。
铭功千载鸿胪井，酣战三军牧羝城。
地接辽东留胜迹，波连齐鲁渡王京。
而今日暮散风雨，犹似当年击柝声。”

乔有年是旅顺人，他对家乡的山水充满了感情。这首诗大约写于同治十年，当时他丁忧在家，他的身份是进士，是同治元年的进士，后在北京做京官，做工部主事。同治十年丁忧在家，诗大约在这时所做。当时国艰日畸，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对大连地区、对我们国家进行侵略，虽还没有爆发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没有沦为殖民地，但从这诗中已经感受到民族危机。

“矗立金山海气横”，“金山”为旅顺黄金山。“唐家曾此驻雄兵”，“唐家”指唐朝军队，唐朝征高丽时曾驻足此处。“铭功千载鸿胪井”，“鸿胪井”指崔忻以唐朝鸿胪寺卿的身份册封渤海国时路过旅顺口凿井刻石之事。那时的唐朝是何等的气象。“酣战三军牧羝城”，“牧羝城”即旅顺牧羊城，系位于今旅顺口铁山镇的汉代城址，据说很多战役是在牧羊城中举行。“地接辽东留胜迹，波连齐鲁渡王京”，是说旅顺的地理位置，北面接连辽东，西南是齐鲁，这个地方具有护守京师北京的责任。“而今日暮散风雨，犹似当年击柝声”，能感受到风雨就要来了，在日暮的时候风雨来了，听起来象当年击柝的声音。一片忧国之情跃然纸上。

乔有年，字春溪，号古农。是旅顺双台沟人，清同治元年（1862年）进士。他诗写的好，字写得也好，大连地区许多碑，是他写的，有的是他撰文的。乔有年是大连地区传统文人的典范。这个人不仅文采很好，而且勇于任事。同治十年，金复州大水，颗粒无收。官府不报灾情，仍然收赋税，到处催

逼，民不聊生。当时旅顺，即现在营城子的韩道观到衙门去报灾情，金州副都统安图等人到旅顺视察，答应解决。但回去之后等了很久也没有解决，催租的人仍然逼迫，百姓十分困苦。在此情况下，韩道观带人到金州副都统衙门找，现在叫上访。安图施了一计，以人多为由，胡乱将案子推翻，治以咆哮公堂之罪，认为他们是打砸抢。将九人抓到大狱，严刑拷打，判了死罪。这是奇天大冤，后来告了几年都没有翻案。这时乔有年挺身而出，到北京替老百姓打官司。金州副都统派人追杀，但没有成功，在邓御史的帮助下，打赢了官司。安图被贬为校骑校，金州的官员都被撤职，安图后来郁郁而死，死后棺材被链子锁起来，表示犯了重罪。这是乔有年做的事，他是很愿意为老百姓做事的。

乔有年后来也被贬了，从工部主事贬为山东蒙沂沂水章邱做知县。在章邱，他刚到任，在阅案卷时发现，有甲乙两姓学生，被前任判了死罪，他发现疑点。此案大致是这样的：甲姓学生订乙姓学生的姐姐为妻，因为古时很早成亲，象娃娃亲，当时没见面，就是时常递些信物。有一天，乙姓学生看见甲姓拿了一个很漂亮的荷包，乙就向甲要这个荷包，并答应让姐姐给甲另绣一个。过了几日，乙的姐姐绣了一个荷包让乙拿给甲，但甲这天未上学，荷包被一个大学长看到，就抢走了。晚上大学长就拿这个荷包到乙家，跳墙而入，以荷包为信，骗乙的姐姐，冒甲的名在乙家留宿，早上出来时被乙看到，大学长就将乙击死。乙的姐姐报到官府，官府判甲和乙的姐姐通奸杀人的死罪，两人都被关到大牢。乔有年在阅卷时发现有问题，就设一计。在一屋内设一席，对其二人说明日要行刑，你们夫妻在此相聚吧，乔有年和妻子躲在隔壁偷听。开始二人并无话，到了下半夜，女子对男子说，我们姐弟俩条命都赔你了，你有什么可哭的。男子说，我没有去你家，并无杀人，你说我杀人可有证据。女子说

你肩上有黑记，男子脱衣验看，并无任何印记。乔有年在旁听到，知道有疑。第二日，乔有年让老先生带学生到其衙内，请他们吃面条。当时天气非常热，大家吃得汗流浹背，乔有年率先脱衣，大家也都将衣服脱下，罪犯显露出来，当场就将其捉拿归案，此案得以告破。由此可见乔有年断狱明卓的。后来他升任州官，但还未到任便死了，当时囊空如洗，他儿子无钱回旅顺，就将其葬于济南。

大连地区爱国主义诗篇，我再举一篇，即王永江的古风《黄龙墓》。

明末后金已据有辽东大部，而明将毛文龙只据辽东半岛南端和附近的几个岛屿，作为抗金的根据地，以牵制后金。崇祯元年（1628）袁崇焕再次督师薊辽之后，用计杀死了毛文龙。毛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投金，引后金兵攻旅顺。旅顺守将黄龙（身为登莱巡抚）力战无援自刎殉国的事。

黄龙的墓久已湮没，在俄国租借旅顺修炮台时，在黄金山下发现了这块墓碑，此事传开，因为黄龙这件事很壮烈。

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他是金州人，当时还年轻，是前清的贡生，后来以贡生的身份做的官，民国后做过奉天省长，并创办了东北大学，是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写了《黄龙墓》，当时王永江的身家性命都在日本人的指爪之下，所以他能写这首诗，确实难能。诗云：

崇焕无谋文龙死，孔耿已降馀可喜。
桓桓忠勇黄将军，追叛舟师破浪驶。
回军獐岛保南陬，转战风云暗淡愁。
力尽孤臣悬海外，从容刎颈丽譙楼。
降将招降复及尚，辽东至此无汉将。
空馀碧血化蓑弘，三百年来金山上。
墓中剑矢土花斑，碣畔弓刀血迹殷。

西海当年明社屋，而今皮岛居他族。
曼珠终失汉山河，地下忠魂应痛哭。
郁郁佳城为谁开，九原不作应心摧。
土非干净耻居此，宁使英雄骨化灰。
孔耿尚王今安在，一般茅土成荒秽。
争及将军有遗芳，姓名并恃黄龙塞。

“曼珠终失汉山河”，满州又称为曼珠，当时清人从明朝手里夺下了辽东，最后又丧失了，结果还是沦为殖民地。“地下忠魂应痛哭”，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目中，祖国还是汉人的祖国，与现在祖国的概念不一样，满族人被认做异族侵略，现在又把汉人的山河失掉，交给了日本。“土非干净耻居此，宁使英雄骨化灰”，当时碑发掘以后，骨头已经没有了，但是碑是黄龙的。碑上的字现在已经修复了，列为世界文物保护单位。这篇诗可以说是对英雄的赞颂，对孔有德等人的变节行径进行无情的鞭挞。慷慨悲凉，沉郁雄强，充满了民族正气，在当时殖民统治之下，能写出这样的诗是非常不容易的。

王永江也有很多事功。除了前面提到的之外，在日俄战争之后，俄国在大连的所有权益转到了日本的名下。到了1923年，租期到了，王永江以奉天省长的名义照会日本，要收回旅大。当时全国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收回旅大的运动。这件事日本人很忌恨王永江。后来因为与张作霖政见不合，辞职回来，死于金州。

他也是一个诗人，写了七百多首诗，有《铁龕诗钞》、《铁龕诗存》、《铁龕诗余》。

其《读陆务观诗》云：

放翁愁病一生多，归老林泉对酒歌。
垂死不忘家国恨，祥符九域望山河。

其《题八大山人龙云风虎图》诗云：

山人朱明之子孙，天崩地坼声泪吞。
一腔禾黍山河泪，尽化云烟笔墨痕。

极写对故国山河的热爱。

还有一首诗《题山海关》，这首诗是《铁瓮诗钞》的第一首，他的报国的热情全在此体现出来了，当时王永江还很年轻，还是一个秀才，他过山海关时，写了这首诗：

山绕雄城海绕山，汉秦残垒暮云间。
春风橐笔三千里，月夜题诗第一关。
剑底雄心双泪热，镜中华发几茎斑。
曹腾河汉星辰睡，万派潮声落远湾。

这首诗大气雄磅，一开句就用了两个绕字，“山绕雄城海绕山”极生动地写出了山海关的地貌，去过山海关的人知道，山海关就是这样。“汉秦残垒”，秦代的长城，汉代的长城，在暮云之中看见了。“春风橐笔三千里”我一介书生向往的是什么？用汉代张安世“橐笔”事孝武帝几十年的典故，“橐”是指小口袋，装文具。“笔”是簪笔，古时文人把笔插在头发上随时拿来用，这讲笔墨生涯。“月夜题诗第一关”夜间过的山海关题的诗。“剑底雄心双泪热”，想到这些不禁热泪盈眶。“镜中华发几茎斑”当时已经见了白发了，还没有建功立业，没有为国家做事。“曹腾河汉星辰睡”，“曹腾”，是半睡半醒，“河汉”，星星半睡半醒，可是人却没有睡，心情是“万派潮声落远湾”，“万派潮声”是大海的声音在耳盼回响。这首诗确实大气磅礴。

而最能代表大连清代文人爱国情怀的，要属有关甲午战争的三篇诗歌了。其一为王志修的《曲氏井题咏》。

这首古风记录了甲午战争中，即1894年11月6日金州城被攻破，当时金州城中曲家的七名妇女，抱着三名幼儿投井殉节的事。诗云：

“曲氏井，清且深，波光湛湛寒潭心。一家十人死一井，千秋身殒名不沉。金州曲氏世耕读，家世雍雍规范肃，堂上曾无姑恶声，入门娣姒皆贤淑。家园有井供饪烹，日月提汲泉源清，有时人影照井底，皎然古镜涵虚明。金州十月倭奴来，声历历鸣晴雷，守者登埤力督战，援兵不至城垣摧。非我族类心必异，人人闺闼无趋避，多少朱门易服逃，谁知仓猝成名义。曲氏门内皆伯姬，守身赴井甘如饴，节妇殉名女殉母，伤心各抱怀中儿！我来金州理案牍，夜夜夜深闻鬼哭，晓起登城询土人，共指井边曲氏屋。土已葬荒井并存，门闾未表哀贞魂，一时死义已足尊，争如节烈成一门。吁嗟乎，巾帼大义愧官府，欲荐寒泉应不吐，城南崔井唐题名，合于此井同千古！”

这首诗把曲氏众妇女塞乎天地的全部正气写出来了，极尽歌颂。

“曲氏井”位于金州古城的西南角，城墙底下。“金州曲氏世耕读”曲氏家族世代是种地的，或读书的。“堂上曾无姑恶声，入门娣姒皆贤淑”，家里上下很和气。家里有井，用于烹饪，妇女天天去打水。井很清，有时人影照到井底，皎然不变，像面镜子一样。“金州十月倭奴来”指阴历十月，阳历是十一月六日。“倭奴”指日本人来了，“砲声历历鸣晴雷，”炮声像打雷一样。“守者登埤力督战”，“埤”是城墙，当时金州副都统连顺，金州厅海防同知唐宝庆都带领着兵上城墙守城。“海防援兵不至城垣摧”当时没有援兵，

所以攻破了。“非我族类心必异，入人闺闼无趋避”，指日本，是没有礼仪的，直接就进入妇女的房间，强暴妇女。“多少朱门易服逃”，有钱的人都跑了。“谁知仓猝成名义”，旗人妇女不裹脚，经得起长徒跋涉，当时旗人妇女跟男人都跑了，但是汉人的妇女都是包着小脚，根本没法走路，更何况当时曲氏一门中，婆婆年岁已高，这些年轻的不走，就跟着婆婆一块去死，婆婆投井，其余的女子抱着孩子一块投井。“曲氏门内皆伯姬”，“伯姬”是烈女。“守身赴井甘如饴”，“饴”是糖。“节妇殉名女殉母，伤心各抱怀中儿！”最伤心的是怀中还抱着孩子。“我来金州理案牍”，三个月之后到金州来做的金州海防同知。“夜夜夜深闻鬼哭”，因为金州海防衙门与曲氏井仅一墙之隔，每天晚上听到鬼哭的声音。其实不是鬼哭，是人哭，家里女人死光了。

“晓起登城询土人”，早上登城问老百姓。“共指井边曲氏屋”大家告诉了他这件事。“抔土已葬荒井存”，“抔土”一抔土，曲氏妇女都已经葬了，但荒井还存在。“门闾未表哀贞魂”，可是这个事还没有上报朝廷，还没有得到表彰，这些妇女们应该感到哀伤。“一时死义已足尊，争如节烈成一门”一门节烈非常不容易，一时为义而死已经是让人尊敬了，一门为义而死更是不容易。

“吁嗟乎，巾幗大义愧官府”，妇女大义凛然的气概让我们这些做官的都感到惭愧。“欲荐寒泉应不吐”，当时他亲率金州海防官员到曲氏井边吊唁、献祭品。我献了祭品给你们，地下的妇女，你们应该接受。“城南崔井唐题名”，“崔井”指旅顺的鸿胪井，唐朝的题名是很有名的。“合于此井同千古！”，这口井也应与鸿胪井一样万古流芳。

这口井后来被称为“曲氏井”，现在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诗的作者王志修，为同治年间的举人，山东诸城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甲午战后，由于“三国干涉还辽”，清政府收回了旅大。王志修是清政府接受金州后上任的金州厅海防同知。上任后的第三天，即在城内西街海防同知衙门内的“连樁簃”中写下了这首长诗，曲氏一门妇女的节烈事迹，也赖此诗得以流传。王志修在任时间不长，但为金州父老留下了永远的纪念。其中主要是对宣传和表彰曲氏众女子悲壮事迹上所做的工作：上任之初，即将曲氏的事迹写成奏折上报旌表，题写长诗“乞和于世”，广为宣传，亲率金州海防分府官员到曲氏门内吊唁等。这些，对于晚清的一个从五品大员，确乎难能。在这首诗中，王志修将曲氏妇女们视死如归的凛然气节，与达官贵人们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易服出逃的卑劣行径加以对比，发出了“巾帼大义愧官府”的浩叹，表现了其爱国的情怀。讲到这儿，我想起晚唐诗人司空徒有首诗“不朽才消一句诗”，想不朽只需要一句诗，有的诗人只是一句，一首就可以流名千古。王志修，因为这一首《曲氏井题咏》，金州人、大连人永远忘不了他。

第二篇说一下张之汉的古风《闫生笔歌》。

也是讲甲午战争的，甲午战争中日军6日攻破金州，7日攻破大连湾，紧接着向旅顺进攻。但不熟悉路，找人带路，在南关岭抓到了塾师闫世开，他是个秀才，闫世开誓死不带路。后来日本人把他杀了，剖了心腹。日本人为什么这么恨他？虽然言语不通，但是文通，闫世开骂敌人，敌人听不懂，后来闫世开写了满纸忠义之词，其中有一句叫“宁死不做狗奴”，坚决不给带路，后来日本人就杀了他。

张之汉三个月听了这件事之后，写了这首诗，诗云：

“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奋椎难击博浪沙，抗节直比胡天雪。非椎非节三寸毫，竟凭兔颖探虎穴。千军直扫风雨惊，披肝沥血凝成铁。饮刃宁惜将军头，振笔直代常山舌。头可断、舌可抉，刃可蹈，笔可折，凛凛生气终不灭，吁嗟闫生古义烈。闫生著籍辽海东，心系家国身蒿蓬。策卫喜读剑侠传，斩蛇恨无隆公。海国无端腾战雾，天堑鸭江競飞渡。席卷已下金州城，毡纒更觅阴平路。识途马老用闫生，冲冠义愤岂能平。直将易水悲歌气，激作渔阳挝鼓声。闫生发冲敌目笑，不解华言舌空掉，抽笔愤书忠义词，飞雪刀光进出鞘。刀边骂敌怒裂眦，掷笔甘就刀头死。心肝攫出泣鬼神，淋漓血染山凹紫。呜呼！皇朝圣武开神皋，鼓鼙将帅思贤劳。九连城头将星落，颓军断后谁盘。东南铜柱沉江涛，太阿倒柄凭人操，十万横磨岂不利，一割无用同铅刀。胡为乎！刀围大帐笋锋密，挺然独立闫生笔！”

诗歌颂闫世开的这支笔，“抽笔愤书忠义词，飞雪刀光进出鞘”，把闫世开的笔歌颂做像刀一样。“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讲气节，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的做法一样。在秦讲张良，张良在白浪沙用铁锤刺秦王。在汉讲苏武，苏武牧羊北海十九年，不亏大节，被匈奴抓被住十九年让他投降，他没有投降。“奋椎难击博浪沙，抗节直比胡天雪”，“抗节”，举着节，“节”是古时出使时帐上加的矛。匈奴抓苏武在北海牧羊十九年一直举着节，这个节一直可以举到和胡天那么高。“非椎非节三寸毫”，闫世开就有三寸的毫。“竟凭兔颖探虎穴”，“兔颖”指兔毫，就凭这支笔探虎穴。“千军直扫风雨惊”，这支笔可以横扫千军。“披肝沥血凝成铁”，肝、血变成了铁打这支笔。“饮刃宁惜将军头，振笔直代常山舌”。这点大家都知道，“常山舌”讲，安禄山叛变时严泉卿被抓，他大骂安禄山，舌头割掉了仍然骂。“将军头”指颜。当时他是三国时刘章手下的将军。他被俘后，劝他投降，他说没有投降将军，只有断头将军，所以称颜将军头。“闫生著籍辽海东”，他是旗

人，是汉军旗人。是南关岭三道沟的人。“心系家国身蒿蓬”虽然身很低微，但心系着国家。“策卫喜读剑侠传”讲一种豪气，“策卫”骑驴，表明身份低微，但充满豪情。“斩蛇恨无隆準公”，“隆準公”指刘邦，无处报国，徐有一腔豪气。“海国无端腾战雾”，“海国”指日本，无端挑起战争，这首诗用典很多，“战雾”指黄帝战蚩尤。“天堑鸭江競飞渡”，讲战争，日军从鸭绿江打进来了，“席卷已下金州城，毡縋更觅阴平路”，“毡縋”，用布毛毡裹着从上面下来，“阴平”小路，讲日本人用这种方法打进了金州。“路识途马老用闫生”，管仲攻敌国回途迷路，用老马带路而归的事。“冲冠义愤岂能平”，藺相如出使秦国，手拿和氏璧怒发冲冠。“直将易水悲歌气，激作渔阳挝鼓声”，“易水”，荆轲刺秦王，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渔阳，倪衡击鼓骂曹的故事。“皇朝圣武开神皋”，“神皋”指土地，圣武的皇帝开疆拓土。“鼓鞞将帅思贤劳”，此为礼记中的话，“听鼓鞞之声则思将帅之尘”听到鼓声想到将帅们的劳苦。“九连城头将星落”，说得是薛宝贵，但他是在平壤而不是在九连城战死。“颓军断后谁盘稍”，“稍”长矛，在上面的丈八长矛。兵败如山倒，有谁断后？“东南铜柱沉江涛”，马援在济南立了铜柱就如地界。“太阿倒柄凭人操”，把剑把给别人，凭人宰割。“十万横磨岂不利”，“横磨”是横磨剑，难道十万精兵、十万横磨剑不利么？“一割无用同铅刀”，像铅做的刀一样。“胡为乎！刀围大帐笋锋密，挺然独立闫生笔！”歌颂了闫世开凛然大义的爱国情怀。

这首长诗的作者张之汉，字仙舫，沈阳人，清末贡生。这首诗作于光绪乙未（1895）岁首，距闫世开就义仅数月。诗以文天祥《正气歌》的笔法，以强

烈的爱国情怀，歌颂了闫生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成为激励人们民族情感的武器。而闫世开的事迹，也是赖以此诗得以流传至今。

张之汉诗书画皆精，是当时的辽东名士，他的诗很多，爱国诗篇很多。在此就不举例了。

第三篇，《吊忠魂》，作者孙忠亮，号似楼，前清贡生，山东郯城人。

讲王书翰使单骑乞援被日军俘虏壮烈牺牲的事迹。诗是四首绝句，这里咱们看两首。

（其一）

海疆要塞是金门，捍卫辽东固本根。
单骑乞援非得己，奋身不惜走山村。”

（其四）

李家屯外土城村，忠骨长埋有旧痕。
野老自能谈往事，不劳史笔表忠魂。

甲午战争日军登陆之后，过了皮子窝，继续往南走。东面皮口，现在金皮路，北面哈大路，复州大道，日军已经全部封锁了。在这种情况下金州危机，但大连的驻兵很多，各路观望，没有统领。当时金州副都统连顺和正定镇总兵徐邦道坚决抗日，但兵很少，一边做准备，一边报李鸿章。李鸿章派大同镇总兵程之伟从营口南下施援，但程到了复州便滞留观望不前。如果继续进军就能形成前后夹击日军的形势，但程就是停滞不前。在此情况下连顺派了身边的记室，现在叫书记官、文书，贴身幕僚单骑到复州催导。在当时日军封锁的情况下，这个人要有胆识，要可靠，要会骑马，要年轻，还须懂军族的事情，要有证明，要怀有书信。在11月4日从金州出发，沿复州大道往北走，走到金州三十里堡之间时，遇到了敌军，他转而向东走，在今天土城子附近被日军追上俘虏了。日军逼问他军情，他只字不吐，只说我叫王清福，我是个当兵的。因

为当时他外面穿着百姓的衣服，里面是清军的衣服。这是隐瞒不了的。他说我没什么说的，快杀了我，这是日本记者龟井兹明在日记中写的，照片也是龟井兹明照的。当时王清福 24 岁，正当日军劝降之时，他乘隙用头撞石而死，但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姓名。前几年日本出了龟井兹明的日记，才知道他叫王清福，复州人。这几年金州都传叫王记室、王书翰使，因为他带着书信，壮烈牺牲。关于此事在六十年代，前清进士陈云浩也写《光绪甲午中日之战，金州副都统幕王书翰使死甚烈，作长歌以记之》，孙宝田先生写的《金州副都统幕王君死难记》都是纪念这事。

后来孙似楼在六十年代又写了四首诗，其中有这么两首：

为国捐躯近百年，英风宛在始无前。从今三字 永与金州义共存。

可怜身后不知名，太岳迎头较重轻，多少将军同为死，引军烈烈向

诗表达了对于他没有留下姓名的感慨，现在既然知道他叫什么名字，我们应该大力宣传。关于王书翰使，我曾写过文章，我根据日本随军记者的日记、日人的相关资料和《李鸿章全集》中有关甲午金州保卫战的有关电文，撰写了文章加以详细的考证过当时的过程，应该就是这个历史。

1896 年“三国干涉还辽”，1898 年签订了大连租地条约《旅大租地条约》，俄国强占旅大，当时施行非常残酷的高压统治，抢地、抓人、无恶不作。当时旅大租给了俄人，只有金州这一孤城还归属清政府管辖，城外都是沙俄的，金州厅海防同知涂景涛，等清朝官员仍在城内办公。涂景涛字稚衡，湖南长沙人，清光绪间举人，曾任奉天承德（今沈阳）知县，后署金州厅。他很爱国，是当时的清政府的划界委员之一，在划界时沙俄肆意扩张，涂景涛万分愤怒，并采取各种办法与沙俄进行据理力争。如在勘定旅大北界至皮子窝时，

他与附近的村民秘密往来，对沙俄武装施压。当时在城外，沙俄疯狂地抓人掠地，群众对这种情况不理解，甚至传闻，这都是“土地佬”（当时金州人送给涂景涛的外号）和俄人勾结造成的，以至出现过围攻涂景涛轿子的事件。这皆使他万分痛苦，遂写下了《戊戌中夏十五日偕山阴茹利宾游胜水寺》的长诗。诗云：

“云根高障疑无缝，偶被神斤辟奇洞。洞天天半绝尘踪，谁压巉岈起层栋？杰阁耸出苍松颠。上有幽僧伴鹤眠。线路穿林转深峭，盘空蹑翠寻飞仙。学仙当结芳尊友，安得蓬莱太平酒。尽倾东海入杯中，醉乡直到无何有。酒酣拔剑叹汪洋，长鲸未斩心忧惶。菩萨低眉不我顾，曾经阅历千沧桑。青山青青不改色，我欲往山犹不得。题名聊志游山缘，石上长留数行墨。”

到过观音阁的人都知道，那是在一个大山洞底下，“谁压巉岈起层栋”大山底下的样子。前八句讲形势，讲观音阁这边的地势是怎样巍巍怎样壮丽。后面讲“线路穿林转深峭，盘空蹑翠寻飞仙。学仙当结芳尊友，”尊，酒杯，学仙就要喝酒，“安得蓬莱太平酒”但是到哪里找蓬莱仙境的太平酒呀。“尽倾东海入杯中，醉乡直到无何有”如果有的话，我把东海都倒入杯中，让我醉到什么也不知才好呢。“无何有”很愤懑、很痛苦到了极点了。“酒酣拔剑叹汪洋”，喝酒喝到了酣畅之处拔出剑来，可是看着剑我望洋兴叹。“长鲸未斩心忧惶”没法子减除沙俄。“菩萨低眉不我顾，曾经阅历千沧桑”，观音阁主要是南阁的菩萨，人们都说观音阁很灵，都到那里许愿，到现在还在传说灵。但是看过沧桑之变的菩萨，大慈大悲的菩萨今天却不看顾我，不管我现在的心情。“青山青青不改色，我欲往山犹不得。题名聊志游山缘，石上长留数行墨。”石碑在文革中被砸了，现在只剩下一小块，但拓片还有。

沙俄在占领旅大之后，对农民催租逼粮，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1898年腊月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爆发了由马成魁领导的反俄抗捐武装斗争。从今天金

州和普兰店交界处的牌坊到大刘家一带六会民众参加的大规模的斗争，这次斗争在清际外交史料中都有记载。当时参与这场斗争的，就有贡生王天阶。

王天阶他是一个贡生，他怎么会参加农民的斗争呢？这说明他很有气节。王天阶，字仲升，号南溪，金州城北沙家屯人（今杏树屯镇境），光绪十四年（1888）年优贡，精于书法，赴奉天闱试之时，考官在其卷子上批“字压三省”，有《浪吟诗稿》存世。后来一直在金州、沈阳等地教书。因为他带领斗争，俄军把他抓起来，扬言要把他杀了，后来在清朝总署与俄国驻华公使的交涉下，通过外交手段，才释放。王天阶这个人境界很高，很有气节的人。他有七律《读时务书文有感》一诗云：

地球处处起纷争，四海狂澜何日平。
细阅邦交声泪下，纵观世变梦魂惊。
强邻环视威如虎，敌国并吞渴似鲸。
火及栋梁悲燕雀，高呼唤醒是先生。

此诗系王天阶在读时务书文的感想。诗中的“先生”是何人，因诗稿的原题目后人做了涂改而难以考证。但南溪先生忧心时局的爱国激情仍跃然纸上。

王天阶还有一首七律，意境很高，而且表现他爱国爱家的情怀。是《九日登金州城楼》，“九日”指重九，重阳节。诗是这样：

荆棘丛生雉堞荒，登临满目感沧桑。
人烟萧索经兵燹，衙署倾颓作市场。
几树寒鸦秋色老，一声孤雁客心伤。
苍凉晚景凭谁赏，枫叶飞红菊绽黄。

写了重阳之日登临残败的金州城楼感想。曾几何时，金州是辽东重镇，城高池深，但经过两次战争，已经是荆棘丛生，城垣也都破败了，人烟萧瑟，经过兵洗，金州人烟萧瑟，这是战争之后的事，1900年俄国趁庚子之乱、趁义和团运动之后，强行占领了金州，把金州同知马宗平和金州副都统阎福生都抓起来了。诗是在这之后写的，但还是清朝的时代。海防同知的衙署做了市场。

“几树寒鸦秋色晚，一声孤雁客心伤”，当时他在金州教学，秋风萧瑟。“苍凉晚景凭谁赏，枫叶飞红菊绽黄”更加使作客于此的诗人备感孤凉心伤。表现了极强烈的爱国情怀。这首诗确实可以与唐诗比，与许浑的诗相比。

清末明初还有一个人叫李义田，字在旃，号姜隐，金州城内旅顺双台沟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举人，是非常著名的爱国诗人，写了很多爱国诗篇，其中有一首叫《金城杂咏》，诗是这样：

廨舍荒凉十二旗，
当年枉改汉官仪，
嫁衣依样为人作，
警眼兴亡一局棋。

看到了金州十二旗，金州有十二旗，满州八旗，汉军三旗，蒙古巴儿虎一旗，共十二旗。每一旗都有衙门，可十二旗的衙门都荒废了，想到了满人白白改变汉人的仪规，白白拿下汉人的天下。“嫁衣依样为人作”到了今天，告诉日本人，你们还在走这步棋，还是这样做么？警告占据旅大的侵略者：不要重蹈满清王朝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覆辙，以异族来统治，别忘了“警眼兴亡一局棋”这只是一局棋。我说这是伟大的预言，他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必然灭亡，他是很有气节的。

还有《金城杂感》和《金城访友归途口占》，他在金州和王永江这些老先生他们很好，经常去，每次从金州回来，都写金州的诗，因为金州当时在日本

统治之下，感慨很多。其中《金城访友归途口占》，是归途时路过大连所作的。其二云：

洋场楼阁矗云霄，
往迹何须溯旧潮。
斗大孤城春孰主，
风光淡荡水西桥。

其三云：

车行不厌故迟迟，
一路窗栏纵眺宜。
海色山光都入目，
故乡风景系人思。

又有《金城杂感》其三云：

斗大孤城傍海滨，
风光犹带古时春。
最怜夹道依依柳，
一样迎人复送人。

诗讲得是金州的柳树。柳树不知道亡国之恨，就像“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柳树不知道亡国恨，依然迎人送人，这首诗寓意深刻。直接警告殖民统治者，提醒世人。

李义田在清末民初是大连诗坛执牛耳者，是领袖人物。他有首诗叫《岁暮遣怀》，表现了他在日本高压之下的心情。因为他处处表现爱国情怀，所以日本人对他很忌恨，后来有人说他佯狂，实际是自保。有诗云：

转毂年华将又阑，几多情绪触毫端。
风听海面潮声大，雪积山头高处寒。
世事真如麻更乱，愁怀未信酒能宽。
去曷来打雪尘心净，堆案群书久不观。

“去曷来打雪尘心净”，怎么能把雪打来洗洗心绪，“堆案群书久不观”堆到案头的书很长时间没有心思看了。“风听海面潮声大“压力很大。”雪积山头高处寒”恐怖的气氛。“世事真如麻更乱，愁怀未信酒能宽”酒都消不了的愁，什么愁？家国的愁。所以日本人能不忘恨他么，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害死的。

同时期还有个人，阎宝琛。说到清末大连地区的文人，不能不提阎宝琛。他字献廷，金州人，光绪甲午（1894年）科举人，曾参加过“公车上书”，这人很有气节。在日本统治期间，强力推行奴化教育，妄图使大连人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就和其弟阎贵琛（金州厅学诸生），在其家中开办“国学义塾”，免费教授四书五经和蒙学经典，年复一年，日本人对他恨之入骨，但对他没有办法，因为有功名，地方有影响力。后来这些老先生倡修大连地方志。但日本人横加阻挠，没有写成，现在只留下《金州志篆修稿》，实际上就是大连地方志。因为金州直到清末明初还是大连的行政中心。其中有一次他到满铁大连图书馆来查地方资料，归途遇雨，在车上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文字水平很高，这首七律是《连滨车行遇雨作》，诗云：

乘兴轻车载雨行，连滨飘渺接蓬瀛。
愿将一邑留真录，岂为千秋博盛名。
人物至今谁健在，山川终古是多情。
董狐已逝温公邈，回首沧桑百感生！

这是说让后人说，王永江的诗，此老诗大有诗在，“董狐已逝温公邈，回首沧桑百感生”董狐是春秋时代的晋国的史官，他秉笔持书赵盾弑灵王，是史官的典范。但董狐已经很遥远了。温公指司马温公，也已经很遥远了。

“人物至今谁健在，山川终古是多情”，这句话很有哲理，只有山川，只有祖国、家乡的山河永远不变。

四、结语

爱国诗清朝中后期以来很多，几千首诗中有爱国诗篇占很大比重。我总结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爱国诗，因为道光之后大连人烟兴盛起来，到了近代，尤其光绪二十年之后到一九一一年期间，再往后推由民国至1945年，大连地区一直处于外敌的侵略、略夺、占领之下。大连的文人的爱国热情，很多都在诗中体现，表现爱国家、爱家乡的情怀。这时期的诗大多是变徵之声，徵是五声中宫、商、角、徵、羽的一声，是高亢的音调。今天所举的诗大多是高亢的诗，都有爱国的热情，都发出国破家亡的感叹，歌颂保家卫国的情怀。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这一时期的诗人大多是永于任事，敢于挺身而出的士子。他们不是坐以论道，而是亲身实践，为国家做事的文人士子。就如刚才提到的乔有年、陈铨。陈铨当时是处于乾隆盛世，表现的是盛世的气象，但是他想主持一个事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到后来讲的乔有年，能挺身而出为老百姓办事。到后来的王书翰使、阎世开、王志修，是从五品大员，副省级领导，能带领手下官员到小民家吊唁，写了这么一首诗起和于世，非常不容易，还有涂景涛、刘心田、王天阶、张之汉、王永江、李义田、阎宝琛等人不仅是能写诗，而且大有事功在，都能做有益于家国的事情。

第三个特点，“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由于清朝后期国家沦落，遭受苦难，反映在诗篇上，大都是继承了老杜的诗风。写法上大都苍凉、沉郁、雄强，所以才能感人至深，我们读了至今都受感动。

第四个特点，这些诗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水平非常之高，如《曲氏井题咏》，这首古风甚至可与唐诗相比。还有王永江的《夜过山海关》、王天阶的《九日登金州城楼》等艺术水平都非常高。有些人说大连没有文化，这是对大连的历史不了解。大连地区清代文人的文学水平非常高，留下了大量的，一流的诗篇。说明了，我们大连自清朝以来文人士子有一种爱国、爱家的传统，对此，我们应该感到自豪，而且加以大力弘扬。当然，大多数诗篇现在还散佚，尚未整理，这都需要我们抓紧整理和继承。我们谈打造文化大连，就必须把我们的传统重拾回来，这样我们才能有自豪感，才会有信心，增加城市积淀，提高城市的地位。

第五点，我们要发扬诗教的传统，这些诗表现爱国情怀，至今读起来都感人至深。对我们尤其是青少年有很大的爱国教育。我们中国是重视诗教的国家，诗其实就是歌词。我们要利用诗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加强爱国、爱家的教育。

我要说的就是这些，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来做今天我演讲的一个总结，表示我的心情。“摘藻扬芬连海情，赫山碧水荡高风。先贤一掬乡邦泪，直到如今耀眼明。”谢谢大家！

日本人的心与佛教

——佛教对日本思想文化的影响

[日]上山大峻 李济沧 译

一、古代日本与中国

日本在公元 6 世纪左右,正式形成了国家。我的同事木田知生教授在上次的讲演中,对此有过介绍。在国家形成的初期,主要是从中国输入了大量文化,如文字、典籍、官僚制度、建筑技术等。从制度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都有绝对性的影响。在整个日本文化与国家的形成过程当中,如果没有中国文化作为基础,那么日本这个国家也就不会成立。从这一点来说,日本从中国受到了莫大的恩惠。

在众多的文化中,对日本人的精神形成有着巨大影响的是佛教与儒家思想。我本人即是日本佛教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的僧侣,也是研究敦煌出土佛教资料的佛学研究者,所以今天主要想以佛教为中心,与各位谈谈佛教思想、文化是如何影响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价值意识,又是如何在当代日本人的精神结构中发挥作用的?

二、圣德太子与佛教兴隆

大家都知道,佛教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它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后，又从中国传到了朝鲜半岛与日本。根据日本最早的一部史书《日本书纪》记载，大约在公元 538 年左右，百济国王圣明王将一些佛像和佛教经卷带来日本，也就是说，佛教最初并非直接传自中国。538 年以后，日本人建设了自己的国家，开始直接从中国输入佛教。说到日本接受佛教的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圣德太子（574—622）。他并不是天皇，而是摄政，也就是专门辅佐天皇的人物。在日本国家的形成以及将佛教定为国教的过程中，圣德太子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所以今天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他。

圣德太子在日本文化与制度的建设上，贡献极大。他派遣隋使到中国，从中国输入最先进的文化和制度，使还处于未开化状态的日本成为一个国家，提高了国际地位。比如当时日本还没有文字，于是他便从中国引进了文字。此外还有律令制度，也是圣德太子将其导入日本，创建了日本的官位和官僚制度，等等。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主要想谈谈圣德太子与佛教的关系。

圣德太子不但学习佛教，还研究佛教，撰有《法华义疏》、《维摩经义疏》、《胜鬘经义疏》等著作。由于当时日本的技术水平还不够，所以就从中国和朝鲜请来了许多工匠，在全国大修寺院。日本最古老的一座寺院是奈良的法隆寺，据说便是圣德太子请人修建的。法隆寺的建筑物样式、使用的材料历经 1400 年，没有一点变化。它有一座五重塔，里面据说藏有释迦牟尼的佛骨。塔的屋檐的形状是平移的，这与现在中国寺院建筑物的屋檐有所不同。中国寺院的屋檐一般是向上翘起，而日本则是自然的下滑，这点不同是非常显著的。大家如果有机会去日本观光，请一定去法隆寺看看。

这张据说是圣德太子年轻时的一幅肖像画。由于圣德太子在佛教上的贡献，所以尽管日本有很多宗派，有很多寺院，但几乎所有的宗派对圣德

太子都非常崇敬，这幅画像，一般寺院都可以见到他的画像。我是僧人，也有自己的寺院。在我的寺院里，就有一幅圣德太子的画像。这张是圣德太子成人后的画像。日本纸币，面额最大的是一万圆。旧版一万圆纸币上，印的就是圣德太子的头像。现在用的是新版，上面印的是福泽谕吉（1835—1901）。

到公元 594 年，圣德太子把佛教定为国教，让日本人将自己的伦理道德建立在佛教之上，这是他的一项功绩。由于在佛教、文化制度、官僚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巨大贡献，使圣德太子成为日本人最为尊敬的历史人物。

在简单地介绍了圣德太子以后，下面我想谈一下日本是怎样从中国引进佛教文化的。这里想举两个和我的研究有关的例子。首先这是一件在位于丝绸之路上的吐鲁番发现的锦缎残片，发现当时，是遮盖在一具木乃伊脸上的。而这一件则是在唐代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现收藏于法隆寺的“四骑狮子狩文锦”锦缎，形状比较完整。大家可以看到，分别出自两个地方的绵缎，在图象和花纹上却非常相似。日本有位从事染织业的专家对两件锦缎进行比较后，认为完全是同一个人用同一种技法制做的。因为这位专家是搞织染的，根据他的经验，好比每个人的指纹都不相同，这两件锦缎也只有同一个人才能织出，如果换了别人，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他认为这是同一个人制做的两幅锦缎。

这幅绵缎的图像非常对称，上面还织有汉字“花树对鹿”，根据这位专家的判断，既有汉字，又强调了对称，在当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技术，而这项技术，只有在中国的长安才能见到。同一个人在长安的作坊里制

做的锦缎，一件在吐鲁番，另一件却在日本飞鸟时期(6世纪末—8世纪初)的法隆寺，简直是相隔万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对此，有的历史研究者推想，罩在木乃伊头上的锦缎残片，可能是当时建立在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450—640)国王麴伯雅从朝贡的长安带回高昌的(609)。可是另外一幅又是怎么传到日本去的呢？当时日本曾派遣好几位遣隋使访问中国的隋朝，其中比较有名的一位叫小野妹子(607、609年两次遣隋)，于是有学者便推测，或许是小野妹子把这件锦缎带回了日本。

两幅锦缎，一件由麴伯雅带回高昌国，另一件则由小野妹子带去日本，作出这样的判断，是有理由的。大家看这幅法隆寺藏锦缎，图像上织有四匹马，在骑马者中有一人头戴皇冠。这个皇冠很特别，不是中国的。根据史料判断，戴皇冠的人是位于现在伊朗地区的一个古代王朝的国王，翻译成中文叫珂思路二世，在位时期是公元589年到628年。上面的锦缎就是专门为珂思路二世制做的。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伊朗人并没有制做这种锦缎的技术，所以便派人到中国，请长安的工匠完成了上述锦缎，时间大约在6世纪末7世纪初，刚好与麴伯雅朝贡及小野妹子至长安的时期一致。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当时西亚、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发达的。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这张照片是刚才介绍的法隆寺的一幅壁画，虽然曾经被火烧过一次，但还是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画的中央是释迦牟尼，两旁是观音。

现在大家看的是敦煌千佛洞第220号洞窟的壁画。最早发现这幅壁画的是平山郁夫(1930—)，他是中日交流协会的会长，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画家。他到了敦煌，又去了法隆寺，看到这两幅画除了颜色稍微不同以外，在构图上极其相似。当时画这种壁画需要一个工艺，就是先用纸做出

一张纸型，把它贴在墙上，然后根据纸型进行描画。为什么法隆寺与敦煌的两幅壁画如此相似呢？有位学者的观点令平山先生十分赞同，这就是敦煌与法隆寺的壁画可能用的是同样的纸型。这与刚才介绍的锦缎事例一样，都是从中国产生的文化技术、工艺技术传到了中亚、西亚和日本，都反映了当时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以中国为中心进行的，而且也十分繁盛。

这张照片是法隆寺的一尊带有光背铭的佛像，又称释迦三尊。之所以想作一下介绍，是因为它的头形、脸形和笑容，与中国北魏时期的佛像特点十分相似。当我们再看这尊佛像在佛堂里的全景时，就可以发现整个建造环境和北魏的佛像营造也是完全相同的。在佛像后面刻有文字，内容是建于何时以及建造的理由等等，十分详细。据此可以知道，这尊佛像建于公元623年，是圣德太子去世后，为了纪念他而建造的。法隆寺模仿北魏营造佛像，也可以说是当时文化交流的一个典型事例。

刚才我曾提到，日本人从中国带回了壁画的纸型、锦缎等工艺技术。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推测，很有可能是中国的工匠直接来到日本来在日本建造了这尊佛像。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大家都知道，敦煌石窟的墙壁上，描绘有唐代的飞天，形式非常流畅，那种在天空飞舞的形象，十分生动、精采。现在大家再看这幅法隆寺的飞天的照片，与敦煌的在形象上虽然有点不太一样，但两者在构思和意境上却可以说异曲同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法隆寺是受到了敦煌飞天画像技术的影响，而且工笔如此细腻，图像如此相似，都不能不使人感到，极有可能是中国的工匠来到日本直接描绘这些飞天的。有鉴于此，对上述佛像的营建，也可以作出同样推测。

这张照片里的弥勒佛像，藏于圣德太子所修建的一座寺院里，作深思

状。这种类型的佛像在中国或是韩国都有很多，可以证明圣德太子为了从中国、朝鲜输入佛教，是花了极大心力的。圣德太子死后约一百年，在奈良营建了拥有日本最大佛像的东大寺。当时在敦煌以及山西的大同，都有十分巨大的佛像。这股营建大佛的风潮也传到了日本，东大寺的大佛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下面这张照片就是东大寺，大佛就建造在中央这座巨大的建筑物里。附近的这一个小型建筑物叫做正仓院，里面收藏了许多 7-8 世纪的奈良时代从中国引进的文物。这是正仓院的外景，1000 多年前建造的这个建筑物至今没有任何变化。因为那时没有空调和调湿器，所以花了很大功夫，用一种木头搭建的方法来调节空气，防止湿气的进入。

这是一个玻璃碗，估计是通过丝绸之路从西亚传入日本的，在当时可以说价值连城。产于 7-8 世纪的玻璃碗中，保存如此精美完整的，现在或许只有在正仓院才能见到。当时官僚的皮带，根据官位高低，镶嵌的宝石颜色、形状也不一样。当时中国的于阗（今和田）是出产宝石最为有名的地方，这些皮带上的宝石，也可能是从那里引进到日本的。这是一件琵琶的照片，也是正仓院的收藏品。当时库车地区十分喜欢音乐，这件琵琶正是从那里传入日本的。

还有一位人物，也必须向大家介绍，这就是鉴真和尚（688—763）。他是扬州人，后来到了日本。这张照片就是鉴真去世前，弟子们为他建造的一尊像，大家都知道他是失明的人，所以像的眼睛也是闭着的。鉴真五次东渡日本，都失败了，最后第六次取得了成功（754）。在去日本之前，他已经失明，但还是下定决心要去日本，最后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鉴真在佛教传播上的贡献，尽人皆知，这里不拟多谈。只有一点，这就是他在医学方面的知识十分丰富。他不是医生，但对中草药非常有研究，到日本后，去山

川田野采集中草药，因为失明，只有用鼻子判断草药的功效，就这样把中草药的知识传给了日本人。所以在日本，不限于僧侣，就是卖中草药的人对鉴真也非常尊敬，他们要捐款，也都要捐到鉴真和尚的寺院里。

从圣德太子到鉴真，他们所做的都是尽可能把中国的佛教传到日本，教给日本人。除了圣德太子和鉴真，还有两位人物值得一提：一位是最澄（767—822），他开创了天台宗；还有一位是空海（774—835），他是真言宗的祖师，他们也都在竭尽全力，将中国的佛教带到了日本。

佛教传到日本以后，并非一直保留着原来的样子，就像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许多变迁一样，传入日本的佛教也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13世纪以后，出现了亲鸾（1173—1262）、日莲（1222—1282）等人，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构建了具有日本特色的佛教。有关日本佛教的历史与现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地方。由于时间关系，我在下面只准备从两个方面谈谈佛教对日本的影响。

三、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

在上面，我主要介绍了佛教是如何传到日本，有哪些人做了什么样的贡献等等。至于谈到佛教对于日本人的精神影响，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一是禅宗。首先来看前者。

圣德太子虽然醉心于研究佛教，但不要忘记他同时还是一个摄政官员，是一位政治人物。把佛教定为日本的国教，这是他所做的第一项工作。而第二项工作，就是如何才能将佛教变成日本人的伦理道德基础，如何使官员和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佛教的教义？为此，圣德太子特意把自己的

心得体会汇编了 17 条,称其为《宪法十七条》。《宪法十七条》成于 604 年,文章现在都保存了下来,内容并非全都是佛教,还涉及到了儒家思想。这里主要介绍其中关于佛教的几条。

《宪法十七条》第一条便提倡“以和为贵,无忤为宗”,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讲求调和,不要争斗(无忤)。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境界,让人和人不要斗争呢?紧接着在第二条中,就提到了这一方法,即“笃敬三宝”,只要遵照佛教的教义,用佛教的思想去修行,就能达到这一境界。

为什么要遵照佛教教义呢?这是因为佛教乃“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亦即世界万物的最终目标,世界各国最根本的思想。当时的上国——隋王朝,也是非常崇佛的,所以圣德太子要求人们遵守佛教。第二条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人本来没有那么坏,即使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只要遵照佛教之教,就会变好。

另外,人们在判断事物是非的时候,往往需要有一个标准,佛教就提出了这个标准。比如有两方正在进行战斗,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标准是什么呢?圣德太子提到,要从佛教里去找判断的标准。他在第一条里强调“和”是终极目标,在第二条中强调了理由,可是为什么要强调“和”呢?在第十条里面,作了如下阐述:

十曰,绝忿弃嗔,不怒人违。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无端。是以彼人虽嗔,还恐我失。我独虽得,从众同举。

要达到“和”的境界,首先需要人和人之间的调和,需要对自己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即认识到自己只是一个凡夫。什么叫凡夫?人都是有自己

的欲望，以自我为中心的存在，因此只要是人，都有自己的缺点。这一自我认识，十分重要。

“和”的最大敌人是争斗。互相挑衅，想把对方压倒，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对方绝对错误，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个凡夫，是一个有缺点的人，你就不会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自己有缺点，对方也有缺点，大家都让一步，退一步，反省自己，就会重视对方的观点，然后想办法调和双方的想法。世界上既没有绝对的聪明也没有绝对的愚蠢，既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既没有绝对的正确也没有绝对的错误，这些对立的观念其实都相对的。当有了这种思想时，人和人之间才能达到“和”。上面“人皆有心，心各有执。彼是则我非，我是则彼非。我必非圣，彼必非愚，共是凡夫耳”一句，应该说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

“和”是佛教思想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人总是处于纷争之中，总想把对方压倒，取得自己的胜利。每天这样想，就会忽视对方的存在。认为自己是绝对的善，绝对的正确，最后就会破坏生活、社会的秩序，会变得非常混乱。如果你把自己当作一个凡夫，想到大家都是有点缺点的人，这时就会用一种平心静气的“和”的思想去对待对方，这样往往会获得更好的效果，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大的幸福。

强调“和”，实际上也在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人和人之间从根本上来说是平等的。不论官有多大，地位有多高，你还是一个人，也有很多错误，在这一点上，大家都是凡夫，因而也都是平等的。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去压倒对方，这是佛教最为反对的行为。所以说，要想达到“和”的境界，首先必须认识到大家都是平等的。

作为日本人，我的感觉是日本社会还存有这种“和”与平等的观点。比如，日本人开展集体活动时，一般都尽量不想突出自己，也不过分强调或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日本人看来，处于一个团体内，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我不一定了不起，我的想法也不一定就高明，因此需要尊重别人的意见，更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因而在接纳别人的意见时，就会让自己做些妥协。这种思维方式和佛教有着很深的联系，可以说是日本人的一个特点。

大连与日本的交流非常多，大家和日本人接触时可能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们在说话过程中一直说“对不起”，似乎老是想表达自己的歉意。实际上，在日本人思维深处，始终留有一个需要向对方道歉的意识。可是，如果日本人听见日本人说对不起，并不觉得说的人真的作错了什么，日本人的感觉是，你有错我也有错，大家彼此彼此。正因为日本人不爱突出自己，主张不太明确，不太善于强调自己的意见，所以外国人尤其是欧美人总认为日本人性格暧昧，说话含糊，并指出这种不直截了当和不明确就是日本人的缺点。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生活在这种大家都能退一步的环境里，相反倒会觉得有些事情能因此处理得更好，就像中国的一句俗语：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在我看来，欧美人说的日本人的缺点，可能正是日本人的一个优点。

说到这里，我已经预料到了各位会有这样一种想法：你既然说日本人这么重视“和”，重视协调，经常反省自己，可为什么会发动侵略别人的战争呢？对于那场侵略战争，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的心情是非常沉重、非常痛苦的，深深感觉我们作了对不起亚洲人民的事。但是作为一名研究者来冷静分析时，我认为那个时候的日本人心中可能已经没有了佛教的思想。大家都知道，目前影响中日关系的是靖国神社问题。靖国神社与佛教无关，他

是神道，也叫神教。在当时，日本人的神教思想特别重，敬神不敬佛。从我的立场来分析，正因为受神教的影响，轻视了佛教思想，才使日本最终走上了侵略的道路。

四、与自然一体的观念

有关佛教对日本的影响问题，第二点我想谈一下禅宗。禅宗是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宗教，也就是把老庄思想融入到了佛教思想之中。它以公元6世纪从印度来到中国的菩提达摩为始祖，到慧能（638—713）时正式成立。赵宋以后，经荣西（1141—1215）、道元（1200—1254）传至日本，对日本的文化与艺术产生了影响。

大家都知道，老庄思想主张无为自然，禅宗也主要强调崇尚自然，讲究自然，佛教和老庄学说融合到一起，这就形成了禅宗的思想。不过，一般人的观点似乎并非如此。他们认为人有很多欲望，有着很多要求、需求，而强调自然就不太符合人的这一思想，因此就总想对自然加以人为的改造。但在禅宗那里，却强调原来的自然并无不好之处，也无需改造，这即是上述“无为自然”的体现。当人有一种欲望时，便想方设法要实现自己的欲望，要达成自己的欲望，但在此过程中，往往就会排斥某些东西。对自然也是同样，总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自然，要用自己的意志去改变它，这应该说是一般人的思想。

禅宗有句话叫“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现在的存在就是一个佛，人便是一个自然，不需要对他强加多少东西。以一种平常心，用一种自自然然的方式去对待自然，这就是禅宗的主要思想。必须承认，这种思想对日本的

艺术和日本人心心理构造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大家看见的这张照片是位于京都的禅宗寺院大本山妙心寺。为了准备这次报告，我最近专门又去了一次妙心寺。这里是方丈，方丈一词出自《维摩诘经》。大家首先看它的建筑物，这是一块没有加任何人工雕饰的木头，非常质朴。在寺院里的拉门上，画的是一幅山水画。日本人认为，在拉门上画上自然山水，就仿佛使自己置身于大自然之中。

这是一幅典型的自然山水画，大家可能以为出自中国的某位画家之手，其实这是日本人画的。日本人极为崇尚中国的山水画，他们学会这种画法后，就有许多人模仿中国的山水画，非但如此，还让自己生活在其中，极力让自己融入山水之中。

这张照片拍的好像是哪里地方的田园风光，其实是京都龙安寺的庭院。有山有水，中间还有小岛，四周的树木自然生长，这即是自然的表现方式。下面这一张，不知各位中国朋友会有什么样的感想？日本人如果看了一定会充满感动的。这是日本庭院的风景，山水交融，一片自然的风光，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对日本人来说实在是妙不可言。再看下面这幅画，中间摆着几块石头，四周全是沙子，这也是一种庭院布置，因为并没有水，所以日本人称之为“枯山水”，也就是没有水的山水。这个庭院属于龙安寺，意在不用水而达到身临大海之感，于是就以沙石为水，在上划上一层层的纹样，代表着波浪。用石头和沙来反映山水，这大概也是日本人追求自然的一种表现。大家注意庭院后面的这堵墙，完完全全是建造当时的模样，异常质朴，毫无修饰，这些都是深受日本人喜爱的。

前面讲过，崇尚自然的观念中深藏着不强加欲望于人的意图，也就是干什么都要存一个知足的念头。抑制自己的欲望，是来自佛教的思想。日本人到寺院参观时一般要用清水洗手，这张照片就是一家寺院的洗手石。整

块石头外圆内方，中央方形储水口的上下左右都刻有文字，合起来就是“吾唯知足”这四个字。“吾唯知足”也就是少欲知足之意。提醒大家要知足，不要把自己的欲望推加给其他人。

这是龙安寺的另外一处小园子，苔藓自然而然地生长，没有清除的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美国军人住在这里，他们首先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拿掉苔藓，用油漆把石灯笼、石楼台刷得漂漂亮亮。在美国人的思维中，自然并不美。由此也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与日本人大相径庭。这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庭院，一扇自自然然的门，四周似墙，极尽自然之能事。只要去日本人的家，一般都会发现这种情况：不论房子怎样狭窄，主人都要设法种几颗树，树一个小灯台，旁边还要布置一个洗手处，也就是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酿造出自然的气氛。

现在想介绍一下日本的茶道。

日本茶道的开山祖师是千利休(1522—1591)，但茶本身却是禅宗僧人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谁都知道喝茶可以提神，不会打瞌睡，禅宗讲究坐禅，不能瞌睡，所以对禅宗来说，喝茶是再好不过的。在日本，喝茶还有一套讲究的仪式，称之为茶道。这是一个茶室，汉语叫“壁龛”，日本人的住居里一般都有这样的空间。整个空间里，只有一朵花作装饰。我估计这种形式也是从中国传过来的，不过现在的中国却不太多见，中国人要放花的话，可能会摆设很多才会感觉漂亮。日本人则不同，虽然只一朵，看上去也单调，但却感觉十分自然。再看一个茶室，这里的“壁龛”中挂有一幅反映自然的汉字，通常“壁龛”里都挂着这样的字。旁边一朵花，下面再加一个香炉，大家看前面还有一个茶炉，是专门烧茶用的，旁边再放一只茶碗。

人处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 大概都是能作到心平气和的。即便是来了平常不太喜欢的人, 这时也会用一种平常心来招待对方, 为他沏茶。“壁龕”里的这一朵花也是有讲究的。茶道祖师千利休曾有一句话: 要插花, 就尽量要让这朵花好象开放在自然田野之中一样。因此日本人插花, 一般都讲求自然的情调。下面这张不是茶室, 而是一般日本人家中的“壁龕”。大家一看, 就知道这家并不宽敞。虽然不大, 也还要做一个“壁龕”, 为的是显示自然。主人的志趣, 在此可以说一览无余。这是我家的“佛龕”, 因为我是僧人, 所以就在里面挂了一幅南无阿弥陀佛的字。这是一座寺院里的茶室, 叫草庵, 非常俭朴。佛教教义要求少欲知足, 为了表示自己遵守教义, 所以就建造了这种极为朴素的房子。

这是一只中国的青瓷茶碗, 这是高丽的茶碗, 都是日本的国宝。中国的青瓷和高丽的茶碗制造技术很早也都传到了日本。在日本, 越朴素越是美, 价值也就越高。大家看这只茶碗, 因为讲究自然, 所以碗口是弯弯的, 根本就没有制做平展。在一般人看来, 就好像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 或者说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但日本人却觉得这是一种自然, 一种美。为什么日本人追求这种并非完美的东西呢? 或许是善于喝茶的缘故吧, 这就是感觉世上万物有好有坏, 如果单纯追求完美, 就会把一些并不完美的东西一古脑全都扔掉。在日本人看来, 即便是失败的东西, 即便是杂草, 也都是具有灵气的, 不应轻视。这种思想发展到现在, 就是日本人比较喜欢追求质朴。就是这种碗口弯弯的日本茶碗, 在日本的茶道中却被视作是美的极致, 所谓“静寂”、“简素”正是日本式的审美观。

关于日本人追求简素和古拙, 还有一个例子。中国朋友到京都吃日本料理, 就会发现日本人在饮食方面也讲究自然, 无论是菜还是碗碟, 都尽量要体现出自然的气氛, 为此往往还要加放许多花草, 而且是一道菜一道菜地

端出。有的中国朋友会觉得日本人是不是太小气，怎么能拿这点东西出来招待客人呢？其实这也是一种误会，在日本人看来，这是最高形式的款待，因为用的是最美的东西在款待大家。我每次来中国，就感觉中国朋友非常热情，餐桌上摆满了山珍海味，也令人大饱口福。可以说，仅在饮食这一点上，就会发现中国与日本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说话上，日本人也不主张话要多，而是讲求用“言外之辞”来传达自己的意思。正如《维摩经》所云，言语并不能表达自己真正的心情。于是，寡言也成为日本人性格的一个基本特点，追求一种“以心传心”（汉语称作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境界，这正是受到禅宗的影响之故。日本人一般都不太爱表达自己的欲望，认为“少欲知足”（吾唯知足）、自制与清贫是一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这，即是来自佛教的影响。

五、现代所面临的变化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和日本都相继引进了西方的文化和思想，以佛教、儒教为根基的传统文化及思考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西方的思想与前面谈到的佛教迥然不同，它主张人的欲望得到满足便是幸福。发展科学，正是为了追求这一目标。自然并不完美，所以要通过人工使其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完善，这似乎也是一般欧美人的想法。所谓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乃是自然进步的法则等观念，现在也席卷了整个亚洲。

我经常在想，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确实发展很快，可以说走在了亚洲的前列。但是我现在却非常怀疑这到底是好还是

坏？我们从西方引进了那么多的技术、制度、文化甚至思想意识，可是引进来了以后，日本人真的就变得幸福了吗？你到现在的日本去看看，社会问题非常严重。尤其令人寒心的是，孩子可以拿刀子去杀自己的父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是那樣的干枯、紧张。虽然不能说完全是西方的错，但它的影响不容忽视。我们怎样去面对这个事实，怎样继往开来，怎样迎接一个更幸福、更美好的明天呢？这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最后想给大家介绍一位日本女诗人，叫金子美铃（1903—1930）。在准备这个报告时，我就想介绍她及其作品了。这位女诗人才活了 27 岁，她生长在我的故乡山口县。她的诗最近在日本很受欢迎，听说很多中国朋友也喜爱读她的诗。大家现在看的这首《鱼儿丰收》，大意是：

绚烂的朝霞，丰收的船队
肥肥的 鱼，沉甸甸的鱼网
海滨好像变成了集市
但在那大海中，又有多少
鱼在为自己的伙伴而落泪呢

鳀鱼也叫沙丁鱼，日本人十分喜爱，因此有很多船队出去捕捞，捕鱼回来，船上的人岸上的人都十分高兴。但作者却提醒大家，高兴的同时，不要忘记海底下有成千上万的沙丁鱼在为同伴而掉泪。也就是说，人不能只顾自己，吃沙丁鱼固然开心，但也要想一想还有许多鱼在悼念自己的伙伴。这就是金子美铃的诗想要表达的东西，应该说，她的思想与佛教的关系很深。

金子美铃的诗，现在引起了日本人的瞩目，这也就说明日本人开始在省，在深刻考虑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实质。中国现在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

时期，我非常希望中国的将来变得更加美好。中国朋友经常说希望在经济发展中，从日本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和借鉴。这些当然很重要，但我还是想把金子美铃的诗介绍给中国朋友，衷心期望中国能从日本那里得到思想上的借鉴和教训。

最后，衷心感谢大连图书馆为我提供了这次与中国朋友交流的机会，也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里听我的报告！我所介绍的佛教对日本的影响，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问：您好！通过您的演讲，我对日本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对于自然的认识。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捕鲸问题，日本一般人民是怎么看的？

第二个问题，中国在科技发展的同时，忽略了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当然现在政府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了。日本的科技发展在明治维新后，可以说跃居世界前列，在这方面中国今后应注意哪些方面呢？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答：我先回答第二个问题，在经济技术发展过程当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呢？中国是日本传统文化的老师，我们作为学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经验，更没有什么可以教给中国朋友的。唯一想提醒大家的是，互相借鉴，互相帮助最为重要。

中国文化也好，日本文化也好，实际上都有一个共通的根，这就是都尊奉仁义之“仁”与道德之“德”。我们要发展经济，要发展科技，但在这一过程中，绝对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根，一个“仁”一个“德”，这是根

本。在这方面，我也想继续做些研究。

关于捕鲸问题，我想换一个角度回答。刚才介绍的金子美铃，她生活的山口县也有吃鲸的习惯。不过日本人在吃的时候，往往对鲸鱼有一种感激之情：你把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活下去，所以请接受我们的感谢之意。佛教原本是主张不杀生，不吃肉的，但是只吃蔬菜不吃肉，人就很难生存下去。所以不光对鲸鱼，日本人对任何食物都心怀感激之念。吃饭前说我吃了，吃完后说我吃好了，这就是在感谢神赐予我食物。我的想法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能够得到理解，但这确实确实是日本人的一种普遍想法。吃东西无论是鲸鱼还是别的食物，既然让我吃了，那就是我生命的恩人，吃了之后，我就应该做一个完整的人，做一个好人。以上回答，不知能不能让您满意，不过在我看来，这些仍然属于佛教的思想范畴。谢谢！

问：谢谢您的讲演。您提到中国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儒家和禅宗，影响更大。我有两个问题：第一，既然佛教文化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为什么日本的统治者还会发动侵略战争呢？当时佛教文化为什么没有发挥作用去阻止那场战争呢？第二，日本一些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如果这是日本文化的话，那这种文化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答：您所提出的问题，我遇到过很多次。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整个日本佛教界一直都在作深刻的反思。为什么发动那场战争时，佛教界无力阻止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十分痛惜的事，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深入的。如果说我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一直在走一条弱肉强食的道路，这是欧美的道路。单纯追求政治经济的发展，其结果就是抛掉了从中国引进的优秀文化。明治维新后，对儒教、佛教大加排斥，拼命吸收欧美的文化，在那时，这是大势所趋。佛教被当时的统治者们抛弃了，这

就是我的看法。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佛教同样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和影响。在今后发展的过程中，日本人应该在这一惨痛的经验中吸取充分的教训，同时日本的佛教界也要多作努力防患于未然，示人以警钟。谢谢您的提问！

问：尊敬的上山校长，今天上午听了您的讲座之后，感觉收获非常大，我对禅宗有过特别深的偏好，特别喜爱，我也曾经很多次地想到一个问题，天地自然生养万物，孔子曾经说过，“四时兴焉，万物盛焉”，庄子说“天地有大美，尔不言”。因为树木、花草，他们是自然而然地生长，但是有血腥的动物，比如说狮子等等他们需要一个生物链。从禅宗的角度讲，因为花草树木没有自我，他们靠天地自然地生养。但是人需要有自我，所以他们需要去争夺。我非常喜欢日本的池田大作先生。他是一位佛学的传播者，贯穿在他心中的是每天每日都在战争，是否能够自我完成。如果说禅宗崇尚自然，也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无为”，可是“无为”又怎么样融进“有为”呢？我觉得无为和自然也应该为我们生活所用，能够帮助人们成功，能够让我们的事业成功，对此，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

答：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能够听到您这样一个好的提问，我心里非常高兴。池田大作属于日莲宗，这个宗派强调要把事物中不好的东西去掉，努力建成一个好的事物，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在日本，还有另外一个亲鸾开创的宗派，它比较承认现状，认为现状的东西、自然的东西都是好的，要接受自然的东西。总之，日莲宗和亲鸾开创的宗派是两种

不同的思路。您的问题要深入探讨,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我现在只能作这样简单地回答。

最后,在今天的这场报告中,我老是在思索这样一个问题:人非常了不起,也很伟大,但人同时也是非常恐惧非常可怕的。现在,我们要努力做一种什么样的人呢?我想这个问题是我们大家都必须直面的重大课题,我也必须不断告诫自己,一定要进一步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非常感谢大家,谢谢!

大连图书馆藏稿本述略

陈艳军

大连图书馆向以独具特色的珍藏，享誉海内外，吸引着专家学者。这些独具特色的馆藏古籍主要来源于原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旧藏，即今天我们通称的满铁资料、罗振玉家藏、王永江家藏三个部分。在这些收藏中，内容包罗万象，版本独具特色。其中的稿本，堪称珍品中的菁华。为使读者更多了解大连图书馆馆藏，本文试就馆藏稿本 12 种，依目力所及，一一罗列，溯其源流。

陈履中·《孟子论文》七卷

是稿一函三册，高 28.3 厘米，宽 18.8 厘米。半页九行，行十九、二十字，楷书，无栏格，白口。首页右下钤“敬堂行三”印，部分为馆藏印覆盖。全书朱墨笔圈点勾勒，行间夹注。卷前有自序两篇，遂安姜士仑序一篇，柘城高玠序一篇，永城李惺序一篇。在自序中，陈履中言明著《孟子论文》之意义，“明孟子之道”，“以求本溯流，以穷源之一道也”。书衣题“旧钞未刊本”，当是刊刻前稿本。

陈履中，字执夫，号雁桥，康熙举人。明末复社名士陈贞慧之孙，其父宗石入赘商丘侯方域家，遂为商丘人。雍正间累官御史，出为甘肃布政参议，长守宁夏道。后因坐事罢归，居家二十余年，闭门著述，有《四书直解》、《孟子论文》、《河套志》、《宋州人物志》、《寓圆纂集》及《雁桥诗钞》等书传世。

张廷济·《家藏金石家书目·研斋金石目次》一卷

是稿一函一册。半页九行，行二十五字，行楷，单边，浅赭色格纸，有横格，书口上端有“竹林书塾”四字，下端有隶书“海云”两字，卷端右下钤“己为莫奚受有”朱文长方印、“世荣印信长乐”白文方印，扉页钤“徐氏玉林堂印”朱文长方印，卷末钤“寿所藏”朱文方印。书皮上书“张叔未先生手写所藏金石文字目录”。书内略有涂改增删。卷后有龚橙题字一行：“此梁山舟学士自簿金石文字，同治四年夏得之，以贻朗亭。橙记”。继之以罗继祖题字两行：“此张叔未先生手稿，余细验笔，逾知之。叔未先生蚤年书颇似山舟，与晚年书迥别，龚孝拱习见晚年书，故疑是山舟，为举正之，继祖。”

橙即龚橙，龚自珍子。字孝拱，号昌匏，晚号半伦。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王韬为其撰小传，称其“藏书极富，甲于江浙，多四库中未收之书，士大夫家未见之书。孝拱少时，沉酣其中，每有秘事，篝灯钞录，别为一书，以故于学无所不窥，胸中渊博无际”。他精于文字学，对元史也颇有研究，著《元志》五十卷。工诗词，善书法，时有“孝拱真书自一家”之誉。然为人与其父迥异。八国联军来犯，为向导引贼入圆明园，为世人唾。晚年发狂而卒。龚橙同治四年（1865）夏得此手稿，误以为梁同书手稿，并赠给沈朗亭。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号石翁，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举人，特赐进士。选庶吉士、累迁侍讲。工书法，著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等。朗亭即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号朗亭，又号子荣，亦为浙江钱塘人。道光十六年进士，官陕甘总督，赠太子太保，谥文忠。

张廷济（1768—1838），字叔未，一字说舟，号竹田，又号海岳。浙江嘉兴人。嘉庆举人。善书画，精鉴赏，富收藏。行、楷书冠绝当时，“叔未书，法南宫，草隶独出冠时”（《清史列传》）。著有《金石文字》、《清仪阁所

藏古器物文》、《清仪阁金石题识》、《清仪阁古印偶存》、《桂馨堂集》等。

是稿为著者手稿，为家藏金石书目录集。

英和·《庚扬集》不分卷

是稿两函十五册，高 25.1 厘米，广 17.8 厘米，行字不等，楷书，无格，白口。包括《庚扬集》七册，《使清海草》一册、《恩福堂诗抄》两册，《馆课》一册、《制艺》一册、《钦案奏稿》一册、《旗务奏稿》一册、《条奏底稿》一册。各稿未经编次刊刻，内有五册经作者亲笔署题。《八旗艺文编目》曾著录英和有《恩福堂诗抄》十二卷，抄本。是稿《恩福堂诗抄》首册卷端右下钤“英和之印”朱文方印，卷末钤“树琴英和”朱文方印，据此可知为英和稿本。《庚扬集》是英和自嘉庆元年（1796）至道光六年（1825）的诗文集，《恩福堂诗抄》则是英和乾隆五十八年至道光八年间古今体诗文的整理。《使清海草》卷尾有“壬辰仲冬月陆费瓌谨诵五过录藏一本”题字一行，据于植元先生研究，《使清海草》出自英和子奎照之手，此说可信。

英和（1771—1840），满洲正白旗人，姓索绰洛氏，汉姓石。字树琴，号煦斋，汉名石桐。历任乾、嘉、道三朝太子太保、协办大学士。道光八年（1828），因皇陵地宫浸水案，被人“引应奏不奏例，比拟大辟”，被“解发黑龙江充当苦差”。道光十一年三月，被赦回京。因此遭遇，英和退守田园，借诗文以寄哀愁。70 岁时，抑郁而终。

海保·《守拙轩诗稿》三卷《军中杂稿》一卷

是稿一函两册，高 25.5 厘米，宽 12.1 厘米，半页八行，行二十四字，楷书，白口。《守拙轩诗稿》各卷分别标出页码，卷一右下方钤“海保臣印”白文方印一枚；《军中杂稿》卷首钤自用印一枚，卷末钤“海保臣印”白文方印、“鹿门”朱文方印各一枚，《隐梅庵道人小传》右下方钤“亚圣之孙”白文方印一枚，朱墨笔圈点。是稿由门人包文适（兰圃）校录，海保子松荣（友芝）编辑。根据印记，当为海保稿本。清《八旗艺文编目》有著录。《守拙轩诗稿》三卷，卷前有许奉恩（叔平）守拙轩诗稿序、海保自叙。许奉恩，字叔平，安徽桐城人，廪生。海保挚友之一。《军中杂稿》一卷，卷前有海保序。

《守拙轩诗稿》收海保诗 200 余首；《军中杂稿》收海保文稿 33 篇。许奉恩称其为人“谦抑”，“不炫厚赏，不矜绝伎”，诗“能为各体”，“君之诗亦如君之为人，慷爽峭峻，振奇出类，犹之李杜白诸公之诗之各肖乎！”（前引文出自许奉恩序）海保认为，“文，大抵有三义焉：学究天人，笔补造化，推测宇宙阴阳之奥旨，发明圣贤授受之精微。其文敛气在骨，博厚高明，可以参天地而通鬼神，是之谓圣文；次如外王内圣，过化存神，律一己而，希圣希天，御万国而立功立德。其文骨重气凝，昌明博大，所谓匹夫所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之谓至文；又次如研经注史，载兴乱之所由，而人知感发，彰善瘅恶，明兴灭之所自，而人识劝惩，其文气骨停匀历，万古而不磨易，一字而不得，是之谓鸿文。”海保“抱关击柝之暇”，偶作文章，自以为“未逮”古人万分之一，随手抛弃。及至晚年，因“官冷无事”，遂“找辑”文章若干篇，以留给家族中后人。（前引文出自海保自叙）

海保（1811—约 1870），字鹿门，孟姓，隶汉军镶红旗，祖籍北京，自称“长白海保”、“落帽山人”，宦海沉浮一生，官阶无大建树。

董恂·《董搢卿日乘》十三种十三卷

是稿六函二十二册，版框高10厘米，广13.9厘米。半页十行，朱栏，白口。封皮钤“董”朱文葫芦形印、“酝卿”朱文方印各一，扉页钤“酝卿”朱文方印，“董醇”白文方印各一。据此印记，是稿为董恂稿本。记事始于道光二十六年，止于光绪十三年。有《随轺载笔》七种，《时维鹰扬》一种，《千佛名经》一种，《权衡仓粟》一种，《文缘琐记》一种，《还读我书》一种，《勤笔免思》一种，《奉讳归里》一种，《范我驰驱》一种，《转漕衡湘》一种，《魏阙重瞻》一种，《秋闱琐记》一种，《量入为出》一种。《随轺载笔》七种有《问津记一》丙午查办长芦事件、《问津记二》丙午收买天津商米、《问津记三》丁未验收海运商米、《问津记四》戊申验收海运南粮、《问津记五》壬子验收海运南粮，《迎薰记》己酉山西运城查办，《度陇记》己酉查办甘肃事件。

董恂（1870—1892），字饮之、忱甫，号韞卿，江都县邵伯镇人。初名醇，后避同治帝讳改恂。道光二十年（1840）中进士，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等职，还曾充殿试读卷、会试正副主考官，以及文宗、穆宗二帝实录馆总裁，又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全权大臣，奉派与比利时、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董恂勤于记事，每任一职或奉一差，都有笔记记载，先后著有《随轺载笔》七种、《楚漕江程》、《江北运程》、《甘棠小志》、《荻芬书屋诗文稿》以及《手订年谱》等近百卷。

《楚漕江程》、《江北运程》、《甘棠小志》、《荻芬书屋诗文稿》以及《手订年谱》等都已经刻板印刷，然亦有未能刊刻者，《董韞卿日乘》即如此。

李本柱·《十瓿斋诗稿》不分卷

是稿一函四册，版框高 16.4 厘米，宽 12.3 厘米。半页十行，行十九字，楷书，双黑口，单鱼尾，书口有“十瓿斋”字样。每册首页钤“王氏珍藏”朱文印，“王懿荣印”白文印。全书朱墨笔圈点、校勘、贴签。函套题签署“十瓿斋诗稿王文敏藏本 玉良署端”。玉良，即孙宝田（1903—1991），号辽海鳌翁，生于大连金州，师从罗振玉、王季烈，治大连地方史，有《旅大文献徵存》等。函套内侧有：“作者李本柱为山东武定人，为李之芳之曾孙。李之芳顺治进士，总督浙江军务，平耿精忠乱，卒谥文襄。李本柱之事历不可考，留待博雅。”内夹浮签二页，上书“十瓿斋诗稿得之于市坊小贩手中，原本所查残缺，仅可看清注，此为李某十瓿斋，名尚不可考。根据诗题先文襄平耿逆之叶，考证《人名大字典》，有李之芳，山东武定人，顺治进士，总督浙江军务，平耿精忠之乱，卒谥文襄。罗继祖先生来函云：考之《山左诗抄》、《山东通志》知为李之芳之曾孙，名当为李本柱。细阅原本残处，尚颇近似。卷首有王懿荣珍藏印，王籍山左，谊重同乡，想当然矣。王贤口（此字不识）志于大战后之第二年即西历一九四六年也”

全书分为《车中集》、《车中二集》、《蓬集》、《竹舫草》、《椎卢集》、《粤东游草》、《得鹏楼草》7种，共收诗 450 余首。

李本柱，山东武定人。曾祖李之芳，顺治朝进士，总督浙江军务，平耿精忠之乱，卒谥文襄。李本柱事不可考。

沈铭彝·《云东逸史年谱》一卷

《云东逸史年谱》一册， 首页钤“罗振玉”白文方印，卷末钤“罗振玉印”朱文方印。全书共 11 页。有罗振玉题识：“此姚云东年谱手稿，得之嘉兴唐鷗庵家，不著撰人姓氏。中有‘铭彝按’云，知为沈竹岑先生撰。以予所藏《李英公碑》碑末沈氏跋尾观之，即竹岑先生手书也。编中前为年谱，后为世系表，再后为墓图，而附以《弟云东遗宅诗》一首。云东绘事精妙，为梅道

人后一大家。此谱搜讨至详，异日当为梓行。沈氏，字纪鸿，官至教谕。道光十七年卒，年七十五。为张叔未先生姊夫，精于金石之学。《金石学录》曾著其名而不详其事，实为书其概略于此。光绪戊申正月上虞罗振玉题记。”

沈铭彝（1763—1837），字纪鸿，号竹岑，浙江嘉兴人。官至教谕，精金石学。有《沈竹岑日记手稿》等书。其父沈可培（1737—1799），字养原，号蒙泉，晚号向斋。乾隆三十七年进士，历任江西上高、直隶安肃知县。馆藏有稿本《旧事重提》一册。姚云东（1422—1495），即姚绶。字公绶，号穀庵，自号仙痴，人称丹丘先生，晚号云东逸史等，浙江嘉善人。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后因忤逆权贵，被贬为永宁知县，遂辞官不做，回归故里，善诗文书画，以此终老其生。罗振玉光绪三十四年（1908）得此书，并做题记。1914年罗振玉践行题识所言“异日当为梓行”，以稿本影印出版。本书内容体例，在题记中罗振玉已记述详明。

吕海寰·《奉使公函稿》不分卷

是稿两函七册，左右单边，版框高24.3厘米，宽15.9厘米，半页十行，字数不等，红格，行楷，白口，单红鱼尾，书口有“一言堂”。封皮左题“奉使公函稿存”，右题“原稿”，以万、冕、衣、旒等分册（此书曾遭水浸，有三册字迹已失），第一册书名页题“奉使公函原稿存查七册”。第六册封页题“公事要函”、“京外各大宪及京卿司道”。书内各件函稿结尾间有“已缮”、“经缮”、“发缮”、“某月某日发”、“此稿勿庸缮发”或“应抄”等小字，在署名处钤有“言忠信行笃敬”朱文长方印。

吕海寰（1843—1927），字镜宇，山东掖城人。幼读私塾，同治六年（1867）举人。历任工、兵、外务部尚书，以善办外交闻名。创建中国红十字会。著有《奉使金鉴》六十卷、补辑四十卷，《庚子海外记事》四卷。

光绪二十三年（1897），吕海寰经李鸿章推荐，任驻德、荷兰公使。使德四年正值中德关系多事之秋，吕海寰与国内总理衙门大臣奕劻、总办大臣吴廷芬、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频繁函件往来，遂成《奉使公函稿》。是稿记述了自山东曹州教案发生至辛丑条约签订前中德两国间的外交史料，诸如关于修筑胶济铁路问题的交涉、关于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打死一事的交涉，以及英德、英俄等国间的关系，是研究这一时期中西关系史的重要资料；公函记述了义和团的一些活动、在德国购买武器等问题，为义和团运动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佐证；公函还记述了吕海寰为整顿武备购买军用物资、多次建议政府派人出洋留学、为振兴中国商务四处访求人才的情况。在吕海寰笔端，我们还能够读到使德途中他的所见所闻、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在南洋等地华侨的境遇等等，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不分卷

是稿两函十三册，版框高 18.1 厘米，宽 12.3 厘米，半页九行，字数不等，楷书，双红鱼尾，朱格，白口。《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汇集中外人士有关地理类著述 96 种：美丁题良译《地志启蒙》，美李安德撰《地势略解》，清孙文楨撰《坤舆撮要》，清叶翰撰《亚洲全图说略》，清徐崇立撰《地球山水答问》，《腾越近边关隘考》，清叶翰撰《亚洲山势说略》，清王锡祺撰《都鲁金矿疏略》，清王锡祺辑《中英续议滇缅界务汇录》，清曹廷杰撰《东三省舆地图说》、《东北边防辑要》、《图们江口宜划归中国议》，清周传樽撰《东三省边防答问》、《内外蒙古边防答问》，俄铺加特撰《中国边

事论》，佚名撰《闵俗杂志》，清许景澄撰《帕米尔图叙》，英爱吴锡匹敌亚撰《帕米尔考略》，清薛福成撰《帕米尔及附近诸地考略》，清胡祥鏊撰《印度喀楚特图说》，英乔恩斯撰《克什米尔考略》，清陶模撰《新疆南山杂议》，清谢济世撰《西北域记》，清张海撰《西藏纪述》，清升泰撰《藏印边务录》，清陈炽撰《西藏篇》，英李提摩太撰《俄国变通兴盛记》、《安南变通兴盛记》、《缅甸变通兴盛记》，佚名撰《游历俄国风土记》，日镰田荣吉撰《俄游纪略》，清沈林一撰《俄属纪略》，佚名撰《辉春輿地考》，佚名撰《俄国新疆考》，英陔勒低撰《俄属波嘎拉新志》、《俄属基法新志》，佚名撰《中俄交涉考》，佚名撰《俄东西分界江岭城埠风土大略论》，清陈贻范译《俄人蚕食太平洋迤北边地考》，佚名撰《墨领峡考》，清陶保廉撰《游西岳诸峰记》，清刘大櫟撰《浮山记》，清刘开撰《游石钟山记》，佚名撰《封禁山考略》，清储湛撰《游云巢记》，清柯培元撰《玉山考》，清徐崇立撰《西北山镇考》，佚名撰《阿尔泰山考》，清王德均撰《长江图说》，《中国海道图说》、《澎台海道图说》、《朝鲜海道图说》、《日本海道图说》，比卢法尔撰《黄河由盐窝改道情形》，佚名撰《黄浦考》，清黄显台撰《北江形势论》，清李功谱撰《春明纪游》，佚名撰《海门风土记》，佚名撰《沙市情形记》，清陈其昌撰《藏蜀界务图记》，佚名撰《西江清形》，佚名撰《江洪江场图说》，佚名撰《云贵川商务论》，清吴德煦撰《章谷屯志略》，佚名撰《海洋深浅考》，佚名撰《山海关记》，日郑永昌撰《秦皇岛记》，佚名撰

《威海卫形势》，佚名撰《威海卫形势论》，佚名撰《胶湾详述》，清程子翼撰《沪游记一卷》，佚名撰《上海海口形势考》，佚名撰《浙西铁路情形论》，佚名撰《舟山考》，佚名撰《沙门湾形势说略》，佚名撰《三沙湾情势记》，清柯培元撰《噶玛兰风俗志略》、《噶玛兰番市志略》，佚名撰《澎湖列岛志略》，佚名撰《虎门形势》，佚名撰《九龙开埠记》，佚名撰《九龙志略》，佚名撰《广州湾形势考》，佚名撰《三水新埠记》，清吴桐林撰《广州湾图说》，清周逢源译《东方商埠术要》，佚名撰《游三仙洞记》，佚名撰《平壤济南浦记》，佚名撰《越南风俗记》，清周传谋译《琉球岛记》，清沈林一撰《缅甸记略》，英浮乃撰《逻罗考》，清孙兆熊撰《逻罗考》。

王锡祺（1855—1913），字寿萱，别号瘦冉。江苏清河人，世居山阳。光绪中任刑部候补郎中。为救国曾东渡日本求学。他一生治学，尤精于地理。

“终日垂穷合坐，图籍纵横，丹黄不离手”，倾其毕生经历，编辑汇钞了大批地理著作，以其书室命名，成《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十二帙，《补编》十二帙，《再补编》十二帙，《三补编》十帙。《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再补编》，先后于清光绪十七年、二十年、二十三年由上海著易堂排印出版，流传于世。而《三补编》则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以稿本成书，有叙末“光绪辛丑三月上浣南清河王锡祺谨叙于小方壶斋”为证，光绪辛丑即为光绪二十七年。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三补编》编排体例和收书范围风格与前三编一致。从内容上看，他更多关注国计民生，愤慨于西方列强蚕食我领土，清政府却腐败无能，官民麻木。从《三补编》叙言中，可见一斑。“中国隶亚洲，亚洲何若？中国不之知而日本知之，而欧美各国知之。日本欧美各国何若？同治以来始稍稍有缀旧简，采象胥，开辟蹊径者。然斐洲澳洲则仍懵然眊然也。……谓非官民睽亥，锢疾于鸦片，沉溺赤仄，蔽囿于时艺试律殿体，……德据胶澳，俄占旅顺，英租威海，法营广湾，意大利夺取沙门湾。……人核实而我蹈丘，人复古而我趋时，人因利乘便而我深闭固拒，人约纵连衡通力合作，而我一意孤行踽凉鲜偶。”反映出王锡祺作为清朝末年的有识之士，渴望了解世界的急迫心情。是稿为清稿，多人抄缮，字迹清晰工整。在书的天头地脚等处，记录了需要修改的文字和格式要求，当是校稿者笔迹，概是准备交付印刷前所作的最后修改。未能付梓，个中原由，不为外人所知，也只能由后人揣度琢磨了。

罗布桑却丹·《蒙古风俗鉴》不分卷

是稿一函十册，版框高 20.2 厘米，宽 15.1 厘米，半页十一行，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稿纸抄写而成，装订简易。首页钤满铁大连图书馆方藏书印一枚，椭圆入藏印一枚，标示时间为“昭 10.9.30”。据此可知，此书稿昭和 10 年，即 1935 年 9 月 30 日，入藏满铁大连图书馆。此时距离罗布桑却丹离世已

经7年，这本手稿是如何为满铁收藏的呢？是作者寄赠，还是其他途径？目前尚没有资料可以说明。

罗布桑却丹（1873—1928），蒙古名巴颜陶格涛，汉名白云峰、罗子珍，罗布桑却丹是其藏名。蒙古族著名学者，思想家、哲学家、民俗学家。祖籍内蒙古阿拉善，出生于喀喇沁左旗阿日山乌苏（今辽宁凌源市）。通汉满蒙藏四种语言。光绪二十八年（1902）冬，获理藩院“四种语言固师”学位（喇嘛学位名称，专门从事喇嘛经翻译）；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翰林院聘其为满蒙高等学堂教师；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民国三年（1914）间，两次东渡日本，任教东京外国语学院和京都板原寺佛学院。1914年回国，先住沈阳，后定居大连。供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外事课，并著书立说。

《蒙古风俗鉴》是罗布桑却丹的代表作。1915至1918年间，经四年历练，用蒙古文字写就。他几易其稿，但直至去世，此书没有公开出版发行。现存世稿本有两种，一种存日本东洋外国语大学，一种存大连图书馆。经中日学者比照研究，认为存于日本东洋外国语大学本为初稿，存于大连图书馆本为定稿。1981年，蒙古族学者哈丹碧扎拉桑抄录大连图书馆藏罗布桑却丹手稿本《蒙古风俗鉴》批注的蒙文版《蒙古风俗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蒙古风俗鉴》拂去了神秘的面纱，为我国学者所认识，对罗布桑却丹及《蒙古风俗鉴》的研究，不断深入，有一批优秀的论文著作发表出版。1988年，学者赵景阳以此为蓝本翻译的汉文版《蒙古风俗鉴》由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为罗布桑却丹和《蒙古风俗鉴》研究锦上添花。据蒙古族学者朝格吐比对大连图书馆藏手稿本，哈丹碧扎拉桑抄录批注本存在错误。

《蒙古风俗鉴》全书分为六十一类，从蒙古源流谈起，内容包罗万象，蒙古地区自然环境、物产、风俗民情，以及蒙古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哲学、宗教、地理、历史、医药、动植物、刑法、婚姻、风俗、习惯、历史等，

无所不包。以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论述了物质世界的发展变化，揭示了喇嘛教与封建剥削制度的关系，揭露了喇嘛教的欺骗性和危害性，被誉为蒙古族的“百科全书”，是蒙古学研究的珍贵历史文献。

王永江·《王永江手稿》十七种，《易原窥余》不分卷。

《王永江手稿》十七种，清末至民国间手稿本，二十二册。《自传》（1872-1913年间）一册，《丁卯日记》（1927年）一册，《存画录文稿钞》一册，《阴符经》一册，《阴符经浅解》一册，《三易皆演后天卦》一册，《赋》一册，《世之治》一册，《胎息服气诀》一册，《铁龕医学辑要》两册，《温病条辨》两册，《医学钞》一册，《医学笔录》两册，《腾蛟起凤》一册，《花团锦簇》一册，《群英杂集》一册，《游观等杂钞》两册，《文囿猎新》一册。

《易原窥余》一册，民国十三年（1924）圈点校订稿本。

王永江（1872—1927）字岷源，号铁龕。祖籍山东蓬莱县，生于辽宁金州。20岁以县试第一考取优贡，步入仕途。至民国七年（1918），升任奉天省长，民国十二年（1923），兼任东北大学校长。民国十五年（1926），鉴于军阀混战，借病请假回籍，从事著述。著有《读书偶得》、《铁龕诗草》（二集）、《易原窥余》、《阴符经注》及《医学辑要》、《痼疾窥余》等。

松崎鹤雄·《毛诗摘说》不分卷

是稿一函六册，版框高19.3厘米，广13厘米，半页十行，行十九字，白口，朱格。用侔天精舍朱格稿纸抄写。行间删削增改，有眉批。卷端钤“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藏书印，标示入藏时间为“民国38.1.19”，即1949年。是时，松崎鹤雄已归国三年，满铁大连图书馆亦由中苏合营的中国长

春铁路公司接管经营，本馆如何寻得是稿，尚无法判定。经与作者其他稿本字迹比对，是为松崎鹤雄手稿真迹。

是稿包括《王风》一册，《卫风》二册，《郑风》二册，《邶风》一册。摘录诗句，解题释义，集众家之说，述自家观点。

松崎鹤雄（1867—1949），号柔甫，日本汉学家。1908年来到中国，1910年往长沙拜叶德辉、王闿运为师，学习中国文化。1920年起任职于满铁大连图书馆，为司书。1930年，参加中国营造学社，任参校。九一八事变后，离开学社。因负有为日本收集中国珍贵古籍之使命，频繁参与书籍买卖活动。尤其为满铁图书馆图书补充，“贡献”卓越。1929年，奉命急赴北京，搜购珍籍10大木箱。在买卖南浔嘉业堂藏书上，极尽心机，迷惑刘承幹，购得《永乐大典》44册。他还为生活陷入困境的邓之诚牵线卖书。

松崎鹤雄对《论语》、《诗经》、《尚书》、《楚辞》、《山海经》等中国文献有精深的研究，出版《诗经国风篇研究》、《诗经に就いて》、《历代诗经研究概说》、《楚辞の九歌に就いて》、《山海经に就いて》等专门著作，著有《十六七世纪中国思想の研究》、《食货志汇编》、《湖南事情》、《柔父随笔》、《近读书籍一二》等书。因其对汉学研究的成绩，1933年，他的学生们组织成立了柔父会，定期举办清谈会，松崎鹤雄主讲。先后主讲了《明末の科学者徐光启》、《硕学王国维》、《湖南の博学叶德辉》、《（湖南の纯儒）王先谦》等，并由柔父会编辑，单册出版。编辑了多种文献目录，在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刊《书香》上发表。

与营造学社社员阚铎、瞿竞之及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比如邓之诚、罗振玉、刘承幹、王季烈等颇有交往。1933年应罗振玉之邀，到旅顺库籍整理处与罗氏姊夫何益三同主整理内阁大库史料。1946年4月回国，邓之诚写《送松崎柔甫 鹤雄之子 归日本》绝句三首，为其送行。“ 年中土思依依，青鬓来

游白首归。从此花开肠应断，落花风里送征银。定知猿鹤喜君还，万树樱花照玉颜。唯有交情抛不得，移情终古是三山。万里波涛一苇航，诗囊安稳压归装。他年尚有重来约，日月休伤似酒浆。”（《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1月10日第1期：邓瑞《邓之诚与松崎等人的友谊》）罗继祖有《寄怀松崎柔甫》：“早餐湖绿夕山岚，灯火人知老学龕。世难抱经修夙好，道穷集蓼喻偏甘。襟期恍接羲轩上，风景真如晋宋南。我亦金根同不学，荷衣延誉到今惭。”

以上罗列，只是大连图书馆藏稿本中的一部分，却也反映出大连图书馆藏稿本的特点。这些稿本既有手稿本，也有清稿本，皆为海内外孤本，且只有个别后来影印出版，史料价值和文物价值巨大，是我们今天研究版本、作者思想、生活时代、写作背景的宝贵资料。

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之满语、满学图书概述与举要

薛 莲

大连图书馆藏古旧籍满文文献丰富，有图书、内府档案、舆图、碑刻拓片等。其中的满语满学图书无论从语言文字种类、数量、内容，还是版本等方面都具有鲜明的风格和特点。不但藏有满文图书的线装古籍（1911年前出版），而且又有各种版式、国内外出版的满语、满学的旧籍（1949年出版）。因为这部分藏书为“满铁资料”的一部分，即满铁大连图书馆和满铁奉天图书馆的旧藏，满铁的藏书印，清楚地标明每部书的入藏时间，对今天的满语、满学研究，对清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对这些满文图书进行过几次整理和编目，但都不够完善。《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只收录满文图书280余种，2520余册；《大连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图书综录》（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收录满文图书410种，3179册，但仍不全面，特别是用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就不包括其中。现在经过整理，统计出满语、满学图书共440余种，3300余册，其大概情况简述如下：

一、概况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图书有多种文字形式，满汉文合璧最多，有256种，如《御制翻译春秋》等；其次为满文，有125种，如《日讲四书解义》等；再次为满蒙汉文合璧，有35种，如《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合便览》等；以及满蒙文合璧5种，如《御制满蒙文鉴》等；满朝文1种，《清语老乞大》；满藏汉文2种，如《唐古特文鉴》等；满蒙藏文1种，《十八合宜教训》；梵藏满汉文1种，《钦定同文韵统》；汉满蒙日文1种，《新

编金史名辞解》；汉女真日文1种，《女真语ノ新研究》；满蒙藏汉文4种，如《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等；满蒙藏维汉文1种，《御制五体清文鉴》；日汉满文3种，《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等；满日2种，《满和辞典》和《满语文典》；日文的满学图书5种《满洲语图书目录》、《满蒙言语の系统》等多种形式。

从内容上看，非常丰富，涵盖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政治法律、文学、哲学、伦理、文教体育、宗教、军事、天文历法等各方面。其中语言文字类最多，其次分别为历史地理类、政治法律类、哲学类、文学类、伦理学类、宗教类、文教体育类、军事类、天文历法类以及综合类和其他类等。而且同一种书往往有多个版本。

如语言文字类的《清文鉴》就有多种形式和版本，从“一体”到“五体”，历次增修本都有：《御制清文鉴》二十卷，康熙四十七年(1708)武英殿刻本；《御制满蒙文鉴》二十卷，康熙五十六年(1717)武英殿刻本；《御制增订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英殿刻本；《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四十五年(1780)武英殿刻本；《御制四体清文鉴》三十二卷，乾隆朝武英殿刻本；《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二卷，民国影印本；《音汉清文鉴》二十卷，两种，雍正十三年(1735)刻本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秀谷中和堂刻本等。

历史地理类的《书经》有六部五个版本，分别是乾隆三年(1738)京都文锦堂二酉堂合刻本、乾隆二十五年(1760)武英殿刻本、精一斋刻本、京都琉璃厂文盛堂刻本和清刻本(二部)等。文学类《诗经》有五部四个版本，分别

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满文抄本、乾隆三十三年（1768）满汉合璧刻本（二部）、听松楼满汉合璧刻本，清满汉合璧刻本（两节版）。

从版本形态看，大体有刊本和抄本两种形式。刊本中包括刻本、石印本、影印本、油印本、铅印本、晒蓝本等；抄本则包括写本、稿本和抄本等形式。

刊本中数量最多的刻本，主要是内府刻本、殿刻本、官刻本、各堂坊刻本等。内府和殿刻本中以政治法律、哲学类图书居多，如政治法律类《大清律》、《大清律例》、《钦定八旗则例》、《钦定吏部则例》、《钦定汉官品级考》、《钦定满官则例》、《钦定兵部则例》、《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中枢政考》、《上谕八旗》、《上谕旗务议复》、《白塔信炮章程》等；哲学类《春秋》、《书经》、《周易》、《御纂性理精义》、《御制翻译四书》、《翻译大学演义》、《日讲四书解义》、《御论》等。另外还有历史类的内府和殿刻本，如《太祖大破明师于萨尔浒之战书事文》、《太祖高皇帝圣训》、《高宗纯皇帝圣训》、《仁宗睿皇帝圣训》、《钦定续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资治通鉴纲目》等；伦理类有《小学集注》、《圣谕广训》、《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御制劝善要言》、《孝经集注》、《醒世要言》等。

官刻和堂坊刻本以语言文字类居多，兼有其他类，如官刻本有西安将军署刻本《清文指要》；江南驻防衙门刻本《清汉文海》；荆州驻防翻译总学刻本有《清文总汇》、《成语辑要》、《单清语》等。堂坊刻本包括京都隆福寺三槐堂：《满汉字清文启蒙》、《清文汇书》、《清文指要》、《圆音正考》、《吏治辑要》、《翻译六事箴言》等；京都隆福寺路南聚珍堂：《公文成语》、《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清文接字》、《清语摘抄》、《初学必读》、《千字文》、《小儿语》等；文渊堂：《清文典要》、《翻译类编》；京都翻译书坊：《初学津梁》、《清文接字》、《军令》、《行军纪律》；京

都炳蔚堂：《四书集注》、《三合语录》；金陵听松楼：《联珠集》、《新刻清书全集》、《同文广汇全书》、《新刻满汉字诗经》等。另外还有盛京彩盛刻字铺、琉璃厂五云堂、京都三怀堂、鸿远堂、京都博古圣经堂、文锦堂、二酉堂等堂坊的其他类满文图书。

大连图书馆藏各类大量的内府、殿刻本，官刻本和堂坊刻本满文图书，从一个侧面反映清代满文图书刊布的繁荣景象。

抄本中语言文字类图书数量很大，说明当时人们学习满文非常普遍，个人抄录和编纂的词汇集、成语集、会话集和语法书比比皆是。有《翻清阅目便览》、《清文后学津筏》、《清文玉液》、《唐古特文鉴》、《初学语》、《同音字汇》、《清文助字辨》、《清文虚字歌》、《呼啦篇》、《满汉语汇》、《无圈点字书》、《青云得路》、《佩音玉圃》、《一隅集》、《翻译书房总纲成语》、《上谕成语》、《满汉公文成语字汇》、《翻译发微》、《单话》、《百条》等。历史类的抄本也不少，有《克氏奏书》、《满汉明福王事略》、《公主碑文祭文集》、《满洲姓氏世居谱》、《恩家日记拙记二册》、《通鉴集录》、《喀拉沁甲喇各佐领下官兵户口呈册》、《蒙古甲喇各佐领下官兵户口呈册》、《张家口八旗蒙古兵丁匠役数目名册》、《守备禁城十门正白旗护军校及护军名册》等；政治法律类有《嘉庆政绩》、《上谕集成》、《八旗箴》、《官员衙署等处总录》、《内府礼垣录书》。文学类的抄本图书也很有特色，如《诗经疏》、《古近体杂诗》、《公馀闲集》、《十二重楼》、《御制全韵诗》、《世态炎凉》（又名《金瓶梅》）等，多为珍稀本。

二、珍稀本满文图书提要与考证

大连图书馆藏满文图书有许多孤本和珍稀本，孤本满文图书约有 120 多种。还有一些国内各种书目没有收录的满文古旧籍图书，如内府抄本《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铅印本满文《新约全书》、影印本满文《御制避暑山庄图咏》等。下面是其中几种的提要 and 考证：

1. 《御制五体清文鉴》三十二卷《附补编》四卷：

满汉蒙藏维合璧，三十六册，线装，民国影印本。页面高 28 厘米，宽 14.5 厘米，版框高 19 厘米，宽 10.8 厘米，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四行，小字双行，版心依次为满文书名、类目，汉文类目、页码；钤“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 民国 37 5. 17”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每册末页均钤“东洋文库（油印字——作者注）殿寄赠”朱文方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满铁大连图书馆”被苏军接管时的称谓，至 1950 年 12 月由旅大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旅大图书馆”。

《御制清文鉴》始编于康熙十二年（1673），历经 35 年，康熙四十七年（1708）完成。后来，以此为基础增补成《御制增订清文鉴》，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编定，将原有词汇译为汉文，并附有满文对音，以及满文的汉字切音。《御制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则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敕撰，乾隆五十七年（1792）校刊发行。《御制四体清文鉴》与《御制五体清文鉴》的编纂时间现在尚无定论。但最晚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四体”与“五体”都已在编纂当中；而后者是在前者的编写过程中，奉旨增加维吾尔文及其满文注音，并在原藏文下添注两种注音而成。三、四、五体的增修，使《清文鉴》系列臻于完善，堪称康乾盛世之作。

《御制五体清文鉴》的成书时间约为乾隆五十六年（1791），早于《御制四体清文鉴》的乾隆五十九年（1794）。从现在看，它是一系列《清文鉴》中

最具语言学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一部：以阿里噶里字（一种蒙文注音系统）和满文字母为藏文注音，并加维吾尔（回）文及其满文注音而成五体，特别是维吾尔文为今日少见之古字。该书成书之后并无刊本大量发行，文物价值颇高。从留存至今的档案记载看，当时只有三部抄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载，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懋勤殿收存两部^①；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载，盛京（今沈阳）故宫收存一部^②。从《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看，国内现仅存有三部抄本，一部藏故宫博物院，另一部藏雍和宫。《世界满文文献目录 初编》（富丽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1983年）载日本东洋文库藏一套四函三十六册，但无版本项著录。日本著名学者、“近代日本汉学第一人”内藤湖南于1912年曾到中国奉天（今沈阳）故宫的翔凤阁，在秘密状态下以十天的时间，对整部《五体清文鉴》共计2600页，拍摄了5300多张照片，带回日本。内藤湖南还提及，“听说百鸟库吉博士曾经在法国巴黎见过同样的本子，如果果真与我们拍摄的这本相同的话，那么，也许是英法联军侵入圆明园时掠得的”。^③

大连馆藏的这套影印本不见各家著录，从钤印看，来自日本东洋文库，但底本为三部抄本中的哪一种、底本来源、影印时间等则有待于考证。

^①江桥：《御制四五体〈清文鉴〉编纂考》，《历史档案》2000年1期载，五体成书大致在乾隆五十六年，早于四体，但未大量刊印，懋勤殿在乾隆朝仅收存2部。依据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懋勤殿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书籍中已有五体《清文鉴》，而五十八年十二月初一日至五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新收书籍中才有四体《清文鉴》样本一部，可见五体早于四体成书。但翻遍乾隆朝懋勤殿收存书籍档，仅有两部在录。”

^②辽宁省档案馆藏盛京内务府档案：“盛京内务府594”、“盛京内务府24348”、“盛京内务府19003”。

^③（日）内藤湖南等著，钱婉约等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第30~40页。

2. 《清语老乞大》

满朝合璧，存一册（卷一，原目录卡片著录“7册缺”），线装，乾隆三十年（1765）箕营（平壤）刊本。为典型的朝鲜刊本：白口，四周单边，半叶六行（满文单行，朝鲜文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单花纹鱼尾（四片两两相对、向中心倾斜的阴文叶状图形，有别于中国古籍中的花鱼尾），汉文书名、卷次、页码，单花纹鱼尾；开本宽大，页面高33.2厘米，宽21.9厘米，版框高25.5厘米，宽19.3厘米；纸质为高丽皮纸，纸纹清晰，色白而有韧性。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9 1 15”朱文椭圆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正文为满文和朝鲜文对照的对话。卷一末有乙酉年（1765 乾隆三十年）洪启禧汉文《清语老乞大新释序》，云：“清学在今诸译为用最紧，为功最难。其课习之书有《老乞大》及《三译总解》……《老乞大》则始出于丙子后，我人东还者之因语生解，初无原本之依仿者，故自初已不免齟齬生涩。而今过百季，又有古今之异，假使熟于此书，亦无益于通话之实，从事本学者多病之。庚辰，咸兴译学金振夏因开市往留会宁，与宁古塔笔帖式质问音义，辨明字画，凡是书之径庭者改之，差谬者正之。翌季开市时，复质焉，则皆以为与今行语一一吻合。自此，译者无所患于舌本之闲强，振夏尽有功于本院矣。因都提举洪公筵禀入梓箕营，不佞方与闻院事故，略记颠末如此云。乙酉秋提调行判中枢府事洪启禧谨序。”

《清语老乞大》是朝鲜编写、刊行的满朝文双语教材，为当时朝鲜人学习满语（时称清语）口语时所用。采用朝文为满文注音，朝文意译的形式刊印，是

稀见的朝语、满语合璧本古籍。韩国成百仁等认为^①，“老乞大”是“老汉儿”的意思。《老乞大》最初用汉文写成，是朝鲜培训官方译员的汉文口语教科书，出版年代及题目不详，但推测是产生于高丽王朝。讲述的是一个朝鲜商人往来北京和朝鲜王京之间的各种经历，以对话形式出现，内容十分贴近现实。后来在朝鲜被译成《蒙语老乞大》、《清语老乞大》、《倭语老乞大》（但《倭语老乞大》今已不存在）。第一个手写本的《满语老乞大》据说是一个朝鲜人翻译的，他在仁祖十四年(1636)，丙子之役以后返回朝鲜。1684年被汇编成《新翻老乞大八卷》，1703年木版刊刻出版。但这两个本子久已失传。目前流传的1765年的本子《新译清语老乞大八卷》是在1703年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目前此书仅存大英图书馆、巴黎的Bibliothèque de l'École Nation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Vivantes、日本的Komazawa大学图书馆，而巴黎的一套为影印本。直到现在《清语老乞大》对满语研究及满语对话教学仍十分重要，因为1684年的新版《新翻老乞大》和1703年现已不存在的木版是现知的最早的满语对话教课书。台湾的庄吉发1976年曾将其译成汉语，日本的津曲敏郎则于1977、1978年译成日语。

^①(韩)成百仁、高东昊著，蒋理译，许明玉校《韩国的满语研究概况》，《满语研究》1999年1期。而关辛秋：《元以来一部多个语种版本的第二语言教材——三种文本〈老乞大〉教材编写特点分析》，《汉语学习》2004年3期，则认为，“汉文本《老乞大》使用了至少400年，可能是迄今为止使用时间最长的对外汉语教材。《老乞大》最早的作者不可考，有人认为是来到中国辽东的朝鲜人，有人认为是中国人无疑。在其成书年代问题上存在着元末还是明初的分歧，多数人主张编纂于元末。”还认为“蒙文本《老乞大》存在了至少374年，蒙文本《老乞大》使用的上限不易确定，一般认为《老乞大》最早的版本是蒙语本，不是汉语本，即蒙语本出现的年代早于汉语本，在元末之前。但由于多年来没有人见过蒙语本，蒙文本的说法还是个推测”。然后引用胡明扬先生的观点（引自郑光主编《原本老乞大》胡明扬序，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老乞大》一书国内学者据书名推测最初当为元代蒙古人为蒙古子弟所编汉语读本之名，因其它各族从无称汉人为‘乞大’者。‘乞大’疑即‘契丹’之音转，如俄语亦称中国为КИТАЙ。因此，原本当为蒙文本，惜至今未见蒙文本，其它各民族版本似当为蒙文本翻版。但此种猜测始终未获确证。”

大连图书馆藏这本 1765 年箕营（平壤）刊本残卷，不见各家著录，自是十分珍稀。

3. 《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不分卷》

满汉合璧，二十册，内府朱格精抄本。页面高 30 厘米，宽 26 厘米，版框高 22.5 厘米，宽 17.8 厘米；半叶 10 行，汉文行 21 字，小字双行，满文行字不等；版心有单红鱼尾；有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书签为黄绫墨笔题“仁宗睿皇帝大事档案”。包括堂谕一册，汉文；上传三册，其中满文一册，汉文二册；来文七册，其中汉文六册，满文一册；仪注二册，满汉合璧；奏销四册，其中满汉合璧二册，汉文二册；尊封事宜二册，满汉合璧；杂项一册，满汉合璧。

记事起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六的，止于道光元年（1821）七月十一月。这期间正是嘉庆帝七月二十五日驾崩，宫廷内外举办丧事、道光帝继位等许多事情的发生期，如“仪注”二册，记载了诸如“礼部奏为大行皇帝大事治丧成服仪注事”、“礼部奏为大行皇帝遗诏到京王大臣等在午门听宣仪注事”、“内府等衙门奏为大行皇帝梓宫由热河奉移一切仪注事”、“礼部为奉移大行皇帝梓宫回京仪注事”、“本府奏为八月二十七日皇上登极是日在皇太后前行礼仪注事”、礼部具奏治丧事宜等，“礼部具奏大行皇帝尊谥颁发诏书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上行礼仪注事”、“礼部奏为仁宗睿皇帝初周年大祭皇太后行礼仪注事”等。对清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此书当为孤本，文物价值巨大。

4. 《新约全书》二部

满文，一册，精装，铅印本，版式为“中西合璧”：页面高 23.2 厘米，宽 15.3 厘米，厚度为 4.1 厘米；版框高 16.9 厘米，宽 13.9 厘米；四周双边，半叶十三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满文“enduringge ewangelium”和

汉文页码；虽是单页，但按筒子叶计页数（即两面为一页）；全书共分八章节，各章分别计页码，具体为 63、39、68、53、69、86、72 和 66 页；无版权页。书名页印满文“ice hese”；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 11. 12. 11”（另一册钤印时间为“昭 17. 2. 18”）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从钤印看，二部入藏的时间是 1936 年和 1942 年。

满文圣经是历史上第一部铅印的满文图书，传世稀少。关于刊本满文《新约全书》考证如下：

日本渡部薰太郎对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满洲语新约全书》（规格为 25×17×9）做了提要^①：1822 年，俄国人ステファン・リポウゾフ（Stepan Lipovtsov——作者注）译完“马太传”的最初七章。1823 年，“马太传”印刷 550 部。1825 年《新约》全部译完，俄国没有出版。1833 年，ノールウイチイのポウロウ（George Borrow——作者注）为印刷此《新约》，被聘到俄首都圣彼得堡。1835 年（一说 1836 年）印刷 1000 部满文《新约全书》……1855 年，此满译本《新约全书》的 200 部航运上海，途径爪哇，发生海难，200 部《新约全书》一卷未留，全部丢失……该书内容如下，现今印刷的任何一种文字《圣经》，都是章节分列，而满译《新约全书》却有章无节，只分二十七卷为八部，每一部分页数大致相同，推想可能是为印刷便利……

^①（日）渡部薰太郎编著：《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昭和七年（1932）。

而据韩国金东昭考证^②，刊本满文《新约全书》只有一个版本，即上文已经提到的日本“天理图书馆藏”的《满洲语新约全书》，由S. V. Lipovtsov于1825年翻译成满文，1835年在St. Petersburg出版。目前此书在英国的The British Library中藏有5部，BFBS（伦敦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的缩写）中藏有3部，伦敦的India Office Library and Records中藏有1部。苏联（原文即如此称呼——作者注）科学院亚细亚民族研究所（Instituta Narodov Azii Akademiya Nauk SSSR）收藏1部（1864年被收集），著录为8卷，每卷的页数分别为61张、37张、57张、40张、52张、60张、130张和50张，每页记有12行满文，大小为30×18和24×13两种。

以上是目下所能够统计的刊本满文《新约全书》，从各国藏品现有的版本项著录可以明确的是，大连馆藏不同于日本和苏联，而日本和苏联的版本也有所不同，其渊源关系，有待于今后继续考证。大连图书馆藏同一版本的两部《新约全书》不见被收录到各种满文书目，实属珍稀。

以下是版本上比较有特色的几部满汉合璧图书：

5. 《新刻清书全集》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听松楼刻本。白口，四周双边，书名页镌满汉文“新刻清书全集”，“听松树楼藏本”，钤“听松楼”朱文方印和花草图案朱文圆印。其特殊在于第二、三、四、五册为两节版，中间以三条细栏线隔开。一部书两种版式，比较稀见。

6. 《四书集注》十九卷

满汉合璧，十四册，道光十八年（1838）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刻本。白口，四周双边，半叶十二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书名，单黑鱼尾，汉

^②（韩）金东昭著，金贞爱译《东洋文库藏现存满文圣经稿本介绍》，《满族研究》，2001年4期。

文页码。书名页镌“四书集注”、“满汉字合璧”、“京都琉璃厂炳蔚堂朱氏藏板 道光戊戌秋月重刊校对无讹”、“每部纹银肆两整”。在牌记上直接镌刻书价的中国古籍图书亦不多见。

7. 《满洲姓氏世居谱》不分卷

满汉合璧，五册，抄本。各册首页钤“纳哈塔氏”朱文椭圆印，“孤鸿和尚”朱文方印，《高丽姓氏》册封皮钤“吟秋山馆”朱文长方印，函套内侧有“银壹两”印记。此部书为抄本，“银壹两”盖是函套价格。

三、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提要

日文编著的满语、满学图书可以说是大连馆的满铁资料中满文文献中的特色之特色，也是日本殖民统治大连的产物。数量虽然不多，只有12种，21册，但特点鲜明。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拥有一批老一辈的满学满语研究者，其中的羽田亨和渡部薰太郎的著作，大连馆就有收藏，特别是“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的论著有6种，10册，几乎涵盖了其一生中关于满语、满学的重要著述^①。这部分图书的装帧形式可以说是中西结合，一般是油印或铅印本，有筒子叶，有线装，也有洋装、精装：

1. 《满语文典》

渡部薰太郎编著，满日合璧，一册，线装，大正七年（1918）间岛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行、字不等，版心有汉文页码。封面墨笔题“满语学丛书第一辑 满语文典 完”，书名页印满文书名

^①（日）石滨纯太郎著：《故渡部薰太郎先生》，《东洋研究史》第二卷第一号，昭和十一年（1936）十月，文后附有“渡部先生论著目录”，按时间顺序详细列出15种，其中关于满语、满学的有14种，另外的《女真馆来文通解》（昭和八年大阪刊）大连馆也有藏。

“manjurame kooli”，“满语学丛书发行会”；朱笔题“著者谨呈”。钤“S. M. R. • LIBRARY • S. M. R. 9. 4. 2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大正七年（1918）著者《满语学丛书发刊之辞》，同年薰风《绪言》。卷末版权页印“大正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行”，“编辑兼发行者 支那间岛龙井村 渡部薰太郎”。

渡部薰太郎（1861—1936），日本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的满学满语研究者。早年学习英语，后来沉湎于满语、女真语的研究，并致力于整理编纂出版这方面的图书资料。这部书是他亲笔题名赠送给满铁大连图书馆的，也是其一生中出版的第一部论著。《绪言》中言及“从编辑、印刷到装订过程，乃自己完成”、“以誊写版印刷本书，作为满语课本之第一卷”。

2. 《满洲语图书目录》（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大正十四年（1925）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钤“S. M. R. • LIBRARY • S. M. R. 2. 10. 11”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大正十四年三月十五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前有《清汉元音字典》和《御制性理精义序文》书影，大正十四年（1925）二月编者绪言。“目录目次”将所收满文书分为“言语部（27 种）”、“政治部（6 种）”、“道德部（20 种）”、“宗教部（4 种）”、“哲学部（3 种）”、“历史部（3 种）”、“文集部（3 种）”、“稗史小说部（6 种）”、“兵法部（1 种）”、“天文部（1 种）”等十类。正文以汉文（少数以日文）列书名，以日文做提要，满文书目以日文标注读音，而不写满文。

3. 《（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合璧，一册，昭和七年（1932）大阪东洋学会铅印本。铃“大连图书馆 7.10.19”蓝文椭圆印、“大阪东洋学会（钢笔书写——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昭和七年十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三号”“大阪东洋学会”，书名页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编”“增订满洲语图书目录”“大阪东洋学会刊行”。卷前有《御制四体清文鉴·卷十三·人部·四》和《西游记·第十四回·六贼无从心猿归正》书影，汉文《奉呈文》及编者昭和七年（1932）九月“满洲国承认の日”的序。

渡部薰太郎序中称，此目录包含大阪外国语学校的满文图书 128 种，满铁奉天医科大学预科教授ダブルユー・フックス氏 1931 年的满文书目 36 种，ビ・ヅ・フロン・メーレンドルフ氏 1890 年的满文书目 249 种，アレサンダ・ワイリ氏 1855 年的满文书目 59 种，合计 472 种，除去重复的得 370 种。正文编排体例同上。

需要再书一笔的是置于序文和正文之前的“奉呈文”——1932 年大阪东洋学会拜谒“满洲国执政溥仪大人阁下”之际奉呈的，云：“……上古我国与肃慎来往，降至勃海，邻交之谊，殆二百载矣。皇清之兴也，其修好虽不及古，而其迹未尝绝也。则今满洲国之建设，我国民有复古之思，欢欣鼓舞，岂偶然也哉？当是时，结两国之交欢有最功者，言语是也。我国语属乎乌拉尔阿尔泰语族，而清语即满洲语（原文为小字，作者注）是通古斯语之一支派，则两语同其系统……清话由之又更发达，犹我国之于假名字也。凡与异民族来往接触，学其语仿其俗，甚者至同化于其祖……我国亦有学之者，距今二百年，获生徂徕既读解之……现下我国东洋历史科及博言科之学生，有学清话者，东

京大阪两外国语学校蒙古部亦课之……我大阪东洋学会以研究东洋民族言语习惯风俗宗教为主旨，尤染指满蒙，往往刊行书籍杂志，其关于清话者不少，亦盖欲扩充清话特质长所与贵国固有文化，以传之不朽也。今清朝发祥之地，满洲国新建焉……然窃谓其国语虽袭用汉语，而以清话为旁系之国语，以保存其国土之本音，是所以崇敬祖宗之灵也欤。而我学界亦受其余泽矣，亦伏冀贵国要路诸公，开设清话研究所，使书生学修之，保存其国家独立言语，不堪切望也。”纵观全文，日本帝国主义扶持溥仪伪满政权、吞并我国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其竭力搜集、刊行满文文献的目的，亦溢于言表。

4. 《满洲语缀字全书》

渡部薰太郎编，汉日满合璧，一册，精装，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汉文页码。钤“S. M. R. • LIBRARY • S. M. R. 5. 6. 23”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钤“大阪东洋学会（钢笔题——作者注）寄赠”蓝文方印。卷前有女真人和契丹人画像各一张。卷末印“昭和五年三月十日”、“亚细亚研究第九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 渡部薰太郎编辑”、“满洲语缀字全书”、“大阪东洋学会”。

5. 《新编金史名辞解》（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满蒙日合璧，一册，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半叶十三行，行字不等。钤“S. M. R. LIBRARY S. M. R 昭. 7. 3. 5”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渡部薰太郎（钢笔题——作者者）寄赠”蓝文方印和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面印“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渡部薰太郎著”“新编金史名辞解”“大阪东洋学会发行”。卷前有女真人画像一张（画像中题字为女真文，背面是日文的女真文字说明），昭和五年（1930）“大阪东洋学会会长”中目觉序和著者识。正文先列

出金史中的汉文词汇、其在原书（金史）中的卷次和页码，然后注明其所属类别（如“人”、“地”、“姓”等），再说明其来源（蒙语或满语），译出其对应的汉语，以拉丁文标注读音，最后以日文解释其意思。

6. 《女真语ノ新研究》（二部）

渡部薰太郎编，汉女真日合璧，一册，昭和十年（1935）大阪东洋学会油印本。筒子叶，版心有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 11. 3. 18”朱文椭圆印（另一册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 10. 4. 1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书名页印“昭和十年一月二十日”“亚细亚研究第十二号”“大阪外国语学校讲师 渡部薰太郎著”“女真语ノ新研究”“大阪东洋学会”。卷前有昭和十年（1935）著者序文，“目次”则列出全书的三个部分：类集女真译语、（语头画引）女真语汇和译语丛谈。

“类集女真译语”将所列词汇按“天文部”、“地理部”、“时令部”、“花木部”等 17 个部分分类，正文先是汉文词汇、女真语的汉文读音、女真语的拉丁字读音，最后以日文解释其意义。在解释中将部分女真语与满语和汉语做比较说明。

“女真语汇”部分的女真语词汇是以汉文标注其读音，然后是对应的汉语词汇。

“译语丛谈”阐述了女真族、女真人和女真语的历史，将新旧女真语进行详细比较，又与满语、汉语进行了比较。

这是渡部薰太郎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述，第二年（1936 年）他就故去了。

7. 《(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

小山爱司编著，日汉满合璧，二册，线装，昭和九年（1934）东京中央学会油印本。筒子叶，无边栏，半叶九行，行字不等，版心依次为汉文中国朝代（从三皇、五帝至清代）、汉文页码。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 10. 7. 26”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名页印日汉满文“小山爱司编著”“oyama aidzi banjibuha”、“上卷 人名之部”、“正训东洋史地人名日汉满同文辞林”“dung yang š i di ž in ming ž iben nikan manju tung wen tsi lin”、“东京”“dunggin”、“中央学会版藏有”“cuowao sekkuwai han dzaioio”。卷前有昭和七年（1932）“官房总务课长、书记官”横沟光晖序、昭和九年（1934）“内阁官房记录课长、内阁书记官”川岛孝彦序，昭和九年著者序文。卷末版权页印“昭和九年七月一日发行”，钤“中央学会”朱文方印；下卷为“地名之部”。正文每行以日、汉、满的顺序行文，按中国朝代顺序编写，正文后是附录和字表。

8. 《满和辞典》

羽田亨编，满日合璧，一册，精装，昭和十二年（1937）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铅印本。封面印满文书名“满和辞典”“manju ž i ben gisun kamcibuha bithe”、“文学博士”、“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京都帝国大学满蒙调查会刊”，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 13. 2. 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前有昭和十二年（1937）十一月“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研究室 羽田亨”的序。

羽田亨（1882—1955），日本历史学家。京都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1913年任京都帝国大学副教授，1924年任教授。曾从事调查研究敦煌文献。1938年至1945年任京都大学总长，后任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1953年获

文化勋章。他被称为日本研究西域文化史“权威”。著有《西域文明史概论》、《西域文化史》、《羽田博士史学论文集》。^①

9. 《满蒙言语の系统》

石滨纯太郎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九年（1934）岩波书店铅印本。封面印“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东洋言语の系统）”“满蒙言语の系统”“石滨纯太郎”“岩波书店”，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昭. 9. 11. 22”蓝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封底版权页印“昭和九年十月十五日发行”“岩波讲座 东洋思潮 第五回本”，“发行所（东京）岩波书店”。全书分四个部分：“满蒙言语”、“アルタイ语”、“蒙古语”、“满洲语”。

石滨纯太郎（1888—1968），日本东方学会会员，中国古代史、西域史和中国少数民族语学研究家，日本西藏学会前会长。文学博士。在京都大学、关西大学、龙谷大学等校任教。曾随内藤湖南往欧洲调查敦煌文献及东方学研究状况，后主要从事回鹘、西夏等胡语佛典的研究工作。五、六十年，组织西域文化研究会，整理大谷文书为中心的敦煌吐鲁番资料，完成《西域文化研究》全六册的编辑和部分撰稿工作，著有《东洋学之话》、《支那学论考》等^②。近年来，我国又有学者提出“敦煌学”一词首先由石滨纯太郎创用。^③

10. 《满洲语のほなし》（《满洲语之话》）（二部）

^① 日本人物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日本人物辞典》，商务印书馆，1988年。

^② 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③ 方广钊：《从“敦煌学”的词源谈起——兼为王冀青先生补白》，《敦煌学辑刊》2001年2期，肯定了王冀青提出的“敦煌学”一词首先由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创用。

今西龙著，日文，一册，精装，昭和六年（1931）双色打印本
卷端题“青邱说丛卷二 昭和六年一月”、“满洲语のほなし”、“今西龙”，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12 2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书中论述了满语的发展历史。

11. 《满洲语史》（四部）

俄国イ・ザハノロワ著，布村一夫译，日文，一册，昭和十八年（1943）满铁调查部铅印本。封面印“满铁调查月报别刷第八十三号”、“昭和十八年二月号（第二十三卷第二号）拔刷”、“满洲语史”、“满铁调查部”，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8 5.11”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编纂殿寄赠”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卷端题“イ・ザハノロワ”“布村一夫译”。

12. 《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满洲语与汉语混用的歌本“吃螃蟹”》）（二部）

朝鲜金九经编著，汉满日合璧，一册，满铁奉天图书馆铅印本。封面印“奉天图书馆丛刊第二十一册”、“满洲语と汉语を混用したる歌本‘吃螃蟹’”、“金九经”；钤“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 假受 昭.10.11.12”朱文椭圆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朱文方印及大连图书馆藏书印。此文曾在《满蒙》第十六卷第九号第222—242页（大连，1935年）上发表（大连馆有藏），此单行本当属珍贵。

金九经，字明常，朝鲜鸡林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曾在初创的京城（今韩国首都首尔）帝国大学图书馆工作。民国十九年、二十年（1930，1931）曾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日韩字音沿革比较研究”课。与魏建功相交善，与鲁迅、胡适等中国学者、文人有交往。后客居沈阳，刊印古籍史料。民

国二十三年（1934）辑校铅印出版了《姜园丛书五种七卷》，收五种朝鲜各时期人著作^①。

关于“歌本吃螃蟹”，我国著名现代文学家、藏书家郑振铎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以“二酉”署名，发表《“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跋》一文，刊载于1947年9月26日的《华北日报》副刊《俗文学》第13期，对此进行了考证和研究^②，全文如下：

《“螃蟹段”满汉兼子弟书》一卷，未题撰人，福克司(Fucks)博士藏。子弟书为俗文学中鼓词中之一体，文词渊雅，音节沈穆，乃清代中叶以降旧京流行歌曲，擅长者以满人多。到鼎革后，竟成绝响矣。此本体裁，系用满汉文字，贯串造句，开卷八句曰冒头，曰诗篇，以下始为正书。凡二百五十四句，用发花辙，皆叶通俗京韵。事衍一屯居之满洲青年夫妇，移居城市。一日，夫市蟹归，二人皆不识何物。会蟹逸，妇捉为所钳，彼此惊吓。既煮熟，复不知食法，妇怨其夫，因而勃。婢女邀邻妇解劝，并告物名，教以食法而罢。书中词语滑稽，之解颐。所叙当时习俗，也颇有观风知古之资焉。子弟书以钞本者流传最多，此为道光间旧京打磨厂文萃堂书肆所刻，至足珍也。辛巳仲冬，二酉识。

郑先生的这篇文章，不见《劫中得书记》、《西谛书目》、《西谛书跋》等书收载，却是我国文献学者最早介绍“满汉兼子弟书螃蟹段”现存清代早期刻本的文章，比较全面、科学。“满汉歌本吃螃蟹”的研究，至今对中国俗文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对满族文学和满语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①夏晓臻：《南京图书馆藏朝鲜籍人著作考》，《图书馆学研究》，1997年4期

^②关家铮：《郑振铎书跋二则》，《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3年1期

以上是目目前整理出的大连图书馆满铁资料中满语、满学图书的概况，希望对这一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辽宁省档案馆何荣伟研究员和大连图书馆王小川老师的帮助和指导，谨致谢忱。）

眉批钞

范旭仑

录自大连图书馆藏书。纸尾之学，小道足观。尝鼎一脔，聊志前修之灵心慧舌云。

魏书一百十四卷，北齐魏收撰，宋刊元明递修本。太祖纪之慕容垂遣史朝贡，奉帝西单于印绶，封上谷王，帝不纳，是岁，慕容垂僭称皇帝于中山，佚名批云：当去僭字。史书欲道其实，邻国遣史即云朝贡，其诬欺乎？既来封拜，即以上临下之词，乃诡云朝贡，何无耻也！

明史列传稿二百八卷，清王鸿绪撰，雍正敬慎堂刻本。列传七十八之帝得疏喜甚，迫群议不遽行，而朝士咸指目韬为邪说。韬意不自得，寻谢病归，批云：但据程子、司马光之言，而不博求于古典，吾不知何人为邪说也。作史者特于张骞、桂萼、方献夫、席书、霍韬之疏皆详志之，盖亦有深意存也。

皇明从信录四十卷，明陈建撰，沈国元补撰，万历四十八年刻本。卷十三之皇考圣谟大训，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法，诚能守此，足为贤君，批曰：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晋元帝授太子以韩非书，帝王之道，废而不讲，所以乱亡。

三朝野纪七卷，明李逊之撰，清钞本。卷一泰昌朝纪事批云：贞皇，寻常人耳，无好处，亦无大不好处。所长者，挺击一案不深究；所短者，纵淫于服中不知检也。

六子全书六十卷，未题辑者，明万历十一年金陵胡东塘刻本。老子注：居善地以下不当泥定水解，如诗家比兴一般，注恐非。

金薤琳琅二十卷补遗一卷，明都穆撰，清宋振誉补，乾隆四十三年汪荻洲刻本。卷八之阙一字，批云：所缺必非一字。都公所见当是已经翦截本矣。

桐阴论画三卷，清秦祖永撰，同治五年朱墨套印本。蒋廷锡之逸笔写生，颇有南田馥韵，惜贗本甚多，大约妍丽工致者多系门徒代作，非真迹也，陈田批：文肃写生用重笔，与南田分道扬镳。此评未允。供奉内廷之作，亦有妍丽者，在具眼别之耳。

泉币汇考十六卷首一卷，清唐与昆撰，咸丰元年唐氏红药山房刻本。卷一徐树铭批：字体与阁帖所收苍颉书相类，又类所收禹书，或禹都安邑时所造耶？

困学纪闻二十卷，宋王应麟撰，清何焯评，阎若璩笺，桐乡汪屋刻本。卷一之乾坤之次屯，曰建侯。封建与天地并立。一旅复夏，共和存周，封建之效也；匹夫亡秦，五胡覆晋，郡县之失也，乾隆丁未十一月廿四日雪夜果亭胡麟批：封建有得亦有失，郡县有得亦有失，犹唐以藩镇而亡，宋以销除藩镇而亦亡也。典午封建之初，原无先王之规制，使得以日寻干戈，而平吴后尽销郡县武备，则天下之势反弱，是其封建与郡县两失之。

订譌杂录十卷，清胡鸣玉撰，乾隆二十三年刻本。卷一之裒然俗作衰然非，毕裕曾批：此字之误，由于坊刻选本西汉文以裒为衰，操觚家不读史汉，不知元文，以致谬种流传，遂迷其本字，然稍知读书者必不误也。

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峻注，宋刘辰翁、刘应登、明王世懋评，明凌瀛初四色套印本。卷三文学篇习凿齿史才不常：如水之泓，如山之崢，如林木之萧瑟，正形容诗语入神之词，如何评为乃不成语耶？殊否否也。

世说新语八卷，刘宋刘义庆撰，梁刘峻注，明黄之竾校注，嘉靖十四年刻本。卷六黄之竾云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为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

批曰：刘氏既为太真从姑，则母家自姓温，夫家乃姓刘耳，何得谓其女不姓刘？妄讥孝标，直是狂吠。

古今说海一百三十五种，明陆辑辑，嘉靖二十三年陆氏伊山书院刻本。聂隐娘传、曾季衡传，极似泰西小说中预言，叙得曲折有致。铃 CHAN TSZE YSE\ 字师曾。殆陈衡恪欤？

宋大家苏文定公文钞二十卷，宋苏辙撰，明茅坤辑，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卷六周论：近李卓吾有论与此相发，更奇特精彩。又晋论：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此文王之不得已也，而周以兴。晋武以惠之不振，诸王吞灭，以至于亡，弱子可以亡国矣。晋武之智不及此者，亦天之恶晋也。秦政死而胡亥亡秦，晋武死而晋惠亡晋。秦政诸子岂无可以延秦者？晋武诸王岂无可以延晋者？皆以弱子亡，故诛灭无馀。天之恶暴甚矣，岂必皆人谋之不臧？

空同子集六十六卷，明李梦阳撰，邓云霄、潘之恒辑，万历三十年归隆裔刻本。卷二十奉送大司马刘公归东山草堂歌：钱谦益素不喜空同诗，逐篇任意诋謔，固属丧心病狂。此篇浑雄浏澆，高出古人，亦任意訛毁。盖李赤之流必死于厕而后已，所以不死者，厕鬼亦恶其丧心之甚也。卷二十二吴伟松窗读易图：七古贵清穆浑圆，气舒而调畅。清不可薄，穆不可质，浑不可浊，圆不可滑。气舒匪直也，调畅匪激也。此作无巧不臻，有美皆备。上窥李杜，无少忤色。吾不知钱受之果有眸子否！桀犬吠尧，于古有之，吾又奚怪！卷五十八江西按察司副使周君行事：所贵乎史才者，无落稗官小说家数，读之令人气壮。近日作者每立一传，其事之纤微，无不备录，读之如观杂剧。简该洁宕，全不理睬，于乎难矣。献吉识其大者，故能雄视百代，走司马子长、杨子云之垒而

不蹶。文如古镜鉴物，声情毕露。近日作者文如玻璃涂水银，以之影人，固属不遗，然失真处往往异象也。

西林全集二十卷，明安绍芳撰，清康熙十一年虚籁堂刻本。卷一之白榆阁对雪：往季升兄存日，大雪必登眺，酒酣乃归。自嵇公去后，广陵散不可复得已。今康熙辛未胤子秀拱，无端折毁，譬诸雪夜访戴，兴尽而返，夫何憾哉！洁园安璇跋，时年六十三。卷七夜泊任城洁园批：孤城欲下杨朱泪，斗酒平临李白楼：余幼时以杨朱李白作对联见称，不知此君已有此诗也。

落落斋遗集十卷，明李应升撰，李逊之辑，清康熙刻本。卷四自述之落落宜于酒，悠悠好去眠，批曰：酒能养血性，懒能完天真。取义成仁之人，主志决不落金玉锦绣一套。公登第时已洒落如此，所以能致其身以事君也。以势分为业者，毕生之所就，可知矣。

翰林珠玉六卷，元虞集撰，清钞本。卷一赵千里出峡图之各以所操济，虽危万无失，批曰：无蹶于山而蹶于垓，正是此意。

有怀堂诗稿六卷，清韩葵撰，康熙四十二年刻本。卷一上魏环极先生四十韵：长律属对工稳，气亦流贯，可以争胜词坛。

乙丑诗编一卷，清朱筠撰，清稿本。枣风花之风前美人对春语，冷烛飞花红坠碧；朱珪批曰：写一碧字，幻至苌弘之血、湘妃之泪。野鬼紫魄，冷烛坠红，如许淋漓，江淹恨赋令人不知其意之所寄。

独学庐初稿十三卷，清石韞玉撰，乾隆六十年许彭年长沙刻本。云留旧草之行不得也哥哥，批注云：行不得，本草今俗谓鹧鸪啼，曰行不得也哥哥。黄庭坚诗：终日忧兄行不得，鹧鸪应是鼻亭公。

岱山文集十二卷，清赵执信撰，赵芝圃辑，乾隆三十九年因园刻本。卷五耿益都东归拥马图记陈其山批：前摹拥马情景，几于纸上有声，后更将拥马之

人说偏说少，乃加一倍写法，妙不呆填。贤令政绩一语，尽从空际着笔，斯为灵心慧舌。行文如天马行空，不受羈勒。

文选六十卷，梁萧统辑，唐李善注，明嘉靖八年朱知烺刻本。卷四：三都赋识污体卑，多破绽，乃构思十年，何也？

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十五卷，明王锡爵、沈一贯辑，万历十八年周曰校万卷楼刻本。卷一解缙大庖西上对事方孝孺评点批：方公所评特就其文论之耳，以后而观，如缙者，首鼠之人耳，所谓忠肝义胆、劲气直词者安在哉！古人云知人不易，以方公之贤，犹不知缙为何等人，况其它乎？噫！乾隆丁未葭月初二日闲亭氏题。

茗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宋胡仔撰，清钞本。前集卷二十九之冷斋夜话云：盛次仲、孔平仲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龙千丈，澹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奇绝。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批语：斜拖阙角一联，语殊穿凿可笑，即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亦不过穷措大说好看话耳。总之，北宋诗人除欧梅、苏黄数大家外，不免粗率也。

大连图书馆藏国家善本概论

王雨霖

“国家善本”是指编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古籍，其中有大连图书馆藏书 840 多种。张之洞《书目答问》云：“善本之义有三：一曰足本（无阙卷、无删削），二曰精本（精校注），三曰旧本（旧刻旧抄）。”当作为“善本”的定论。大连图书馆开办百年，以收藏富有特色的善本著称。

一、来源

主要有三方面：大连图书馆自行采购，大谷光瑞藏书转让，罗振玉藏书捐赠。

大连图书馆自行采购

大连图书馆 1907 年建馆后，历经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馆、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旅大市图书馆和大连图书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中国长春铁路公司中央图书馆图书印”、“旅大市图书馆所藏善本”、“大连图书馆藏”等藏书印记，是大连图书馆百年历程的物证，也是古籍采购的见证。图书馆先后采购了诸多藏家之精品，如明代昆山叶盛菴竹堂、宁波范钦天一阁、闽县徐兴公红雨楼、海虞毛晋汲古阁、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又有清代到民国诸藏家的旧籍，如阮元、朱彝尊、王士禛、孙星衍、吴重熹、盛宣怀、缪荃孙、叶德辉、徐乃昌、丁福保等等。

大谷光瑞藏书转让

大谷光瑞（1876—1948），日本人，探险家、考古学家，通晓汉学。1917年将其藏书寄存于满铁图书馆，其中包括5000册汉文古籍，后来作为抵押物转予满铁大连图书馆。其中百余种被列为国家善本，明清小说是其精华所在。现存75种国善明清小说中，60种为大谷光瑞藏书，上钤“大谷光瑞藏记”、“写字台之藏书”等藏书印记，使得大连图书馆以收藏明清小说闻名于世。世已多知，不复赘述。

罗振玉藏书捐赠

罗振玉（1866—1940），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自号贞松老人，浙江上虞人，考古学家。富藏书，约30万卷，筑大云书库藏之。1945年藏书遭劫，仅存十之三四；1949年，其孙罗继祖整理9万馀册捐赠旅大市图书馆。罗家藏书钤章者鲜，“唐风楼”、“大云精舍”、“罗振玉”、“罗叔言印”偶遇，故无从检示其数。

二、版本

大连图书馆现存国家善本中，包括明清精刻本、钞本、稿本，批校本，四库全书底本。

明刻本

据研究，馆藏最早的刻本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刊行的明方孝孺（1357—1402）诗文集三十卷本《逊志斋集》。“逊志”取自《尚书·说命下》：“惟学逊志，务时敏，厥修乃来。”该集有五个明版本，一为洪武三十年三十卷刻本；一为天顺七年（1463）蜀本；一为成化十六年（1480）刻本，此本三

十卷，拾遗十卷，称为邑本；一为正德十五年（1520）郡本，此本二十四卷；一为嘉靖四十年（1561）据蜀本、郡本刻本。此本为三十卷本，又首有洪武三十年林右“逊志斋文集序”，王绅“逊志斋稿序”，据明崇祯十六年（1643）所刊《正学先生逊志斋集》，录有林右王绅二序，并标注“俱洪武三十年刻”。此为洪武三十年刊之确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成化十六年刻本，误。

次为《皇明典礼》，明建文二年（1400）刻本。函套题“皇明典礼 / 丙戌春月 / 松斋题”，版心录有刻工张东、林天福、林阿添、朱阿山等多人。书内有一浮签，云：“是书四库未著录。《明史·艺文志·皇明典礼》一卷注云：‘万历中颁则必非是编，刘若愚《内板经书记略》称《皇明典礼》十本九十五页，又与此不同。’予得于内阁大库残书类中。《内阁旧书目》亦未载。诚海内孤本，至宝也。光绪二十五年正月藏者记。”

馆藏明建文至嘉靖间（1399—1567）刻本尚有《新刊标题孔子家语句解》六卷、《新刊素王事纪》一卷、《性理大全书》七十卷、《新增格古论要》十三卷、《脉经》十卷等四十余种。

精刻本

精刻本是指校勘严审、字体秀挺、纸墨优良的刻本。

《西陂类稿》五十卷，清宋荦（1634—1713）撰，康熙年间毛扆、宋怀金、高岑刻本，十六册四函。卷端题“吴江门人周龙藻、侄之举编次”，首陈廷敬康熙五十年（1711）序，次侯方域、王士禛、汪琬、朱彝尊等序，目录末镌“侄孙怀金、常熟门人毛扆、外孙高岑校梓”。宋荦晚年居西陂，自订文集为《西陂类稿》。钤“曾经御览”、“天官冢宰”、“牧仲”、“荦”、“山水方滋”等印记，均为宋荦藏书印。如此自著自藏者，颇为稀见。“曾经御览”说明此书曾出入皇宫，故宋家视为珍宝。虽经三百年递藏，书品犹佳。

明毛晋汲古阁刻本，以其校勘详明、雕印精美而著称。馆藏毛刻本有：

《剑南诗稿》八十五卷附《放翁逸稿》二卷《家世旧闻》一卷、《吮呷集》一卷、《元四大家诗集》四种、《词苑英华》四十卷、《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一种等。

武英殿刻本，因其以“钦定”、“御纂”等敕修方式产生，故校勘精审、纸墨精良、刻印精致、装潢精雅。馆藏殿本有：《古文渊鉴》六十四卷、《皇輿表》十六卷、《御定历代题画诗类》一百二十卷等十馀种。

钞本

历代学者皆喜钞书，且雠校精审，为后人所珍。大连图书馆藏有明清钞本70馀种，这些钞本或无刻本行世，或可补刻本之衍讹。馆藏国善明钞本14种，清钞本63种。

《澹生堂藏书目》不分卷，明祁承【火業】（1563—1628）撰，明末许元溥钞本，八册一函，无序跋。钤“许元溥印”、“泰峰”等藏书印。澹生堂为祁氏藏书室名。许元溥，生卒年不详，字孟宏，自号千卷生，长洲人，崇祯三年（1630）举人，尝与黄宗羲、刘伯宗约为钞书社。

《江汉文集》，清钞本，四册一函，卷端题“商丘周次公著 / 彭城方肇评”，钤“青照庐”、“唐风楼”等藏书印。此书实为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之改钞。如此改钞人名作，似为作伪史之仅见。“唐风楼”为罗振玉藏书印，扉页亦有其墨笔题记，中云：“此本乃孔氏岳雪楼所藏，曩游广州得之。”余尝著文考之。

稿本

稿本具有原创性，尤其名家手稿，其笔墨本身，即具有文物价值，或兼具艺术价值，其历史文献价值无论矣。大连图书馆现藏国善稿本 20 余种，或手稿本，或清稿本。

《从朔编》不分卷，清沈铭彝（1763—1837）辑，清稿本，一册一函，卷首题“嘉禾竹岑沈铭彝辑”。钤有“半窗松雪”闲章一枚。此书乃名物考订之汇辑，略类宋人高承之《事物纪原》。“从朔”语出《礼记·礼运》，意为追溯事物之本原。今经查证，是编大都取材于陶宗仪、杨慎、顾炎武、赵翼诸人之著述，特稍经裁补统纪耳，自目为“辑”，亦固其宜。《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子部》著录为“沈铭彝撰”，盖未尝细检之过也。详见拙著《从朔编考朔》。

《英和稿本集》不分卷，清英和（1771—1840）撰，清稿本，十四册一函。钤“英和”等印记。书名代拟。含《赓扬集》七册、《恩福堂诗钞》二册、《馆课》一册、《制艺》一册、《条奏底稿》一册、《钦案奏稿》一册、《旗务奏稿》一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赓扬集》，不切实际。观其批语，知为付梓之清稿。《制艺》颇多删改批评，不知出谁手笔。《赓扬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有藏，余皆为孤本。

批校本

古籍一经名人名家批校题跋，就具有了特别的学术资料性和证史性，可作为版本鉴定依据。我馆所藏古籍中，可以查到的名家批校题识者有周道暹、朱锡玠、吴騫、李鼎元、俞樾、许瀚、吴广霁、罗振玉等，其内容或订误，或释义，或评其人其书，或补内容之缺漏。

《秘书志》十一卷，元王士点、商企翁辑，清钞本，六册一函。吴騫朱笔批校。吴騫（1733—1813），字槎客，号兔床，浙江海宁人。笃嗜典籍，与黄丕烈、陈鱣交好。批曰：“《曝书亭集》作‘秘书监志’，‘监’字似不可

少。此志既用国书，语多鄙俚，而每卷立题，尤荒谬不通。恐并非王、商手笔，或后人妄撰此目，未可知。惜竹垞、竹汀诸公均未论及。”又云：“丙寅五月，仲鱼孝廉为予泛吴中购得此志。其卷数、门类与《十驾斋养新录》所载悉同，惟叶数《养新录》共二百六十五叶，而此计二百六十八叶焉。宫詹所见本尚有阙叶与？”又：“此本舛错甚多，予虽以意校，终未能释然。复属仲鱼访之三吴藏书家，率与此本无异，仍携以见还。仲鱼亦照录一部，弃于紫薇讲舍。嗟乎，宫詹往矣，谁复能与予辈再订此书邪！嘉庆己巳五月吴骞记。”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唐孔颖达撰，日本天文年间（明嘉靖间）金泽文库钞本，三册一函。清学者俞樾题记：“岛田君翰言其先德篁邨先生藏书二万卷，唐钞宋槧无所不有，此其一也。密行细字，古色斑斓。《左传正义》单行本世间不可多得，君其宝之。曲园俞樾记。”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等，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卓为有清一代大师。

除名家批校题跋外，无从考者甚多，其中不乏高论。

《宋大家苏文定公文抄》二十卷，宋苏辙撰，明茅坤辑，万历七年（1573）茅一桂刻本。卷六“周论”有批：“近李卓吾有论与此相发，更奇特精彩。”又卷六“晋论”茅坤评语后评曰：“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此文王之不得已也，而周以兴。晋武以惠之不振，诸王吞灭，以至于亡，弱子可以亡国矣。晋武之智不及此者，亦天之恶晋也。秦政死而胡亥亡秦，晋武死而晋惠亡晋。秦政诸子岂无可以延秦者？晋武诸王岂无可以延晋者？皆以弱子亡，故诛灭无馀。天之恶暴甚矣，岂必皆人谋之不臧。”李卓吾即李贽，明人，然则批者殆明末人耶？

四库底本

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而其底本亦具版本价值，后流散各处，我馆藏有5种。

《伐檀斋集》十二卷，明张元凯撰，清康熙间刻本，一册一函。钤“翰林院印”（满汉合璧大方印）、“云间第八峰周氏藏书”、“继祖之印”等印记。此本内钤“分校吕云栋签”校字浮签五条。卷二《安履山房赠舅氏启孙二首》：不苦杨雄喫，吕云栋签曰：不苦扬雄吃。《四库全书》已改。卷二《述怀寄高邮贾生》：执戟杨子居，吕校云：执戟扬子居。《四库全书》未改。卷三《娄水行访曹子念作》：棹歌不断款乃声，吕校云：棹歌不断欸乃声，欸讹款。《四库全书》已改。卷三《塘上行逢友人顾愿作》，吕校云：顾愿甫作，脱甫字，据目录增。《四库全书》未改。卷三《苏生行》：相逢大快共樗蒲，吕校云：相逢大笑共樗蒲。《四库全书》未改。卷四《兹会之盛》：杨家子云老执戟，吕校云：扬家子云老执戟。《四库全书》已改。卷五《部饷至京引见皇极门时戊辰九月五日二首》：杨马执经来，吕云栋签云：扬马执经来。下有双行小字：杨字应照原本，吕签恐非。不知出何人手笔。又王世贞序：万历戊寅岁长至日弇州山人王世贞元美撰，有朱笔勾乙，并有墨笔接写二字，当系校官所为。今检《四库全书》本，校官未署吕云栋。又按题署之虞山云云，为挖却，当为虞山钱谦益受之口口。盖源于钱谦益著述俱遭禁毁也。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六十卷《后集》四十卷，宋胡仔撰，清钞本。予尝作《苕溪渔隐丛话四库底本考》考之。

另三种是：

《集钟鼎古文韵选》五卷，明释道泰撰，明钞本。

《历代地理指掌图》不分卷，题宋苏轼撰，明刻本。

《分门古今事类》二十卷，宋佚名辑，清钞本，一册一函。

三、印记

藏书印记不仅是藏书的凭证，也是研究版本的借鉴。

藏书印记最多者为《圣宋皇祐广乐图记》八十一卷。是书宋冯元等撰，清仇承勋钞本，钤“五福五代堂宝”朱文方印、“八徵耄念之宝”朱文方印、“太上皇帝之宝”朱文方印、“乾隆御览之宝”朱文椭圆印、“季沧苇藏书印”朱文方印、“秀野堂顾氏藏书印”朱文方印、“简庄艺文”朱文方印、“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白文方印、“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朱文方印、“何元锡印”白文方印、“钱江何氏梦华馆藏”白文方印、“章紫伯鉴藏”朱文方印、“荻溪章紫伯珍藏善本”朱文方印、“章绶衔印”白文小方印、“归安章绶衔字紫伯印”白文方印、“紫伯过眼”白文方印、“磨兜坚室”朱文方印、“笛江”白文方印、“庸笙”朱文小方印、“瓜瓞外史”白文方印、“但读离骚可无酒”白文方印、“读骚如斋鉴赏之印”朱文方印、“读骚如斋”朱文方印、“天然爱好”白文方印、“富贵神仙”白文方印，达二十五枚印记之多，可谓递藏有序。

“乾隆御览之宝”、“五福五代堂宝”、“八徵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为乾隆皇帝藏书印记。

“季沧苇藏书印”为清季振宜藏书印记。季振宜（1630—？），字诜兮，号沧苇，泰兴（今江苏扬州）人，顺治四年（1647）进士，官至浙江道御史。工诗文，精鉴别，著有《季沧苇藏书目》、《静思堂诗稿》、《听雨楼集》等。

“秀野堂顾氏藏书印”为清顾贞观藏书印记。顾贞观（1637—1714），字华峰，号梁汾，无锡人，晚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曾孙，康熙十一年（1672）举人，官至内阁中书。工诗能词，著有《积书岩集》、《弹指词》等。

“简庄艺文”、“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为清陈鱣藏书印记。陈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浙江海宁人，嘉庆三年（1798）举人。精于经学，长于校勘，著有《经籍跋文》、《简庄缀文》等。

“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为清鲍廷博藏书印记。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绿饮，安徽歙县人，嘉庆十八年（1813）赐举人。藏书宏富，雅善订讹，著有《花韵轩小稿》、《花韵轩咏物诗存》等。

“何元锡印”、“钱江何氏梦华馆藏”为清何元锡藏书印记。何元锡（1766—1829），字梦华，号蜨隐，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监生，官至县主簿，著有《秋神阁诗抄》等。

“章紫伯鉴藏”、“荻溪章紫伯珍藏善本”、“章绶衔印”、“归安章绶衔字紫伯印”、“紫伯过眼”、“磨兜坚室”、“笛江”、“庸笙”、“瓜瓞外史”、“但读离骚可无酒”、“读骚如斋鉴赏之印”、“读骚如斋”为清章绶衔藏书印记；“天然爱好”、“富贵神仙”两枚闲章的主人可能也是他。章绶衔（1804—1875），字紫伯，号辛复，浙江归安（今湖州）人。诗书画皆精，著有《磨兜坚室书室录》等。

馆藏国善，经藏家无数，择百人简录：

叶盛（1420—1474）文伯仁（1502—1575）范钦（1505—1585）项元汴（1525—1590）吴岫（明嘉靖间）陆应阳（1542—1624）王衡（1561—1609）谢肇淛（1567—1624）徐兴公（1570—1645）尹嘉宾（1572—1622）穆光胤（明万历年间）钱谦益（1582—1664）韩锡（约1592—？）孙承泽（1593—1676）项禹揆（？—1651）毛晋（1599—1659）郑任（1600—1675）方文

(1612—1669) 侯洸 (1613—1677) 施闰章 (1618—1683) 孙治 (明末清初)
王熙 (1628—1703) 朱彝尊 (1629—1709) 王士禛 (1634—1711) 胡煦 (1655—1736)
徐逢吉 (1656—1740) 何焯 (1661—1722) 李馥 (1662—1745) 顾嗣立 (1665—1722)
吴锐 (1668—?) 马思赞 (1669—1722) 沈德潜 (1673—1763) 黄叔琳 (1674—1756)
宋筠 (1681—1760) 孙嘉淦 (1683—1753) 沈心 (约 1685—?) 邵泰 (1690—1758)
富察昌龄 (约 1700—1769 后) 张宗櫛 (?—1775) 励宗万 (1705—1759)
刘纶 (1711—1773) 卢文弨 (1717—1795) 盛百二 (1720—1770?) 弘晓 (1722—1778)
袁景辂 (1724—1767) 王昶 (1724—1806) 蒋士铨 (1725—1785) 永璫 (?—1787)
卢址 (1725—1794) 朱筠 (1729—1781) 章学诚 (1738—1801) 丁杰 (1738—1807)
孔继涵 (1739—1783) 郑东愈 (1744—1808) 李鼎元 (1749—1812) 倪模 (1750—1825)
张应时 (1751—1824) 永瑔 (1752—1823) 程鸿绪 (1756—1814) 刘恕 (1759—1816)
朱锡庚 (1761—?) 秦恩复 (1761—1844) 张廷济 (1768—1848) 英和 (1771—1840)
吴荣光 (1773—1843) 钱侗 (1778—1815) 汪士鍾 (约 1786—?) 常茂徠 (1788—1873)
常大淳 (1793—1853) 丁晏 (1794—1875) 许瀚 (1797—1866) 山田业广 (1808—1881)
毕道远 (1810—1889) 袁芳瑛 (1811—1858) 唐翰题 (1816—1875) 丁艮善 (1829—1893)
徐承祖 (1829—?) 奕訢 (1832—1898) 傅云龙 (1840—1901) 吴重熹 (1840—1918)
盛宣怀 (1844—1916) 缪荃荪 (1844—1919) 盛昱 (1850—1899 年) 裴景福 (1854—1926)
吴广霈 (1855—1919) 甘鹏云 (1861—1940) 祝廷锡 (1864—?) 曹秉章 (1864—1937)
王礼培 (1864—1943) 周贞亮 (1867—1933) 董恂 (1870—1892) 王澐 (1871—1944)
冒广生 (1873—1959) 丁福保 (1874—1952) 张其

隍（1877—1927）文素松（1890—1941）刘明阳（1892—1959）谢国楨（1901—1982）吴尚时（1904—1947）谢兴尧（1906—2006）罗继祖（1913—2002）。

浅析近代以前地域带给中日间的文化差异

辛欣

人类创造文化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文化的产生离不开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影响文化的形成。这种影响在文化的初始阶段尤为显著。因为科技不发达，交通手段落后，限制了人类交往的范围，故而使文化明显地带有地域特征，不同地域的国家和民族拥有不同的文化。正如一本书中所言：“地缘！一只无形的手像妆扮姑娘一样打扮了形形色色的国家和民族。”¹中国和日本就在其中。本文拟从中日古代文化入手，以地域为线索，分析两国间的文化差异。

一、文化历史差异

中国位于北半球亚欧大陆东侧，西南和西面有世界最高的山脉环绕，西北和北面为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东临烟波浩淼的太平洋。整个地势西高东低呈阶梯状递减，江河奔流由西向东注入大海。如此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完整、内容博大精深的特点。

首先，黄河、长江为中华文明的较早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远古的地球受冰川期影响，长时间寒冷干燥，人类生存条件恶劣。直到新石器时代开始的一万年前，地球的自然环境才逐步好转，气候变暖，降雨增多，人类因此进入发

¹北京泛亚太经济研究所：《人文大国：影响世界历史的大国与人文精神》，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年版，第8页。

展的黄金时期。这种变化在北纬 30—40 度之间的地区表现最为明显。中国最早的文明发源地是从陇山到泰山的黄河流域，恰好处于这一敏感地带的中心线，即位于北纬 35 度附近。距今 8000—3000 年间的地球气温较现在高，当时的黄河流域基本上处于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之下，土地肥沃，河湖密布，自然资源丰富，农业生产稳定，为古代文化的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后来，随着全球气温降低，温度带南移，长江流域的文化又悄然兴起。据考古资料显示，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国人类祖先 10 万年前就已进入旧石器时代；公元前 7000—6000 年开始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阶段），原始农业、畜牧业出现；公元前 5000 年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经过夏商周奴隶社会后，于公元前 221 年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封建社会开始。

其次，偏僻的地理位置和封闭的地理环境成就了中国文化历史的完整。中国四周被山脉、高原、沙漠、草原、大海包围，中国文化就是在这种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较少受外界干扰地发展了几千年。中国的疆域辽阔，南北相距 5000 多公里，当历史上遭受北方游牧民族袭扰时，有充足的回旋空间，避免了由于文化强烈冲突而导致的文化历史中断（这种现象在其他三个文明古国都曾发生）。地域包括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两个方面，如果说中国大陆文化历史未因外来文化冲击而中断，一个原因是因为文化势差的存在，即中原文化较北方民族先进，那么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偏居大陆一端的地理位置。世界古代文明全部集中在大陆的北温带，形成了所谓的“中纬度文明带”，如果以处于北半球文明带中部的地中海文明区为中心的话，中国距中心的距离最远（除去远隔重洋的墨西哥），避免了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优秀文化的冲击。

再者，良好的自然条件、辽阔的疆域孕育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国地貌总趋势为西高东低，黄河、长江等大河自西向东奔流入海。江河挟带的泥沙在中国东部塑造了一系列肥沃辽阔的大平原，黄河、长江中下游平原面积宽广

毗连成片，使中国文明在黄河流域形成之后，能够迅速向南发展向北扩散，最终形成我国东部的传统农业文明区。在古代世界范围内，没有其他文明能像中国文化领地如此辽阔。到目前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址已达 7000 余处，遍布全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¹。各民族、各区域文化互相渗透，互相影响，互相衔接，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气象恢宏的中国古代文化。良好的自然条件适合农业的发展，丰衣足食推进文化进步，古代中国在生产、教育、思想、政治等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领域都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连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世界赖以存在的重大发明创造中，有一半来自中国”²。

与中国相比，日本古代文化历史时间较短，文明程度相对滞后，对外依赖性强。这与其特有的地理环境有关。日本是岛国，位于亚洲东部，在美洲大陆被发现以前，它可谓是世界最东端，远离古代世界文化中心，虽距中国较近，但是由于海上交通不便，阻碍了大陆文明的进入，影响了文化发展速度。5000 年前当中国大陆文化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时，日本还处于母系氏族阶段——绳文时代；当中国已经步入使用铁器农耕时代时，日本列岛上的人们却还过着“从自然拾果实，捞鱼贝于河海，猎鹿、猪、兔于山野的渔猎经济和使用石器的生活”³。当中国秦汉统一的封建帝国形成时，日本才刚刚显露奴隶制国家的萌芽。除去地理位置影响日本同外界接触交流外，日本本土的地理条件也限制

¹张凯：《中国文化史》，北京燕山出版社，第 8 页。

²同①，第 5 页。

³（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三联书店 1957 年版，第 12 页。

了其文化发展的速度。日本处于大陆边缘，是大陆与大洋在地质上的分界线，地震频繁，每年发生有感地震 1500 多次。中国有句俗语叫“稳如泰山”，日本人却不得不“杞人忧地”。古代日本地质不稳定，除地震外火山也时有爆发，在现今的日本仍能发现有许多地方被厚厚的火山灰岩覆盖。另外，日本每年受季风影响，台风暴雨不断，自然灾害频繁。这样的自然条件不利于农业生产，当然也不利于原始文化的发展。由于自然缺少创造基础，日本文化发展过多依赖于外界，日本古代文化历史是借助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国文化）完成的。比如：公元前 3 世纪借助高度发达的中国金属文化，跳出新石器时代的困惑；645 年借助盛唐法律制度，成立中央政府，完成“大化改新”……关于日本人最早的资料是在公元前 1 世纪至公元 5 世纪的中国古籍中，公元 8 世纪日本才出现自己的史书《古事记》（712 年）和《日本书记》（或称《日本纪》，720 年），就连本民族的语言日语也是靠对汉语的改造完成的。

二、 文化类型差异

给文化划分类型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因为文化本身不仅内容庞杂涉及范围广，而且时时发展不断变化，正如美国学者克鲁伯和克罗孔在《关于文化的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中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不分析它，因为它没有固定形状。我们想用字来范围它的意义，这正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似的：当我们去寻找文化时，它除了不在我们手里以外，它无所不在”¹。因此，没有任何一种类型说可以将一个民族或国家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完全概括，只能根据文化在某一方面或某一问题上的突出表现加以定性说明。本文选择文化源流、文化交流两个问题来分析不同地理环境下的中日文化差异。

¹同②，第 1、7 页。

（一）发生型与摄取型

据考古发现，10万年以前的时代，我国存在过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这些人类具有当今蒙古人种（黄种）的明显特征——铲形门齿¹。这一发现充分证明，中华民族的祖先产生于中华大地，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中国古代文明辉煌大多出自国人之手，较少借鉴外界力量，其原因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然。中国国土面积大，自然条件好（土地肥沃，季风气候使高温与降雨同步，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业繁荣（早在7世纪的唐代，中国人均年粮食拥有量已达500斤），养育了众多人口（16世纪中后期，明万历年间人口达1.2亿）。泱泱大国既利于抵御外族侵略，又便于人才辈出，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可能。另外，周边国家皆文化落后，文明世界遥不可及，可使中华文化借鉴的东西太少，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中国文化的自我创造与发展。

日本的自然环境远不如中国。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列岛，不适合人类生存。史学界认为，生活在日本列岛最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并不是岛上固有的人，而是从东亚或其他地方进来的²。这些人把当地文明带入日本，开创日本文化纪元。狭小恶劣的自然环境不利于人类生存，同样缺乏创造文化的基础，只能借助外界文明推动社会向前。日本近代以前的文化史始终与域外文明相联；从文字（汉字）到思想（儒家、佛教、禅宗）到社会制度（封建仿唐，近代习欧）再到科技（兰学）。即使日本学者也不得不承认，说日本之历史是文化摄取史不足为过。

¹同②，第1、7页。

²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第38页。

（二）超越型与融合型

中日在处理与本土以外的文化关系方面表现不同。以宗教为例，中国本土宗教追求现世化风格，“虚置彼岸，执著此岸”¹，这与外来宗教教旨发生冲突，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内几乎外来宗教的“出世性”都被淡化，“入世性”被强化。比如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它本是一个力图与外部权威脱离的宗教，原教禁止出家人与国王有联系，“沙门不敬王”。然而，在中国佛教被中国化，靠拢统治阶级，佛教组织和教派首脑从朝廷接受土地和册封。就连教规非常严格的基督教，在明清之际入华时，也被迫顺应中国民情风俗，允许中国受洗者保留祭祖祀孔的习惯。后来，罗马教皇发布《禁约》，强调一神教教义，遭到清王朝的驱逐和禁绝。

而日本采取的作法则不同：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不被同化，善于调整各种文化间的矛盾，使之融合在一起，提出“本地垂迹说”，称天照大神是大日如来的现身，而日本各地的神也都是其他佛为拯救日本众生而降生到列岛上来，这样“神佛合一”，使佛教真正在日本人的灵魂中“扎下了根”²。

中国文化由于自身的成效，在同异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更多的是进行文化辐射，即单向输出。中国是东亚文化圈的核心，其周边国家和北方少数民族文化比较落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同化功能，“化夷狄入夏”。历史上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都曾受过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至今仍旧存在。另外，封闭的地理环境，辽阔的疆域，使中国文化有可能避免或有选择地接触异质文化，尤其是来自异域的超越型文化，减少了文化冲突。

¹冯天瑜：《人文论衡》，武汉出版社，第34页。

²（日）桶口清之：《日本人与日本传统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页。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与外界文化的接触方式是只进不出，只来不往。其原因有三：第一，日本是岛国，周围是海洋，尽管海洋在古代使日本同外界相对隔绝，但是对于那些能够克服海洋障碍的人来说，日本岛又是一个向四面开放的场所，成为多种文化交汇的十字路口。对于日本来说，不具备超越异质文化的能力，只能将其接受融合。第二，文化势差决定日本与大陆的“传承”关系，先进的中国文化流向日本，日本成为大陆的“卫星文明”。第三，日本文化是针对本国国情加工外来文化而形成的文化，缺乏普遍性，因此较少对他国文化产生影响。

文化类型不是文化与生俱来具体存在的现象，是人们为了研究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理论划分，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自生文化也难免借鉴，摄取文化也离不开创造，曾经文化单一不等于以后不引进其他文明。文化类型只用来说明历史，分析具体的文化现象还应采用发展的辩证的眼光，不该囿于文化类型。

三、 精神文化差异

马克思指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¹。自然环境影响人类的发展，必然也影响人的精神文化形成。中日两国的自然环境不同，在人的精神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思想上的“合”与“和”

¹转引（苏）弗普罗宁可夫等：《日本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引言。

古代中国是一个地域宽广、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适宜人类生息繁衍的国度。在这块大地上，上天赐予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人类对天地饱含感情，当他们在蓝天下放牧，在阳光下播种时，会感到自己融入了天地间，天地就像父母一样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天地万物与吾一体，这就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就是将事物看成一个整体，天人不分，天就是人（心），人（心）就是天，充分发挥“本心”的作用就可与天同体，人心就是一个小宇宙。由“天人合一”思想又派生出“知行合一”、“情景合一”的命题，提出认识、道德、艺术、审美等方面的标准，其核心都是“合”，强调事物间的互相联系、和谐统一。

日本文化思想的核心为“和”，这同其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日本是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个人难以应付火山、地震、台风带来的严重灾难，必须依靠众人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生存。其次，日本农业主要的生产方式是种植水稻，水稻的季节性很强，在气象多变的条件下，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在短时间内完成。因此在与他人合作的过程中“和”的精神尤为重要，用“和”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指的是“宽容”、“忍让”、“和谐”、“和为贵”。另外，日本与大陆一海相隔，大海阻止了外族的入侵（历史上日本未曾被异族占领过，据载13世纪忽必烈曾想占领日本，但被忽然而至的台风刮跑），保证了岛上民族的单一性，有助于“和”精神的推广。日本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民族”，其精神谓之“和魂”。

（二）道德中的“孝”、“仁”、与“忠”、“勇”

中国强调“孝”，孝是封建伦理道德的基础，所谓“孝为百善先”。古代中国社会是宗法社会，依靠血缘纽带联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古代的氏族生活在黄河流域，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居民流动性不大，工商业不发达，建立奴隶制政权时，血缘关系没有被打破，最后形成家国同构。

与中国不同，日本社会虽然也是根据家族原理组成的，但这种家族主要是经济共同体，其成员未必都出自同一血统，实际是“集团”而非“家庭”。因此，与中国相比，日本是一个半宗法社会，凝聚这个社会的道德核心是“忠”，不是“孝”。前面已经提到，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水稻农业生产方式，使日本文化重视群体的存在，强调个体归于群体，强调群体的和谐统一，其结果导致群体封闭，群体圣化，群体成员具有强烈的归属感，忠于群体。封建幕府时期“忠诚”成为武士的道德，强调从者接受主君的恩赐必须回报、履行义务，具体包括“服从”、“隶属”、“献身”等方面。后来“忠诚”又演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国民道德，忠于国家，效忠天皇。

其次，在道德内容方面，中国儒家思想推崇“仁”，相信“仁”是人类本质的道德，是治理家国的原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把“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点，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成仁”。日本道德忽略“仁”，强调“勇”，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为武士阶层所推崇和遵循。在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撰写的《日欧比较文化》一书中，记载了日本武士夸耀脸上的刀疤（“向庇”），鄙视脑后受伤的情况，¹显示了武士以勇为美的道德观。中日这种道德差异同地理环境有关，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中国崇山耸立、平原坦荡的地理环境生就仁者，富庶安稳的生活令人向善；反之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经受连续不断自然灾害的日本人，必须意识到勇敢的可贵，从而推崇舍生忘死的大无畏精神。

（三）性格里的“粗犷浪漫”与“精巧谨慎”

¹（葡）路易斯·弗洛伊斯：《日欧比较文化》，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7页。

960 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使中国人对“大”颇为衷情：喜欢花很长时间建造规模宏大的长城和宫殿；喜欢把天地融为一体，从大的范围思考问题；喜欢把世界归为“大一统”，推行和平主义；自高自大，喜欢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中心。另外，国土之大毋需向外扩展，故而形成中国人的“内拓”性格，不仅在国家疆域和文化领地方面向内地开拓，而且在精神领域也主张向内开拓，好思辨、内省。同时，自然环境优越，生活富庶，时间充裕，又养成中国人的浪漫、慵松、平和宽容、得过且过的性情，主静——不善争斗，务虚——遵礼隆法，不重视实用科学的发展。

生活在面积狭小列岛的日本人，喜欢精巧浓缩的东西，如短歌、俳句、庭院组石、剑法、柔道、花道、茶道等；多变的气候形成日本人敏感的性格，善于洞察外界的变化，重视别人对自己的评价（日本人竭尽全力收集外国出版的有关日本的报刊资料）；长期在狭小的水田里劳作，养成日本人精细谨慎的品质；火山、地震、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的经常出现，带给日本人的是无奈、随波势去的无常心理；同时，为了应付自然灾害，使日本人对实用的东西更感兴趣。另外，日本人的性格具有明显的两重性——“静穆的激情，战斗的恬淡”。这是由日本特有的气候决定的。日本除北海道之外，其他地区都具有热带、寒带双重特征，夏季台风暴雨侵袭列岛，冬季日本又是世界上降雪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大雨大雪的双重自然现象，形成日本人性格中的“季节性”突发的特殊成分。

从上所述不难发现，近代以前地域确曾给中日文化带来差异，这种差异对两国的近代化以至后来的发展都产生过深刻影响。本文尝试找出地理环境同文化间的联系，目的就在于更好地理解中日民族及其历史。然而，构成文化的因素很多，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否认它对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过分夸大它的影响也是不正确的，正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我们不应该把自然界估

量得太高或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¹另外还应注意，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人类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地域对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正在逐渐减弱。

¹黑格尔：《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版，第 123 页。

中国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

刘斌

近代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发生历史性剧变时期。从由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裂变程度看，妇女伦理思想在近代所面临的挑战、递变与建构是社会最深层次，也是影响最广泛的变革之一。它涉及到了妇女道德意识、道德实践活动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带给人们生活方式、观念认识的诸多改变，尤其是妇女伦理思想转变与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紧密结合，不断推进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使近代妇女伦理问题更具研究价值。当下，我们同样面临社会转型，一系列伦理道德需要完善，甚至重建的关头，旧有的伦理道德如何扬弃，如何应对不断出现的新的涉及伦理道德问题，尤其是女性伦理问题。笔者认为，以史为鉴不仅可以使我们准确地分析诸多伦理现象，而且对新时期伦理道德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

伦理道德是人的心理、思想和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它属意识形态范畴，受社会存在的制约。所以，不同的社会形态会有不同的伦理道德。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的伦理道德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并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规范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中国封建社会既是一个等级结构的社会，又是一个宗法组织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广大的妇女既处在封建等级的最底层，同时在家族内部受尊卑关系的制约也处在卑下的境地。所以，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封建道德对妇女道德意识和道德活动的规范是非常严格的。“三纲五常”是封

建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根本准则，夫为妻纲、男女有别是一切束缚女性，实现男尊女卑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封建统治阶级还专门为妇女制定了一系列道德规范。

“三从四德”是封建社会妇女的生活原则。《礼记·丧服·子夏传》中解释“三从”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东汉班固在《百虎通义》中对“三从”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男者，任也。女者如也，从如人也。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没从子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妇者，服也。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四德”最早见于《周礼》，班昭的《女诫》对“四德”作了这样的诠释：“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

“三从”、“四德”把女性一生都置于以父、夫、子为代表的男性控制之下，失去自我，为他人而活着，完全成为任男人摆布的木偶。

男女有别、男外女内是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产物。《礼记·内则》曰：“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外内不共井，不共湣浴，不通寝席，不同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始于谨夫妇，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阍、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任组紃，学女事以共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笱豆菹醢，礼相助奠。”男外女内把妇女与外界全然隔绝，女性被囚禁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里，成为料理家务、侍奉公婆丈夫、生儿育女的贤妻良母。

封建礼教灌输女性严守“男女授受不亲”的戒律。尤其在婚姻大事上，需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得违抗。在男权社会中，这种婚姻关系受害更深的还是女性，她们被看成是传宗接代的工具，甚至是家族交易的砝码。一旦婚姻关系确立，她们一生的命运就完全操纵在丈夫手里，永远不能改变。在婚姻生活中，女性还深受妻妾制、“出妻”，尤其是片面贞操观的危害。从宋代起，封建的贞操观得以强化，“从一而终”、“一女不能事二夫”、“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将妇女紧紧地束缚在婚姻之中。封建统治者还用褒奖的方式，为“节妇”、“烈妇”、“烈女”、“贞女”建贞节牌坊，树立极端的“榜样”，形成扭曲的社会风气。贞节观使广大妇女失去了自主精神。

传统礼教还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把妇女禁锢在无知、愚昧的状态之中。在审美情趣上，推崇女性的所谓“柔弱”美，女子要懦弱纤细、轻声柔气、步履轻盈、举止舒缓、胆怯怕羞、不善言语。这种审美标准发展到极致，于五代和宋朝，兴起了妇女缠足风气，并被历代所效法风行了1000多年。缠足不仅是对妇女身体的摧残，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枷锁，本已被“男外女内”束缚在家中的妇女，因缠足行动不便，活动的天地更加狭小，精神世界更加封闭，性格更加怯懦柔顺，最终成为男性得意的玩偶。

值得指出的是，这些针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在历代封建统治者的倡行和教化下，已成为女性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历史上，附和封建礼教的“女教”之作，如《女则》、《女训》、《女孝经》、《女论语》等都出自女性之手。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活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的广大女性，即遭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和残害，同时，她们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即便是个别女性有冲破礼教束缚的言行，也会受到包括来自女性在内的全社会的唾弃。

这种道德主体意识的丧失不仅透视出传统礼教对妇女残害之深，也预示其改变的难度是极大的。

但是，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在外力作用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改变，上述妇女伦理道德在新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面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鸦片战前，中国是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家庭小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生产模式，使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在一个男耕女织，耕以足食，织以致余，以织助耕的生存状态中。战后，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巨大的分解作用。这时输入中国的商品大多为棉纺织品，并以物美价廉占据了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棉纺织业遭受到严重打击，土纱土布生产日益衰落。耕织分离，自然经济的基础被打破了，这是近代中国社会一切变革的基础。纺织分离、耕织分离使以织助耕更加困难，众多农户陷入贫困破产状态。在外国商品能够到达且商品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一些农妇转而从事如缫丝、拣猪鬃、编草帽辫等新兴手工业，但更多的农妇则跟随破产的农民大军流入城市，成为日后机器纺织生产的后备力量。无论是从事新兴手工业的农妇，还是日后成为机器纺织生产的女工，她们原有的生活状态均被打破。一是在家庭经济上，越来越多地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责任；二是脱离了男耕女织的小农生活方式，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从事近代职业，她们的家庭地位乃至社会地位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美国学者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在论述现代化与妇女平等权利时说：“那些将导致促成现代化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会逐渐改变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使他们从心理上、行为上都赞同给予妇女与他们所享有的差不多是同等的权利和地位。”“通常对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和权利表示尊重，愿意让妇女在决定家庭事务时有发言权，同意甚至鼓励妇女走出家庭参与国家和本地区的政

治生活，参加各种社会工作，也能听取妻子提出的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和建议。”¹ 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论述的男人对妇女态度转变是“在获得较高的现代性后”的一种状态，但在获得较高现代性的过程中，任何相应的改变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鸦片战争后妇女社会生活的改变虽不具有普遍性，但作为新的社会存在，它代表的是近代社会发展的方向，随着这种改变的不断深入，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的基础也就越来越牢固了。

在经济侵略的同时，西方基督教与资产阶级思想也传入中国，在与中国传统礼教发生全面碰撞的同时，也为近代妇女伦理思想的演变与构建提供了思想武器。两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获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他们是带着用基督征服中国的目的而来的，除民间传教外，还通过办学校、医院、慈善救济机构，翻译西书，出版报纸等途径来扩大教会的影响。这些传教士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者。值得注意的是，西方教会针对中国传统礼教——男女授受不亲，有意识地派出了大量女性传教人员，到19世纪80年代，在华女性传教人员的数量已超过男性。她们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对中国广大妇女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生活状态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使命感也更为强烈。就改变妇女生活方式、启蒙女性意识和突破传统礼教对女性的束缚而言，在华传教士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了有效的尝试。第一，以众生平等的宗教观念冲击传统尊卑观念，提倡男女平等。第二，利用教会在华各类出版物，介绍西方国家女性教育、职业、社会活动及妇女运动开展情况，同时对中国社会缠足、溺女婴、纳妾等陋习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三，提倡女子教育，创办教会女学。第四，开展不缠足运动，改变社会风俗。第五，通过创办师范、医专、护校、妇女圣经学校等对女性实施职业教育，培养其职

¹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68、88、89页。

业技能和提供就业岗位。教会上述所为对中国广大女性生活方式、生存观念的改变具有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长期生活在传统礼教下的国人，不仅知晓了西方女性是如何生活的，而且接触到了与男尊女卑直接对立的男女平等观念，促使他们在思考社会问题的同时，以西方女性生活为参照系，质疑传统妇女伦理思想，关注妇女问题。教会创办女子学校（包括女子职业学校），不仅开创女子学校教育的先河，为日后维新派开办女学提供了范式，而且塑造了有知识、有职业技能的新型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态度犹如一面旗帜，其感召力不言而喻。教会开展的不缠足运动从更广泛的社会范畴冲击传统礼教，对改变妇女生活起到更直接的作用。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新的阶级力量产生并不断壮大，他们在变革旧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并以之为武器对封建专制政治及维护这种政治制度的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更广泛、更深入的批判。“三纲五常”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也是妇女伦理思想的基础，批判传统伦理道德自然会触及妇女伦理思想，况且传统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束缚与残害已发展到极至，已形成巨大的社会痼疾，以至于任何想改变近代社会现状的阶级和阶层都会注重妇女问题，在妇女伦理观念上反思传统，借鉴西方。从此意义上讲，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是反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内容，并始终与政治变革紧密相联。

二

妇女伦理思想在近代的演变与建构历经了酝酿、基本确立、完善、不断完善的历史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洋务派对妇女伦理问题的关注

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传统的外交、军事、生产方式及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传统伦理思想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洋务派在对“贵义贱利”、“重农抑商”和“黜奢崇俭”等传统伦理道德进行批判，提出“求利”、“逐利”、“商本”等洋务伦理观的同时，对传统妇女伦理思想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洋务派对妇女伦理问题的关注是基于其对西方社会了解的加深。他们或通过考察、游历，或任驻外公使，或长期接触、研究西学，对西方社会有了切身和深入的理解。王韬于1867—1869年在英法游历时发现，英国的教育“女子与男子同，幼而习诵，凡书画、历算、象纬、舆图、山经、海志，靡不切究穷研，得其精理”。婚姻家庭上“国中风俗，女贵于男。婚嫁皆有择配，夫妇偕老，无妾媵”¹。1876年李圭在美国参加世界博览会，参观了其中的“女工院”，看到妇女所著各种书籍、绘画、图卷，所做的各种精巧器具，甚为惊叹。他们的总体印象是“泰西风俗，男女并重”。反观中国社会，尤其是宋代以后，理学家极力宣扬封建礼教，导致“乱伦兽行之风日炽，逼死极烈之惨日闻”²。“朝野上下间，拘于‘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至妇女缠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戕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他们发出感叹“人生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³。

¹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107页。

²胡珠生：《中国近代人物丛书·宋恕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149页。

³夏东元：《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288页。

针对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洋务论者从改良社会道德风尚的愿望出发，提出了废除社会陋习、婚姻自主、一夫一妇等改良传统妇女伦理思想的主张。宋恕认为，中国社会存在着奴婢、娼妓、童养媳和妾四类极苦之民，她们的境遇苦不堪言，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对此要严禁收留童养媳，违者处以十年徒刑；严禁逼迫妇女为娼妓；严禁买卖奴婢，现存的奴婢改作雇工；严禁虐待小妾，家中妻妾平等。对缠足陋习，要求“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仍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为进一步改变女性生活，他们还主张“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匾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他们希望通过新的社会教化，能“利兴弊去，二百兆裙钗皆能佐夫教子”¹。在婚姻家庭上洋务论者认为，男女婚嫁应依循自主自愿的原则，父母可以出面办理相关事宜，但必须是男女当事人“于文据上亲填愿结，不能书者画押；其无亲父母者，悉听本男女自主，严禁非本生之母之伯叔兄弟等强擅订配”²。婚姻缔结后，男女双方均不必死守从一而终的旧俗，“夫有出妻之礼，妻有请去之礼”，以礼相待，离合自由。他们尤其赞赏西方社会“夫妇偕老，无妾媵”，感叹“一夫一妻，实天之经也，无论贫富悉当如是”³。

¹夏东元：《郑观应集（上）》289页。

²胡珠生：《中国近代人物丛书·宋恕集（上）》，149页。

³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原人》。

洋务论者对妇女伦理问题的思考与主张，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婚姻家庭观念中一夫多妻、从一而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束缚和残害女性的伦理道德思想，对改变身为“极苦之民”的女性生存状态、传统女性审美情趣及女性无受教育权利等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洋务派借鉴西学也罢，质疑和修正传统礼教也罢，均是从维护王朝统治的目的出发，严守“中体西用”的原则，这就使其思想和主张仍停留在封建礼教大范之内，对解决妇女问题途径的探讨也缺乏深度和广度。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他们在提出建立新的君臣、家庭伦理主张之后，思想渐趋保守，认为“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是整合人心，救中国的基础。所以，洋务论者没能也不可能对传统妇女伦理思想进行更深入的批判。洋务派对妇女伦理问题的关注开启了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的历史进程。

（二）维新派妇女伦理思想与主张

19世纪末中国社会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的局面。为挽救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继承并发扬洋务改良思想，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发起了一场全面而深刻维新变法运动。这时，维新派变革社会的理论基础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进化、变易、民本等思想外，还有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等思想，其理论主张更完善，也更具科学性。为实现君主立宪政治主张，维新派对封建专制主义及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纲常伦理进行批判。“三纲五常”是封建礼教的核心内容，也是传统妇女伦理思想的基础，维新派在对“君为臣纲”、“父为子纲”批判的同时，对“夫为妇纲”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妇女伦理思想进行揭露和批判，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维新派揭露和批判了封建礼教对妇女的压迫与摧残。他们指出：“男外女内”、“男女授受不亲”使妇女“学问无由进，识见无由开，一步不可行，一

物不得见，从者谓能修礼防，谓之贤媛；不能从者谓之无廉耻，以为荡人”，“终身深居闺闼，不出中庭”，过着“为囚”的生活；“数岁弱女，即为缠足”，“日夕迫胁，痛彻心骨，呼号艰楚，夜不能寐”。长大后“扶壁而后行，跪膝而后集”。“以兹纤足，躬执井臼，或登梯而晒衣，或负重而远行，蹒跚踟蹰，颠覆伤生。至若兵燹仓皇，奔走不及，缢悬林木，颠倒沟壑，不可胜算”。加之穿耳挂环，带指环、手镯，“状类枷锁”，过着“为刑”的生活；为人妇者，烹饪、侍膳、破柴、汲水、扫除门庭、缝纫衣服、洗沐、按摩、盥衣等无所不为，且“少不如意，即加诃骂”，她们被随意役使、凌虐，“纳妇之金等于买奴”，过着“为奴”的生活；女子一旦嫁人，“事夫、畜子以尽其业，胼手、胝足以为其家，守节、从一以终其身，茹苦、含辛、怀贞、守独以终其年”。“私为一人之有，若产业器用者”，过着“为私”的生活；男人看女人“但问其美否以为爱玩。是故为之衣裙五采以绚之，为之金玉珠石以饰之，为之步摇花朵以丽之，为之涂脂抹粉以艳之”，女子被“囚以重室，锁以细腰小足，枷以金珠玉石”，过着“为玩具”的生活。¹何以形成整个社会对妇女的压迫、歧视和残害？维新派认为是宗法专制制度和封建礼教造成的。宗法制度规定男性传宗，确定了男性绝对权利，使女子失去了独立之人权，变成男性之私属；“夫为妻纲”使男子“自命为纲”，合法地占有和奴役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父死从子”的三从妻道，把妇女一生置于男性控制之下，不得立门户，不得存姓名，不得顾私亲；“女子无才便是德”剥夺妇女受教育的权利，造成一家之中“男子则文学彬彬，妇女则鹿豕蠢蠢，虽被服相

¹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华夏出版社2002年166—172页。

近，有同异类”¹；“守节”、“从一而终”，不顾男性“姬妾罗侍，放纵无忌”²，单方面要求女性忠诚于男性，并剥夺了女性再嫁的权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使婚姻“本非两情相愿，而强合渺不相闻之人，絜之终身，以为夫妇”³，女性失去婚姻自主权。封建礼教使“今大地之内，古今以来所以待女子者，则可惊，可骇，可嗟，可泣”⁴，是妇女受压迫的道德根源。

如何改变妇女的生存状态，康有为从建立“大同”社会的愿望出发，提出了男女平等，各自独立的主张。他认为在大同社会里，“女子有独立之权，一切与男子无异”⁵。“男女平权，男女平等，同事学问，同充师长，同得名誉，同操事权”⁶。在男女平等平权的基础上，婚姻是男女双方自愿订立的“交好之约”，随时可因当事双方的意愿解除或续签合约，“不得有夫妇旧名”。男女交合，所生婴儿不得用父母之姓，由“育婴院”统一供养。这样，不仅家庭不存在了，而且夫妇、父子、兄弟之伦也不复存在，也就清除了残害女性的传统礼法的根基。针对太平之世不能骤至，康有为又退次制定了女子升平之制。

“宜先设女学，章程皆与男子学校同。其女子卒業大学及专门学校者，皆得赐出身荣衔”，且终身带之；女子学有所成，“许选举、应考、为官、为师，但问才能，不加限制”；“女子中有愿充公民、负荷国务者，听其充补。其才能、学识足为议员者，听其选举”；“法律上应许女子为独立之人格，所有从

¹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160页。

²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M]，中华书局1981年304页。

³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M]，304页。

⁴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M]》，154页。

⁵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M]》，151页。

⁶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M]》，240页。

夫限禁，悉为删除”；“婚姻皆听女子自由，自行择配，不须父母尊亲代为择婿”；“女子有出入、交接、游观、宴会，皆许自由”；“女子既为独立之人，其旧俗有缠足、细腰、穿耳鼻唇以挂首饰者，以及长布掩面、蔽身，加琐于眉中、印堂者，悉当严禁”；“女子与男子衣服装饰当同”，“既无形色之分，自无体制之异，如是而后女子为师，为长，为吏，为君，执职，任事，乃不异视”¹。这里，康有为从教育、国事、法律、婚姻、社会风俗，甚至服饰等方面规定了女性的相应权利，以实现其男女平等的主张。在康有为看来，男女平等是天赋人权的体现，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基础。他指出：“故全世界人欲去家界之累乎？在明男女平等各有独立之权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国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去种界之争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全世界人欲致天平之世、天平之境乎？在明男女平等各自独立始矣，此天予人之权也。”²这样，康有为把实现男女平等与社会进步紧密结合起来，使其男女平等思想有了实践的基础。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开展兴女学、不缠足运动等，把男女平等主张付诸实践，推动了妇女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除康有为之外，其他维新思想家也不同程度地阐述了男女平等的思想。谭嗣同对封建社会妇女遭受的种种奴役和欺侮深表同情，在痛斥了封建节烈观，包办、买卖婚姻，缠足、溺女婴陋习等基础上，指出：“重男轻女者，至暴乱无礼之法也”，“男女同为天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³。梁启超从男女平权出发，尤其注重女

¹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M]》，198—199页。

²罗炳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名著·康有为大同书[M]》，296页。

³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下）[M]》，中华书局1981年348、349页。

学问题，他认为女子受教育的程度与国家兴衰密切相关，女性受教育才能成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贤妻良母¹。严复通过中西对比，强调女性自强是国政的根本，而要想使女性自强，就必须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实现男女平等。

维新派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天赋人权论中寻找到了批判封建专制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有利武器，在全方位地分析中国女性家庭生活、社会地位的基础上，对传统妇女伦理思想基础——“夫为妻纲”和核心内容——男尊女卑进行批判的同时，提出了男女平等、平权的主张，冲击了传统妇女伦理道德中男外女内、从一而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女子无才为德等观念。他们对传统妇女伦理思想的批判不可谓不尖锐，男女平等、男女平权主张的提出不可谓不进步，解决妇女问题的实践不可谓不震撼，这一切使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与建构进入了一个质变的历史阶段。但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他们无力从根本上认识封建礼教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根源与社会根源，改良的政治立场，也使他们不可能消灭封建礼教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也就不可能为新的妇女伦理思想的建立打下坚实的基础。维新派对妇女问题的探讨说到底是其改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没能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妇女伦理思想体系。维新派妇女伦理思想和主张为近代妇女伦理思想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妇女伦理主张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民主革命派以西方近代民主学说为武器，向封建专制主义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他们在维新思潮的基础上，进一步宣传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民主主义思想，提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要建立民主政治，就必须消灭封建专制制度，必须

¹李兴华、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51页。

在思想观念上彻底肃清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传统思想文化，包括封建伦理道德。民主革命派在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同时，已明确认识到道德革命的重要性，他们在了解了西方近代伦理学说之后，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发出了“道德革命”的呼喊。在这一过程中，妇女伦理思想的演变与建构更进了一步。

民主革命派在批判旧礼教、礼俗同时，提出了新的婚姻家庭观。他们认为旧式婚姻：第一，存在婚姻专制之弊。“主婚之全权，实在于父母，而无子女容喙之余地”，这是旧式婚姻中最大的弊端。男女婚姻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当事人双方“不得任一肩，赞一辞，惟默默然立于旁观之地位”，实则变成了父母选媳择婿。选媳时“为父母者，不问其子之才学如何，但思取得佳妇以为家庭生色”，“试问以惊才绝艳之名媛，配目不识丁之痴汉，则衽席之间，果能琴瑟协调否耶？”择婿时“为父母者，不问其女之才色如何，但思嫁得佳婿以为门楣增光”，“试问以锦心绣口之才，娶垢面蓬头之丑妇，则闺房之内，能相敬如宾否？”这种婚姻势必“为夫者不钟情于其妻，则狎妓蓄妾之风开矣；为妻者不钟情于夫，则外遇私奔之事至矣”，最终既“坏夫妇之爱情”，又“坏女子之品行”¹。第二，存在买卖婚姻之弊。旧式婚姻是家庭之间的一种交易行为，婚姻男女是交易砝码，交易的过程由双方家长完成，犹如商贾之贸易，“此与贩卖鹿豕牛羊何以异？”更为甚者，“绝世才媛，下嫁枯肠老夫”、“痴汉偏骑骏马走，巧妻常伴拙夫眠”²，婚姻悲剧也由此产生。买卖

¹张栢、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841页。

²张栢、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840页。

婚姻还造成攀比凌驾之风，败坏了社会风尚。第三，存在早婚早聘之弊。早婚早聘给人们带来修学、人种、经济、品性、不能事亲、不能教子、不能宜家室七种之害，至于指腹为婚、抱中论婚更是把儿女当作私有财产，全凭父母喜好来决定子女终身大事。第四，存在繁文缛节之弊。旧式婚俗“乐工礼生谓之六局，喜婆媒媪是为六婆，此两六者，实惟赘人”，“以一人之事，动劳百千之众，揆之公德，已属有亏；况以耳目之故，骗人于奴隶之域，上以病国，下以殃民”¹。

对上述婚姻之弊，革命派要求必须彻底清除，并建立“自由婚姻”和“法制婚姻”。他们认为：人类婚姻经历了掠婚、卖婚、赠婚和自由结婚四个时期，西方文明国家已进入第四个时期，惟中国还处在买卖婚时代，“即此一端，中国人之品格，其下于他国人数等，已可概见矣”。自由结婚是男女自行择配，然后订立婚约，形成法制婚姻。法制婚姻“一则结婚离婚，均可自由，兼可再嫁；二则行一夫一妻之制；三则男女同受教育，男女同入交际场”²，这与传统礼法婚姻相比要进步的多。所以，建立自由、法制婚姻不仅可以增进国人之品格，也是顺应人类婚姻发展的需要。

在家庭伦理上，革命派对“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父为子纲“就伪道德言之，父尊而子卑；就法律言之，父杀子而无辜；就习惯言之，父得殴骂其子，而子不敢复。因强弱之异势，迷信之误谬，故父尊而子卑，父得而统辖其子”，造成“为子者，自幼及长，不能脱于迷信与强权之范围”，世代相传，“阻人道之进化，败坏人类之幸福”。夫为妻纲“就伪道德言之，夫尊而妻卑。就法律言之，夫得出妻，妻不得离夫。夫执奸杀妻

¹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857页。

²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961页。

无罪而得奖，妻杀夫则为凌迟之罪。就习惯言之，夫嫖则为当然，妻与人交则为失节。因强弱之异势，迷信之误谬，故夫尊而妇卑，夫得而统辖其妇”，于是，“侵侮其妻，无所不至”。要追求人道之进步、人类之幸福，就必须“以真理去迷信”，“求自立以去强权”¹，实现父子平等、夫妻平等，就必须进行家庭革命。何谓家庭革命？“脱家族之羁轭而为政治上活动是也，割家族之恋爱而求政治上快乐是也，抉家族之封蔽而开政治上之智识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为政治上之牺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隶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产家族之恶果而收政治上之荣誉是也”。这里，家庭革命与政治斗争紧密结合，以家庭革命改变个人不自由，以政治革命改变国民不自由，使家庭革命的口号更具战斗力²。

革命派还进一步论证了女子实行家庭革命的重要性。女子“襁褓未离，而‘三从’‘四德’之谬训，‘无才是德’之警言，即聒于耳而浸淫于脑海，禁识字以绝学业，强婚姻以误终身，施缠足之天刑而戕贼其体干焉，限闺门之蛙步而颓丧其精神焉，种种家庭之教育，非贼形骸即锢知识，其不生而夭者幸耳”；与家中兄弟相比“无父母之恩，而有父母之虐”；出嫁后“洗手羹汤，躬操井臼，贤夫人职业，其天责之常哉”，且翁姑待之“其合不以情交，其心必存异视”，“其禁遏自由之权利，且不逊父母兄弟而尤过之”；丈夫于妻子“俨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权，杀人无死刑，役人如犬马，对称贱曰：‘妾’，自号尊为‘天’”。家庭礼法使女子无权利，轮为人奴，无自由，即为天囚，

¹张栻、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1016—1021页。

²张栻、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833页。

故家庭革命“女子实急于男子万倍”¹。况且，“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²，女子独立的人格不容侵犯，应有的权利不容剥夺。革命派号召同胞“溅热泪，运妙腕，奋一往无前之精神，持百折不回之愿力”，夺得“种种天赋完全之权利”，使广大女性“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有营业而后有生利，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之束缚、得种种之运动”³。

在旧礼俗批判上，革命派对缠足和女学问题进行了论述。他们指出：女子缠足，全是男子的罪过，是长期以来男性为了控制、玩弄女性而形成的扭曲的审美心理。缠足不仅给女性自身带来身体上和精神上的危害，而且因母亲缠足，运动不灵，血脉不通，所生儿女亦瘠弱天昏，整个民族人人成病夫。所以，从国家、民族利益考虑，缠足恶习必须铲除。传统社会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这是“独夫民贼，畏其民犯上作乱，日以愚民为事也”。女子无才一害家族，二害社会，三害国家，是“亡国之源，亡种之源”⁴。要改变女子无才，就必须兴女学，以兴办女学来铸造有个性、有独立心、有新风气的国民之母，以提高整个中华民族身体、心理素质和知识水平，改变社会道德风尚。

婚姻与家庭伦理是社会伦理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束缚和残害女性的主要伦理思想。革命派揭露和批判了传统妇女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男尊女卑”及由此所规定的男外女内、从一而终、保守贞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诸多妇女伦理思想。与维新派相比，他们更多地借鉴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道德主张，

¹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926—929页。

²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922页。

³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926—929页。

⁴张枏、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922—924页。

把婚姻自由、家庭平等与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甚至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思想水准有了明显的提升。他们在分析传统婚姻与家庭伦理产生的根源时，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宗法家族制度和家族伦理，提出“家庭革命”的主张，使斗争目标更明确。从强调个性解放、人格独立的角度出发，革命派进一步论述了妇女经济权利问题，提出“自营生计”，“有营利而后有生利”的主张，从本质上找到了妇女摆脱男权统治的途径。当然，这一时期民主革命派的首要任务是进行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政治斗争，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细致地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虽然提出了“道德革命”的主张，但如何进行道德革命，如何建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伦理道德，就婚姻家庭而言，如何真正作到婚姻自由、家庭平等，树立起新的婚姻家庭观，革命派没能明确回答。加之其宣传与鼓动局限于知识界，没有深入到社会中下层，其启迪民众的作用受到了局限。尽管如此，民主革命派的婚姻与家庭主张对近代妇女伦理思想建构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主义者的妇女伦理观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民主主义者以“民主”与“科学”为武器，向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反对旧伦理、旧道德是这场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妇女伦理道德而言，主要是通过剖析女子婚姻家庭、女子贞操、女子社交、女子教育、女子职业和女子权利等问题，在批判传统礼教的基础上，提出其观点和主张，使妇女伦理道德有了新的内涵。

在婚姻上，民主主义者认为婚姻应是恋爱的结合，自觉的、真一的异性恋爱，即“人格的爱”是婚姻的基础。异性恋爱，确定男女情感，用胡适的话说

要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才可以有形体上的结婚，否则，婚姻只能是异性的强迫同居，这不是真正的婚姻，也就谈不上婚姻自由。婚姻自由“不是没有限制，可以放任径行”，而要受法律的制约，法律应保障婚姻契约缔结和解约的自由，即订婚和离婚的自由。所谓订婚自由即所订婚约“必须根基于自由选择、自由意旨，丝毫不受外力的牵引”，而传统社会指腹为婚、父母之命“都是野蛮的结合”。有了爱才有婚约，婚姻过程中，有一方没有爱了，婚约就可以解除，这就是离婚自由。离婚后，男女双方“各自回复原状，当然又有再婚自由”¹，以往男尊女卑，男可再娶，女不能再嫁，这是专制的表现，是侵犯了他人的自由权利。民主主义者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契约和法律的角度论证男女均有结婚、离婚、再婚的自由，把爱作为婚姻的基础，并考虑到离婚自由可能会使那些借故妻没有新知而要离妻的人有了借口，给婚姻造成负面影响，以及婚外爱对婚姻的危害，坚持一夫一妻制原则，表明其对婚姻内涵、婚姻形式等问题的思考较以往更理性了。

在家庭上，民主主义者论述了传统家庭伦理对妇女的残害。他们认为，传统礼教为维护父权为中心的家族制度，确定了男尊女卑的道德原则，使男性家长拥有无限权利，而女性只能卑贱屈服。男外女内，妇者服也，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一切使专制时代之妇女“幽闭闺闼，不能自主”，失去自由，“为男子之财产，为男子之奴隶”。不仅如此，传统礼教所具有的超道德的强制性，使夫妇之伦于刑律上也有明显体现。律例论刑“以夫同于尊长也”，“以妻同于卑幼也”，夫殴妻，妻殴夫，“则妻独加重三等，夫独减轻二等”。“重男轻女，刑礼同然”。所以，民主主义者认为，要争取家庭中男女平等、夫妻平等，除要扫除与人道主义相对立的“天尊，地卑，扶阳，抑

¹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234页。

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外，还要争取“法律上之平等”，争取“法律内之自由”¹。

为了家族的延续，传统礼教规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围绕“有后”，又形成了卑贱女性的礼俗。“孝非有后不可，所以生子不待成年，已有家室”，早婚早生，“使数千万男女常陷于贫困，辛辛苦苦，苟全性命，以度无聊的生活”；“因有后之必要，妻苟无子，即犯‘七出’之条，而纳妾的制度，又因之而起”，为旺香火“必行一夫多妻和蓄妾的制度”；男人可为后，“生男则寝床弄璋”，女人不能为后，“生女便寝地弄瓦”，“男女的贵贱轻重，都由于能为后不能为后的关系，而溺女之风气又因之而起”；男子娶妻是为了繁衍后代，是对父母尽孝，女子也就成为男子传宗接代的工具。传统孝道还要求子女感恩、孝养父母，推之极至“不但做出活埋其子，大悖人道的事，又有自割其身，以奉父母为孝的”。为尽孝道，不惜以牺牲子女的人格为代价，此种孝道必须破除。如何破除？“父子母子，不必有尊卑的观念，却当有相互扶助的责任。同为人类，同做人事，没有什么恩，也没有什么德。要承认子女自有人格，大家都向‘人’的路上走”²。

传统礼教大力宣扬“从一而终”、“一女不事二夫”等贞操、节烈观，民主主义者对此进行了尤为猛烈的抨击。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指出：“节烈这两个字，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但到后来“却是专指女子”。按时下道德家的界定，“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

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4页。

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58、159页。

嫁，也不私奔，丈夫死得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设法自戕，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按着这个定义，女子一旦与男子确定夫妇关系，便成为某一男人的永久财产，一世做奴隶到底，为其而生，为其而死，这是不道德和不平等的。节烈专对弱女子，“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无非是以强权和美名来欺压和愚弄女子，是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节烈“极苦，极难”，且“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所以，要除去节烈之苦痛，“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¹

胡适对妇女贞操问题的论述首先从贞操的概念入手，着重批判了专制政府制定的《褒扬条例》。他指出：“在文明国里男女用自由意志，由高尚的恋爱订了婚约，有时男的或女的不幸死了，剩下的那一个因为生时情爱太深，故情愿不再婚嫁，这是合情理的事。”“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但在婚姻不自由的情况下，男女订婚后，“女的还不知男的面长面短，有何爱情可言？”没有爱情也就谈不上守贞操。传统礼教用青史留名“来鼓励无知儿女做烈女”，且通过褒扬来“渐渐养成一种舆论”，这是“不合人情，不合天理的”。“贞操是男女相待的一种态度”，男子要求女子为其守贞操，“他们自己却公然嫖妓，公然纳妾，公然‘吊膀子’。再嫁的妇女在社会上几乎没有社交的资格；再婚的男子，多妻的男子，却一毫不损失他们的身份”，这是何等能的不平等。如果贞操“是双方交互的道德，不是偏于女子一方面的”，那么男子、丈夫也应有贞操，其不贞操的行为应用“对

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16、122页。

待不贞妇女的态度来对待他。”北洋政府制订《褒扬条例》，褒扬守节寡妇、殉夫的烈妇，对男子不贞操的行为不去惩罚，显然是维护“男子专制的贞操论”，“是野蛮残忍的法律，这种法律，在今日没有存在的地位。”¹

李大钊更从经济上分析贞操问题，指出：中国的农业经济使大家族制度特别发达，“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以父权为中心的家族制度规定的夫妇关系，把“女性完全浸却：女子要守贞操，而男子可以多妻蓄妾；女子要从一而终，而男子可以细故出妻；女子要为已死的丈夫守节，而男子可以再娶。”顺、从、贞节“使妻的一方完全牺牲于夫，女子的一方完全牺牲于男子。”²实际上，在男子狩猎女子耕作时代，因女子地位高于男子，贞操问题绝不会发生，“而且有一妻多夫的风俗”。到畜牧、农业时代，男子独占职业，女子靠男人生活，女子地位下降，贞操问题也就发生，“且是绝对的、强制的、片面的。又农业经济需要人口，一夫多妻之风盛行。”到工业时期，虽然生产技术进步了，生产数量增加了，但“资本主义的产业组织分配的方法极不平均，造成了很多无产阶级”，贫困加剧，女子不得不和男子一样从事社会工作。这时女子的贞操“就由绝对的变为相对的，由片面的变为双方的，由强制的变为自由的。从前‘从一而终’，现在可以离婚了；从前重守节殉死，现在夫死可以再嫁了。”随着资本主义灭亡，“生产的方法由私据的变为公有的，分配的方法由独占的变为公平的，男女关系也必日趋于自由平等的境界。只有人的关

¹易竹贤：《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73页。

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49、150页。

系，没有男女的界限。贞操的内容也必大有变动了。”¹这里，李大钊从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关系，阐述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制度的变化，最终带来男女关系的平等，贞操内容的变化，说明其对此问题的认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主张指明了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

民主主义者还在大力提倡男女社交公开、男女同校、大学开女禁、女子从事社会职业的同时，批判了封建“礼防”。他们指出：自从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并称后，历代男子就把“勿耽女色”、“勿谋及妇女”作为修身的大教训，“犯了这教训，便是终身之玷”。因为“他们认定男子和女子，只有个‘淫’字的关系，所以看女子和毒蛇猛兽一般，是不可与亲处的”。²于是设置礼防，规定男女不杂座；叔嫂不通问；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礼非祭，男女不交爵等等，限制了男女交往的自由，其结果“反而养成男女不规则的自由，而比较高尚人格的自由幸福，被他抑制摧残尽了！”实际上，女子也是人，人与人交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男女交往应是“有人格的男与有人格的女”的交际，无所谓礼防不礼防，那些“欲隔绝男女之界，以养成高尚人格”的想法与做法不仅做不到，而且是有害无益的³。当下，消除男女礼防的有效办法一是男女同校，尤其是大学开女禁，做到男女教育平等，以教育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打破男子轻视妇女的陋习，同时提高妇女自身的觉悟，认识到女子不比男子低，努力去争取更多的属于女性的权利；二是“援助女子在社会上得到职业，并进而作一切职业向女子开放的运动”。这样，女子通过从事

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42页。

²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28页。

³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74页。

社会职业，获得经济独立，“与一切男子占到平等地位，使一切男女都得到互相交际的机会”¹。

总之，这一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在批判封建礼教的同时，尤为重视妇女伦理道德，并从婚姻家庭、女子贞操、男女礼防的角度更深刻地剖析了旧道德习俗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了礼教“吃人”的本质。同时，其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妇女摆脱礼教束缚的具体主张，如以男女真爱为基础的婚姻自由，以人格独立为基础的男女平等平权，甚至把消灭私有制度作为男女最终平等的条件，表明其在打破传统的同时，有意识地要建立一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妇女伦理道德，即婚姻家庭及社会生活中女性独立人格的获得，以及在此基础上实现真正意义的男女平等与平权。这不仅赋予了妇女伦理思想新的内涵，而且对近代伦理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

从上述妇女伦理思想演变的过程，我们不难看出：

第一、传统妇女伦理思想在近代的演变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形成了一个以西方女性生活和社会地位为参照系，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基本理论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传统礼教对妇女的残害，提出新的妇女伦理主张，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运动轨迹。演变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不同历史环境和认识基础，对传统礼教的批判和新的妇女伦理道德主张在广

¹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188、189页。

度、深度和内涵上确有差别。如果说洋务思想家对传统妇女伦理道德的批判和所提出的解决妇女问题的主张开启了演变的历史进程，维新思想家在此基础上，深入批判传统妇女伦理道德，提出了男女平等平权的主张，基本上确立了新的妇女伦理道德的基础的话，那么，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则以婚姻家庭伦理为切入点，对封建礼教、礼俗展开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批判，他们的具体主张不仅丰富了男女平等平权的内涵，奠定了近代妇女伦理道德的基本架构，而且部分激进的思想家开始用阶级的眼光，把妇女问题的根本解决放在消灭私有制度的基础之上，指明了妇女伦理道德演进的方向。所以，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演变的四个阶梯，层层衔接，不断递进，形成了与传统妇女伦理思想有质的区别的近代妇女伦理道德。

第二、传统妇女伦理道德在近代的演变有力地推动了妇女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是妇女为获得本应具有的社会权利与社会地位而进行的社会革命，它要求女性作为运动主体的广泛和深入的参与。但是，对长期生活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广大妇女来说，传统妇女伦理道德已内化在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导致其自觉与不自觉地遵循甚至是维护传统礼教与礼俗，可以说这是妇女解放运动得以开展的最大障碍。所以，冲破传统妇女伦理思想，启发女性自我觉醒，确立新的女性道德意识来指导妇女解放运动是至关重要的。从此意义上讲，妇女伦理思想的演变与建构是妇女解放运动的基础。严格说来，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始于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思想家对封建礼教、礼俗的批判及不缠足、兴办女学等运动的开展，首先启发了知识女性觉醒，她们率先投身到自我解放运动中去。辛亥革命期间，民主主义者大力宣传西方国家妇女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自由权利，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实际斗争中，揭露批判封建婚姻与家庭伦理道德，把禁缠足、兴女学等具体问题同国家和民族前途联系起

来，动员了更多的人，尤其是广大妇女投身到反封建专制和礼教、礼俗的斗争中。辛亥革命时期，众多女性以“女国民”的身份，提出“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的口号，在争取自身权利的同时，积极参与反封建的政治斗争，担当起了推动社会进步的职责。辛亥革命之后，自由、独立的妇女伦理思想进一步发展，成为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因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主义者，在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抨击的同时，在社会上大力提倡男女社交公开、教育权利平等、女子经济独立、男女婚姻自由等观念，造就了一批有知识、有文化、有自我意识的新女性，她们成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同时，这些新女性率先垂范，带领广大妇女进行了范围更广阔、内容更深刻的妇女解放运动。

第三、传统妇女伦理道德演变与近代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联，鲜明地体现出中国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特质，这固然使演变后的妇女伦理思想更具实践意义，但同时，近代政治斗争的紧迫性与不同阶级、阶层服务于不同政治的目的性，决定了近代思想家们没能真正坐下来，就伦理问题本身进行深入的思考。说到底，伦理道德建设既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与需要，同时也要求人们的主观注意。近代，传统伦理思想中包括女性伦理道德并非完全是糟粕，如何扬弃？哪些西方伦理道德适用于中国的国情，该怎样取舍？怎样融合？这都是伦理建设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近代思想家虽然已认识到了改变传统伦理观念的必要性，提出了重铸国民道德的主张，也在一定程度上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就近代伦理建设本身而言，还没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近代妇女伦理道德的核心是男女平等平权，何谓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平权？怎样才能实现平等平权？如何将平等平权的主张内化成为人们的道德意识去指导道德实践活动？这

一切均是近代妇女伦理思想建构的关键性问题，近代思想家在这些关键问题上还缺乏更为理性的思考。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此外，男女平等平权的主张涉及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对社会的冲击也是全方位的，这就需要社会的广泛认同，尤其是广大女性的认同，要形成一种崭新的社会思潮。近代妇女伦理思想体系的不完备，势必会影响这一思想的更广泛的传播，从而也减弱了其指导社会实践的功效。

总之，传统妇女伦理思想在近代特殊历史条件下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发生了改变，并形成了以男女平等、平权为核心内容的近代妇女伦理思想，这是历史的进步。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使近代妇女伦理思想没能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传播与认同也缺乏应有的广泛性。但是，近代妇女伦理思想的出现对妇女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可磨灭。

毛文龙与“毛家将”述论

魏刚

毛文龙，字振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死于明崇祯二年（1629），是明辽东沿海地区的主帅，是17世纪明与后金在辽东沿海地区战争中至关重要的人物，是毛文龙军事集团的核心。毛文龙独树一帜、在辽东沿海地区活动的时间是从天启六年（1621）至崇祯二年（1629），共9年。而“毛家军”在辽东沿海地区的活动却直到崇祯十年（崇德二年，1637）才结束，前后共17年。在明清（后金）争夺辽东的25年间（1618—1643年），不可谓短。然而，多年来史学界的研究却明显地受明朝重辽西轻沿海战略的引导，更多重视的是辽西正面战场的影响和袁崇焕的作用，而对沿海战场与战略缺乏深入研究，对毛文龙亦持否定的态度。毛文龙究竟是罪人还是功臣，是非尚需讨论。笔者以为对毛文龙的研究尚未完结，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的结论需要质疑，结论似乎不应是一面倒。对毛文龙的研究不应局限于毛文龙自身，还应包括以他为核心的“毛家将”。本文试图通过对毛文龙和“毛家将”的军事活动及其作用，说明当时明清（后金）双方势力在辽东沿海地区消长的基本状况。

一

毛文龙是“毛家军”和“毛家将”的核心。毛文龙自幼丧父，寄居于舅父家中。曾跟塾师“治书习文”，少年时，喜好武艺，“善骑射”，颇有“治世

之志”¹。万历二十三年（1595），文龙随舅父到山东。期间，毛文龙不断听到来自辽东的紧急军情，决心从军辽东，干一番事业。经人介绍，毛文龙投辽东总兵李成梁，补内丁千总。后升为百户、千户、守备，成为一名下级军官。泰昌元年（1620）十月，毛文龙倡议捐资，修造火器，受到辽东经略袁应泰的赞赏，特“加游击衔”²。

天启元年（1621），经人引荐，毛文龙做了辽东巡抚王化贞的“练兵游击”，驻守广宁。五月，王化贞派毛文龙“往河东等处招致遗民，恢复疆土”³。毛文龙率军丁约 200 人，乘船，从三岔河口出海，沿辽东半岛西海岸南行，进取连岛和猪岛（今大连金州区西 40 里海中），沿途致书招抚盖、复、金州各卫后金汉人游击。由猪岛登岸，越金州地峡，转往广鹿岛（今属长海县），捉获岛官胡可宾，“安抚居民一百六十余家，民丁七百余户”⁴。接着又往哈店岛（今长海县哈仙岛）挺进，“擒获岛官任光先，安抚居民二百余口”⁵。七月初九日，又进占大小长山岛，先后“收复郭长儒等六百人”、“李二等三百名”⁶。接着进抵石城岛，擒获岛官何国用。还掳获“夷船三只，铜炮二位，铁炮四位，安抚宋尚元等住民千余”⁷。毛文龙从诸岛“归正”军民中补充兵员，使毛家军由少到多、不断壮大。继而又收复了色利岛（长海县塞里

¹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³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⁴《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⁵《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⁶《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⁷《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岛)、章子留岛(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王家岛等。所到之处“召集难民,归者甚众”¹。这样,辽东沿海各岛又重归明军掌握之中。

毛文龙率部向东抵达朝鲜西海岸弥串堡时,侦知镇江(今丹东)后金守将佟养真派兵出城,往救黄嘴、双山等处,城内空虚,遂决计袭取该城。他先派人说服佟养真的中军陈良策归附并约为内应。七月二十日夜,在毛文龙的部署下,千总张攀率兵百余人及屯民从侧翼前进,堵绝金兵归路;千总陈忠率兵丁200余人乘夜渡过鸭绿江,在镇江城外20里处上岸。对镇江城形成包围,接着,“喊声齐发,一鼓登城,内外夹击”。守城的后金兵惊魂落魄、四散逃命。佟养真及其子佟丰年、侄佟松年等进行抵抗,被入城明军击倒,“仆地就缚”²。“毛家军”成功地夺取了镇江城。在镇江之捷的鼓舞下,宽甸、汤站、险山等堡的军民纷起响应,擒拿后金守将,归附毛文龙。辽东巡抚王化贞闻讯后向朝廷报捷,明廷授毛文龙为广宁都司,兼副总兵,命其驻守镇江,相机进取。“毛家军”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受到百姓的欢迎,牛酒慰劳,车马捆载,“响应奔附,不可胜计”³。“毛家军”由最初200人左右迅速发展 to 万余人,成为牵制后金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辽东沿海地区为明朝开辟了第二战场。

努尔哈赤得知镇江失守的消息后,急派皇太极、阿敏率军三千前往镇压。由于辽西明军观望不前,毛文龙孤掌难鸣,面对后金军的强势进攻,只得放弃

¹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³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镇江，退往朝鲜境内。在朝鲜的支持下，于天启二年（1622）五月率部移驻皮岛（今朝鲜楸岛）。六月，明廷授毛文龙署都督建僉事，平辽总兵官。

皮岛位于鸭绿江口东南朝鲜湾，又称东江，东西 15 里，南北 10 里。“自天启元年河东失，民多逃岛中”¹。毛文龙设镇岛中，广招辽民，开屯耕收，通行商贾，使皮岛成为东江雄镇。皮岛虽地近朝鲜，可得到友邦的援接，但由于远离金州、旅顺和登州等要地，其战略局限性在日后表现得越发突出²。

为了牵制后金军对辽西的进犯，毛文龙决计夺取金州要地。他与诸将商议道“辽东要地，惟金州南通旅顺口，北至三牛坝，西通广宁，东可图复。此城若得，陆扼建州骑，水可登州运粮，停泊”³。为了迷惑后金军，毛文龙派遣小股兵力袭扰东堡、长甸、会安堡、白羊口等地，“日日放炮，以为声势”，以转移后金的注意力。与此同时，命守备张盘、程鸿鸣等率主力自麻羊岛向金州城进发。七月初三夜，张盘等率军抵金州城南门，“各举火把，呐喊放炮”，四方“老幼辽民助张声势”。城内居后金兵仅五百余人，惊慌从北门逃奔。明军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金州城，缴获后金“大小炮铳一千零十四位，硝磺连药五百六十斤，大小铁铅炮子一千三百零二个”⁴。天启三年（1623）四月，后金军万骑攻打旅顺，被毛文龙部将都司张盘击败，后金遣使劝降，张盘怒斩来使，并设伏再次大败后金军。战后，明廷加授毛文龙为左都督、赐尚方剑。

¹ 《明史·毛文龙传》。

² 魏刚：《明朝设镇皮岛的战略得失》，《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 年 2 期。

³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毛文龙入皮岛”。

⁴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外二种），“天启元、二两年塘报”。

天启四年（1624）四月，毛文龙派兵在高岭、沙松牌击败后金军。五月，毛家军沿鸭绿江、越长白山，袭扰后金辉发江一带。五年六月，发兵夜袭耀州（辽宁营口西北岳州村）官屯寨。九月，发兵袭海州张屯。六年五月，遣兵袭鞍山驿（今鞍山南三十里旧堡）。毛文龙凭借辽东东部山区的有利条件，采取小股部队的游击战术，曾搅得后金不得安宁。但由于每次军事行动规模太小，最终结果往往是败多胜少，使出奇制胜的成果得而复失。如袭取镇江、金州却不能保有，远袭辉发的明军却全军覆没等¹。天启五年，后金军六千攻破旅顺，全歼守城明军。明军守将张盘、朱国昌皆战死。所谓“牵奴有余”的评价，言过其实。

努尔哈赤为解除后顾之忧曾先后两次派人致书毛文龙进行诱降，毛文龙都不为所动。皇太极即位后，毛文龙为缺粮短饷所困，也曾派人前往联系，提出议和。皇太极亦派使者至皮岛进行商议。但最终均未有结果。这些议和活动成为日后毛文龙谋叛的罪证。

毛文龙开镇皮岛，时时袭扰后金，有功于朝廷。然而，也存有边镇诸将的通病，归结起来有两大问题：一是拥兵跋扈、不受节制；二是浮夸索饷糜饷、虚冒军饷等问题而引起朝臣议论纷纷。就连朝鲜人也说他“恣虐日甚，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²。对此，毛文龙多次上奏抗辩，崇祯帝的态度则由抚慰渐至冷淡。

¹ 《清太祖实录》卷四。

² 《燃藜室记述》：“毛文龙诛死”

崇祯元年（1628），新任兵部尚书、督师蓟辽的袁崇焕经与阁臣钱龙锡密议后，决计谋除毛文龙。出关上任后，先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毛文龙。如设文臣监督、设饷司于宁远，控制其粮道，又严海禁，封锁登州沿海等等，致使东江“商贾不通，岛中大饥”¹。而后设计诱杀毛文龙。崇祯二年五月二十九日，袁崇焕以阅兵犒师为名，泛海抵达旅顺双岛。次日，毛文龙应招前来会见。六月五日，毛文龙应招至袁崇焕军营门。袁崇焕只许毛文龙与随行官员进入营围内，将毛文龙的随行兵士隔在围外，并密令参将谢尚政等暗伏甲士。一切布置就绪后，袁崇焕突然厉声斥责“望尔回头是岸，谁知尔狼子野心”²。随即当众宣布毛文龙十二条当斩之罪：“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³宣布罪状之后，喝令擒缚毛文龙，剥去冠裳，并申斥道：“你道本部院是个书生，本部院却是一个将首！”又向在场的毛文龙部将道“毛文龙如此罪恶，尔等以为应杀不应杀？若本部院屈杀

¹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五。

² 《崇祯长编》卷一八，崇祯二年六月。

³ 《明史·毛文龙传》。

了他，你们就上来杀我！”众将官相顾失色，叩首哀告。其中“有称文龙数年劳苦者，崇焕叱之曰‘文龙一布衣尔，官极品，满门封荫，足酬劳，何悖逆如是！’”¹。毛文龙以为杀他是皇上的旨意，只得叩首乞免。袁崇焕不为所动，言道“尔不知国法已久，若不杀尔，东江一块土非皇上所有”。遂朝京师方向叩首道：“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²言罢，取出尚方宝剑，交与期牌官，斩毛文龙于帐前。宣示毛文龙将士“诛止文龙，余无罪”。“当是时，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惮崇焕威，无一敢动者，于是命棺敛文龙”³。次日，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了祭礼，在他的灵柩前拜祭道：“昨斩尔，朝廷大法，今祭尔，僚友私情。”⁴随后将东江军队进行了改编，分为四协，命毛文龙子副总兵毛承祚（又作毛承祿）、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各领一协。由陈继盛代掌东江军务。返回宁远后，袁崇焕向崇祯帝奏明此事。崇祯帝得知此事后，大为震惊，但考虑到毛文龙已死，无奈眼下还要依靠袁崇焕收复辽东，因此，非但未加责备，反而“伏旨褒答，俄传谕暴文龙罪，以安崇焕心”⁵。崇祯帝否定了毛文龙

¹ 《明史·毛文龙传》。

² 《明史·毛文龙传》。

³ 《明史·毛文龙传》。

⁴ 《明史·毛文龙传》。

⁵ 《明史·毛文龙传》。

及东江的作用，言“岛中毛文龙悬军海上，开镇有年，动以牵制为名，全无事实”¹。

分析袁崇焕为毛文龙所定十二大罪状，几乎是当时官场和边将的通病。即便全是事实，也非毛文龙所独有，以此当诛，则诛不胜诛！袁崇焕杀毛文龙本质上是东林党人排斥异己的表现，毛文龙之死，是党争的后果。毛文龙是毛家军的缔造者和维系的核心，事实也证明毛文龙死后，毛家军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呈现出内乱不止、分崩离析的危局。可见，袁崇焕不顾辽东抗金大局擅杀边帅，其后果只能是自毁长城。清人昭槤对此曾评价道：“文龙守皮岛多年，虽有冒饷抗拒诸状，然其兵马强盛，将士多出其门……，使留之以拒大兵（指后金），不无少补。崇祯乃不计其大事，冒昧诛之，自失其助，遂使孔定南诸将，阴怀二心，反为本朝所用，此明代亡国之大机。”²此评价是公允的。《明史·袁崇焕传》也认为毛文龙死后“岛弁失主帅，心渐携，益不可用，其后致有叛去者”³。

二

刘兴祚，又名刘海，后金称刘爱塔，开原人。幼年时被建州女真所掠，在女真中生活长达20余年，为代善属下。他精通女真语，才干出众。又为人豪爽、侠义，交友甚多，颇得努尔哈赤的赏识。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刘兴祚随努尔哈赤西征辽东。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后金军攻克辽阳，继而连下海盖金复各州卫。刘兴祚为游击，驻守金州。他招抚沿海岛屿的汉人，截击明援军，因功连

¹ 《国榷》卷九十

² 昭槤：《啸亭杂录》卷十，“毛文龙之杀”。

³ 《明史·袁崇焕传》。

升为参将、副将。受命管辖金复海盖四州卫。后因征赋不力、偏护汉人而受到努尔哈赤的怀疑和训斥，遂心生叛意。在明将毛文龙等人的策动下，刘兴祚决意叛金归明。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1623），刘兴祚与金州守将罗某约定共同归明，并派人赴登州约明军渡海前来，欲为内应，共取辽东半岛。但此事却被人告发，刘兴祚等人被代善拘禁。后因证据不足而被释放。此后，刘兴祚多次与毛文龙、孙承宗、袁崇焕等明将秘密联系。“东通毛镇，西透关、宁”，“奴一言一动，莫不先为密达”¹。“大清两次入关，塔俱遣人先报”。天启二年（后金天聪元年，1627年），即位后的皇太极欲围攻锦州，刘兴祚密派部下赴锦州通报。次年，刘兴祚派人持书潜往皮岛，密通毛文龙。途中，被后金截获，刘兴祚因而被捕。由于好友进言为他开脱罪名，加之，刘兴祚佯装自杀以示冤屈，因此又逃过了一劫。他决定投奔毛文龙，遂与其弟刘兴治密谋策划，先使其弟刘兴贤逃往皮岛，随即精心伪造惧怕牵连而自杀的假象，目的是出逃后家人免受牵连。安排就绪后，刘兴祚烧死替身，投奔皮岛。其弟刘兴治随后亦借外出治丧之机，投奔皮岛。刘氏兄弟前后分三次出逃，共携家眷、部众 230 余人，但兴祚母及弟侄亲属尚留在后金。不久，明廷授予刘兴祚为游击，其兄弟亦被授予游击或都司。同年六月，袁崇焕斩毛文龙，东江明军被分为四协，刘兴祚升为副将，自领一协。在稳定东江局势方面，他起到了重要作用。史载“岛中威权，皆归于海。海素多才能，挟以权数。文龙之诛，岛中危惧，几于生变，赖海镇静”²。十二月，袁崇焕入狱，孙承宗督师山海关，刘兴

¹周文郁：《边事小记》卷四。

²《李朝实录》仁祖七年七月。

祚奉命率军援永平。途中，用计击败后金军一部，斩获后金兵近 600 人。皇太极为此十分震怒，表示“擒刘兴祚，胜得永平”¹。派阿巴泰、济尔哈朗等率兵寻战。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正月初三，刘兴祚受到后金的夹击，虽拼死力战，然寡不敌众，中箭而死。其弟兴贤被俘。刘兴祚阵亡后，直到七月，明廷才予其追褒三等及祭葬，荫其子刘大缙世袭锦衣指挥僉事。

由于明廷对刘兴祚的抚恤迟迟未下。刘兴治十分气恼，遂迁怒于人。他与代理皮岛军务的陈继盛不和，便借口陈继盛有意隐瞒不向朝廷奏报，旌表其兄，杀害了陈继盛，举兵叛乱，到处杀掠。明朝派副总兵周文郁前往安抚，随后又任锦州参将黄龙为征虏前将军都督僉事，镇守皮岛。刘兴治等表面接受安抚，暗中却在积极进行叛逃活动，他与参将李登科、游击崔耀祖、都司马良、李世安、郭天盛等人联络，密信与皇太极，表示归降。皇太极亦复信，表示欢迎。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三月十六日，刘兴治再次发动叛乱，大肆杀戮不从叛者，参将沈世魁全家被杀，其本人险些遇害。沈世魁遂纠集同伙，夜袭刘兴治住所，将其杀死。前往铁山接应的后金兵亦被击败。这场叛乱很快被平定。

皇太极趁皮岛明军人心未定，于五月二十七日派兵 6000 人攻打皮岛，皮岛明军在新任总兵黄龙的指挥下，凭借火器和战船的优势，与后金激战十余日，后金军死伤累累，战败撤走。

同年十月，皮岛发生兵变。兵变原因有多种说法，朝鲜方面认为是黄龙专废军政，贪黷无厌。黄龙是否贪黷，很难辨明，即使如此，亦为辽东明将通病。以此解释兵变原因，很难成立。况朝鲜素厌皮岛明军索要钱粮，述史因往往带有本国倾向性而失实。黄龙本人把兵变归为军中缺粮、缺饷，应是符合实

¹ 《清太宗实录》卷六，天聪四年正月。

际的。因为明末因缺粮、缺饷而导致兵变的情况，比比皆是。皮岛缺粮、缺饷，必然引起士兵的不满。《明史》则认为皮岛之乱是耿仲裕阴谋发动的。

“游击耿仲明之党李梅者，通洋事，龙系之狱。仲明弟都司仲裕在龙军，谋作乱”¹。可见这次兵变的出现是黄龙要处治内奸、清查其同党，危及到耿仲明、耿仲裕兄弟，于是，耿仲裕便利用士兵的不满情绪，鼓动变乱。耿仲裕率部卒以索饷为名，包围黄龙的都督衙门，将黄龙捆绑，“拥至演武场，折股去耳鼻，将杀之”²。这时，忠于黄龙的将领尚可喜、李维鸾等发兵平定了叛乱，首乱者耿仲裕等被黄龙处死。黄龙还疏请朝廷惩处耿仲明。

毛文龙死后，皮岛连遭变乱、内讧不断，使明廷以东江实现牵制后金的策略化为泡影。而紧接着出现的登州之乱和旅顺战役则加速了明朝辽东沿海防线的崩溃。

三

孔有德和耿仲明，都是辽东人，原为毛文龙部属，孔有德深受毛文龙宠爱，被收为养孙，赐名“毛承诗”，官拜先锋参将。毛文龙死后，孔有德与陈继盛不和，遂与耿仲明及毛文龙部将李九成等投奔登州巡抚孙元化。孔有德被授为步兵左营参将、耿仲明为中军参将³。崇祯四年（天聪五年），皇太极兵围

¹ 《明史·黄龙传》。

² 《明史·黄龙传》。

³ 《清史稿·孔有德 耿仲明传》。

大凌河城，孙元化遣孔有德率 3000 人渡海援救，因遭遇飓风而改从陆路，十一月行至吴桥（今河北吴桥县东），遇大雨雪，军中乏食，遂纵兵行掠反明。十二月，连破临邑、商河、新城诸城。孙元化及山东巡抚余大成皆力主招抚，“檄所过郡县毋邀击”。孔有德假意请降，于次年正月率兵攻登州城。是时，耿仲明在城中，他对朝廷要查处自己深为不满。于是，秘密联络辽东诸将陈光福及杜承功、曹德纯、吴进兴等 15 人为内应，接应孔有德进城。巡抚孙元化被捉。黄龙的家属全被杀害。旅顺副将陈有时、广鹿岛副将毛承禄等亦起而响应孔有德。黄龙诛杀叛党，抚定诸岛，叛党高成友据旅顺、断关宁、天津援师，黄龙命游击李维鸾、尚可喜等击走之，黄龙移驻旅顺。孔有德设官置署，自号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陈有时、毛承禄、陈光福等为总兵官。连续攻取邻近黄县、平度诸城，围莱州，攻高密等城。新任山东巡抚徐从治中炮身亡，登莱巡抚谢琏亦被杀。明廷急命侍郎朱大典等督师平叛。其后又派出辽将祖大弼率军数万增援。孔有德接连战败，陈有时战死，被迫退守登州。明军遂陆围登州。孔有德几次出战失利，李九成战死。孔有德只有海路可走。崇祯五年（天聪六年）十一月，孔有德、耿仲明乘夜率兵及家眷万余人从城北出海、分乘战船一百余艘，撤出登州、使向旅顺，投奔后金。黄龙预料到孔有德等逃走必经旅顺，便率部在旅顺海面准备截击。崇祯六年（1633）二月，双方在旅顺海面展开激战，孔军遭受重创，李九成之子李应元被杀，毛承禄、陈光福、毛有贤、杨世魁、乔可城、孙卫祖、苏有功、高志祥等 20 余名将领被擒。孔有德等退双岛，遣游击张文焕、都司杨谨、千总李政明等泛海至盖州，请降。皇太极派范文程等安置。孔有德又复遣副将曹绍中、刘承相等与后金约定自镇江登陆。皇太极遂遣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率兵接应。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孔有德等率所部军民于五月间辗转到达鸭绿江口，在后金军的接

应下，从镇江登岸，抵达沈阳。皇太极设宴相迎，赐蟒袍、貂裘等，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¹。

此时随着大凌河战役的结束，辽西战事暂时告一段落，后金攻打旅顺已势在必行。不久，孔有德等侦知黄龙尽发水师前往鸭绿江剿“贼”，旅顺空虚。于是，皇太极决定发兵攻打旅顺。

六月十九日，皇太极遣兵部贝勒岳托、户部贝勒德格类率骑步兵万余人在孔、耿的引导下进取旅顺。七月一日，后金前哨 500 余骑先到旅顺河北，占据黄金山等山头，架设火炮，轰击旅顺的外围城墙，一连轰击了 3 天。四日晚，后金军将 5 门西洋大炮及无数战车、云车推到城下，全面攻城。后金兵架起云梯争先而上。守城明军以西洋大炮轰击远距离的后金兵，投掷火罐、射出矢石对付攻到城下的后金兵，用枪搦尚未登上城头的后金兵。后金兵“轮班昼夜攻打”，双方连续激战两昼夜。六日，黄龙组织明军 3 次出城反击，后金军稍退后又将明军逼回城内。此时，明军火药矢石将尽，形势万分危急。黄龙对部将谭应华说：“敌众我寡，今夕城必破。若速持吾印送登州，不能赴，即投诸海可也。”²。谭应华走后，黄龙指挥明军力战。是夜，后金兵“死命攻城”，明军“冒死守御”。四鼓时分，后金兵又暗用木筏漕船在旅顺河北渡海，至蔡家口等处时，被明哨兵发现，黄龙立即拨兵迎战。但为时已晚，后金兵已先登岸。此时，另一支后金军从城东北角杀进城内。明军同后金军在城里展开巷战。只有 200 余副盔甲的明军无法抵挡后金兵的进攻，黄龙及部将李维鸾等被

¹ 《清太宗实录》卷十四。

² 《明史·黄龙传》。

后金兵团团团围在中间。黄龙料到无法突围，自刎而死。李惟鸾、项祚临、樊化龙、张大禄、尚可义诸将俱战死。事闻，明廷“赠龙左都督，赐祭葬”¹。

旅顺战役，后金军损失了4000余人，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到七日早晨战斗结束，旅顺要塞终于为后金所夺取。鉴于旅顺的重要地位，皇太极下令以2500人驻守旅顺²。后金控制旅顺，扼水路咽喉，切断了登莱与皮岛的联系。

孔有德、耿仲明因功享有上朝时与八和硕贝勒同列第一班的殊荣。崇德元年（1636年），孔有德被进封为恭顺王，耿仲明被封为怀顺王，号其兵为“天祐兵”。

四

黄龙死后，明廷任毛文龙部将沈世魁为总兵留守皮岛。沈世魁原是辽东商贾出身，目不识书，其女为毛文龙妾。他“倚势横行岛中”³。旅顺失陷后，皮岛兵民人心惶恐，一些明军已退往广鹿、长山等岛屿。皇太极曾二次致信沈世魁，进行劝降。沈世魁不为所动。但是，他与尚可喜之间出现了矛盾，使辽东沿海明军又发生了新的分裂。

尚可喜，辽东海州（今海城）人。后金进入辽沈时，他家遭受战乱，亲人离散。其父于天启元年从军，隶毛文龙麾下，为游击。天启三年（后金天命八年），他投水师，不久，寻找父亲同属毛文龙部。其父在同后金作战中战死，他带领其军，逐渐发展成为一员骁将。毛文龙死后，隶属黄龙。因平定耿仲裕

¹ 《明史·黄龙传》。

² 《清太宗实录》卷十五。

³ 《明史·沈世魁传》。

叛乱有功，被提拔为副将。后金破旅顺时，尚可喜驻防海上，其族兄弟尚可义在旅顺之役中战死。黄龙死后，他留守广鹿岛。在截击孔、耿大军时，他又为明朝立了功劳。然而，沈世魁和他的同伙王庭瑞、袁安邦等欲加害尚可喜，下令调尚可喜回皮岛。尚可喜初不知有诈，得到命令，立即动身，行至长山岛，大风骤起，不能行船。而沈世魁又累下命令催促，引起了他的怀疑。他派人秘密上岛探听消息，遂得知沈世魁的阴谋。尚可喜悲愤填胸，返回广鹿岛，决计投奔后金。

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十月，尚可喜秘密派遣部将卢可用、金玉奎二人赴盛京请降¹。十一月，卢、金二人返回广鹿岛，呈上皇太极的回信并赐貂裘以示信，期待他“幸无犹豫”，早日归服（同上）。次年正月，尚可喜起兵反明，连下大、小长山，石城，海洋等岛屿，清除岛中守军，擒获守将马建功、孙殿邦、王廷瑞、袁安邦、孙有明等人。随后，率所部兵民一万多人投奔后金。对此举，皇太极极为重视，“命诸贝勒集满、汉、蒙古诸臣，谕曰‘广鹿岛尚副将携民来归，非以我国衣食有余也，承天眷佑，彼自来附。八家贝勒已出粟四千石，凡积粟之家，当量出佐饷，仍予以值’”²。派贝勒多尔袞、萨哈廉等前往迎接。皇太极降敕慰劳，并将攻克旅顺时所获尚可喜亲属二十余人送归尚可喜。三月，尚可喜至海州。四月，尚可喜入朝。皇太极亲迎十里外，尚可喜行抱膝礼。皇太极设宴，赐蟒衣、狐裘等。旋授之总兵官，号其军曰天助兵，从优安置其部众于海州³。

¹ 《清太宗实录》卷十六。

² 《清史稿·尚可喜传》。

³ 《清史稿·尚可喜传》。

尚可喜投奔后金，对残存的明军又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东江防线处于迅速崩溃中，皮岛陷入孤立之中。

同年十月，尚可喜上奏皇太极，建议攻取皮岛。当时皇太极的主要打击目标是关内，从长城北部关口入边袭扰明内地，因此对皮岛明军暂时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崇德元年（1636），尚可喜被封为智顺王。

崇祯十年（清崇德二年，1637）二月，皇太极下令进攻皮岛。此时解决皮岛问题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一方面，几次入关远袭，大量地消耗了明朝的实力；另一方面，漠南漠北蒙古已经归服，尤其是朝鲜也在清军的打击下彻底屈服，于崇德二年初向清称臣。失去朝鲜方面的帮助，皮岛明军被彻底孤立，陷入空前危机之中。同年二月，皇太极命硕托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舁红衣炮十六位，并朝鲜战船五十艘，往取明皮岛”¹。沈世魁率岛军凭借海上优势，顽强抵抗。四月九日，清军攻占皮岛，消灭皮岛守军一万余人，沈世魁被俘后不屈而死。

次年二月，石城岛的沈世魁残部走投无路，接受投降。其他海岛“虽有残卒，不能成军”，明廷以登莱总兵遥领之。次年夏，杨嗣昌尽徙其兵民于宁锦，沿海诸岛为之一空²。至此，明朝经营十五年之久的辽东沿海防线彻底告终了。

简论

¹ 《清太宗实录》卷三十四。

² 《明史·沈世魁传》。

毛家军是明朝在辽东地区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在毛文龙时期，这支力量在与后金争夺辽东沿海地区、牵制后金的军事斗争中曾发挥过作用。然而，明朝的腐朽统治、毛文龙的战略失策及军阀的痼疾，使得这种作用表现得极为有限。毛文龙死后，这支军队已失去了凝聚的核心。从此，在与后金（清）的军事斗争中，始终处于被动挨打之中。毛家军的内部矛盾，造成其内部的不断分裂和叛乱，从根本上削弱了这支队伍，相反却壮大了后金的力量。后金统治者采取的争取毛家将的举措对分化瓦解毛家军起了加速的作用。在辽东沿海的军事斗争中，皇太极看重的不仅仅是辽东沿海地区，更重要的是与明朝争夺毛家将与毛家军。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1895—2005）

刘俊勇

考古学是近代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考古学的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研究古代社会的历史。所谓实物可以概括为遗迹和遗物两类，因其大多沉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出来，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和发掘工作。

大连地区位于辽东半岛最南端，西隔渤海与华北远邻，东隔黄海与朝鲜半岛相望，南隔渤海海峡与山东半岛遥相对峙，北依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广阔腹地，从很早的古代起，辽东半岛的大连地区就成为南北交流的枢纽。

一般认为，在中国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出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而大连地区近代考古学则出现在 19 世纪末。1895 年 8 月，中日甲午战争硝烟尚未散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就受东京帝国大学（东京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东京大学）人类学教研室的派遣，来到辽东半岛，在旅顺、大连等地进行调查。

从 1895 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已经历了 110 年。认真总结这一段考古学史，对于我们现今从事的考古学研究必会大有裨益。

笔者赞同安志敏对辽东史前考古学的分期，并把它引入本文的大连考古学分期，即萌芽期（1895—1927）、形成期（1928—1945）、成熟期（1946—1963）、发展期（1964 至今）¹。

¹安志敏：《辽东半岛的史前文化》，《大连文物》1992 年第 1 期。

一、大连地区考古学的萌芽（1895—1927）

1895年8月下旬——12月下旬，日本学者鸟居龙藏调查旅顺、大连和熊岳城、盖平（今盖州）、大石桥、海城、辽阳等辽南地区的史前遗址和汉代遗址。大连地区仅在貔子窝（今普兰店市皮口）采集到个别的石器。这是日本学者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考古调查。

1905年，日本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再次占领旅顺、大连，鸟居龙藏再次来到大连，调查和试掘了普兰店锅底山遗址。

1909年，鸟居龙藏第三次来到辽东半岛，调查和发掘旅顺双岛湾、老铁山、郭家屯，普兰店台子山等遗址和墓葬。

1910年8月，京都帝国大学（京都大学前身，以下简称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冈谦藏等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牧羊城和老铁山积石冢。

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再次调查旅顺刁家屯古墓和牧羊城，并同立花政一郎等人，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的三处积石冢。

此外，1906年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在旅顺老铁山发现石器，并在其附近发现汉代贝墓、砖室墓。

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在旅顺发掘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滨田耕作：《旅顺刁家屯古墓调查补遗》，《东洋学报》1921年第3期）；

1914年至1915年，满铁岛村孝三郎等调查旅顺老铁山积石冢，并在大连滨町（今黑嘴子）发现彩绘陶。

1923年，八木英三郎奉满铁调查课之命，先后到旅顺南山里、双岛湾、营城子，大连市内，金州，普兰店，貔子窝等地调查，发现史前时代贝丘遗址和积石冢。

1925年，金州“南金书院”院长岩间德也和教员三宅俊成在金州北门外发现“元上百户张成墓碑”，在金州亮甲店发掘蚕厂屯史前遗址，出土百余件石器和大量陶片；在金州凤凰山麓发掘史前时代遗址。

同年，清野谦次调查旅顺羊头洼遗址。

鸟居龙藏当时是以人类学的考察为主，兼及民俗学和考古学，因而当时的规模都很小，主要的目的在于寻找遗物，而对遗迹和层位关系则注意不足，甚至缺乏正规的记录和实测。滨田耕作发掘的老铁山积石冢，也缺乏墓葬的实测，仅简略地报道了出土的陶器。

鸟居龙藏将他的三次考察成果，于1910年出版了《南满洲调查报告》一书。鸟居龙藏作为日本第一代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受过专门训练。因此，他根据亲身考察而写成的这本书，从地质学、地理学、人类学、考古学几个方面入手，对从史前到高丽时代的遗迹进行分类研究和描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安志敏先生认为该书是“中国考古学最初之权威著作，亦为中国考古学之基础”¹。佟柱臣先生认为“这是东北地区考古学的第一本书，……东北考古学开始阶段的一本比较标准的书”²。滨田耕作对老铁山积石冢的发掘和报道，是其从事考古学生涯的第一步，而他后来对日本和中国考古学的研究却是以此为开端。

¹安志敏：《日人在华之考古事业》，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5期，1946年8月3日。

²佟柱臣：《中国东北考古学史》讲稿。

这一时期是小规模的个人考古活动，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往往把一大批属于青铜时代的遗迹和遗物，当作新石器时代的遗迹和遗物。这是需要我们认真辨别的。我们还应该看到，当时进行的考古工作仅限于史前和汉代。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只是初步的，但不可否认其作为近代考古学的启蒙，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形成（1928—1945）

1928年，日本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开始进行有组织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1928年，首先发掘貔子窝遗址。貔子窝包括位于今普兰店市皮口碧流河边相邻的单砬子和高丽寨两个遗址。在京都大学滨田耕作的主持下，东京大学原田淑人、驹井和爱、田泽金吾，京都大学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前身）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彩陶、磨光石器、磨光陶器等石器时代遗物及黑砂质陶器、石器、青铜器、铁器等金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物，并对单砬子墓中人骨进行了考古测量和推测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人。1929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一册《貔子窝——南满洲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以下简称《貔子窝》）。这是首次在大连地区进行的较科学的大规模考古发掘。

1928年10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共同组织发掘旅顺牧羊城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水野清一、岛田贞彦，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八幡一郎、驹井和爱，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中国北京大学庄严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城址于10月1日开始发掘，同月25日结束。发掘期间，又对城址周围的古墓进行调查，从10月9日开始发掘刁家屯、于家屯、官屯

子等地的贝墓、石墓、瓮棺墓、埜周墓，同月 23 日结束。1931 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二册《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以下简称《牧羊城》）。

1929 年 9 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南山里汉代砖室墓和贝墓。京都大学清野谦次、滨田耕作、岛田贞彦，东京大学田泽金吾，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参加了发掘。共发掘 7 座砖室墓。1933 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三册《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以下简称《南山里》）。报告日文部分由岛田贞彦、滨田耕作执笔，英文概要由滨田耕作担当，同时收录了与南山里砖室墓有密切关系的刁家屯和营城子牧城驿砖室墓，作为附录。并说明，上述材料虽是滨田耕作前几年调查、发掘，也曾一度发表过，但此次为便于彼此参考，将原稿修改后的概要加以附录。清野谦次及金关丈夫、三宅宗悦担任南山里砖室墓发现的人骨研究。

1931 年 7 月，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等发掘营城子沙岗子汉代壁画墓。1934 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第四册《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以下简称《营城子》）。

1933 年 5 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京都大学滨田耕作、清野谦次、金关丈夫、三宅宗悦，关东厅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发掘。1942 年出版了《东方考古学丛刊》乙种第三册《羊头洼——关东州旅顺鸠湾内史前遗迹》（以下简称《羊头洼》）。

1939 年 9 月 22 日—10 月 3 日，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塌遗址。报告《望海塌——关东州亮甲店附近望海塌史前遗迹》作为附录，收入《羊头洼》。

1941 年 4 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京都大学梅原末治、澄田正一，东京大学长谷部言人、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

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大长山岛上马石贝冢”为题，分别发表在1986、1988、1989年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人间文化》2—4期。

1941年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调查、发掘旅顺老铁山和营城子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小林行雄、澄田正一，东京大学藤田亮策、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老铁山与四平山”为题，发表在日本《橿原考古研究所论集》（1979年）第4辑。

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和四平山积石冢。京都大学澄田正一、水野清一，东京大学八幡一郎，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森修等参加了调查和发掘。文家屯遗址发掘资料由澄田正一以“辽东半岛的史前遗迹——文家屯遗迹”为题，于1972年发表在日本《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纪要》第12期。

此外，三宅俊成等还进行了许多调查和发掘：

1927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和阎家楼丘陵的史前遗址，以及进行烽火台考古调查（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29年，三宅俊成调查金州五里墩烽火台，发掘金州亮甲店望海坨史前时代遗址，出土了彩陶片和石器，还调查了望海坨明代抗倭城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0年，三宅俊成调查普兰店市杨树房黄家亮子遗址及汉代城址，以及皮口老龙头、夹心子南山头、东老滩，碧流河塔寺屯等遗址，在唐家房小于屯、

西孙屯等地发现战国方足布，调查了赞子河新台子烽火台——永安台，还发掘了金州西南大连湾大拉树房汉墓（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黄家亮子城址》，《乡土》1932年第2期；《关东州史迹图》，1935年）；

1930年5月，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调查营城子双台子山（双砬子）遗址，采集有陶片等，在发表的报告中收入了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和久原市次的搜集品和采集品，其中吉田悌太郎、浦田繁松的搜集品是从当地居民手中购买的出自山顶的积石冢的遗物，久原市次的采集品是出自遗址的山腰（江上波夫、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旅顺双台子山新石器时代遗迹》，《人类学杂志》1934年第1期）。

1931年，三宅俊成发掘甘井子海茂屯遗址、营城子文家屯遗址、双砬子遗址，调查了四平山积石冢和旅顺于大山、大台山遗址，并在大台山遗址发现了彩陶，还调查了牧城驿明代城址、旅顺城山（伯母山）城址、信台子烽火台、旅顺大孤山积石冢、天后宫、明代旅顺城址和唐代鸿胪井刻石地点等，对旅顺将军山积石冢、牧羊城址、南山里和柏岚子的汉墓进行了试掘（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2年6月12日，三上次男、岛田好、三宅俊成等，对金州董家沟的汉墓进行调查（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

同年6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调查，试掘了广鹿岛朱家屯、吴家屯遗址和朱家屯汉代城址、獐子岛沙泡子遗址、海洋岛、小长山岛姚家屯遗址、大长山岛高丽城山遗址，还调查了南太山高丽城山城址、李家屯隋代五铢钱出土地点和毛文龙衙门址，拓制了新安寺和三官庙的石碑。同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二次调查，发掘了广鹿岛吴家屯和朱家屯遗址（三宅俊成：《朱家屯城址》，《乡土》1931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前时代的小调查》，《满

洲学报》1936年第4期；《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同年，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和城子前土城址（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三上次男：《关东州董家沟汉墓》，《人类学杂志》1933年第11期）。

同年10月3日，三宅俊成对金州正明寺城儿山进行调查，在大吴家屯南大岭屯城附近发现石器、陶器和汉代瓦片（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同年10月16日—12月30日，三宅俊成第一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

1933年3月末—5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大岭屯汉代城址，出土有石器（斧、刀、剑、纺轮等）、陶器（夹砂褐陶片、筒瓦、板瓦、半瓦当等）、铜制品（镞、钏、带钩、燕国刀币残片、货泉等）、铁器（斧、刀形器、釜形器等）。推断为汉代沓氏县治的所在地（三宅俊成：《大岭屯城址》，《满蒙》1933年第6期；《大岭屯城址的考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1933年8月，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了第三次调查，发掘了大长山岛上马石、清化宫、高丽城山，小长山岛姚家沟、旗杆山、唐家沟、英砣子，广鹿岛洪子东、东水口、柳条沟等遗址，同时在格仙岛、塞里岛、瓜皮岛、哈仙岛进行考古调查（三宅俊成：《长山列岛史迹巡礼》，《满蒙》1933年第12期）。

1934年，三宅俊成对长山列岛进行第四次调查，发掘了獐子岛沙泡子、李墙屯和海洋岛南玉屯遗址。

1935年，三宅俊成发掘金州董家沟台山北方史前时代遗址。

1937年，三宅俊成在复州城和长兴岛进行考古调查，在长兴岛发现北大山、大古山、悬心山等史前时代遗址和蚊子嘴汉代砖室墓、塔山塔基等，并根据横山上发现的石堆，推测可能有积石冢（三宅俊成：《复州城及长兴岛史迹调查略记》，《满洲史学》1937年第3期）。

同年4月12日，旅顺博物馆调查旅顺南山里郭家村南丘陵耕地中出土的15把曲刃青铜短剑（岛田贞彦：《南满洲老铁山麓郭家屯附近发现的铜剑》，《考古学杂志》1938年第11期）。

1938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凤鸣岛及附近的小岛调查发掘史前时代遗址，还在金州大石棚附近的丘陵地带采集到石器（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39年，三宅俊成在瓦房店市华铜矿发掘3座石棚，石棚底部发现了人骨，出土有夹砂褐陶壶、罐和环状多瘤玉器等，在庄河太平岭发现石棚，发掘庄河尖山大张屯遗址（三宅俊成：《在满二十六年——遗迹考察和我的人生回忆》，1985年）。

1940年3月末——12月末，三宅俊成第二次发掘金州董家沟汉墓，出土大量的陶冥器（三宅俊成：《东北亚考古学研究》，1975年；《关东州董家沟古墓调查报告》，《满洲学报》1942年第7期）。

同年秋，旅顺博物馆岛田贞彦到长山列岛进行考古调查（岛田贞彦：《大长山岛贝冢发掘记》，《考古随笔——鸡冠壶》，1944年）。

三宅俊成是以个人之力进行调查和发掘的，因而规模一般都较小。

必须指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开展的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是在刺刀保护下进行的。在殖民当局的保护下，日本人完全主宰了大连地区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的权力。从1895年鸟居龙藏进入大连地区，特别是从

1905年日本第二次占领大连地区，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日本学者在大连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出版了《貔子窝》、《牧羊城》、《南山里》、《营城子》、《羊头洼》等五部大型报告，发表了数百篇报告、简报和论文。《貔子窝》等五部大型报告，奠定了日本在东北亚考古学的地位，日本人一直引以为荣，20世纪80年代初还出版了影印本。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在大连地区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文物，一部分被运往日本，如1911年10月滨田耕作发掘老铁山西北山脉三处积石冢出土的石剑、石斧、石镞、白陶片、蛋壳黑陶片和陶杯、盂、罐、鼎、鬲、盆及小冥器豆、壶等文物，1912年6月滨田耕作等发掘旅顺刁家屯五室花纹砖墓的出土文物，1933年5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组织发掘旅顺羊头洼遗址的出土文物，1941年4月和9月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长海大长山岛上马石遗址、四平山积石冢的出土文物，现藏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研究室；1942年日本学术振兴会组织发掘文家屯遗址的出土文物，现藏名古屋爱知学院大学，另有一部分石器藏九州大学。被运往日本国内的文物中，不乏精品，如四平山积石冢出土的玉牙璧、玉斧、玉铎、玉锥形器、蛋壳黑陶把杯、黑陶单把杯、黑陶双耳盂、黑陶壶、黑陶豆、猪形陶鬲、袋足陶鬲，文家屯遗址出土的彩陶、玉雕刻器，上马石遗址出土的压印纹陶罐、三环足盘、角剑，羊头洼遗址出土的高足陶豆、卜骨、青铜片等。

1908年，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将旅顺黄金山北麓的唐代鸿胪井刻石运往日本，现存放在日本皇宫建安府前院。内藤湖南受日本海军省的委托，于1905年7月专程来旅顺实地调查鸿胪井刻石，确认其史料价值。这成为日后日本海军将刻石盗往日本的契机。1906年，内藤湖南再次来到东北。在调查的基础

上，还查阅了《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盛京通志》、《旧唐书》，并征求了奉天中国官员的意见，写出调查报告，认为鸿胪井刻石“于史有益”。“第一，应当说辽东稀有的一通石碑，与渤海有关”；“第二，匡正《大明一统志》及《大清一统志》的疏谬”，“第三，鸿胪井碑是唐使节经由陆路山东、海路，再经旅顺到了今奉天地方的渤海国王居城的证据”。经过内藤湖南的调查、考证，明确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史料价值，海军省随即将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盗往日本，献给皇宫。把鸿胪井刻石和石亭“作为战利品献给皇室的”是日本海军大臣斋藤实。可以说斋藤实是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主谋。具体执行盗掠鸿胪井刻石和石亭的无疑是日本海军旅顺镇守府¹。

上述行为，完全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是对中国文物的掠夺。这种侵犯和掠夺直到1945年大连回到祖国怀抱才告结束。

应当说，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相对比较科学。在遗址发掘方面，采用了探沟法，据《貔子窝》，在发掘单砣子、高丽寨两处遗址时，是按水平层位来划分文化层的，而不是像今天严格地按自然形成的地层来划分，因此，不同时代的遗物容易混在一起。作者认为单砣子遗址“在包含遗物的层里，根据上下层位之不同的遗物性质，看不出代表了哪种文化。……也就是说，此处遗址是单一的文化，而不是有别的文化”²。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当年确实是把不同时代的遗物混在一起了。这种单调的探沟布局，难以解决遗迹的性质，以后的羊头洼、望海坨等遗址的发掘也是如此。像羊头洼遗址的发掘，探沟中发现房址，也不向外扩，根本不能完整地揭露。即使如此，在近80年前采用这种按水平层位划分文化层的方法，还是相对比较科学的。

¹刘俊勇：《关于鸿胪井刻石的几个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²东亚考古学会：《貔子窝——碧流河畔的史前时代遗址》，《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1929年。

对于日本学者在学术上所做的工作，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许多调查、考古报告和论文具有一定的水平和参考价值。安志敏指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即对中国采取军事、经济等攻势，即使文化事业方面亦不遗余力，而其中之较显著者，则当推于中国之考古事业。迄今已逾五十余年，且皆有正式之报告，虽为文化侵略，然对阐明中国古代文化之功绩亦不可没也。”¹安志敏又说：“东北之考古工作，迄于我国抗战胜利，日人已作之调查工作，已五十年之久，今后之东北考古工作，虽已能由我国学者执行，然对日人研究之成果，也断不可弃置。”²佟柱臣指出“外国学者大多是尾随其帝国主义的烽烟炮火之后来中国的……，如果说作历史结论的话，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掠夺。但作为我们搞考古研究的同志来说，还应该注意一点，就是他们发表的材料，乃是我们的祖先，中华民族祖先遗留的古代文化遗产，我们还是要把这些材料拿过来认真加以整理和研究的，尽管对外国的一些观点，我们要采取批判的态度，然而就考古资料的意义来讲，我们还是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不能因为是外国人搞出来的，就一律摒弃。这种摒弃的简单做法和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它无益于我们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进行”³。这正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三、大连地区考古学的成熟（1946—1963）

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和人民政府的建立，1948年11月成立了文化古物保管委员会，下设劳动人民文物陈列所，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¹安志敏：《日人在华之考古事业》，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5期，1946年8月3日。

²安志敏：《东北史迹概说》，天津《益世报·史地周刊》第71期，1949年12月9日。

³佟柱臣：《中国东北考古学史》讲稿。

段。自 1951 年人民政府接管旅顺博物馆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就以旅顺博物馆为中心展开。

我国学者在大连最早开展的考古工作，主要是汉墓的发掘。20 世纪 50 年代，于临祥、许明纲先后调查、发掘了一批汉墓，如 1954 年营城子汉代贝墓和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大连营城子发现贝冢及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4 年第 10 期）；1955 年双台沟贝墓的发掘（《大连市郊营城子发现贝壳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12 期）、旅顺尹家村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第 7 期）；旅顺市三涧区韩家村、土城子河东汉代贝墓、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6 年第 2 期）、旅顺老铁山对庄沟汉代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老铁山区发现古墓》，《考古通讯》1957 年第 3 期）、大连劳动公园东门前东汉砖室墓的发掘（于临祥：《旅大劳动公园东门前发现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6 期）、旅顺牧羊城汉井和汉墓的发掘（于临祥：《旅顺牧羊城发现古井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第 8 期）等。

上述汉墓大多比较零散，基本上是随时发现随时清理。

较大规模的汉墓发掘是 1954 年 8 月中旬——10 月上旬的营城子汉墓发掘。当时在旅大市郊营城子新建铁路、公路两侧发现大批古墓，于是组成由李雅、于临祥、张世明、陈钟远、于鸿志、王慕侠、苏君会、李海亭、孙传凤、衣燕春、陈兰柱、于翠娥、任淑香等人参加的“营城子古墓葬清理发掘工作组”，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共发掘贝墓 41 座、砖室墓 9 座、石板墓 2 座和辽金时期土圜墓 2 座。其中的 41 座贝墓有考古报告发表（于临祥：《营城子贝墓》，《考古学报》1958 年第 4 期）。于临祥认为，贝墓与贝石墓、贝砖墓虽结构不同，但均属于贝墓的葬制。根据墓葬形制，具体分为单人葬的单室

贝墓（11座）、夫妻分室合葬的双室贝墓（9座）、夫妻合葬的单室贝墓（11座）、贝石墓（4座）、贝砖墓（6座）五种形制，并推定贝墓的年代可能早到汉初，下限约至西汉末期；贝石墓的年代亦应是西汉末期；贝砖墓的年代属于西汉中叶至汉末。

此次营城子汉墓发掘，是大连地区最早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有计划的一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营城子贝墓》是大连地区第一篇发表于《考古学报》的报告。表明大连地区的考古学已经进入成熟时期。

其他比较重要的汉墓发掘，还有旅顺北海李家沟第20号贝墓（于临祥：《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考古》1965年第3期）。这座贝墓平面呈“凸”字形，分为前、后两室。后室葬死者，为夫妻合葬，除“宋郟信印”铜印和铜带钩、石剑璫出于男性死者腰部外，其他随葬品分置两处，一处在后室东部，另一处在前室南部。两处陶器器形相同，只不过是前室陶器都绘彩，多出铜洗和2套鎏金车马具模型。

1957年10月5日——11日，许明纲发掘营城子1座石板墓，并收入1954年发掘的2座石板墓，发表有考古报告（许明纲：《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考古》1959年第6期）。推定石板墓的年代为东汉后期，下限为魏晋时期。

许明纲还对贝墓进行了综合研究（许明纲：《旅大的汉代贝墓》，《辽宁日报》1963年7月13日）。

这一时期的史前考古主要是进行了一些调查。如1987年发掘的大嘴子遗址就是1959年发现的（许明纲：《旅大市金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0年第2期）。还在新金县（今普兰店市）、庄河县（今庄河市）发现

史前时代遗址（《新金县华岩寺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光明日报》1954年1月14日；许明纲：《庄河县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1960年第10期）。

1957、1959、1960年，许明纲、于临祥、陈钟远等人三次在长海县进行调查，发现10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许明纲：《长海县调查发现十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光明日报》1961年4月18日；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61年第12期、1962年第7期）。许明纲、于临祥提出“上马石的压印篦纹平底筒形罐为主的一种文化，早于龙山文化”。此前，佟柱臣明确指出：“大长山岛上马石、广鹿岛吴家村、獐子岛沙泡子、貔子窝、塔寺屯的列点纹、横弧纹、纵弧纹和篦纹陶等，已见于西喇木伦河流域和嫩江流域等细石器文化地带。”¹这些认识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并被以后大连地区考古发掘和研究所证实。

1961年8月，安志敏利用休假期间，调查了小磨盘山遗址，并结合烈士山1948—1949年调查情况和发掘资料，提出旅顺老铁山和四平山积石冢发现的典型龙山文化陶器和玉器，可能属于典型龙山文化遗存，在旅大地区代表着较早的一个阶段。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更确切地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可能已进入青铜时代（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第7期）。

1960年5月，许明纲清理了营城子后牧城驿楼上墓地暴露出的3座墓葬，出土了曲刃青铜短剑等遗物（旅顺博物馆（许明纲）：《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第8期）。这篇报告同当年发表的《辽宁朝阳十

¹佟柱臣：《东北原始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考古》1961年第7期。

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一起，引起了考古界的高度关注。

这一时期还在过去的资料基础上，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性质、分布、分期进行探讨，对某些遗存重新评价，如指出以羊头洼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不适于直接作龙山文化处理，单砣子、高丽寨地层存在问题，不能作为分期断代的依据等。

1957年——1962年，金县三十里堡马圈子和山后村、得胜金家沟北大壕、金州镇南、亮甲店都家村、大魏家东田村，甘井子营城子对面沟、后革镇堡，旅顺尹家村等地，分别出土了一批金元文物（许明纲：《旅大市发现金元时期文物》，《考古》1966年第2期）。其中，重要的有大魏家东田村出土的铜范，包括铍、犁镜、鎚头等。后革镇堡出土的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罐内装有鎏金凤凰等饰品，上盖一件白釉褐花小瓷碟。

四、大连地区考古学的发展（1964至今）

这一时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东北考古工作队在大连地区的一系列发掘为开端。1976——1992年，是以旅顺博物馆与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等联合进行发掘；1994年以后，大连地区的考古工作是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为主进行的。其特点是通过广泛的考古发掘，建立起大连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序列，较为深入地研究史前考古文化和历史考古文化，全面地认识大连地区考古学。

参加大连地区考古发掘的是东北考古工作队一组（以下简称东北队一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志敏（副队长兼一组组长）、郑乃武、陈存洗、丁六龙、张国柱、汪义亮，中国历史博物馆任常泰，旅顺博物馆许明

纲，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贾洲杰等。从1964年5月16日——10月29日，发掘了营城子后牧城驿双砣子遗址、楼上墓地、岗上墓地，金县董家沟卧龙泉墓地，旅顺将军山积石冢和尹家村遗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以下简称《双砣子与岗上》）。

1964年6月20——24日和同年8月23日——10月29日，东北队一组历时三个月，两次发掘了双砣子遗址，共开探方11个，揭露面积350余平方米，发现房址17座，窖穴10个，出土大量的石器、陶器和骨器等遗物。分别以第一期文化、第二期文化、第三期文化代表双砣子遗址的文化性质及其发展顺序。

双砣子一期文化房址发现3座，均为双室半地穴式。陶器皆手制，有的口沿经轮修，绝大部分为细砂黑褐陶，常见器形有罐、壶、碗、豆、杯等。陶器表面磨光，纹饰以弦纹为主（有的还附加乳点纹），彩绘陶占有一定比例，以红、白、黄三色构成几何图案。石器中以长身的厚石斧较突出，刀、有孔斧、镞、矛、鏃、环状器等，均与二、三期文化有共同之处。F16的碳14断代为公元前2060±95年（树轮校正：公元前2465±145年）。

双砣子二期文化未发现房址，陶器主要为轮制，以泥质或含细砂黑陶、黑灰陶占绝大多数。陶器中以鼎、深腹盂和大量的器盖为双砣子二期文化所特有，开始出现甗形器。陶器表面以磨光为主，常有弦纹或刻划纹，突出的特点是，往往在颈、腹部饰以带棱角的凸弦纹。石斧不同于双砣子一期文化，多短身扁薄作长方形，典型的半月形石刀和扁平石镞都比较普遍，其他石器也与双砣子一期文化雷同。双砣子二期文化是新的发现，与山东的岳石文化非常类似。双砣子二期文化叠压在双砣子一期文化之上，虽然缺乏直接的年代证据，不过参照岳石文化的5个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00—前1485年（树轮校正：

公元前 1 890—前 1 750 年) 之间, 则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绝对年代也应大体与之相当。

双砣子三期文化发现 18 座长方形半地穴单室房址, 都砌有石墙, 为一种新的建筑形制。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 部分口沿经过轮修, 仅有个别为轮制。陶质以细砂灰褐陶为主, 大型陶罐的数量显著增多, 典型的器形有鼓腹小底罐、高领罐、细柄矮足豆、圈足簋、敛口曲腹盆等, 还有三足或五足的多足器以及有的圈足削成三个缺口, 均是双砣子三期文化的特有器物。陶器的表面也以磨光为主, 刻划纹的数量较双砣子一、二期文化显著增多, 并有许多刺点纹, 还出现竖行排列的附加堆纹。石器中长方形扁平石斧相当普遍, 半月形石刀和扁平三角形石镞大量出现, 还有本期所特有的长身弧背石凿。据碳 14 断代, F4 为公元前 1 170±90 年(树轮校正: 公元前 1 360±155 年)。

除这三期文化外, 报告还收录了 1964 年 5 月间当地居民在遗址西部山腰采石时发现的曲刃青铜短剑 1 件、陶罐 1 件、石纺轮 1 件、环状石器 1 件。据发现人介绍, 这批遗物同出于一处, 还曾见到零散人骨, 显然是一处墓葬。人骨和遗物均未见火烧。作者推定其年代为公元前 8—7 世纪, 与岗上墓地相当。

双砣子遗址的发掘, 是我国学者在大连地区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遗址发掘, 无论是发掘方法还是研究水平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双砣子遗址三叠层的发现与研究, 为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分期树立起了标杆。

1964 年 10 月 5—15 日, 东北队一组选择旅顺将军山东部山脊上一处较小的积石冢进行发掘。此处积石冢和大多数积石冢一样被盗掘过, 其西北部表土下面发现有日本“宽永通宝”。虽曾被盗, 但冢内结构的基本轮廓尚存, 共

9 个墓室，分南、中、北三排，南排四室，均南北向；中排三室，东西向二，南北向一；北排二室，均东西向。由于被盗，除南排 4 个墓室内发现被盗后剩余的器物外，其余墓室仅有少量陶片，或根本不见任何遗物。陶器多为小冥器，完整复原的共 20 余件。其他陶片可以分为泥质黑陶、泥质白陶、泥质红褐陶、细砂红褐陶以及泥质灰陶等几种，还发现几片磨光蛋壳黑陶片。器形有杯、盆、罐、豆、环足盘、三足器、鬲和器盖等。还有石矛 1 件、玉璧 1 件。

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在大连地区发掘的积石冢，第一次对墓室进行了实测。虽然 1909 年鸟居龙藏发掘了 6 处积石冢，但并未对墓室作过实测，仅有两幅平面示意图和一幅想象的剖面图。《双砬子与岗上》报告提出了这样的假定，“以将军山积石冢为代表的遗存，虽接受山东龙山文化的浓厚影响，仍属于辽东土著的史前遗存，并不能同山东龙山文化混为一谈。至于当时居住的聚落遗址，可能与郭家村上层有更密切的联系”。

1964 年 5 月 25 日——8 月底，东北队一组对岗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 28、南北宽 20 米，叠压在属于双砬子三期文化的遗址之上。整个墓地顶部以黑土夹杂砾石封筑。以石灰岩石块筑墙，以中央大墓为中心，共筑有 23 座墓。这 23 座墓可分为石板底墓、石棺墓、烧土墓、砾石墓和土坑墓五种。除 2、12、23 号墓未被火烧外，其余 20 座墓中的人骨均经火烧。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等。陶器为夹砂褐陶，均手制，器形有罐、壶、碗、豆等，有平底和圈足两种，有的圈足较高。器耳发达。青铜器多被火烧变形，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矛、镞等。石器有棍棒头、镞、纺轮、砥石和滑石铸范等。装饰品有铜钏、铜簪、铜带钩和各种质料的珠饰。

岗上墓地叠压在双砬子三期文化遗址之上。墓地下部遗址堆积的碳 14 年代为公元前 1 335±90 年（树轮校正：公元前 1 665±135 年），同时双砬子

三期文化的碳 14 年代为公元前 1 170±90 年（树轮校正：公元前 1 360±155 年），墓地的年代晚于双砣子三期文化。《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岗上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公元前七八世纪。

岗上墓地的发掘，首次完整地揭露了以曲刃青铜短剑为特征的氏族共同墓地，同时还对辽东曲刃青铜短剑墓的葬制、葬俗、文化性质和年代分期提供了崭新的资料，成为有关研究的重要转折点。

1964 年 5 月 17 日——6 月 17 日，东北队一组对楼上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位于椭圆形土丘之上，东西长 34、南北宽 24.2 米，高出周围地面约 6.8 米。经过修整后的土丘中央形成方形圆角高台，高台四周以石灰岩石块砌就，共有墓葬 10 座（包括旅顺博物馆 1960 年 5 月清理的 3 座），可分为石椁墓、石板底墓和砾石墓三种。位于墓地中心的 3 座石椁墓规模较大。10 座墓均为火葬。随葬器物有陶器、青铜器、石器和装饰品，以及被当地村民掘出的火烧过的明刀钱和铁器等。陶器有罐、壶等。青铜器有凸脊曲刃短剑（附青铜剑柄、剑鏢和石加重器）、斧、凿、刀、锥、马具等。石器有球、镞、纺轮、磨石等。装饰品有石珠、骨珠、贝饰、滑石饰、玛瑙坠等。

楼上墓地破坏情况比较严重，1960 年清理的 3 座墓室已遭到不同程度扰乱，以致 M1 和 M3 的出土遗物混杂在一起，甚至还包括了时代较晚的遗物，如明刀钱、铁镰等。由于当时仅清理了残存部分，没有能够明确墓地的结构及其葬式。通过此次全面揭露，了解到它同岗上墓地基本一致，代表同一时代的氏族共同墓地。在楼上墓地，典型式、过渡式、衰退式三种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共见，《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其年代应在春秋中、晚期。

1964年5月28日——6月6日，东北队一组对金州董家沟卧龙泉墓地进行发掘，全面揭露了整个墓地。墓地呈椭圆形，南北直径22米，东西直径14米，以石块和黑土为封，封土高20——50厘米。墓地有5座墓室，其中1——3号墓发掘前已被挖毁，据介绍，这3座墓墓底都有大石板，为东西向，被火烧过。每个墓室中均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还出土铜T字形剑柄1件、磨石2件、石纺轮1件等。经发掘的4号墓出土23枚石珠。5号墓出土凸脊曲刃青铜短剑1件、T字形铜剑柄1件、石加重器（枕状器）1件、小铜斧1件、铜车马具2件、铜泡2件。

卧龙泉墓地出土的4件凸脊曲刃青铜短剑，全部属于过渡式，即曲刃趋于消失，又有T字形铜柄共存，《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年代当与楼上墓地的年代相当或稍晚。

1964年9月11日——10月12日，东北队一组对旅顺尹家村遗址进行发掘。此前，东北队一组于1963年10月在尹家村南河一带调查时，清理了暴露在河边的4座墓葬。根据地层堆积，尹家村遗址分为三个时期，即尹家村一期文化、二期文化和汉代三种遗存。

尹家村一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8个和墓葬5座。墓葬多被水冲毁，都是长方形土坑火葬墓，坑底和坑壁均有火烧痕迹，《牧羊城》报告称为“罍周墓”。《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罍周墓”一词应废弃不用。尹家村一期文化可复原陶器器形有杯、碗、罐、豆、甗等，基本上承袭了双砣子三期文化。另外，尹家村火葬墓所出土的过渡式曲刃青铜短剑¹，也可以同楼上墓地相对比。《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一期文化的年代与楼上墓地相当或稍晚，即约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并认为辽东一带曲刃青铜短剑为代表的遗存属于定居的农业聚落，与游牧活动无关。

¹ 《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汉以前遗迹》，《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二册，1931年。

尹家村二期文化遗迹包括窖穴 2 个和石椁墓、瓮棺墓各 1 座。石椁墓为长方形土圹墓，在墓底四周有扁平石块垒砌成石椁，墓圹中心有 7 块石块，可能是盖在木棺上；石板下面压有人骨和朽木痕迹，证明当时先将木棺放入土坑中，然后在木棺与土圹间砌石块。死者头向东，仰身直肢，随葬品有青铜短剑 1 件，放在死者腰部右侧，石棍棒头 1 件，放在死者胸部右侧。陶器有夹砂褐陶和泥质灰陶两类，皆手制。夹砂褐陶器有叠唇平底深腹筒形罐 1 件、陶壶 2 件、陶豆 2 件；泥制灰陶器有豆 1 件，呈浅盘、喇叭状足，竹节状细柄，此豆与战国时期的遗物比较接近。《双砣子与岗上》报告推定尹家村二期文化的年代当接近战国早期。

汉代遗存包括窖穴 5 个，土坑墓 5 座和瓮棺墓 5 座。土坑墓形制与中原地区汉墓一致，但在木棺周围铺有砾石却罕见。儿童瓮棺墓以瓮、罐、盆为葬具，M6 刻有“平乡口穀何陵”六字铭文，记载了死者的籍贯、身份和姓名。

《双砣子与岗上》报告认为此铭文可作为墓志的先声。推定窖穴、土坑墓和瓮棺墓的年代为西汉初期。

1964 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建立了大连地区青铜时代至西汉初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并为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之大，影响之深远，是以往任何时代所不能比拟的。

1964 年东北队一组在大连地区进行的一系列考古发掘，还为大连地区培养了考古工作的骨干力量，许明纲就是在这次发掘之后，成为日后大连地区考古工作的领军人物。

在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几年沉寂之后，许明纲带领旅顺博物馆的同事和弟子们开始进一步探索大连地区史前考古和历史考古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史前考古方面，主要有旅顺郭家村、于家村，长海小珠山、上马石，大连大嘴子，庄河北吴屯，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等遗址的重要发掘。

1973年6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许明纲、刘俊勇、陈连旭等发掘了旅顺将军山（将军山与老铁山是连在一起的，后来统称老铁山）积石冢（M1）。M1属于单排积石冢，平面呈长方形，共六个墓室，东西排列，大小不一，除（3）、（6）两室保存部分随葬品外，其他墓室均被扰乱。随葬陶器有黑陶圆筒形把杯、喇叭状螺旋纹杯、敞口折盘圈足豆、三环足盘、盆、器盖等，还有杯、罐、壶、三足器等小型陶冥器。石器有锛、矛。认为老铁山积石冢可能是郭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旅顺博物馆（陈连旭）：《旅顺老铁山积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1976年3月，为配合碧流河水库工程，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苏小幸，新金县文化馆戴廷德，庄河县文化馆白元祥等组成考古队，发掘了位于新金县安波刘屯西山和东山、双塔乔屯的11座大石盖墓（旅顺博物馆（刘俊勇）：《辽宁大连新金县碧流河大石盖墓》，《考古》1984年第8期）。大石盖墓一般是自地表向下挖一土坑，或不挖土坑只在地面上垫几块石头，然后盖上一块大石板作为上盖，有的一端筑有小石箱。墓内人骨经过火烧。随葬品有扁平大玉（石）斧、滑石铸铜斧范、侈口长颈壶、叠唇深腹罐等。碧流河大石盖墓不同于以往发现的石棚、石棺墓、积石墓，是一种新发现的墓葬形制。推断其年代当为西周至春秋。

1973年11月，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等试掘旅顺郭家村遗址，发现了早于龙山文化的遗存。

1976年10月——11月、1977年3——7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辽宁大学联合发掘郭家村遗址。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孙守道、金殿士、孙力、高青山、方殿春、张克举、李红军，旅顺博物馆许明纲、王发源、苏小幸、刘俊勇、陈连旭、许正雄、王琳、王珍仁、葛华、周家花、孙慧珍、李萍、孙永利、朱金枝，辽宁大学何贤武、解恒谦和历史系75届同学参加了发掘。三次发掘共揭露面积600多平方米，发现有房址和灰坑，出土各类遗物近2000件（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许玉林、苏小幸）：《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下层文化发现房址11座，均被上层文化房址和灰坑打破，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米左右。石、玉器共341件，其中磨制石器266件、打制石器64件。陶器以夹细砂褐陶为主，还有相当数量的红陶。绝大多数陶器为手制，只有泥质灰黑陶上使用了轮制技术。从陶器分析，既有地方的显著特点，又有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点。最有地方显著特点的是各种刻划纹筒形罐；具有大汶口文化特点的是红陶实足鬲、红陶罐形鼎、红地红彩陶片、红地黑彩陶片、红地复彩陶片和釜形鼎等。特别是红陶实足鬲流与口平，腹如罐，下接三个实心锥状足，与大汶口文化早期陶鬲十分接近。其他生产工具还有陶刀、蚌刀、蚌镰、蚌镞、牙镞、陶拍、骨针、骨锥、骨梭、角锥、陶纺轮等。下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3065±100年。

上层文化房址多保存不好，能看出形状的仅4座，半地穴式建筑，有圆角方形和圆形两种，直径在5——6米左右。灰坑48个，大多是废弃的窖穴。石器以磨制为最多，种类有斧、铲、刀、杵、磨盘、磨棒、矛、镞、网坠、铍、

凿、纺轮、锥等，尤以有段铈和巨型网坠最富特征。陶器既有本地特点，更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而且特点越来越明显。这些陶器有两类，一类为夹砂褐陶，另一类是泥质黑陶和蛋壳黑陶。厚仅1—3毫米的蛋壳黑陶代表了当时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器形主要有折沿罐、叠唇罐、鼎、豆、盂、杯、器盖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针、骨锥和陶猪、陶兽、陶人头像等雕刻艺术品。骨针磨制得十分纤细精巧，针孔仅可容蜡光线穿过。上层文化碳14测定年代分别为公元前2280±100年、公元前2230±90年、公元前2160±90年、公元前2130±70年、公元前2070±90年。

上层文化席篓里盛装的炭化谷物，发表报告时认为是粟，后经沈阳农业大学董钻、杨守仁等教授共同鉴定为黍的籽粒¹。这是大连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谷物标本。郭家村遗址中还出土有较多的哺乳动物，包括家猪、狗、斑鹿、獐、獾、野猫、麝、狍、马鹿、豹、熊，以及飞禽、鱼类的遗骸和海产软体动物介壳等。

郭家村遗址是大连地区重要的遗址。随着20世纪70年代该遗址的发掘和以后的小珠山遗址、上马石遗址的发掘，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编年逐步建立起来。

1977年4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旅顺于家村遗址，揭露出房址7座，灰坑4个，出土各类器物260余件（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旅顺于家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遗址分为下层文化和上层文化两期。上层文化揭露房址6座，其中F3至F7互相叠压，时间不会相差太远。F5保存较为

¹许明纲、刘俊勇：《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纪略》附录一，《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完整，平面呈不规则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地面坚硬，四周现存 10 个柱洞，南面埋有利用大陶壶口部制成的灶圈。遗物集中在东面和北面，有陶壶、陶罐、陶碗、陶杯、陶豆、石斧、石锛、石矛等。下层文化石器主要有斧、锛、刀、铲、网坠、镞、环刃器、矛等。除个别网坠为打制外，其余都是磨制。陶器一般屃有大量的细砂，胎较厚，以黑褐陶为主，黑皮陶次之。多为手制，壶和罐的口部有的经慢轮修整。绝大部分陶器表面磨光，个别纹饰为弦纹、弦纹乳点、刻划纹和镂孔等。器形有罐、壶、豆、杯、盆、钵、碗、灶圈等。其他器物还有骨锥、骨铲、骨凿、骨针、骨鱼卡等。

上层文化仅揭露出 F1，已被修梯田时破坏掉一半。墙壁是泥土堆筑，地穴上部西侧有一排不规则石块，可能是石墙。残存房址周围有柱洞 23 个，基本上是按内外两排排列。灶坑在西北，是两个深浅不一相连的火塘，用 3 块扁平石板铺就，中间有一保存火种的矮圈足豆。上层文化石器有斧、锛、刀、网坠、纺轮、棍棒头、矛、镞等。陶器可复原的很少，多为夹砂陶，泥质陶很少，陶胎较薄，以黑褐陶为主。多为手制，个别有轮修。素面居多，表面磨光。纹饰有刻划纹刺点、凸棱纹等。器形有矮足镂孔豆、簋、杯、壶、罐、钵等。大多数器物为圈足器，有的圈足有三个缺口。其他器物有骨锥、骨针、骨鱼卡等。

于家村遗址下、上层文化都属青铜时代，分别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相对应，属于双砣子一、三期文化。于家村遗址下层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275±150 年、公元前 2135±100 年、公元前 1705 年、公元前 1680 年；上层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330±85 年、公元前 1280±90 年。

1977年4月——6月，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发掘于家村砮头积石墓地。墓地从外表看，是用小海卵石封顶且隆起的小土丘，残存面积约960平方米，有58座墓（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许明纲、刘俊勇）《大连于家村砮头积石墓地》，《文物》1983年第9期）。这些墓是多次筑成的，先筑出中间部分，其他则是后来傍筑的。每座墓都是用在附近海岸取来的石块，于地面筑成的，以长方形为最多，其次是椭圆形。

砮头积石墓地盛行丛葬。各墓内人骨颠倒交错叠压在一起。墓室东西向，则头骨有东有西；墓室南北向，则头骨有南有北。各墓内人骨多少不一，最多的达21具。每座墓内的人骨都不是一次埋入的，人骨之间仅以一层小海卵石隔开。葬式多为仰身直肢葬，成年人与小孩葬在一墓之内。迁葬仅见一例。

砮头积石墓地随葬品以陶冥器为主，多放在墓的两端，有形状多样的罐、壶、杯和豆、钵、盆、舟形器、镂孔尊形器等。陶冥器特点明显，都是夹砂黑褐陶，纹饰主要有凸棱纹、刺点、弦纹和刻划纹，尤以凸棱纹与刻划纹组成的复合编织纹最富特征。石器数量不多，种类有斧、铤、刀、矛、环刃器、纺轮等。青铜器只有6件，有镞、圆形泡饰、环、鱼钩等。装饰品种类较为丰富，有石珠12串、陶珠9串，还有绿松石坠、玛瑙坠、白玉坠、莹石坠和骨贝。砮头积石墓地中贫富分化的现象尚不明显。一些大墓随葬品很少，甚至一无所有，相反一些小墓中随葬品却较为丰厚。

砮头积石墓地出土的陶器在质地、器形、纹饰诸方面都与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陶器相同，墓壁里夹杂的陶片也属于于家村遗址上层文化，应是于家村遗址上层人们的公共墓地。于家村遗址上层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年代为公元前1330±85年和公元前1280±90年，另从24号墓出土的青铜镞具有的商末周初特点分析，砮头积石墓地的年代相当于商末周初，已进入青铜时代后

期阶段。后来公布的墓地人骨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325 年 \pm 110 年，显然过晚，故不采用。

1978 年 10——11 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对长海县广鹿岛柳条沟东山、小珠山、吴家村、蛎碴岗、南窑和大长山岛上马石、高丽城山等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于临祥、苏小幸、刘俊勇、周家花、许正雄，长海县文化馆王璀璨、傅清君等。发现有房址、灰坑和大量的陶器、石器、骨角器、贝器（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长海县文化馆（许明纲、许玉林、苏小幸、刘俊勇、王璀璨）：《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考古学报》1981 年第 1 期）。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是此次发掘的重大发现。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分析，该遗址分为一、二、三期。小珠山一期文化（下层）生产工具石器以打制为主，有刮削器、盘状器、网坠、球和磨制的岫玉斧、磨盘、磨棒等；生活用具陶器以麝滑石粉末的黑褐陶直口筒形平底罐为主，纹饰以压印之字纹和压印之字纹与编织纹组成的复合纹为主。

小珠山二期文化（中层）发现有房屋遗迹，因扰乱严重，结构不明。生产工具石器以磨制的斧、铲、刀为主；生活用具陶器以麝云母粉末的夹砂红褐筒形罐为主，同时出现了壶、钵、鼎、器盖、三足觚形器等，纹饰以刻划纹为主，并出现红地黑彩彩陶片。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3 940 \pm 150 年、公元前 3 860 \pm 100 年、公元前 3 670 \pm 110 年、公元前 3 320 \pm 100 年。

小珠山三期文化（上层）生产工具石器几乎都是磨制，有斧、镑、刀、杵、磨棒、网坠、砥石等；生活用具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口沿

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折沿鼓腹罐、壶、钵、豆、三环足盘等，纹饰以刻划纹和附加堆纹为主。

上马石遗址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分为下、中、上和双砣子二期文化、战国五期，下层文化属于新石器文化，中层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文化，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即上马石上层类型。个别地段还有属于双砣子二期文化的瓮棺墓地，以及曲刃青铜短剑墓地等¹。

上马石遗址下层文化房址面积较小，室内还发现有驯养的狗。既有打制石器，也有磨制石器，陶器与小珠山一期文化相同。

上马石遗址中层文化石器多是磨制，陶器具有较浓厚的山东龙山文化特点，三环足盘比较多见。总体看来与小珠山三期相近。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2 450±110 年、公元前 2 095±100 年。

上马石遗址上层文化属于青铜文化。石器几乎都是磨制，镞、矛、棍棒头等兵器较多。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 220 年±150 年、公元前 1 180 年±100 年。

瓮棺墓共发掘了 17 座，均为小孩和未成年人的墓，以单个大壶作为葬具，瓮口向上者盖有石板，瓮口向下者则有意打掉底部。随葬品绝大多数是陶冥器，与邻近的普兰店市单砣子第一、二号墓随葬陶器相同²。

曲刃青铜短剑墓地与瓮棺墓地毗邻，共发掘 10 座墓，出土随葬品的仅有 3 座墓。墓中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是迄今发现最完整的一件，由 T 字形柄、剑

¹ 1977 年 4 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派人在上马石清理了 10 余座瓮棺墓和曲刃青铜短剑墓。同年 10 月，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再次进行清理，明确划出了曲刃青铜短剑墓的圻限。

² 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刘俊勇）：《辽宁长海县上马石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82 年第 6 期。

身、加重器和包护加重器的贴叶组成，剑柄与剑首空隙处塞满麻布。年代约为战国早期¹。

吴家村遗址文化内涵单纯。F1 保存最为完整，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挖在生土层中。东西长 4.97 米、南北宽 4.76 米。门位于东北角，门道向房外伸出，呈半圆形，有—步台阶。房内四周有里外两排柱洞，外面—排靠近墙边，柱子—般较粗。有的是—主柱和—傍柱并排支撑。从房内堆积分析，房子四壁是用树枝或草围好后抹泥。房顶以—椽、—椽为骨架铺草抹泥。由于意外失火，生活用具陶器和生产工具石器、骨器，以及—头小猪均被压在房内。遗址中出土打制石器有刀、—镞、—网坠、—刮削器等，磨制石器有斧、—铤、—铲、—网坠、—镞、—杵、—砥石、—磨石、—磨盘、—磨棒等。需要指出的是，遗址中出土了—批玉器，包括玉斧、—玉铤、—玉凿、—玉牙璧、—玉环等。陶器分为—类，—类是—夹砂红褐和红陶，—类是—泥质红陶。—夹砂陶器器形多为—刻划纹直口深腹筒形罐；—泥质红陶器壁较薄，—鬲、—盃、—壶、—孟、—钵、—碗、—豆等器表磨光，深受—山东—大汶口文化影响。遗址中还出土有—陶猪等陶塑艺术品。—陶猪形态丰腴，是—家猪的造型。出土的动物遗骨以—家猪为—最多，—鹿、—獐次之。—海产软体动物贝壳有—牡蛎、—锈凹螺、—疣荔枝螺、—红螺、—毛蚶、—青蛤、—沙海螂、—紫石房蛤、—伊豆布目蛤、—鬻螺、—单齿螺、—帽贝、—笋螺、—福氏玉螺等。

吴家村遗址属—小珠山二期文化。—碳 14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2 880±100 年。

—柳条沟—东山遗址文化内涵单纯，陶器通体饰—压印之—字纹。年代应稍早于—小珠山遗址—下层。

¹—旅顺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刘俊勇）：《—辽宁—长海县—上马石—青铜时代—墓葬》，《—考古》1982 年—第 6 期。

蛎碴岗、南窑遗址均属于小珠山中层文化。

小珠山遗址三叠层的发现，是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成为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考古分期、编年的重要标尺，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小珠山遗存被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列为新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至铜石并用时代文化的代表之一。因此，可以说1973—1977年的一系列考古发掘，是大连地区考古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

1980年4月—1982年6月，在大连地区进行的文物普查中发现史前时代遗址322处、墓葬51处、积石墓地70处、石棚14座、石棺墓69处、青铜短剑墓11处；战国遗址9处、墓葬14处、城址2处、汉代遗址4处、城址8处、墓葬84处；魏晋墓葬8处、高句丽山城10处；辽金元遗址88处、墓葬49处、窑址2处、石塔2座、摩崖造像1处；明清城址20处、墓葬52处、庙宇21处、烽火台80座。其中，庄河黑岛北吴屯遗址、瓦房店长兴岛三堂村遗址、普兰店望海寺摩崖造像是三年文物普查的重大发现（许明纲、刘俊勇：《大连市文物普查主要收获》，《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

1987年3—7月初，由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和旅顺博物馆、各区市县文物干部组成的考古队，首次对位于大连市大连湾镇政府所在地东南约2公里处的黄海北岸半岛尖端的大嘴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1987年大嘴子遗址发掘的有许明纲（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队长，刘俊勇（旅顺博物馆）、吴青云（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任副队长。队员有于鸿志、王璘、张波、葛显斌、于礁、孔明、任乐元、赵静雪（旅顺博物馆）、张本义、张清濂、王家忠、王立昱（金州博物馆）、赵云积（瓦房店市博物馆）、姜福德（新金县文化馆）、孙德源（庄河县文化馆）、刘华堂（旅顺口区文化馆）、刘文越（甘井子区文化馆）等。1992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

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再次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两次发掘共揭露出房址 50 余座，石墙数条，出土各类器物近 2 000 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 1987 年发掘报告》，大连出版社，2000 年；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辽宁大连市大嘴子青铜时代遗址的发掘》，《考古》1996 年第 2 期）。大嘴子遗址分为第一、二、三期文化，分别与双砬子一、二、三期文化相对应，尤以第三期遗存最为丰富。由于大嘴子遗址绝大部分探方未掘到生土，故第一、二期文化遗物发现较少。不过，大嘴子第一期文化出土的铜戈残段，是重要发现之一。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建筑遗迹分为房址和石墙两部分。房址有石筑地面式和半地穴式两种，以半地穴式为最多。石筑地面式房址以石块筑墙，都是废弃建筑。半地穴式房址有方形圆角、圆形和椭圆形三种，这类房址往往是因失火而倒塌，室内都有陶器、石器出土。石墙是同类遗存的首次发现。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陶器以夹细砂灰褐陶为主，还有少量的黑皮陶和泥质灰黑陶。房址中的陶器绝大多数为手制，部分口沿经过轮修，个别的为轮制。陶胎一般较薄，大型陶壶数量多，从断碴观察，陶胎系几次相套接而成。器形除壶外，还有罐、碗、豆、簋、盆、甗、舟形器等。圈足器数量较大。陶器素面多，纹饰多在壶的颈、肩、腹部和簋的肩、腹部。刻划纹数量显著增加，种类也繁多，并有刺点纹、凸棱纹和附加堆纹等。此期仍有彩绘陶。彩绘颜料和绘制图案同第一期文化，并有在刻划纹上绘彩之例。F35 出土的两方石砚是首次发现，证明这些彩绘陶器的图案是本地居民自己绘制的。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石器出土最多。石斧已由棒形弧刃发展到扁平斜刃；石刀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也繁多；长身弧背石铤特点明显；石戈、石矛、石剑、石 等兵器大量出现。大嘴子第三期文化铜器仅出土一件形体硕大的铜镞，很有地方特点。

大嘴子第三期文化 F3 中发现有 6 个装有谷物的陶罐，经专家鉴定为粳稻和高粱两个种属。大嘴子粳稻的发现，填补了我国东北地区的空白，属于首次发现，成为迄今我国发现最北的稻米出土地点。大嘴子稻米发现的意义更在于为研究中国栽培稻传播朝鲜半岛、日本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条传播路线应当是从长江中下游—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朝鲜半岛—日本九州再到本州这样一条以陆路为主，兼有短程海路的弧形路线，以接力棒的方式传播过去的。这五站除辽东半岛外，其他四站过去都有稻谷（米）标本发现，这次大嘴子稻米的发现恰好补上了这一缺环。

大嘴子遗址发现的石墙，在辽东半岛是首次发现，在社会形态的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这石墙和铜镞、石戈、石钺、石矛、石剑、石棍棒头等发达的兵器的出现与使用，表明当时战争已很频繁，并有相当规模。就其社会发展阶段来说，已经越过了原始社会解体时期。

1990 年 4—8 月，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联合组成考古队，对庄河北吴屯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许玉林、曲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小幸、王嗣洲、张翠敏（旅顺博物馆）、孙德源（庄河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等。揭露房址 8 座、灰坑 2 个、围栅基址 2 道，出土生产工具 500 余件，复原陶器 60 多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庄河县文物管理办公室（许玉林、苏小幸、王嗣

洲、孙德源)：《大连市北吴屯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北吴屯遗址分为下层文化遗存和上层文化遗存两期。

下层文化遗存发现5座房址，为圆形半地穴式建筑，直径一般4—5米，大者直径达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向南，门道较短。房内有石砌方形灶址，有的旁边还附砌小灶。房址分布密集，但排列有序。在居住区边缘有木围栅基址。

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多麇有滑石颗粒和粉末。纹饰以压印之字纹为主，其次是压印编织纹、网格纹、人字纹、横线纹、斜线纹、波浪纹，以及由两种组成的复合纹，也有少量刻划纹，特点是以单一纹饰为主，施纹均不到底。器形以筒形罐为最多，其次是鼓腹罐、矮领壶及钵、碗、杯和无底筒形器。石器以磨制为主，有斧、磨盘、磨棒、网坠，还有玉凿；打制石器较少，有刮削器、尖状器、锄、球等。其他器物有骨针、骨锥、陶片网坠、陶片纺轮等。下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 6470 ± 185 年(树轮校正值)。

上层文化遗存发现3座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建筑，一般长约4米，大者8米以上，周边有柱洞。门朝南，门道较短且开在西南角，房内有圆形土灶址。陶器仍以夹砂红褐陶和黑褐陶为主，其次是夹砂红陶和黑陶，麇滑石较少。纹饰以各种刻划纹为主，其次是压印之字纹、编织纹、网格纹、点纹和乳钉，出现了刻划“弓”字纹。器形以侈口筒形罐为主，其次是鼓腹罐、小平沿罐、高领壶、折腹碗及杯等。磨制石器有斧、磨盘、磨棒。出土了玉鸟、玉凿等。打制石器和其他器物与下层文化遗存相同。上层文化遗存碳14测定年代

为距今 5 140±120 年（树轮校正值）。报告编写者认为此数据偏晚。北吴屯上层文化遗存代表了小珠山二期文化的前段，填补了小珠山二期文化前段的空白。

1990 年 4 月 1—25 日，为配合在大连召开的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联合发掘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遗址。参加发掘的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梁振京、杨柏林，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陈全家、陈国庆，旅顺博物馆刘俊勇、王嗣洲，瓦房店市博物馆刘作富、杨允宽及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86 级部分同学。揭露房址 6 座、灰坑 17 个、沟 4 条、墓葬 2 座，出土遗物 200 余件（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陈全家、陈国庆、刘俊勇、梁振京）：《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2 年第 2 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三堂村遗址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房址 3 座，均为半地穴式建筑，有圆形、方形圆角和椭圆形三种。灰坑内有大量贝壳和烧骨、陶片，并发现有两座小孩墓。石器有斧、刀、网坠、矛和玉牙璧等；骨、角、蚌、牙器有锥、鱼卡、梭等；陶器最显著的特点是叠唇筒形罐器表施有纵向排列的条形堆纹。这种条形堆纹有两种制法：一种是将细泥条等距离贴附于器表；另一种是直接于器表经挤压堆塑成形。纹样有直条、曲折条、波浪条，泥条表面往往切压成绳索或链条状。与叠唇筒形罐共存的其他器类有壶、钵、碗、盂，但数量很少。

第二期文化遗存房址 3 座，也是半地穴式建筑，有椭圆形和长方形两种。石器种类有斧、镑、凿、刀、剑、杵、网坠、磨盘、磨棒等；骨、角、牙器有锥、鱼卡、鱼镖、矛、刮削器等；陶器多夹砂，有少量泥质红陶和灰陶。以折沿鼓腹罐为最多，还有壶、碗、钵、豆、盆、圈足盘、三足盘、环足盘和环梁器盖等。

三堂村第一期文化遗存是新确认的文化，它与新民偏堡、东高台山和沈阳肇工街遗址出土的同类陶器相同，年代大体在距今 5 000——4 500 年之间。三堂村第二期文化遗存与小珠山三期文化、郭家村遗址上层出土器物相同，年代应与郭家村遗址上层大致相若。

1996 年 10 月 6——19 日和 1998 年 3 月 30 日——4 月 4 日，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两次对旅顺北海大砬子遗址进行发掘。参加发掘的有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张翠敏，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孙波等。两次发掘揭露房址 8 座、灰坑 4 个，出土遗物 200 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刘俊勇、张翠敏）：《辽宁大连大砬子青铜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6 年第 2 期）。

根据地层堆积和出土遗物，大砬子遗址已发掘地段分为第一期文化遗存和第二期文化遗存两个时期。第一期文化遗存未发现房址，仅发现灰坑 3 个。石器主要有斧、镑、刀、铲、杵、研磨器、有刃器、磨石、球、纺轮等，多为磨制。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匕、牙饰件等。陶器以泥质黑皮陶和灰陶为主，多为轮制，器表磨光，陶色较纯正；夹砂黑灰陶和黑褐陶多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罐、盂、碗、器盖、豆、杯等。以弦纹为主，器壁起棱和折棱，底部下接三个弧形矮足，是第一期文化遗存陶器的重要特点，与双砬子二期文化相同，年代也与之相符。

第二期文化遗存揭露出房址 8 座，灰坑 1 个。石器共 142 件，有斧、镑、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其中，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壶、罐、

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

1980年8月上旬，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发掘新金县双房墓地。该墓地包括石棚6座、石盖石棺墓3座（许玉林、许明纲：《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2号石棚出土有经火烧过的人骨和夹砂红陶网格纹壶1件、石纺轮1件。6号石盖石棺墓出土随葬品有曲刃宽叶柱脊青铜短剑1件、滑石斧范1套（两扇）、叠唇深腹陶罐2件、钵口有耳圈足陶壶2件。6号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以往发现相比，剑身较短，尖节距尖部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比较原始。所出土的陶壶等器物，在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开原李家台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需要提及的是，前述双房石棚与6号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二者的年代当不会相差太远，6号墓出土的陶器与于家村上层和上马石上层类型有联系，年代也有向前提的可能。

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有1982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发现的药王庙遗存（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12期）。文化特征为石器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钺、双肩石镞为代表性器物，陶器以叠唇深腹罐为代表。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

1992年3—4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大连旅顺大潘家村遗址，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旅顺博物馆许明纲、苏小幸、刘俊勇、王璠、王嗣洲、郭永军、王梅、殷红，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普兰店市博物馆付文才等。揭露房址7座、灰坑7个、儿童墓葬1

座、西汉墓葬 3 座，出土器物 500 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 年第 10 期）。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中、上层之间。

历史考古方面，主要有汉魏墓葬的发掘，以及辽金元明遗迹和文物的发现。

1972 年 5 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对营城子石板墓进行清理。该墓平面呈“品”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罐、鼎、盆、盒、碟、案、灶、井、房、楼和铁镬 1 件、五铢钱 1 枚。陶楼通高 54 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正中有一长方形门，在第一和第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各设一长方形窗，底部各留一长方形孔，以备各层之间连接。2 层顶部均出檐，由筒瓦铺成，前面有圆形几何纹瓦当。楼之四角和门、窗四周以及斗拱均绘红彩。第二层的底部阴刻隶书“高楼”二字。年代约在魏晋之际。

1975——1978 年，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先后对新金县花儿山陈莹、乔家屯、姜家屯、西北山等处 20 多座贝墓进行发掘。其中陈莹、乔家屯 7 座贝墓的材料已发表（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刘俊勇）：《辽宁新金县花儿山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 4 辑，文物出版社，1981 年），其余材料尚待发表。已发表的 7 座贝墓，分为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晚期两期。西汉前期以花儿山 M1 为例，随葬陶器中有鼎、盆各 4 件（红、灰各二），盒、壶各 2 件。除各 2 件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施绿彩为地，其上再以红、白、赭石等彩绘蟠螭纹、几何纹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组合与中原地区鼎、盒、壶组合如出一辙，其年代为西汉前期无疑。西汉中晚期以花儿山 M7

为例，墓室长 4.8、宽 4.4、深 1.8 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有鎏金铜柿蒂泡钉的皮质饰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 5 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两棺之间和女性死者脚下置有大量的随葬品，有彩绘盖壶、盒、洗、盆、魁、灶、耳杯，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铜带钩，漆樽、案、钫，石板砚，以及五铢钱等。陶器组合除具有前期鼎、盒、壶、盆外，新出现了熏炉、灶、耳杯等新器类。花儿山 M7 陶灶呈圆形，是同类器中较早者；墓中所出的 100 枚五铢皆为满城汉墓 II 型五铢，但从随葬器物分析，其年代当在宣帝至成帝时期。

1989 年 5 月 30 日——6 月 14 日，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瓦房店市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瓦房店市老虎屯马圈子村东北的 4 座石板墓，出土随葬器物 70 件（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许明纲、刘俊勇、吴青云）：《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1993 年第 1 期）。年代当在东汉末期至魏晋。

2003——2004 年，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为配合基本建设组成“营城子汉墓考古队”，对营城子发现的 180 余座汉墓进行了发掘¹，其中大部分是贝墓。

2003——2004 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贝墓中，有一批只出新莽货泉的墓。这是明确的新莽时期的墓葬，可以据此作为标杆，确定一批新莽时期墓。近年来在大连营城子发掘的一些砖室墓和石砖贝合筑墓，可以视为贝墓的孑遗。

砖室墓是 1999 年发掘的沙岗子农科院墓（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金有、阎永生）：《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记略》，《大连文物》，1999 年）和 2003—2004 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沙岗子农科院墓为单室，平面近

¹详见《辽宁日报》、《大连日报》、《大连晚报》、《半岛晨报》、《新商报》等报道。

方形，南北长 6.5、东西宽 6.1 米。四壁均以长 30—32、宽 14—16、厚 6 厘米的素面灰砖筑成，筑法随意，并无规律，或卧、或立、或纵、或横。从残存墓壁可以看出，墓是先筑出高 3.2、厚 0.5 米的四壁，在四壁上、下 8 个角预留对称的 16 个方槽，南、北壁中部还各有一个上下贯通的大方槽，表面以立砖封堵，南、北两壁之上顺外沿再筑单层立砖直至墓顶，共 12 层，并无起券痕迹。所有方槽中均有大量木炭，表明曾安插过大型木方。墓壁和墓底也发现大面积火烧过的木灰痕迹，而从墓顶塌落的灰砖极少。综合以上迹象分析，该墓当为砖木合筑，即四壁以灰砖筑砌，墓顶似为硬山式木结构。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底铺有 15—20 厘米厚的贝壳。这显然是贝墓的孑遗。沙岗子农科院墓的筑法并无规律，是砖室墓的初始筑法，故带有贝墓的遗风。随葬陶器有陶节颈壶、罐、“二千石”洗、盆、灯、博山炉、井、灶、器座，铜器有昭明镜、日光镜、博局镜、鎏金车马具模型、鎏金漆器附饰朱雀、熊足，以及铁剑、铁锤，石板砚等。2003—2004 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同类墓筑法与沙岗子农科院墓大略相同，四壁多是由一摞一摞灰砖摆放，四壁多贴有一层贝壳，墓顶也有一层贝壳。既是砖室墓的初始阶段，又是贝墓的孑遗。

2003—2004 年大连营城子发掘的砖石贝合筑墓，也属贝墓的孑遗。该墓四壁由卵石和碎砖筑成，内有贝壳壁，底部也铺有一层贝壳。该墓共出土 4 件青铜器，计有鼎、樽、承旋和洗各 1 件。鼎为常见的西汉典型式样。器身呈椭圆形，腹为圜底，盖为圜顶，两者以子母口相扣合。腹下为三蹄足。器口两侧各有环耳，腹上部有一道突起棱线。盖顶是三枚环状柱头钮。樽为筩形，口沿与底部有突起纹带，腹部两侧各有兽面衔环铺首，腹下为三蹄足。承旋是与筩形樽相配使用的器物。该承旋为圆案状，案面有繁缛的线雕花纹，似为龙

纹。下有三个蹲坐人足。人作深目、高鼻、大嘴状，以头部顶起圆案。这种造型极为罕见。因出土时与樽放置在一起，故定名为承旋。洗为折沿，腹壁较直，两侧各有铺首，平底。与上述4件青铜器共出的其他器物还有龙纹金带扣、铜印（因锈蚀严重，已不见印面文字，仅可辨出兽钮）、玉剑璫等。可以断定，墓主人生前具有很高的地位。该墓出土的这批器物，堪称迄今东北地区发现的汉墓之最。

辽代考古发现较少。1973年庄河市高岭刁家沟发现的一批辽代晚期文物当出自墓葬，有铁马镫、衔、釜、刀、镞和铜盘、钵、匙、带卡、环、包银圆形泡饰、包银心形泡饰等（刘俊勇：《庄河市发现的辽金元文物》，《大连文物》1997年第1期）。

金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0年5月15日于文物普查时发现的新金县望海寺摩崖造像（许明纲：《大连市新金县发现金代摩崖造像》，《考古》1988年第1期）、1978年9月发现的复县（今瓦房店市）谭家屯窖藏（刘俊勇：《大连谭家屯金代窖藏》，《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1996年发现的瓦房店市台后村刻字铜钹（赵云积、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台后村金代铜钹窖藏及有关问题》，《北方文物》2000年第3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金代铜官印（许明纲：《大连市出土金代官印》，《考古》1983年第8期）、官府验记铜镜（许明纲：《辽宁大连出土官府验记官印》，《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窖藏铜钱（吴青云：《大连地区金代铜钱窖藏研究——兼论金代的货币经济》，《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等。

元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73年6月发掘的旅顺寺沟砖室墓（刘俊勇：《大连寺沟元墓》，《文物》1983年第5期）、1989年黄海海域（旅顺口老铁山东南）出水瓷器（刘俊勇：《黄海黄海海域出水元代瓷器》，《大连文物》1992年第1期）、1980年11月发现的复县舒店瓷器窖藏（王嗣洲：《复县发

现一处元代瓷器窖藏》，《辽宁文物》1983年第4期），以及大连市发现的元代铜、铁权（许明纲：《大连地区出土元代铜铁权》，《考古》1987年第11期）等。

明代考古发现主要有1985年3月31日发掘的金州萧金山明墓，出土的白瓷注壶、白瓷大碗胎体甚薄，做工精细，堪称精品（吴青云：《大连金县萧金山明墓》，《旅顺博物馆通讯》1986年第1期）。其他重要的发现还有1976年3月发掘的碧流河水库淹没区明墓（刘俊勇：《大连碧流河水库淹没区的明墓清理》，《辽宁文物》1983年第5期）、1983年6月和1987年3月旅顺小黑石海域和瓦房店市长兴岛海域出水的铜火铳（刘俊勇：《大连小黑石出水铜火铳》，《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2期），以及1967年10月金县牟家供销社院内、1975年10月庄河薛家屯、1981年11月22日旅顺水师营东沟村、1983年3月瓦房店刘屯等地出土的景德镇青花瓷器（许明纲：《大连市发现的明代窖藏青花瓷器》，《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第1期）等。

这一时期，在考古调查、发掘的基础上，考古学研究方面成果可谓硕果累累。

史前考古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有周信学、孙玉峰、王志彦、王辉《大连古龙山遗址研究》，（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中国大连考古研究》（崔茂藏译，韩国学研文化社1997年）。论文主要有综述1973——1980年间的考古新发现（刘俊勇：《综述旅大近年来考古新发现》，《辽宁文物》1980年第1期）、1945——1980年和1945——1985年考古主要收获（许明纲：《建国以来大连考古的主要收获》，《学习与研究》总29期，1981年；《大连解放四十年来考古主要收获》，《大连文物》1986年第1、2

期)、1895年至20世纪末考古发现与研究(刘俊勇:《百年来大连考古发现与研究》,《白云论坛》,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等。

史前考古研究大多侧重在分期方面。自20世纪60年代发现双砣子三叠层以来,主要有三期文化说,以双砣子下、中、上层为代表,划分为一、二、三期文化,一、二期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相类似,但地域性突出,故另行命名;至于三期文化则与当地的青铜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同时还证实过去的一些发现,也与上述的三期文化有关(安志敏:《略论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分期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考古》1979年第5期)。七个类型说,新石器时代划分为四个类型:以小珠山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中层和郭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以小珠山上层和郭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于家村下层为代表的类型;青铜器时代划分为三个类型:以于家村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上层为代表的类型、以上马石曲刃青铜短剑墓代表的类型(许玉林、许明纲、高美璇:《旅大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时代文化概述》,《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三个阶段说,以小珠山遗址的层位为根据,下层与新乐下层文化较为接近,中层受大汶口文化影响强烈,上层约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王承礼、张忠培、林沅、方起东《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第1期)。四种文化说,以小珠山下层类型、郭家村下层类型、郭家村上层类型和于家村下层类型为代表(郭大顺、马莎:《以辽河流域为中心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报》1985年期)。八种文化(类型)说,小珠山下层文化、郭家村下层文化、郭家村上层文化、长兴岛北洼(三堂村遗存)、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上马石上层类型、药王庙类型(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分期问题》,《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期;《大连青铜时代文化概述》,《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2

期)。三种文化说，以新石器时代的小珠山文化（包括小珠山下、中、上层，上马石下、中层，郭家村下、上层），青铜时代的双砣子文化（包括双砣子下、中、上层，于家村下、上层、高丽城山）和上马石文化（上马石上层）（许明纲：《试论旅大地区新石器和青铜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八种文化遗存说，小珠山一期文化、小珠山二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双砣子三期文化、尹家村一期文化、尹家村二期文化。以上八期文化还可以分成两个不同谱系，即以小珠山一、二、三期文化（包括郭家村一、二期）为一群，而双砣子一、二、三期（包括于家村一、二期）和尹家村一、二期文化为另一群，分别代表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各有自己的渊源和承袭关系。此外，在长兴岛以及大连营城子文家屯等地的若干遗存，又与沈阳偏堡遗址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它可能代表由北而南发展的另一文化谱系（安志敏：《辽东史前文化的序列和源流》，《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科学出版社1996年）。新石器时代文化九期说，其中一至三期为压印纹文化谱系，五至九期为刻划纹文化谱系，四期为过渡期（王嗣洲：《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研究》，《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笔者近年提出大连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分期为新石器文化即小珠山一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小珠山二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铜石并用文化即三堂村一期文化、小珠山三期文化（包括前、中、后三段），早期青铜文化即双砣子一期文化、双砣子二期文化（刘俊勇：《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待刊稿）。学者们还就大连地区羊头洼类型和大连地区青铜文化进行分期研究（陈光：《羊头洼类型研究》，《考古学文化论

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徐光辉：《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分期》，《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发展还体现在对史前社会形态研究方面十分踊跃，成果尤伙（王嗣洲：《试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社会经济形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刘俊勇、曲传林：《大连新石器时代社会形态初探》，《大连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王嗣洲、苏小幸：《大连地区史前开发史初探》，《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在农业、渔业和环境、动物考古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许明纲：《大连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刘俊勇：《辽宁大连大嘴子稻谷、高粱的发现与研究》，《农业考古》1992年第3期）；于临祥、王宇：《从考古发现看大连远古渔业》，《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刘俊勇：《我国东北新石器时代渔业生产初探》，《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2期；傅仁义：《大连郭家村遗址的动物遗骨》，《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大连北吴屯遗址出土兽骨的鉴定》，《考古学报》1994年第3期；尤玉柱等：《大连古龙山洞穴文化遗物及对当时古生态环境的探讨》，《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张翠敏：《试论大连地区原始生态环境与人类经济生活》，《博物馆研究》1997年第1期）。

这一时期，由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史前考古发掘资料渐多，学者们开始对两个半岛文化交流进行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佟伟华：《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原始文化的交流》，《考古学文化论集》第2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刘俊勇：《史前时期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文化交流初探》，《东夷古国史研究》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王锡平、李步青：《试论胶东半岛与辽东

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随着史前玉器在我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大连地区出土的史前玉器也受到关注（刘俊勇：《大连出土的岫玉器及有关问题》，《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2期；《大连出土玉器初探兼论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大连文物》1991年第1、2期合刊；《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玉器研究》，《出土玉器鉴定与研究》，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辽东半岛玉牙璧初步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周晓晶：《辽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1999年第1期）。

这一时期，外国学者，主要是日本学者小川（大贯）静夫、岗村秀典、宫本一夫等对大连地区史前文化进行多方面研究（小川（大贯）静夫：《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史前陶器考察》，《辽海文物学刊》1988年第1期；岗村秀典：《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交流》，《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6年；宫本一夫：《论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史前文化的地域性及相互影响》，《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1期；《辽东新石器时代陶器编年的再探讨》，《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3年；《上马石上层文化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

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开始研究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王巍：《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大同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的相互关系》，《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

系》，《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曲刃青铜短剑遗存，一直是东北亚考古研究的热点之一。自孙守道、徐秉琨首先开始研究起（《辽宁寺儿堡等地青铜短剑和大伙房石棺墓》，《考古》1964年第6期），几十年来始终是方兴未艾。日本学者秋山进午较早对包括大连地区在内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进行研究（《中国东北地方早期金属文化的概貌》，《考古学杂志》第53卷第4期，第54卷第1、4期，1968年、1969年）。我国学者林沄、靳枫毅对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综合研究（林沄：《中国东北系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80年第2期；《中国东北系铜剑再论》，《考古学文化论集》第4辑，文物出版社1997年；靳枫毅：《论中国东北地区含曲刃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最为引人注目。研究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文章不多，刘俊勇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把大连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遗存分为四期：第一期以双房石盖石棺墓为代表，年代为西周中晚期；第二期以岗上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春秋时期；第三期以卧龙泉墓地和上马石墓地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前期；第四期以徐家沟石椁墓和尹家村12号石椁墓为代表，年代为战国后期（《大连地区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第2期）。韩国学者对楼上3号墓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的年代进行研究，认为M3应为比M1早几个世纪的墓，从而得出楼上M3与岗上墓地属同一时期，年代为公元前8—前7世纪的结论（李亨求：《旅顺后牧城驿楼上3号墓出土的琵琶形青铜短剑的年代商榷》，《考古》2002年第10期）。

历史考古方面以汉墓的分期与研究的成果较多（刘俊勇：《辽宁汉墓述论》，《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辽宁汉代贝墓类型与分期探讨》，《博物馆研究》1995年第1期；《大连汉墓初论》，《大连文物》1996

年第1、2期合刊)。根据以往资料,将大连地区汉墓分为五期:第一期西汉前期即高祖元年至景帝后元三年(前206—前141),以花儿山M1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盆;第二期西汉中期即武帝建元元年至宣帝黄龙元年(前140—前49),以营城子单人单室贝墓、分室合葬贝墓为代表,陶器组合为鼎、盒、壶、罐等,所出铜镜为昭明镜、日光镜,钱币为半两、武帝至宣帝五铢;第三期西汉后期即元帝初元元年至新莽地皇四年(前48—24),以花儿山M7为代表,随葬陶器组合除前两期的鼎、盒、壶、盆、罐外,新出现了耳杯、熏炉、灶等器形;第四期东汉前期即光武帝建武元年至和帝元兴元年(25—105),以前牧城驿砖室墓为代表,随葬陶器有鼎、仓、樽、瓮、盒、罐、壶、盆、盘、房、灶、井、魁、勺、耳杯和陶俑等;第五期东汉后期即殇帝延平元年至献帝延康元年(106—220),为花纹砖室墓,随葬陶器与东汉前期墓大略相同,新出现五枝灯、虎子、长方套盒等器类,铜镜出现“位至三公”铭文。瓮(瓦)棺墓的年代约当西汉前期至新莽时期。石板墓出现于东汉后期,主要流行于魏晋时期。

汉魏以降考古学研究,还有对高句丽山城的考证(许明纲:《大连地区四座山城略考》,《博物馆研究》1996年第1期)等。

自1964年至今,大连地区考古学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相信今后的大连地区考古学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

《读书敏求记》版本源流述略

余彦焱

清初钱曾（1629—1701，字遵王）所撰《读书敏求记》，系一部古代目录学经典之作，自清初以来，备受推崇。作为一部私家藏书目录，《读书敏求记》不仅沿袭汉以来书目解题传统，并开创以读书记形式著录所藏善本之先例，对于清代以来藏书家讲究版本鉴定、注重善本著录之风气影响深远，又开启近世版本目录学发展之先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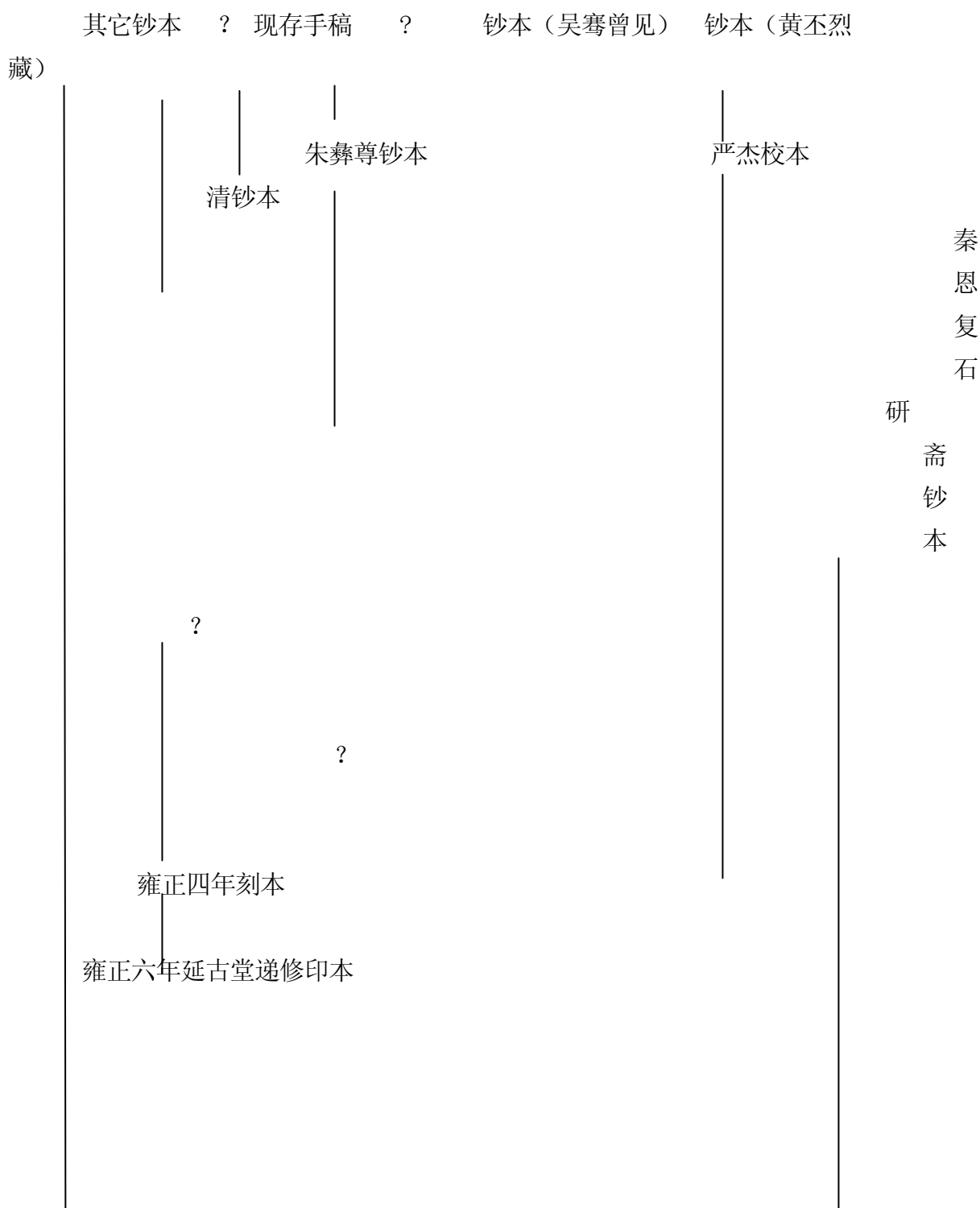
《读书敏求记》之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一是因为其稿本流行情况颇多传疑之辞，再是因为传世钞校本面貌多端，互相参杂而又各有歧异，三是刻本曾经多次转版重印，是同是异，启人疑窦。故本文一一罗列所见所知诸版本，意在厘清诸版之关系，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好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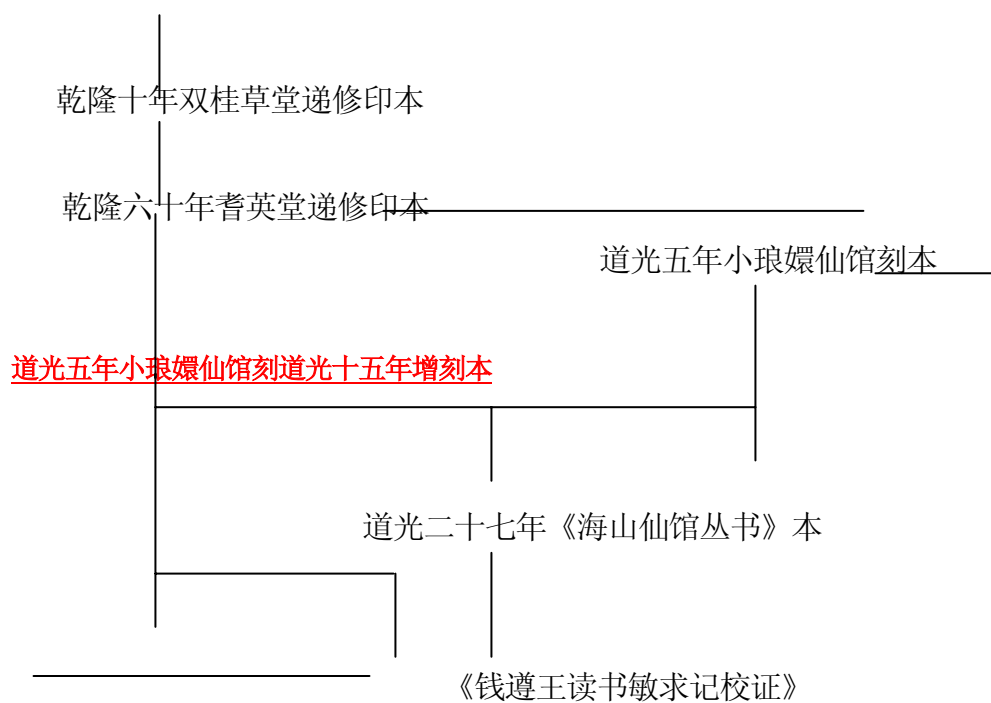
《读书敏求记》各本问世之顺序，正如章钰（1865—1937）所云：“先出者为朱钞、赵刻，在康、雍年间；后出者为堯圃所称之足本，严氏据以校补、阮氏据以再刻，在嘉道年间；题词本则中册，入浙局。上下两册归堯圃，则在乾嘉年间。”¹旧传《读书敏求记》一书于钱曾生前曾由朱彝尊钞出一本。然钱曾卒于康熙四十年（1701），八年后，朱彝尊亦辞世。钱、朱所藏，于两人在世时实未尝公开。自二人逝世后，稿本、钞本方始散出，流传渐广，然20多年间，亦皆以钞本传世。至雍正四年（1726），吴兴赵孟升据某钞本刻印，此书始有刊本行世。赵刻版片，此后数易其主，故今传有雍正六年（1728）延

¹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序跋题记》，见于章钰《读书敏求记校证》，民国二十一年刻本。

古堂、乾隆十年（1745）双桂草堂、乾隆六十年（1795）耆英堂等递修印本。此后，又有合刊本、钞本于一之道光五年（1825）阮氏小琅嬛仙馆刻本及道光十五年（1835）年阮氏之增补本。道光二十七年（1847），潘仕成刊《海山仙馆丛书》亦收入此帙，系就耆英堂本与小琅嬛仙馆本参校而成者。而最后民国时章钰之《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则为结合前述众本而成之整理本，系现行《读书敏求记》最善之本。《读书敏求记》各本之关系，可参以下之版本系统示意图：

《读书敏求记》版本系统图





注:

- 标“?”者系情况不详。

至于《读书敏求记》流传诸本之基本情况，则如下文所述：

一、手稿本

此本系《读书敏求记》之未定稿，题曰“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为丰顺丁日昌（1823—1882）旧藏，迭经名家鉴定，均认为确系钱曾手稿无疑。此本今藏国家图书馆，不分卷，残存一册，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一字，无格。首行题“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¹，有独山莫友芝（1811—1871）跋、丁日昌批注并跋。有“丁日昌字静持号禹笙”、“禹笙”、“禹笙流口（览？）所及”、“我是识字耕田夫”、“贤者而后乐此”诸印²。曾经丁日昌、涵芬楼递藏，吴騫、莫友芝、邓邦述、张元济、傅增湘、章钰皆经眼。

钱曾歿后，此手稿若隐若现，沉浮不定，直至清末，始辗转归丁日昌收藏。江标《丰顺丁氏持静斋宋元校钞各本书目》“钞本史部”类著录曰：

“《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一册。钱遵王手稿，浓圈密点，亦有涂抹删改。盖其《读书敏求记》未编定之初本也。诸经中有可补赵、阮两刻之遗者十许条。”此本上有丁日昌同治九年（1870）跋，文曰³：“同治九年三月初十日，禹生读。《东都事略》现归于予。《毛诗要义》此云系钞本，予所得宜稼堂宋刻本，巍然为海内之冠。惜当时牧斋、沧苇、子晋诸藏书家不及见也。是书颇有波澜，忽在题中，忽在题外，可喜也。雨生又识于清节堂。”

莫友芝曾为丁日昌整理书籍、编辑书目，同治四年（1865）获见此本，并跋云：“此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未编类初稿也。其灭改字意，悉与元钞同，

¹ 杜泽逊《四库存目标注（〈读书敏求记〉条）》，见于《藏书家》第二期，齐鲁书社，2000年，页146。

² 《涵芬楼烬余书录》“史部”，民国间商务印书馆印本。

³ 莫、丁二跋见《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序跋题记》。

盖是遵王手迹。中载诸经本有十许条，溢出阮刻《敏求记》之外，亟可宝贵。同治乙丑五月既望，邵亭借校题。”

丁日昌之后，此本于民国年间经张元济手入藏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中，又经邓邦述借校，傅增湘经眼。傅增湘有题记曰¹：“丁氏所藏稿本，为张菊生收得，转入涵芬楼中。余曾假观，友人邓君邦述曾校过。”张元济亦以此本为钱曾手稿无疑，其《涵芬楼烬余书录》著录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先后有三刻本，书凡六百二十种。此稿尚未有‘敏求记’之名，所收仅二百七十九种，既无卷第，亦未分类，惟誊写工整，前后一律，粉末涂改，朱笔圈点，均极度审慎。是为遵王手定原稿无疑。”章钰校《敏求记》时，曾托傅增湘转借而得一观，跋云“托江安傅沅叔增湘转借上海涵芬楼藏遵王《题词》一册，审为《敏求记》之初稿”。又云：“写本之残者……计存二百八十余条。”²李盛铎于民国十一年（1922），亦曾借此本校所藏清秦氏石研斋钞本，并跋曰³：“虞山钱遵王《藏书目录题词》中有朱笔圈点及粉笔涂灭、墨笔添易之字，殆《敏求记》之初稿也。壬戌芒种后二日借校，盛铎。”

二、其他钞本

（一）朱彝尊钞本。今未见著录。据吴焯所言，此钞本之来源，乃“遵王撰此书，秘之笈中，知交罕得见者。竹垞检讨校士江南日，龚方伯遍召诸名

¹ 《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六“史部·目录类”，傅增湘订补、傅熹年整理，中华书局，1993年。

²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史部”，顾廷龙编，燕京大学图书馆，民国二十七年，页76。

³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11。

士，大会秦淮河，遵王与焉。是夕，私以黄金青鼠裘予其侍史，启篋得是编，命藩署郎吏抄录。并得《绝妙好词》先刻，遵王疑之。竹垞为之设誓而谢之，不轻受人也。晚年稍稍传出，江南旧家间有之”¹。此钞本后归马思赞（号寒中）²，吴焯又自马思赞处购得，吴氏康熙五十六年（1717）跋曰：“竹垞既重违故人之命，而又惧此书之将灭没也，暮年始一授族子寒中。余闻之久矣，然知其严秘勿肯与。近者校讎诸书，寒中悯予之劳，竟许以赠。余以白金一斤为寿，再拜受之，亦设誓辞焉。”³吴氏又谓，此本“字多谬误。盖当时半宵写成，未经校对”⁴。吴焯之后，蒋凤藻曾得此本，其致叶昌炽札曰：“尚有朱竹垞钞《敏求记》原本四册。张宗橐重又校过。五色纷披，比近刊多出不少。”⁵然蒋氏《秦汉十印斋书目》著录之《读书敏求记》版本只有“吴省兰临黄丕烈校本”，朱钞本究竟归于何处，今已不可考。又据吴焯之跋文，知丁敬身亦曾藏一钞本，得于石门吕氏，乃朱彝尊亡后，其家属窃录而出者，但讹误更多。

（二）黄丕烈藏钞本，即后世所谓“足本”。今未见著录。叶廷管校本题记称：“闻我郡黄氏士礼居藏有遵王原钞本，颇精。”⁶严杰⁷著录过此本次第

¹ 《拜经楼题跋记》卷三，道光二十七年刊本。

² 马思赞（？—1745），原姓朱，字仲安，号寒中，又号南楼，海宁人。监生。室名“道古楼”。有《道古楼诗选》。《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三著录有其《道古楼书画目录》钞本五册。

³ 《拜经楼题跋记》卷三。

⁴ 《拜经楼题跋记》卷三。

⁵ 《心矩斋尺牍》，蒋凤藻着、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编纂委员会编，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校印，民国三十年，页42至43。

⁶ 《拜经楼题跋记》卷三。

⁷ 严杰（1763—1843），浙江钱塘人。字厚民，号鸥盟，室名书福楼。精于经学，曾参阮元之幕。阮元编《皇清经解》、《经籍纂诂》时出力最多。

于所藏赵刻本之上。道光五年（1825）阮福重刻小琅嬛仙馆本，曾以此本与雍正四年赵孟升刻本相校。关于此本之来源，阮氏序中曰：“道光乙酉夏，武林严厚民师因编《皇清经解》，重游岭南，篋中携有赵氏初印，并言曾用遵王手定原稿次第，以朱笔一一补正于上方。其稿今藏黄尧圃主政家。”张元济曾论云：“黄尧圃自称有题词，有人疑即兔床所指之上、下二本。然严厚民曾据以校补刻本，与此册无涉，且今亦不存。”¹

（三）吴騫曾见本。今未见著录。据吴騫称，乾隆三十八年曾于浙江采进书局得见此本，其题记曰：“癸巳（乾隆三十八年）秋八月，见书局（即四库馆浙江采集进献书局）有此钞本，旁注‘中’字，知尚有上、下二本，惜不可复见。细阅此本，盖即《读书敏求记》之初稿，故各书参错，未曾归类。然《敏求记》止六百余种，而此一本已有二百八十三种。”²今据吴騫所述此本之大概，则知并非今存之题词本。而章钰《校证》所据各本中，有邓邦述藏振绮堂钞本一种，“即槎客题语所谓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当为乾隆三十八年）见于书局中者，在见题词本之后一年。”而章钰则谓：“遵王定本当即槎客在书局所见钞本旁注‘中’字者，此乃题词本，槎客据以补出《清教录》诸条，非黄尧圃所称足本，亦非尧圃所得题词本之上、下二册。”³张元济亦以为此本与前述手稿本非同一本，因此本“全体无旁注‘中’字，且种数不符，疑吴氏所见，为他人传录之本。”⁴

¹ 《涵芬楼烬余书录》“史部”。

²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序跋题记》。

³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据目》之“陈简庄校本”条。

⁴ 《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张人凤编，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537至538。

（四）秦恩复¹石研斋钞本，不分卷，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道光十五年（1835）年，阮亨以此钞本参校道光五年阮福小琅嬛仙馆本，辑出二十五条，增刻《补遗》一卷，与小琅嬛仙馆本一起收入《文选楼丛书》。此秦恩复钞本后归李盛铎，李氏曾于民国十一年（1922）借涵芬楼藏《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校此秦氏石研斋钞本，又跋曰：“涵芬楼藏《读书敏求记》稿本，文字颇有异同，其所录凡二百七十七种，此本未有者十六种，录于此册之后。”²李盛铎藏书后捐归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本即在其中。《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李氏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皆有著录。

此外，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目录类”著录，国内所藏《读书敏求记》其他钞本尚有：

- 清钞本，清周星诒校并跋。题“虞山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不分卷。今藏国家图书馆。杜泽逊认为，此本“当从前本（即前述手稿本）录出者”³。
- 清钞本，清陈昱跋。今藏上海图书馆。
- 清钞本，三部。皆藏国家图书馆。
- 清翁汝明钞本，清翁心存校。今藏国家图书馆。
- 清钞本，清吴玉墀、丁丙跋。今藏南京图书馆。
- 清钞本，清张宗橐跋并录，清许昂霄校。今藏国家图书馆。
- 清钞本，清叶名澧跋并倩人录，清黄丕烈批校题识。今藏国家图书馆。

¹ 秦恩复（1760—1843），清江都人。字近光，一字敦夫，号伯敦。乾隆丁未（1787年）进士，官编修。室名“石研斋”、“五笥仙馆”等。有《石研斋书目》、《石研斋集》。

² 《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页11。

³ 杜泽逊撰《四库存目标注（〈读书敏求记〉条）》。

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有钞本二种，一清初钞本，清宋定国康熙丙申、雍正丙辰校，邓邦述跋；一缪荃孙云自在龕绿格钞本。¹

三、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本

此本为《读书敏求记》最早刻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已据重庆市图书馆藏本影印。卷端题“也是翁钱曾遵王”，目录前题“箴后人也是翁钱曾遵王”，目录末题“吴兴赵孟升用亨校”，目录版心下镌“松雪斋”三字。前有王豫序、雍正四年（1726）赵孟升序，后有曹一士跋。关于此本之所出，王豫、赵孟升、曹一士皆未言及。然章钰之《序跋题记》中收方燾如²赵本序（此序刊本未收）称刻自“某氏”本，云³：“吴兴赵生，吾徒也。取某氏《读书记》，版钁之，摹其本以饷予。”又叶廷管称曾见袁绶阶、贝镛各依黄丕烈钞本影校于刻本，始知赵刻脱误甚多，且少著录书20余种，故疑赵氏所据者乃初稿而非定本⁴。上海图书馆亦藏一部雍正四年（1726）松雪斋刻本，有罗振常录清吴焯、吴蹇、朱文藻、陈鱣、胡重校并跋。

雍正四年赵刻初印本中原有傅序，系伪托时人傅王露之名而作。后因傅氏告官，引起官司，遂撤去傅序。关于此段故实，吴焯校本中，录有焯子城撰之

¹ 同上。

² 方燾如，清淳安人，字若文，号朴山，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官丰润知县。有《集虚斋稿》、《集虚斋文录》、《集斋虚学古文》等。

³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序跋题记》。

⁴ 同上。

题记说明：“此书向惟曝书亭藏有钞本，珍秘不出。先君子以重价购得之。稼翁晚年力不能守，元钞宋刻，雨散云飞，而此书遂流落人间。吾友赵君用亨为刻之吴兴，卷端冠序一首，借先友傅编修玉笥之名。傅不知也。偶于书肆中见之，大怒，且以‘旧史官’三字为犯时忌，徧告当事，欲毁其板，几允所请，赖先子解纷得寝。然用亨亦因此愧愤，不复刷印示人矣。”¹故后印本及他本皆不录傅序。傅王露，号玉笥，浙江会稽人，康熙五十四年乙未探花，授编修，雍正间任《西湖志》总纂，极负时名。当年傅王露既于书肆中见此《敏求记》刊本而大怒，则其初刻初印本当有傅序可知，然今所见之松雪斋本中皆无傅序，此则正如章钰所云“今初印不可得，间有流传，傅序已撤去”²。不知有傅序之本人间尚存否，待考。

四、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雍正六年濮梁延古堂递修印本

此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牌记作“读书敏求记/虞山钱遵王先生著/濮川延古堂藏版”。此本系以雍正四年松雪斋刻本重印，故行款、版式、字体悉同前本。卷前目录三叶，版心下无“松雪斋”三字，代之以黑口，然墨下“松雪斋”三字隐约可见。前有雍正六年濮梁序，自署“雍正六年小春月濮川濮梁书于延古堂”。则所谓“濮梁刊本”者，实即以松雪斋刊本涂去“松雪斋”三字，另加入濮梁序。“后来，索性将原版中一切赵氏刻本的标识统统剝掉。”³故，前人所谓雍正四年赵刻本、雍正六年濮刻本，实际同为一版。今国图、上图、上海博物馆均藏有此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九二三册）所收入者，即据国图藏本影印。

¹ 《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卷三。

² 见《读书敏求记据校各本略目》“吴兴赵氏刊本”条。

³ 宋平生《〈读书敏求记〉版刻源流考辨》，载《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学刊》，1991年第2期。

笔者曾获睹上海博物馆藏本，该本曾经章钰过目，卷首有其题跋，述此本之来源：

“吴兴赵孟升于雍正四年校行此记，前有自序，目录中缝有‘松雪斋’三字，卷末有‘某某校’字，以借名傅玉筍编修作序，且冠以‘旧史氏’，为犯时忌，经傅告官，砍毁其板，赖吴尺鳧调解乃寢，详见吴敦复乾隆丁巳跋语。此本与赵刻无丝毫异同，而有雍正六年濮梁序，无校字字样，‘松雪斋’三字则用墨涂去。详加审度，乃悟此即赵本。殆因刻成后几肇大祸，而又不甘毁弃，乃划校名，抹中缝，而另请人序之，且疑假造姓名也。刻书雅事，演成此段故实，当时风气亦可想见。至书中校语脱漏舛误，系厂贾眩人之技，不必置论。为书所见，谗孟莘道兄定之。己未元夕，长洲章钰。”后钤“章式之读书记”白文印一方。按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亦论及曾于蒋孟莘处借书一事，与上述文字相近，不赘录。

五、清雍正四年赵孟升松雪斋刻乾隆十年沈尚杰双桂草堂递修印本

此本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黑口，单鱼尾。有赵孟升原序、曹一士原跋，并增乾隆十年沈尚杰序。沈序署“乾隆十年岁次乙丑仲冬既望东里沈尚杰书于双桂草堂”。是本今国图、上图有藏。据其书版式、行款同于松雪斋本，又“弘”、“历”等字不避讳推断，此本当由松雪斋版递修而来，并非如沈尚杰序中所说“举吴兴赵氏之本重加校仇，付诸剞劂”之重修。

六、清雍正四年赵孟升刻乾隆十年沈尚杰双桂草堂乾隆六十年沈炎耆英堂递修印本

此本行款、版式、字体同前本，亦是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四周单边，黑口，单尾鱼。封面镌“读书敏求记/虞山钱遵王先生着/耆英堂藏版”字。有胡

重、沈炎二跋。沈炎乃尚杰之孙，沈炎跋云：“此书原刻颇有错误，今俱改正，一一开列于左……此外凡蛀损模糊廿余页，俱重刻完善，庶藏书家得旧本，可以互勘矣。乾隆六十年乙卯夏日携李沈炎记于耆英堂。”胡重跋云：

“雍正丙午吴兴赵孟升用亨氏始授诸校梓，乾隆乙丑嘉兴明经东里沈公重校以行。”又云：“今明经文孙葭士因斋中板片岁久漫漶，乃取善本讎勘，讹者刊之，阙者补之，刮磨之工，浹旬乃竣。”此本与赵孟升刻本行款、版式、字体、断板、避讳皆同，可知仍是在原版基础上重新校改后印行，应属递修本。国图、上图、上海博物馆皆藏有此本。

笔者所见上海博物馆藏本，乃章钰《补遗》中所称“陈菱庵校本，上虞罗子经振常传录于常熟赵氏藏本”。章氏《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稿成后又获此本，遂据之撰《补遗》一卷。是本卷前有章氏手跋曰：“甲子岁朝春，钰辑《敏求记校证》脱稿，付京厂开版。越岁六月，上虞罗子经执友以手录陈菱庵先生校本见示，成《补遗》一卷。翻智既竟，敬记卷端，以志嘉惠。乙丑九月廿一日，长洲章钰侨津记。”此本过录诸家题语、批校甚多，章钰《补遗》所记则甚略，兹稍作补充如下。

此本有罗振常过录陈其荣校跋，另有高世异、章钰等跋。其天头、地脚以墨、脂、朱、花青诸笔详录各家校语。此本另页又有录陈菱庵题识，云：“右录叶调生《吹网录》，其所云刻本与钞本有无互异及部类互异者，即用墨笔录于此编，俟觅得校本，再当重勘一过，此书方有定本也。同治壬申春三月十二日，菱庵漫士识。”全书各处钤有“旧山楼劫余”、“旧山楼”、“非昔轩”、“次侯手校”、“赵不騫印”、“徐恕”等印。按“旧山楼”为清末赵宗建（1828—1900）之藏书楼。赵氏江苏常熟人，字次侯，号次公，别号非昔居士，室名非昔轩、旧山楼等。赵氏旧山楼藏书甚富，又撰有《旧山楼藏书记》。该本为旧山楼赵氏旧藏，赵宗建以朱笔校过，后传至其曾孙赵不騫。又经罗振常、徐恕递藏。

此本卷一第十二页天头空白处又有罗振常题：“此本乾隆六十年沈氏又修改误字，海山仙馆所刊即修改之本也，今悉依之改正各处。振常”。第四卷卷末题：“丁巳六月，友人费君景韩出示陈菱庵手校《读书敏求记》，极为精审，因篋中适有旧山楼藏本，与陈校底本相同，因令抄胥录其校语于赵本，而陈校原本则为常熟丁氏所得。录竟因识岁月。上虞罗振常。原校用诸色笔，迨录时间有未悉同原色者，兹分别记之如次：原校墨笔仍墨笔，朱笔改花青，脂笔改朱笔，绿笔仍绿笔”。另有一纸说明：“书中脂笔一系过录沈柳坪校本（仅三、四两卷），一系复校徐稚卿钞本《也是园目》及粤刻《述古堂目》。绿笔系从鲍铭青处旧钞本校得。其朱墨笔是否菱庵已语，不能臆断。”费景韩乃海宁人费寅，设书肆于海宁峡石，陈校本为罗振常从其处借来。高世异跋曰：“遵王此著名重艺林，虽无善本，读者憾之。数年私愿，广求校册，以勘得失，期成完璧。偶过罗君，喜见是本，即从假归。人事倥偬，校录逾岁始克完竣。罗君雅怀，既有同志，复宽时月，俾予校讎，乐成之惠，弗可谖也。于还书日题此识感。己未中秋，华阳高世异记于金陵慧圆閤侨胞寓。”钤白文“世异印信”及“苍茫斋主人”朱文印各一方。

综上所述，赵孟升刻本与延古堂、双桂草堂、耆英堂递修印本实出自同一版，可称为赵本系统。

七、道光五年阮福小琅嬛仙馆刻本

此本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书前有阮福序，后有严杰跋。存赵孟升、王豫二序。每卷末有“道光乙酉年八月依武林严氏书福楼本开雕”篆书二行木记。此本乃阮福以严杰（厚民）书福楼所录黄丕烈藏钞本与赵

刻本参校重刻而成。阮福重刻本自序曰：“道光乙酉夏，武林严厚民师因编《皇清经解》，重游岭南。篋中携有初印本，并言曾用遵王手定原稿次第，以朱笔一一补正于上方。其稿今藏黄尧圃主政家。脱漏三十余种，如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丁度《集韵》等书，皆赵本之所未载。讹谬之处，悉行改正，疑廊吏钞时仓卒所遗舛也。雍正本已不可多见，何论遵王原稿。爰亟为钞录，重付梓人。至原序仍录存于后。”

八、清道光五年阮福小琅嬛仙馆刻道光十五年阮亨增刻本

道光十五年（1835）阮亨据秦恩复石研斋钞本校小琅嬛仙馆本，辑出二十五条，乃增刻《补遗》一卷，与阮福刻本一并收入《文选楼丛书》。有阮福序、严杰跋及赵孟升、王豫旧序。每卷末有“道光乙酉八月依严氏书福楼本重雕”篆书木记。《补遗》卷末有“道光乙未年夏五依江都秦氏石研斋本开雕”木记，并“仪征阮亨梅叔校”七字。

九、清道光二十七年潘仕诚刻《海山仙馆丛书》本

半叶九行，行十九字，左右双边，无界栏。黑口，无鱼尾。版心下镌“海山仙馆丛书”。有赵孟升、沈尚杰、胡重等序跋。此本乃以沈炎耆英堂递修本与阮福刻本参校而成。阮刊本无而赵刊本有者，注“严本缺”三字于每条之下。民国二十五年（1936）商务印书馆据此本影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1985年，中华书局重印）。

十、民国十五年章钰刻本（《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

章钰（1865—1937），字式之，江苏长洲（今苏州）人。一字坚孟、坚梦，别署长孺、北池逸老、霜根老人等，光绪进士，曾任清史馆纂修。其著作最著名者有《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及《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章钰室名

“四当斋”，乃取宋代尤袤所云图籍“饥当肉，寒当衣，孤寂当朋友，幽忧当金石琴瑟”之语而得。章氏喜藏书，其四当斋收书达三千三百六十多部、七万多卷。又精于金石目录与掌故之学，故所藏以史部与集部为多。民国二十六年（1937）逝世以后，其家属将四当斋藏书悉数赠与燕京大学。民国二十七年（1938），由顾廷龙先生负责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三卷，由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

光绪三十四年（1908），章钰曾从宗舜年¹处借得其父宗源瀚²所藏于城³所录海宁管庭芬⁴手校《读书敏求记》，以后遇有别本，辄随见随录，遂成《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四卷，故题“海宁管庭芬原辑，长洲章钰补辑”。此书初刊于民国十五年（1926），民国二十一年（1932）又增刻《续补遗》一卷。

《读书敏求记校证》四卷，民国十五年（1926）刻本，封面镌“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长洲章氏丙寅年刊成”，《后记》后有“京都杨梅竹斜街文奎斋王孝艾缮刻”一行。卷端题“海宁管庭芬原辑，长洲章钰补辑”。章氏撰此《校证》，曾参阅赵氏松雪斋刻本、濮梁延古堂递修本、沈氏耆英堂递修本、阮氏小琅嬛仙馆刻本、潘氏海山仙馆刻本等，以及所见校钞者凡二十七本。章氏尝自道其着书之缘由云，因所藏“沈修赵本，蝇头杂沓，不便披寻，乃发兴

¹ 宗舜年（1865—1933），江苏南京人。字子戴，号耿吾。源瀚之子。富藏书。其室名曰“咫园”、“野绿轩”。

² 宗源瀚（？—1897），清上元人。字湘文，舜年父。监生。室名“颐情馆”。

³ 于城，清海昌人，字赤霞，号小圃。国子监生。

⁴ 管庭芬（1797—？）清海宁人，字培兰，号芷湘，晚号芷翁。诸生。工书画，长于钞书。室名“花近楼”、“待清书屋”。

录一净本”，遂“一一搜索原本，纠误补漏”，写出校证文字¹。不仅对《读书敏求记》文字作大量比勘，且补入大量史实。《校证》包括《总目》、《补辑类记》、《据校各本略目》、《补目》、《佚文》、《序跋题记》、《附录》、《补遗》、《后记》等各一卷（民国二十一年增刊时又增入《续补遗》一卷），整理出赵刊本、沈刊本共六百二十一条著录，又佚文十三条（章钰曰“六百二十条”，误）。据《四当斋藏书目》所载，《校证》有第一、第二、第三及清稿本。原书六万言，此本衍为二十四万余言，乃《读书敏求记》各本中最详备可靠之本。顾廷龙先生曾曰²：“研究版本目录之学，向必从遵王《读书敏求记》入门，故经乾隆以来诸家之校注者甚伙。近得式丈荟萃一编，成此《校证》，为学者不可不读之书也。比见吾校图书馆藏有高世异（尚同）手录各家批校本，间有自记者，因取丈赠本对雠，则大都已入《校证》矣。”章钰《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书版尚存，“文革”后中国书店曾重刷印，1987年广陵古籍刻印社曾影印。1990年中华书局再次影印，列入《清人书目题跋丛刊》。

章钰作此《校证》时，邓邦述亦正从事于《读书敏求记》之校勘，篋中所收此书版本甚多。今国家图书馆藏有《校证读书敏求记》一册，存卷一，未题校证人，著录为“江宁邓邦述群碧楼钞本”，疑即邓氏未完稿。章钰曾从邓邦述处借得《读书敏求记》多种，其《校证·据目》中所载借自邓氏之版本有：

（一）雍正四年刻本

1、章氏称“吴兴赵氏刊本”，雍正四年（1726）赵孟升刊，有傅王露王豫及孟升自序，曹一士跋。

¹ 《钱遵王读书敏求记校证·补辑类记》。

² 《章氏四当斋藏书目》顾廷龙跋。

2、吴騫校本，底本系赵刊本，吴騫传钞朱文藻¹校。

3、胡重²校本，底本系赵刊本，以汪森³裘抒楼钞本校。有胡重跋。

4、陈鱣⁴校本，底本系赵刊本，“仲鱼先生传槎客校并旧钞本、遵王定本校”。

（二）乾隆十年双桂草堂印本

1、章氏称“嘉兴沉氏刊本”。

2、严元照⁵校本，底本系双桂草堂印本，章氏称“芳椒堂校本”，严元照以沈祖彬⁶钞本校。

（三）乾隆六十年耆英堂印本（章氏称“嘉兴沉氏刊本重修本”）

（四）道光五年小琅嬛仙馆刻本

1、章氏称“仪征阮氏刊本”。

2、管庭芬校本，底本系阮刊本，校以陈鱣、胡重校本。

3、劳氏丹铅精舍校本，底本系阮刊本，以沈祖彬钞本及严元照两校本校。

（五）清钞本

¹ 朱文藻，字映漭，号朗斋，又号碧溪居士。清仁和人。乾隆诸生。精金石、史学。室名“碧溪草堂”。

² 胡重，字菊圃，号小书隐生，又号菊圃学人。清嘉兴人。室名“书隐阁”。

³ 汪森（1653—1726），字晋贤，一字碧巢。清休宁人。富于藏书，室名“裘抒楼”、“小方壶”、“碧巢书屋”。

⁴ 陈鱣（1753—1817），字仲鱼，号简庄。清海宁人。精训诂之学，好藏书。室名“向山阁”、“六十四砚斋”。

⁵ 严元照（1773—1817），字久能，一字修能，号蕙榜，又自号晦庵居士。清归安人。聚书数万卷。室名“芳椒堂”、“柯家山馆”。

⁶ 沈祖彬，会侯，号惠圃，清康雍间人。

章氏称“娄东宋定国¹校本”，“康熙丙申一校顾苍史本，雍正丙辰再校王逸陶本”。今台湾“中研院”史语所藏“清钞本”，有清宋定国康熙丙申、雍正丙辰校，近人邓邦述跋者²，即章氏所云之本。

(六) 沈祖彬钞本

(七) 吴焯绣谷亭校本

“系曝书亭钞本，吴尺凫先生以吕氏明农草堂钞本、赵氏刊本校”。

(八) 赵昱³小山堂校本

“系传钞丁敬身所藏明农草堂本，赵谷林先生传尺凫校”。今上海图书馆藏清初钞本有清陈昱跋，未知是否即此本。

(九) 汪宪⁴振绮堂钞本

“系传录小山堂本，朱朗斋传钞尺凫校”。

(十) 汪铁樵⁵校本

除邓邦述藏本外，章钰汇校所据本又有：

(一) 雍正六年延古堂印本

章氏借得蒋汝藻藏本。

(二) 海山仙馆刊本

(三) 述古堂藏书目录题词稿本

章氏自傅增湘处借得一校。今藏国图。

¹ 宋定国，字宾王，号蔚如。清娄县人。富藏书，精校勘。室名“心远堂”。

² 杜泽孙《四库存目标注（〈读书敏求记〉）》。

³ 赵昱（1689—1747），原名殿昂，字功千，号谷林。清仁和人。贡生。有小山堂藏书数万卷。室名有“小山堂”。

⁴ 汪宪（1721—1771），字千陂，号鱼亭。清钱塘人。乾隆十年进士。好蓄书。室名“振绮堂”、“静寄东轩”。

⁵ 汪铁樵，清钱塘人。

（四）赵昱小山堂残钞本

此本残存卷四一册，板框外有“小山堂钞本”五字，清朱文藻、吴騫校，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章钰从丁国钧处借得一校。近有曹培根为曹大铁《藏书目录》所作辑注，其中著录有“《读书敏求记》赵氏小山堂钞本”，此本“朱文藻朗斋录何义门校本，合订一册，吴兔床騫精校，晚清丁秉衡又有校正并题记五则，有丁氏藏印”¹，当即此本。此本《善本书室藏书志》未见著录。丁氏书后多入江南图书馆，然《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未载，未知何时流入曹大铁处。

（五）吴騫原校本

蒋汝藻藏，有清吴騫校并过录朱文藻等诸家校跋。章钰跋云“孟莘道兄通假”，今藏台湾原中央图书馆。

（六）黄丕烈校本

蒋汝藻藏。

（七）叶名沆²影钞本

陈曾寿藏，系“影写沈尚杰本，照录堯圃校语，叶名沆借诸城李氏本录于京师”。今藏国图。

（八）吴志忠³传录黄堯圃校本

¹ 《藏书家》第十辑，齐鲁书社，2005年，页一三五。

² 叶名沆（1811—1859），字润臣，号翰源。清汉阳人。道光十年举人。室名“敦夙好斋”。

³ 吴志忠，字有堂，号妙道人。清长洲人。长于目录校勘之学。辑有《璜川吴氏经学丛书》。

沈曾桐藏。有周星诒题记，云系魏稼孙得于吴中。今国图藏雍正四年（1726）松雪斋刻雍正六年（1728）延古堂印本，有吴志忠录黄丕烈批校，周星诒批注并跋，蒋凤藻、陆心源批注。疑即此本。

（九）于城传录管庭芬校本

宗源瀚旧藏，章氏从其子舜年处借得，并称此本为其《校证》之导师。今上海图书馆藏有雍正四年松雪斋刻乾隆十年双桂草堂修版印本，有宗舜年校并跋，徐鸿熙、章钰、邓邦述跋。疑即此本。

（十）管庭芬汇钞原稿残本

沈曾桐藏。存第三卷。

（十一）管庭芬汇钞传录残本

缪荃孙藏。缺第二、四两卷。

（十二）谢章铤¹藏本

此本曾经谢章铤、周星诒、蒋凤藻、周左季递藏，后归沈曾桐。

十一、1984年书目文献出版社排印丁瑜点校本

是本据沈尚杰本点校，参以阮刻、潘刻及佚名临吴焯、吴蹇校本。末附序跋十三则。

作者简介：余彦焱，女，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馆员。

¹ 谢章铤（1820-1903），清长乐人，字枚如，藏书处名“赌棋山庄”。

东洋文库藏《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资料随录

吴 格

一、引言

日本东洋文库新近入藏之《〈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纂资料》（下简称《编纂资料》。分类号：X1/3-B/42。登录号：369376），凡六函 88 册，分为“研究所”（三函 48 册）、“书目”（三函 40 册）两部分。其书高 26.5 厘米，宽 20 厘米，封面（底）单叶磁青布拓裱，与内（底）封叶粘连，四眼双线装订，上下书背包角。各册均订为五十叶左右，十二行红格稿纸（版匡高 17.1 厘米，宽 34.2 厘米），四周双栏，文武边，白口，版心有朱长方墨丁，全书统一型制。

此批资料之性质，属于民国二十至四十年代原北平人文科学研究所（下简称“研究所”）组织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简称《续修提要》）时遗存之“交稿记录”（“研究所”部分）及“书目记录”（“书目”部分）。所谓“交稿记录”，即各撰稿人所交提要稿之篇目及时间记录；所谓“书目记录”，即各撰稿人与研究所拟定之提要书目。以上两种记录，均以人立册、人各一册（或两册），分别著录《续修提要》篇目 13000 余种、书目 19000 余种。根据记载，《编纂资料》于 1945 年由研究所方面向国民党教育部特派员沈兼士先生完成移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收藏，建国后递藏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目前正在进行之《续修提要》整理，系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续修提要》原稿（1998 年齐鲁书社影印本），并取同出一源之《续修提要》油印稿参校。由于《续修提要》稿总数有 34000 余篇、涉及撰稿人 70 余名，各篇提要

稿之具体撰人，尚存部分空白及误缀。利用“交稿记录”与“书目记录”，对于确认《续修提要》各稿著者，首先可收比勘之效。鉴于《续修提要》编纂史研究尚属起步，有关档案及资料尚未公开或已流失，《编纂资料》之发现与利用，对于了解《续修提要》编纂原委及相关人事，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兹据笔者于东洋文库检阅《编纂数据》之笔记，逐册介绍如次，覆查校核所得，附识其后。

二、关于《续修提要》“交稿记录”

《续修提要》“交稿记录”48册，封面左上、右下方各贴红色纸签一方（白纸衬边），上签书撰者姓名一行（或书字号而旁注本名，或姓名前后加“编纂（着）者”、“提要目录”等字），格式略存差异；下签书“研究所”三字，各册一律。书根及书背分别以铅字铃印撰者姓名。各册均自次叶始书写，每叶以铅笔画为六栏，栏目分题如下：

- （一）某部某类（注明所录图书之类属，如“史部/诏令奏议类”），
- （二）书名（注明所录图书书名，如“御制孝献皇后行状一卷敕撰传”）
- （三）版本（注明所录图书版本，如“松邻丛书本”）
- （四）撰人（注明所录图书著者，如“清世祖制行状，金之俊敕撰传”）
- （五）收稿日期（注明提要稿收到日期，如“七月廿二日”）
- （六）附注（注明提要稿系属撰稿人某年某月份之稿，如“二十年七月份”）

第一函十六册（东洋文库编号：研一①）

第一册

王式通（封面左上红签，下同，从省）/ 研究所（封面右下红签，下同，从省）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铃印“王式通”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

著录：

《御制孝献皇后行状》起，至《程中丞奏稿》止，凡三十六种。

收稿日期：

[二十年]七月廿八日（二十年七月份），八月十九日（二十年八月份），八月廿四日，九月廿一日（二十年九月份）。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史部诏令奏议、目录类著作。附注栏记有“著录”、“存目”等语。检《续修提要》原稿，王式通所撰提要存三十六篇，与此交稿记录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0.9”，知王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年九月，此为《续修提要》早期成稿。

第二册

王孝鱼 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王孝鱼”题名。

著录：

全册空白无记录

格按，本册无王孝鱼所撰提要交稿记录，又“书目记录”第六册封面原题“王孝鱼先生”，复经钩乙，改为他人姓名，可知王氏参与《续修提要》编纂曾中辍。今检《续修提要》稿本，王氏所撰提要稿存五十篇，多属子部儒家类著述，交稿当晚于此册登录之时。

第三册

王重民/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王重民”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1

著录：

《绍兴府志校记》起，至《鹑野堂诗征》止，凡九十三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七月三日（廿三年七月份）、七月十八日；

[二十四年]十月三十日（二十四年份）；

[二十五年]五月廿五日（二十五年份），八月廿四日；

[二十六年]五月一日。

格按，本册所录分属各部，多与敦煌文献、太平天国遗书及《四库》禁书（称“禁书类”）有关。检《续修提要》原稿，王重民所撰提要存一百一篇，较此交稿记录略增数种。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5”，知王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第四册

江瀚/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江瀚”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7

著录：

《古文尚书马郑注》起，至《蜀龟鉴》止，凡八百七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年]七月十七日（二十年七月份）、八月十九日，九月二十一日（二十年九月份）、十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二日（二十年十月份），十一月十四日（二十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四日；

[二十一年]一月十六日（二十一年一月份）、二月十五日（二十一年二月份），三月十五日（二十一年三月份）、四月十六日（二十一年四月份），五月九日（二十一年五月份），六月七日（二十一年六月份），七月十九日（二十一年七月份），八月十三日（二十一年八月份），九月十七日（二十一年九月份），十月十八日（二十一年十月份），十一月十日（二十一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二日（二十一年十二月份）；

[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二十二年一月份），二月十六日（二十二年二月份），三月十二日（二十二年三月份），四月廿日（二十二年四月份，接第一册），五月二十九日（二十二年五月份）、六月十二日（二十二年六月份），八月六日（二十二年八月份），九月九日（二十二年九月份），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份）；

[二十三年]一月十六日，二月九日（二十三年一月份）、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五日，四月九日，五月十日，二十三年六月份（二十三年六月份），七月份（二十三年七月份），二十三年八月份，九月份（二十三年九月份），十月二日

(十月份)，十一月七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日（廿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十七日；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三月九日，四月四日，五月十日，五月三十日，七月八日，八月六日，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九日，九月三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经部各类及史部别史、杂史、地理、政书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江瀚所撰提要存七百四十二篇，与此交稿记录略有出入，可供比勘。册中所记收稿日期偶有参差，又“二十四年二月二日”交稿之“《京口三山全志》十二卷”至“《武夷山志》二十四卷”二十条，因钞写重复勾除，可知“交稿记录”系据交接时清单等誊钞。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12”，知江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

第五册

向觉民/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向达”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6

著录：

《外国事》起，至《续高僧传》止，凡五十三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九月份（二十三年）；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二十四年份），五月三十日，九月五日，九月三十日，十月八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有关中西交通史著作，分属子部释家、道家类，史部地理等类。检《续修提要》原稿，向达所撰提要存五十四篇，与此交稿记录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10”，知向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十月。

第六册

沈兆奎/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黑色铅字钤印“沈兆奎”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0

著录：

《曾惠敏公奏议》起，至《退思初定稿》止，凡一百七十八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三月十三日（二十五年份），四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十二日，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九月十八日，十月七日，十月十九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十日，十二月廿一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一月十九日，一月二十二日，二月四日，二月六日，三月九日，三月二十五日，四月十二日，四月二十一日，五月十四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六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史部别史、载记、传记、地理、诏令奏议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沈兆奎所撰提要存一百七十八篇，与此交稿记录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6”，知沈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

第七册

编纂者 吴廷燮/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吴廷燮”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清秘述闻》起，至《仪礼经注一隅》止，凡六百二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月廿五日（廿三年），十一月五日，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廿九日；

[二十四年]一月十四日（廿四年一月份），一月廿八日，二月二日，二月十三日，二月廿七日，三月十一日，三月廿五日，四月二日，四月十五日，四月三十日，五月十三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四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十六日，八月二日，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九日，九月二十日，十月三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七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五年]一月十三日（廿五年份），一月二十一日，二月六日，二月十七日，三月三日，三月二十日，四月十日，四月二十四日，五月十二日，五月十七日，六月十三日，七月一日，七月二十日，八月七日，八月二十五日，九月十一日，九月二十六日，十月十四日，十月二十六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六日；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廿六年），一月十九日（二十六年份），二月三日，二月二十二日，三月六日，三月二十日，四月一日，四月十八日，五月二十日，六月四日，六月十八日，七月五日，八月廿八日，九月十日，九月廿七日，十月十一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二十七日；

[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二月九日，二月廿五日，三月十四日，三月廿九日，四月十五日，四月廿七日，五月十二日，五月廿七日，六月十一日，六月廿四日，七月八日，七月廿三日，八月八日，八月廿三日，九月六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史部正史、纪事本末、杂史、职官、政书、诏令奏议、史表、传记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吴廷燮所撰提要存八百五十三篇，较此增经部礼类、子部兵家类等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7.9”，知吴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八册

编纂者 吴寄荃/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吴燕绍”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4

著录：

《西藏志》起，至《藩疆览要》止，凡五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

[二十四年]六月七日（二十四年份），八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五年]一月八日（二十五年份），一月廿一日，三月二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五日，四月卅日，六月十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廿八日，十一月九日。

格按，封面题名“吴寄荃”铅笔旁注“燕绍”。本册所录多为边疆史地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吴燕绍所撰提要存四百二十篇，较此增子部兵家及史部杂史、地理、方志、诏令奏议、政书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11”，知吴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九册

吴承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吴承仕”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9

著录：

《仪礼经注疑直辑本》起，至《增订周易本易补》止，凡六十二种（六种抄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七月份（二十三年七月份），八月份（二十三年八月份），九月份；

[二十四年]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十四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十五日，六月七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十三日，八月十三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经部易类、子部杂家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吴承仕所撰提要存六十二篇，与交稿记录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8”，知吴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

第十册

何小葛/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何小葛”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8

著录：

《成都县志》起，至《夹江县志》止，凡二百八十七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卅一日（二十四年份），七月六日，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四日，九月十一日，十月十六日（廿四年十月），十一月十八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一月十三日，二月六日，三月十九日，六月十一日，七月六日，八月七日，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廿一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廿三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一月廿八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四川省方志。检《续修提要》原稿，何小葛所撰提要存二百八十七篇，与此交稿记录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3”，知何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三月。

第十一册

编纂者 何澄一/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何澄一”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2

著录：

《南海县志》起，至《永春州志》止，凡一百七十七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七月份（廿三年七月份），八月份（廿三年八月份），九月份（廿三年九月份），十月二十四日，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四日；

[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十一日，三月五日，四月六日，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廿四日，八月二十四日，十月二十三日，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五年]二月十日，八月十四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方志。检《续修提要》原稿，何澄一所撰提要存一百七十七篇，与此交稿记录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8”，知何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第十二册

余绍宋/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余绍宋”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9

著录：

《图汇宝鉴续编》起，至《常惺惺斋书画题跋》止，凡三百八十三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十一月二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未收余绍宋所撰提要。余氏所撰《书画书录解题》著录自汉以来历代书画论著甚富，出版于民国二十一年。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11”，知余氏此册交稿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所撰提要一次交稿近四百篇，或即据《书画书录解题》修改而成。

第十三册

编纂者 尚秉和/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尚秉和”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6

著录：

《九家周易集注》起，至《易内篇》止，凡二百四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六年]八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十一月二日，十二月七日；

[二十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二月廿四日，四月五日，五月卅一日，七月五日，八月廿五日，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一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经部易类、子部术数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尚秉和所撰提要存三百七篇，较此交稿记录增加。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7.10”，知尚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四册

编纂者 周叔迦/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黑色铅字钤印“周叔迦”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6

著录：

《佛说大安般守意经注解》起，至《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分中略录名数疏》止，凡一百九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八日（二十三年份），十二月十日；

[二十四年]二月二日（二十四年二月份），四月十一日，六月二十九日，八月八日，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日，十月二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二十五年份），六月一日，七月二日，八月十一日，十月十三日；

[二十六年]一月廿一日，五月十九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子部释家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周叔迦所撰提要存五百十八篇，较此交稿记录增加。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5”，知周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五册

柯劭忞/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柯劭忞”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

著录：

《周易郑注》起，至《澹园诗续编》止，凡一百九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年]七月十八日（二十年七月份），七月廿四日，八月十三日（廿年八月份），八月廿四日，八月廿七日，九月十日（二十年九月分），九月廿四日，十月廿二日（二十年十月份），十一月四日（二十年十一月份），十一月廿三日，十一月廿六日，十二月廿一日（二十年十二月份）；

[二十一年]一月廿二日（廿一年一月份），二月廿三日（廿一年二月份），三月十六日（廿一年三月份），四月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九日，五月十七日（二十一年五月份），六月廿一日，八月廿二日（二十一年八月份），九月廿三日（二十一年九月份），十月廿四日，十一月廿二日，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二年]廿二年一月十九日（二十二年一月份），二月十四日（二十二年二月份），三月十日（廿二年三月份），四月廿日（廿二年四月份）；

[二十五年]一月八日（二十五年一月份），（廿二年三月份）。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经部易类著作，又有少量史部金石、集部清别集类提要。检《续修提要》原稿，柯劭忞所撰提要存一百八十三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1”，知柯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一月。

第十六册

胡玉缙/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胡玉缙”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5

著录：

《周礼三家佚注》起，至《周礼摘笺》止，凡九十一一种。

收稿日期：

[二十年]十二月廿一日（廿年十二月）；

[二十一年]二月廿二日（廿一年二月），四月廿二日，五月廿一日，六月廿二日，七月廿二日，八月廿二日，九月廿一日，十月十一日，十月廿二日，十一月廿九日；

[二十二年]一月廿日（廿二年），一月廿八日，二月廿一日，二月二日，三月廿一日，七月廿一日，八月廿一日，十月廿一日，十一月廿一日，十二月廿二日；

[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二十三年一月份），六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八日（二十三[四]年一月份），四月卅日，五月十六日，七月十九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经部礼类著作（一种入史部典礼类）。检《续修提要》原稿，胡玉缙所撰提要存八十五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7”，知胡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胡氏学殖深厚，毕生致力增补《四库提要》，撰有《四库全书总目未收书目提要续编》、《清人经籍题跋》等，其自撰稿本中未收入以上提要。

第二函十六册（研一②）

第一册

高润生 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高润生”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8

著录：

《养羊法》起，至《蚕桑织务纪要》止，凡一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二月十八日（二十五年份），三月十三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一日，五月五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五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十日，七月二十九日，八月十七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二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一月廿四日，十二月十二日；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二十六年份），一月二十二日，二月二十二日，四月五日，五月十日，五月二十八日。

格按，本册所录以子部农家类著作为主，又有少量经部易类提要。检《续修提要》原稿，高润生所撰提要存一百五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5”，知高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五月。

第二册

班书阁 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班书阁”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1

著录：

《康熙南昌郡乘》起，至《草韵辨体》止，凡六百三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五年份），五月十一日，六月十七日，七月九日，七月三十日，九月二日，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二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十九日；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廿六年[份]），二月一日，三月廿日，四月一日，五月一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八日，六月十八日，七月六日，八月九日，九月二十八日，十月十八日，十二月七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江西、河南两省方志（含游记），兼及史部、集部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班书阁所撰提要存一千四百四十六篇，较此增史部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等类，子部杂家、艺术等类，集部别集、诗评等类著述，为《续修提要》撰稿较多者之一。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2”，知班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增撰提提交稿尚在其后。

第三册

编纂者 夏仁虎/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夏仁虎”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7

著录：

《南畿志》起，至《南游记》止，凡六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二月七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廿七日。

[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二十四年份），七月十八日，八月五日，八月三十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五年]三月十日（二十五年份），六月十六日，七月十六日，八月十一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二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九日。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二十六年份），二月二日，三月四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四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五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史部传记、地理类及江苏、浙江两省方志。检《续修提要》原稿，夏仁虎所撰提要存六百十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9”，知夏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

第四册

夏孙桐/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夏孙桐”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黄帝内经太素残本》起，至《显志堂稿》止，约三百六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八月份（二十三年八月份），十二月七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四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廿八日，三月五日，四月四日，五月九日，六月八日，八月九日，九月九日，十月九日，十一月九日，十二月六日。

[二十五年]一月廿二日（二十五年份），二月十三日，三月九日，四月十日，五月十二日，六月十二日，七月十日，九月七日，九月廿六日，十一月九日，十二月八日。

[二十六年]一月六日（廿六年），二月一日，三月八日，四月十日，五月八日，六月十四日，七月十三日，八月十四日，九月十八日，十月十六日。

格按，本册所录以子部医家类著作为主，未有清别集数十种。检《续修提要》原稿，夏孙桐所撰提要存七百五十八篇，子部医家类以外，清别集提要较此增加。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0”，知夏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五册

孙海波/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孙海波”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8

著录：

《汉魏石经残字叙录》起，至《集殷墟文字楹联》止，约五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十三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石经、甲骨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孙海波所撰提要存九百余种，较此增经部易类、四书，史部传记、金石，子部儒家、杂家，集部清别集、诗评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7.9”，知孙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增撰提提交稿尚在其后。

第六册

孙师郑/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孙雄”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1

著录：

《百华绛柎阁诗集》起，至《蒋观云先生遗诗》（蒋智由）止，凡一百八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八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一月廿六日，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七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廿五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十一日（二十四年二月[份]），三月九日（二十四年三月份），三月廿一日，四月一日（二十四年四月份），四月十日，四月二十二日，五月十七日，五月二十九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清别集著作。封面题名“孙师郑”，铅笔旁注“孙雄”。检《续修提要》原稿，孙雄所撰提要存二百八十篇，较此增史部传记、子部杂家及清别集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5”，知孙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增撰提提交稿尚在其后。又册内有夹签铅笔注云“孙师郑校至五月廿九止，六至十册全无（即蒋智由止）”，可知增撰提要有五册之多。

第七册

编纂者 孙楷第/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孙楷第”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0

著录：

《唐书志传通俗演义》起，至《增广归元镜》止，凡四百二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七月份（廿三年七月份），八月份（二十三年八月份），十月三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一月七日，十二月六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廿五日（廿四年一月份），二月十八日，三月九日，四月六日，五月九日，六月十日，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九日，九月二十六日，十月三日，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六日，十一月二十二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廿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三月二日，四月六日，六月一日，七月六日，十月九日，十二月五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二十六年），二月九日，四月五日。

格按，本册所录以子部小说家、集部戏曲类为主，又有河北省方志数十种。检《续修提要》原稿，孙楷第所撰提要存五百五十二篇，较此增子部杂家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4”，知孙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八册

孙曜/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孙曜”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5

著录：

《月令气候图说》起，至《夏小正私笺》止，凡三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七年]七月廿八日，九月廿八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史部时令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孙曜所撰提要存六十一篇，较此增经部礼类、史部职官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7.9”，知孙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七年九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九册

编纂者 伦明/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黑色铅字钤印“伦明（一）”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6

著录：

《孟子篇叙录》起，至《尚书约旨》止（未完，接下册）。

收稿日期：

[二十一年]五月廿一日（廿一年五月份），六月十四日，七月十八日（廿一年七月份），八月十五日，九月十七日，十月十五日，十一月廿八日（二十一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二年]一月十九日，二月十七日，三月十九日（二十二年三月份），四月二十日（二十二年四月份），六月二十日，七月十八日（二十二年七月份），八月二十日，九月九日（二十二年九月份），十月十九日，十一月二十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一月份），二月九日（廿三年二月份），三月十五日，四月十一日（廿三年四月份），五月十日（廿三年五月份），廿三年六月份，七月份（廿三年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二十三年九月份），十月三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月十二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月十七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一月九日，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十三日，三月九日，四月十二日，四月廿四日（二十四年四月份），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三日，六月九日，七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六日，八月二十一日，九月十日，九月二十三日，十月十四日，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六日，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三日；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五年），二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六日，三月十日，四月二日，四月十七日，五月四日。

格按，本册未完。册内经部“群经类”《钦定七经纲领》行端铅笔记“七卷末”，次行“四书类”《考证古本大学》行端铅笔记“在八卷中”。又史部“传记类”《史尚书行述》行端铅笔记“十六卷末”，“诗类”《三百篇诗评》行端铅笔记“十九卷末”。据此推测，伦氏所撰提要交稿时或已自行分卷。

第十册

编纂者 伦明/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伦明（二）”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接上册）《诗问》起，至《香草校孟子》止，与上册合计共一千七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六月五日，六月十二日，七月六日，七月十六日，八月七日，八月十五日，九月一日，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四日，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五日；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四日，三月五日，四月一日，四月二十三日，五月七日，六月十一日，六月二十五日，六月份，七月一日。

格按，以上两册所录为经部各类，史部传记、地理、方志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伦明所撰提要存一千九百四篇，为《续修提要》撰稿最多者之一。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7”，知伦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

第十一册

鹿辉世/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鹿辉世”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42

著录：

《河防记》起，至《大岳大和山纪略》止，凡一百四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五月一日（二十五年份），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二十二日，七月二十一日，八月三十一日，九月廿八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十四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廿六年）。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地理类河渠之属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鹿辉世所撰提要存九百九十三篇，较此增史部地理、方志，子部儒家、杂家，集部明别集、清别集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知鹿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二册

张伯英/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张伯英”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1

著录：

《弘文馆帖》起，至《寰宇贞石图》止，凡四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十八日，三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五日，八月二十六日，九月三十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二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二月二十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二十二日，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七日，八月二十八日，十月三日，十一月十四日，十二月七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廿六年），二月三日，三月十五日，四月二十六日，五月廿六日，六月廿六日，九月廿七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子部艺术类书画、法帖之属等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张伯英所撰提要存五百二十七篇，较此交稿记录增多。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9”，知张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三册

张海若（张国溶字海若）/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张国溶”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3

著录：

《康熙湖广总志》起，至《康熙竹溪县志》止，凡二百三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九月十日（二十四年份），十月十七日，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月十九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一月二十九日，二月二十七日，四月四日，四月三十日，六月五日，七月廿九日，八月三十一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湖北省方志。封面“张国溶字海若”六字旁题。检《续修提要》原稿，张海若所撰提要存二百三十三篇，与此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8”，知张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第十四册

张寿林/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张寿林”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2

著录：

《广德州志》起，至《灵宝玉鉴目录》止，凡五百八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十二月廿六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廿九日；

[二十四年]二月一日（二十四年二月份），三月九日，六月三日，十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二十五年份），五月十二日，五月十八日，七月十五日，八月二十一日，八月二十五日，九月九日，九月二十二日，十月十二日，十一月二日，十一月十七日；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一月廿五日（二十六年份），二月六日，三月十七日，四月一日，五月一日，六月八日，七月六日，六月八日，八月七日，八月二十八日。

格按，本册所录以陕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等省方志为主，又有部分经部诗类条目。检《续修提要》原稿，张寿林所撰提要存一千六百五十八篇，较此增经部各类，史部传记、地理，子部儒家、杂

家、道家、类书，集部清别集、小说、诗评等类著述，为《续修提要》撰稿最多者之一。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8”，知张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五册

冯汝玠/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冯汝玠”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2

著录：

《铁云藏龟》起，至《淮阴金石仅存录》止，凡三百三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一月三十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廿五日，三月廿五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二十八日，九月二十五日，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五年]一月十六日（廿五年），二月十八日，三月十八日，四月十七日，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六日，七月十七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六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六日（二十六年份），二月十八日，三月十六日，四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六月十六日，七月十五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十六日；

[二十七年]一月十五日（廿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六日，三月十六日，四月十五日，五月十六日，六月廿一日，七月十四日，八月十三日，九月十三日，十月十三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经部小学、史部金石、目录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冯汝玠所撰提要存六百九十篇，类目相同，数量较此增加。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7.10”，知冯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六册

编纂者 冯承钧/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冯承钧”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交广印度两道考》起，至《亚欧两洲沿岸海道纪要》止，凡三百七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八月份（二十三年八月份），九月份（二十三年九月份），十月四日，十月十二日，十月二十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一月十三日，十一月二十日，十一月廿六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廿六日；

[二十四年]一月七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十四日，一月份（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廿二日，一月廿八日，二月十一日（二十四年二月份），二月廿五日，三月五日，三月十三日，三月十九日，三月二十八日，四月四日（二十四年四月份），四月十日，四月十六日，四月二十三日，四月三十日，五月八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一日，五月二十九日，六月十三日，八月六日，八月十二日，九月三日，十月三日，十一月四日，十二月三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廿五年），二月四日，三月三日，四月八日，五月一日，六月一日，七月二日，八月十一日，九月七日，十月三日，十月二十九日，十二月二日。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纪事本末、外国史、传记、地理，子部杂家、医家、天文算法等类及“欧美人撰译”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冯承钧所撰提要存三百七十四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 12，知冯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

第三函十六册（东洋文库编号：研一③）

第一册

编著者 冯家升/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冯家升”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0

著录：

《吉林通志》起，至《黑龙江通志纲要》止，凡十九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四年一月份）。

格按，本册所录为吉林、黑龙江两省方志。检《续修提要》原稿，冯家升所撰提要存十九篇，与此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1”，知冯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

第二册

傅振伦 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傅振伦”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5

著录：

《嘉靖新河县志》起，至《乾隆定兴县志》止，凡六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二十三年份），十一月十三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二十四年二月份），三月十八日（二十四年三月份）。

格按，本册所录为河北省方志。检《续修提要》原稿，傅振伦所撰提要存一百四十九篇，方志以外，较此增史部传记、史钞，子部释家，集部词曲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3”，知傅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三册

杨遇夫/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杨树达”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3

著录：

《国文法草创》起，至《后汉书知意》止，凡一百九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一月五日（廿三年），十二月一日（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月廿六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四年一月份），四月四日，四月廿七日，六月十日，六月廿七日，七月十八日，八月八日，八月二十四日，九月十日；

[二十五年]三月廿五日（廿五年），八月廿八日。

格按，本册所录为经部小学、史部正史（《汉书》）、集部清别集（湘人）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杨树达所撰提要存一百九十五篇，与此悉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8”，知杨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八月。

第四册

杨钟羲/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杨钟羲”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

著录：

《公羊春秋经传通义》起，至《史记探源》止，凡六百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年]七月廿七日（二十年七月份），八月十九日，九月廿一日，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年十二月份）；

[二十一年]一月十八日（廿一年一月份），二月十九日（二十一年二月份），三月廿日，四月十六日，四月十九日，五月廿七日，六月廿日（廿一年六月份），七月廿一日（廿一年七月份），八月廿二日（廿一年八月份），九月十六日（廿一年九月份），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廿二日（二十一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七日（廿一年十二月份）；

[二十二年]一月廿日（廿二年一月份），二月廿二日（廿二年二月份），三月廿日，四月廿日（二十二年四月份），五月份，七月十九日（廿二年七月份），八月二十日，九月二十日（廿二年九月份），十月十七日（二十二年十月份），十一月十五日，十二月二十日（二十二年十二月份）；

[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三年一月份），二月廿日（二十三年二月份），三月十六日，五月十五日（二十三年五月份），六月份，廿三年七月份，廿三年八月份，廿三年九月份，十月廿日，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廿四日；

[二十四年]一月十九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廿五日，四月一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经部春秋、小学，史部编年、纪事本末、传记、史评等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杨钟羲所撰提要存六百十四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4.3”，知杨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四年三月。

第五册

叶启勳/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叶启勳”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8

著录：

《自堂存稿》起，至《四书人物广义》止，约三百六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七月份（二十三年七月份），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二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月十六日，十月廿六日，十一月五日，十一月十七日（二十二年十一月份），十一月廿九日，十二月十三日，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十二月廿九日；

[二十四年]一月四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十日，一月十八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一月廿六日，二月十一日（二十四年二月份），二月十二日，二月十八日，三月一日，三月八日，三月十四日，三月十九日，三月廿五日，三月三十日，四月二日，四月五日，四月十一日，四月十五日，四月二十日，四月三十日，五月六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二日（二十六年份），一月廿九日，二月二十二日，三月十五日。

格按，本册所录经、史、资、集各部图书均有。检《续修提要》原稿，叶启勳所撰提要存三百五十九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知叶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一月。

第六册

董康/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董康”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7

著录：

《袁礼部诗》起，至《林东城文集》止，约五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二月十七日（二十五年份）。

格按，此册所录均为明别集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董康所撰提要存四十九篇，与此相合。所撰提要，版本皆题“吴兴刘氏嘉业堂藏明□□刻本”。董氏曾为嘉业堂撰明集部分藏书志，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以上提要，疑即据《嘉业堂藏书志》明集稿改撰而成。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2”，知董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二月。

第七册

赵斐云/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赵万里”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7

著录：

《唐韵佚文》起，至《担当遗诗》止，约三百五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月八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一月七日（廿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一日，十二月廿六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三月一日，三月三十日，五月七日，六月八日，七月一日，八月七日，九月三日，十月七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二月三日，三月六日，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九日，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七日，九月二十三日，十月二十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八日（二十六年份），二月二十三日，三月二十二日，四月二十一日。

格按，此册所录以集部明别集为主，又经史杂著数十种。检《续修提要》原稿，赵万里所撰提要存三百四十九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4”，知赵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

第八册

赵录绰（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赵录绰”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全册空白无记录。

格按，此册交稿记录空白，原因未详。检《续修提要》原稿，赵录绰所撰提要存一千一百六十八篇，多为史部传记、目录，子部儒家、杂家及集部清别集等类著述，属参与《续修提要》编纂撰稿数量较多者之一，其交稿时间当稍晚。

第九册

编纂者 刘节/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刘节”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3

著录：

《金石编补略》起，至《中舟藏墨录》止，约一百九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六月三日（二十四年份），七月八日，十一月四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一月廿日，五月廿一日，七月十六日，九月八日，十月八日，十二月廿九日；

[二十六年]二月二日（廿六年），四月十四日。

格按，本册所录主要为经部小学、史部金石类著作。检《续修提要》原稿，刘节所撰提要存二百十四篇，类目相同，数量较增。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4”，知刘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

第十册

编纂者 谢国桢/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谢国桢（一）”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

19

著录：

《罪惟录》起，至《瑞阳阿集》止（未完，接下册）。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一月廿一日（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十二月十三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份（二十四年二月份），四月四日（二十四年四月份），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年四月份），四月廿四日，四月三十日，五月十六日，五月二十七日，五月三十日，七月十六日，七月二十四日，十月一日，十一月六日，十二月三日，十二月廿七日；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日（二十五年份），三月五日，四月四日，四月二十七日，七月二日，七月廿九日，九月二日，九月八日，

第十一册

编纂者 谢国桢/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谢国桢（二）”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

19

著录：

（接上册）《梦庵杂著七种》起，至《钝吟集》止，两册合计共一千三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五年]九月八日（二十五年份），九月廿八日，十月廿九日，十一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年]一月十五日，二月二日，四月十二日，六月六日。

格按，以上两册所录多为史部杂史、子部丛书类著作，其中晚明史籍称“特撰书目”。检《续修提要》原稿，谢国楨所撰提要存二千一百五十七篇，较此增史部编年、别史、外国史、传记、地理、政书、目录，集部明别集、清别集等类著述，为参与《续修提要》编纂撰稿数量最多者之一。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6”，知谢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六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二册

谢兴尧/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谢兴尧”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9

著录：

《全辽志》起，至《太平军目》止，凡一百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日（二十四年份）；

[二十五年]一月卅一日（二十五年份），二月廿七日，五月九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廿八日，十一月十七日，十二月二十六日；

[二十六年]一月廿八日，三月一日，四月二十七日，六月，九月十四日，十月十三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与太平天国相关书籍，又辽宁省、热河两省方志十余种。检《续修提要》原稿，谢兴尧所撰提要稿存八百三十五篇，较此增史部别史、杂史、传记、政书、地理，子部天文算法、术数、杂家，集部明别集、清别集等类著述。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0”，知谢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三册

瞿仙槎（瞿汉字仙槎）/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瞿汉”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34

著录：

《长沙县志》起，至《新化建火神庙记》止，凡二百十种。

收稿日期：

[二十四年]八月二日（二十四年份），九月三日，十月七日，十一月五日，十二月五日；

[二十五年]一月七日（二十五年份），一月二十二日，三月九日，四月九日，六月八日，七月四日，七月十六日，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七日，九月十八日，十月二十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三十日，十二月十七日；

[二十六年]一月四日，一月三十日，二月六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湖南省方志及地志类书。“瞿汉字仙槎”五字旁题。检《续修提要》原稿，瞿汉所撰提要稿存八十八篇，均湖南省方志。溢出之书，有待复核。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2”，知瞿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二月。

第十四册

瞿宣颖 提要目录/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瞿宣颖”题名。封底白纸签脱落。

著录：

全册空白无记录。

格按，此册交稿记录空白，原因未详。检《续修提要》原稿，瞿宣颖所撰提要存三十九篇，均为集部诗评类著述，交稿时期应稍晚。

第十五册

谭其骧/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谭其骧”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18

著录：

《康熙济南府志》起，至《路桥志略》止，凡三百八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二十三年十月份），十二月十八日；

[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二十四年份），八月十三日，八月二十九日，九月十一日，十月二日，十月十九日，十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廿日，十二月二日；

[二十五年]一月四日（二十五年份），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八日，八月九日，九月二十九日，十一月二日，十二月五日，十二月廿八日；

[二十六年]一月廿九日（二十六年份），四月五日，五月十日，六月十四日，十月六日。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山东、河北两省方志，末有江南县志、乡志数种。检《续修提要》原稿，谭其骧所撰提要稿存八百四十二篇，均为史部地理、方志类著述，数量较此增加。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6.10”，知谭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六年十月，增撰提要交稿尚在其后。

第十六册

萧仲珪 编纂者/研究所

书根及书背以黑色铅字钤印“萧璋”题名。封底白纸签题编号：2

著录：

《潞城县志》起，至《大宁县志》止，凡二百四十余种。

收稿日期：

[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二十四年]三月廿八日（廿四年三月份），二月廿八日，四月二十七日，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七日，七月二十五日，八月三十一日，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二十日；

[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二十五年份），二月二十四日，三月二十八日，七月二十七日。

格按，本册所录均山西方志。封面题名“萧仲珪”铅笔旁注“萧璋”二字。检《续修提要》原稿，萧璋所撰提要稿存二百六十九篇，与此相合。封面左上红签铅笔旁注年月“25.7”，知萧氏此册交稿截止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

三、“交稿记录”所见《续修提要》编纂史料

《续修提要》未竟全功，编纂凡例未见流传，东洋文库所藏《编纂资料》之发现，为研究《续修提要》编纂及组织活动提供诸多线索。兹据上“交稿记录”中所见，归纳一二。

一、以上“交稿记录”48册，内钞写者凡614叶，计共著录《续修提要》稿13000余篇，较现存《续修提要》原稿总数（34000余篇）不足二分之一。篇目数量不足，一因东洋文库所藏“交稿记录”收藏不全（各册封底粘贴白纸签所题编号，“余绍宋”册已标为“49”号可证），二因交稿记录止于《续修提要》中期（1938年），后期完成之稿尚未录入，故有已知撰稿人数及撰稿数量著录未全之现象。

一、“交稿记录”著录《续修提要》撰稿人凡45人：王式通、王孝鱼、王重民、江瀚、向觉民（达）、沈兆奎、吴廷燮、吴寄荃（燕绍）、吴承仕、何小葛、何澄一、余绍宋、尚秉和、周叔迦、柯劭忞、胡玉缙、高润生、班书阁、夏仁虎、夏孙桐、孙海波、孙师郑（雄）、孙楷第、孙曜、伦明、鹿辉世、张伯英、张海若（国溶）、张寿林、冯汝玠、冯承钧、冯家升、傅振纶（伦）、杨遇夫（树达）、杨钟羲、叶启勳、董康、赵斐云（万里）、赵录绰、刘节、谢国桢、谢兴尧、瞿仙槎（汉）、瞿宣颖、谭其骧、萧仲珪（璋），均见于《续修提要》编纂人员名录，占已知编纂人员总数（71人）之半数以上。

一、“交稿记录”中之董康、冯家升、冯汝玠、高润生、何澄一、何小葛、胡玉缙、江瀚、柯劭忞、刘节、尚秉和、孙楷第、孙雄、王式通、王重民、吴承仕、向达、萧璋、谢国桢、杨钟羲、余绍宋、张国溶、周叔迦23人，未见于以下“书目记录”。此外，王孝鱼、瞿宣颖虽已于“交稿记录”中立册而无交稿记录（两人均有提要稿留存），可知两人交稿时期较晚。

一、“交稿记录”各册封面所记人名，有记字号而旁注本名者，如“瞿仙槎”下注“瞿汉字仙槎”、“张海若”旁注“张国溶字海若”、“孙师郑”旁注“孙雄”等；亦有未经注出者，如“向觉民”、“赵斐云”、“杨遇夫”等；又有撰人名字异写者，如“傅振伦”作“傅振纶”等。

一、“交稿记录”中“收稿日期”栏所记“□□年□月□日”，系指撰稿人交稿日期；“附注”栏所记“□□年□月份”，则指该批提要稿属于撰稿人某月之功课，盖研究所方面邀请各撰稿人参与提要撰写之初，有每月提交成稿若干篇并按收到稿给酬之约定，故某月日所交提要稿，大多即作为撰者当月之功课，亦有前月未交稿而本月补交、及本月交稿量多而移作下月课者之例。又“收稿日期”及“附注”两栏所记日期，为便检阅，除当行之下，又重复书于各跨叶之首行，故册中所见年月日相同者颇多。

一、“交稿记录”不仅真实记录各撰稿人参与《续修提要》撰稿之起迄年月，可供复核《续修提要》各稿之撰写人及时间，又具体反映《续修提要》前期至中期之编纂进程，故不惮琐屑，详加彙录。据“交稿记录”所载，各撰稿人之交稿始于民国二十年（1931），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左右，已完成《续修提要》二分之一弱初稿，其中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前后为交稿旺期。

一、《续修提要》编纂之初，有仿《四库提要》分别“著录”及“存目”之考虑，故“附注”栏中间或录有“著录”、“存目”等字，但全体而观，尚未一律。

一、“交稿记录”系据撰稿人交稿时清单钞录，因各书已经撰稿人目验，故所著录书名、著者及版本较“书目记录”加详。研究所方面检点《续修提要》成稿，曾据此记录与提要原稿及“书目记录”反复校核，并于眉端（或册内所存夹签）留有校记，兹胪举一二：

（一）说明书目重复情况

第一函第四册（江瀚）“《安甫遗学》三卷”条眉批：“重，删。柯撰入易类。”

格按,《续修提要》此书收有江瀚、徐世昌、柯劭忞所撰三稿,入“经部/群经总义类”,故所谓“删重”,亦仅提示其书已撰有提要稿而已。

(二) 说明书目分配情况

第一函第四册(江瀚)“《四书纂言》四十卷”条眉批:“《四书》类为孙人和包办,凡加△记号,即与孙重。”

第二函第十册(伦明)“四书类”眉批:“《四书》类系孙人和包办,加△记号者即与孙重。”

格按,检《续修提要》原稿,以上标注“△”诸书,现存提要稿均为江瀚等所撰,可知孙人和虽曾包办“四书类”提要,一旦他人已经撰稿,研究所方面仍予调整,故未多重复。

(三) 说明原稿缺存情况

第一函第十五册(柯劭忞)“王石曜念孙《说文段注签记》清本一卷(双剑谿于氏藏本)、桂未谷《说文段注抄案》手稿二卷(双剑谿于氏藏本)、王棗友筠、张石舟穆手订《说文答问疏证》六卷(稷香馆吴氏藏本)、朱允倩骏声《说文段注拈误》手稿一卷(纯嘏堂朱氏家藏本)”四种眉批:“原稿未到。”

格按,查《续修提要》原稿,以上四种稿钞本未见撰有提要。

四、关于《续修提要》“书目记录”

《续修提要》“书目记录”三函四十册,封面左上、右下方各粘长方红色纸签一(白纸衬边),上签内书撰者姓名及“书目”各一行;下签空白,全体一例。书根、书背分别有墨书撰者姓名(内“孙海波/第二册”、“赵录绰/第二册”、“刘启瑞/第二册”、“罗福颐”四册为红色铅字钤印)。各册自次叶始书写,每叶以铅笔画为五栏,栏目分题如下:

(一) “某部、类”,如:“史部奏议类”

(二) “书名”，如：“《怡贤亲王疏抄》一卷”

(三) “版本”，如：“道光三年刊本”

(四) “撰人”，如：“清怡贤亲王允祥撰”

(五) “备考”，如：“二十五年三月到”

又各行上方栏外钤有“已撰”朱文长方小印、或以铅字补写“已撰”二字。

第一函十三册（书目一①）

第一册

沈兆奎先生 书目（封面左上红签内题，封面右下红签空白，以下同，从省）

著录：

《怡贤亲王疏抄》起，至《退思粗订稿》止，约二百六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72）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史部奏议、别史、杂史、传记、政书、史评及集部别集等类著作，大半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沈兆奎所撰提要一百七十八篇，类目及数量与此相合。

第二册

吴向之先生 书目

著录：

《大唐六典考订》起，至《龙沙鳞爪》止，约七百三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54）

格按，吴廷燮字向之。本册所录为史部正史、职官、政书、诏令奏议等类著作。《续修提要》载吴廷燮所撰提要八百五十三篇，数量较此增加。

第三册

吴燕绍先生 书目

著录：

《异域竹枝词》起，至《游历巴西经》止，约四百五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05）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地理、杂史、方志及子部释家等类著作。《续修提要》载吴燕绍所撰提要四百二十篇，数量较此增加。

第四册

余宝龄先生 书目

著录：

《周易蠡测》起，至《荣遇堂日记》止，约三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52）

格按，本册所录为经部各类，史部传记、地理，子部儒家、兵家、医家、农家，集部别集等类著作，多未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余宝龄所撰提要七十一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五册

柯燕舲（昌泗）先生 书目

著录：

《历代疆域表》起，至《邶中记》止，约一百四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37）

格按，本册所录均史部地理类著作。仅一二条（《括地志》八卷、《水经释地》八本）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柯昌泗所撰提要四十七篇，多为子部杂家、释家、道家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与此不同，似后经调整者。

第六册

茅乃文先生 书目

著录：

《嵯政全书》起，至《红鹅馆诗钞》止，约五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84）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政书、舆图类著作，半数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茅乃文所撰提要二百九十篇，均为史部地理类著述，类目及数量与此不同，可知《续修提要》撰稿人遴选之变动。

第七册

高观如先生 书目

著录：

《释迦如来嘎应化事迹》起，《五灯会元补遗》止，红格稿本七叶，约一百六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44）；又《四十二章经注》起，至《续一切经音义》止，十行绿格“观庐丛记”稿本八叶，约一百六十种。

格按，本册所录均为释家类书目。绿格本书目卷首铅笔记有“高观如”、“已撰”字，原拟誊至红格本（已钞《四十二章经注》、《御注圆觉经》两种而止）。《续修提要》载高观如所撰提要二十二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八册

班书阁先生 书目（第一本）

著录：

《三州游记》起，至《完白山人篆刻偶存》止，约一千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29）

格按，班书阁“书目第二本”未见。此日内订有油印书目《史钞目录》四叶（收书约四十种）、《史部史评类拟纂提要目录》四叶（收书约五十种）、《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未撰提要目录》六叶有半（收书约一百六十种）等，书目均经修订增补。本册所录以史部地理类（游记之属）、方志（河南省），集部别集（五代、金元）、总集、诗话等类为主，兼及他部类书。《续修提要》载班书阁所撰提要一千四百四十六篇，类目及数量均较此增加。

第九册

夏仁虎先生 书目

著录：

《天下山河两戒考拾》起，至《两京赋》止，约五百四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61）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地理类（山川、河渠、寺观、山水、游记、方志之属）著作，半数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夏仁虎所撰提要六百十篇，多为史部传记、地理类著述及江苏、浙江两省方志，类目及数量较此增加。

第十册

夏孙桐先生 书目

著录：

《惜抱轩诗文集》起，至《毘陵沉氏杂着》止，约四百四十种（末有前笔记阙数：104）

格按，本册所录均集部清别集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夏孙桐所撰提要七百五十八篇，多为子部医家类及清别集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增加。

第十一册

孙海波先生 书目

著录：

《汉魏石经残字叙录》起，至《南海李氏寶召斋吉金目录》止，约一千一百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67）

格按，本册所录多为经部小学、史部金石、子部杂家等类著作，三分之二钤有“已撰”印。

第十二册

孙海波先生 书目

著录：

《三代秦汉金文拓本》起，至《中国地理教科书》止，约二百六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共 568）

格按，书根以红色铅字钤印“孙海波/第二册”。本册所录为经史各类著作，仅六十余种钤有“已撰”印。以上两册书目合计约一千三百余种，《续修提要》载孙氏所撰提要九百余种，多为经部易类、四书，史部传记、金石，子部儒家、杂家，集部清别集、诗评等类著作，类目及数量与此相合。

第十三册

孙光圻先生 书目

著录：

《帝王世纪续补》起，至《顾氏义田事略》止，约八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66）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杂史、政书、职官等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孙光圻所撰提要五百六十五篇，类目及数量与此相合。

第二函十三册（书目一②）

第一册

孙人和先生 书目

著录：

《古今韵书》起，至《庄子内篇注》止，凡五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9）

格按，本册所录多经部小学、子部道家类著作，半数钤有“已撰”印（道家类悉数完成）。《续修提要》载孙人和所撰提要九百九十二篇，多为经部小学，子部杂家、道家，集部词曲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均较此增加。

第二册

孙曜先生 书目

著录：

《月令粹编》、《图说》起，至《夏小正注》止，约二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69）

格按，本册所录多史部时令、地理类著作，时令类（近五十种）钤有“已撰”印，地理类多未撰。《续修提要》载孙曜所撰提要六十一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三册

伦明先生 书目

著录：

《古文尚书辨》起，至《韩魏公言行录》止，凡一千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435）

格按，书根题“伦明一”，“书目第二册”未见。此册所录为经部各类及史部传记类著作，半数以上钤有“已撰”印（传记类均已完成，经部未完成）。《续修提要》载伦明所撰提要一千九百四篇，类目及数量均较此增加。

第四册

许道龄先生 书目

著录：

《关中陵墓志》起，至《滇黔湘鄂皖豫行程记》止，约二百四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07）

格按，书根姓名黑色铅字钤印。所录为史部地理（古迹、杂记、边防之属）及子部类书等类著作，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许道龄所撰提要一百十七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五册

鹿辉世先生 书目

著录：

《浚河事例》起，至《湖录经济考》止，约八百六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53）

格按，本册所录多史部地理类（河渠、水利、山林、古迹、杂记之属）及集部明、清别集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

第六册

（王孝鱼先生）鹿辉世先生 书目

著录：

《孔子家语宪》起，至《丹铅新录》止，约五百种（末有铅笔记阙数：62）

格按，封面题名“王孝鱼先生”已经墨笔钩乙，并添写“鹿辉世先生”。本册所录均为子部儒家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鹿辉世所撰提要九百九十三篇，类目及数量与此相合。

第七册

黄之六（寿祺）先生 书目

著录：

《京氏易》起，至《丧礼或问》止，约三百四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20）

格按，封面题名“寿祺”二字墨笔添写。本册所录均经部易类、礼类著作，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黄寿祺所撰提要一百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八册

张伯英先生 书目（第一本）

著录：

《东书堂》起，至《俞紫芝兰亭诗》止，凡二百五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0）

格按，张伯英“书目第二本”未见。本册所录为子部艺术类（法帖之属）、集部总集类著作。《续修提要》载张伯英所撰提要五百二十七篇，数量较此增加。

第九册

张寿林先生 书目

著录：

《赤山湖志》起，《柏岩感旧诗话》止，约六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80）

格按，本册所录为经部春秋、史部地理（山川之属）、云南省方志、集部楚辞等类著作。“春秋类”书目系据油印稿（十一叶约二百四十种）增补，增补者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张寿林所撰提要一千六百五十八篇，较此增经部各类，史部传记、地理等类，陕西、福建、贵州、安徽等省方志，又子部儒家、杂家、道家、类书，集部清别集、小说、诗评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均较此增加。

第十册

陆会因先生 书目

著录：

《易道入门》起，至《国朝闺阁诗钞》止，约四百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08）

格按，本册所录均集部清别集（闺秀之属）著作，多未钤“已撰”印。《续修提要》载陆会因所撰提要一百六十八篇，清别集以外兼及他部，类目及数量较此增加。

第十一册

陈壬孙先生 书目

著录：

《历代名臣奏议》起，至《撷芙蓉亭集》止，约八百五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415）

格按，陈铤字壬孙。本册所录为史部诏令奏议、集部别集（自唐至清）等类著作，近半数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陈铤所撰提要八百四十三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十二册

冯承钧先生 书目（第二册）

著录：

《汉西域图考》起，至《海录》止，凡八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6）

格按，本册所录均史部地理类（边疆、外国地理之属）著作，大多已完成并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冯承钧所撰提要三百七十四篇，含史部纪事本末、外国史、传记，子部杂家、医家、天文算法等类及“欧美人撰译”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增加。

第十三册

傅振伦先生 书目

著录：

《史汉合编》起，至《敦煌写本老少互嘲词》止，凡一百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史钞类及敦煌遗书等，均已完成并钤有“已撰”印（仅缺《两晋南北史合纂》一种）。《续修提要》载傅振伦所撰提要一百四十九篇，含河北省方志及史部传记、子部释家、集部词曲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增加。

第三函十四册（书目一③）

第一册

傅惜华先生 书目

著录：

《盛明杂剧》起，至《醉茶志怪》止，凡六百余种（卷末铅笔记阙数：298）

格按，本册所录均为集部词曲、子部小说家类著作，所录半数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傅惜华所撰提要四百八十二篇，数量较此增加。

第二册

叶启勳先生 书目

著录：

《周易发例》起，至《四书人物广义》止，凡一百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

格按，本册所录均经部各类著作，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叶启勳所撰提要三百五十九篇，兼及四部著述，类目及数量均较此增加。

第三册

赵万里先生 书目

著录：

《陈翼叔诗集》起，《王侍郎遗书》止，仅十四种（末有铅笔记阙数：5）

格按，本册所录均为明别集，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赵万里撰明别集提要三百四十九篇，数量较此增加。

第四册

赵录焯先生 书目（第二册）

著录：

《费邑艺文志》起，《注坡词》止，凡八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2）

格按，赵录绰“书目第一册”未见。书根姓名以红色铅字钤印。所录为史部政书、子部儒家等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赵氏所撰提要一千一百六十八篇，含史部政书、传记、目录，子部儒家、杂家及集部清别集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均有增加。

第五册

刘泽民先生 书目

著录：

《河图纬》起，至《群书备考》止，凡五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6）

格按，本册所录为春秋纬书及佛寺志等书，多钤有“已撰”印。书根题“刘白村”。《续修提要》载刘白村所撰提要九百四篇，含经部春秋，史部地理、目录，子部释家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均增加。

第六册

刘启瑞先生 书目

著录：

《宝应人物志》起，至《少游草》止，凡一千一百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69）

格按，本册所录以集部别集、总集类著作为主。书目有写稿、打字油印稿，油印稿题“拟选集部总集类提要送审目”，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刘启瑞所撰提要一千三百五十九篇，集部以外尚有他部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均有增加。

第七册

刘启瑞先生 书目（第二本）

著录：

《赐书楼集》起，至《乐府遗音》止，凡一百四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67）

格按，本册所录为集部宋、明别集类等书，多未钤“已撰”印。首叶《勿轩易学启蒙图传通义》行眉端题“以下八千卷楼宋元明刊善本书目”，似从丁氏书目录出待查者。

第八册

谢兴尧先生 书目（一）

著录：

《李秀成供词》起，至《周莲峰文集》止，凡一千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958）

格按，本册所录为经部各类（川人所著）及史部杂史类著作，史部书多钤有“已撰”印，经部则多空阙，似谢氏初有意认撰川人经部著作，后未实现。

第九册

谢兴尧先生 书目（二）

著录：

《竺山诗文集》起，至《艾子杂说》止，约四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171）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杂史、集部清别集类著作，史部著作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谢兴尧所撰提要稿八百三十五篇，类目及数量较此均有增加。

第十册

韩承铎先生 书目

著录：

《续富国策农书》起，至《敝帚集》止，约七百二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341）

格按，本册所录为子部农家、集部清别集等类著作，半数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韩承铎所撰提要六百五十三篇，含史部杂史、政书，子部兵家、谱录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均有增加。

第十一册

瞿汉先生 书目（第二册）

著录：

《南岳总胜集》起，至《新化建火神庙记》止，凡一百二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4）

格按，瞿汉“书目第一册”未见。本册所录均湖南方志及地理类著作，大多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瞿氏所撰提要稿八十八篇，类目与数量与此相合。

第十二册

瞿兑之先生 书目

著录：

《谈艺录》起，至《试律丛话》止，约五百八十种（末有铅笔记阙数：498）

格按，本册所录为集部诗文评等类著作，多未钤“已撰”印。《续修提要》载瞿氏所撰提要三十九篇，存稿数量较此为少，待核。

第十三册

谭其骧先生 书目

著录：

《安南志略》起，至《天山博岳冰峰五日游歌》止，凡四百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292）

格按，本册所录为外纪及游记等类著作，多未钤“已撰”印。《续修提要》载谭氏所撰提要稿八百四十二篇，均为史部地理、方志类著述，较此类目不同，数量增加。

第十四册

罗福颐先生 书目

著录：

《淳化阁帖跋》起，至《六练九练法》止，凡一百四十余种（末有铅笔记阙数：45）

格按，本册所录为史部金石、子部谱录等类著作，大部钤有“已撰”印。《续修提要》载罗福颐所撰提要一百六十一篇，含子部杂家、术数、艺术、谱录等类著述，类目及数量较此均有增加。

五、“书目记录”所见《续修提要》编纂史料

“书目记录”之成型应早于“交稿记录”，反映《续修提要》编纂之初书目整理情况，同时涉及撰稿人员之遴选及分工。兹据浏览所得，略述“书目记录”中所含编纂史料。

一、“书目记录”著录班书阁、陈壬孙（楸）、冯承钧、傅惜华、傅振伦、高观如、韩承铎、黄之六（寿祺）、瞿兑之（宣颖）、瞿汉、柯燕舛（昌泗）、刘启瑞、刘泽民、陆会因、鹿辉世、伦明、罗福颐、茅乃文、沈兆奎、孙光圻、孙海波、孙人和、孙曜、谭其骧、吴向之（廷燮）、吴燕绍、夏仁虎、夏孙桐、谢兴尧、许道龄、叶启勳、余宝龄、张伯英、张寿林、赵录绰、赵万里等36位撰稿人及其所承担撰写之基本书目19000余种。

一、以上撰稿人中，陈楸、傅惜华、高观如、韩承铎、黄寿祺、柯昌泗、刘启瑞、刘泽民、陆会因、罗福颐、茅乃文、孙光圻、孙人和、许道龄、余宝龄等15位，虽参与《续修提要》撰写并稿存至今，然前述“交稿记录”中未见其人。以其他既见于“书目记录”、又见于“交稿记录”者例推，研究所方面应曾为上述诸撰稿人立有“交稿记录”册。

一、“书目记录”大多以墨笔书写，其中又订有部分油印稿。如“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中《史钞目录》四叶、《史部史评类拟纂提要目录》四叶、《子部艺术类篆刻之属未撰提要目录》六叶有半，“张寿林”册

（第二函/第九册）中《春秋类》油印书目十一叶，“刘启瑞”册（第三函/第六册）中《拟选集部总集类提要送审目》油印书目八叶等。此类油印稿均半叶十二行，四周单栏，黑色油墨印刷（国内辽宁省图书馆、博物馆也有收藏），为《续修提要》编纂之初所拟书目，“书目记录”即据此修订（如书名项添加副书名、著者项添加批校者姓名等）并增补而成，收书范围逐步扩大，书目品种陆续增加。

一、“书目记录”编成后，依据学术专长选定撰稿人，交付各家实际撰写中又多有调整，此类目录工作，多见于各册眉批及备注项所记，兹略作归纳，以窥《续修提要》编纂体例：

（一）相关著述提要分并举

“沈兆奎”册（第一函/第一册）“《汉书琐言》、《后汉书琐言》、《续汉书琐言》（沈家本撰）”条眉批：“《诸史琐言》已撰过，三书作一提要。”

同册“《文选李善注书目》、《世说注书目》、《三国志注书目》、《续汉书注书目》（沈家本撰）”条眉批：“四书作一提要。”

“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羽庭诗集补遗》、《文集补遗》（元刘仁本）”条眉批：“分作两提要。”

格按，书目收集之初，多多益善，不厌其烦，为大型书目编纂之通例。具体撰写提要，则归并分析，多须调整。沈氏辑书甚勤，类别相近而多为小种，故加归并；刘氏诗、文补遗体例不同，故提要分撰。

（二）复核版本以定去取例

“沈兆奎”册（第一函/第一册）“《删补晋书》（明刊本，明蒋之翘）”条眉批：“原注，已见《四库》存目，如无别本，可不撰提要。”

同册“《历代史论》（通行本，张溥）”条眉批：“原注已见《四库存目》，馆藏是否别本。”

格按，以上两条“备考”栏均注云“本会无别本”，《删补晋书》未钤“已撰”印，《历代史论》则钤有“已撰”印。可知《续修提要》选目标准，凡与《四库提要》著录版本有异者，可予增补。

（三）《四库提要》已收而取消例

“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西湖寻梦录》（清张岱）”、“《入蜀记》（宋陆游）”、“《塞程别纪》（宋余冢）”、“《广州游览小志》（清王士禛）”、“《滇行纪程》（清许纘曾）”、“《安南纪游》（清潘鼎珪）”、“《西征道里记》（宋郑刚中）”、“《五岳游草》（明王士性）”、“《赵宝峰先生文集》（元赵偕）”、“《诗林广记前后集》（元苏正孙）”、“《研北杂录》（元陆友仁）”诸条眉批：“见《四库》。”

格按，《四库提要》已收之书揽入，说明“书目记录”初编较为草率，又因《续修提要》原有增补《四库提要》已收书之设想，而版本、卷数之异，何者当收，何者不收，编纂之初，体例尚未掌握严格。

（四）《四库提要》已收仍著录例

“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著录《四库提要》已收书多种，“备考”栏附注如下：

“《广成集》十七卷（前蜀杜光庭）”条：“《四库》所收为十二卷本。”

“《桐江集》八卷（元方回）”条：“《四库》本惟收《续集》。”

“《仇山村遗集附录》一卷（元仇远）”条：“《四库》惟收《遗集》，未收《附录》。”

“《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元黄潛）”条：“《四库》所收为《黄文献集》十卷本。”

“《梅磴诗话》三卷（元韦居安）”条：“《四库》列入未收。”

格按，据以上版本说明可知，《四库提要》已收之书，如存在内容卷数差异，《续修提要》仍可收录。

（五）相同著述提要互相避让例

“沈兆奎”册（第一函/第一册）“《读史提要录》”条眉批：“已撰。前单已取消。”

同册“《宋中兴百官题名》（《藕香零拾》刻《大典》本）”条眉批：“删。”

同册“《郑众国语章句》、《贾逵国语解诂》、《虞氏国语章句》、《唐氏国语章句》、《孔氏国语章句》（玉函山房本/马国翰辑）”诸条眉批：“已撰有《汉学堂黄氏遗书考》本。”

格按，查《续修提要》原稿，收有孙光圻、徐世章所撰《读史提要录》提要两篇；又收入谢国楨所撰《宋中兴百官题名》（《藕香零拾》刻《大典》本）提要；并载沈兆奎所撰玉函山房本《郑众国语章句》诸书提要。

（六）已初步约稿而退还取消例

“茅乃文”册（第一函/第六册）“《历代沿革图》（清严六制）”眉批：“送稿撰人作马征麟，吴向之已撰，此目取消。”

同册“《职方地图》（明陈绶撰）”条眉批：“谢国楨已撰，撰人作陈祖绶，此目取消。”

同册《奉天舆地总分图》（清裕寿山制）”条眉批：“重复退回。”

同册“《四塞略记赋》”至“《越游纪胜》”凡一百三十二种眉批：“以上各目暂取消。”

格按，据以上批语推测，“书目记录”存在由撰稿人提交之可能。《续修提要》工程浩繁，主持乏人，拟目与撰稿同时进行，故有据已成稿、另聘撰人而随时调整目录之现象。

（七）已收成稿通知撰者止撰例

“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竺国纪游》（清周霭）”条眉批：“谭已撰，函知止撰。”

“孙海波”册（第一函/第十一册）“《称谓录》（清梁章钜）”条眉批：“刘已撰，通知止撰。”

“傅惜华”册（第三函/第一册）“《片玉山房花笺录》（清孙兆澣）”条眉批：“孙已撰，通知止撰。”

格按，“书目记录”眉批中此类“通知止撰”之提示甚伙，足征《续修提要》编纂之前期准备不足，选目主要依赖各撰稿人拟交，一旦发现重复，只得临时通知止撰。现存《续修提要》原稿中一书多稿现象，多因此而产生。

（八）生存人著述不予著录例

“班书阁”册（第一函/第八册）“《西夏纪事》（戴锡章）”条眉批：“生存人不录，原稿退还。”

“孙海波”册（第一函/第十一册）“《棣华馆笔记》（陈斐然撰）”、“《侠龁随笔》（陈诵洛撰）”条眉批：“近人不录。”

格按，查“书目记录”中仍有生存人著作著录之例，如《说文旧音补注》一卷（胡玉缙）、《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柏根氏所藏甲骨文字考释》（美明义士）等稿，均钤有“已撰”印”。

六、结语

《编纂资料》所含《续修提要》编纂史料，可供研索之处尚伙，以上所述，仅属尝鼎一脔，尚待深入。兹承《白云论坛》征稿，不辞浅陋，整理今夏于东京东洋文库阅书笔记如上（部分内容已另刊）。笔者自2005年秋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一年，个人研究计划，即为校阅《续修提要》经部整理稿以付出版。因工作繁重，终日伏案，不敢心有旁骛。早大图书馆藏书美富，近在咫尺，犹未多涉足；东京其他图书馆所在，虽心向往之，亦甚少访问。不意冥冥之中，若有神助，偶承友人介绍参观东洋文库，即于该文库近年新购入而尚未编目公开之书箱内，发现上述《续修提要》编纂史料，复蒙东洋文库主持人厚谊，特允即行整理，提供阅览。文献遇合，已称奇缘，同道多助，益深铭感。至此批本应收藏于北京之珍贵资料，何以流落东瀛，令人偶藉机缘，始克获观异域，披阅抄录间，不禁感慨系之。

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往来函件略考

柳向春

高邮王氏父子为乾嘉小学重镇，所著《高邮王氏四种》为从事训诂、小学研究之必读。其生平亦遂为广大学者所周知，兹不复赘。陈奂字倬云，号硕甫，晚号南园，长洲籍诸生，为清代另一小学大师段玉裁之入室弟子。陈奂其人经术湛深，尤谙于毛诗，为清代著名诗经学家，所著《诗毛氏传疏》三十卷被誉为清代毛诗学集大成之作，历来为众多学者所重视。

现存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往来书函共计十五通，其中陈奂致王引之五通，王念孙致陈奂一通，王引之致陈奂九通。分别见于陈奂《三百堂文集》¹、罗振玉辑《昭代经师手简续辑》²，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³及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⁴。

高邮王氏父子与陈奂相识于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陈奂初次入都之际，二氏相识相知之经过，在陈奂所作《师友渊源记》⁵中记载颇详：

¹ 王大隆辑《乙亥丛编》本。收陈奂致王引之函两通。

² 罗振玉 1918 年刊本。收陈奂致王引之函四通，其中第四通已见陈奂《三百堂文集》（王大隆、赵诒琛辑《乙亥丛编》本，1935 年）。

³ 《高邮王氏遗书》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收王念孙致陈奂函一通。

⁴ 《高邮王氏遗书》本。收王引之致陈奂函九通。

⁵ 上海图书馆藏汪氏郎亭清稿本。

王名念孙，字怀祖，一字石，高邳州人。乾隆乙未进士，直隶巡永定河道，尚书文肃公安国子。公晚年始生先生，四岁即口授《尔雅》。稍长，从学于戴东原先生，故

戴氏有段王两家之学。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奂入都谒先生，先生有疾，从者扶而行，命无揖，且曰：“吾不见客十七年矣¹，段若膺先生歿后，天下遂无读书人矣。”送出及胡同口，曰：“瘡病不能答拜，明日遣儿子引之答拜也。”前辈之接待后进如此。每论著书，必于所托者尊，或其书中经后人改窜，又复后人不能理，则奋志研虑，日定以课程。发前人之未发，味众人之不味，必底于有成而后止。书示《集韵》三则、《毛诗传》三则，端楷数千言，子引之、孙彦和、曾孙恩沛皆有题，为《四代手墨》，装成长卷。余又备载颠末，记不一记，以余门诸弟子，若管庆祺，潘遵祁，弟希甫，子侄观保、贵生，马钊，弟铭，丁士涵，费宝鏐，陈倬，杨岷，李善兰，汪毓沈，随后赞跋，各记渊源，卷长五六丈。庚申四月十三日，苏城陷，此卷遗弃钮家巷潘相国馆中。盖以深造自得者海人也。年八十，奂书联云：“代推小学有达人，天假大儒以长日”，称先生寿。句当意，以为“吾且守藏篋中，而不与世俗富贵寿考作颂祷者同张县矣。”道光七年丁亥，再入都，犹及见先生。属校《管》、《荀》书，间有校语，则载记《杂志》中，前辈之不没人言又如此。撰《广雅疏证》十卷《音》一卷、《读书杂志》十种八十二卷《志馀》二卷，寿八十有九。

¹ 据闵尔昌《王石臞先生年谱》（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民国间刊本，下简称《谱》）“（嘉庆）二十三年戊寅七十五岁”条注：“不见客十七年系依硕甫撰先生《遗文叙》，前十七年先生方在永定河工次，不应谢客。十七年十字疑衍，当是先生罢官后不见客耳。”闵说可从。

此为嘉庆二十三年秋间事，时王念孙 75 岁，王引之 53 岁，陈奂 33 岁。

王氏父子与陈奂一晤之后，即引以为知己，自此往来不绝，交游持续四世，历久弥笃。同治二年（1863），陈奂以 78 岁高龄在上海因病去世。上溯自嘉庆二十三年，二氏之交往已历时 45 年。

陈奂自嘉庆二十三年秋入都，至道光二年（1822）冬南归，在京四年。其间，陈奂与王念孙往来问学无虚日，二氏见必论学，娓娓不倦，乃至引之每“进谒必丁宁曰：老人好论书，论书眠不得也。慎毋久坐。”¹ 关于此四年间二氏之交往，现存文献皆语焉不详，其往来详情，亦不可尽考。唯现存王引之与陈奂函及陈奂回函各一通，可知为此间所作，说详见下文。

又据陈奂《师友渊源记》载，王念孙尝“书示《集韵》三则、《毛诗传》三则，端楷数千言”。《王石臞先生遗文编次序》²亦曰：“既而奂归南，先生每念念不忘，精整端楷写示《毛传》、《集韵》各三则，几千百言，遂装成长卷，尊奉圭臬。”今查《王石臞先生遗文》卷四有《致陈硕甫书》，内容大体与上述二文所述同³，当即为是书。此书原件曾为陈奂精装成卷，至五六丈之长，各家题跋款识琳琅满目，洵足宝藏，惜已毁于咸丰庚申之乱，不复存于天壤间。此函刘盼遂《高邮王氏父子年谱》⁴及舒怀《高邮王氏父子年谱新编》¹

¹ 《师友渊源记》。

² 《三百堂文集》卷上。

³ 卷四《致陈硕甫书》：“垂问《毛诗故训传》，欲为厘正，是所托已尊。屡读大著条示，俱极精审，洵非卤莽者可以从事。亦思兼治丁氏《集韵》，以考古人音读，汉魏后之音转音变，足征用意之劳。余窃以为《集韵》当先治其纰缪处，如许九讹为许元之类，表而出之，则廓清之功已甚伟矣。奉到茧纸二幅，谨书《毛传》、丁《韵》鄙著六条，录呈左右，拜求教正。”

⁴ 下简称刘谱。《高邮王氏遗书》附。

皆系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然据上引《王石臞先生遗文编次序》中陈奂所述“奂归南，先生每念念不忘，精整端楷写示《毛传》、《集韵》各三则……”可知，必为道光二年以后所作，或即作于道光三年陈奂返乡伊始，亦未可知。日本山本正一所作《陈硕甫年谱》则“推测此信为六年春寄出，而据陈先生的《与王伯申书第二》（《文集》卷下²）‘覆悉分韵二十一部’来看，寄信当为此年。”³今考陈奂此函，内曰“新正奉惠书，并赐老伯大人恭纪与宴诗六章，具徵盛事，儒林共庆。书中又覆悉分韵廿一部之理与四家《诗》师传异同之事，备示详慎，敬受教益，感谢感谢。”可知陈奂所云“覆悉分韵二十一部”乃为王引之来函而言，与念孙无关。再考念孙原函，云“又蒙垂问古韵部分，即于段茂堂先生《音均表》十七部中，分出缉叶帖一部，合盍洽狎业乏一部，质栉屑一部，祭泰怪夬队废一部，共为廿一部。月曷末黠辖薛则统于祭泰部，去声之至未霁，入声之术物迄仍是脂微之入也。若冬韵则合于东钟江而不别出。此其崖略也”，仅为大概介绍其分韵之状况，亦并未详细剖明其间分合之缘由。

嘉庆二十四年，王引之《经传释词》刻成⁴。除夕，陈奂即收到王引之所赠之全部十卷，“始知经传中有实义字而为助语者，有虚义字而为数训者，昔人未了，独先生一一详释之”。二十五年正月五日，引之又致书陈奂，订正陈奂“雍种”一则，并以《庄子》、《国语》为例，说明“匏”、“瓠”二字无甚

¹ 下简称舒谱。《高邮王氏父子学术初探》附，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

² 即《三百堂文集》卷下《与王伯申书》辛卯。

³ 该谱“道光五年”条，下简称山本年谱。见《陈奂研究论集》，林庆彰，杨晋龙主编，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出版，2000年。

⁴ 阳海清：《文字音韵训诂知见书目》，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

分别。而回函中，陈奂再将自己两条研究心得录示引之，以求校正¹。陈奂此函，王欣夫先生系年于二十四年，而据函中所言，陈奂已于上年除夕收得《释词》，且又已接至王引之新正五日所作之函，则陈奂此函，必作于二十四年之后无疑。再因《释词》二十四年方得刻成，则此函作于二十五年，或可无疑。山本年谱系赠书事于道光三年，未知何据。然以《释词》刻毕之嘉庆二十四年，方为陈奂居京师之时，引之于此际赠书，当最为合情合理。山本年谱因将赠书之事误系于道光三年，与此相应，则王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一通亦为误系于三年。山本陈述系年缘由为：“按，王大隆注收到此书是己卯年（嘉庆二十四年）。然己卯先生（陈奂）在京师，常出入王家论学，无必要再书牒往来。故推测此事可能发生在先生南归后不久。姑系此年。”²此正可见山本之昧于当日情势，朝夕相处而仍有书函往还者，于古人交游中极为经见，不足以此为疑。

道光三年（1823）三月十三日，王念孙八十寿辰，陈奂“书联云：‘代推小学有达人，天假大儒以长日’，称先生寿。句当意，以为‘吾且守藏篋中，而不与世俗富贵寿考作颂祷者同张县矣。’”³此正可见陈奂与王念孙心意相通，及彼此默契之情。道光五年，王念孙 82 岁，上距其乾隆三十年钦赐举人，正值周甲，恩赐重赴鹿鸣筵宴，并赋纪恩诗六章以志铭感⁴。次年正月，陈

¹ 《三百堂文集》卷下《与王伯申书》己卯（此函当作于嘉庆二十五年，王欣夫先生系于二十四年。误）、《高邮王氏遗文·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一。

² 山本年谱“道光四年”条。

³ 《师友渊源记》。

⁴ 据闵谱，本年王引之有与陈奂函，然不明其具体所指。另据本文之考订，则此年引之并无作书与陈奂。

免即收得引之书函及王念孙所作六章纪恩之诗。此函中，引之详尽申述“分韵廿一部之理与四家《诗》师传异同之事”¹，而陈免之回函则告知“读大著《经传释词》，抽绎微眇，嘉惠良多。乃本《释词》之例读《毛诗故训传例》，寻其词句，依训推类，亦藉得其条贯焉。”²王欣夫先生系此为道光十一年（1831），但据陈免回函有“后学制陈免谨再拜伯申先生阁下：新正奉惠书，并赐老伯大人恭纪与宴诗六章，具征盛事，儒林共庆……”云云，陈免四年七月丧父，而念孙之纪恩诗则作于上年，故此函当为道光六年（1826）所作³。又与此函左近，引之再致书与陈免⁴，书中于陈免之说直陈异议，无丝毫之回护，此亦可见古人交游之不苟：

至“王事敦我”，“敦，厚也”，于经义尚未允协，故郑易之云，“敦，犹投也”。《笺》是而《传》非，似不必曲为之讳。尊说又言，三家诗多用本字，疑以己意读经，不必尽是师传本子不同，如司马迁以训诂字代经之比。案三家诗训诂字皆在注中，如“是艾是”，《韩诗》“艾”作“刈”，云取也。“实命不犹”，《韩诗》“ ”作“实”，云有也之属，是也。未尝取以代经。其正文字异仍是师传本子可知，故其字虽异而声则同，非若司马迁以训诂字代经，义同而声异也。

¹ 《三百堂文集》卷下《与王伯申书》辛卯（此函当作于道光六年，王欣夫先生系于道光十一年，误）。

² 《三百堂文集》卷下《与王伯申书》辛卯。

³ 山本年谱同此。

⁴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二。

此函刘谱、舒谱、山本年谱皆系于道光五年，然其中言“家君重宴鹿鸣，辱承殷倦致贺，感谢靡涯。前稔大兄先生读书杭州山寺，此时已还归不……”，正是接前引陈奂之回函而言，故此函之写作，亦当为距上函不远之道光六年。

九年春，引之致书陈奂¹，述及念孙父子于陈奂“衍字二条”佩服之情，且表明已于《尔雅述闻》内引用。又就陈奂来函中所述《敝笥》、《九罭》二诗《传》中“大鱼”之训提出疑议，以为陈奂据段玉裁之说径去“大”字，乃改《传》以从《笺》，为不可从。该函最后，引之告知即以所著《经义述闻·毛诗》三册寄呈，又托付陈奂与黄丕烈家商借所藏宋本《荀子》，俾仿照刊刻行世。又据此函，可知引之于八年之冬²尝接陈奂手书一通，并曾作回复及附寄家刻《逸周书杂志》二册，之后，又曾托人转寄《经传释词》一部。然九年二月间陈奂再次作覆时，却仍未收得《逸周书杂志》《经传释词》二书及引之函件。关于这一事件之结果，可藉《昭代经师手简续辑》所收陈奂致王引之书第二通获知，此函王大隆先生所辑《三百堂文集》未收，兹录全文如下：

伯申先生经席：昨奉到去年九月望日复书，蒙老伯大人惠教《逸周书杂志》一种，奂拜颂之下，感谢靡已。所转送大著《释词》一部，已交

¹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三通。函中言“拙著《经义述闻》付梓未竟”，可知其当作于即将刻毕之时。十年，《述闻》行世，则此函作于此前不久可知。

² 据下引《昭代经师手简续辑·陈奂致王引之书》第二通，此函所作时间当在九月十五日，此云“去岁之冬”，当为虚指。

黄莞圃先生令孙矣¹。来书因带信人道绕河南，复从浙江舍弟处转寄，是以淹迟半载。所云北宋钱佃《荀子》，去年接信后曾向黄处借录，黄氏所校钱佃本在世德堂本上，免所过校钱本在谢刻本上。其宋（钱）本行款及世德本与谢刻本不同之处，皆未暇细校。今来书，行将《荀子》重刻一部，嘉惠来学，免闻之不胜欣喜，即诣黄家借校，而莞翁令孙适又远出，只好借到重录，觅便寄呈。恐劳注念，先此布闻。二月中旬又有一信，校正《毛传》讹字十则，录呈乞教，幸为指示，翘企祷切。肃此具复，诚请著安，不尽依依。后学陈奂顿上。老世伯大人尊前恭请福安。 谢大校。三月望日谨冲。

细绎此函，可知道光九年三月望日陈奂作书之时，尚未收得上述引之之函（第三通），而此函之目的，在于告知引之，一所寄两种书籍已收讫；二宋本《荀子》暂未借到；三二月中旬曾有一函，内容为“讹字十则”。

陈奂去函引之后不久，陈奂已得见黄氏，将黄丕烈所校《荀子》过录，并以自校一通寄予京师。引之回函赞曰：“尊校《荀子》按语确为精彩，与家君不谋而合者颇多，所谓德不孤也，佩服之至。”²王念孙道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所作《读荀子杂志补遗叙》亦曰：“去年，陈硕甫文学以手录宋钱佃校本异同

¹ 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三通云：“又有拙著《经传释词》一部转送江琴涛先生令孙”，江琴涛，即江声。其孙为陈奂业师江沅。而陈奂此函则云“已交黄莞圃先生令孙矣”，疑有误。

²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五。此函中有“兹先将已刻之二十卷（《经义述闻》）托令侄寄呈左右”之语，然陈奂之从侄陈兆熊已歿于道光六年之冬，或许此时陈奂别有一侄在京亦未可知，疑不能明。山本《年谱》正据此而定此函为道光五年兆熊未歿前所作，然亦嫌武断。又下引陈奂回函中言“膺月八日舍弟归里，接奉手教，并赐到大著《述闻》二十三卷”，亦不明所指。然此函作于道光九年则庶几无疑，据李庆《顾千里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道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千里寄书王引之，答其所询《荀子》版本事”可知，正是根据顾千里所提供之版本线索，王引之乃囑陈奂代为从事钞校。

寄来都，余据以与卢本相校，已加载《荀子杂志》中矣。”¹陈奂之校录成果，曾为其弟子丁士涵汇钞为一卷，今可见于王欣夫先生《蛾术轩篋存善本书录》²甲辰稿卷三“荀子校语一卷”条附录，念孙所采入《杂志》者十二条，已皆见其中。山本年谱以“信中谈到已全部收到先生手校本《荀子》的情况来看，其时间亦是此年”³，将王引之与陈奂书之第三、第五通及陈奂致引之第二通均系于道光五年。刘谱、舒谱系《与陈硕甫书》第三通于道光六年，《与陈硕甫书》第五通于道光七年。然王念孙《读荀子杂志补遗叙》云：“去年，陈硕甫文学以手录《宋钱佃校本异同》寄来都”，则陈奂代校《荀子》并寄校语至京一事，当在道光九年可知⁴。王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三通、《昭代经师手简续辑·陈奂致王引之书》第二通及王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五通内容均紧密相关，其写作时间亦紧紧相连，故其皆作于道光九年间，由此可确知。

《昭代经师手简续辑》计收《陈奂致王引之书》四通，其中前三通未收于王大隆先生所辑《三百堂文集》，第二通已见上文所引。又据函中内容分析，其第一通⁵、第三通当即作于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五通收启之后。全文如下：

¹ 《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三。

² 鲍正鹄，徐鹏标点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³ 山本年谱“道光五年”条。

⁴ 闵谱亦系此于本年。

⁵ 山本年谱亦系此于本年。

谨启者：九月廿日接奉手教，知《荀子》六册业已照入。来谕先将《天文训》¹一篇钞录寄都。奂札询汪姓，从无一音回复，是以即从黄氏校宋本上倩人写出。后适在亲友家遇见汪姓，因约出城，即将《天文训》照原宋本细细对校。其《淮南》全书已钞出三本，据云需明春告葺也。所钞《管子》²，实无妥便，迟迟未寄。邵鱼竹兄服阕来京，须十一月中到苏，可以托寄带呈无误。今以《天文训》二十叶奉达左右，其行款悉依原宋本钩清矣。大著《述闻》末后数卷倘已刻就，乞便赐下，以付装成，细意读之，幸甚幸甚。顺请伯申先生著安。后学制陈奂谨再拜。世伯老大人尊前比请福安。

伯申先生经席：月八日舍弟归里³，接奉手教，赐到大著《述闻》二十三卷，自《易》《书》《诗》至四《礼》四《传》，每说一经，必令人解颐。国朝经学之昌，至此可称全盛矣。《毛诗》三卷与鄙意合者颇多，因窃以自喜，而又得扩闻充识，感惠正不可言喻。《荀子》付梓人否？来教云奂手校之本已可照此重刊，原宋本如未钞写，则以中止为妙，

¹ 案：陈奂曾三校《淮南子》，据《三百堂文集》卷上所收道光四年《影宋钞本淮南鸿烈解跋》、道光十四年《校本淮南子跋》及上图藏道光十年陈奂《淮南鸿烈解跋》（清钞本）可知。函中所言陈奂校录之《淮南子》，当即指此清钞本而言。

² 道光十四年，陈奂作《明刊本管子跋》，中云：“北宋《管子》向藏黄尧翁家，旧阙自十三卷之十九卷，影钞补足。尧翁歿，其书尽归汪君闾源家。己丑九月，王怀祖先生属钞，乃向汪氏借录。奂对勘之余，作《辨误》一卷，与《杂志》复者削之，得六十余则，因自过录于明刻刘积本。明刻差误极多，乃知宋本之足贵。”可证此函所作时间。又可参江澄波《古刻名钞经眼录》所录陈奂《管子》跋：“此北宋本《管子》，旧藏黄主政尧圃家，今为王大司空伯申向汪君闾源借录嘱校。因自校一过，又作考证一卷。时道光九年九月朔长洲陈奂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122—124页）

³ 王引之《与陈硕甫书》第五通言“先将已刻之二十卷托令侄寄呈左右”，而此处则又言“舍弟”，山本年谱以为当指陈奂从侄陈兆熊而言，然兆熊已于道光六年歿于京师，故将此函系于道光五年。然据函末陈奂署“后学制陈奂”，而陈奂之父丧于道光四年七月，此时已出二十七月丧期。母丧于道光七年九月，时间与此吻合，故此函所述“舍弟”，当系别指，非如山本所认为之“舍侄”之误。

奈奉谕稍迟，此书业托黄家钞写。免将尊意与黄氏商量，其势已不能中止，只好多此一费矣。闻黄氏尚有校宋《管子》《列子》《淮南子》等书，若思重雕，亦当向伊借录。错误于前，补过于后何如？十一月十二日免曾修一函，谅蒙照察。知廛远注，肃载布闻，谨谢大教，顺请崇安。后学制陈免谨再拜。老伯大人尊前恭请福安，谢教。

陈免钞录《淮南子·天文训》寄至都中王氏寓所之时，王引之方从事《太岁考》之写作，而《天文训》则于其考证极有帮助。故而，引之专意回函致谢云：“拙著《太岁考》十二篇，赖有寄示之宋本《淮南子》，又加一证，感荷奚如！”¹并特别强调：“兹先呈上《太岁考》下卷，祈改之。第八叶九叶及辨《荀子注》‘宰者崔嵬’及《采菽传》‘平平，辩治也’二条，未知是否，统希教正。”²

道光九年年底将近，引之又有函致陈免³，当为上文所引两函之回复。据此可知，引之已接到上述两函及宋本《管子》钞本、陈免校语。此外，引之亦将所刊诸书之进度告知陈免：《荀子杂志》刻完二卷，将于明年夏秋间刻毕。

《述闻·通说》则已刻毕一卷。函中引之又提及曾于此前一月作书与陈免，然该函现已无踪可稽。此第六函刘谱、舒谱系于道光八年十二月，然据函中所述“收到宋本《管子》钞本与尊校各条”，则此函作于本年底无疑。

¹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四。引之此函刘谱、舒谱系于六年冬，然据上文之考订，可知其误。山本年谱亦系此函于本年。

²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四。

³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六。山本年谱系此函于本年十月。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所收之《与陈硕甫书》第七，以函中述及《荀子杂志》八卷已刻成故，则据念孙《王石曜先生遗文·读荀子杂志补遗叙》及上文所考订，当作于道光十年¹。刘谱、舒谱系此于九年，而以上文所述，九年底《荀子杂志》仅刻成二卷而已，与事实不符。又此时倩汪氏代钞之《淮南子》亦届葺事，故引之托付陈奂一并代为雠校²。陈奂作为段玉裁弟子，说经一本其师，虽段氏有所歧误，亦沿袭不置，且多方为之委曲回护。对此，引之亦直言奉劝，不稍假借：

段茂堂先生《诗经小学》考订精审，而所引他人之说，间有不足存者，如王中丞汝璧之解“日居月诸”穿凿支离，而乃见采择，似择焉而不精矣。想尊著内必不守此曲说也。

道光十年，王引之收到陈奂所寄之校本《淮南子》与苏州新刻之《仪礼管见》，乃即回复曰³：“兹于仲秋两奉手教，并奉到宋本《淮南子》《仪礼管见》。”又言：“《仪礼管见》及致胡主政书，已送交。”此事亦可藉道光十二年胡培翠与陈奂书为证⁴：“前岁奉到手示，并《仪礼管窥》一部。”又据引

¹ 山本年谱“道光十年”条：“按刘盼遂的王氏年谱，此事记作道光九年。然据《荀子杂志》中的王念孙叙，其时间为道光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在这年内送书于先生，疑问很大。并且道光十年秋，王引之在《与陈硕甫书》第八中，还向先生询问是否收到《荀子杂志》。如说此事发生在道光九年，实是很不合理。”

² 据陈奂手跋：“八卷《本经训》阙第九叶，十四卷《谗言训》阙第八叶、第九叶，十六卷《说山训》阙第二十叶、第十六叶，共计阙五叶。《谗言》、《说山》板心小号，又误改误倒，此系宋刻之误。《谗言》、《兵略》二篇每行下半多损坏不能辨，而全书字既小，印本又漫漶。今得菴翁手校本互勘，其字迹之隐约者即从黄校本校补，其字迹之全然磨灭者不复校补，恐失其真也。此刻北宋本旧藏扬州曹棟亭家，后藏苏州黄尧圃家，近藏苏州山塘汪闾源家。道光十年六月十一日，陈奂硕甫氏校毕记。”（上海图书馆藏陈奂校《淮南鸿烈》清钞本）

³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八。山本《年谱》亦系此于本年。

⁴ 《汪胡尺牍·胡培翠致陈奂书》第四通，复旦大学藏光绪二十五年刻《灵鹫阁丛书》本。

之此函，知陈奂亦有《管子》校本，其间考证皆详备精审，惜今已难踪迹¹。陈奂之《诗毛氏传疏》，据其自述：“此疏之作，始于嘉庆壬申从学段氏若膺先生于苏郡白莲桥枝园，亲炙函丈，取益难数。”至此已届廿载，虽无定稿，然其中精义，已屡与王氏父子商榷讨论，故此函中，引之勉励曰：“大著《毛诗考证》不日成编，即当付梓以示来学。弟远道不及相助，谨以前此所存余款，聊佐剞劂之费，敬祈晒存，万勿见却是幸。”此年，引之65岁，《经义述闻》全书刻成²，所主持校刻之《康熙字典》，亦届葺事。

又据舒谱，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王引之有“复陈奂书，寄示《读书杂志》九种并《汉隶拾遗》一本。按：“闵氏据江阴缪氏所藏王氏墨迹，录入谱。”今考闵谱原文，可知此函实为复侯官陈恭甫书，恭甫名寿祺，为引之进士同年，非与长洲陈奂陈硕甫书，此当系舒氏一时手误。

道光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寅时，一代鸿儒王念孙卒于京邸。十三年，引之奉父柩南归，并于是年冬安葬念孙于江苏六合县北乡东岳庙镇南。热丧之际，引之仍念念不忘挚友之著述，守灵间歇，即致书陈奂询问其《传疏》之进度：

¹ 此点又可见陈奂《三百堂文集·明刊本管子跋》：“奂对勘之余，作《辨误》一卷，与《杂志》复者削之，得六十余则。”又张文虎《西泠续记》（光绪十五年刻本）云：“又示《管子补注》，云昔王怀祖观察念孙作《读书杂志》，囑以宋板分校，因随笔记此，汇而成卷，凡《杂志》所已见者皆汰之矣。钩抉疑义，校订异同，精核处甚多。”而据江澄波《古刻名钞经眼录》（122—124页）云，尝见陈奂《管子》自校本，全书眉间粘有“奂案”夹签甚多，乃是《管子考证》之原稿。

² 《经义述闻》于引之生前凡三刻，一刻于嘉庆二年，书凡四册，不分卷，只五经义。再刻于嘉庆二十二年，书凡十五卷，即江西卢宣旬刊本。三刻即道光七年十二月京师寿藤书屋刊本（见《述闻》卷末标识），书凡三十二卷。然据王寿昌等《伯申府君行状》：“自庚戌入都侍大父，讨论经义，凡有所得即笔于篇，过庭所闻亦备载之。迄庚寅成书，凡三十二卷，名曰《经义述闻》。”（见《高邮王氏遗书·王氏六叶传状碑志集》卷四）则此刻当完成于十年。此说又可参陈鸿森《阮元与王引之书九通考释》，见于《龙宇纯先生七秩晋五寿庆论文集》，2002年，485—514页，又见于陈氏《清代学术史丛考》“《经义述闻》诸版”条，《大陆杂志》第八十七卷第3期，1993年，4—15页。

“大著《毛诗考证》谅已成编，未知何日付梓？”¹殷殷关切之意，溢于言表，足征二氏相知之切，投分之深。

又逾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引之亦辞世，年六十九，予谥文简。“其仲子彦和，字慕蘧，官芜湖道，筑专祠于仪征，属（陈奂）为之篆额。”²此时，上距嘉庆二十三年二人相识，已17年之久。

¹ 《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陈硕甫书》第九。闵《谱》本年云“有与陈硕甫书”，所指当即此函。

² 《师友渊源记》。

门前两株白果树

董桥

《罗雪堂合集》，线装，两函书。这套书总共是三十九函 188 册，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主编是张本义，副主编是萧文立，只印 150 套，订价人民币 75000 元，是图书馆殿堂等级的精版善本。我的老师兼老友王贵忱先生最近到大连讲学看到书出来了，想起我一定想看也一定嫌贵，张本义先生于是题字送我三十九函里的《雪堂法书集翠》一函三册，萧文立先生题字送我《卷首》三册。张先生是大学问家，研究罗振玉书法见树见林，现任大连图书馆馆长；萧先生是罗雪堂嫡孙罗继祖的得意门生，年轻得很，用功得很，治学之余还在电视上主持节目。听贵老说，这套大书全靠他们两位热心奔走集资筹印，几经艰辛终于问世。杭州华宝斋和富阳古籍印刷厂的印刷和装订一点不俗气，采用的纸张布料也极度考究，王元化先生题的那五字签条自然又格外典丽了。

罗雪堂传古自任，学问博通，照罗继祖统计，他祖父传刻的古图书和新材料都 640 余种 1589 卷，自己的著述也 150 多种。雪堂一生学海浮泛，宦海浮沉，学术尽管深厚，政治识见稍嫌蒙昧，一心愚忠清廷逊帝竟致流落倭寇陷阱，加上王国维沉渊之痛给他带来难白之冤，学业成就凄凄然在毁誉纠缠之间罩上一层神秘的迷雾，厚实之士扬其高山流水，激昂之辈讥其鼠窃狗盗。我不做学问而好奇心重，浅尝罗雪堂的著述断断续续也好多年了，可惜沾都沾不上门边，罗雪堂的法书我向来倒是有点偏爱，字字不见脂粉但见天生的清雅，家

藏一幅他写给朱汝珍的行楷，忍不住也只敢写一则小品一记偶得之喜。一连几个深宵浏览这两函善本，我时时想到的竟是旧交曹晓鸣，他懂罗雪堂的学术比我懂得多得多了。

老曹从前是小曹，留英留美的建筑师，20世纪60年代在新加坡做了静叔的邻居，常到静园玩，业余爱写旧诗，爱刻图章，爱画国画，80年代儿女要他跟大嫂迁居美国方便照应，一场大病挺过来加倍看破放下，潜心研究金石碑帖，研究青铜甲骨，雪堂、观堂、彦堂、鼎堂的学术尽收眼底。老曹今年年初读了我的《雪堂行楷》看上插图那幅罗振玉的字，来过几次电话苦苦催我匀给他，说是讲钱不伤感情，拿他家传那件永乐漆盒交换也无不可。我是过来人，老曹的心情我清楚，等我有一天舍得放手我一定照价匀给他；他家那件剔红漆盒我在静园见过，太珍贵太难得了，我不能趁他头脑发热害他吃亏。

90年代老曹回大陆观光给我带来一本罗继祖的《枫窗脞语》，他说罗先生的小文章都写出了大气魄，是于省吾说的“以少少许胜人多多许”，语短宏深，意度波澜。我听从这位老大哥的开导，细心研读果然若有所悟，悟出学问不深天分不足做文章说什么也凝不起来沉不下去。老曹常说这位史学家、书画鉴赏家的文字句句持平，通情达理；我却觉得罗先生的立论并非处处崇尚持平，只是笔力之稳健既是他的文品，有些深刻的不平之鸣化而为文依然显得妥贴，那才是他深情达观之宽宏境界。我坚信天下上好文章从来不讲持平，老曹听了骂我是邪说！他到底是比我老的老头。

萧文立先生在“卷首”的《罗雪堂著述述略稿》写的“序例”里说：大连市旅顺口区的将军山是罗雪堂晚年栖止之所；大连市内的墨缘堂是他印书售书之店铺；大连西郊的南山是他安息之地：“故居尚存，门前两株雪堂手植白果树，今已亭亭如盖、结子满盆矣！”白果树当是银杏树，记得静园后花园当年有一株小树清秀萧索，静叔说是银杏，老曹硬说不是，大家一起查过植物学图

录也无从核实，最后协议静待小树结子再定胜负。

前天晚上我打电话告诉老曹《罗雪堂合集》出版的消息，他连连慨叹心长钱短：“算了，反正医生近来劝我不可劳神不可用功！”他说。我们谈起雪堂手植的白果树，谈起静园那株银杏树，老曹说白果虽可入药，味苦涩，有小毒，“十足罗振玉这位老先生的为人为学，不容易对付”。他说静园那株银杏后来还是枯死了，静叔悄悄送了老曹清代一枝银杏木材雕成的小如意：“南洋气候炎热，”静叔说，“银杏死了证明确实是银杏了！”老头倔得够气派。

《天风阁词》论稿

周笃文

20 世纪的同龄人夏承焘先生以 87 岁高龄走完了他人生的路程。他的等身论著与天风阁诗词是我们重要的文化遗产，被人民所珍爱和研习。本文拟就夏承焘先生词创作的发展轨迹及其艺术特色进行探讨，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创作发展历程

夏承焘先生写词的历史长达 60 多年，大致可以分为解放前后两个阶段。解放前的 30 多年是其逐步成熟，走向辉煌的重要时期。按其发展经过，可分为少年、青年与中年三个阶段。夏先生作词起步很早，起点很高。少年时期即已崭露头角，表现出少有的天才与清丽苕秀的风格。他在《天风阁词集》前言中自承“予年十四五始解为诗。偶于学侣处见《白香词谱》，假归过录，试填小令。张震轩师垂赏《调笑令》结句：‘鸚鵡鸚鵡，知否梦中言语’二句，以朱笔加圈”。这是他第一首作品，作于温州师范。虽然才十五六岁，却能透过一层用笔。意谓我说出来的你能学舌，我梦中的言语你能知道吗？化用唐诗，活泼而又含蓄，可谓巧于构思。温师三年的其他词作，如“昨夜东风今夜雨，催人愁思到花残”以及他写赠其初恋的女郎——钱蘅青的《菩萨蛮》“酒边记得相逢地，人间更没重逢事。辛苦说相思，年年笛一枝”、“钟情难觅飘零

梦，枉匆匆转队成毬”（《高阳台·杨花》）等，皆清蕤颖妙，把少年词人的绮丽情怀写得楚楚动人。

温师毕业后的十年，是其青年时代，也是他词风发展的重要阶段。这时他已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他与当地诗人梅冷生、陈重陶等深相结纳，时有唱和。还与温州道台、名词人林铁尊相识，参加了瓿社的创作活动，并得到朱古微、况蕙风的指导。再加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使他大开眼界，立志作一个有益于时代的诗人。他在《学词日记》中写道：“翻旧年诗词草，自嫌诗境卑卑，无元龙百尺楼气概。”因作自警诗云：“作诗也似人修道，第一工夫养气来”。决心要洗刷其偏于婉约的少年词风，创出新的门径来。这当中五年西北壮游，对其风格的转变起了重要作用。1921年底至1925年秋他在陕西担任中学及大学的教职，汉唐故都的风采、黄河华岳的雄姿，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苦难，在词人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与强烈的冲击。词风一变而为清壮悲凉。如《清平乐·鸿门道中》：“吟鞭西指，满眼兴亡事。一派商声笳外起，阵阵关河兵气。马头十丈尘沙，江南无数风花。塞雁得无离恨，年年队队天涯。”又《鹧鸪天·宿潼关》“过眼秦皇与汉皇，马头但有路尘黄。扫眉人唱三峰媚，折臂翁耕百战场。风浩荡，劫苍茫，旁观莫笑客郎当。贾生涕泪无挥处，要上潼关看夕阳”伤时念乱的长悲大喟，一扫昔日的儿女风华，声情激楚，可以裂竹。此后的严州（今浙江建德）客旅，三年教学生涯，作者寄情山水，创作了一批清逸高远的作品，基本上奠定了他在词坛的地位。

夏先生的中年词作，是指1930—1949这20年间的作品。这时他执教于之江、浙江诸大学，主要精力用于科研与教学。创作相对少些。但由于日寇入侵，国族危机加剧，激于爱国义愤他创作了不少反映时代的佳作，成为他词创作上的一个高峰。风业也日趋清刚激越。1930年秋承邵潭秋之介，夏先生从严州山水之窟来到西子湖畔的之江大学任教，清幽的环境，优裕的生活，渊雅的同事，为词人打开了生活的新局面。流诸笔墨，便有无尽的欣悦。如《望江南·秦望山簧舍》：

秦山好，带水绕钱塘。一道秋光天上下，五更潮信月苍茫。窗户挂银潢。

秦山好，飞观俯西兴。沧海未生残夜日，鱼龙来啖半江灯。人在最高层。

这些正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然而之江并非象牙之塔。东北的沦陷，沪上的事变以及接踵而至的危机，极大地激起了词人的义愤，创作了一批忠义愤发的词章。如《满江红·答任二北》：“辽鹤归来，故乡事、伤心忍说。……照我横磨歌出塞，榆关今是谁家月。叱岛夷、浮海戴头来，吾无惧”、《贺新郎·承德失守》：“醒来铅泪纷成把。念陇头惊沙千斛，边声万马。南渡糊山巾屐盛，日日歌围酒社。天水恨，花应能话。换了尊前箏笛声，听北风鼓角从天下。香影拍，忍重打。”《水龙吟·谒叶水心墓，时闻南京沦陷》：“九原人比山高，海云过陇皆奇气。……沉陆相望何世，送千鸦苍茫天水。横江身手，可堪重听、石城胡吹。夜半回飙，排闾余愤，定惊山鬼。待中兴碑下，铜钱共打，唤先生起。”夏先生为激扬士气，还创作一批《军歌》，中有：“不战亦亡不如战，争此生死线。全中国人戴头前，全世界人刮目看。战战

战！”，“火海压头昂头进，一呼千军奋。左肩正义右自由，挽前一步死无恨。进进进！”此外，作者避寇入雁荡时，还写了一些气奇格高、不同凡响的作品。如《清平乐·常云峰访无闻》：“啸声天半，酌斗浇河汉。赠我长筇龙欲变，咒起身云千片。四更奔走山灵，海舟万里都惊。谁放峰头光怪，先生枕上诗成。”

新中国成立时，夏先生已年过五十。作为一个饱更世乱的正直学者，他衷心欢迎解放，对新社会很有好感。他以饱满的热情从事诗词创作，同时也感到有必要探索新的创作道路，以表现社会的巨变。如《满江红·赠止北》云：

“五十开端，趁未老，共君抖擞。正眼前、乾坤重整，奇功初就。”其六十生日词云：“五十九年非，猛悔如何改？试上层楼望晚江，西日多奇彩。昨岁约飞空，何日真横海？戏与儿童画字看，拄杖将成乃。”又《玉楼春·北京看节日焰火》云：“归来枕席余其彩，龙喷鲸喙呈百态。欲招千载汉唐人，同俯一城歌吹海。天心月胁行无碍，一夜神游周九塞。明朝虹背和翁吟，应有风雷生磬欬。”

又《好事近·原子弹爆破》：

云外迸惊霆，振撼梦中海岳。吹堕天庭一纸，闻战神夜哭。海东回首赤旗高，扶桑满红旭。看合涛头万弩，折毒龙牙角。

又《水调歌头·赠德国友人施华滋》云：

秋水不能画，西子有明眸。醉人千顷波碧，临镜欲横流。待续坡翁俊语，宜雨宜情而后，谁识更宜秋。三月碧桃水，且莫酿春愁。攀斗柄，探月窟，壮哉游。故人相望何处？万里海西头。争似断桥吹笛，携得波光西子，招手落双鸥。让汝广寒阙，容我占湖楼。

在词人眼中，西子湖畔的人文胜概，并不亚于攀星揽月的壮游。奇情妙想，真是匪夷所思。这一期的作品在歌颂之外，也有沉哀入骨的悲吟。如对任铭善的悼念就是一例。铭善是夏老执教之江时的学生，高才妙质而不能谐俗，1957年卒遭排摈，后屈死于“文革”中，年仅54岁。夏先生为作《玉楼春·悼无受》：“廿年旧事倾襟抱，半夜屏风伸脚倒。共伤才子早生天，七十尘容还耐老。吴山眉黛如新扫，永忆湖楼窗户好。临平冷月梦回车，单舸闹红愁打稿。”“临平”指任之墓地。到1979年夏先生又写诗悼念：“拥鼻听吟偻侧行，路人都怪气纵横。高年厚福君无分，论定长沙一贾生。”痛惜之情，真是沉哀入骨了。对于1957年反右派，夏先生是很有看法的。曾写诗批评：“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不等闲。一顶帽儿头上戴，搬它不动重如山。”生性谦和忍让的老先生，眼见人才被摧残和陨灭，再也无法缄默了。收入《天风阁词集》前后编的作品共480首，皆作者生前手订。其他见于日记或他书的词作大约也接近此数。总计当在千首左右。无论数量与质量，夏先生应是上世纪当之无愧的词坛巨擎。

自觉的开拓者

夏先生的创作誉满词坛，并世词家殆罕其匹。朱古微称其词“历落有风格，绝非涂附秣丽者所能梦见。题梁汾词扇一阕尤胜，私庆吾调不孤”¹。夏敬

¹ 《天风阁学词日记》（一）

观亦云：“永嘉夏瞿禅焘，深于词学，考据精审……其词秾丽密致，符合轨则，盖浙中后起之秀也。”¹又称《秦望山水龙吟》、《桐庐浪淘沙》二词，“皆绝去凡响，足以表见其襟概”²。汤国梨则云：“既读瞿髯词，凄情顿挫，万感横集，奇思壮采，今人岂让古人哉！”³

张尔田更云：“尊词于朋好中，胎息神骨俱臻超绝。昔大鹤丈盛推武林陈伯弢词，谓楚材高骞，非吴下阿蒙，恨其未见君作也。”⁴可谓推许备至。

夏先生是20世纪的文化巨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程千帆先生认为“此老之于词学有不可及者三：用力专且久，自少至老，数十年如一日。平生旁搜博考，悉资以治词……一也。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当世学林，殆无与抗手者，二也。精于词学，或不工于作词；工于词者又往往不以词学之研究之意。故考订、词章，每难兼擅，而翁独兼之，三也”⁵。可谓至确至当之定评。夏先生从20岁起攻治词人谱牒、音律之学，他的独创性研究，轶宋超清，为现代词学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我们这一

¹ 《忍古楼词话》

² 《忍古楼词话》

³ 《夏承焘教授纪念集》

⁴ 《天风阁学词日记》（一）

⁵ 《词学》（6）

代治词者必经的陞阶。由于他湛深词学，洞悉其发展源流，故在填词的定位与风格的追求上，能于高处着眼，大处着墨，具有历史的眼光与时代的自觉。他与一般附庸风雅、吟讽花月的旧式文人名士不同，他是以学者的鉴裁与词人的文心，可以追求新的突破。一切文艺应以创新为第一要务，因循守旧则是文艺的悲哀。夏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摸索与时代相称的属于个人的诗词风格。清代，特别是晚清，词风昌炽，百家腾跃，主持坛坫者多为学人，如张惠言、周济、谭献、龚自珍以及朱古微、况蕙风、张尔田、王国维等，莫不雄于才而邃于学。因得探其本原，明其正变，上承骚雅而下开新局。夏先生是幸运的。他虽僻处海隅，但少年时就脱颖而出，得到张震轩、林铁尊等名家的栽培，并进而获得了朱古微、况蕙风的指导。青年以后更与朱、况、吴（梅）、张（尔田）诸老辈以及龙榆生、唐圭璋、任半唐、吴鹭山诸学友切磋请益，这就为他词艺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说自己对词的兴趣，源于老师的鼓励。他对琦君说：“我十几岁作的《如梦令》，那时老师在两句边上密密加了圈，连声夸我作得好，真使我感激万分，从那时起，我马上下定一生要研究词的决心。”¹如何才能写出好的诗文呢？他说“第一要培养对万事万物的关注。能关注才会有灵感……（于是）他又吟起词来：短策暂辞奔竞场，同来此地乞清凉。若能杯水如名淡，应信村茶比酒香。无一语，答秋光。愁边征雁忽成行。中年只有看山感，西北阑干半夕阳”²。夏先生作词悬鹄甚高，不以小成就

¹ 《夏承*教授纪念集》

² 《夏承*教授纪念集》

为满足。要求自出机杼，不依傍古人。其《自赠》诗云：“古如无李杜，我亦解高吟。莫拾千夫唾，虚劳一世心，江湖秋浩荡，魂梦夜飞沉。脱手疑神助，青灯似水深。”抱负可见。又其1928年《学词日记》云：“阅现代名人传，屡有感动……日汨没其精神于故纸中，不能扩其耳目于斯世。明年忽已三十，我其终为一乡一邑之人乎？”1929年日记云：“思中国词中风花雪月，滴粉搓酥之辞太多……求拜伦哀希腊之伟大精神，中国诗中当难其匹……以后作词，试从此辟一新途径。王静安谓李后主词有释迦、基督代人类负担罪恶意。此语于重光为过誉。中国词正少此一境地也。”其1939年9月日记云：“夜读王逢原诗，因成一词，思以韩王诗笔为词，取材在寻常词苑之外，为苏辛再开生面。”句有“九衢尘底千虫俦，火狱当前堕……层冰积雪满高坤，安得手提天下上昆仑”（《虞美人》）。基于这样的自觉，夏先生可以追求一种新声情、新意境和新气象。它是以清刚为骨，奇崛为神，深折为姿态而戛然独造自成一家的。如《金缕曲·题顾梁汾词扇》：“展卷寒芒立，有当年河梁凄泪，扞之犹湿。比赋娥眉艰难事，多此几行斜墨。便万古神暗鬼泣。何物人间情一点，长相望，旷劫通呼吸。携酒问，贯华石。”又《清平乐·雁荡常云峰》：“啸声天半，酌斗浇河汉。赠我长筇龙欲变，咒起身云千片。四更奔走山灵，海舟万里都惊。谁放峰头光怪，先生枕上诗成。”如此笔墨襟抱，确乎是词坛未有之境。作为一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别开生面的词家，夏先生对诗词的改革也很关心。在他与林庚白的通信中，提出诗词用韵可以“国音为标准”，“宋人

用方音填词不足法。”他还认为“各体文事，势不能不变。时下有人哓哓以更新体貌为言，而不知变换其神理，驯致内容之腐滥……时下之白话诗词大多不足称文艺”¹。60年前的这些观点，今天仍有参考价值。夏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能将学者的识鉴与词人的才情紧密结合、不断探索诗词的新定位的自觉开拓者。他自承作诗“于昌黎取炼韵，于东坡取波澜，于山谷取造句”，填词则欲“合稼轩、白石、遗山、碧山于一家”²。纵观夏先生词作，确能摄取山谷的瘦硬、白石的清刚，复参以东坡、稼轩的雄旷与宏肆。夏先生是折中刚柔、含纳豪婉，以健笔写奇情而独放异彩的一代巨匠。

词艺特色

夏先生在谈到填词风格时说：“宋词有深远坚苍一种，与唐五代之婉丽靡曼者不同，予好以宋诗意境入词，欲会唐词宋诗为一体。”³用宋诗笔法写唐五代词中意境，这就是刚健清奇的承焘体。姚鹓雏在赠夏老的《玉楼春》中写道：“辛姜一手阳春曲，咫尺便看追玉局。兴来平地看青春，诗入空肠歌绿萼。君词多骨我多肉，瘦硬神通君所独。与君同合字癯仙，昔有吴侬歌裂竹。”⁴指出了他对苏辛、白石的继承与瘦硬通神的特点。

¹ 《天风阁学词日记》（二）

² 《天风阁词集》（前言）

³ 《天风阁学词日记》（一）

⁴ 《天风阁学词日记》（三）

奇创性可说是夏词的首要特色：如写桐庐江行的夜色“万象挂空明，秋欲三更。短篷摇梦过江城。可惜层楼无铁笛，负我诗成。杯酒劝长庚，高咏谁听？当头河汉任纵横。一雁不飞钟未动，只有滩声”（《浪淘沙》）。写武汉大桥通车：“人间天上两星桥，汉江正秋宵。黄鹤不须招，看人比江楼更高。红旗舞处，人民事业，千古浪难淘。容我伴诗豪，挟白月飞过怒涛”（《太常引》）。又如《题王船山手稿》：“六经生面，岩壑书成关世变。宙合苍茫，并世相望有顾黄。风云叱咤，红紫江山环讲座。不待扶筇，开卷光芒见祝融”（《减兰》），皆骨采骞腾，想落天外，令人有观止之叹。

深折是夏词的第二个特点。文艺贵变，层次、曲折与错综是服膺于变化的需要的。一览无余，一泻到底不是艺术，一唱三叹才是艺术的高境。夏词于此极见工力。如《清平乐·黄河舟中》：“离心东注，一派茫茫去。料得剪灯楼上语，今夜春寒几许？枕边数拍哀笳，酒醒且莫思家。只在深闺梦里，几曾身到天涯。”词写对新婚别后妻子的思念，却不从正面写，而移位到对方——写剪灯人对自己的惦记。明明是行经在浊浪排空的黄河天际，却说成只在深闺梦中。以深折之笔出之，既含蓄又浑成，自是高境。另如《临江仙·将入雁荡寄心叔》：“挥手山楼灯火伴，音书南北都稀。阿连最少最相思。观身因悟易，临事见能诗。岁岁扁舟苕霅约，几番开谢梅枝。梦中台荡有归期。一筇如忆我，双笛更邀谁。”“心叔”即任铭善，是夏老最器重的门人。词里比之为谢惠连。“一筇”两句，意谓你如想我这个扶杖的老人，就快来雁荡伴我吹笛

吧。倒折用笔，便觉意足层深。其《浣溪沙》写湖窗景色云：“湖上游人羨画阑，午风似酒坐忘还。帘波诗思有无间。知画修蛾谁最好，但愁幽兴各无闲。家家分绿看吴山。”下片三句是说，尽管有最美的佳人，也无暇追求，因为大家都被吴山的春绿吸引住了。湖山之美就这样巧妙地渲染出来了。其《菩萨蛮》云：“百年作计归来早，官桥杨柳风先扫。何路问关山，山山娟血斑。家多多翠竹，让与霜禽宿。莫访淡妆人，天寒倚市门。”此词上片谓沦陷山河，处处血痕。下片所言倚市门之淡妆人，则指投向汪伪的旧友。用比兴寄托之手法，表示痛惜与绝交。意严而笔婉，当细心体会。

理趣是夏词又一显著特点。夏先生耽嗜哲理，于佛学、理学造诣很深，对西洋哲学也下过相当的工夫。故其词中往往洋溢着理趣与对人生的觉解。如：

过雨春溪万佩鸣，草虫能学鼓琴声，溪头侧耳有牛听。隔水数峰犹在定，过桥孤杖莫相惊。滩风到面小诗成。（《浣溪沙·灵峰晓行》）

门外苏堤接百堤，窥门好鸟四时鸣。吟人笔下有花枝。霜霰不惊容阅世，声华渐淡可言诗。西风酒面立移时。（《浣溪沙·压堤桥赏荷》）

欲话西湖各沧神，巫夔归路亦兵尘。重温旧梦真如画，不泣新亭要有
人。

诗脱手，酒沾唇。何须攀柳更梭巡。疏梅筋骨凭君看，数点能回天地
春。（《鹧鸪天·送成业诸生西行》）

第一首写人与自然的契合；第二首写勘透声华的道心；第三首写“数点能回天地春”的生机，皆意味深长，具有儒门与释迦气象。夏先生词作与一般骚人名士不同，充满袞袞天机，有一种高远进取的精神。他在一首诗中告诫友人

“莫向西风添苦语，四山红叶正如春”。正是这种胸次、气概，使他在词坛上别开生面、度越前人，成为一座耸入云霄的高峰。

夏先生的词学研究创作都取得了震灼古今的成就，在上一个世纪的词林中堪称独步。王季思先生在唁电中称他为“一代词宗，芳流海外；等身著作，光照人间。人生到此，可以无憾。”可谓定评。如何深入学习这份词学遗产，继承他的宝贵经验，以提高当前词学研究创作水平，有着现实的意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扬广大。

尺牍书法中所见平阙书仪及艺术范式

彭砺志

在古代，尺牍是人们话语交流的书面形式和信息传达的重要媒介，它综合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交际关系以及审美方式。汉魏以降，工尺牍、善书翰被视为世族士人立身的艺能，尺牍也以其书法之美成为世人宝爱藏弃的对象，并催生出魏晋书法灿烂之观，蔚为后世帖学的渊藪。同时，不同时代的社会文化和书仪规范在客观上又成就了尺牍大小错落、长短参差和虚实相映等复杂多变的形式美感。书疏当面，迹乃含情，人们赏悦尺牍，正是综合了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因素。

尺牍书法差参错落的形式在书仪中被称为平阙，其本质与尺牍书写过程中“以工为敬”的心理要求一样，都是礼俗在书仪中的反映。较之于启奏类文书的一本正经，僚朋居家尺牍的平阙在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严格的规范，其灵活性常为书法家个性化书风的创造提供了一定的契机。

在当代书法创作和展览中，以尺牍形制或借鉴尺牍平阙样式创作的各种体裁的书法作品层出不穷。创作者将创新的眼光共同指向其流美空灵的构成形式，这无疑又唤醒了今人对古代尺牍书法艺术魅力的热情，极大地丰富了书法创作的形式。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由于一些书写者对 2000 多年的尺牍文化的隔膜，和对于这种由多种文化价值外化凝成的艺术行为和语言习惯的生疏，多数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单纯行为上的摹仿。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也有些人不了解古代尺牍出于礼仪习俗而时作移行的原委，不管写什么内

容，都写得七长八短的，于是有刻意造假尺牍的现象。¹”况且就书法创作而言，古代尺牍所蕴藏的多样化形式还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当代书法“造假尺牍”的现象也暴露出目前书学研究中尺牍这种所谓的“平阙”形制关注不够。现今流行的尺牍书法一类的书籍多数就此一笔带过，语焉不详。再就学界对平阙问题的研究来看，目前还主要集中在对敦煌文书中关乎平阙文献的整理及其礼制的发掘，极少涉及存世的尺牍书迹，至于以通史视觉对这一书仪变化形式进行考察，则暂付阙如。

为了对古代书仪的研究有所贡献，同时给尺牍类书法创作提供一种理论或实践上的借鉴，本文拟对沿袭 2000 多年的尺牍平阙的历时性变化、原理方法、图式类型等问题作一较全面的探讨。所见不广，阙误在所难免，篇幅所限，议论定有未周，希望得到专家学者的指正。

一 平阙的源流与演变

今天我们看到古今尺牍作品中长短不一的行款形式古人称之为“平阙”。平阙一词，最早见于唐代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其卷四明确规定了当时表状笺启等官牍文书的“平阙之式”，敦煌写本中郑余庆的《大唐新定吉凶书仪》在此之外还详细地规定了家私书疏的平阙内容。平阙，顾名思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平出”，《左氏襄公二十五年传》疏引魏晋《仪注》注“写章表别起行头者，谓之跳出”。²别行跳出即平出。具体而言，在尺牍行文书写中

¹ 丛文俊：《传统与现代的碰撞》，第二届中国（天津）书法艺术节组委会：《21 世纪书法·天津论坛学术论文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2 年，第 11 页。

²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 1029 页。

如遇到特殊的人、事、物、称谓及其关涉的动作等字词时或另起一行抬头书写。平出发展到明清，因其超出原来齐头，所以又形象地被称为“抬头”，形成了包括单抬、双抬、三抬、四抬甚至多抬的文书制度，按照从高到低的抬序又分为第一抬头、第二抬头，依次类推。

二是“阙字”。遇到前述类似情况时因内容重要性等差或书写性空间要求不作移行处理，只在原行相关的词语上方空一二字或更多字再直行书写，此谓之阙，或可对应称之为“空抬”或“挪抬”。平与阙二者都是体现书疏中尊卑程度与相互关系的外化形式。

应该区别的是，这里讨论的平阙形式与手札中表示题额、段落提示、题记等内容而造成的与此相同的行款格式没有任何必然联系。

根据尺牍所见，平阙形制滥觞于秦，形成于汉晋，成熟于唐宋，明清之际流于泛滥，至于近代可看成是前代之孑遗。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尺牍书迹具体加以寻绎。

（一）秦代萌芽期

平阙之制，先秦未见，甲骨钟鼎文字，凡“王”、“王曰”等辞句，不提行亦不空格。许同莘认为“君臣一体，不以直书为嫌，此古义也。”¹自秦代开始，方出现提行颂圣之体。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八·秦阳陵虎符跋》：

平阙之式，古金文中无有也。惟琅琊台残石则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顶格书，此为平阙

¹许同莘，《公牍学史》，档案出版社1989年，第27页。

之始。此符左右各十二字，分为二行，“皇帝”二字，适在第二行首，可知平阙之制，自秦以来然矣。¹

除琅琊台刻石之外，其他如《泰山刻石》、《会稽刻石》、《峰山刻石》等全然没有恪守平阙（这或许是后人在翻刻过程中重书挪行所致），二世诏书和李斯奏文，凡“始皇帝”内容不守平阙的例子非常普遍。可见，发端于秦的平阙形制，因国祚甚短尚未形成严格的制度，但却是后代平阙形制的嚆矢，如同尺牍以名称、书式区别尊君卑臣一样，影响甚远。

睡虎地秦墓的两封木牍家书是目前秦代公私尺牍中唯一所能见到的以提行为敬的例子，此形制格式可反映当时民间书札的一般情况。以M4出土的11号木牍为例：

1 二月辛巳，黑夫、惊敢再拜问衷，毋毋恙也？黑夫、惊毋恙也。前日黑夫与惊别，今复会矣。 |

2 黑夫寄益就书曰：遗墨夫钱，毋操夏衣来。今书节（即）到，毋视安陆丝布贱，可以为禅襦 |

3 裙襦者，毋必为之，今与钱偕来。其丝布贵。徒[以]钱来，黑夫自以布此。 |

4 黑夫等直佐淮阳，攻反城久，伤未可智（知）也，愿毋遗黑夫用勿少。书到 |

5 皆为报，报必言相家爵来未来，告黑夫其未来状。闻王得苟得 |

（以上正面）

¹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9页。原书标点者不明平阙，将“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全作引文。

-
- 1 毋恙也？辞相家爵不也？书衣之南军毋□不也？ /
 - 2 为黑夫、惊多问姑姊、康乐孝须（婴）故术长姑内外□ /
 - 3 为黑夫、惊多问东室须苟得毋恙也？ /
 - 4 为黑夫、惊多问婴记季事可（何）如？定不定？ /
 - 5 为黑夫、惊多问夕阳吕婴、□里阎诤丈人得毋恙……矣。 /
 - 6 惊多问新负、婴得毋恙也？新负勉力视瞻丈人，毋与……勉力也。¹ （以上背面）

虽然牍背文字因墨染黑，但仔细辨认仍能看出其大略。与正面文字满行书写不同，背面文字第1行本来尚有空位可容多字，却断开另起一行，第2、3、4、5行末同样留有地尾。不难看出，断行抬头都有一个共同规律，那就是，凡关涉对方的问候之语，即致书者“多问”家室内外不同对象的内容几乎全部另行书写。可以肯定地说，换行平抬的目的是出于对受书对象的尊敬。6号木牍的三处断行也属同一情况，此不详举。

据考证，秦墓家书书写日期为秦始皇二十四年，早于其统一前2年。究竟是民间尺牍提行示敬方式影响到秦代官方的平阙之制还是秦制影响到民间家书，由于所见书迹资料有限还不能过早地下结论。

（二）汉晋形成期

汉承秦制，尺牍平阙形制因袭前代。汉代简牍实物的大量存在为我们考察分析汉代尺牍平阙形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秦代题铭文字平阙内容在汉代章表类尺牍中大量出现，并明显形成规律。除“皇帝”、“皇”、“帝”外，凡是涉及皇室成员所见如“太后”（《敦》

¹说明：行款原竖行今移作横式，顺序一律照旧。行满而抬头另书者，后记“丨”表示，因抬头断行者以“/”表示。■处文字已模糊不清。上俱见《睡虎地秦简》，文物出版社1981年。

188)、“高皇帝”(E. P. T65:295),皇帝的政令“制”、“诏”、“制诏”等,皆须抬头另行书写,¹有时还高出二三字的位置,如武威磨咀子出土的五杖诏书令册中“皇帝陛下”、“制曰”即为此例。与后代抬头有所不同,为了突出所抬内容,以上诸字与正文间皆有意拉开一字左右的位置,这与唐宋时期的阙上尊下判然有别。

尺牍的抬头制式也影响到汉代的碑刻,如《乙瑛碑》逢“尚书”、“朝廷”时亦换行平出,《华山庙碑》中,“袁府君”、“京兆尹”平出,而“高祖”、“太宗承”、“孝武皇帝”、“仲宗”别行高出一字,为第一抬头,从尺牍平阙来看,平分等差的形成要到元代以后。由此观之,现在坊间流行的所谓早拓本极有可能系明代翻刻,因为以后代平阙之制妄替前代者在刻帖、刻书中都普遍存在。

汉代私书平阙较秦代发生变化,其敬抬意识进一步强化。与文本结构相适应,汉简中把以前换行的整句问候分为二行,具礼与对象的内容常分行抬头书写,更加突出了示敬的对象,有时文末具礼内容还再次抬头。如

1 信伏地再拜多问 /

2 次君君平足下。厚遗信非自二信幸甚寒时信愿次平君君平平近
强酒食察事毋自易信甚薄礼 |

3 □ 絮一信再拜进君平来者数寄书使信奉闻次君君平毋恙信幸伏
地再拜再拜 /

¹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08页;李均明 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15—117页。

4 次君君平足下 □ 初叩头多问

5 丈人寒时初叩头原丈人近衣强□洒食初叩头幸甚幸甚初寄□贛
袜布二两□□者丈人数寄书 |

6 使初闻丈人毋恙叩头幸甚幸甚丈人遗初手衣已到

此为《居延汉简甲乙编》附图 51 一封汉代的帛书。从平阙内容来看，此尺素中三处抬头：二处（2、4 行）是对收信人君平的拜礼，一处是对其丈人的拜礼（第 5 行）。

提行为敬即使对致书者的妻子也不例外。如：

1 宣伏地再拜请

2 幼孙少妇足下，甚苦塞上暑时。愿幼孙少妇足衣强食，慎塞上。宣幸得幼孙力过行边，毋它急。 |

3 幼都以闰月七日与长史君俱之居延，丈人毋它急，发卒，不审得见幼孙不。它不足，数来 |

4 记。宣以十一日对候官，未决。谨因使奉书伏地再拜 /

5 幼孙少妇足下。朱幼季书愿高掾幸为到临渠隧长

6 对幼孙治所。…… （《居简》10·16）

李均明认为，“出土简牍中所见秦汉书信起首语通常为致信人致敬语，按正规写法当独占一行，以示礼貌。”¹有时，“为使一牍中能容纳更多的文字，致信人便将起首语与正文在一行中连写，其间以界格符隔开，表示原本当另起

¹ 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第 72 页，又参见李均明、《简牍符号考述》，《华学》第二辑，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93-107 页。

一行。”其实，首行之所以独占一行，是为了突出对第二行受书人的礼貌。凡有界格号者，均开门见山，无受书人称谓，所以与“礼貌”无关。如：

儿尚叩头白记●闲不上日久食尽乏愿贷谷一斛…… 《敦》

244A

邳严叩头白 /卒俱往取之叩头…… （《居简》231.13B）

以上二处界格符前后文字无关具礼及其对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分为两行。因牍面空间的限制，为节省片面而形成的两行合并为一行的例子不是没有，如：

伏地再拜请稚公足下善毋恙良善苦官事春气可欲愿杂……

（《敦》1088）

在封检的封题中，提行最为普遍。前行为致书致敬语，下行是名衔尊称，相当于简牍正文开头的两行。

1 刘宣书奏

2 武大伯

《居简》284.25

1 吴阳书再拜奏

2 甲渠候曹君门下

《新简》E. P. T40. 8

1 奏

2 淳于

3 卿足下

平阙在谒牍类尺牍中形式最为完备。如尹湾汉简中的十枚谒牍，¹不仅“进”、“奏”与其后对象尊称常分为二行，就是“问”、“请”、“谒”、“亲”等动词，虽是自己的动作，但因涉及对象为对方，也一律提行单书，甚至“问疾”二字也分二行书写，这实质上已开唐宋尺牍以动词为平阙内容之先河。

进长安令

儿君 (正)

东海太守功曹史饶谨请吏奉谒再拜

请

威卿足下师君兄 (反) YM6D23

奏主吏师卿?

亲 (正)

五官掾副谨遣书吏奉谒再拜

谒 赵君孙 (反) YM6D18

进

师君兄 (正)

容丘侯谨使吏奉再拜

问

疾 (反) YM6D20

进主吏

¹ 《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

师卿（正面）

弟子口迫急谨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足下（反面）YM6D

卒史宪丘骄儒

以上我们所举汉牍平阙诸例，严格来讲，只有平而无阙。不过，简牍中偶有空字的现象。我们发现，敦煌汉简中有一“君”上缺一字¹，可能就是为了表示尊敬的目的，是否属谨阙示敬目前尚限于孤证。

谨阙示敬的典型例子较早见于频繁出土的东吴名刺当中。如“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绶”。“问起居”上空二三字，是为了突出向对方的问候之意，当为谨阙示敬之通例。

当纸质文书代替简牍，平阙自然转移到尺纸之上。敦 2277：“口书浮叩头言 / 薛用思起居平安。”即为典型跳行之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纸书完整者不多，李柏文书为草稿，没有平阙。焉耆文中有一具平阙者。如“十月四日具书焉耆玄顿首 / 王督邮彦时司马君彦祖侍者”。

在吐鲁番文书中，有前凉建兴三十六年，东晋永和四年（348）的王太宗上太守启，其中“秋节转凉，奉承 / 明府体万福”句，“承”后及受书人的职官“明府”平出，这与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中，“吴子杨往初”句断行平出一样，表明普通尺牍在除始句的具礼对象内容之外，句中所及受书者也开始成为平出示敬的对象。

¹冯党书幸致 君辱辱幸临赐谒都护会闻病泄数日不愈以故…… 《敦》662A

东晋二王尺牍，主要通过唐代摹拓和宋代刻帖流传至今。墨迹中惟一可见当时平阙形式的是万岁通天帖中的《姨母帖》，其内“姨母”平起。其他均为刻帖。

至于刻帖，由于各种原因，刻帖基本上改变了原来尺牍字迹的行款格式，但有少数帖札也保留当时的平阙。如《绛帖》始收的王羲之《霜寒帖》：

臣羲之言，霜寒，伏愿
圣体与时御宜，不胜驰情，谨附承
动静，臣王羲之言。

(图 1.2.6)

这是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刻帖中从内容到字迹王羲之最为可信的作品。从“臣”字款看，当为书与晋帝的时间拜贺。“伏愿”用于尊长信中，P.3637 杜友晋《新定书仪镜》“通例第二”：“凡下情不具、不宣、伏惟、伏愿、珍重等语，通施尊长”，“承”在汉魏六朝有“闻”“听说”之义，后世的“承闻”一词即由此而来¹。“圣体”、“动静”均系代表皇帝容体情貌之词，其平出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法帖中残存的平阙还不至此，其他如《淳化阁帖》中晋明帝《伏想帖》、王羲之《嫂安和帖》，王廙的《七月帖》、《嫂何如帖》，王献之《仲宗帖》、《黄门帖》等，都反映出当时人的抬头换行的习惯。当然，多数已因移行消弥。至于二王草书尺牍，姚鼐跋王羲之《元度何来迟帖》的意见值得重视，“凡二王帖无名者，多是题后答人书。此五帖殆是题后答卑幼语，故辞尤简、笔尤纵也。”²没有平阙的限制，从某种程度上更助长了草势的猖獗。

(三) 唐宋成熟期

¹ 汪维辉. “承”有“闻”义说补, 《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3年1期。

² (清)姚鼐.《惜抱轩全集·法帖题跋》，四部备要本。

唐代是尺牍平阙形制全面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从制度上，国家第一次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对官牍书写中的平阙作了规定。据《大唐六典》卷四《礼部》尚书礼部郎中员外郎条记：“凡上表、疏、笺、启及判策、文章如平阙之式。”注称：“谓昊天、后土、天神、地祇、上帝、天帝、庙号、祧皇祖妣、皇考、皇妣、先帝、先后、皇帝、天子、陛下、至尊、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皆平出；宗庙、社稷、太社、太稷、神主、山陵、陵号、乘舆、车驾、制书、敕旨、明制、圣化、天恩、慈旨、中宫、御前、阙廷、朝廷之类，并阙字。”¹与汉代官牍相比，唐以礼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阙式内容。平与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天地和皇帝、皇储、家眷，二是帝之诏命、陵寝、朝廷等。平阙的不同代表了以帝王为中心，从天地君到皇权所及范围的次第与轻重的不同，开元时期书仪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平阙形制因体裁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异，如柳公权《蒙诏帖》，“蒙 / 诏”分二行书写，而颜真卿《多宝塔碑》“主上”、“我皇”与“勅旨”等统一上空三字，并无多寡平阙之别。

受官牍平阙的影响，唐代也出现了用于家庭内外和朋友之间的私书平阙。元和时期郑余庆《大唐新定书仪》中规定：“高祖、曾祖、祖、翁婆、外祖、耶娘、慈颜、尊亲、尊体、动止、起居、寝膳、伯叔姑舅姨、桑梓、垅坟。右前件家私书疏，准式并平阙。墓所、莹所、殡所、坟上、墓侧、告口人、考妣、家君、先代、所贴、所符、高门、曾门、大门、昭穆、兄弟、诲示、告勤、问及、示问、勾当、处分、丞家、阅阅、动静、履体、尊者、所履、丈人、丈母、庭训、庭闱、恩造、口寿、命口、高命、感慰、永感、永慕、长

¹《大唐六典》，中华书局1991年，第88页。

者、仁惠、仁慈、雅旨、徽猷、雅致、望问、清誉”，赵和平先生认为“清誉”之下应补入“右已前件家私书疏，准式阙二字”等十三字文意方完¹。

就私疏平阙成分来看，系从表奏平阙而来，同样也体现了由人及身的先后关系。其中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一是将对方的来书，如“诲示”纳入平阙；二是动作动词，如“永感”“永慕”，因其对象涉及对方，也被列入空阙的范围。其实，这种规定只是对应用性书仪的一般性总结，书迹所见平阙用语远比这些复杂。如《绛帖》中保存的武后时狄仁杰书，从所能确定为平阙的内容来看，“高会”、“陈谢”、“攀恋”等词皆为书仪所不见者。

孟冬渐寒，伏惟 /

尊体起（居）万福，仁杰即（日）蒙 /

恩，不审近日 /

寝膳何似，自成 [] 违间，将及半年， |

每属萦仍，曾无一札，惶悚之外，攀 / |

恋实深，人使远来， 絨翰猥至，披 |

捧欣佩交集下怀，兼有 [] 沾，出于 / |

纪念，未期 高会，企望增深。使回

奉状 起居陈 /

谢。不宣。谨状

十月日从表弟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狄仁杰

虽然现存唐代的尺牍实物较少，但从一些敦煌书仪写本来看，唐代私疏平阙上下业已普遍，这在一些书仪写本中反映出来。如P. 3625号书仪，虽为书仪，而与实际尺牍的平阙形式已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是生活化的口语，其中

¹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84页；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第491页。

“谢驼”，“谢留坐茶酒”，与五代时期书家杨凝式的《韭花帖》、《夏热帖》极为相似。至于《二娘子家书》已与北宋齐头短脚尺牍毫无二致了¹。

宋承唐绪，平阙的形式更为规范和实用，作为官文书的平阙，《庆元条法事类》规定，“天神、地祇、官阙、行幸、皇太子，如此之类皆平阙。陵庙中林木，举陵庙号为官名、待制，如此之类皆不阙字。”²

宋代尺牍平阙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宋初以来的劄子，朝野上下充斥着劄子书风。劄子文体在形式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提头”样式。“每一段一提头，有五、七至九提头，谓之提头劄子。有当祝颂而云不待祝颂，有当问眷而云不敢拜问，有当请委而云不待有委，立当奉使令，皆益务自卑以尊上而已。”³

和唐以前平阙相比，宋代尺牍有以下特点：

一是唐时平与阙的界线至宋开始模糊，阙字内容反而使用较少，平抬的内容大幅度增加，凡涉及受书人，不管是名称，还是动作，乃至属于自己行为而涉及对方者，也一律平抬书之。以苏轼的《致坐久上人》为例，其中的“林下高人”、“法体”、“书”等关乎坐久上人者皆平出，而“想念”、“会见”这样虽属于自己行为而涉及对方者，也一律抬出。

¹ 学界也有人将它定为北宋太平兴国五年之物。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二娘子家书》，《敦煌研究》2001年3期。

² 《庆元条法事类》卷十六。

³ (宋)刘应李辑：《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大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69本，齐鲁出版社1995，39b。

二是本属于公牍的状表牒劄子与私人尺牍书写形式趋于合一，并守相同的平阙习惯，平抬为常，官牍流于民俗可见一斑¹。如赵鼎（1085—1147）劄子，所不同者只是署押惟多具全衔之官职，具以“右谨具呈”。

三是有平出无高抬。如蔡襄《进茶录》、《谢赐御书诗》、米芾的《向太后挽词》，其中所及天地帝皇者也不高出一字。

元代尺牍基本上恪守宋代的平阙制式，但已经出现以抬代平的现象。如柯九思《兰亭孤独本跋》，“御奎章阁”与前分行抬高一字。《元代书札选》冯子振题跋“前集贤待制冯子振奉 / 皇姊大长公主命题”，后乃高抬二字。抬头出位以代平出的现象在尺牍中也有存在。如薛植与倪云林书，凡“云林”、“远赉”、“手海”、“文候”等本是宋代平出的内容一律抬出一格。

元代甚至还出现了二层双抬现象。元刻《元典章》当中，抬头出现了平抬、单抬和双抬的情况。陕西户县道教观重阳宫蒙汉合璧《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碑》，遇“天皇圣”等字双抬，大王名讳“只”和“令”单抬。

元代尺牍类题跋虽以平出为多，但不可否认已经有高抬现象存在。刘九庵先生曾据元代平阙无高抬这一规律，以赵孟頫一幅墨竹图跋语有“子昂试绣儿墨为 / 伯庸老友作”的高抬现象，断定其不会出自赵氏笔下，²不管结论如何，恐怕方法不是很周全。

（四）明清泛滥期

如果说高抬在元尚属于特例，那么明代以后即成为普遍现象。

明初文书规定，上书题本与奏本均“抬头二字”，³平行写18字或22字，再加上抬2字，当为20字或24字。抬出的2字，分别代表抬头不同的性质和

¹（宋）欧阳修，《与陈员外书》专门提及了“状牒之仪，施于非公之仪。”吴丽娱先生有专文论及唐五代时“官牍流于民俗的过程。”详《书仪的礼书规格及诸种程序》，《唐礼摭遗》，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42—243页。

²刘九庵：古书画的“上款”与书画鉴定，《美术观察》1996年9期。

³《明会典》礼部卷七十六。

内容，此所谓的“第一抬头”（双抬）、“第二抬头”（单抬）的规定。明《昭代王章·名例》规定的抬头内容从一字至四字五字共 369 个。第一抬头大致包括了唐宋平及部分阙的内容，新增第一抬有“先师孔子”等。第二抬头有皇宫建筑的门阙、国家、监府等¹。这样，以前平出制式已被级差代替。清代抬头制度愈加复杂和严格，抬头中的“落差”现象已达到叠床架屋的地步。清初皇太极与人书信中，就对从“天地”到“明帝”再到自身最后国臣平阙的高低规格作出四级规定²。至乾隆皇帝又明令：“题奏行文凡遇天、祖等字高四格抬写，太上皇帝高三格抬写，皇帝高二格抬写。”³整个清代最多出现了第四抬头的现象。这样，宋代平抬谨敬的意义在官牍中已消失殆尽。

清代平阙形制级别等差最高，执行最严，它不仅在官牍文书，而且在科举试卷科场条例中都有明确规定。

官牍平阙往往是官僚之间私牍的晴雨表。士大夫把君臣之间的平阙带进官场之中，从宋元时期平头短脚到明清的上下参差，官牍显现的级别等差因私信平阙加以普及化，有时私书运用较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宋元平阙示敬朝分级抬头发展，为表私敬，多数平抬已经不再具有谨敬的作用。明王璟与大司寇胡老先生书，在“圣皇”、“上”、“一人”与“朝”、“奏”二级抬头之外，又在“老先生”与“手翰”之间别分为二级，这样，前后共形成了四级抬头的形式。书用正体端楷，语多虚词浮夸，抬头节节上升，礼至反而情疏，

¹按明《昭代王章·名例》规定：文书中凡录写皇帝谕旨，均单抬书写 147 个，双抬内容 222 个。郑振铎：《玄览堂丛书》卷七十三，民国三十年（1941）上海影印本。

²清代在建国伊始，天聪元年（1627 年）皇太极致袁崇焕书中称：“我乃循礼而行，书明帝比天字低一格，书我比明帝低一格，书明国臣工比我低一。……凡尔书信，书明帝比我高一格。若将明国臣与我并书，我将不受之。”从“天”到“明帝”再到“清皇太极”再到“明臣”，形成四个等差。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上，商务印书馆 1927 年初版，第 104 页。

³《大清律例》律六十四。张荣铮、刘勇强、金懋初点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年。

所以，在官僚往来的尺牍中，大多不用此式。不过，多数人对其进行了简化处理，即将奏牍两级或多级合为一级，在受书者之下又细分为二级，即题称为一级，与受书者相关的人事、动作为二级。《清代名人手札》中锡良（1853—1917）致陆宝忠书，合“特颁”、“温诏”与“朝廷”为第一级，“伯葵”（人名）与“霁范”、“身强”等为二级，这样共形成三级抬头的形式。

由于宋元所谓的平抬在有些人眼里已经失去了意义，明清有人便在抬头高低上大做文章，唯恐失敬。特别是在小简副启复书之中，经常会出现整幅笺纸上空或下空的现象，如上图藏明何良傅与人尺牍，“启之契兄先生门下”八字完全腾空，堪为奇观。

近代以来，由于打破了专制国家机关，等级多抬成为无源之水，尺牍中礼仪尊卑的观念随之淡化，基本上又恢复了传统的平抬和空抬的习惯，使尺牍平阙真正成为时代文明与个人修养的一种表现方式。

以上通过对古代尺牍平阙形式变化的历时性考察，我们发现，古代尺牍的长短行形式，从产生到发展变化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官牍直接影响到了私疏，平阙的成熟与尺牍结构程序化紧密相关。从早期的平抬谨空，一直发展到非高不敬，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与官僚政治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以及他们又如何将“齐家”“治国”的思想带入到普通相与私书之中。而对于那些视科举入仕为人生最高理想的士大夫们，《昭代王章》、《科场条例》及明清《会典》中所定的违式，大概成了平阙训练的最佳范本。¹

二 平阙的原理和方法

¹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例：试卷内失格违失者罚停三科，如遇“列圣”、“郊坛”、“宗庙”、“皇上”、“圣主”各字样，事系实用应分别三抬双抬敬谨书写，如有未经抬写或抬写不合或既经抬写复行涂点者均照违式，罚停三科；受卷官应贴而不贴，罚俸一年，朱卷同内主考官如未指出，每一名同考官降一级调用，正副考官各罚俸一年。试卷内有抬头涂抹，罚停二科，受卷官失察应贴不贴者，罚俸一年。“国膏”、“德音”等字例应双抬，朝廷、国家等例应单抬，其有单抬偶讹者，准予免议；如嘉庆十三年，湖北一等五名陈大儒考卷中“熙代”误为单抬，停罚一科，十八年四川一等一名周毅足“猷徽”二字应抬而不抬，停廪饩一年。（清）麟桂等《钦定清代科场条例》卷四十九磨勘事宜上，道光刻本。

（一）原理

尺牍往来是一种交际行为，其平阙的基础是古代社会人们相互关联与交往中的等差级别。

自西周礼乐文化兴盛以来，古代社会就无时不处在各种礼仪关系之中。孔子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常（或五伦）所定的五种人际关系，归根结蒂都是以宗法血缘为纽带，按上下尊卑差序向外扩散，形成家国伦理同构的关系网而推行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和社会交际的规范。这其中，君臣和父子代表了“国家”与“家”两种不同的秩序，父子领域，限定在私的家内，倡导“孝”的世界；君臣秩序处在公的场合，要求“忠”的使命。二者场合虽不同，但都处在皇帝统治体制之下，君主秩序是对人们行为最为强大的约束力量，“忠君敬长”是每个时代对礼的普遍要求¹。

尺牍平阙是交际关系的一种反映，自然要体现封建社会内部君臣、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等级关系。“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同样适合于平阙，“尊卑贵贱，不逾次行”。²平出与缺字、抬少与抬多的差别，其原理说到底和尊卑贵贱高下等级差别异质同构。

平阙和避讳类似，都是由最小的范围开始，进而无限扩大，后成为专制政治的怪胎。

尺牍的抬头虽始于秦，但还很难说有真正的制度，而民间尺牍的敬抬问候尚出于一种纯朴亲情。

¹[日]尾形勇著 张鹤泉译，《中国古代的家与国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第174—183页。

²《琅琊刻石》文句。

汉代官牍平阙的内容有所扩大，凡称呼皇帝（包括皇室成员）、谥号、庙号、命令（如“制”、“诏”或“制诏”）、本朝尊美（如“圣朝”“皇汉”）等崇拜对象，都列为平头的范畴，但在抬字多少上也没有统一的划分。魏晋所见尺牍实物虽有限，但平、阙形式均有所扩大。至于有唐，范围更大，且呈等级化发展，并日益与政治联系起来。《大唐六典》卷四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在这里，我们看出，平阙始延及天地、社稷、神灵、祖祧、山陵等，这已与当时的政治礼仪有了干系。据《资治通鉴》乾封二年（667）载：“十二月，甲午，诏：‘自今礼祀昊天、上帝、五帝、皇地祇、神州地祇，并以高祖、太祖配，仍合祀上帝、五帝于明堂。’”¹比照平阙，其缘由明矣。

“上事天，下事地，宗祀先祖而宠君师，是礼之三本也。”²天、地、君、亲、师作为整个封建社会的崇拜偶像，或是历代“吉礼”的祭祀内容，无疑属平阙的范畴。从宋代始，先师孔子与天地与先祖并列，成为后世的祭祀对象，所以蔡襄《谢赐御书诗》墨迹中，“孔子”、“乾坤”与“陛下”、“圣慈”同处在抬头的位置。明清时期，以君王为中心，上下衍生出一个庞大的二级词群谱系，且我们从《昭代王章·名例》看到，被列为第一抬头和第二抬头的字、词和短语近400个，无一不与皇权发生关系。而这一等级秩序在私疏中也常常见到，如黄道周《日从云间诸友札》，天地、天子是一级抬头，而日月、河岳列为二级抬头。清代平阙的范围在前代的基础之上又有所增加，尺牍中凡遇如圣、恩、驾、朝、今、京等与帝王皇权发生关系者都只许出现在尺牍抬头处了，且由二级抬头发展为四级抬头，这样，如果再加上原来的平抬和空抬，从上至下最高可呈六个等级。如清代李元度与大中丞石泉的书札中，逢天

¹《资治通鉴》卷二百一，中华书局标点本，第6353页。

²（清）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98年，第17页。

麻、北陞、恩纶、黄扉、恤赠等均为三抬¹，这比《科场条例》卷四二中规定的“抬写格式”，有过之而无不及。

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定平阙的范围和级别只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为避免因平阙违式而受处罚，或为表示对于国朝的忠心，明清不少尺牍平阙上都存在着“超标”的现象。如对于年号，从来没有列入平阙的范围，可我们从明清的尺牍和题跋中经常能看到其平抬的情况。上图藏明陈元晋尺书就将“隆庆”抬高了一字的位置。

与高居上位相比照，自然就有俯居下位者，为表示虔诚，明清尺牍常见开篇有将自己的名款落得又低又小的情况。封建社会，家国一体，书疏中的平阙不仅施于君长，也施之于尊长，所以，家礼的规范自然也渗透到尺牍当中。特别是从唐代开始，东汉以后形成的世族和庶族壁垒森严的制度基本改变，礼下庶人，尺牍平阙礼仪关系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家私书疏平阙也不能随意书写，否则就有不敬之嫌。现存敦煌唐代书仪中对此已有明确的规定。除我们前面所引郑氏书仪所定平阙之外，杜友晋《新定书仪镜》（P. 3442）分别按对象血缘关系的远近亲疏和年辈高低的不同，分为极尊、稍尊、平怀、稍卑、极卑五等，依此确定了不同的书札用语²，而相应的平阙形式也就了然其中了。不过，家书平阙与公牍平阙相比，私牍平阙只能退居其次了。换言之，在家族内，决定尊卑等级的是长幼亲疏，在社会交往中是官品的高低。如黄道周《致寰翁尺牍》，老母没有平阙，而将“翁兄”、“寰翁嫂夫人”抬高一字，“宵肝”、“恩纶”等为人主歌功颂德的词抬二字。

¹《明清名人尺牍墨宝》，中华民国十一年（1922）文明书局。

²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37—258页。

在社交领域，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规范和仪式属于“五礼”中“宾礼”的范畴。《礼记·曲礼》开篇曰“毋不敬”。郑玄释曰：“礼主于敬”。又云：“夫礼者，自卑而尊人。”¹《礼记·聘仪》也有“敬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²可见，礼与“敬”与“让”与“尊”联系在一起。君子只有处处表现出恭敬谦让的风度，才能成为有礼之士，才称得上是“君子”。所以，在人际交往中，外敬内谦是其基本原则。反映在尺牍中，就是对己自抑自贬，用谦词卑语，对人则加褒扬，用嘉词敬语；对人尊用平阙，对己卑用谦侧。如果我们对照明李如松与人书，不难明白其中凡“台颜”、“教诲”、“德受”、“候怀”、“台驾”、“翁台”、“尊安”“俯留”六处敬词，六处抬头，二处己名，均用谦侧小书形式。

（二）方法

“自卑而尊人”，首先是通过称谓词语的感情色彩表现出来的，凡此类词均与平阙息息相关，以下举例全部来自于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名家尺牍书迹，因数量众多，注不一一。

对自身用谦称。根据受书者身份的不同，自称“臣”、“民”、“晚生”、“学生”、“后学”；“鄙人”、“不才”、“不佞”、“仆”、“敝”、“愚”、“舍”、“贱”、“鄙”等，并用小字侧书的形式以体现谦卑，而对家族中的尊长，谦称为“家尊”、“家兄”等，该用平抬的用空抬，该用空抬的尽量以侧书。对方亲属称呼则用敬称如“令尊”、“令堂”、“令兄”、“令子”等，并施以平阙形式，甚至连对方的左右和从者、旆从都在平阙表现的范围之内。如苏轼《渡海帖》中，“令子”、“从者”均用平出。

¹（清）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第3页，第12页。

²《礼记集解》，第1459页。

除尊称敬指外，平阙的范围还有：一是与受书者身体、德才、居所、文章等相关的名词。如尊体、体中、动静、音容、尊履、动履、台履、眠食、体候、淑候、孝履、起居、燕居、台驾；宏才令德、远业、德义、风范、隆情、清范；尊处、尊寓、尊斋、高斋；尊念、雅意；佳篇，大笔。其与前面的动词搭配比较灵活。如承|动止修胜，伏惟|体候清胜，比来|体履佳胜，不审体力如何，阔远|清范，仰窥|雅志，等等。

二是与尺牍相关的名词。称呼对方的来函有各种各样的敬词，如尊函（翰、缄、谕、示），贶书（毕），（函）惠札（函、笺、毕、书），来示（诰、函、音、札谕），手书（教、诲、函、牍、谕），赐书（谕、书），存记，缄牍，钧谕。对方的复函称为：赐复，还函，环章，复示、诲答等。凡此类一般多为平出内容。与之搭配的动词有：奉，承，枉，接奉，接展，奉，伏奉、辱，蒙，烦等，诸如特赐|手问，忽辱|珍翰之类。

除名词之外，相关动词也常用平阙形式。

一是表示阅览一类。如果寄书人此前已与对方去书，预想对方已经收阅，相关平阙敬词有：鉴、台鉴、钧鉴、青鉴、入鉴、垂鉴，览、省览、登览，察、垂察、察收、入察，知，等等。常用搭配动词有：达（览），奉，悉，荷，蒙，谅，想等。

二是表示乞使、请求、希望、叮咛一类。如可否|借见，乞|纳之，略望|示及，必烦|照管，可否|借观数日，希|转致，乞|教正，祈|鉴谅，伏乞|亮照，乞|转致意，具稿请|教，千万|勿忘，举我一觴，不审|肯顾否，请|明示，伏乞|鉴赏，等等。

三是表示感谢一类。如欲拜|谢，恭惟|神明，人还布|谢，趋|尊斋面|谢，未由|面谢，余容面|谢，极感|远意，等等。

承，蒙，幸，荷，烦等表示对方的行为是加惠于己，多用于感谢他人对自己的眷爱和照顾，其后的动词对象均可平出。与“承”关联的词有：承教，承示，承枉重，承蒙，重承，承询等。与“蒙”相关的词有：辱蒙，亮蒙，渥蒙，夙蒙，仰蒙，前蒙，伏蒙等，与“荷”相关的词有：仰荷，谅荷，辱荷，深荷，曩荷，顷荷，幸荷等，与“幸”相关的词有：幸垂照，幸察等。

四是表示相见一类。如不获|款奉，不克|诣违，须至|面白，未知|后会之期，近者经由获|见为幸，莫能|瞻晤，不获|再会，等等。有时，表示思念之类如“驰思”、“攀仰”、“悬悬”、“翘企”等也可抬出。

平阙的动词远非以上所举。从原则上来说，一切与对象发生关系的动词，均可以列入抬头或挪抬的范围。从与受书者之间的关系来看，这些动词有的是主谓关系，有的是动宾关系，还有的是对象关系，即后者虽属致书者的行为，而涉及的对象却为对方，此亦为空格或平阙的范畴。如米芾《与新恩吏部侍郎书》中，“奉状上|贺”句，贺字上抬，因为虽是自己的行为，但贺的对象为对方，这类似日语中的动词敬式。必须注意的是，平出的动词多为谓语动词，而相关的修饰词一般不能平出。如“能|过此谈半日否”，“想不|深罪也”，“望疾为|催促”。

在平阙体词及谓词当中，如果前后为同一陈述对象，一般不作二次抬头，如名号不拆行，主谓不分行。如果前后涉及的对象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如“吾兄”之类多数人是抬兄而不抬我，如在苏轼帖中，“乞为我详推”，书者先从“为”字处断行，但为避免“我”字抬头，索性将上一“为”字涂抹，在“我”上重加一“为”字。一人多抬在苏书中也比较普遍，如“慰|左右念|亲之意”，“若不|上念|门户付嘱之重”，均为连动式结构形成一人多抬的情况。

宋后尺牍书写形式已经完备，至少包括九部分：具礼、称谓、题称、前介、本事、祝颂、结束、日期及署押。与其结构相适应，属于平出部分的有：

一是称谓部分。自古以来，尺牒称呼对方和自己既可以放在开头，还可以放在末尾，也可以前后都有，那样更加恭敬。唐宋称呼对方和自己多在文末，明清之际，以在牒首居多。无论如何，称呼对方均为抬头这一点没有改变，而题称常用尊侧书写。

二是寒暄问候起居语。如不审 | 尊体起居如何，伏愿 | 动止康和，伏惟 | 万福，初寒，惟 | 动履休胜，审 | 侍奉万福，比想 | 庆侍为道增胜，经宿 | 尊候冲胜，伏想动履之胜，且审 | 台候康胜，维 | 侍奉万福，惟冀 | 调护，等等。

三是祝颂之语，表示对受书人的关切祝福之词。以苏轼尺牒为例：“宜 | 倍万自爱”，“万万自重”，“千万 | 保重保重”，“万万 | 以时自重”等，清代尺牒类化为四字，了无生气。如祇请 | 台安，此复 | 刻安，多见之于尺牒一类书籍。

四是公牒中遗留的一些专用词。如伏惟 | 深察，伏惟 | 照察，等等。此类以阙字居多。

平阙还有一些特殊要求，如抬人不抬己，抬官不抬亲。上图《藏顾宗孟（万历四十七年进士）与表兄书》，“老母”居下，而“大兄”（包括相关的庇、念、）抬二，“母姨”抬一，“表侄”空抬。按辈分言，老母与姨母系姊妹关系，比书才表兄长一辈，较其表侄长二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悬殊，正是尊人卑己的缘故。

在凶书中，则不守生活中的平阙秩序。敦煌书仪规定，修吊答书“如亡者虽卑，书疏之中并须平阙，以幽明道异，以敬于亡者也。”¹上图藏明彭遵古（万历十四年进士）书中，将“天”与“老先生”并级同抬。

……

而凶问忽传，酸心痛骨，奈此生何已矣！无复可问

天而证心者矣。竟成千古，悲何可言。往者实受老先生之知，曲加培植，故常心感而不敢通问一字于

左右，正以先生缘令弟以知生，有令弟在，即先生可相照映。

……

尺牍平阙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加之使用对象、场合、情境之不同，同一时代也会有所变化。一般来说，宋代尺牍平阙行较短，平阙执行比较严格，行行吊脚情况较少见，明清尺牍行较长，在对待平阙动词上多宽式，吊脚多见。但一般来说，行不两挪、单字不行似乎是古代尺牍一致的要求。

此外，平阙的运用也经常因人而异。如北宋书家中，苏轼尺牍平阙堪为典范，而米芾书因势利导，平阙往往不甚严格。

¹（唐）张敖：《新集吉凶书仪》，赵和平：《敦煌写本书仪研究》，台湾新文丰1993年，第577页。

平阙的原理和方法为我们复原古代著录或文学别集中那些“有字无书”的作品提供了形式上的参照，也为还原古代尺牍书法的本来面目，繁荣当代尺牍书法创作总结了一种基本方法。

（三）平阙在其他书法类型中的表现

平阙不是尺牍的产物，它作为一种制度，与避讳一样，广泛存在于古代一切文书、书籍之中，同样也出现在其它形制的书法作品中。

尺牍平阙是在交际意义上产生的。从接受学的原理讲，一切书法作品，一旦进入流通与传播，都会形成创作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这其中，有的授受对象宽泛，是一种隐性的授受关系，如石刻书法；而有的对象明确，双方的关系甚至还通过上下款文字内容表现出来，这属显性的授受关系，这无疑是尺牍交际功能的延伸。若以此衡量，尺牍交际是一个开放的空间形态，其平阙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尺牍本身。换言之，作为最早自觉书法的形式——尺牍，其平阙的表现形式和理念也可能在手卷、题跋、条幅、楹联、斗方等凡具备一定授受关系的书法体裁和作品上表现出来。

我们读苏轼的《次辩才韵诗》，“辩才”、“师”二处均移行拾出，而《赤壁赋》文后跋语，两处“钦之”也是换行平出。这是因为诗文的接受对象和关系是明确不移的。再如我们读元代张雨的诗札长卷，诗卷、书答、题跋三者又完全合一。在古代，诗卷与尺牍经常难分彼此，或者说，古代诗札在很多时候正是在交际中产生与传播的，因此也恪守尺札的平阙形制。

书画题跋形式也常呈这样的一种状态。邹一桂《小山画谱》云：“画有一定落款处，失其所，则有伤画局。或有题，或无题。行数或长或短，或单或双，或横或直。上宜平头，下不妨参差，所谓齐头不齐脚也。如有拾写处，只

宜平抬，或空一格。”¹这里，所谓平抬和空抬正是作品在流通中尺牍平阙的一种扩大和延伸。如高凤翰画后的一跋，记录了与受画者的一段情谊，与尺牍无二。“世兄”、“（趋）庭”抬一，“（新）擢”抬二，“趋”字上阙，而“弟翰又复识”为侧书，“擢”字乃涉及对方的行为，故提行书写。²

明代高堂大轴兴起之后，仍常能见到平阙的影响。如故宫藏徐渭《墓表赋》轴（163.7×46 cm），首句“朝庭久罢孝廉科”，较其他行首高出一字，其缘于“朝庭”一词。轴类作品的款字内容，从交际的功能看，常为尺牍文字的压缩，其位置、大小、高低排列完全与尺牍的原理相同。从先后来讲，上款为受书者，下款为奉书者，且前高后低，此其一；二是各种称呼，等同尺书的敬称，并将尺牍中一些交际用语扩大为款书专用文字，如“正”（法正、教正、晒正等）、“属”（雅属、清属）、“鉴”（大鉴、法鉴）、“玩”（赏玩、雅玩），此类词语系从尺牍中来，均可成为抬头或阙字的内容。如明清书法交流中常出现的“雅政”一词，其“政”当为“正”之别用，其源头见于大王法帖中。《老学庵笔记》卷一：“王羲之之讳正，故法帖中谓正月为一月，或为初月，其他正字率以政代之。”³至于下款具名及“拙书”、“拙笔”之类以示自谦的词语，可采取小字侧书的形式。如伊秉绶“秋静”七言联，上款为“集句书奉 | 蒙泉老兄大人雅正腕”，“奉”字后抬行示敬，下款为“汀州弟伊秉绶”，“弟”与“秉绶”均为侧书小字，倍显谦恭。这些手段对于丰富书法章法，无疑是有益的补充。

尺牍平阙成就了尺牍书法的形式，而当这一独特的形式上升为艺术化语言时，其交际性就会被完全肢解。明代中后期折扇书法异军突起，成为一种重要

¹（清）邹一桂：《小山画谱》卷下，影印本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838第733页。

²《历代名画大观·题跋书法》，下册，上海书店，1997年，第158页。

³（宋）陆游：《老学庵笔记》，要剑雄、刘德权点校，中华书局1979年，第138页。

的书法类型，人们一般会将其形式上的长短错落归因于扇面的空间形状。然而，齐脚扇面也并非没有。这就是说，扇面书法形式的真正成因是出于章法的安排，而尺牍的平阙形制无疑为其重要的源头。

三 平阙的范式类型与艺术创造

（一）范式类型

平阙是尺牍形制对书写的普遍性要求，它根源于社会交际之中的等级秩序，是书仪和形制的外化。但是，在文人书家和士大夫官僚的笔下，这一形式还被赋予了礼制之外更多的含义。文人尺牍有史以来不去步趋书仪平阙，自元始渐兴的多级抬头也未曾进入尺牍书法的主流，这均说明文人尺牍书法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中国传统文人极重信札书艺，汉末赵壹所批评的“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遽迫，故不及草。草本易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正反映了书家对尺牍书法的要求从来都不苟且。《宝真斋法书赞·文忠与钱穆父书简重本二帖》载苏轼尺牍，“每自贵重。虽尺简片幅亦不苟书，遇未惬意辄更写，取妍而后出以予人，期于传世。”¹无独有偶，文徵明，“书未尝苟且，或答人简札少不当意，必再三易之而不厌，故愈老而愈精妙，有细入毫发者。或劝其草次应酬，曰‘吾以此自娱，非为人也。’”（黄佑田《衡山文公墓志铭》）可以想见，当尺牍书写被当作书艺去经营，平阙因便可能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²。而具有书法范式的意义。

¹（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中国书画全书》2册，第250页。

² [英] 贝尔：《艺术》，周金环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页。贝尔认为“在各个不同的作品中，线条、色彩的关系和组合，这些给人以审美感受的形式，我们称之为有意味的形式”。

贝尔曾说过，“当一个艺术家的头脑被一个真实的情感意象所有，又有能力把它保留在那里和把它‘翻译’出来，他就会创造一个好的构图。”¹尺牍平阙虽并非出于艺术本身的意义和目的，但毕竟体现了人之常情，授受交际关系的不同、心灵距离的远近，都会影响到书写者对图式的营造。特别是当“情”与“礼”达到统一时，平阙变成了表情达意的手段，其图式构也就暗合了书法艺术“迹乃含情”的原理。明陈继儒题跋苏轼的《答谢民师论文帖》后所言：“东坡碑版照四裔，不如尺牍天真烂漫。所谓‘吾写字觉元气十指间拂拂飞出’，此卷等是也。”苏轼与人书，其平阙使用严式典型，平阙有度，与其严谨书风相一致。这一方面体现了苏轼人格上的谦谦君子形象，另一方面，书法的自然率真亦由此涓涓流淌，形制与形式的完美结合堪为典范。

如果我们将古代平阙构成的图式加以总结，就会发现，它并非今人所理解的“平头短脚”一种形式，其图式多样化蔚为大观。如果我们捕捉平阙这一“有意味的形式”，便会发现尺幅之内有以下变化类型：

一段落式。尺牍文字被平阙分割为一个个较整齐的自然段落。如秦简家书顶格书写，即酷似段落，从换行的内容来看，这全然与宋代黄庭坚《致云夫七弟札》如出一辙。²明清阶梯式平阙形成之后，又常见有高二格书写而成的段落。

二平头短脚式。这是古代尺牍平阙中最为典型的样式，自唐宋起贯穿于尺牍书法的应用，它是平抬形式最直接的反映，其中以宋代最为典型。

三上下错落式。此为明清尺牍所特有，尤其是在与官长往还尺牍中颇为多见。其特点是上下都高低不平，错落参差，但当等级落差过大而层出不穷时，从书法形式看，往往会流于形式而失去其范式意义。

¹ [英] 克莱夫·贝尔著，周金环译：《艺术》，中国艺术联合出版公司 1984 年，第 156 页。

² 在黄庭坚与云夫七弟尺牍中，全文四处平抬，都发生在对“廿五叔母”、“诸兄弟”、“寿安姑”、“叔母”的问候处。

四上空下实式。亦或称之为落地式，最初是明代复书的格式，因信笺的上部留空较多，后来有人索性以上空为尊，自然形成。

五上实下空式。亦可称为飞天式。形式上它是平头短脚的一个特例，所不同的是，在尺牍的下部留有大片空白。

六悬空式。它综合了五、六二种尺牍形式的特点，在尺幅的上下留有较大的天头和地尾，书写在尺幅的中间展开，此式常出现在文辞较少的尺牍中。由于居中且上下参差，有时在外形上还呈现为扇式结构。

七擎天柱式。它由飞天式变化形成，因其中一行贯通上下，从外形看酷似擎天一柱。

八星罗棋布式。如果行列长短比较均匀，而其中阙字敬空占主流，那么，就会形成如棋子似的一个个眼目。阙空有利于改变因过度跳行所带的来对行气的破坏，节省空间。对比唐宋前与明清的碑刻，唐阙多抬少，而明抬多空少，甚至分层分级，抬头泛滥。

九递抬（降）式。有时因平阙偶然出现的行列突然呈现依次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呈台阶式跳跃美感。

十附加式。古人尺牍中常见有附书或别加内容的现象。这类文字如果在文中，一般要低于前文，这样在尺牍的左下方，常形成一块相对独立的单元内容，附书中照样也遵守平阙，但抬头只能限制在单元范围之内，不能高过正文，这样，便产生了填补空白的作用。有时，在有界栏的笺纸书写时会突破界栏限制，写在上下界格之外。

十一立轴式。一般来说，在与卑下或熟知的尺牍交际中，原则上是可以不计较平阙得失的，这样上下通栏直接书写，只在署名处留有一段空白，宛似一

幅缩小的立轴式作品，这也反映了明代以后高堂大轴对尺牍形式的影响。由于位势的不同，此类作品多以行草面目出现。

一般来说，以上所列的十余种图式变化类型，既有一定的时代性，也有某种个性化特点，它反映着书写者个人的审美趣味。如苏轼的尺牍书法，常平头短脚。米芾尺牍，形式上多呈段落式结构，用宽式平阙，直书而下，颠狂的个性藉此充分张扬。王铎书喜从中间起首，字行错落，多呈悬空图式。书家的个性书风潜在地影响到他们对图式的创造与选择，图式是反映他们书法风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苏轼《答谢民师帖卷》跋语中，明娄坚曾仿苏体书，补写一段阙文，也试图恢复苏书中的平阙形式，然具宽式，与苏书的严式仍有距离，我们只需将二者比较就能看出其中不同。

不过，上举所谓艺术变化的范式类型只是我们今人的审美印象。换句话说，这些图式并非书者一味为追求变化所致，多数情况下书者起笔前并非未意识到要采用哪一种固定模式，而是平阙形制自然形成的结果。在众多的图式类型中，以前三类和最后一类颇为普遍，而以第二种为根本图式。多数情况下，一幅尺牍之内常常是几种图式的混合体，所以，平阙形式还与尺牍语言的随机性有关，尺牍措辞有助于改变尺牍图式。今人尺牍书法由于抽去了尺牍语言的交际性内核，其形式上的模仿最终只能流于空洞无物。

（二）艺术创造

平阙于书法的形式构成有着积极的意义。大字、侧书和阙空通过字体大小或字距来调整和改变间距，而断行抬头是通过变换行列的齐与不齐，不齐之齐，进而形成黑白、虚实、疏密的对比以改变整个作品的章法布局和气韵节奏。总之，书写过程中的有意识中断控制，不仅造成了前后节奏上的变化，也形成了大量空白的存在。尺牍行文的自由性和不确定性，势必会产生空白的随机性，这样，黑白之间彼此错综，形式与节奏在有些书家的手下形成了完美的和谐。如被喻为“天下第二行书”的《祭侄文稿》，全文气势奔

泻，一气呵成。但如果我们细观详察，“尔父竭诚”、“（余时受）命”、“仁兄爱我”、“天不悔祸”、“（吾承）天泽”五处均有大小不等的空白，仿佛是在随意的挥洒中分割而成，这种布局和秩序的改变，有力地缓解了紧张的节奏与急泻的速度，让读者紧绷的神经得以调节。

从作品图式来看，书法形式常与平阙功能发生矛盾，这时，一些高明的书家总会采取一些迂回变通的手法避“错”。如著名的《韭花帖》虽是疏朗，但在二三行下部二字却写得比较局促，因为第一行断行已近于页脚，如果不仍依上面的字距处理，下部会与第一行呈现一样的情况，行底不成抬，自然势必会削弱敬抬的意义。另一种情况就是迁就形式。同在这通尺牍中，按“猥赐 | 盘殮”是应该分写二行的，作者大概是嫌其有害整个章法，依然照直书写，还有“修状陈谢”，为了突出“谢”字顶头位置，前三字字距紧密，又一次避免了割裂为三行的可能。此足见尺牍书法是如何惨淡经营。

再如，被米芾誉为“长史（张旭）世间第一帖”的《秋深帖》，“秋深不审 / 气力复何如也”，由于平阙形制的制约，开头四字在真行之间，换行后始入草境，这好比运动员由起跑到加速的过程。米芾的《张季明帖》，虽非专为临帖，但书此句时也使用这一形式。曹宝麟先生分析：“气力”另起，意在追摹六字一笔书的壮气逸韵。显然，平阙在米的笔下完全成为一种形式上的语言。

然而，尺牍平阙形制毕竟是在实用中自然产生形成的，“毋不敬”的功能与书写形式美之间常常会发生矛盾。形制要求唯抬是尊，特别是在明清官上尺牍中，充满了官场内逢迎之气，平阙上繁文缛节，多级抬头，严重地割裂了文句的上下联系和结构的整体性，经常是一个词七上八下，一句话四分五裂，就是当事者在抬头高低中也常常弄错。上图藏明李麟与玄陵书，刚开始还能将

“足下”、“令先祖”高平二级分开，可往后写，便不作分别，连同“令岳丈”一起均成为一抬了。可见，如果过分迁就礼仪，形式会走向极致，而变成书写的赘疣。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使尺牍平阙也开始走到尽头：等级特权的取缔从根本上消弥了平阙制度，代之而起的是行缩二字的段落普及，以前尺牍之中长短参差的形式成为历史；同趋衰落的还有笺艺，“信笺亦渐失旧型，复无新意，惟日趋于鄙倍”。¹

这样一来，千余年造就的尺牍书法美的因子从内容到形式渐渐被抽空，供文儒雅士把玩于书斋案头的精美尺牍日益淡出人们的生活空间；“迹乃含情，言唯叙事”²，尺牍只剩下了单纯的叙事特征，至于“尺牍疏书，千里面目”——书法如面的传情功能也就渐行渐远，随之远去的还有历代文人耿耿其中的风流才情和儒雅怀抱。

然而，当我们虑及尺牍书法的前途，还不至于黯然神伤。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国家级书法展览，仍不乏尺牍书法的影子，不过，“此枇杷不是彼琵琶”。当尺牍从书斋案头迈进展厅，在改变书法传播和交流方式的同时，也刷新了传统尺牍的固有观念：尺牍从形制功能迈向形式，古代尺牍平阙的图式类型无疑为书法形式的创造提供了绝佳范例。

作者简介：彭砺志，博士，1966年生，籍贯陕西咸阳。现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¹鲁迅：《〈北平笺谱〉序》，见《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5页

²（唐）张怀瓘：《书议》，《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149页。

国贼郑孝胥旅大行事心迹考实

孙海鹏

一 本文所考孝胥旅大行事依据中华书局《郑孝胥日记》，汇录为概说第一。

一 本文仅录郑孝胥旅大行事。汇录为行事第二。

一 郑孝胥作于旅大诗文于行事中依编年排列。日记中记载有诗题而集中失收者，均在行略中注明。汇录为诗文第三，可知其心迹。

一 郑孝胥于旅大交游甚广，择其重要者考其行事为交游第四。分为国人与日本人两部，依姓氏笔画排列。家人小传附于后。部分人士已为人所熟知，故不附其小传。

一 凡本文涉及主要地名均将现地名列于后，汇录为地名第五。

一 本文均使用公元纪年，附年号纪年。清辛亥后均采用民国纪年，伪满洲国纪年不用。

概说第一

郑孝胥名于世者有三。一曰诗。郑孝胥诗多宋人意，风骨高绝，沉郁萧寥，钱仲联尝云：“郑苏堪孝胥如三峰太岳，独见高标。”一曰书。郑孝胥书

法乳秦汉，胎息北碑，以雄强霸悍闻于一时。一曰变节。向者邵镜人《同光风云录》中言及孝胥“生平自负有经世才，好奇计，喜谈兵，雄辩，能折人于广座之中。”此言郑孝胥之干练通达，殊不知其变节绝仁弃义，其“经世”“奇计”“雄辩”之能皆未用于家国，于日人则极尽恭逢，除唯诺而无他。郑孝胥晚岁承逊帝溥仪惶惶“保命”“复清”之旨，与日本军国主义者密谋，仓皇出津沽，奔东北以图复辟。郑孝胥于其间大肆鼓吹“王道乐土”之悖论，与日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挟逊帝置民族大义于不顾，谋一己之私，其变节之行即自此始。我中华民族向来褒忠义，贬奸佞，世代皆然。而郑孝胥晚岁所为绝非忠义，亦不如奸佞。陈曾寿尝以严嵩父子目郑孝胥父子之跋扈，窃以为郑孝胥父子之龌龊实不如严氏父子，缘严氏父子但误国而尚未至卖国。如郑孝胥父子实则真正十恶不赦之国贼也。

郑孝胥自1910年（宣统二年）始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止25年间，凡12次赴旅顺大连。共计于旅大144日。此144日，于郑孝胥一生可谓转瞬。实则郑孝胥一生奸名正源于此百余日中。1931至1932年间，郑孝胥与日本军国主义者于旅大完成阴谋建立伪满洲国之最终策划，此一逆行，乃中国近代史中重要之史实。而诸史家尚未考其行略，治旅大地方史者亦未察。余从张松斋师治旅大地方史有年，师命海鹏考郑孝胥旅大行略，旨在揭示其阴谋，向世人昭示其于国家、于民族之大不义也。今将郑孝胥12次赴旅大之行略勾勒如下。

郑孝胥于1910年（宣统二年）2月与10月两次赴连。皆经由大连赴奉天。郑孝胥是年乃应东三省总督锡良、巡抚程德全之约，筹划锦瓌铁路及葫芦岛修筑港口事宜。其间于旅大停留3日，且留诗一首。虽行色匆匆，而郑孝胥留心旅大风土人情、街市商贸以及港口规划。其切身感受到旅大街市商贸繁荣兴旺，尤其是日人贸易往来兴隆，街市情况不似中国城市，反觉似日本城市。此一感点符合日俄战争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旅大地区实行政治倾轧、经济掠夺之事实。郑孝胥此二次赴旅大似仅为经行，实则其对东北风土人情有初步了解，为日后逆行奠定初步基础。

1929年（民国十八年）三四月间郑孝胥两次赴连。郑孝胥此两次旅大之行虽仅5日，然其先后在连会晤谢介石、周嗣培、罗振玉等人。主要任务即考察旅大以及东北政治环境，打探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溥仪小朝廷政治态度，目的在于复辟。郑孝胥曾于是年2月在天津晤罗振玉，了解周嗣培、朱庆澜诸人在旅大所持言论政见。又于费叔迁处得知张宗昌、孙传芳、陈炯明、鲍桂卿、李思浩、田中玉、潘复、张英华、林宪祖、曾毓隽、梁鸿志等人欲联合各方势力谋求复辟。故郑孝胥3月初觐见溥仪，陈述欲谋划东北之事，旋即北行。是年两次赴旅大，均小住几日即离开，除游览、饮宴之余，仅会晤罗、周少数几人，与日本新闻界个别人物有初步接触，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且行动隐晦，不事张扬，郑孝胥之老谋深算如此。

1931年（民国2年）11月溥仪在日本人安排下仓皇出天津，奔东北。其意图即欲借日本人之力，行复辟之事，殊不知日本人已将其君臣视作傀儡，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溥仪尚不自知，将一切谈判磋商权尽皆交付郑孝胥父子，其信任程度除郑孝胥外无他人。郑孝胥在1931年11月6日日记中写道：“毋失日本之热心，速应国人之欢心。此英雄之事，非官吏、文士所能解也。”由此可见郑孝胥在溥仪“出关”问题上的基本看法。其父子内则力排旧臣，若陈宝琛、陈曾寿、罗振玉、胡嗣瑗诸人；外则与日本人行蝇营狗苟之事，不惜出卖国家主权。郑孝胥自是年11月抵连，越明年（1932年）2月21日离连。在此90余日中，郑孝胥父子以其“态度灵活”而颇受日本人赏识，遂承溥仪之命，与日本人达成阴谋建立伪满洲国之初步协议。事见其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28日日记：

中岛来访。十时，与板垣、中岛、罗振玉同在大和一号房中会谈。板垣述日本与东三省事变之缘起，今大局略定，众意欲联合三省为满蒙自由国，推举宣统帝为大总统，军民分治，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满、蒙、汉、日本、朝鲜人民无分畛域，合为一体。罗振玉问何以不称皇帝，板垣谓不便推举皇帝，故先称大总统，七年一任，治安之后再上尊号，于事势为宜。郑孝胥问，总统为共和国名称，是否实行共和？设议会否？板垣谓，立法缩小，不立议会。郑问，总统何权可负责任？板垣言，三权分立，而隶于总统。于是郑孝胥言：‘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罗振玉言：‘皇帝亦可推举。不必总统，反成假共和

之局。’至此议止。三时半，板垣、中岛来覲，六时半始下。夜，板垣请上至军校俱乐部晚宴。宿大和。

板垣征四郎于前一日（27日）抵达旅顺，郑孝胥在大连得到此消息后随即驱车赴旅顺，与板垣在日本酒馆共进晚餐，且是日宿旅顺大和旅馆。由此可得知，板垣在面见溥仪之前，已经将日本方面态度渗透给郑孝胥，且希望郑孝胥能够在溥仪小朝廷中保持对日有所倾向之立场。故而郑孝胥在次日（28日）谈判中有“若权归皇帝而聘用日本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之语，态度十分明了。而能够使溥仪顺利接受日本人条件的却是郑孝胥以张作霖之下场相劝告。然作为遗老之罗振玉并不知晓郑孝胥与日本人间之默契，想法几近于幼稚简单，很不合时宜地说出让日本人感到很不喜欢听的主张，那就是“不能没有皇帝”，而这也为其日后为日本人以及郑孝胥等人所严重排斥埋下伏笔。

陈曾矩《局中局外人记》中记载当时情境云：“老十八日到连，暂憩大和旅馆，约苏厂来见。苏厂怪老未先电告，言仓卒赴旅，恐难入见。欲先通一电话至旅。老辞之。言此来只尽己之心，若不得见，亦无可如何。遂行。到行在，门卫日人闻老来颇表敬意，立为传达召见。是夜宿旅顺之大和旅馆。次日，又入见。第三日，苏厂父子来，言日欲在大和旅馆开会，旅客均不能容留，催老行。老言本拟即行，已命几士、午园赴连换金票，俟其返即动身也。遂见上陛辞，上嘱至连后稍缓归津。返旅顺，则苏厂父子不待几士、

午园归，已代将行李上车矣。老至连，适与几士、午园错过。及二人由旅复返连，乃知非日人开会，实板垣将到，恐老参预，故立促行也。逾日，上派人召老复入见。知板垣见上，言拟建满蒙共和国，请上为总统。上未允。老痛陈其不可，请上坚持。临辞言，臣风烛余年，恐未能再来；即来，亦恐未必能见。愿上珍重。凄然而行。至连，苏厂来，神气不似此前之高兴。言此事是罗叔言办坏，将从此不管。老责灾之，言汝随上来，不离左右，此事岂罗一人之责！此时乃言不管，何以对上？渠默然无辞。老遂归。”此段记述足见郑孝胥父子之跋扈阴险。

郑孝胥父子与日本人之“默契”程度超出溥仪所有近侍重臣，溥仪对板垣征四郎代表日本军部所提出要求稍微有所“犹豫”之时，又是郑氏父子“力排众议”，2月24日日记云：

郑垂九时半至行在请对，力请勿驳。同对者罗振玉、商衍瀛、万绳 皆不敢言，惟陈曾寿力言非君主不可。郑垂复引少康邑纶、庖正，辩难久之，上乃决。……暂许之议，十时乃定，危险之机，间不容发。盖此议不成，则本庄、板垣皆当引咎辞职，而日本陆军援立之策败矣。虽曰集权制度，观其事势，未能骤集，犹待外得日本，内得人民乃可为也。

旅顺大和旅馆密谋后仅1月有余，即于3月9日，伪满洲国于长春建立。此举倒行逆施，为天下人所不齿，而郑孝胥等人力主与日本人合作，出卖我国东北“国防”、“治安”、铁路、港湾、矿山等为代价，换取一己之利。其卖国行径，实该九死而不足以赎其身。

1933年（民国二十一年）5月与7月间郑孝胥两赴旅大。其5月赴大连，对外称其欲有“赏樱之举”。郑孝胥抵连后先后至旅顺白玉山招魂塔、大连西公园忠灵塔行礼，其无耻若此。且拜会日本关东军驻旅大军政要员，与武藤信义密谈。是年郑孝胥赴旅大自表面观之似无要事可言，无非会见友朋，与家人欢宴、游览而已。实则其所见诸人，若林博太郎、武藤信义、甘粕正彦、田冈正树、太田外世雄诸人皆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又若蒙古章嘉活佛代表陈伯材、宫子万、王春暄诸人皆为投敌卖国之流。故而郑孝胥所谓“赏樱之举”背后尽是联络日本人以及汉奸之流，行出卖国家、民族主权之事。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月21日，郑孝胥率赴日访问团20余人自长春至大连，翌日乘船赴日。4月26日始返大连。郑孝胥此行乃奉溥仪之命专程“答谢”日本皇室以及政府为建立伪满洲国所出之力。其在日行径郑孝胥有《使日日记》，观者可一识其嘴脸。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月下旬郑孝胥陪同溥仪至旅大避寒，故地重游，感慨良多。4月初至大连送溥仪访问日本，下旬又至大连迎接溥仪返回长春。郑孝胥在连一如往日，拜会关东军及满铁成员。是年3次赴旅大，皆行色匆匆，此时郑孝胥长子郑垂已死，顿失臂膀，其亦不为日本人所宠，故而沮丧之心情不言而喻。

行事第二

1910年（宣统二年）2月7日。在连1日。首次。

1910年（宣统二年） 50岁

2月6日（在沪）：早七时三刻乘“神户丸”赴大连。郑孝胥此行应东三省总督锡良、巡抚程德全之约赴奉天，筹划锦瑗铁路以及葫芦岛修筑港口事宜。

2月7日（在船上）：夜三时半停轮。

2月8日（在大连）：早七时船泊大连。上午游览街市。见日人商铺贸易频繁，华商不及之。十二时登火车赴奉天，途经金州、盖平、熊岳城、海城、大石桥。晚近十时方抵奉。车中作七律一首。

1910年（宣统二年）10月27日—28日。在连2日。二次。

10月26日（在大石桥）：乘2四时火车赴大连。

10月27日（在大连）：早七时半抵大连，住辽东旅馆。与伯安至码头，查看海港情况良久，购买大连市地图而返。午饭后乘火车至旅顺，游览街市。看白玉山招魂塔以及日俄战争遗迹。晚七时返回大连后游览街市，目睹大连已经成为纯粹之日本城市，而华人反成为寄居客。

10月28日（乘车）：上午十时半乘火车赴奉天。夜十一时方至。

是年在连3天。

1922年（民国十一年） 63岁

12月9日（在沪）：得到郑垂自青岛书信，将于十九日赴大连。恭亲王溥伟将移居大连。

12月22日（在沪）：郑垂自大连归上海，在丸船上遇黄秀伯、汪精卫。

1923年（民国十二年） 64岁

1月12日（在沪）：作《寄恭邸》诗一首。

1月23日（在沪）：郑禹将赴大连。

1929年（民国十八年）3月8日—10日。在连3日。三次。

1929年（民国十八年） 70岁

2月19日（在津）：罗振玉与郑孝胥谈周善培、朱庆澜在大连之言论。

2月20日（在津）：费叔迁与郑孝胥谈及在大连联合张宗昌、孙传芳、陈炯明、鲍桂卿、李思浩、田中玉、潘复、张英华、林宪祖、曾毓隤、梁鸿志、易某、叶某等人，谋求复辟。

3月6日（在津）：郑孝胥觐见溥仪，召对。辞行。晚八时乘华山丸赴大连。

3月7日（乘船）：凌晨四时抵大连。

3月8日（在连）：九时船入港。郑孝胥至大和旅馆访谢介石不遇。谢介石、周善培来访，在船上用餐。到星浦公园游玩，在海滩漫步。应谢介石之邀至电气公园登瀛阁晚饭，作陪者有周善培、周嗣培昆仲；《满洲日报》社会部长武田南阳。

3月9日（在连）：游览老虎滩。郑孝胥应周善培之约，至周宅用晚饭。
罗振玉、罗振常昆仲来访。

3月10日（在连）：谢介石、徐宗浩来访郑孝胥。每日新闻社石桥贞男来访。晚九时乘船离连。

1929年（民国十八年）4月26日—27日。在连2日。四次。

4月26日（在连）：午后三时郑孝胥抵大连，住大和旅馆。访周善培、周嗣培，请代约张鼎臣、梁鸿志、荆植新于东兴居晚饭。罗振玉父子自旅顺来访。

4月27日（在连）：周善培来访郑孝胥。至周寓所用午饭。午后二时登天潮丸赴天津。

是年在连5天。

1931年（民国二十年）11月19日至12月31日。在连42日。五次。

1931年（民国20年） 72岁

11月18日（在汤岗子）：溥仪欲移居旅顺。晚十一时，郑孝胥陪同其由汤岗子乘车赴大连。

11月19日（在旅顺）：溥仪一行天明至沙河口，换乘汽车，八时到旅顺。先至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十一时入住大和旅馆。

11月20日（在旅顺）：郑孝胥从报上得知日军已经攻占齐齐哈尔，马占山兵败。

11月21日（在旅顺）：罗振玉转来胡嗣瑗信，欲觐见溥仪。

11月22日（在旅顺）：郑孝胥往福州、上海、天津寄信。溥仪至旅顺黄金山打球。罗振玉本日赴吉林。

11月23日（在旅顺）：溥仪至203高地观看日俄战争战迹。胡嗣瑗来访。告云：天津《庸报》登载郑孝胥照片，以复辟首领相称。

11月24日（在旅顺）：复周嗣培、王季烈、陈懋复三函。郑孝胥陪同溥仪参观旅顺龙王塘水源地。

11月25日（在旅顺）：郑孝胥为日本人作书。得知奉天地方自治会章程。

11月26日（在旅顺）：郑孝胥陪同溥仪至黄金山打球。罗振玉自奉天回，言熙洽进三万元。溥仪转送二万元与关东军。

11月27日（在旅顺）：晚，郑孝胥应溥仪召。得赐膳。

11月28日（在旅顺）：陈曾寿、润良、川岛芳子等陪同婉容到大连。郑孝胥复胡嗣瑗函。

11月29日（在旅顺）：婉容面见溥仪。召赏郑孝胥及郑垂。

11月30日（在旅顺）：郑孝胥陪同溥仪、婉容游览海滨，登白玉山。晚陪同其于日本宪兵官舍晚饭。

12月1日（在旅顺）：罗振玉为溥仪商借肃亲王府作为居处。郑孝胥与甘粕商谈地方自治事。

12月2日（在旅顺）：郑孝胥为溥仪讲《左传》。陪同其至黄金山打球。

12月3日（在旅顺）：郑孝胥为溥仪草拟印章二枚。一曰“不忘在莒”；一曰“溲沱麦饭”。从天津《大公报》得知钱定均公开致信，劝郑孝胥为复辟事辟谣。

12月5日（在大连）：与郑垂、上角利一、安原同赴大连。先至星架浦观庄景珂宅。又至文化台，晤王季烈、宪真、胡嗣瑗、陈曾寿。至墨缘堂书店，晤薛俊臣，买《诗韵》。访笠木良明，不遇。

12月6日（在旅顺）：得天津及郑禹信。

12月7日（在旅顺）：罗振玉委郑孝胥题写经三卷。

12月8日（在旅顺）：溥仪至肃亲王府看屋。婉容自大连至旅顺。郑孝胥得天津信。

12月9日（在旅顺）：郑垂与工藤忠至大连取回行李。是日，胡嗣瑗、陈曾寿搬至南方旅舍。

12月10日（在旅顺）：郑垂回天津。郑孝胥决定在大连租屋，委托王季烈为觅仆人，租得文化台九十五号。为溥仪讲《左传》。

12月11日（在旅顺）：郑孝胥从陈曾寿处得知四川刘文辉将来觐见溥仪，且承诺百万元。是日，作四绝句。

12月12日（在旅顺）：郑孝胥晤罗振玉，得见杜天一所作自救会广告。广东黄诰、温肃等2余人联名上书，劝溥仪复辟。

12月13日（在旅顺）：日本组建新内阁，犬养毅任内阁总理。郑孝胥为溥仪题《金刚经》签。

12月14日（在旅顺）：郑垂赴大连，探视郑禹是否抵连。罗振玉对郑孝胥言，日人大川周明之文学议论甚正，乃工藤忠之同志。

12月15日（在旅顺）：甘粕正彦、谢介石来见郑孝胥。关东军求溥仪劝告马占山与日本和解。熙洽进献二万元。谢介石求以熙洽组阁，郑孝胥不悦。

12月16日（在大连）：郑孝胥乞假。至大连居大和旅馆。访王季烈于文化台。

12月17日（在大连）：郑孝胥移居文化台九十五号。与王季烈作竟日之谈。宪真、润良、罗福葆来访。工藤忠来传溥仪命令，命郑孝胥至旅顺，定于3日后赴旅顺。

12月18日（在大连）：与王季烈、郑垂访宪真，久谈。又访罗福葆、宝熙。蒯若木、王季烈、宝熙来访。

12月19日（在大连、旅顺）：为宪真作古诗。上午十时，与郑垂访罗福葆，委托其为代购至天津船票。赴旅顺，觐见溥仪，命郑孝胥在家眷抵连后再赴大连。访罗振玉后返回大连。至墨缘堂取回船票。访蒯若木。王季烈来访。

12月20日（在大连、旅顺）：王季烈、罗振玉、宝熙来访。同罗振玉、郑垂至墨缘堂。与罗振玉同至旅顺。得知日本主张满蒙独立政策。

12月21日（在旅顺）：罗振玉来访郑孝胥。陪同溥仪、婉容宴请三浦、中谷局长。郑垂往天津。

12月22日（在旅顺）：复郑孝胥书，劝其至大连一游。与日人上角利一、工藤忠陪同溥仪在其寝室用中饭。午后，罗振玉来访。

12月23日（在旅顺）：为润良书册页。罗振玉来言将归祭。晚八时，祁继忠陪同郑孝胥返回大连。

12月24日（在大连）：早七时半在码头接家眷。入住文化台新居。工藤忠带来溥仪所赏赐二百元。

12月25日（在大连）：郑孝胥访王季烈、宝熙。蒯若木来，出示诗稿及书作。王季烈由墨缘堂带来汇款二百元。

12月26日（在大连）：送十一月房租一百元给王季烈。访蒯若木，观沈曾植书扇面二纸。金卓来谈，言应先取奉天警察督办清乡权，然后召集张学良部下以及满蒙人士，作为将来之禁卫军。且言及熙洽习气太重，未经战事云云。

12月27日（在大连）：从报上得知有人击毙日本兵一人。大连市内戒严。在家作书。蒯若木来访。

12月28日（在大连）：宪真、罗福葆、祁继忠传溥仪谕与郑孝胥，因戒严事，不可轻出。蒯若木约午饭。

12月29日（在大连）：从报上得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决定将以武力抗日；熙洽在奉天征兵。委托王季烈在交通银行存钱。

12月30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谈。郑禹游星浦，访江知源。

12月31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谈。郑孝胥为其远祖王文恪书《洞庭山赋》求题。江知源来访，遂同至星浦公园，在暖房中观海至日落。至辽东旅馆观百货场，遇宝熙。

是年在连 42 天。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1月1日—2月21日。在连52日。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 73岁

1月1日（在大连）：江知源来访，约明日往观其所营果园。读王季烈远祖王文恪《震泽集》。

1月2日（在大连）：郑孝胥至连山村访江知源，观壁间周嗣培所作七律。过访王季烈、宝熙。

1月3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访。郑禹至墨缘堂，归云：罗振玉未至，然电催上角利一赴旅顺。蒯若木来谈诗。

1月4日（在大连）：罗振玉来访，示其所作代东北三省宣言迎銮文。

1月5日（在大连、旅顺）：罗福葆来告，溥仪命郑孝胥速至旅顺见。遂乘车至旅顺，晤罗振玉、商衍瀛、上角利一、工藤忠、甘粕正彦等。午饭后召见郑孝胥，得知马占山已愿意与熙洽合作；板垣征四郎将在东京陆军会议后来旅顺觐见。下午四时溥仪派护军送郑孝胥返回文化台。

1月6日（在大连）：王季烈、宝熙来访郑孝胥。郑禹赴旅顺。罗福葆为郑宅代购电话机一部。

1月7日（在大连）：郑孝胥与宝熙赴俄国饭店用午饭。

1月8日（在大连）：访王季烈，不遇。是日安装电话，号码为22437。王季烈、宪真来。

1月9日（在大连）：得知朝鲜人李逢昌行刺日本天皇未果。上角利一来告，关东厅知岩田爱之助将来访郑孝胥，叮嘱郑孝胥保守满蒙复辟机密。商衍瀛、王季烈来访。

1月10日（在大连）：访商衍瀛，遇宪真，遂同赴王季烈之约。座有田冈正树、宝熙、杨咏春、郑禹、郑广渊。

1月11日（在大连）：商衍瀛自旅顺来电话，上角利一让其转告郑孝胥不要见岩田爱之助。是日，王季烈来访。

1月12日（在大连）：罗福葆来电话云，自奉天归，将来访。郑孝胥遂与王季烈、郑禹往视之。罗振玉与郑孝胥密谈。罗云：熙洽引起诸人不满，甘粕正彦将逐之。臧式毅似可用，而阚朝玺、齐恩铭尽为张作霖党羽。故洮南外三省皆有危机，应予以重视。宝熙、蒯若木来访。

1月13日（在大连）：溥仪命随侍吴天培传话，若郑垂归，可令其至旅顺。为王季烈题其远祖王文恪书《洞庭山赋》，作七古一首。王季烈携杨咏春之子杨宗瀚来访。

1月14日（在大连）：郑垂来函，将与醇府二格格媿和乘“武昌丸”于十六日赴大连。是日，与家人游星浦大和旅馆海岸，拟令郑广渊婚后居此。

1月15日（在大连）：作书与商衍瀛，请其代奏郑垂抵连时间。溥仪命随侍吴天培来询问醇府二格格媿和行期。蒯若木来。

1月16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访。

1月17日（在大连）：江知源来邀午饭，郑孝胥以齿痛谢之。为大连酒楼登瀛阁书一联。王季烈来访，言云，安原在墨缘堂云，岩田爱之助将来访郑孝胥，为防其过激，关东警察署请勿见之。是日夜，罗福葆来电话询问岩田是否来访。

1月18日（在大连）：郑垂抵连，遂赴旅顺。王季烈、蒯若木来访。

1月19日（在大连）：郑孝桯、五丁抵连。是日夜，至辽东饭店用饭。

1月20日（在大连）：与郑孝桯访王季烈。蒯若木来访郑孝胥。与孝桯及子侄辈至星浦大和旅馆海岸。晚，邀王季烈、胡靖卿及子侄于登瀛阁用饭。

1月21日（在大连）：商衍瀛及其三子来访。王季烈邀至俄国饭店用饭。郑垂赴旅顺。

1月22日（在大连）：熙洽进献八万元，谢介石向溥仪面荐熙洽组阁。溥仪怒，召郑垂、上角利一等面告之。罗振玉遂诘责谢介石。上角语郑孝胥云，徐良、谢介石等人皆诣周善培，谋划前往东京见犬养毅。

1月23日（在大连）：江知源来示答郑孝胥诗。王季烈、胡靖卿、杨宗瀚来访。

1月24日（在大连）：郑垂赴旅顺。徐良覲见溥仪。作《文化台晓望》一首（集中不载）。

1月25日（在大连）：送弟孝桎乘“大连丸”离连。陈宝琛乘“济通丸”抵连，住星浦大和旅馆。郑孝胥遂携郑垂往见之，适郑禹亦到。阻挠陈覲见溥仪。傍晚，宝琛赴旅顺。得电话，命郑垂明日赴旅顺。阅报得知，国民政府将于上海增兵二万，与日开战。徐良来访，郑孝胥避而不见。

1月26日（在大连）：郑垂赴旅顺。与郑禹赴蒯若木之约午饭，座有王季烈、胡靖卿、杨宗瀚、田中玉。田赠二绝句，约4日后晚饭。郑垂自旅顺返，言陈宝琛云，应派使与日本政府协商条约。郑垂反对。阅报得知蔡廷锴将指挥淞沪之战。

1月27日（在旅顺、大连）：郑禹等赴沪。郑孝胥与郑垂赴旅顺覲见溥仪。得知板垣征四郎明日到。溥仪命郑孝胥与罗振玉先与之谈。遂归文化台，得旅顺电话，言板垣已到，急赴旅顺，与之在日本酒馆共饭。夜宿大和旅馆。

1月28日（在旅顺）：上午十时，郑孝胥、罗振玉与板垣征四郎、通译官中岛比多吉于大和旅馆一号房中密谈。日本人主张合并东北三省建立满蒙自由国，推举溥仪为大总统，七年一任，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罗振玉主张实行帝制。郑孝胥言：“皇帝、总统之名，须加讨论。若权归皇帝而聘用

日本名人为最高顾问，必可成中日合作之效。”午后三时半，板垣、中岛觐见溥仪。晚，板垣宴请溥仪及众人。郑孝胥夜宿大和旅馆。

1月29日（在旅顺、大连）：早，溥仪召见郑孝胥、郑垂。八时，郑孝胥、罗振玉、郑垂、板垣、中岛等觐见。溥仪反对共和制，郑孝胥亦反对。归大连，在蒯若木宅中晤陈宝琛。

1月30日（在大连）：王季烈、杨咏春、杨宗瀚、蒯若木来访。是日，郑孝胥舌痛颇剧。晚赴田中玉之请，座中有宝熙、江知源、王季烈、蒯若木、杨宗瀚等。

1月31日（在大连）：至南方旅舍访陈宝琛，受到斥责。陈氏定于明日离连。日人长冈重夫、上野来访。阅报得知，国民政府将向日宣战，迁都洛阳。

2月1日（在大连）：至码头送陈宝琛，然船已开。作《遐谷》诗示宝熙、王季烈、蒯若木。宝熙来访。

2月2日（在大连）：郑垂赴旅顺。蒯若木来访。宝熙、蒯若木皆有和《遐谷》诗作。

2月3日（在大连）：郑垂访刘骧业于辽东饭店。

2月4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谈吉林事，言张之洞九子燕卿明日欲觐见溥仪。为商衍瀛题《寒灯听雨图》。上角利一来访。

2月5日（在大连）：是日除夕。王季烈、张燕卿来访，郑孝胥颇看重张氏。与郑垂访宝熙，遇杨咏春。

2月6日（在大连）：王季烈、蒯若木来访。上午九时，郑孝胥与子垂至常盘桥乘车赴旅顺。溥仪召见郑孝胥、郑垂。得晤陈曾寿、张燕卿、商衍瀛、上角利一、工藤忠。顺访罗振玉，其病已小愈。访王季烈、宝熙、蒯若木。

2月7日（在大连）：与郑垂访宪真、田中玉、江知源。郑垂赴旅顺。蒯若木、田中玉来访。

2月7日（在大连）：江知源来访。日人长冈重夫来谈，言应派万绳 赴东京鼓吹满蒙君主之说。郑垂晚八时方自旅顺返。

2月9日（在大连）：王季烈、商衍瀛来访。郑孝胥致电醇亲王五十寿辰。

2月10日（在大连）：王季烈与祺璞森、恩棣、林尊侃来访。祺璞森乃蒙古王那彦图之子，欲觐见溥仪。

2月11日（在大连）：与郑垂至中华新社答访祺璞森、恩棣、林尊侃三人。午后，郑垂赴旅顺。

2月12日（在大连）：日人长冈重夫来访，言将赴奉天、吉林、洮南。郑孝胥邀请祺璞森、恩棣、林尊侃、宝熙、王季烈、商衍瀛同至星浦大和旅馆，晚邀众人赴登瀛阁用饭，上角利一、罗福葆亦至。上角介绍祺璞森于关东军，是夜祺即赴奉天访板垣征四郎。

2月13日（在大连）：醇亲王眷属抵连。太田外世雄、万绳 来访。和宝熙《人日晚霁》七律。宴请太田外世雄、万绳 于辽东饭庄。

2月14日（在大连）：郑垂赴旅顺。祺璞森、恩棣、林尊侃来访，言及其在奉天所见日军之状。太田外世雄与其友斋藤实来访。晚，王季烈邀晚饭。

2月15日（在大连）：杨宗瀚来访，其将归北京。郑垂自旅顺返回。夜，太田外世雄来。

2月16日（在大连）：太田与笠木良明来访，同至星浦用午饭，谈东北三省事，依郑孝胥之意欲聘请日人平沼骥一郎为总顾问，笠木谓此人近于阴谋家，而推举斋藤实。笠木夜归奉天。宝熙来访。

2月17日（在大连）：与郑垂访太田外世雄、万绳。蒯若木来访。

2月18日（在旅顺）：溥仪27岁生日。早，与宝熙、毓善、郑垂赴旅顺贺寿。得晤恭亲王溥伟、罗振玉、宪真、王季烈、商衍瀛、润良、宪章、宣铎、周嗣培、金卓、李西等人。摄影后，在旅顺大和旅馆用饭。与恭亲王溥伟做长谈。午后四时返连。

2月19日（在大连）：王季烈来云，可以开列五十人名单，得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批准后，方可觐见溥仪。阅《满洲月刊》，得知奉天、吉林、黑龙江、呼伦贝尔、热河均推溥仪为元首。

2月20日（在旅顺、大连）：郑孝胥得旅顺电话，与郑垂赴旅顺，与溥仪商议对日关东军司令部之措辞。郑孝胥云：“共和，则谢以未达；如议君主立宪，则告以事体繁杂，须研究讨论，果无流弊，乃试行预备，以三年为期。三年之内，惟以独裁君主、集权政府办理一切政务。如议国号、年号，则告以国

号不可改，年号或可酌改。”得溥仪默许。返连，邀请宝熙、王季烈、蒯若木、田中玉、江知源至星浦大和旅馆用饭。晚，得旅顺电话，派郑孝胥、郑垂、罗振玉、上角利一同往奉天会晤板垣征四郎。

2月21日（在大连、奉天）：得溥仪上谕，叮嘱郑孝胥等不可改变既定办法。上午九时半乘车赴奉天，随即会晤板垣征四郎。晚，板垣宴请郑孝胥等人于粹山酒馆，晤张景惠等民意代表。

2月22日（在奉天）：郑孝胥与张燕卿密谈，承诺各方代表如果一致赞成满蒙独立，将来必论功行赏。板垣征四郎来访，出示官制以及人民保障等法律条文。郑孝胥至行政委员会旁听各方代表讨论国体事宜，吉林代表谢介石、张燕卿；蒙古代表苏某等主张君主制；奉天代表金毓黼、冯涵清、李盘；黑龙江代表赵仲仁；哈尔滨代表葆康、宋文林等主张先试行君主立宪，将来改为君主制。今日来访者：邵麟；金毓黼；赵仲仁；广轮；赵欣伯；太田外世雄；笠木良明。晚十时半乘车返连。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2月23日—29日。在连7日。

2月23日（在旅顺）：早七时半郑孝胥在周水子换车赴旅顺。觐见溥仪。郑孝胥极力主张应当借日本人力量建立国家，溥仪暂定先执政一年。板垣征四郎来旅顺觐见溥仪，商定国号、年号等事。晚，郑孝胥返连。郑垂半夜始返。

2月24日（在大连）：为溥仪拟定《即位宣告文》：“满蒙人民，困于虐政，倒悬之急，孰能解之。予以不德，膺兹世乱，虽有吊民之怀，苦于援溺之术。今为人民推戴，辞让不获，勉徇再三之请，且以一年为期。必当竭愚昧之

诚，求贤智之助，除其疾痛，登之衽席。天日在上，咸使闻知。”郑垂赴旅顺，郑孝胥使之向溥仪代奏：“与日本司令部所请制度不必争辩，俟人民代表至再定行止之略。”郑垂返连，叙述今日旅顺之事。溥仪不同意民本制，不受临时执政号，引起板垣征四郎不满。上午九时半溥仪与罗振玉、商衍瀛、万绳栻、陈曾寿、郑垂等商议建国事宜。郑垂力主同意日本人要求，意为先试行临时执政，俟日后徐图之。罗振玉、商衍瀛、万绳栻皆不语。陈曾寿力主帝制。郑垂与陈辩解良久。溥仪默许板垣所定条款。板垣征四郎大悦，遂于上午十一时赴奉天向本庄繁复命。郑孝胥以为此事不可武断决定，必须外得日本支持，内得人民支持方可。是日宝熙、王季烈来访。

2月25日（在大连）：访王季烈。日人小平总治来访，取回书册。蒯若木来访。

2月26日（在大连）：上角利一来电话。张燕卿催郑垂赴奉天。垂遂以未奉溥仪之命却之。

2月27日（在大连）：郑垂赴旅顺。恭亲王溥伟来访郑孝胥，言其欲随溥仪赴奉天。王季烈来访。

2月28日（在大连）：王季烈来访。上角利一来电话云，方与罗振玉自奉天归。郑孝胥视罗若鲁昭公之公徒，颇有怨恚。

2月29日（在旅顺、大连）：郑孝胥与子垂赴旅顺觐见溥仪，溥仪欲以国务院事委郑孝胥。上角利一传本庄繁电话，命郑孝胥明日赴奉天。板垣征四郎来访。返连后赴星个浦水明庄答拜恭亲王溥伟。晚十时，乘火车赴奉天。

3月1日（在奉天）：郑孝胥访本庄繁，与之密谈。复与板垣征四郎密谈。访奉天省长臧式毅。晚，板垣邀郑孝胥、郑垂、臧式毅在日本酒家共谈。

3月2日（在奉天）：郑孝胥晤张海鹏、日人太田外世雄。

3月3日（在长春）：午后三时赴长春，与臧式毅、熙洽汇合，考察溥仪临时行宫。商议国务院各部，臧兼任民政部，熙兼任财政部。与板垣饮酒。晚，乘车返奉天。

3月4日（在奉天）：与各报记者见面。晚八时三五分乘车返连。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5日—6日。在连一日。

3月5日（在大连、旅顺）：早七时抵连。整理衣物，午后三时赴旅顺觐见溥仪，询问奉天、长春事。奉命至关东厅，与厅长山冈告别并致谢。晚宿旅顺大和旅馆。

3月6日（离连）：早七时，溥仪一行乘火车离开旅顺。九时至沙河口换车，午后四时至鞍山汤冈子，于对翠阁休息。晚，郑孝胥与板垣征四郎商定参议府、国务院名单。

3月9日（在长春）：伪满洲国成立。郑孝胥任国务院总理。郑垂、郑禹任国务院秘书官。

是年在连 60 日。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5月二日至7日。在连6日。六次。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 74岁

5月2日（在长春）：乘早九时火车赴大连。郑孝胥在车站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以乞假赴大连观赏樱花应对，且将旧作《樱花》诗示众。晚七时五十分抵连，郑禹陪同入住星浦大和旅馆。作《4月8日乞假至大连星浦》七绝诗二首。

5月3日（在旅顺）：田冈正树来访。早九时半赴旅顺，至白玉山招魂社行礼。拜访旅顺要塞司令官安藤、海军司令官津田。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约午饭。饭后参观旅顺博物馆。于洞庭街大云书库拜访罗振玉。赴龙王塘水库参观。下午返连，拜访满铁总裁林博太郎、副总裁八田嘉明。晚赴林博太郎之约于星之家酒馆用饭，武藤作陪。作诗四首（集中不载）。今日新闻记者多来采访。

5月4日（在大连）：晨起即与郑禹至星浦登星矾，绕海岸后而返，作七古《星浦樱园》一首。午后，由二警察陪同步行至大广场，观看大岛义昌塑像。日暮时分与郑禹赏樱花。作《涛声》七绝诗一首。是日，中日来访者颇多，求书者渐多。

5月5日（在大连）：日人宇佐美胜夫来访，定铁路表记，略似“王”字，以示王道之意。至西公园，向日本侵略者之忠灵塔行礼；至南公园，于太田外世雄宅中用午饭，高柳保太郎、田冈正树、金岐贤等陪座。午后至墨缘

堂，购得沈石田研一方，《钦定书经图说》二函。丁士源来访。是日作书颇多。

5月6日（在大连）：派郑禹送武藤信义赴长春。邀请太田外世雄、高柳保太郎、田冈正树、金岐贤、白井等日人至登瀛阁午饭。饭后至老虎滩，访高柳之友瓜古长造别墅，饮茶且听奏乐，兴致极高。

5月7日（在大连）：作《茶范阁诗瓜古长造别庄纪事》。上午九时乘火车赴长春。高柳保太郎、田冈正树、金岐贤等日人来送。晚七时五十分至长春，迎者甚众。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7月14日—27日。在连14日。七次。

7月14日（在大连）：乞假半月赴大连。上午九时自长春乘火车出发，赵欣伯同车赴奉天。郑孝胥在奉天晤臧式毅、驹井德三、韦焕章。晚八时抵连。满铁副总裁八田嘉明、田冈正树、太田外世雄等来迎。入住大和旅馆10五号。

7月15日（在大连）：郑孝胥拜访大连市民政署署长永井四郎、市长小川顺之助、满铁总裁林博太郎。至平和台太田外世雄宅小坐。移居星浦大和旅馆，郑禹携儿女来。

7月16日（在大连）：腹疾，食粥后愈。甘粕正彦来访。作《星浦大和旅馆赋盆花》诗一首。作《阅愿学文会试卷诗》（集中不载），拟作《旧邦新命论》（佚）。

7月17日（在大连、旅顺）：沈瑞麟来访，言及日人向苏联购买北满铁路事宜。郑孝胥应武藤信义之约赴旅顺，与之于黄金山别墅中密谈至晚六时。于关东州厅用晚饭，惟有日人大谷光瑞作陪。作《星浦》诗一首。

7月18日（在大连）：郑孝胥约武藤信义至星之家酒馆用茶点，以扇书赠武藤五律一首。作《海岸》七绝二首。是日，日人来访者甚多。

7月19日（在大连）：太田外世雄、成田努来访郑孝胥。至平和台太田宅小坐。傍晚，至星浦。

7月20日（在大连）：武田南阳来访。甘粕正彦来言将赴香港，郑孝胥书扇赠之。作《寄庵》七绝一首。

7月21日（在大连）：郑孝胥移居平和台四十五号太田寓中。会客。

7月22日（在大连）：是日会客多日人。

7月23日（在大连）：晚间，郑孝胥约高柳保太郎、田冈正树、水野梅晓来寓晚饭。

7月24日（在大连）：作书。子侄辈来拜，使之住南方旅社。水野梅晓与佃信夫来访。

7月25日（在大连）：蒙古章嘉活佛代表陈伯材、宫子万、王春暄仓皇来访郑孝胥，云为察哈尔蒙王谋划归满洲国事已被新闻所报，惧怕民国政府通缉，欲避他地。晚应大连商工会议长高田友吉之约赴西园亭观看能乐，满铁总裁林博太郎、高柳保太郎、瓜古长造等作陪。

7月26日（在大连）：作《能乐》诗（不载集中）。与郑禹及子侄辈在星浦戏水。访高孟奇、田中玉、蒯若木。田、蒯皆不遇。

7月27日（在大连）：郑孝胥得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暴亡。遂于午后四时3分乘火车赴长春。车至奉天，谢介石登车同往。郑孝胥于火车上复日本东京电，知晓由菱刈隆继任关东军司令。

是年在连 20 日。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3月21日—22日。在连2日。八次。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 75岁

3月21日（在长春）：上午九时郑孝胥率20余人乘火车赴大连。晚七时抵连。赴满铁晚宴。晚入住大和旅馆。

3月22日（在大连）：上午九时十分郑孝胥乘乌拉尔丸赴日本访问。菱刈隆自旅顺来船送行。

3月24日抵日本。开始访问。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4月26日至28日。在连3日。九次。

4月26日（在大连）：上午八时郑孝胥抵大连。会晤大连日本政要。入住星浦大和旅馆并赴晚宴。郑孝胥等家人来迎。

4月27日（在大连）：晨五时，与孝胥同在星浦海岸散步。远藤、蔡运升、李谦等人来访。

4月28日：上午九时乘火车赴长春。晚七时半抵长春。

是年在连 5 日。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1 月 21 日—26 日。在连 6 日。十次。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 76 岁

1 月 21 日（在大连）：郑孝胥随同溥仪赴大连避寒。晚七时抵旅顺，住大和旅馆。有《十二月十七日从幸旅顺》诗。

1 月 22 日（在旅顺）：郑孝胥陪同溥仪游览黄金山海岸。溥仪念及郑垂，郑孝胥黯然。郑禹赴旅顺。

1 月 23 日（在旅顺）：郑孝胥拜访旅顺港司令滨田吉治郎、旅顺要塞司令田中稔。陪同溥仪至关东州长官公署，听学校学生演奏音乐。

1 月 24 日（在旅顺）：郑孝胥陪同溥仪至镇远町旧居及大和旅馆。旅顺市长米冈规雄来访，为书旅顺市议会匾。得徐雨斋和诗。

1 月 25 日（在大连）：郑孝胥陪同溥仪至星浦，在星之家用饭后游览海岸风景。溥仪作诗一首：“沧海共一色，万里虚明心。天人同此理，相与披素襟。”郑孝胥遂和之：“王道既无外，圣功惟一心。海波平似掌，万里入胸襟。”午后三时返旅顺。

1 月 26 日：郑孝胥陪同溥仪乘火车返回长春。

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4 月 2 日—3 日。在连 1 日。十一次。

4月2日（在长春）：郑孝胥于早七时陪同溥仪自长春乘火车，下午五时3分抵大连。随即溥仪乘日本军舰赴日本。晚，郑孝胥入住星浦大和旅馆37号。

4月3日（在大连）：郑孝胥至东本愿寺，会晤大连市长小川顺之助、太田外世雄、斋藤实等人。拜访满铁总裁林博太郎、副总裁八田嘉明。笠木良明、金岐贤、中西敏宪来访。

4月4日：郑孝胥乘火车，下午五时三十分抵长春。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4月25日—27日。在连3日。十二次。

4月25日（在大连）：郑孝胥抵大连迎接溥仪。晚，入住星浦大和旅馆。

4月26日（在大连）：早，郑孝胥于星浦海边散步，见樱花已残。李谦、金岐贤、鲍观澄来访。

4月27日：陪同溥仪乘火车赴长春。

是年在连9日。

诗文第三

言为心声，诗言志，此我国诗教之根柢。揆诸郑孝胥于旅大所作之诗文，若合符契。概而言之，郑孝胥于旅大有诗三十有一，存目而不见诗者七。文一，存目而不见文者一。共存诗文计三十有二。按其内容，不外三端，一为吐露心迹抒情言志之作；一为描摹山水之作；一为酬人应景之作。

最可见郑孝胥心曲者，端为言志诸作。郑孝胥来旅大，最要者即奔走卖国求荣之事，且恬不知耻，迎合日本帝国主义谬说，以“王道”这个中国古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治境，粉饰日本帝国主义惨绝人寰的兽行霸道丑行，以致这个美好的名词至今蒙受不白之冤。王道之说于 20 世纪初之世界范畴内已成为悖论，缘于民主与科学思想已为大众所接收，且人民崇尚和平自由平等。郑孝胥为迎合日本军国主义者达到侵略我国目的，大发此奇谈怪论，且多见其诗文之中。此类诗文，皆牵强附会，尤见于其 1935 年初应松冈洋右之请于大连满铁协和会馆之演讲《王道广义》中。此文见陈邦直等所著《郑孝胥传》。郑孝胥此文看似引经据典，实则满纸荒唐，多狡辩之语，且无逻辑可言，一味鼓吹“日满亲善”，出卖主权。若“甲无排外之意，乙无侵略之心，若非以王道相兴，则何能有此现象耶？夫国家之责任安在？亦曰为其人民兴利除害而已”之语，其居心何在？今录此文，意在使世人知郑孝胥卖国之论，且由此可知其卖国之实。郑孝胥身体力行，导致“诈诡环生，终致失败”（《王道广义》中语），亦不足为怪也。

郑孝胥诗名甚著，好用险语，气象颇大。若“廿年热血心头贮，犹向寒宵作怒潮”；“老夫何异马识途，却指夷途待豪杰”；“意气人生忽相感，惟将节义见胸襟”；“静中别有吞天意，最爱奔涛日夜声”；“智者创物终相仇，孰为苍生解愁苦”句皆精妙，“热血”“豪杰”“节义”“奔涛”之类辞藻，使人顿生敬慕之感，其实不知郑孝胥辜负隽语，其“热血”心甘情愿成为民族

败类；“豪杰”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节义”之语出其口，何其大言不惭；“奔涛”促成其日夜为卖国求荣而奔走；“为苍生解愁苦”非但未成，却使我东北父老陷于倒悬，任人宰割，任由日本侵略者践踏我白山黑水大好河山，其用心何在？至于“一朝事机发，群盗何足论”；“同洲二帝欲同尊”；“七十老翁闲抱膝，思量次第便收京”；“莫从鼠窟营生活，敢请诸贤放眼看”；“廿年国破空思家”诸语口气甚大，契合郑孝胥喜“雄辩”之性格，亦可窥视郑孝胥心迹。辛亥后，郑孝胥以遗老自居，往返于京津沪诸地，除经营实业外，辄以书画吟咏自娱。实则其野心极大，蓄势待发，所以，其将自己“建功立业”置于首位，自诩有经世之才，好夸海口，刚愎自用，而不务实。其“收京”未成，却甘心卖国；而“诸贤放眼看”却看来了国土沦丧，百姓涂炭，众小丑跳梁的把戏；“廿年国破空思家”与“同洲二帝欲同尊”两句不难看出郑孝胥之丑恶嘴脸，什么是“国破”？难道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真正的国破吗？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摇旗呐喊，鼓吹王道的正是郑孝胥。“思家”之语颇令人费解，正是郑孝胥的此种“思家”导致了我东北百姓十四年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郑孝胥向来鼓吹忠君，然而竟能冒出“同尊”之语，其变节卖国实是必然。

至若其他诗文，尽同于此。上虞罗鲤厂尝言，郑孝胥以诗名者，特指其技巧而言。故其诗文重于体，而轻于质。其与郑孝胥之为人行事何其似也！

王道广义 1935年初于大连满铁协和会馆演讲

今日世界之大事安在乎？曰：在于改换人类之思想而已。百年以来，天旋地转，人事之变化，面目一新，不可复识。然万事尽变，独有一事分毫未变者，无他，即利己主义是也。利己主义之流行，则种族之争，人己之争，永无了期，因其各不相让，遂致前途塞断，终无出路。王道之学，以推己及人为本，以损人利己为戒。世人对于王道终不深信者，其意以为利己则必损人，利人则必损己，乃无可避免之事。故惟有决行利己损人之策，更不反顾，人人皆持此意，希望胜败终有一日之分，则利己之大功，亦有告成之日。岂知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彼利己者，功既难成，结局归于两败，使举世利己之策，根本动摇，无可挽救。当世列国，身入困境，进则难操必胜，退则心怀不甘，于是人类思想，渐有觉悟之机会。鄙人虽抱王道之学说，而力量微薄，不足使人深信。今日乃蒙满铁总裁松冈先生，邀来大连，阐明王道。松冈先生，名震寰宇，群认为改换思想之大家，鄙人得此机会，敢将王道被疑之处，即利人损己一节，彻底说明，使知利人并不损己，利人兼可利己，则素抱利己之策者，其思想病根，或可销减。此段即将狭义之利己思想，改变广义之利人思想，当此各不想让之日，放宽一步，即有一步之出路。前途闭塞，或有渐渐开通之日。后段再将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义说明，即是王道推行之方法。

王道推行之方法

昔宰我问孔子曰：仁者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贡亦问孔子曰：如有传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宰我子贡皆善于言语之科，其心盖怀疑王道之难行，帮巧设此言，以相诘难。如果必须从井救人，博施济众，而后可言王道，则王道未能利人，已先害己，欲以此道救世，岂可能乎？孔子告子贡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此言己为人之主体，人为己之对方，己必选能自立，然后有力量，以求立人，己必选能发达，然后施余力，以示达人，若在己者不能自立，不能发达，虽欲推己及人，亦徒托空言而已。《大学》言君子有 矩之道，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无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 矩之道，上下前后左右，皆就一己所处之地位而言。 矩则易地皆然，毫无不齐之病。故王道推行万里，亦不出 矩之范围。断不必虑及利人损己，如从井求人之为害，亦不必思及博施济众，有不能溥及之为难。洪范亦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便便；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此言人之己之间，视同一体，不必有所偏重，固不可利己而损人，亦不患利人而损己也。王道推行，即不至于受害。今所难者，惟在先施而已。今日满之间，提倡王道，其施行者，已可指证。由此再加进展，则列国考察，必多觉悟；人类思想，亦必更新。若由觉悟而趋于仿效，由更新而入于推求，则王道将为举世最新之学说，数年以后，虽风行世界可矣。

王道与科学之关系

18世纪以来，科学之兴，千变万化，此诚人类之幸福哉！然享此幸福者，骄奢淫逸，流荡忘返，于是蔑视古人，灭天理而穷人欲，幸福之享受愈优，首先之堕落愈甚，谋利之心愈急，专欲之志愈深，而又守其竞争之历史，抱其吞并之野心，遂使科学之成绩，徒以济其作恶之器械。举世之士，自矜进化，言及道德，则群讥其退化，西方则辟其宗教之迷信，东方而侮其圣哲之无知。顾科学之为物也，新出则神奇，久行则陈腐，此有彼无，必以之相轻，此利彼钝，必以之相厄。物质之为用，信独霸于当世矣。而用此物质者，即此人类。物质之殊，试以中华民国论之，崇拜欧美之制造，谓孔孟之学，不可复用于今日，一切文字，皆当废弃。其取法于欧美者，曾未得其皮毛，而已傲其圣贤，轻其父母，暴民肆虐，国内大乱。夫中华之于科学，非有所专长也，特歆慕之而已。其受害已至于此，吾谓科学之成绩，已成习见，凡我人类，试取道德而寻味之，则科学已兴之时代，视科学未行之时代，其有需于人类之道德，为急乎？为缓乎？使王道大明。复得此科学之助，则十九世纪人类之进化，其景象当为何如？明达之士，必有见于此矣。

王道可望实行之明证

满洲建国，举世所不信也；日满亲善，又举世所不信也；满洲提倡王道，亦举世所不信也；谓日满亲善已能实行王道，尤举世所不信也。举世虽不信之，而年复一年，满洲之进步甚速，日满亲善之气象甚明，有可指之以为证者。试即以满铁所为观之。建国之初，以全国国之政，委任于满铁。当时上下

之反对者，皆言可以不设交通部。政府毅然主持，卒以重任，委托于满铁。距今三年，于旧债之清理；新债之增加；路政之整顿；人材之教练；新路之速成；北铁之收买，使国防日以固，国务日以兴，人民相安，实业渐展。甲无排外之意，乙无侵略之心，若非以王道相兴，则何能有此现象耶？夫国家之责任安在？亦曰为其人民兴利除害而已。若据万里广漠之地，而不求其发展，畏首畏尾，猜忌百端，机会一失、补救无及。故任王道，则彼此相助，日起有功，不任王道，则诈谗环生，终致失败。今日亚洲之大局，亦至危矣。苟能以日满亲善之策，推而行之，共存共荣非难致也。见不及此，徒欲奋其私智，逞其私忿，所谓即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然王道之学，责己而不责人，德不足以化之，理又不足以动之，只可徐启其机，待其自悟。环境所逼，大局渐转，持和平之旨者，必可以善意服人。意阿之争，英国善于忍耐，此亦王道思想之萌芽也。今当日满协力，必有不可思议者。鄙人一知半解，率意妄言。所望松冈总裁及在座诸君，采其刍蕘，匡其不逮，使今日所讨论者，列为一时之宏议。当代君子，庶有取焉。

题恭邸移居大连诗后 1923年1月12日

皇纲昔解纽，举朝噤无言。二王义不从，仓卒东南奔。十年极穷困，赍志嗟独存。胶湾不可居，辽海聊栖屯。滔天乱未艾，孰能正乾坤。此来偿天意，抱道非难援。孤忠生众感，气类自相敦。一朝事机发，群盗何足论。狂生如夸父，追日愁黄昏。愿王慎观变，延伫依天阍。

淡路丸舟中约 1931 年 11 月 12 日

同洲二帝欲同尊，六客同舟试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不在多言。

赠甘粕大尉约 1931 年 12 月上旬

谅为烈士当如此，负咎方知疾恶深。意气人生忽相感，惟将节义见胸襟。

旅顺杂诗 1931 年 12 月 11 日

天戴空桐海渡辽，高原无际见盘雕。廿年热血心头贮，犹向寒宵作怒潮。
冬暖通宵雨似绳，回风忍作雪飞腾。人间遇事憎迟钝，造化雕 恐不胜。
弥天四海尽虚名，西抹东涂让后生。七十老翁闲抱膝，思量次第便收京。
繁霜渐觉鬓毛侵，揭日移山尚有心。狂煞拿翁自天纵，字书难字不曾寻。
地辟天开待钜观，争教理会到儒酸。莫从鼠窟营生活，敢请诸贤放眼看。

星浦 1933 年 7 月 17 日

何年奔星坠天阙，长扼惊涛作飞雪。我来踏星欲浮海，星不能飞海难越。
家山只隔海一涯，廿年国破空思家。国人望我如望岁，临海怅惘还长嗟。楼中
候潮日再至，潮声动天破吾寐。桑田沧海眼中人，袖手沉吟待天意。

书扇赠武藤大使 1933 年 7 月 18 日

岷首羊叔子，云台马伏波。风怀去人远，谈吐得天多。沧海当斜照，朱楼
出翠蛾。烹茶留片刻，不厌小诗麽。

王道二首 1933 年 7 月中旬

损人利己只一念，可使举世无安土。圣人复起更无奇，去其所争得其所。
人生托命于天地，相资以生义有取。智者造物终相仇，孰为苍生解愁苦。

妖乱相寻 2 载，弃礼蔑义逮今日。哀之不若使身受，其气既馁将自失。王道荡荡天所开，舍是安归必无术。老夫何异马识途，却指夷途待豪杰。

12 月 17 日从幸旅顺 1935 年 1 月 21 日

向时鱼服赋来归，果见龙腾破壁飞。暂息辽东怀未展，回看赤县事终非。
五铢祚永知当复，三辅民愁感式微。小待太平频拭目，乞身犹欲遂初衣。

和御制诗 1935 年 1 月 25 日

王道既无外，圣功惟一心。海波平似掌，万里入胸襟。

12 月 28 日自大连湾至奉天观日俄战处 1910 年 2 月 7 日

3 日扣舷歌小海，登车始觉入辽东。汉廷谁解施中策，广武空嗟斗两雄。
斜日高原犹血色，层冰断岸自悲风。幼安踪迹殊难测，见尾神龙论未工。

旅顺海岸约 1931 年 11 月中旬

奔腾数百步，势欲卷人去。山恶天无情，茫茫向何处。海滨比君臣，颠沛亦奚惧。朔风莫怒号，饥溺吾所虑。

龙王塘水源地 1931 年 11 月 24 日

澄流千余顷，可饮百万人。长桥若横带，清媚绝点尘。四山静相围，种松成层茵。岂知万花谷，踏遍峰峦春。去海不数里，咸波杳无垠。智者能行水，嗟尔凿井民。

文化台得宅在岩谷间名之曰遐谷以诗纪之 1932年2月1日

云峰山中白驹谷，中岳先生吟不足。此山近市绝市尘，谁抱遐心止山麓。
谷口微通斜入海，海势弯环山起伏。静中日月任窥窗，岁暮烟云欲遮屋。子真
道昭虽往矣，一叟狂歌独来复。辽东避世多名士，只有幼安可追逐。真人已出
犹龙潜，反掌乾坤见新局。岂知投老归何所，梦想旧京倚乔木。结邻莫厌暂婆
娑，自顾未甘弃沟渎。

住山 1932年2月上旬

住山意良静，自尔去人远。惟贪养怀抱，何用惜朝晚。等之逝不舍，所得
未为浅。处逸而待劳，欣然乃善遣。

四月八日乞假至大连星浦二首 1933年5月2日

抉壁施窗忆壮年，推窗海色自无边。人间正有千重恨，呵壁凭谁更问天。
含蕊殊浓开渐淡，人生花事黯何言。花前人与春俱老，惘惘沾襟岂酒痕。

星浦樱园 1933年5月4日

长春春归草未绿，直为看花乞休沐。海上樱林一夜开，举国寻春竞追逐。
朝来宿雾犹连海，紫气涨空吐郁。日光忽入如贯虹，瓔珞漫天散珠玉。云中
君下云四起，飞拥岩腰或山麓。又疑蜃气幻群姝，粉魄脂魂粲盈目。花间士女
各携酒，席地酣歌挈其族。先生微吟杂众醉，岂必独醒聊曳足。当年彩笔已难
状，残锦探怀毫更秃。沧桑回首梦龙华，炫昼崇桃语谁续。

涛声 1933年5月4日

晓色能令海气生，夕阳转觉暮空平。静中别有吞天意，最爱奔涛日夜声。

星浦大和旅馆赋盆花 1933年7月16日

南妆尚未丽，北宇饶丁香。玉簪独幽艳，兼彼二者长。此花小于簪，才可喻钗梁。皎然天下白，间色谁能富。岂可无嘉名，名之曰夜光。聊以比夜合，双璧堪辈行。玉气如白虹，意奇语非常。礼经极能事，物色收众芳。

海岸二首 1933年7月18日

玉佩琼琚困 羈，逃虚入海更安之。孟郊老去歌铜斗，却羨翻船踏浪儿。

渐苦龙沙岁月深，只将梦想寄山林。海波汨没无人处，安得成连为鼓琴。

赠宪有之 1931年12月19日

忠贤久赍志，哲嗣各超特。吁嗟此何时，为国当尽力。少康初在虞，羽山犹未殛。见君窃叹异，风骨果遗直。老夫颇相士，深浅稍能测。热中心忤上，室怒市于色。一笑契吾言，士固先器识。

江知源连山村诗 1932年1月2日

廿年隐海滨，读易忘其老。避乱复居辽，植果守荒岛。诸孙各勤学，玉立尽国宝。知子非忘世，作计不草草。狂夫来一饭，放眼穷苍昊。出门勿相笑，动静或同道。

王君九求题其十四世祖明王文恪公鏊自书洞庭两山赋卷 1932年1月13日

具区之藪吾未游，两山戏湖如双虬。震泽先生赋其状，何异浩渺拿扁舟。
文心嫖姚书隼劲，蝉蜕功名独乘兴。一篇谪解意何深，谁识先忧理尤胜。贾生
希文才可为，天下无事终难施。因时察势有轻重，蚤退斯人已见几。

人日晚霁和宝瑞臣 1932年2月13日

知存岂必兼知退，见浅何缘喻见深。倚伏孰能穷世变，废兴端欲契天心。
辽东人日寻吾党，星浦斜阳换暮阴。但饮莫论眼前事，瘦词聊与托微吟。

茶范阁诗瓜谷长造别庄纪事 1932年5月7日

深闺丽质少执礼，窈窕舒迟云欲起。肃然四坐散茶香，屏气微闻炉沸水。
鱼眼蟹眼聊比拟，细啜无声甘似醴。竹瓢陶孟漆秘器，传观疑年容谛视。箏箫
隔屏惊且喜，宛转娇憨双稚齿。乌盘雪山摹富士，咨嗟妙才妹与姊。敬宾及介
退乃已，门外 樱压桃李。

寄 庵 1933年7月20日

意气当时几许狂，堪憎老境债教偿。残年况味今参透，只是生离死别忙。

交游第四

丁士源字问槎。浙江吴兴人。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海军学校。后入上海圣约翰大学。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留学英国，学习法律。1904年（光绪三十年）回国任北京崇文门税务

总稽查。1911年（宣统三年）任陆军大臣行营处副官长。后任陆军部军法司司长等职。1913年（民国二年）任段祺瑞政府陆军少将参议。1920年（民国九年）去职。1923年（民国十二年）任天津《日日新闻》主笔。次年任安国军空军司令。1929年（民国十八年）任中华汇业银行经理。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任伪满洲国驻日本公使，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去职，任伪满中央银行监事直至光复。卒年不详。著有《陆军规则注解》、《世界海军现状》。

丁鉴修字干元。奉天盖平人。生于1886年（光绪十二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授政法科举人。回国后任东三省陆军司令部外交处处长，奉天省长公署咨议等职。1919年（民国八年）兼任日中官商合办张岭铁矿公司总办，后兼任辽阳天利煤铁公司总办。1928年（民国十七年）参加袁金铠等人组织的奉天临时委员会。“九一八”事变后，参加袁金铠组织的“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任委员。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起，任伪满交通部总长和交通部大臣。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改任伪满实业部大臣。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5月离职。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卒。年五十有六。

万绳栻字公雨，号蹊园。江西南昌人。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辛亥后人江北镇守署军事处处长。1914年（民国三年）后历任江苏督署军法课课长、淮阳观察使、长江巡阅使署参谋长等职。参与张勋复辟，任内阁阁丞。失败后于清室办事处任职。1924年（民国十三年）与溥仪一同移居天津。1931年（民国二十年）后赴东北，参与伪满洲国建立。任执政府秘书处秘书。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卒于长春。年五十有四。著《集》、《直庐日记》。

川岛芳子。原名显玕。又名金璧辉。姓爱新觉罗。满族。肃亲王善耆第十四女。生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养女。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参与制造上海“一·二八”事件。参与建立伪满洲国，任执政府女官长。后任安国军总司令。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逮捕。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在北平被枪决。年四十有二。

王季烈字晋余，后字君九，号螭庐。所居曰蔬香书屋。江苏吴县人。生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光绪三十年进士。官学部郎中。辛亥后充京师学务局局长。1928年（民国十七年）秋移居连湾，筑室文化台，名所居曰墙东辟世居。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出任伪满洲国内务官，翌年辞职，闲居北京。早岁钻研算学、理化，精通昆曲，富藏书。1952年2月1日病逝于京。年七十有九。葬于翠微山麓福田公墓。译有《近世化学教科书》、《物理学》、《通物电光》，著有《螭庐曲谈》。《螭庐未定稿》、《螭庐未定稿续编》皆为金州弟子孙宝田手抄石印本，宝田晚年尚辑《螭庐贻稿》一卷，仅存抄本。

田中玉字蕴山。直隶临渝人。生于1869年（同治八年）。1884年（光绪十年）入北洋武备学堂。次年入袁世凯所编练新军。1904年（光绪三十年）任北洋教练处总办。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任东三省督练所总参议。1911年（宣统三年）任山东兖州镇总兵。1919年（民国八年）12月任山东督军兼省长。1923年（民国十二年）因临城劫案去职。移居大连。不问政事，以诗词书

画自娱。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病逝于连。年六十有六。有《察哈尔政务辑要》、《山东政务辑要》、《行间回忆录》、《集兰亭诗联》、《蕴山自订年谱》。

江导岷字知源，别署滋园。婺源江湾人。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1893年（光绪十九年）入张謇为山长之崇明瀛州书院。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张謇任江宁文正书院山长，再度为张謇门生。后考入两江陆军学校测绘专业。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首聘江谦负责，江谦又推荐其参与筹办公司，任常驻经理，主持日常事务，负责前期测绘，与龚伯源培基雇用青壮劳力，教以拓荒护垦。后任通海海泰盐垦总管理处处长，主抓盐垦。约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寓居大连。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卒。年六十有六。

朱庆澜字子桥，一作子樵。祖籍浙江山阴。1874年（同治十三年）生于山东长清。光绪附生。1892年（光绪十八年）任黄河修复工程的河工委员。甲午后，随军赴登州海防。后随赵尔巽移镇巴蜀，充任四川巡警道。1910年（宣统二年）冬任陆军第十七镇统制官。辛亥革命被推为四川大汉军政府副都督。1912年（民国元年）任总统府军事顾问，同年11月授陆军中将。1913年（民国二年）任黑龙江省都督府参谋长、黑龙江省护军使兼署民政长。1922年（民国十一年）任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兼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1925年（民国十四年）2月辞去一切职务，专门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民国十五年）于天津组织华北慈善联合会。1930年（民国十九年）任长江水灾救济委员会主任。

“九一八”事变后，成立辽吉黑民兵抗日后援会，任会长。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任国民党政府赈务委员会委员长。1941年（民国三十年）卒于西安。年六十有七。

祁继忠。溥仪近侍。后由溥仪送至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回国后在华北伪政府任职。解放后被镇压。

关植耘又名松房。原名枯雅尔·恩棣，字稚云。满族。北京人。生于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925年（民国十四年）与溥雪斋等组织松风画社。曾任故宫博物院编纂兼第一科科长。北京中国画院画师，中国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1982年卒。有《关松房画集》。

李西本名耿昌，字东园，自号石竹山人，别署少白，亦署南北散人。祖居山东福山，后迁居金州。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光绪间以国学生选翰林院待诏。辛亥后回乡，以遗老自处。后隐居于沈阳北陵。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6月11日卒于沈阳。年五十有三。私谥忠介。精篆刻，有《石竹山人印谱》行世。越明年，灵柩运归金州，葬于石竹山下。有二子，长荣镇；次曰荣鉴号小园，善刊石。弟子张东樵鲁；刘占鳌学魁；张伯川文海皆能传其衣钵。辽阳金毓黻作《东园先生传》，述其生平最为详尽。

李谦。回族。军人。支持溥仪复辟。30年代寓居大连。

沈瑞麟字砚裔。浙江吴兴人。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光绪举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任驻比利时公使馆随员。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

代理驻德使馆二等参赞。翌年任外务部参议上行走，旋出任驻奥地利公使。1922年（民国十一年）任外交部政务次长。1925年（民国十四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总长。1929年（民国十八年）任中东铁路理事。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任伪满北满铁路首席理事，宫内府大臣。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任参议府参议，祭祀府副总裁。卒年不详。

张仁乐字燕卿，号耐甫。河北南皮人。生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九子。毕业于青岛特别高等学校。后于日本学习院文科毕业。1922年（民国十一年）任奉天省复县知事。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直隶省正定县知事。次年任天津县知事兼宣隶全省官产处坐办、盐款清理处副处长、兵灾善后清理处帮办、天津市政公署会办。1926年（民国十五年）任天津市特别区市政管理局局长、直隶省石门警察厅厅长。旋任年任交通部参事、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公署秘书。1931年（民国二十年）任长春市政筹备处处长、吉林实业厅厅长。“九一八”事变后随熙洽附逆，任伪吉林省实业厅厅长、东北行政委员会吉林代表，参与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初任伪执政就任大典筹备处督办，任内务官。伪政府成立后任实业部总长，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改任伪实业部大臣。次年任伪外交部大臣，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去职。任伪满新民会副会长。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后与韩云阶等潜逃至日本。卒年不详。

陈宝琛字伯潜，号 庵。福建闽县人。生于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同治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迁内阁学士。中法战争起，署理南洋大臣。因败绩降五级用，遂归里闲居20余年。1909年（宣统元年）复官，授学馆大

臣，补内阁学士，弼德院顾问大臣，任宣统帝师傅。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卒于北京。年八十有七。著有《沧趣楼诗集》《听水斋词》《澄秋馆印存》。二子懋复字几士。1923年溥仪赏其乾清门头等侍卫衔。甥刘骧业字午园。受陈宝琛命长期奔走于日本、东北以及各地军法之间，谋求复辟。

陈曾寿字仁先，号苍虬。湖北蕲水人。生于1877年（光绪三年）。嘉庆状元陈沆曾孙。毕业于度支部财政学堂。光绪二十九年进士。累迁监察御史。辛亥后任北京政府国务院统计局主事。张勋复辟，任学部侍郎。1924年（民国十三年）后任婉容师傅。参与建立伪满洲国。任执政府秘书，内廷局长。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任伪满宫廷府近侍处长，陵庙事务总裁。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6月辞职。迁居北京。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移居上海。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8月，病故于上海。年七十有二。著有《苍虬阁诗》《旧月词》。

宝熙字瑞臣，号沈庵，又号长白山人，别署顽山居士。所居曰锲不舍斋。正蓝旗人。光绪十八年进士。累官至内务府大臣，学部左侍郎。1929年（民国十八年）赴大连鬻书，12月7日—9日于三越楼展览。约于1931年（民国二十年）寓居大连老虎滩。参与溥仪复辟。任伪满洲国内务处处长。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病故。年七十有五。有《东游诗草》。

罗振玉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浙江上虞人。生于1866年（同治五年）。光绪诸生。光绪二十三年发起创办农学会。次年创办东文学社。历任湖

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辛亥后东渡日本，考证研究甲骨。1919年（民国八年）归国，在天津组织京旗生计维持学会、东方学会。参与溥仪复辟与伪满洲国建立，任伪满洲国参议、监察院院长、满日文化协会会长等职。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离任，退隐旅顺整理刊布所藏文物史料。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卒于旅顺。年七十有四。著述甚多，代表作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流沙坠简考释》等。弟振常字子经，号邈园。不问政事，富藏书，经营 隐庐书店多年，所刊印书籍极多。四子福葆字君羽。生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曾任执政府秘书兼总务课长，尚书府秘书官，内务府内务处长等职。

周善培字孝怀。浙江诸暨人。生于1875年（光绪元年）。光绪二十三年副贡生。二十四年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幕，助行新政。戊戌后东渡日本。归国后历充四川总督鹿传霖、奎俊、岑春煊幕。后随岑春煊转督两广，任广东将弁学堂总办。及锡良督川，任成绵道，升提法使。辛亥后避居上海。游弋于民国政坛，参与溥仪复辟活动。1927年（民国十六年）2月与弟嗣培至大连，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离连赴天津，赁屋日租界须磨街。新中国建立后，任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特邀委员。1958年卒于上海。年八十有三。著有《力书》《周易杂卦证解》《易简义》《虚字使用法》。弟嗣培字竹君，工书善画。生卒不详。画作见《近代名画大观》。

林尊侃字叔陶。生平不详

金卓字伯公。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曾经担任张宗昌副官，负责联系溥仪。伪满洲国建立后，任侍从武官。卒年不详。

宣铎字雨苍。中书科中书。罗振玉家塾师。罗继祖从其学。

宪真字有之。姓爱新觉罗。满族。肃亲王善耆第八子。毕业于旅顺工科学堂。任职于满铁调查课。1927年（民国十六年）参与满铁对蒙古图什业图旗经济资源调查行动。伪满洲国建立后，任监察院监察官。后担任伪满采金会社理事。卒年不详。弟宪章。

胡嗣瑗字晴初，亦字琴初，号仲。生于1868年（同治七年）。贵州贵阳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辛亥后，任江苏道道尹。冯国璋聘其为督军公署秘书长。张勋复辟，官内阁中丞。失败后，隐居于杭州西湖五峰草堂。后追随逊帝溥仪至天津任清室驻天津办事处顾问。1931年（民国二十年）11月至旅顺。参与建立伪满洲国。任执政府秘书处处长，充参议。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卒。年八十有一。著有《直庐日记》。

润良。姓郭布罗。达斡尔族。末代皇后婉容之弟。

徐良字善伯。广东广州人。生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徐勤之子。康有为弟子。日本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后留学美国，毕业后回国。历任北京政府司法部、外交部、内务部秘书。后任北京总统府顾问，山东督军公署顾问等职。1940年（光绪三十年）任汪伪外交部政务次长。翌年任汪伪东亚联盟中国

总会常务理事。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任汪伪中央政治局委员会第三届委员会列席委员。卒年不详。

徐宗浩字养吾，号石雪。所居曰万竹庐。江苏武进人。生于1881年（光绪七年）。幼读私塾，喜好诗文。二十岁后研习兰竹画法，精于篆刻。1926年（民国十五年）任北京中国画学研究会副会长。约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寓居大连，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离连，移居北京琉璃厂西太平巷。任北平古物陈列所顾问。1952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7年3月病逝于京。年七十有六。著有《石雪斋诗稿》《松雪斋书画考》《画竹人传》等。

商衍瀛字云亭，一作云汀。广东番禺人。生于1871年（同治十年）。光绪二十九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加侍讲衔。旋赴日本考察政治，归国后任京师大学堂斋务长、教务长。辛亥后任青岛德华高等学校国文教习。1915年（民国四年）客张勋幕。1918年（民国七年）任奉天清室办事处会办。1931年（民国二十年）至大连。参与伪满洲国建立，历任执政府秘书、宫内府会计、审查局局长、内务府处长等职。1939年辞职（民国二十八年）闲居长春直至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因年老未随溥仪逃亡，自大栗子沟返回长春。越明年迁居天津，旋即移居北京。1956年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60年11月病故于京。年八十有九。

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生于1882年（光绪八年）。光绪二十九年举人。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入京师大学堂。任山东登莱高胶道尹公署科长，奉天优级师范学堂教员。1912年（民国元年）任职于北京国务院，兼任

《亚细亚日报》编辑。1918年（民国七年）任安福会参议院议员兼秘书长。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执政府秘书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任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长兼交通部长。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任汪精卫伪政府监察院长。光复后被捕。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以汉奸罪被国民政府枪决。年六十有四。著有《爰居阁诗集》。

谢介石字又安，一作幼安，原籍福建，生于台湾新竹。生于1878年（光绪四年）。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光绪末年回国，历任福建法律讲习所总教习，吉林政法学堂教习等职。辛亥后任吉林都督府政治顾问。追随张勋复辟，任秘书长。“九一八”事变后，随熙洽附逆，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交涉署长。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3月1日，同张燕卿等至旅顺，恳请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成立后，任伪国务院外交部总长。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任参议府参议，旋任伪满驻日本国大使。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去职。卒年不详。

祺璞森字履平。蒙古王那彦图之子。

溥伟，姓爱新觉罗。号锡晋斋主。末代恭王。生于1880年（光绪六年）。光绪二十四年袭恭亲王爵。1902年授正黄旗汉军都统。1908年任禁烟大臣。辛亥后避居青岛，与肃亲王善耆组织宗社党，一生谋求复辟清室，为日本人所利用。约于1922年冬（民国十一年）奉母定居大连星浦山庄。此后长

期寓居大连。1931年10月（民国二十年）出任沈阳伪四民维持会会长。为溥仪所不容。1936年8月（民国二十五年）病故于长春。年五十有六。

蒯寿枢字若木。安徽合肥人。早年留学日本。民国初年任宁夏镇守使。曾任国民政府驻日学务总裁。从杨文会习佛学。从沈曾植习诗文。工书画，富收藏。生卒不详。

鲍观澄。江苏镇江人。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鲍鼎侄。1923年（民国十二年）任上海电话局局长。先后任白崇禧秘书长，张作霖顾问。参与伪满洲国建立。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任哈尔滨市长，后任伪满驻日本代表。卒年不详。

韞和字蕊欣。溥仪二妹。嫁郑孝胥长孙广渊。

蔡运升字品三。黑龙江双城人。生于1879年（光绪五年）。毕业于保定法政学堂。1911年（宣统三年）回双城，任中学校长，地方议会议长。历任奉天县知事、黑龙江都督府参事兼筹防处参议。1915年（民国四年）任黑龙江政务厅长。1929年（民国十八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等职。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任间岛省长。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任外务局长官。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任经济部大臣。光复后赴北平，留居马占山家中。1952年入中央文史馆。后解聘。1959年12月病逝。年八十。

熙洽字格庄、格民，号葛民，姓爱新觉罗。辽宁沈阳人。生于1883年（光绪九年）。早年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1931年（民国二十年）“九一八”事变时，代理张作相一切吉林官民政务。遂投降日本，任伪吉林省长官公署长

官。鼓吹建立伪满洲国。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任伪满洲国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任伪财政部大臣。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任伪宫内府大臣。1945年为苏联红军逮捕，解押至西伯利亚。1950年引渡回国，死于哈尔滨战犯管理所。年六十有七。

大谷光瑞。幼名峻磨，法名镜如。山口县人。生于1876年。日本京都西本愿寺第二十一代宗主大谷光尊长子，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法主。1899年游历中国。1915年至大连出席本愿寺关东别院落成典礼，并留居大连。1940年起先后任日本内阁参议，顾问等职。发起和组织大谷探险队，曾先后三次向中亚地区派遣探险队，掠夺大量珍贵文物资料。其中一部分留存于今大连图书馆、旅顺博物馆。卒于1948年10月5日。年七十有二。著有《大谷光瑞全集》。

上角利一。日本浪人。受板垣征四郎之命至天津劝说溥仪至东北。参与伪满洲国建立。

工藤铁三郎。溥仪赐名忠。青森县人。生于1882年。日本浪人。曾任陆军省以及外务省嘱托。清未来华，跟随升允参与复辟活动。伪满建立后，任溥仪宫内府侍卫长兼警卫官，后任宫内府侍卫处长。光复后回国。卒年不详。

小平总治字绥方。毕业于日本善邻书院。1910年至长沙拜王 运为师治元史。后问学于沈曾植、曾广钧。结交肃亲王善耆，客寓肃王府十余年。肃王逝后，为辑《肃忠亲王遗集》，手书刊印，1929年北平乐只书屋刊行。

太田外世雄。日本浪人。曾任日本农商省委托员，踪迹遍及中国各地。后长期寓居大连。著有《津浦山东两铁道交通圈内的直隶南部地方山东中部地方视察报告书》。

中岛比多吉。清末曾受任于袁世凯北洋讲武学堂翻译官。后于关东军任翻译官。

水野梅晓。日本曹洞宗僧人。黑龙会成员。清未来华，长期在湖南、江苏等地活动。在中国佛教界有一定影响。1925年联络中国佛教徒，召开东亚佛教联合会。在华期间进行阴谋活动。曾任伪满洲国清实录出版委员会委员。著有《满州文化》《支那佛教近世研究》《支那佛教现状》。

石桥贞男。《每日新闻》记者。

甘粕正彦。曾化名内藤雅男。日本浪人。军事特务。1912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任宪兵大尉。因杀害大杉荣全家被判无期徒刑。假释后留学法国。为发动“九一八”事变作了大量特务工作。担任板垣征四郎代表与溥仪谈判。家室长期留住大连。伪满成立后首任警务司长。1936年任伪满协和会总务兼企划部长。1939年任伪满映画会社理事长。光复时，在长春服毒自杀。

田冈正树字子长，号淮海。土佐县人。生于1863年。清末曾受任于袁世凯北洋讲武学堂翻译官。日本同文学社成员。踪迹遍及中国。长期定居大连。主持浩然诗社、同人社。1936年卒于大连。年七十有三。著有《淮海诗钞》、《游杭小草》、《楚南游草》、《汴洛游草》、《燕齐游草》、《入蜀诗纪》、《南游吟草》、《长安纪行》、《台湾游稿》、《乘槎稿》、《沪上游

集》、《保定杂诗》、《燕北小稿》、《满洲杂诗》、《槿域游草》、《归东诗纪》。编有《辽东诗坛》、《清风明月集》等。

瓜谷长造。日本商人。定居大连。与在连商界人士多有往来。在老虎滩附近购置大量土地，建有别墅区。在今文化街附近开设有医院。生平不详。

板垣征四郎。岩手县人。生于1885年。1904年毕业于东京陆军士官学校。1931年阴谋策划“九一八”事变。任伪满洲国最高军事顾问。1934年12月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1938年5月任陆相。翌年任日本侵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7月至1945年4月任驻朝鲜日军司令官。1945年4月至日本投降任日本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

佃信夫号斗南。日本浪人。黑龙会成员。长年在华进行阴谋活动，曾组织日东俱乐部。参与协助张勋进行复辟活动。后参与建立伪满洲国。

松冈洋右。山口县人。生于1880年。1893年赴美国留学。1900年毕业于阿勒贡州立法律大学。后入外务省，于福州、上海领事馆任职。日本侵占大连后任关东都督府外事课课长、外务省情报部长。1921年任满铁理事。1927年任满铁副总裁。“九一八”事变后，与军部勾结，对满铁调查部进行大规模调整充实，成为当时日本最庞大的特务机构。1935任满铁总裁。与东条英机、星野直树、鲇川义介、岸信介合称为统治中国东北“五巨头”。1937任内阁参议。1940年任日本外相。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定为甲级战犯受审。1946年6月病死狱中。著有《振兴满州》。

岩田爱之助。日本黑龙会成员。曾经在天津溥仪住所外开枪威胁。

武田南阳。大连《满洲日报》社会部长。编纂有《东北人物志》。

武藤信义。生于1868年。日本军国主义者。1892年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甲午中日战争，后任迈卫师团参谋，参加日俄战争。1926年晋级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后调任陆军教育总监。1932年再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第一任全权大使及关东军长官，翌年获元帅称号。1933年死于住所。

高柳保太郎。金泽人。生于1869年。1889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曾经参加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任兵站部长，晋升陆军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奉命出使俄国，任武官。1919年参与军部军事间谍机关“特务机关”的组建，担任机关长。1922年退役后任满铁顾问，参与策划满铁大政方针。1930年任《满洲日报》社社长。1933年任英文版《满洲日日新闻》社长。1937年年任《泰东日报》社长。定居大连。著有《满蒙观》、《满蒙的情势》、《煎茶物语》。

斋藤实。生于1858年。岩手县人。海军大将。毕业于海军兵学校。1884年赴美国留学，兼任驻美公使馆武官。归国后在日军参谋本部及海军部工作。后历任海军次官兼任军务局长、舰政本部长、朝鲜总督等职。1932年任日本首相。1936年被枪杀。

笠木良明。日本浪人。1929年曾组织具有浪人组织性质的雄峰会。积极配合关东军策划制造伪满洲国的活动。后任满铁人事课主任。伪满建立后任资政局局长。著有《大连闲话》。

菱刈隆。鹿儿岛人。生于 1871 年。毕业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曾参加中日甲午战争。1928 年任日军驻台湾司令官，晋级大将。1933 年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军长官。翌年任军事参议官。1934 年辞职回国。卒于 1952 年。

金岐贤字伯之。朝鲜人。曾经在《满蒙》杂志发表多篇文章鼓吹满蒙独立。生平不详。

附

郑垂字让于。乳名大七。福建闽县人。生于 1887（光绪十三年）年。郑孝胥长子。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长年跟随其父参与政治活动。1931 年（民国二十年）任伪满洲国国务院秘书官。1933 年（民国二十二年）2 月暴卒于长春。年四十有六。

郑禹字炎佐。乳名小七。福建闽县人。生于 1889 年（光绪十五年）。郑孝胥次子。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于日本东京成城学校读书。次年回国入上海项华书馆攻读英文三年。1911 年（宣统三年）考入英国利物浦大学土木科。1912 年（民国元年）1 月退学回国。7 月入万国函授学校土木科学习。1917 年（民国六年）在商务印书馆充任营业员。后任北京分馆协理、经理。1926 年（民国十五年）任启新洋灰公司上海南批发所经理。1930 年（民国十九年）任华堂搪瓷公司常务董事。翌年跟随其父参与伪满洲国建立。任国务院秘书官。1935 年（民国二十四年）任邮政局局长。同年 7 月充任奉天市市长。参与签订

《日满协定书》。1942年任伪满驻泰国全权公使。1944年（民国三十三年）回国任恩赏局局长。1954年被北京公安局逮捕。卒年不详。

郑孝怪字稚辛。生于1862年（同治元年）12月。郑孝胥弟。光绪辛卯举人，官至道尹。民国后任安徽省政务厅厅长。工于诗，富藏书。与张元济合编《中西编年地名人名物义诸表》。卒年不详。

金邦平字伯平。一字伯安。生于1882年（光绪八年）。郑孝胥之女郑景之夫。安徽黟县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授工科进士。任翰林院检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文案、北洋常备军督练处参议等职。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天津自治局督理，旋任资政院秘书长。1912年（民国元年）任中国银行筹办处总办。1914年（民国三年）任政事堂参议，翌年任农商次长兼全国水利局副局长，1916年任（民国五年）农商总长。长居天津从事实业活动，任天津启新洋灰公司经理。卒年不详。

郑广渊乳名九六。郑禹长子。娶溥仪二妹韞和为妻。解放后在北京某单位任工程师。

五丁。名不详。郑家子弟。

地名第五

辽东饭店：由日本人山田平三开办。位于中山区上海路6号。今大连饭店。

旅顺大和旅馆：建于1903年。今旅顺口区文化街30号。

大连大和旅馆：建于 1914 年。今中山广场四号大连宾馆。

星浦大和旅馆：原址在今星海公园内。今已不存。

星浦公园：亦称星个浦游园。建于 1911 年。今星海公园。

电气公园：建于 1909 年。1940 年后改称小村公园。光复后称鲁迅公园。后改称大连动物园。1994 年拆除。

登瀛阁：位于电气公园中的中式饭店。由钟会臣创办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六十年代被拆除。今已不存。

203 高地：位于旅顺口区三里桥。因海拔二百零三米，被称为 203 高地。日俄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重要阵地。今遗址尚存。

龙王塘水源地：建成于 1924 年。原名官房水库。位于旅顺口区龙王塘镇。今龙王塘水库公园。

肃亲王府：建于 1903 年。今旅顺口区新华大街 9 号。

黄金山：位于旅顺口区东侧。山峰险峻，1880 年清政府曾在此处修筑黄金山炮台。

文化台：今中山区文化街附近。

墨缘堂：经营书籍与文房用品的书店。由罗振玉兴办于 1929 年。旧址位于今中山区鲁迅路上。今已不存。

连山村：今沙河口区连山街附近。

常盘桥：今大连火车站西南角，长江路旁。今在地下。遗址仍存。

表忠塔：位于旅顺口区白玉山麓。建于 1907 年。1909 年完工。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为祭祀侵略者亡灵，美化侵略战争而修建。该塔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今旅顺白玉山塔。

大云书库：建于 1928 年。位于今旅顺口区洞庭街。罗振玉藏书楼。

大广场：今中山区中山广场。

西公园：1898 年由沙俄统治者修建，因位于大连市中心西部，故称西公园。1905 年由日本统治者扩建。1926 年称中央公园。今劳动公园。

忠灵塔：在西公园内。1925 年迁入。埋葬战死的日本侵略者骨灰。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证。1975 年 7 月拆除。

南公园：亦称南山麓公园。修建于 1920 年。今大连植物园。

平和台：今中山区解放路桃源街景山街附近。

关东州长官公署：建于 1900 年。今旅顺口区友好路 59 号。

东本愿寺：建于 1916 年。今中山区麒麟西巷一号。主体建筑仍存。今为大连京剧院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中国国家博物馆编，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 中华书局

郑孝胥著：《海藏楼诗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陈邦直、叶参、党痒周合编：《郑孝胥传》 满日文化协会

卞孝萱、唐文权编：《辛亥人物碑传集》 团结出版社

卞孝萱、唐文权编：《民国人物碑传集》 团结出版社

中央文史研究馆 编：《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中华书局

罗继祖：《鲁诗堂谈往录》 上海书店出版社

高丕琨：《伪满人物》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三辑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 河北人民出版社

陈玉堂编著：《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 浙江古籍出版社
